PDF-XCHANGE Click to buy NOW! www.docu-track.com

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Symposium on Tamsui Studies and the Sino-French War

一、議程表

10 月 29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09:00~09:20　【開幕式】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劉增泉主任主持
09:20~09:50　【專題演講】　清法戰爭對台灣的影響　許雪姬教授主講
09:50~10:10　茶　點

10:10~11:50　第 一 場
主持人：盧國屏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黃瑞茂	歷史建構與空間想像－－淡水世界遺產建構建築策略
馮文星	從影像圖片觀察淡水市容的演進
周澤南 徐韶君	淡水生活志－－解讀鏡頭下的淡水起居空間與在地生活

11:50~13:00　午　餐
13:00~14:40　第 二 場
主持人：周宗賢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羅運治	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
林文鎮	清法戰爭與澎湖
許毓良	清法戰爭前後的北台灣（1875~1895）—以 1892 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爲例的討論

14:40~15:00　茶　點
15:00~16:40 第 三 場
主持人：鄭瑞明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藤波　潔	十九世紀末の淡水における外国人居留地に関する一考察——「淡水地区」に関する「国際性」検視の一視角
林昌華	「焚而不燬」(Nec tamen consumebatur)－清法戰爭時期的馬偕牧師與「耶穌聖教」
紀榮達	誤解麻瘋院－－以淡水河域新莊樂生院之文化資產保存爲例

PDF-XCHANGE Click to buy NOW! www.docu-track.com

10 月 30 日(星期六)

8:30~9:00　報　到

9:00~10:40　第 四 場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黃富三 方素娥	北台首座媽祖廟關渡宮之起源與角色
簡有慶	蓬萊老祖與淡水八月「年例」祭典
王志文	淡水河岸移民宗族組織與原鄉比較------以西亭陳爲例

10:40~11:00　茶　點

11:00~12:00　第 五 場

主持人：傅錫壬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周宗賢	江頭礮臺－－中法戰爭後被遺忘的礮臺
楊蓮福 林于昉	清法戰爭滬尾戰役與淡水礮臺的再考證

12:00~13:10　午　餐

13:10~14:50　第 六 場

主持人：張勝彥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紀榮松	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
Sylvie Pasquet	從戰艦上看福爾摩沙－－法國海軍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
葉振輝	清法戰爭基隆之役

14:50~15:10　茶　點

15:10~16:50　第 七 場

主持人：吳文星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許文堂	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
陳應宗 吳春和	大龍峒陳悅記祖宅修復紀實
傅錫壬	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

16:50~17:10　【閉幕式】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劉增泉主任主持

議程全部結束 賦歸

主題演講題目：　清法戰爭對台灣的影響

許雪姬*

一、 前言

清嘉慶中葉以前，台灣之患來自島內的民變，此後來自島外的威脅日增，[1]由蔡牽侵擾台澎，鴉片戰爭時英國船接近台灣，小刀會在北台肆擾，[2]接著就是 1874 年日本出兵琅橋。清廷眼見台灣日受的威脅，決定在台開山撫番、興利除弊，並自船政大臣沈葆禎開始起在台進行自強新政。在此氛圍下，台灣受到清廷的重視自不在話下，不僅福建巡冬春駐台；刑部侍郎袁保恒還建議在台灣建省。然而到了 1879 年福建巡撫就因福建事多，不再到台灣來了。[3]翌年朝臣中分成海防派和塞防派，海防派主張防日，李鴻章主之；塞防派主張防俄，左宗棠主之；塞防派較勝，左乃得西征並建新疆省。1880 年台灣再度由福建督撫輪流來台巡閱，做短暫的停留。[4]1882 年福建巡撫張兆棟在年底起程來台，他指出台灣必須改造除基隆、滬尾、安平、旂後外的非掩藏式礮台，免得爲敵礮所趁；他也主張要重新調整行政區劃，添設文員；要架設大甲溪橋；開山撫番應循序漸進，避免原住民反抗，[5]但他的指示，在他離台後並沒有被完全落實，俗話說熱過喉嚨就忘記了，如果不是清法戰爭中法國又看上台灣，台灣要建省可能還是件遙遙無期的事。本文擬先探討中法戰爭下台灣所暴露出的弱點，接著再談清法戰爭對台灣的影響。

二、清法戰爭中台灣所顯現的危機

台灣不是清法戰爭的主戰場，但能在滬尾一役擊退法軍，使得法國首相 Jule Ferry 想要佔領基隆、淡水的願望難以實現，法國也自稱這一次的失敗，不僅令人喪氣，也永不再做佔領滬尾的打算。[6]滬尾一役打勝確實振奮人心，但是台灣也出現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

（一）派系之爭多少抵消戰力，戰後乃進行慘烈的報復行動：當清廷聞知法國覬覦台灣時，台灣的佈防乃由台灣道劉璈來主持。按台灣道雖加兵備銜，但軍事應由台灣總兵負責，但因道與總兵不和，遂由自稱知兵的劉璈來主持，他將台灣全島分爲前（澎湖）、後（花蓮、水尾、埤南、三條崙以迄鳳山界）、北（大甲溪

---

*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1 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六年），頁二一

2 此指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小刀會黃位等眾，於 七月二十四日由蘇澳闖入雞籠口內，並聯合噶瑪蘭地區土匪，築石圍、安炮位於雞籠之南，台灣文武民壯五路合圍進擊，十月二十日小刀會終告肅清。見咸豐朝宮中檔，一二〇八二號．溫廣益，<福建華僑出國的歷史和原因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頁八三。

3 世續，《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台北：華文書局，民國五十三年），卷六十八，頁十二 b，總頁六一四。

4 勒方錡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十月二十一日才到台灣。中間經裕寬、李明墀兩位福建巡撫未來台。

5 光緒朝月摺檔，九年二月十四日（批）福建巡撫張兆棟奏，<謹台灣南北各路地方海口情形並應辦事宜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批）指皇帝批示時間，而非上奏日期。

6 《中法戰爭文獻彙編》（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三）頁五六八~五六九。

以北到蘇澳）、中（曾文溪以北、大甲溪以南）、南（曾文溪以南）五路，各設統領分別負責，他因道台駐台南，特重南路防。[7]1884 年清廷派霆軍孫開華郡部來鎮守滬尾、基隆；[8]四個月後再調淮系劉銘傳以巡撫銜來台督辦軍務，劉認爲法軍必攻基隆、滬尾，兩對佈防重點有所不同，齟齬在所難免，不過戰爭在即，雙方倒還能合合。滬尾一役在孫開華、劉銘傳的努力下擊敗法軍，隨即楚系左宗棠彈劾李彤恩，認爲基隆之失（即指劉銘傳撤守基隆）乃李三次飛書向劉告急所致。劉銘傳個性頑強，乃反劾朱守謨譖言於左宗棠，並極力替李彤恩開罪，且要孫開華配合其說辭，但孫拒絕，劉銘傳遂一返其稱贊孫在滬尾一役的員獻，彈劾孫而未成。劉銘傳劍及覆及再彈劾劉璈，他認爲劉璈在清法戰爭中未盡其力配合，且有貪污等罪行，劉璈因之被充軍黑龍江，楚軍在台之勢反衰，[9]然劉璈素受南部地方人士愛戴，劉此舉觸怒了南部人民，故往後只能爭取與中、北部人士的合作。

（二）台灣在清法戰爭期間西部海岸曾被封鎖兩次，以致茶、糖、樟腦是年的出口量急遽減少，影響台灣經汴至深且鉅：台灣一旦被封鎖，無法由西海岸取得自大陸來的兵援與物援，當時來台援兵由東海岸登陸再開往西海岸。居在台灣和大陸中間的澎湖也爲孤找（Admiral A.A.P. Coubert）率軍占領，大陸、台灣雙方面都救不了澎湖。面對重要的戰爭，台灣源來只有總兵卻無法統合全台兵力，台灣之尚能一戰，因清廷在 1884 年中派劉銘傳以巡撫銜來統馭全台軍力，因而滬尾一戰獲勝，顯示台灣必須有一個駐在台灣高於台灣鎮、台灣道的官員。

（三）自 1874 年開始所實行的自強新政並不成功：在開山撫番上，正如劉璈所說，路是旋開旋閉，原住民是來服復叛，並未達成實際的效果；在練兵製器、修繕礮台方面，似亦未能完成，以致劉銘傳到台後還要趕修滬尾礮靄以因應．澎湖的東、西台，媽宮的碼台亦未能拱衛媽宮的安全，以至清法戰爭時澎湖爲法國軍隊佔領；在交通方面，前福建巡撫丁日昌要修自府城節打狗間的鐵路，林維源也應命捐出五十萬元助修，卻因移爲晉、豫賑之用而未成；[10]因此台灣的自強新政必須再進一度落實。

此外清法戰爭中土勇的表現值得重視，清法之戰雖由外援防軍爲主導作戰，但土勇與團練的協助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劉銘傳自基隆撤退，仍令林朝棟率土勇守獅球嶺，張李成（阿火）率勇協助抗亦眾所周知，往後台灣的防衛將如何進行？除了外省的防營外，是否該重用本地的土勇？或者是戰爭中加強團練的角色？

三、清法戰爭對台灣最大的影響是台灣建省

[7] 陳澹然編，《劉壯肅公（三省）奏議》，收入沈雲龍編近代史料叢刊（簡稱近史叢），一九六種，頁二七五。

[8] 光緒十年一月十八日，清廷以中法起釁，令孫開華帶印赴台戍防，二十日抵滬尾，取材自<孫開華傳包>，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

[9]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台灣政局>，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一四三~一五四。

[10] 許雪姬，<林本源及其邸園之研究>，收入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都市研究室，《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台北：該室，民國七十年），頁十九。

台灣建省之議早在 1837 年就由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吳金提出，他懲於朱一貴事件而希望在台設巡撫一名，帶兵部侍郎銜，以便統馭文武，處理錢穀、刑名、考成、調遣之責；不過朝廷卻是以派出滿漢巡台御史來台巡查做爲結論。政府主要的論點是台灣只是一個只有一府四縣的彈丸之地，那能改爲省制，在台設巡撫、建省之事於體不可，於事無益。[11]

1874 年牡丹社事件結束後，清廷令福建巡撫冬春巡台以加強對台灣政務的推行，刑部侍郎袁保恒再奏請在台設巡撫。他指出朝廷對台灣的善後工作只是派福建巡撫每年在台半年，那將拋荒福建的政務，對台灣而言，沒有大員常川駐在，福建巡撫來台之事也終將成爲具文。[12]袁侍郎可謂一言中的，但李鴻章卻認爲在台灣設巡撫仍非長久之計。他說：「筱塢（袁保恒）請改爲台灣巡撫，……爲一時之計，固非妥策，爲百年計，更非常局。[13]」李之心態如此，其他朝臣可以概見，因此總理衙門否決了台灣設巡撫之事。而福建巡撫半年駐台之成例也在 1879 年戛然而止，設非有清法戰爭，台灣建省更是遙遙無期。

清法戰爭結束後，朝臣分析檢討台灣被封鎖海岸線，澎湖被占領，往後這樣的事要能避免，必須加強建設海軍、改善礮台、購建鐵甲船；台灣應派大員駐守，而這時的劉銘傳雖已在 1884 年授爲閩撫，但他在事平的 1885 年初表示將開去福建巡撫缺，專辦台防；[14]淮系的李鴻章等人對建省的事也改變了過去的想法；楚系的左宗棠在中法戰爭期間被派爲欽差大臣以督辦福建軍務，他也仔細分析設立台灣巡撫對台灣的建設將有益處，更基於國防觀點，認爲在台設省的重要性。台灣建省既是原不相合的淮、楚派系所共同支持的事，可見建省的時機已經成熟，朝中的醇親王奕譞乃和北洋大臣李鴻章連銜奏稱：

> 臣等查台灣為南洋樞要，延　千里，民物繁富。通商以後，今昔情況迥然不同，宜有大員駐紮控制。[15]

慈禧遂以太后的名義下懿旨，這時是 1885 年的年底，旨稱：

> 台灣為南洋門戶，關繫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若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即著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詳細籌議，奏明辦理。[16]

於是乎形式上台灣於懿旨所下之日即建省，此舉也顯示清廷已將全台灣不論前山、後山都視爲清朝的領土。

不過劉銘傳卻反對台灣建省，他認爲台灣尚不具建省的條件，可先設布政使綜理錢糧較合實際。與劉銘傳不同的是，當時閩浙總督楊昌濬立刻贊成，準備配合；

---

[11] 李光濤編，《明清史料》(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民國四十二年)，戊編，第一本，頁四十。

[12] 《申報》，光緒三年二月三日，〈侍郎袁奏請福建巡撫改爲台灣巡撫〉。《清史稿》袁保恒傳中亦節有此摺，唯《申報》較詳。

[13]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鴻章)朋僚函稿》，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二種，卷十九，頁一二六六~一二六七，〈復丁雨生(日昌)中丞〉。

[14] 陳澹然編，《劉壯肅公(省三)奏議》，頁一八九~一九〇。

[15]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二百十五，頁五 b，總頁一九九五。

[16] 同上註。

何以兩位封疆大臣的見解有如此大的不同？劉銘傳認爲台灣的財政未能配合，若閩省不協餉則無以建設，換句話說台灣若未做好辦防、練兵、清賦、撫番時不言建省；[17]楊昌濬則認爲福建既會協餉也會和台省充分合作，雖然台灣只有二府八縣，設立型省似覺名實不稱，但清初也曾因地制宜設過偏沅巡撫，故在台可設台灣巡撫；至於說台灣的稅收不足，則可觀察貴州、廣西、甘肅等省，這三省的收入都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都能設省，台灣何以不能？[18]

在考慮劉、楊兩人的籌議下，朝廷決定不准劉銘傳所請，但也考慮閩台通同一氣的重要性，乃仿甘肅、新疆內外相維之制，而將台灣巡撫改爲「福建台灣巡撫」。台灣既以設省，閩、台間必須交割的事務繁多，大約經過兩年多的過渡時期，1888 年才正式分治，其分治的指標是台灣布政使邵友濂正式於是年正式啓用福建台灣布政使關防。[19]建省後首先要調整行政區劃，將台灣原來的二府改爲三府即台北府、台灣府（新設，今台中一帶）、台南府（原台灣府），新設雲林縣、苗栗縣、安平縣（由原台灣憲改稱）、台東直隸州。以今台中大墩的橋孜圖爲省會，因此台灣府是首府，台灣縣市附廓守縣，其知府、知縣都是衝、繁、疲、難四字要缺。由於省會尚未設好，因此台灣府知府暫駐彰化縣城。[20]不過因爲省會迄未建成，而台灣巡撫劉銘傳的施政亦以北部爲主，因此到繼任台灣巡撫邵友濂的時代，乃將省會於１８９４年遷到台北。

至於職官的調整方面，原來在省之下的兩個重要的布政、按察使中，台灣只設布政使，專管刑名的按察使由台灣道繼續兼辦[21]；南部地方的行政工作仍由道來主持，道的養廉銀也由原來的一千六百兩增加爲三千兩。[22]

四、軍事佈防的調整：加設澎湖鎮總兵，並調整台灣島內部防務

台灣孤懸海外，過去的軍事佈防重要防民變，並以綠營爲主。道光朝以後在防外敵，也漸由勇營代替綠營。道光朝台灣的兵雖高達一萬四千名，但隨著太平天國事件，不僅調防台灣的班兵未能如常進行，以致將三年一換改爲五年一換，還須由台灣調「臺」勇到浙江勦辦盜匪、到福建抵抗太平軍，[23]由於綠營已不可用，台灣的班兵在同治中葉已裁減一半，到同治末年又裁成四千多人，這些經設額兵不僅如常維持汛塘，還要開山、修鐵路；因此戰鬥、防衛的事則由各省調來的防軍負責。由於台地本有團練，地主亦有私家武力，慢慢地土勇在台灣防衛上也佔有一定的角色，這些兵由台灣總兵來統轄。至於在澎湖則設有澎湖水師協副

---

17 馮用，《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收入文叢本第二七六種，頁七二；《劉壯肅公(省三)奏議》，卷二，頁二六一~二六三，〈台灣暫難改省摺〉。

18 《劉銘傳撫台前後檔》，頁七五~七六。

19 許雪姬，〈福建台灣省的研究—由建省到分治〉，收入《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三期，頁二五~三八。

20 《劉壯肅公(省三)奏議》，卷六建省略，〈台灣郡縣添改撤裁摺〉。

21 《劉壯肅公(省三)奏議》，卷六建省略，頁四五五~四六〇，〈遵議台灣建省事宜摺〉。

22 光緒朝月摺檔，叔四年八月四日(批)，劉銘傳奏。

23 許雪姬，〈林文察與臺勇—臺勇內調之初探〉，收入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該所，民國七十五年)，頁三〇一~三一四。

將，常川管理二千名水兵以防衛澎湖。

清法戰爭後清廷於台灣的軍事、行政必須有最高的指揮官，乃設台灣巡撫以馭之，不過澎湖地位重要，自清收歸台灣入版圖後即很重視，雖一再加強其防禦，但卻遭法軍攻陷，因此加強澎湖的防衛可說刻不容緩。清廷在澎湖建礮台、建城，有事可固守自保，無事則其兵力可助台處理撫番事務，因此決定加設澎湖鎮總兵一名。

（一）澎湖鎮總兵的設立：清廷因經費拮据，儘量避免增設新官，而採裁改的方式，因此澎湖鎮總兵的設立乃決定和海壇總兵互調；換句話說，即海壇鎮總兵改爲副將，使兩缺互調，朝廷可不增加經費負擔。除了設總兵外，也改海壇中軍兼管左營遊擊爲澎湖中軍兼左營遊擊，使爲澎湖總兵最重要的幕僚；另改海壇右營守備爲澎湖左營守備，兼理兵餉；又裁海壇右營守備，添設澎湖左營守備。過去澎湖的兵餉一向由福建藩司（布政使）給發，兵米則由台防同知在台灣縣（即台南）撥送[24]；建省後，全部改由台灣發放。澎湖第一任總兵是淮系的吳宏洛，他在 1887 年年底履任。[25]

吳宏洛到任後首要之務有二：一是積極建設西嶼東礮台、西礮台，媽宮金龜頭礮台，風櫃尾蛇頭礮台，以及拱北礮台，以便這五個礮台既可拱衛媽宮水道也防衛來自媽宮背後的襲擊。拱北礮台的加強無疑是鑒於法國軍隊在嵵裡登陸而做的補救，至於建媽宮城則做爲崇隆澎湖鎮總兵地位的防戍之所，此城是台灣（也許清代中國）所建最後一個防禦性的城。原來媽宮的行政中心在暗澳，澎湖糧補、海防通判即駐在該地，媽宮城於 1889 年完成後，[26]成爲該地的政、軍中心，亦即不僅澎湖鎮總兵建旗在此，澎湖通判亦同城辦公，媽宮遂成爲往後迄今澎湖最重要的城市。

不幸的是清廷對澎湖的重加防衛，並未能保證澎湖在下一次戰役中不被侵擾，1895 年清日戰爭，日軍知媽宮一帶防禦嚴密，改由龍門裡正角登陸，再三天內澎湖淪陷！[27]

（二）台灣內部防務的調整

原本島內的防衛大体由台灣鎮總兵負責，但因台灣自入清廷版圖後採行以武抑文，異於內地的配置方式，總兵睥睨一切；另方面，爲了壓制鎮，道也加有兵備銜，只要道強勢就會造成文武不和；若道有治軍經驗又有重要的靠山，總兵就瞠乎其後了。[28]當清法戰爭初起，台灣總兵是吳光亮，台灣道是劉璈，兩人並不和睦，由於劉璈知兵，所以當時的閩中大員如福州將軍穆圖善、閩浙總督何璟、署福建巡撫張兆棟都認爲劉璈是辦台防的唯一人選，而不能不將吳光亮奏調回

[24] 許雪姬，〈福建台灣省的研究—由建省到分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三期，二一九。
[25] 吳宏洛任期自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到十八年六月六日因丁母憂而離職，他早在光緒十二年三月已奉派辦理澎湖防務，〈吳宏洛傳包 3387 號〉，藏故宮博物院。
[26] 林豪，《澎湖廳志》，文叢本一六四種，卷二規制，城池，頁五五，始建於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完成於十五年十月。
[27]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明治四十四年)，頁五五，戰紀。
[28] 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頁二二三~二五五。

省，另行委用；[29]也因此面對法軍的覬覦，朝廷才調派劉銘傳來台督辦防務，多少顯示對劉璈的不放心，也顯出淮系在朝中的影響力。

前曾語及劉銘傳在戰後清算楚系的孫開華（霆軍）不成，彈劾劉璈則得逞，顯示楚系在左宗棠過世後勢力漸衰，即使閩浙總督楊昌濬也是楚系，畢竟救不了劉璈。孫開華軍隊調離北台，也顯示，劉銘傳將北台灣的防衛視爲最重要，該地必須由淮軍部隊來防戍，至於南部則將一時無法清除、沒有犯過，又能與劉銘傳合作的台灣道陳鳴志留下來，使其及其他楚系軍隊協防南部地區，此舉一來不致再造成楚、淮另一次衝突，二來南部地方紳士對劉的不滿也因用了陳鳴志而沒有繼續擴大。[30]至於淮、楚兩軍的中間，及中部地區，則用了以林朝棟爲中心的土勇，將楚、淮做有效的區隔，因此淮軍的勢力除了在北台外，還包括澎湖的吳宏洛軍。

劉銘傳重用土勇有其道理，本地人爲兵對地形熟識，他又將給予領兵的利益和戰役相結合，使領兵者如林朝棟者願出死力。舉例而言，中部地區的樟腦，海口的土地都是劉銘傳給林朝棟的利權；[31]因此罩蘭一帶「番」亂發生，不僅影響治安，也影響了樟腦業，林朝棟率兵平之；又因如清丈而引起的施九緞事件，也是由林朝棟剷平。

淮軍是清朝當時最強的兵，劉銘傳在當時中國也是數一數二的將領，劉銘傳也使用淮軍做強力討伐原住民的工具，他的親征，猶如往後被稱爲「鬼佐久間」的日本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大舉剿討原住名的戰役。

以劉的威望，在其任內沒有亂兵叛兵之事，但到了文人，浙江人邵友濂繼任後就較難掌握軍隊，防軍公然對其無禮，[32]邵亦莫可奈何！而後廣東人唐景崧署理台灣巡撫，爲防範日本而招募的兵，則是他故鄉的廣勇或是河南兵（珠江南岸的兵）。洎台灣始行自強新政、加強台灣防備以後，誰是台灣的行政長官或是軍事將領，則募該領導人同鄉或相關的勇營前來台灣防戍，陸續而來的有淮軍、楚軍、黔勇（岑毓英帶來）霆軍、台州勇（劉璈任過浙江台州知府）、粵永，似乎只有與他同派系、同鄉的軍隊才能保護台灣的安全，台勇只是象徵性、利用性的存在。一旦台灣戰爭爆發，他省軍隊不必爲守台而殉台，紛紛求去，能夠自力保護台灣的只剩「臺勇」，乙未之役強力抗日的義勇軍大半是臺人，使日軍受到了比黃海之戰更大的損失！

五、淮系勢力的導入使台灣能夠順利地推行近代化的工作

所謂近代化，簡單來說是求新、求變、師夷之長技以建設地方。台灣近代化的積極推行首推劉銘傳時代（1885～1891），這六年期間朝廷有絕對支持他的醇親王奕譞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因此劉銘傳朝中有人，才能陸續推動台灣相關近代化

[29]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台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頁一二九。
[30] 同前文，頁一五八～一五九。
[31] 林資鑣〔瑞騰〕，＜先考蔭堂公家傳＞，收入林獻堂編，《林氏祖譜》（台中：昭和十一年，自刊本），頁十四～十五。
[32]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七十八種，頁一八七，＜邵友濂＞。

工作。劉銘傳性格偏急頑強，絕不居人之下，他對台灣推行的新政可謂一時俱發，事實上他也知道台灣的財政部能負擔突如其來的這些新政，但在他的強力主導下，福建每年協餉四十多萬兩，一直到 1891 年來才結束；清丈工作在清廷其他地區也未曾實行過，也在其裕材的前提下，雖有施九緞事件及清丈費徵收事件，卻也每年爲台灣的財政增加了四十多萬兩的土地稅，[33]原本台灣的各項事業都採取官督官辦，由官方做全額的投資，然而官方的財政有限，他就不得不依賴民間資本，而走向官督商辦之路。以鐵路來說，光是要徵收土地，置伐木局選枕木，由外國找工程師規劃，由軍隊來修路，這需要相當多的成本，因此在餉絀之餘，他上奏由台灣鉅紳林維源來擔任，最後因煤礦招商承辦章程紕漏，而被革職台任。[34]此舉朝廷已不採納，並被遣責，劉銘傳原本將妻、子都帶來台灣，有準備在台灣終老的打算；[35]但情勢逼得他不能不以病呈請開缺，以保留顏面，以免等到朝廷的免職。

劉銘傳在台灣進行的近代化工作其成果如何？本人另有他文評論，但其爲台灣近代化的先驅者的角色和歷史評價是毋庸置疑的。

六、清法戰爭使官紳合作的形勢更爲加強

據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鄉土重建》一書中所言，地方士紳和地方官僚是中國鄉村實際上的治理者，由於清所置地方行政機關最低的是巡檢司，只能說是現在的派出所，而與縣這一層級之間，有不少事要地方鉅紳合作下才能辦理，甚至可說是各自然村落都是在自治下，除非犯了刑事，否則一般老百姓很少見官。

清代台灣鄉村有聯甲、聯庄、團練制，用以保護地方的安全，又有董事、總理做這些相關組織的頭人，地方士紳遇到天災往往自行救濟，施粥、施衣，協助鄉人渡過難關；[36]而政府要從事地方建設，往往由巨(鉅)紳領頭，依所擁田園的甲數出貲協助，因此有人稱這種稅叫「紳士稅」，是爲了取得政府認可地方領袖的地位所付出的代價。

官紳共治固然是傳統鄉土中國中重要的治安基礎，但是藉官紳合作來開發土地，協助地方平亂，使官紳雙方共利，這方面則以劉銘傳最能利用台灣的大紳士。

台灣南部的開發較早，要能再墾出相當數量的土地有其困難，反觀中北部則尚有可開發之地及重要的資源。南部地方雖以糖的外銷爲大宗，但北部地區的茶和樟腦其大量外銷正方興未艾，尤其樟腦的產量幾可執當時世界的牛耳因而受到外商的重視，爲了掌握這些利權，並開發土地，以便台灣財政進一步穩定，好進行近代化的工作，他考慮與台北、中台(台中)的大戶林維源與林朝棟合作，前者利用其財力，後者利用其武力。

---

[33] 較舊額多出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兩，但除去補水平餘銀外，只溢出三十六萬兩，唐贊袞，《台陽見聞錄》，文叢本第三十種，頁五十二，〈清賦〉。

[34] 光緒朝月摺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批)，吏部尚書麟書奏。

[35] 劉銘傳撫台時曾在一八八七年將妻子程氏及三子盛芾、四子盛芥接到台灣，打算長居。姚永森，〈新發現的劉氏宗譜中有關劉銘傳的史料〉，《歷史檔案》，一九八五年，頁一〇一~一〇四。

[36] 陳盛韶，《問俗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一三二，〈總理〉。按經理各庄爲董事，總理數庄爲總理。

林維源是使板橋林家聲譽如日中天的重要人物，原來在清法戰爭時，他怕政府又勸捐助餉（他在向丁日昌捐出五十萬元以修鐵路時，就明白向朝廷表示，他捐出巨貲後可永不再捐，朝廷也同意），因而回到廈門去了。劉銘傳聞之，特地將他勸回，不僅捐款助軍，事平後以其爲全台撫墾大臣，在官紳合作下開發土地；但劉銘傳也以相對的利益來酬庸他，土地的取得就不用說，北部地區的樟腦也由他來包辦，甚至在劉銘傳重大的清丈事業中，本來要取消業戶的大租，改由佃戶（小租戶）納稅，而取得土地的實際所有權，在林維源等大紳士仍擁有不少大租的的情形下，劉銘傳只能彈性採用將大租減四留六，亦即土地稅原由業戶繳交，現改由小租戶交，但小租戶可以減少大租（小租戶向業戶所納者稱之）的六成，大租戶仍保有四成，這一妥協政府沒有損失，只是一田二主的局面仍然存在，亦直到日本統治後才以收買大租權的方式全部取消大租。

雖然取消大租並不完全成功，但因闢地，而終能在 1894 年台灣即將割讓時，以大嵙崁（今大溪）爲廳治而設置南雅廳（今台北縣三峽、樹林、鶯歌三鎮及桃園縣大溪鎮的全部，及台北縣土城鄉的一部分），也算是有了好的結果。[37]

林朝棟則因其叔父林文明一案剛結案，繼承其父爵位（父林文察，難蔭）而在家等待出世。之前岑毓英以福建巡撫的身分巡台時，想要利用其在黔省造橋的經驗以建大甲溪橋，很需要士紳的協助，林朝棟自備百人前往協助，且部勒有法，受岑毓英的賞識，乃將之推薦給即將來台督辦軍務的劉銘傳，因此清法之役劉銘傳會讓棟軍手在獅球嶺。劉銘傳在戰後以林朝棟之功，向朝廷建議賞穿黃馬褂，此爲台人中唯一的殊榮。林朝棟同時爲其堂叔林文欽（林獻堂父）翼附劉璈而被認爲貪墨一事擺平，林文察也得以在今台中公園一帶設有專祠。

劉銘傳需要林朝棟所部土勇防守中部地區，消極地區隔湘淮系軍，積極地開發中部的土地及樟腦資源，並給林朝棟中部撫墾大臣之銜，林朝棟也不欲襲其父之路線，而捐爲道員，以道的身份領兵，他協助劉銘傳剿罩蘭一帶反抗的原住民，又平施九緞事件已如前述，劉銘傳所給的酬庸是中部地區的樟腦權，因之林朝棟及其兄弟與頂厝的林文欽等合組「林合」以開發樟腦業，隱然執中部大家樟腦業的牛耳，[38]一直到日本統治期間將樟腦專賣前，霧峰林家都是台人中最重要的樟腦商，而林朝棟時期也是霧峰林家經濟實力達到最頂峰的時期。

號稱五大家族的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固然未與劉銘傳合作前已是台灣的大家族，但使其如日中天的則與劉銘傳大有關係，除了這兩家外，李春生也因與林維源合建六館街的家屋以租給洋人做生意而聲譽鵲起；黃宗河則以都司（最高的官位）協助劉銘傳駐兵南雅，並在馬武督一帶開發，[39]深坑黃家也是官方合作的對象，在這些家族中唯獨沒有南部的士紳，這是歷史因素使然，清算劉璈所帶來

[37] 南雅廳設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盜同知。見光緒朝月摺檔，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批），邵友濂奏。

[38] 蔡懋堂，《簡介清季台灣樟腦業概況》，收入氏所著《台灣語言民俗雜　》（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一九八〇年），頁二九七~二九八；《林氏族譜》，頁十四~十五。

[39] 許雪姬，〈武翼都尉黃宗河傳－由德興黃氏族譜及故宮檔案談起〉，收入金祥卿編《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高雄：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五年），頁四八五~四八六。

的結果不得不在此時慢慢咀嚼；而劉銘傳所有近代化的工程也都在北台舉行，甚至只在北台舉行，甚至只在北台活動，今日台灣政治上的重北輕南，其契機在劉銘傳當時已出現。另方面來說北部地方的建設則火速地進行，台北成爲台灣政經中心的雛形已建立。

七、結論

清法戰爭是台灣自清廷收入版圖後，第一次受到最嚴重的挑戰（即使乙未之役，台灣都不在戰場），在戰爭中暴露出楚、淮派系的不和，雖然爲了戰爭勉強合作，但事平後則互相彈劾，另一缺點是台灣不能有事即賴對岸的援兵，必須形成一個較前獨立的軍事防禦體系，必須有自己作戰的準備，因此不能缺少一個最高權力的統兵大員，在軍隊的相關設施如礮台方面，新式武器的購置上都需要加強。

在清法戰爭之前，台灣才在十年前面對日本對台灣南部的侵攻－牡丹社事件；當時朝廷在一片善後聲中，除了湘淮派系問題外都提出了，派福建巡撫半年駐台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所有進行開山撫番、修繕礮台……都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無怪乎在這一戰又打輸了。

而在近十年的兩次挫敗中到底清廷做了哪些改善呢？這是本文首先說明的，那就是將建省之議再度提出，並付諸實行，不再以台灣規模小不合體制；而以台灣雖小，地理位置重要，在經濟力上其年收入爲甘肅、廣西、貴州的十倍著眼，因此設立的台灣巡撫，也就是等於是台灣建省。自此台灣必須靠自己，不能時時仰賴來自福建的協餉，以及有事時自大陸的軍援，雖然此舉以軍事上的考量爲最，但是對往後台灣的自主性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在軍事的佈防上，設立澎湖總兵，希望澎湖在有事時能自保，無事實可以協助台灣的撫番開山工作；而台灣的軍事防衛，則在劉銘傳巧妙的安排下完成，南部仍由湘軍主導，北部則由淮軍，中部則重用台灣的土勇；此後雖也不斷重用臺勇，做爲平定原住民和民變的重要武力，但臺勇迄乙未割讓仍未能成爲台灣防禦的重心。

在台灣各種相關建設如建鐵路、設學堂（包括西學堂、番學堂）、清丈等事業，都因劉銘傳身爲淮系，此時由照顧淮系的醇親王奕譞、淮系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主政，對在台灣的劉銘傳多予支持，使劉銘傳能在短短六年間做了比其他人、其他地方要多的事，雖然今日對這段近代化成果的評價不太高，不過做爲台灣近代化先驅的角色，倒沒有人能挑戰。

也由於臺勇在清法戰爭中出色的表現，率領臺勇的林朝棟受到重用；能出鉅資協助財政的林維源也被重視，劉銘傳就在與台灣士紳積極的合作下開山撫番、建設台灣，所以雙林可說是台灣建省後的兩個重要明星人物，台人的領袖也漸漸形塑出來。在乙未之役時，除了正式科舉出身的丘逢甲出來組團練外，林維源會被舉爲台灣民主國議會議長（辭不就），林朝棟爲中部統領，可見台人較高的領導階層已經出現，可惜的是官做得越大越聽朝廷的命令，紛紛逃往大陸，放棄台灣，使得早期領導台灣人抗日的都是與台灣土地共存亡的中小士紳，一直到日治大正

年間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才逐漸形成台灣人的意見領袖。

清法戰爭給台灣帶來另一個影響就是重北輕南，南部尤其是府城，是道台駐守之地，台灣道劉璈二度來台，任台灣道前後四年，勇敢任事，欲有一番作爲，很得南部地區人民的愛戴，清法戰前，他獨立負責台灣的防衛，以爲法軍會攻台南；但法軍攻台北，劉銘傳在台北打勝仗，這就註定了劉璈失敗的命運，他因劉銘傳「語多不實」的彈劾而被迫離台，台南士紳淚眼遠道相送，不忍其離，[40]南部士紳對劉銘傳的惡感一時難除，劉銘傳亦知此道理，同時也盱衡台北即將代替台南成爲台灣最重要地區的情勢，全力建設北台，使今日台北成爲台灣政、經、軍中心，從那時開始迄今台北的角色未曾改變。

[40] 連雅堂，《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三二，《台灣贅談》，中連雅堂有如下記載：「當璈之被罷也，余年少，臨去之時，士民走送，揮淚告別，至今猶能憶之。」

歷史城鎮風貌經營與空間想像----淡水文化地圖的建構

黃瑞茂*

摘 要

解　之後的淡水的在地運動，特別是從搶救到指定古蹟到再使用的爭　，一方面指出一個不同於過去的城市發展圖像，這是新的生活價值　的選擇，；另一方面需要進行新的自我改造工作，也就是要如何從資源中解放出來，指向更深沉的在地主　性的建構工作。

捷運通車之後，「 光」所帶來的發展動力將淡水的在地工作推向更為分歧的發展途上。但是回　其中的轉折，卻是一頁深刻的　於「文化資產」實踐的地域經　，不只是言語上與象徵上的呼　，而是基於真實經　的社會認知轉　。

本文的任務，在於指出淡水特殊經　中的普遍　題，以引起更為　鍵的討論，例如古蹟保存的「真實性」 社區參與的在地意義、歷史風貌經營的　証等等。而對於淡水在地工作的新的挑戰，則在於「世界遺產的潛力點」的挑戰下，如何從「古蹟」朝向「城市保存」，尋找在地工作的支點與新的能力。

關鍵詞：古蹟修復、地景、城市保存、淡水、認知繪圖

一、前言：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活動，自法制化之前的文化精英的呼籲，至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之後的行政體系及學界成員的推動，近十年來，由於本土運動的興起，各地的知識分子及文史愛好者紛紛組織社團，以特定區域進行文化的發掘與深耕的工作，將文化資產保存活動推展到台灣的各個角落上。」（林會承，2001）

淡水古蹟園區的創設以及世界遺產潛力點的指定，一方面說明台北縣政府對於古蹟，前清總稅務司關署宿舍、滬尾砲台與殼牌倉庫的整修與再使用引起了新的在地爭議，。或許，這不是台北縣政府的問題，而是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推動至今的新的議題。而淡水的在地經驗正可以提供作爲檢討之參考。

另一方面，從關注於單點的文化象徵目的，轉向「城市保存」的意義。成爲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項目，從古蹟保存到城市保存運動擴大了視野與社會認知，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改修飾一種回應。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審查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其中相關者包括第三條第一款「古蹟、歷史建築及

* 淡江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

歷史建築群：指人類因生活需要所構築之建造物、建造物群及其相關之空間或設施。」歷史建築群包括原住民聚落、　代傳統聚落與市街、日治時期市街、集村與宿舍區、產業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近代軍眷宿舍、其他聚落及傳統建造物群等。以及，第三條第三款「文化景觀：指　話、傳說、事蹟、生活、產業或儀式行爲及與其相關連之環境。」文化景觀爲新增類別，其內涵包括歷史路徑、人文景觀區、歷史遺蹟區、舊社遺址區、產業地景及其他文化遺蹟區。

從相關法令的修正與真實世界的情況，從「古蹟保存」到「再使用」與「城市保存」，正是從文化象徵的靜態呈現，落實到與生活世界的連結。　多的經驗也開始豐富古蹟保存的意義，延伸於地域產業的期望、社會　利的照顧、成長教育的培育等等。

但是，依著再使用的目的，「古蹟修復」的爭議已經非縣政府承辦官員所能掌握，在行政舉措失控的狀態下，新的修復工程反而成爲古蹟空前的破壞力量（如滬尾砲台與前清總稅務司官署宿舍的修復工程）。當我們將眼光移向古蹟週邊的環境時，一連串的破壞性行爲不斷的上演。榕園將榕樹坎掉，只爲了加裝戶外座椅的棚架；淡水河邊　廳將埔頂山頭的綠蔭　除，露出突兀的看板；台銀宿舍拆除三棟成爲戶外炭烤店，「金椰」裝扮破壞了小漁港的文化景觀；重建街拓寬計畫將拆毀淡水僅存的街道空間以及歷史巷弄石砌步道（縣政府研議取消拓寬工程）；爲了整理殼牌週邊環境，計畫拆除「水上人家」的聚落（殼牌古蹟修復建築師的提案，縣政府正在研議中）、、、。這些點點滴滴的抹去與塗消，隨著地域觀光的發展而遍地烽火。

弔詭的是，淡水的觀光正是因爲這些凝固於石頭上的歷史文化經驗，而在發展的進程中，這些痕跡很快地被遺忘而拆除。回應這些問題，需要以在地的經驗作爲基地，重新思考這些環繞著「歷史」的地方文化經驗，如何與生活世界連結在一起的意義何在？淡水的發展是依著怎樣的方向而前進？而造成今天困境的結構性因素何在？因此，從在地的真實經驗來看，古蹟保存在此一關鍵性的時勢中如何轉變其工具性，作爲發展在第工作的討論起點。

二、轉向：從「古蹟保存」到「城市保存」

> 「文化這個　念的歷史，在思想與感情上，是我們對於共同生活情況之改　的諸般反應地紀錄、、、。文化　念的歷史是我們的意義與定義的紀錄；但是反之，這一切也只有在我們行動的脈絡中才能夠被理解。」（Williams,1958/1983,p:295）

（一）城市保存與時間的形狀

建築理論家林區強調人的價值與空間，城市的實質構造之間的關聯，主張「人們接觸到城市形式，是由真實的功能、意念與價值觀所構成一個獨特的現象」（Lynch, 1981:36）。「城市」是一部用石頭所寫的歷史，其特殊性在於靜靜的承

載著不同政權統治的企圖與權力運作，以及生活其中之世代所附加其上的種種生活的價值觀；諸種城市歷史與文化變遷的痕跡積澱成爲城市空間的內涵。而城市空間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所在，也就是說，所謂的「歷史」其實就在你我的身邊，在那些被忽略的生活角落中。

「工業遺址」、系統性遺構」、名人故居」已經成爲古蹟新的類型，加上所謂「歷史建築」指定，擴大社會認知與參與作爲文化資產認定的機會，而且指定的主管機關也由中央轉移到地方政府。因此，文化資產保存工作開始進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城市保存」的意義在於「每一個居民是一位有行動力的參與者，在城市建構過程中，不只是一位英雄的設計者。這根植於培育（nurturing）與連結（connection）的美學。」（Hayden , 1995: 236）於是基於城市歷史所進行的古蹟指定不再只是部分專家的職權。

> 「述說時間形狀的故事使用了城市的形式，從一條被遺忘運河的　曲到康乃花園的區域，去連結居住者與都市地景歷史，並且培養陌生人的歸　感。」（Hayden , 1995:）

可能性主要存在於這些城鎮的歷史風貌，朝向觀光（文化參訪）的產業方向發展的可能。也就是藉由建築風貌的維持與地域特色的塑造以支持地域產業的振興。在具體的空間再使用經驗來說，往往包括街道特色景觀的塑造以及個別填充式建築物的再使用計畫，而關鍵在於整個產業計畫的落實。

圖一、淡水的節慶年曆要如何與古蹟空間經營網絡結合在一起是新的　題

（二）地域特色塑造與都市設計管制機制的回應

若說現代主義規劃係根據數字爲基礎的機構規劃實務，那麼，後現代主義的規劃就是「都市設計」了。作爲規劃的分支，於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出現的都市設計之重點，在於爲都市成長與保存，提供視覺設計方向（Barnet,1982,p:12）。

都市保育型的「都市設計」除了關心對於城市歷史經驗作爲發展的回應之外，應該更關注於「城市保存」的深層意義，在於新的提案如何能夠將我們的感覺重新帶回都市空間中的生活，以重建人性價值與城市空間及實質的架構之間的連接。也就是說越發的都市化，越發的需要認知到空間的精神和生活空間的主權應該在於其民眾，也是爲了這些人，我們來保存這些場地。

「城市保存」將對於個別古蹟點的關注擴大於地域風貌的經營，所謂「景觀」在台灣的都市發展經驗中，是一個新的關注課題。

「城鎮景觀（Townscape）管理」對於歷經拆除多條馬路與街巷的台灣城鎮而言，是需要在認知有所轉變，才能夠重新關注於屬於城市空間的整體經驗，一種隱藏於個別建築物背後的協調感。淡水的歷史資產並不只是已經被指定爲古蹟的建築物上，而需要連結隱藏在交通幹道背後的歷史街巷與風貌遺跡上，藉由生活路徑所串聯的熟悉的歷史記憶所在，以及仍活絡於市街空間的種種常民與節慶活動經驗上。

該如何讓這樣的自覺傳遞或表現出來？公眾的自覺需要更多具有再教育意義的展覽，和協助了解文化資產價值的計畫，以及一些需要公眾參與的活動。也可以說，城鎮景觀的概念在於透過日常生活的進行，發展成爲一種普遍的生活意識（Commensense），包含了日常的生活觀念、價值與行爲等等

三、困境與新可能性：淡水個案的經驗對話

相較於台灣的其他城鎮，淡水的機會不只在於過去所累積的歷史人文或是自然條件，而是淡水有許多具有理念與行動力的自發性民間團體，在社會轉變過程中積極於釋放被長期禁錮的社會權力。在這些團結的行動經驗中，我們學習合作，而認知到民間社團所能在生活世界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與能量。學習對於社會發展時勢條件的掌握與回應，以能夠想像與經營定居淡水所希望的生活方式。學習如何站在生活者的立場，以爭取更多的授權與接近城市空間的權利。

相較之下，地方政治現實與生態的轉變仍舊是緩慢的，甚至在新的政治經濟連結下，派系利益化，更爲保守。在地工作仍是位處於邊緣性的角色，縣政府將古蹟或是歷史建築事務當作「補償性」的措施，在地政府將之視爲是政治運作的絆腳石。

因此，民間社團除了繼續努力於建構一幅新的生活圖像之外，更長遠的工作是如何結合淡水所累積的地方知識與學術資源，利用一些管道將知識帶到生活現場中，重新認知居民成爲都市發展的主體，使能夠在生活世界的尺度中發揮作用。

（一）田野調查與搶救並進的在地經驗

在田野調查與搶救過程中，古蹟保存不只是在地文化經驗的傳承，更是淡水在地文化經驗的動態塑造。

反對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興建的行動中，古蹟指定成爲在地進行搶救工作的手段之一，行動的關鍵在於對於淡水都市發展願景的生活價值觀的揭露，這樣的態度直接促成了淡水社區大學的成立，重構知識與行動的關係。過程中所指定的古蹟也成爲後續深化在地智慧的切入點。

（二）古蹟修復的技術性專斷與謬誤

古蹟修復需要在一棒接一棒的過程中不斷的進行辯証，從研究到修復規範與準則的訂定，修復設計的工程技術考量以及美學的定位，到實際施工時的驗證。但是因爲資格上的認定所建構的保障狀況，讓修復設計與施工成爲無法質疑的圈地。長期以來，在承辦機構不願節外生枝的狀況下，審議委員會成爲最後的背書者。

文化資產雖然已經從國家指定轉爲城市進行指定工作，但是審議委員的聘任名單並沒有同時改變，甚至依著所謂內政部所公佈的「名單」，切斷了在地參與的制度性保障。長期以往，古蹟業務關注於程序，而忽略價值的考量，承辦機構欠缺對於此一關鍵時期的文化經驗認知的堅持。出了事，委員說：『這跟我當初所審的圖不一樣！」而古蹟現場已經因爲修復工程而破壞了！

而審議的關鍵在於古蹟文化歷史經驗的美學如何在技術的條件下表現出來，就古蹟修復而言，表現美學的技術是需要辨証與對話；但是就淡水最近的幾個古蹟修復案來看，卻是常常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這些問題，如漢寶德先生所言「、、、各級政府請幾位專家開會決定，過程不夠嚴謹。而在修復作業中，處處要求專家集會審查，自維護工作單位的選拔，到圖樣的審核，均賦與專家無上的權力，又未限制審查者的承攬權，形成利益團體，不免發生球員兼裁判的惡劣情形。」（2001.0416）在此一架構性下，諸多問題浮現。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操作，古蹟研究報告書是爲了修復工程之依據，也就是說古蹟修復工程需要接受研究報告書的規範。但是，就實際的操作而言，並非如此，修復工程的討論完全是從古蹟修復建築師的提案開始，再加上既有之研究報告書中並沒有積極意圖於表達對於修復之積極性規範。長期而往，造成研究與修復設計之間的斷裂。這個問題在「古蹟再使用」的操作中問題更爲明顯。

2、關於古蹟現況之測繪圖的要求在現階段是重要的，因爲太多的經驗是古蹟修復所造成的破壞往往是超越以往，古意盡失。因此，在修復之前的測繪圖有可能是最接近古蹟建築的「物質性材料」，詳細的紀錄將具有「文件性」與「唯一性」。測繪圖面的錯誤、闕漏或是精確性不足，加上普遍使用電腦繪圖，而未經測量而自動等分空間，這些未經檢驗的圖面，與現況存在極大的距離。

3、古蹟的「史實性」靠的是學術專家的判斷與把關以及精確的寫下可以辯証的規範，而「詮釋性」則是靠古蹟修復建築師對於設計美學的素養；因此，從設計專業來說，實在沒有必要用限制性方式來確保古蹟修復的建築師。只要有完善的審議制度就可以達到規範的作用。以淡水的經驗來看，諸多的失誤並沒有因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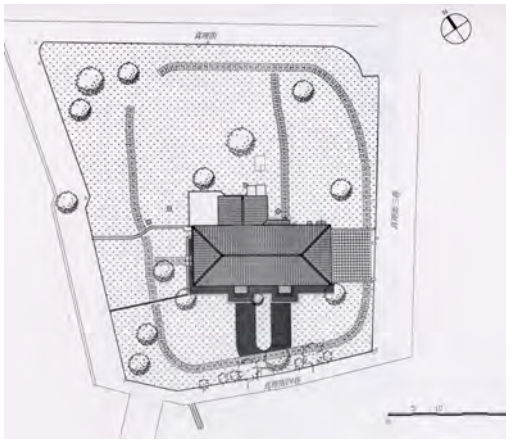
古蹟建築師而減少。有機會參與幾次討論，可以感受到古蹟建築師提案中的謬誤之處，其對於古蹟「史實性」的忽略以及不尊重並沒有因爲身分的保障而得到規範。但是因爲被認定過的資格，許多爭議並沒有被追蹤處理。

4、「古蹟再使用」成爲新的操作經驗，古蹟建築師的資格問題再次浮現， 轉包」的方式成爲處理「再使用」美學要求的模式。另外，古蹟再使用必須回應新的機能與舊空間的衝突處理手法，更嚴重的是室內裝修的考據問題以及相關專業欠缺的處境。目前以「再使用」與「經營」爲主要考量下，古蹟修復的彈性空間加大許多，需要更爲嚴謹以及創意的審議會議來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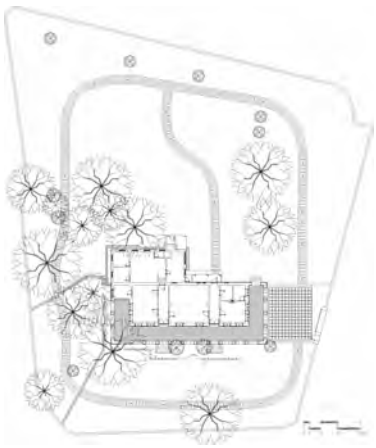
（三）回應地域社會特性之「古蹟」空間計畫書的寫作

搶救活動並非只是情緒的回應與正當性的結果，而是價值觀的操演下，隨著古蹟搶救活動擴大在地的文化經驗認知以及面對未來的行動，這一部分的能量與潛力是空間計畫書重新寫作的資產，但是常常被忽略。因此，所謂的社區參與只是一種回應的手段，而不是一種關注於在地文化經驗累積的價值觀。

「前清稅務司官署宿舍」因爲樹木被砍除上報而促成一場社區參與的討論會。但是似乎只是一種平息一些在地聲音，而不是認知的轉變。隨著動工的紅毛城古蹟修復工程仍舊回到從前，並未將與社區互動成爲工作模式，而且幾個古蹟工地同步地禁止閒雜人等的進出。



圖二、文化局委託古蹟研究單位所測　的平面圖



圖三、淡江建築系所測　的古蹟平面圖

「英商嘉士洋行倉庫」的修復再使用浮現了另一個存在於古蹟修復建築師的專業傲慢。2004 年 9 月 24 日協調會中，古蹟建築師所提出來的方案，圖面設計仍舊存在許多關於淡水河水文的錯誤訊息，甚至連古蹟本體可變動的準則都沒有辯証下，就提出改變「鼻仔頭」景觀風貌的構想。會中局長說，要使用單位趕快將空間計畫書提出來，以免耽誤整個工程的進度。此一裁示並沒有充分理解社區參與的積極意義，空間計畫書的生產不只是要反應居民的需求，參與不是程序上的形式，而是建築師如何有效地帶動設計參與者的空間想像。在參與的過程中，讓參與者可以藉由多次的討論與評價建築提案，而充分理解未來的建築使用。2001 年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所舉辦的「殼牌設計工作坊」所累積的在地討論經驗，並沒有被延續最爲可惜。

圖四、2001 年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所舉辦的「殼牌設計工作坊」

（四）歷史風貌所依存的風格是一種鄉愁的回歸或是連結未來的創意

依著「流浪到淡水」的浪漫歌聲，對於淡水只能說是鄉愁，一種被製造的想像。於是中正老街與河岸邊的各種懷舊的商品就合理地並存在一起，於是淡水老街所陳列的商品到建築物的裝扮，越是普遍化起來，於是淡水的「仿古立面」已經無法與湖口或是三峽有所差別，因爲所使用的材料與設計方式被專業建構所規整了。相較之下，淡水老街所曾經存在的立面竟然具有無法取代的地域魅力，當時的保存提案竟然具有回應今日淡水處境的未來性。

「前清稅務司官署宿舍」圍牆與欄杆的修復方式是對於風格的另一個錯誤詮釋，以目前的設計來看，隱約可以看到當風格成爲目錄上的形式挑選時，其設計邏輯如下：「前清總稅務司官署宿舍」是「外國人的房子」，也就是「歐式」，因此也就採用台灣別墅圍牆常用的「歐式欄杆」，欄杆不是主角，但卻是舉目四望

不能不看的景觀元素。

圖五、「前清稅務司官署宿舍」圍牆與　杆

四、初步提綱：淡水「文化地圖」建構

隨著都會區休閒的擴大，淡水的歷史保存與觀光發展密不可分。相對的，這些歷史還來不及成爲動員生活中的記憶，而過多的觀光客對於鹿港歷史城鎮尺度是一個極大的破壞力量。「休閒式」的工程計畫已成爲一種對於城市發展的普遍想像，但是對於淡水而言，「城市保存」不是一個硬體營造的工作，而是地域社會的活化作爲基礎，關鍵的工作是經營與管理機制。可以在推動過程中，整合地回應諸多在地與外於城鎮的諸多變數。特別是面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外在時勢，一切關於城市的變動屬於未知，因此，空間的營造需要在「都市過程」中來進行（Kostof,1992:305）。此一觀點將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進行檢驗。

（一）淡水的觀光化過程並沒有同時完成地域社會的整備工作，於是淡水街鎮仍是以生活小鎮的基盤設施來承載大量的觀光人潮。也就是說，既有之空間系統並不支持淡水成爲一個完善的觀光或是文化參訪小鎮。所以，觀光行爲與生活的衝突成爲今日淡水的普遍現象。

有關於在地生活與觀光的爭議，不應把淡水視作爲「鄉愁」的想像，反之，我們不再把假日來此的人視爲觀光客，而看成是一個個生命片斷。生活者或是文化參訪者在這個視野上，重新活化了社區生活的內容與方式，重繪其「生活地圖」，以共同經驗與共享一個在地文化的空間生產過程。

（二）從搶救到保存，再到再使用，以及世界遺產的努力，淡水的特殊經驗確認了淡水在地工作的主體性。認知隨著工作的進展而轉變，古蹟保存在觀光發展的情境下，連結了部分的商店的經營策略中；也從觀光的破壞中，看到古蹟保存的文化價值觀，所可以成爲捍衛生活價值觀的重要因素，如重建街的搶救活動。在歷時性的討論中，淡水的經驗深化了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經驗，是台灣的真實經驗的一頁。

「在地工作」的實踐讓我們從新思考在地知識的生產與應用，相關文化保存的歷史知識，就不只是學院中的認知，而是生活領域中的價值，擴大在地知識的內容。淡水從在地工作支持了部分的學院工作的進行，因爲社區大學也將部份的學院知識引入到在地文化工作中。新的任務是如何一起工作，挑戰在於這些知識與更多的生活經驗相連結，讓學院知識成爲在地智慧的一部分，這當然嵌涉到對於知識生產的經驗上。

圖六、以淡水市街空間為基礎的淡水古蹟網絡圖

（三）新的都市生活型態改寫了傳統的「生活計劃」與「路徑」 城市的空間與時間分工競爭趨於和緩。而網路支援工作的結果，人與真實的疏離，在古蹟參訪的經驗中，身體經驗可以獲得往常一樣的鍛鍊。於是藉由地圖描繪的方式，在編碼判斷的過程中，那些被指定爲古蹟以及在地認知中的文化資產一起存在一張「文化地圖」上，成爲主題與背景的文化地景敘述學，讓淡水的歷史經驗轉化成爲可以身體參與的真實空間。

文化地圖關注於這些古蹟的可及性（access）經驗，藉由故事或是空間直接的聯結，提供不同路徑的參訪計畫，積極的態度不只是可以用步行將這些上述的點串起來，而是藉由此一「地圖」找回在這個城市生活的態度與不同的「策略」。分散在各角落的古蹟與歷史空間經過按圖索驥的發掘，將過去的空間經驗疊合在眼前的處境中；古蹟成爲教室，給於參訪者啓示。意義在於，個體可以自主地選擇不同的路徑，以脫離消費力量所步下的符號世界，來完成都市生活的目的。

「文化地圖」建構同時是一種都市經理策略，在以文化作爲都市發展的內涵，可以結合地區環境改造運動所展開的都市建設網絡，以具體的歷史文化經驗來

來縫合失落的地域空間。2004 年淡水社區大學「重建街工作坊」正在繪製淡水的文學步道。

圖七、2004 年淡水社區大學「重建街工作坊」　製淡水的文學步道

（四）新的工作需要有新的思維來支撐。近年則在考古學及都市人類學的進展下，又將研究重點擺在都市區域實質組成之歷史發展的重建上；其研究資料主要是現存的實質歷史遺留和老的地圖及計畫圖（plan）。這些新的都市形態學研究，將城市視爲文化和地理之不同力量所塑造而成的人造環境。關切於城市的實質形式及結構，也就是形態（morphology）。而形態的研究，則不只是形式和結構，也是形式和手法的實質表現。後續的研究，逐漸看到了空間形式變遷背後的社會力量與其中主動的人類的意識與行動，也就是去分析一形式所意含之交互作用的系統中，不同實質構成元素之間的關係（Vance,1990:4）。

都市空間的象徵論述，所指出的意象與真實、人造形式與文化，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社會意涵等的歷史過程。從歷史城市身上，我們發現一些生命的視覺記錄，並視爲集體過去的溝通（Kostof,1992:299）。而學院理論的地景知覺（perception）必須能傳達給大眾，才能有助於規劃實踐工作（Whitenand,1992:630）。相應於後現代都市地景經驗有關環境知覺的研究，逐漸關注於人們對都市地景視覺品質的評價。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都市地景之「文本」（text）研究，不同於將之視爲數學或統計所建構的地景，而是關注於地景中創造的意識型態基礎，也就是都市地景的象徵品質。這種新的人文地景，藉由文學理論分析地景中類似文本的品質，並且了解其意識型態的轉變。進一步解釋地景如何在社會過程中呈現（Duncan,1988:）。

另外，電腦在視覺影像處理能力的發展提供了有關於都市研究中城市歷史形象呈現的方便性與可理解性，例如關於歷史形象、都市考古基礎上的復原與修復、或是想像的重建等等，在都市史研究詮釋工作的基礎上，作爲城市保存的社區溝通與專業判斷依據。

（五）對於真實推動工作而言，需要在挑戰中，創造出各種機制、策略、政策與計畫以作爲導引資源的作用，使能夠落實決策。

面對複雜的都市系統的要求，都市治理是一種都市集體品質照顧的基楚機制。古蹟雖然在都市經理分工中，有一個清楚的分類系統，但是現實中的古蹟並非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生活空間中的一環。因此，如何在現地中建構一個營運作用是有關於古蹟所在之品質呈現的基本條件。

五、結論

雖然城市的實質空間形式承載著種種的生活涵義，但是，城市的主體終究不是鋼筋水泥，而是生活中的人，只有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行動實踐，才能一步一步地建構出可被想像與期待的城市；而城市保存的行動也就能夠點點滴滴地恢復這個城市主體的知覺與行動。

參考書目：

林會承，2001，文化快遞，10 月號，台北市文化局。

漢寶德，2001，文化資產保存法亟待修補，04.16，中央日報智庫論壇。

Barnet,1982,*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Design*,Haper and Row.

Duncan, J and Duncan, N,1988, *(Re)reading the Landscap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6:117-126.

Kostof, S.,1992,*The City Assembled: The Elements of Urban Form Thorough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ynch,Kevin,1981,*Good City Form*,MIT.

Vance, J.E.,1990,*The Continuing Cit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hitehand, J.W.R.,1992,*Recent Aduances in Urbna Morphology*,Urban Studies,(29): 617-634.

Williams,1958/1983,*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從影像圖片觀察淡水市容的演進

馮文星*

一、前　言

「蓋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嵯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更耳。山下臨江陴郠，爲淡水城亦前紅毛城，爲守港口設者。」[1]～郁永河《裨海紀遊》[1]

「日頭將要沉落西，水面染五彩，男女老幼塊等待，漁船到返來，桃色樓窗門半開，琴聲訴悲哀，啊….幽怨的心情無人知。

朦朧月色白光線，浮出紗帽山，河流水影色變換，海風陣陣寒，一隻小鳥找無伴，歇在船頭岸，啊….美妙的蹄叫動心肝。

淡水黃昏帶詩意，夜霧照四邊，教堂鐘聲真稀微，閃閃像天星。啊….難忘的情景引心悲。」[2]～葉俊麟《淡水暮色》

「那時候的北淡線和現在的捷運線是不一樣的。從淡水到台北要整整五十分鐘，並且中間的班次往往要隔一個小時。*所以每次一踏上月台，總會有著一種蒼茫遠行的雄壯感。*」[3]～王文進《豐田筆記》

淡水，一個依山傍水，歷史文物豐富的小鎮。四百年來，在台灣文化歷史中佔有其特殊的地位，寺廟、街屋、民舍櫛比鱗次，巷道幽徑、高低有序曲折蜿蜒，

*淡江大學教學科技組專員

[1]郁永河—台灣遊記文學的開創者。公元 1697 年（清康熙 36 年）的冬天，郁永河自福建出發，經金門、廈門、澎湖，抵台南府城。他由台南走陸路朝北到八里渡船頭，歷經無數險阻抵淡水開採硫磺礦。<<裨海紀遊>> ，生動的紀錄了在台灣的見聞。

[2]淡水地理位置優越，是東南亞海路必經之站，自古以來，便是台灣歷史風潮的重心。最早爲凱達葛蘭平埔族聚居；十六世紀之後，歷經西班牙〈西元 1629-〉 荷蘭（西元 1642-） 鄭成功（西元 1661-） 明鄭降清（西元 1683-） 日本（西元 1896-1945）等時代，境內留存之建築各具特色。清嘉慶年(西元 1796-)後，淡水港規模逐漸形成，同治元年(西元 1862-)開口通商以來，淡水是當時主要之貿易港，西元 1863-1903 年之間，淡水成爲全台最大的國際港，後因泥沙淤塞而式微，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淡水河上游一直沒有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

[3]日本人在淡水和台北之間，蓋了一條北台灣最早的鐵路，自 1901 年通車後，一直到 1987 年才停駛。大台北都會系統於 1998 年完工通車。

可說是台灣最具風貌特色的城鎮。淡水，詩人與畫家[4]的故鄉。淡水有數不清的特色，任何人一提起「淡水」 腦海中必定浮現描述這個小鎮的種種文字與影像。

然而，到了近代，都會的急速發展，房地產的大量開發，蜂起湧入的假日遊客，伴隨國人普遍缺乏的道德素養與城鎮美學的長期規劃，卻讓淡水的人文與地理景觀產生結構性變化，使得淡水這個古老城鎮的美麗容顏逐漸消逝，甚至消失殆盡。「…每次一踏上月台，總會有著一種蒼茫遠行的雄壯感。」～作家王文進在《豐田筆記》中，這種對淡水初次印象的情懷不再，取而代之的除了亙古存在的觀音山、淡水河（雖然經過人們無情的濫墾與污染） 印入眼簾的盡是不具文化特色的商業市容。

天際線破壞的淡江夕照

「淡江夕照」名列台灣的八景之一，是大台北近郊有名的風景點，自古文人雅士多所歌頌不勝枚舉。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潤泰建設興建的四棟大樓（俗稱四大金剛）完成之後，淡水的天際線從此破壞，一年當中有某些季節，整個淡水的夕陽餘暉受其影響。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淡江大學的游泳池興建完成之後 ，大半個校園的落日餘暉因爲高樓的阻擋而提早結束。

欠缺遠景及整體發展策略的城市建築

試舉二例

一、五虎岡：五虎岡並不高，五座小岡頭直逼淡水河岸，具備制高點的優勢。由於沿岸的平地狹小，淡水的街市只好往五虎岡的山丘和谷地發展，成爲一個富有空間變化的河港山城。第一岡設有砲台；第二岡建有紅毛城古堡；第三岡是以重建街和清水街爲主的漢人聚落；第四岡是淡江大學；第五岡上是聖本篤修道院和公墓。位處「五虎岡」第三岡側的紅樓，正面對觀音山，視野遼闊，一目千里，故名「達觀樓」 是一座百年的建築，代表淡水逐勝歲月最雅致的一頁。前院寬闊，曾經豎立淡水警報塔。西元一九九九年，經專家考證，精心修復，於西元兩千年元月完工。但於同時期中正路上不斷興建之商業大樓（如好樂迪 KTV 等）其未加限制的高度，適成爲居紅樓高處遠眺觀音山淡水河出海口的視覺障礙物，實令人扼腕。

[4] 陳澄波－黃昏淡水/1930（畫布油彩） 淡水/1935（畫布油彩） 李石樵－河邊洗衣/1946（油畫），嚴水龍－觀音山/1947（油畫） 廖繼春－淡水/1961（油畫） 1946 年的淡水河，尚清澈的可以浣洗辛勤的婦女們黎明即起，晨光自東斜照過來時，已結束洗衣工作踏上歸途。畫中遠方的河面上，依稀可見台北橋。淡水是顏水龍常去的地方，畫的雖是淡水卻像極了歐洲小鎮，我們可以感受到屬於歐洲浪漫的柔美色調。在畫家心中，一直有著一種渴望，渴望台灣也像歐洲國家般優雅，充滿文化氣息。

二、鄧山寺：位於鄧公路上，是汀州的客家人爲他們的家庭主鄉神明「定光古佛」所設，爲台灣罕見的汀州人移民所建會館與守護神廟。近年來該廟周遭及後方不斷興建新的民間大廈 ，使得廟宇的完整景觀及古意完全破壞殆盡。

與美學及文化相衝突的影像建設

雜亂無章的電線桿，各類型任意張貼的廣告，雖是全台普遍的現象，但以中正路老街爲例，雖然盡是所謂百年老店，在經過重建之後，這條原本極有機會成爲具爲文化特色的老街，我們不易看到巧思獨具的文化招牌，舉目所見皆是如同一般經濟活動形成之商業招牌。 其實「……建築物最初是人們爲了遮風避雨而建構的空間，受限於氣候和民情而有所不同，後來隨著宗教文化和時代的變遷，建物（Building）變成建築（Architecture） 多了一份藝術價值，可供欣賞。例如歐美的教堂、博物館、校舍，原本都只是具有實用功能的建物，在現今都成了具有藝術地位的知名觀光景點…[5]」 淡水具有上述之歷史發展條件，我們不得不報以深摯的文化期待。

真理街上有一極具文化特色的景點，其內的建築涵蓋歐洲、清朝、日據、民國等不同時期，但在景點之前方，不協調的電線桿加上任意擺設之攤販、機車，使得文化影像的捕捉成爲一件難事。

再以色彩應用爲例，國人習慣上普遍喜歡使用原色色系，如大紅、大綠、大藍等應用在廣告招牌、路標、衣著服飾配件等，較不如歐美日等國家常用之混合色，在整體視覺觀感上易失協調或顯突兀。 如具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淡江大學，在已漸具古意之校園，近年設置欠缺用色考慮之道路標示，與現有景觀形成極大的諷刺。

誠如上述，淡水小鎮隨著都會的急速發展，以及房地產的大量開發，使得許多風貌特質消失殆盡，但其豐富的歷史內涵、寺廟古蹟、不變的河光山色，淡水依舊是北台灣最迷人的城鎮。 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Croce)說： 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事實。」 身爲一個長期觀照淡水發展容貌變化的影像工作者，交織著對淡水歷史、現在與未來的情感，期待在台灣邁向富裕生活的同時，提醒人們以往生活中並不重視的建築和地景，喚起城鎮民眾的光榮和驕傲，也就是從城市美學運動的角度出發，我們應有更多的活動可以進行：

提倡環境倫理，普及環境美學教育

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生活方式和思維不斷改變，科技、經濟和物質享受不斷進步，但人性的貪婪和過度的享樂主義以及相信科技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

[5] 仰望與俯瞰，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民國 90 年 10 月 17 日。

法，也造成對人類自然環境的破壞 ，而淡水在演進過程中也無可避免的蹈此覆轍。我們相信爲了提升生活品質並避免生態全面破壞，需要更深層認識生命及塑造新環境倫理[6]。我們回想起來，台灣在經濟貧窮的年代，那時的鹿港、美濃是很漂亮的，因爲它的建築材料非常的單一--紅磚、黑瓦。但富有以後，可以從世界各地進口建材後，它開始醜了。因爲它沒有選擇性說我要什麼，只是把最貴的拿進來，可是在西班牙適合，未必適合台灣。台灣城市的醜陋，很明顯的是從七〇年代的經濟起飛開始。台灣所有美的教育問題在於失去美的自主性，這可能跟我們的生態有關，跟我們的歷史背景有關，跟我們自己的生命價值觀有關。

我們必須了解，環境不是可以掠奪的客體，而是生命的伙伴，只有重新建立自然和人類的新生態觀，才是解決垃圾遍地、山坡地濫墾濫伐、淡水河污染種種環境危機的最佳希望。政府應迅速發展並實施有助於提昇環境議題的警覺與環境倫理的教育內容，並盡量普及社會各階層[7]。在環境教育方面，可以在課程中加入「環境美學」（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透過對自然及人爲環境審視的過程，發現環境中美的形式，並由此產生愉悅或沉醉其中的感情[8]。

故鄉的未來由自己掌握[9]

家庭是人們私人生活最重要的領域，而社區就是民眾共同生活中最基本的單元。行政院文建會自 1994 年起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希望藉由文化藝術的角度切入，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建立社區文化的特色[10]。這種以形塑新文化的理想爲活動主軸正是淡水最缺乏的。我們來看看成功的例子：小樽（OTARU），位於日本北海道西半邊的一個小鎮；峰山富美，一個在此逐漸沒落海港小鎮的無名家庭主婦，只因爲對小樽運河有著一份濃濃的愛和情感，她因而發起、投身小樽運河保存運動長達三十年[11]。爲了保存小樽運河與實現居民所提出的環境改造各項提案，每年不斷在廣場和歷史建築中，舉辦相聲、演講、劇場等活動，透過居民共同參與的集體方式，展開鼓吹運河保存與家鄉守護的觀念。我們可以看到當地居民在不斷的挫折中，以集體力量一步一步讓握有權力的政府與經濟力量，更重視地方歷史的遺產與記憶[12]。於是，小樽現在擁有一份居民的驕傲與認同，四處林立著濃濃藝術風的工作坊、各具特色的和洋式建築、藝品店、食堂與玻璃工坊，種種對小樽歷史遺產與地方的用心，如今已經成爲小樽極富盛名的觀光資源。

---

[6] 1997 世界環境日漢城環境倫理宣言。

[7] 同注 6。

[8] 《國小美勞課教法》，五南，民 84

[9] 行政院文建會〈九十年度社區總體營造年會〉主旨，民 90

[10] 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行政院文建會，民 88

[11] 黃國禎，藝術特區版，自由時報，民國 90 年 11 月 4 日。

[12] 同注 11。

積極發展觀光及休閒產業

放眼歐陸國家，精緻的觀光及休閒產業常是維持其所得水準的強勁支撐，但是我們要的並不是對土地不友善的硬體建設，而是文化與自然景觀、環境品質的充實與改善[13]。淡水迷人的地理景觀與獨具異國情調的神秘特質，絕對具備全力發展觀光的條件。以漁人碼頭爲例，可以仿效澳洲雪梨，在安全與品質兼顧之下，規劃短程遊艇體驗淡水河港風情，如 Coffee tour 、Dinner tour 等等。新竹市和雲林縣都曾舉辦「十大歷史建築和十大地景」票選活動，透過十大地景及建築物的選出，讓當地居民重新檢視所居住的環境，同時培養對自己居住環境的驕傲。淡水具有全國知名度，這種加強人民對土地認同的活動，更是值得推廣。

2001 年《天下雜誌》首度舉行「美感大調查」，試圖了解台灣民眾如何詮釋與看待抽象的「美」。美雖然抽象，每個人對美的詮釋也不一，但美的重要性卻無庸置疑，高達七成四的民眾覺得美很重要，美爲什麼重要？八五．五五%的人覺得美可以「促進社會和諧」，七七．三九%的人覺得美可以「提升生活品質」，而五成六的民眾則認爲美能「讓人生更豐富、快樂」。有一位受訪者覺得「台灣的鄉下很美，保持著純樸感，但城市則不太理想」。不過，不少人的感嘆則是：「以前很美，但現在有點退步了。」在受訪者眼中，台灣最美之處在自然，最不美在人。「自然景觀優美、獨特」居台灣最美的首位（三四．九七%），而「人的素質低落」是台灣最不美的第一要角（三七．四六%），其次是生活環境髒亂（二二．六一）。[14] 淡水是美的，但是淡水可以有比現在更好的發展願景，我們期待在商業利益快速發展的同時，唯有全民共同維護自然生態和發揚人文特色，才是這個美麗城鎮永恆發展的生機。

參考資料：

1.一百零一年古建築—紅樓 1899 傳奇（紅樓簡介）

2.金色淡水【歲次辛巳年】　台北縣：台北縣政府　民 90

3.油彩・熱情・陳澄波，林育淳著　台北：雄獅　民 87

4.高彩・智性・李石樵，李欽賢著　台北：雄獅　民 87

5.淡水，王智平等執行　台北：遠流　民 79

6.淡水，馮文星　台中市：三久　民 86

7.豐田筆記，王文進著　台北：九歌　民 89

8.懷念老台灣，康原著；許蒼澤攝影　台北：玉山社　民 84

9.蘭嶼・裝飾・顏水龍，涂瑛娥著　台北：雄獅　民 82

10.鄉土資訊網淡水站：　http://www.taiwanculture.org.tw/

11. 城市的遠見特別篇—他山之石古川町物語，VCD，公共電視，民 90

[13] 彭明輝，〈台灣可以有更好的發展願景〉，南方電子報，民 90。

[14] 天下雜誌編輯，《天下雜誌 2001 教育特刊—美的學習》，臺北：天下雜誌，民 90。

淡水生活志—解讀鏡頭下的淡水起居空間與在地生活

周澤南* 徐韶君**

一、前 言

淡水昔稱「滬尾」 就目前所知， 『滬尾」之名至晚在二百八十六年前（康熙四十八年）就已開始使用了。風光明媚的淡水，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文人、藝術家薈萃的地方，其環境幽美自不在話下。最讓人所知的即爲「淡水八景」[1]，指的是指峰凌霄、香山觀海、雞嶼晴雪、鳳崎晚霞、滬口飛輪、隙溪吐墨、劍潭幻影、關渡劃流。[2]如此優美的環境，爲近來的興起及開發奠定了基礎。

隨著交通的便利，淡水成爲大台北地區民眾休閒的好選擇之一，觀光業發達了，也喚醒樸實的小鎮，帶動淡水的商機，讓淡水不再只有美麗的八景和魚酥、鐵蛋。捷運的完成，更使人潮大量湧入淡水，大台北的民眾將週末時光托付給淡水，而淡水人的休閒又該往哪找尋呢？又淡水土地快速炒作，道路不斷闢建，發展的觸角向周邊的農地延伸。淡江大學的創建、登輝大道的開闢、捷運的通行、漁人碼頭的設置、黃金水岸的發展、淡海新市鎮的開闢等等，爲淡水的居住空間與生活環境帶來劇變，並孕育了不同的生活型態。蓬勃發展的契機中隱含著居住環境素質降低以及社區關係瓦解的危機，也突出了環境改造和社區意識之栽培的迫切性。

當我們將淡水鎮的居住環境和休閒娛樂置放在歷史脈絡下檢視時，可預見它必然體現台灣一般城市所經歷的現代化之掙扎的共性[3]，同時也必將展現出該地區居民在面對居住型態改變時，其反應的差異性。這樣的差異一方面來自淡水這地區的自然特質，另一方面則源於其特殊的人文資源，包括民情風俗與價值觀的不同[4]。本文乃採取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5]方式，通過影音記錄淡水在地

---

* 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研究生。

** 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研究生。

[1] 另外還有分「淡北內八景」：岔嶺吐霧、戍臺夕陽、淡江吼濤、關渡分潮、屯山積雪、蘆洲泛月、劍潭夜光、峰峙灘音；『淡北外八景」：羅漢朝佛、半月沈江、龍目甘泉、馬錬番房、峰溪石壁、海岸石門、石屏錦麟、燭臺雙峙。

[2] 陳培桂著《淡水廳志》 (第一冊）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頁 40-41。

[3] 針對現代化所帶來的生態危機與社區解體，已有大量的專著進行個案式與理論式的探究，足以展現現代性所體現的危機之共性，故非本文研究的重點。

[4] 世界衛生組織對居住環境水準的設定條件是安全性（safety） 健康性（health） 效率性（effciency） 舒適性（comfort）等四項。可是居住水準之尺度實際上會隨著社會價值體系之變化而改變。因此，不同屬性的居民由於受認知的社會價值觀不同，因而對居住環境水準的需求必然有所差異。參見鄭正忠著《居住環境意願之研究－以台北市新北門更新地區爲例》 1995 碩士

人的居住經驗和居住環境意願，以及休閒娛樂的現狀。 換言之，上述差異性正是本調查所要拍攝與呈現的重點。

質性研究一詞，意指非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方法來獲得研究發現的任何類型之研究。它可能指涉有關人們生活、生活經驗、行爲、情緒和感覺的研究，也包括組織功能、社會運動、文化現象及國家間互動等之研究。雖然上述研究的部分資料可能會以量化的方式來處理，作爲提供有關議題的背景資料，但在多數情況下，其分析都是詮釋性的（interpretative）。本研究的原始資料爲錄影帶，記錄在淡水不同居住型態和環境之下生活的居民，對居住環境的意願及感受，以及淡水居民對觀光客湧入而導致在地人休閒空間遷移的想法。這樣的記錄結果雖然難以達致量化的客觀性，卻期望呈現豐富而多樣的詮釋材料。故本篇論文以「影像呈現」爲主，以鏡頭的真實呈現讓畫面說話，而以文字爲輔，做影像呈現的補充，並加強其完整性。

二、淡水居民「休閒娛樂」的概況

（一） 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

從前對「休閒」並無明確的概念，直至近年週休二日的實施，人們才開始重視工作之外的活動，並統稱爲「休閒活動」。休閒（Leisure）在希臘的古典意義爲積極正面的意思，又可分爲時間面向、活動面向、心理狀態和整體概念。因此一般的對休閒的定義爲：一種個人對其需求產生知覺、引發動機，到評估、決策、行動、回憶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經歷自由愉悅的感覺，並可從事自主選擇的活動，以滿足個人的需要[6]。更簡單的說法就是除了「工作」和「生計活動」[7]外，爲提升內在生活質素所選擇的活動 皆可稱爲「休閒」[8]。所以若以現在對休閒的定義，討論老淡水居民的休閒娛樂是行不通的，因此在針對老淡水居民的休閒活動時，我們必須將限制放寬 ，把工作之外的時間皆納入休閒的範圍內[9]，如此才

論文 頁 20。

[5]關於質性研究特質，參見 Anselm Strauss、Juliet Corbin 著，吳芝儀、廖梅花譯《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濤石文化出版 2001 。

[6] 黃詩涵<休閒及休閒參與影響因子之探討>摘要。 參見網頁 http://ecophilia.fo.ntu.edu.tw/thesis/seminar/%E9%BB%83%E8%A9%A9%E6%B6%B5r1.html ）

[7] 在非工作的時間中，至少有部份是用在生計活動上，如煮飯、收拾、洗碗、買菜和睡覺。這些活動是生活上必須的，但並不是「休閒」。

[8] 這些活動和工作或生計活動無關。例如：看書、聽音樂、種花、集郵、郊遊、行山等。即我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參與這些休閒活動，而參與的動機是個人覺得是否有意義去做。這些活動的誘因和金錢無大關係。

[9] 休閒與工作的關係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切入：1. 補償：我們利用休閒來抒發由工作中累積的緊張和被剝奪的感覺。即是休閒被視爲一種可以「消除鬱氣」的方法。2. 關連：工作和休閒是有關連的。對工作滿意的人（例如：工作需要高度個人參與及接觸他人的人，如專業人士）往往會參與更多休閒活動。反之，工作沉悶、重覆的人（如生產線上的無技術勞工）則較少參與休閒活動或義務工作。3. 分隔：認爲工作與休閒在心理上是獨立的，所以沒有關係。有一訪問了 1297 名員工的研究發現，工作及休閒的滿足感兩者無關連，而是分開但卻各自與整體生活質素有關。（參見 Health4Ever 網頁，http://www.health4ever.com/index.htm ）

有交集與共識。

老一輩人們幾乎沒有「休閒」的觀念，淡水亦然。他們的工作往往就是生活的重心，退休後的閒餘時間通常也是在家中灑掃、陪孫子玩耍或在看電視聽廣播中度過，除在清晨或傍晚時間，才有可能四處走動散步，活動筋骨。而家裡有做生意的則以幫忙看店，藉機與客人聊天，也當作另一種休閒。在受訪老人中，大多都表示自己無固定的活動時間，少數人會在廟口、茶室聊天，但大多的老人則會往三芝或後山跑，通常那離觀光區比較遠，也聚集較多的老人在一起喝茶聊天或下棋。

> 我沒有常常到一個地方啦！都四處走走啊，早上在家裡旁邊晃晃，下午就騎車去山上泡茶，有時候就帶著孫子一起去，小孩子在旁邊玩，我就下下棋、發呆……廟口比較少來啦！平常還好，星期六日人就很多，吵死了！不喜歡……。[10]（清水祖師廟廟旁佚名）

> 我家就住在旁邊啊，早上跟太陽下山的時後就來幫忙澆水（澆花），我喜歡這裡，因為他是祖師廟，你要知道他拜的是一個和尚吶，是一個醫生和尚，這裡拜的是人不是神，要感恩尊重啦，他救好多淡水人哪！我也常常往三芝跑，那邊比較大，大家在一起比較有的聊，現在這裡老人變少了，都是外地人……。（清水祖師廟口佚名）

一般小家庭的休閒活動大多傾向使用公共建設或往郊外移動。例如往老梅公園、北海岸、金山等地區，或者淡水的農場等，由於地點近，具交通便利之優點，故往往是選擇休閒之處；而公共建設的使用則有漁人碼頭、紅樹林自行車步道、各社區公園、河岸公園等。再者就是參與市鎮所所舉辦的活動，或是往台北市區做較高消費的休閒活動如逛百貨公司消費、用餐、看電影等。

> 淡水人現在越來越重視休閒活動 ，這裡的消費者外地人跟在地人各佔一半，在地人又大多是以小家庭為主，來這裡烤肉、摘花、親近大自然，所以現在我們開始設計適合不同消費者的活動，像是摸蛤仔、烤焢窯等，我覺得這方面的遠景會越來越好，因為觀光客都在中正路、河岸附近，在地人不喜歡跟別人擠，反而會往山上走，這是可以做的……。（大屯花卉農場老闆）

（二） 信仰與休閒活動的融合

淡水的廟會活動很多且盛大，這些活動亦深入各個民眾信仰及家庭裡，不僅僅是老人負責承傳指導，連壯年階層也熱烈參與 ，更可在陣頭中見到年輕的臉孔。淡水的陣頭很多，分爲新興獅、清水龍等[11]。除了陣頭本身的成員外，更有許多家族組成的隊伍，早早的準備並隨著廟會活動從頭至尾參與。信仰活動幾乎成爲淡水人家常常參與的活動之一，一年下來往往好幾個大型廟會，除了參與陣頭的表演、繞境外，更是淡水人藉以聯絡感情相互交流的時候，因此淡水的信仰

[10]本文章所引之居民感言與意見，皆採自田野調查期間的採訪與拍攝。

[11] 很多陣頭是以地區作爲分別，例如新興獅即爲新興里所組成的陣頭。

活是具有休閒的作用的。

在淡水幾個盛大的廟會中，有農曆五月初五的「淡水祖師爺迎神賽會」。其祭典活動從一天傍晚的「暗訪」[12]開始，至當天[13]的「繞境」[14]進入最高潮。此時家家戶戶幾乎都置香案供奉，鞭炮齊發煙硝瀰空，遊行隊伍及民眾將街道擠的水洩不通，甚至坐在路邊休息或躺著小憩，很少地方像淡水辦的如此盛大。而「張尪公九年一擺大拜拜」[15]更是淡水人全員動員的大事，通常迎駕隊伍浩大，且陣頭也會多達六十多個，由起點開始「起馬」[16]展開「過頭」[17]慶典的序幕，直至「入廟」[18]爲止。由於不是年年皆爲主辦處，因此每逢主辦時幾乎家家戶戶參與，虔誠之至。農曆三月十五日是保生大帝的生日祭典，淡水地區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八庄大道公」。大道公神像原由淡水地區的五個庄頭輪流奉祀，後來分爲九庄，各庄頭每九年輪拜一次。每逢過頭時，幾乎每家皆殺豬公酬神，繞境隊伍、陣頭更是多達二百多隊，幾乎癱瘓淡水的交通，歷時約七、八個鐘頭；而八庄大道公的賽豬公活動，也成爲淡水地區最盛大的民俗活動，至今仍流傳著。[19]

淡水大大小小的廟會不斷，廟會活動幾乎成爲淡水人的生活之一，尤其盛大的廟會活動往往要準備許久，歡欣鼓舞的氣氛也使的淡水地區不論老少皆參與其中，遂成淡水地區特殊的信仰及休閒活動結合的現象。

三、淡水鎮公所的公共休閒建設

淡水鎮公所的建設項目很多，其中也不乏休閒的公共建設。鎮政建設中有關休閒的有公園、景觀步道及活動中心。其中公園部分有八個：文化親水公園（位於紅毛城對面的淡水河畔，沿岸有許多咖啡店林立） 、淡水漁人碼頭（位於淡水第二漁港內，有 332 公尺的木棧道延伸入海；跨港橋，長 164.9 米，平均寬約 5 公尺，最高處約 12 米，以人字形單面斜張橋爲橋型，流線彎曲造型與風帆意象相互呼應） 、竹圍公九公園（位於民生路八十七號對面，面積：2030 平方公尺）、百齡公園（位於中正東路 40-7 號，面積 0.3 公頃，爲小型社區公園） 、運動公園（位於竿蓁一街 52 巷 1-2 號，面積 3 公頃，內有藍球場、網球場、羽球場、溜

[12] 因淡水人認爲祖師爺神力昭彰，信眾將司法神之神格加諸祖師爺身上，而有「暗訪」出巡之儀式。

[13] 農曆五月初五。

[14] 昔日衛生不良，每逢溽暑，時疫流行，地方人士乃備神輿迎駕繞境，疫癘遂息，因此五月初六祭典便由此而來。

[15] 雍正年間，安溪同鄉張、高、林三姓相偕渡台，並供奉張尪公來台崇祀。之後三姓均各以尪公爲族人的凝聚中心，香火不斷。其中張姓族人逐漸散居成九個聚落（以九個角頭見稱） 依族譜昭穆分爲九房，並定例各房輪流奉祀尪公神像一年，此爲九年一次大拜拜的由來。九個角頭有二個在淡水，分別在下圭柔山矸仔樹腳和小坪頂興福寮，其中小坪頂派下人數最多，因此每逢小坪頂「落馬」時，就顯的全鎮爲之轟動。

[16] 送駕之意。

[17] 將尪公神像自甲角頭移至乙角頭。

[18] 將神像請入廟堂的神龕內。

[19] 以上參見張建隆著《尋找老淡水》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1996 頁 86-97。

冰場等多項運動場地）、滬尾砲台公園（位於忠烈祠旁，原爲淡水高爾夫球場的一部份）、大屯溪生態保育公園（位於中和里小中寮橋至雙福橋間之大屯溪中游）、馬偕三角公園（於中正路與三民街交叉口，緊臨馬偕醫館及淡水基督長老教會教堂）。[20]

其中馬偕三角公園不具有「休閒娛樂」的功能，僅能說是馬偕雕像的設置處而已；而文化親水公園及淡水漁人碼頭則是以觀光客居多，假日時人潮眾多，將公園擠的水洩不通，淡水居民使用量不大；滬尾砲台公園的使用者除了打高爾夫球的民眾外，一般居民也會利用清晨於此運動、聊天，此外場地還算廣大，因此居民利用時間也較爲頻繁。其餘公園如竹圍公九公園、運動公園等，有較完整的設施，故民眾使用的次數及人數多，但尚不足以供淡水民眾做完善的休閒場所之用。因此八座公園中，最具休閒功能的文化親水公園及淡水漁人碼頭被大量湧入的觀光客佔據，其餘的公園對淡水居民所發揮的功效其實有限。

在景觀步道方面有四處：紅樹林自行車步道（由於自行車道的串連，已可從漁人碼頭騎至新店碧潭）、淡水河河岸景觀步道（淡水鎮老街旁的淡水河岸從和衷宮至小漁港間長一點五公里的水岸）、中正路一段景觀步道（中正路一段從蘇王爺廟至沙崙路口道路兩旁的景觀步道，往沙崙方向右側有鵝卵舖成的健康步道及自行車步道，左側是自行車步道及設有體能設施的體健步道）、藝航滬尾（淡水藝術節活動的藝術標誌，由具淡水漁船特色的舢舨船彩繪而成）。

其中藝航滬尾和馬偕三角公園一樣，只是一個標誌，不具備休閒場所的功能；而紅樹林自行車步道與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結合，又連接了新店碧潭，算是很完整的休閒景觀步道，除學校做教學之用外，一般民眾亦在早晨或傍晚沿著步道散步，又因捷運現可攜帶自行車，故增加了許多的便利性，也使使用自行車步道的民眾更多，算是休閒建設中較爲完整且使用者較多的建設；淡水河河岸景觀步道則與上述文化親水公園相連接，也是觀光客必經之地，旁邊店家林立，假日時人滿爲患，平時則因商家休息而沈靜，在此活動的大多爲釣魚的老人及近海以舢舨捕魚的民眾爲主，非假日時人潮三三兩兩，淡水民眾的利用不大；中正路一段景觀步道，雖有健康步道、自行車步道，但因大部分爲木材材質，故健康步道的設施大部分皆已損壞不敷使用，再者沿途車流量大車速亦快，並不適合自行車的行駛，平時更荒廢無人使用。因此在景觀步道方面，除紅樹林自行車步道外，其他景觀步道則實用性不高，減低了淡水居民的使用率。

活動中心方面，淡水有十九個活動中心，五個集會所，其中大型的活動中心就有七個。這些空間通常是社交舞、有氧舞蹈、瑜珈、太極拳等課程的聚集地，也有些社區教學，例如媽媽教室、親子教室等的教學場所，中心內的運動設施、書報及閱覽室也爲居民所利用。由於活動中心分部比較平均，也較無觀光客的加入，因此淡水居民較有一個屬於自己而無商業干擾的休閒空間，但利用的多寡，則需視活動中心舉辦的活動及教學而定了。

淡水觀光客眾多，因此許多活動皆會在淡水舉行，尤其是週末及節日時，故

[20] 參見「淡水鎮公所全球資訊網」鎮政建設之公園項目，http://www.tamsui.gov.tw/

淡水居民也會參與這種大型活動，例如晚會、演唱會、文化活動等等。而鎮公所、文化中心、台北縣政府也時常在淡水舉辦文藝性的活動或展覽，也讓淡水居民多了另一項活動的選擇，可說是因觀光發達而附帶的好處。

> 淡水啊！越來越沒有文化可言，本來老街根本不是這樣的，大家急著賺錢，反正觀光客來了就走，又不會管你到底有什麼文化？淡水的假日到處都是觀光客，我才不會下山去跟觀光客擠，還不如找幾個朋友找個空閒的地方泡泡咖啡……河邊改了之後，觀光客是真的變得很多了，但是相對的我們在地人就不喜歡去了，因為那種感覺已經沒有了……。（咖啡店老闆李翊凌）

> 淡水鎮的建設根本就是為觀光客建的！什麼老街嘛，改的一點文化都沒有，當初我就是覺得淡水是個有文化又漂亮的地方，所以才在這買房子，可是住在這以後，發現淡水的建設都是以可以賺錢為主，反而淡水的居民都沒照顧到，塞車、活動空間被剝奪，一大堆問題，所以我們社區要聯合其他社區，從社區開始做起，參與淡水的各項建設，跟鎮公所溝通，做最直接的民意反映……。（書香大第社區委員黃先生）

四、本文所探討的居住環境範圍

1970 年代以來，現代化議程落實在台灣的都市計畫藍圖中，導致幾乎所有主要城市被現代主義式[21]的規劃所統攝。台北都會不斷膨脹，城市居住品質漸趨惡化，周邊的城鎮成了疏通其人口壓力的衛星市。淡水這原本純樸的小鎮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成爲一個新興的休閒城市與住宅區，是台北人紓解生活壓力的周末新聚點。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牧歌式生活固然是理想中的居住環境，舒適、便捷、安全、有效率，同樣是城市居民無法捨棄的生活條件。於是，便捷與悠閒兼具，文明與自然並存的起居空間和生活環境，成爲人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家園和理想社區。居民是居住環境系統中的個體，他是居住環境中各項設施的真正使用者，因此居住環境中的規劃，都應以居民的居住環境意願爲依歸，才能滿足居民的需求，獲得居民支持，建立共同的居住意識。

環境具有自然、社會、文化層面的多樣化特性；實質環境的改變將影響人類心理。Lawton(1970)將居住環境分爲五種空間層次；包括（一）最基本的室內環境（room）、（二）住宅環境（house）、（三）鄰里社區環境（community）、（四）都市環境（urban environment）以及（五）區域環境[22]。室內環境非常個人化，無法反映淡水城鎮區域特色；而都市環境與區域環境涉及整個淡水鎮的都市規劃問題，範圍太大。故兩者皆非拍攝能力範圍所及。因此，我們將範圍集中在住宅環

[21] 參見劉欣蓉《台北淡水個案》收錄於《文化資產、古蹟保存與社區參與研討會論文集》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印行 1996 頁 212。

[22]同註三，頁 19 。

境和鄰里社區環境這兩項；旨在探討淡水鎮內，在不同聚居型態下生活起居的在地人，如何表達和詮釋各自的居住環境意願，包括他們對環境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素質的評價。

關於人類集居型態方面的研究，希臘建築師及都市計畫者達西阿迪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提出了集居學或人類集居學（Ekistics）的命名[23]。台灣光復後，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結果是傳統居住型態的消失，由新的集居型態所取代。根據集居學的專業分類，台灣集居型態的變遷大致上可分爲下列數類：

1.獨門獨院式與雙併式

2.連棟式

3.店舖式（住商混合式）

4.中高層公寓

5.集合式[24]

淡水鎮境內的集居型態涵蓋上述所有類別，然而本文目的並非針對上述集居型態之類型與變遷進行分析，而傾向於針對個體住宅之外的社區或鄰里環境，進行居住品質的評估。

五、淡水居住環境之類型及居住經驗之表達

最早集居於淡水的是平埔族原住民，漢人於荷蘭統治時期才正式到淡水開墾。十八世紀，淡水一帶更是開闢成田，並逐漸形成聚落。道光二十年（1840），滬尾街的人口已有二、三百戶。光緒廿一年（1895）時，已增加至一千零十三戶[25]。當時人口主要集中在現在的中正路、重建街和清水街一帶，形成日後的淡水老街或舊城區。

民國六十二年以後，由於工廠、房地產以及外來人口的大量移入，在缺乏規劃和管理下，淡水聚落產生了不平衡的發展。本文將所拍攝之居住環境，依其差異分爲四大區域：㈠仍然保留不少清代街市風貌的重建街與清水街之間的斜坡地帶。㈡隨著淡江大學的創立而興起於五虎崗上的水源街、大學城與大田寮之密集集居環境。㈢面臨解體中的樹林口與水源地丘陵地帶的梯田環境與農家文化。㈣爲淡水承諾種種美好未來的淡海新市鎮之原聚落和原生態。

（一） 老城區的清代街市風貌

和淡水老街平行的清水街、米市街及重建街，是淡水鎮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區塊。其中位於福祐宮和祖師廟斜坡地帶的重建街，在中正路拆除之後，已成爲保存清代淡水歷史風貌的唯一街道。雖然只和老街隔著一排商店的距離，重建街的

[23] 參考張止善著《由我國集居型態的演變論社區管理系統之建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　頁 14。

[24] 同注 6，頁 77。

[25] 數據皆參考張建隆著《尋找老淡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1996。

斜坡居住環境卻擁有不受人潮和交通干擾的寧靜。

我小時候在這裡，可以看到大船小船入港… …打開門就看見對面的觀音山。我覺得台北小孩真可憐，油煙吃得比人們多，交通和住宅擁擠不堪。不像我們淡水風景好，有山有水。每逢五月初六的祖師廟會慶典，遠至外國的遊客都會來看熱鬧，甚至住上一個月。這些風景、古蹟和活動，都是祖先留給我們的重要文化資產。（重建街居民吳慶訓）

我們家在中正街和清水街之間，緊鄰山坡，房子很長，中間是主要的生活空間。為了採光而在中庭開闢了天井，和隔壁只隔一道矮牆，所以鄰里關係密切。我們沿著清水街去上學，一路上有許多遊玩的地方，例如防空洞，就是我們小時最愛玩耍之處。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回憶，保留了重建街和清水街坡坎的景物和風貌，才能夠讓回憶延續。（中正街居民張智祥）

很多附近的老人家每天下午都會聚集在祖師廟這裡來下棋。這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悠閒的打發時間的空間。下棋不僅可以訓練腦力，避免老人癡呆症，還可防止肌肉萎縮。我年輕時，英專路一帶都是稻田，我喜歡到後山去打獵和攝影。（油車口居民楊順全）

可惜，擁有豐富文化資源的重建街卻因爲一項道路拓寬計劃，而面臨消失的威脅。由於重建街居民和淡水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質疑，台北縣政府決定重新評估該工程的實施，並希望居民能整合出一個方案，提供政府作爲後續推動的依據。淡水社區大學遂開設了重建街工作坊，以完成相關提案的整合，並促進居民參與重建街的造街計畫，讓在地人有機會主動塑造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在居住環境面臨威脅的情況下，重建街居民更有意識的表達了他們對居住環境的感受和意見。

我是藝術工作者，六年前來到風貌特殊的重建街，就決定住下來。我非常同意應該保存這裡的文化與歷史。我很羨慕八里的人，可以利用觀光產業讓居民能夠過很舒服寫意的生活，我希望這裡也能夠這樣。（重建街居民余素君）

我孩子的歷史課本介紹了三峽祖師廟、台北保安宮、林家花園等等。可是我發現我們這裡也有像李梅樹這樣的藝術家，如文學家黃昶雄，也有像林家花園那樣的古蹟如榮記大厝、還有福祐宮、祖師廟等。這些都能提供孩子們現成的本土教育教材。（重建街居民）

我跑遍了台北，最後決定在重建街買下房子。這裡幽靜的街道上，阿伯阿嬤可以互相聊天，和他們問個好，是非常過癮的事。我的小孩走路上下課，家里的狗在街上溜韃，根本不必擔心會被車撞。這裡的治安環境也非常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容易拉近。（重建街居民）

重建街雖然和熱鬧的中正街只有一街之隔，卻擁有非常寧靜和古早意味的街景。凡是來過重建街的遊客，都可以輕易的感受這股幽靜和濃厚的文化氣息，沒有一個不受感動的。（社區大學基金會執行長許慧明）

我覺得重建街的夜景會更好看。在昏黃的街燈下，重建街的坡坎、許順記的店面招牌，保留著清代風貌。重建街的歷史資源，具有為淡水提供不同型態的旅遊經驗的潛力；即一種比較悠閒、舒適、充滿文化意味的旅遊體驗。即使不從旅遊的角度來思考，從居住環境素質方面來看，我們也應該爭取自己所要的居住環境。（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黃瑞茂）

（二） 淡江學府周邊的密集住宅區

2003 年某月某日，淡水鎮學府路的密集公寓發生了一起瓦斯桶爆炸案。公寓三樓的沙發、電視和一面牆壁，被爆炸的威力拋出街道上。距離氣爆現場不及 50 公尺的水源街二段，是淡江大學學生和外來者的寄居處，擁有高密度的人口和瓦斯桶。喧鬧、擁擠、髒亂、同居等現象，賦予它墮落街的稱譽。

淡江大學的創建帶動了淡水的經濟發展[26]，也改變了大學周邊地區的居住型態。大田寮、水源街、大學城、北新莊等地，從原來的田地與農舍，逐漸轉變成密集的公寓式住宅和狹窄的街道巷弄。台灣各城鎮所經歷的都市化弊病，或許都體現在這區塊的起居環境和居住品質中。我們以水源街二段爲例，呈現水源街二段的居住特質與環境，它究竟是繁榮的像徵，還是又一次都市規劃的不良示範呢？

我的生活範圍就在這兩條巷子之間。水源街二段給我印象是髒亂、人潮多、機車到處亂停和亂駛，對行人構成行動不便和安全威脅。淡江大學的校園很美，可是當我每次從大學城這一端，越過校園穿到水源街的那一端，感覺水源街就像菜市場一樣，景色和環境素質條件，和校園的落差非常大。

最近這裡開設了越來越多的電玩店和租書店。可惜這裡完全沒　有售賣專業書籍的書店。可能和淡大學生的閱讀風氣有關吧？以前有一間還不錯的金石堂書局，已關閉了。只是文化風氣恐怕不是能在一朝一夕改變的吧？中山大學是禁止騎機車的，是很好的建議。可是我不太相信淡大也能實行這樣的政策，雖然這樣才能解決交通和環境問題。

雖然水源街具有種種不便和弱點，可是它的生活機能還算方便。和台北地

[26]淡江大學目前學生人數爲 27,714 人，若以四份之一的大學生將在淡水居住四年爲估計，這人口對淡水經濟帶來的效應非常可觀。然而，這些居民是否獲得居住環境素質方面的回饋呢？以上數據請參考周彥文、吳博勳著《淡水地區人文環境的變遷》 收錄於文化與環境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2003 （未出版） 。

區相比，這裡還存在著濃厚的人情味。我常看見餐廳的老闆們在巷尾閒話家常，和學生也打成一片。如果我不是因為可　能在台北工作，我會選擇繼續留在淡水。我喜歡淡水的純樸。（水源街二段學生居民呂玉祥）

（三） 瓦解中的梯田文化

快速變遷中的淡水，田園牧歌的生活方式逐漸成爲只待追憶的遺憾。像徵高度發展的登輝大道，帶來生活的便捷與速度，也切割了淡水的梯田文化，再也難以拼湊回原貌 。從農業轉型成其他行業的變遷，可以從行業結構的變化獲得印證。民國五十一年農業人口佔淡水的 52.2%，到民國八十一年就被工業取得，僅剩 13.7%了[27]。

樹林口[28]這裡以前都是梯田，灌溉的水源從水源地[29]哪裡流過來。淡江樹大學還未興建之前，從目前的捷運站到英專路、水源街、大田寮和大學城一帶，全都是田地，北新路和登輝大道附近也是。

我小時候這裡只有草屋，富有人家才有能力蓋三合院，蓋屋時用的木料都從後山獲得。這種三合院式的古厝具有冬暖夏涼的特性。農家的生活雖然辛苦，但也比較沒有壓力。農閒時我們愛聚集在院子裡說各種各樣的故事。小時不上學的時候就在田地玩耍，在水裡摸魚蝦，也帶著獵狗到後山打獵。

以前的生活固然值得懷念，但是改變是必要的。這裡的人不再種田後，紛紛改行做其他的。種蔬菜、買土地、店屋、收租等，生活還算不錯。雖然我們在老街（中正路）買了自己的房子，可是我的孩子們像我一樣，都不喜歡住在老街，而選擇留在這裡。鎮里不僅交通很亂，吵鬧，而且周圍環境的文化不良好，鄰居們愛講三字經。鎮里也缺乏人情味，不像在這裡，鄰居們和寄宿的學生們和我向來都熱情的招呼，沒有隔閡。（樹林口農民黃明堂）

我們鄧公路這裡原本都是梯田，以前種水稻，現在改為種蔬菜。登輝大道開闢後，由於大道夜間的螢光太過強烈，導致我們種的一些菜類無法長大，有的菜過早開花。例如還在種菜的叔叔說，A 菜才長很小就開花了。我比較喜歡以前的生活。沒有壓力，很悠閒，童年的樂趣也很多。從家里步行到小學去上課，都是邊走邊玩的，河水很清澈，常常還沒上課，就因為摸魚蝦而把衣服都弄溼了。（鄧公路居民紀彩霞）

（四） 淡海新市鎮的聚落原貌

淡海新市鎮位於台北市中心以北十六公里。南、北以臺二號橋與九號橋爲

[27] 參見張建隆《尋找老淡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1996　頁 212。
[28] 沿著水源街二段，越過登輝大道，前方的梯田山坡地就是樹林口。
[29] 水源地又稱滬尾水源。乃明治二十九年間（1896）動土興建的台灣最先完工的自來水工程。引大屯山麓雙峻頭的清源爲源頭。

界，西至台灣海峽，東至淡水鎮水源國小，計畫面積 1756 公頃。這項龐大的計畫，旨在興建中低收入住宅，預定容納三十萬人口，以緩減台北都會的人口壓力。該計畫分三期開發，第一期開發區之興建進度已達 76%，但因經濟不景之影響，導致開發進度受阻，人口之遷入也不如預期中的踴躍[30]。

該計畫最大的敗筆在於施工前對開發區原貌未能進行詳盡調查，對於區域內的生態環境、自然地理以及先民歷史，未能詳加調查記錄。《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即載： 淡水鎮市區後方的紅土階地近年發現大量坋坑文化遺址，可惜大多遭淡海新市鎮計畫破壞。”公司田溪流域的史前遺址多達 32 處，佔淡水遺址總數 75 處的 43%[31]。

1654 年荷蘭人繪製的大台北古地圖，在淡水河口北側，被標號爲 43 的林子溪，就是公司田溪，翁佳音（1998）表示它代表已開墾的農田，有水道灌溉的水田，其地點就是淡水的大莊埔。淡海新市鎮的興建，爲公司田、大莊、沙崙等地帶來不一樣的居住面貌。這片快速炒爆後和淡水居民隔離的土地與居住空間，大大的改變了淡海的原生態和居住型態。

> 這裡和大莊、沙崙一樣，以前都沒有路名。淡海新市鎮開發過後，從中正路接上這裡的大道建竣，才按上路名。被淡海新市鎮計畫征收後的土地，如今大部分都已經沒人耕種和居住。由於是政府的計畫，任何人都不得不搬遷，那些想留下來的老人家，也沒辦法不搬遷呀！
>
> 我們這間古厝，擁有大約兩百年歷史。大庄那邊，所有原有的房子農舍都被拆掉了，只保留了一間古厝作為受保護古蹟。我們這里前面原本是田地，再過去就是海邊，被征收過後，現在已經改為公園用地和住宅用地，完全喪失原貌。
>
> 我年少時候，屋前是曬谷的屋埕，平時就是我們的遊樂場。除了變賣土地而獲得利益的部分地主，對大部分居民而言，淡海新市鎮並沒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從以前到現在，這裡的年輕人都缺乏工作機會，都必須到淡水鎮或更遠的地方打工。 （淡海原聚落居民陳文麟）
>
> 淡海新市鎮還未開發前是完全不同的樣貌，聚落是散居式，屬於自供自給式的小村落，多數人家都種水稻。原有的海灘也和現在填海過後的不一樣。以前海螺很多，七至八月期間，則產很多的小章魚。我小時候喜歡在淡海海邊和田地玩耍，捕捉各種各樣的動物。長大後即使搬到北投子去，

[30] 關於淡海新市鎮開發計畫的基本資料及其影響，可參考文一智著<淡海新市鎮開發計畫對淡水地區空間變遷之影響>收錄於《二００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 2001 頁 217－234。

[31] 關於淡海新市鎮施工期間對淡水歷史遺址的影響，可參考紀榮達著＜再見公司田橋：淡海新市鎮開發對淡水史蹟之沖擊＞收錄於《二００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 2001 頁 235－250。

也時常要回來這裡消遣；例如找山葡萄、捉毛蟹、章魚、撿海螺等等。這裡的小孩還好，可以到處逛逛，台北的小孩就缺乏可以玩樂的地方。
淡海新市鎮還未開發前，除了稀落的農舍，海邊都長滿了相思樹和黃錦樹。其海岸線的珊瑚礁，有豐富的漁產資源。（徐朝明先生）

新市鎮填海時，將長達大約八百多公尺的潮間帶給填平了。這潮間帶是許多海生動植物的生長地和庇護所。海螺、毛蟹、章魚、龍蝦、椰子蟹等等，都以潮間帶為臨時庇護所，填海後，這些生物無法覓食，就無法生存了。填海工程對生態的影響是明顯的，現在已經看不到海參之類的動物了，只是魚蝦不會反對而已。小時候我們兄弟除了來海邊撿海螺加菜，還將一種叫 guwa 菜的海藻撿回去，曬乾後餵豬，能增加豬的胃口。

淡海的原聚落是疏散的形式。四十年前，這裡大部分都是土厝，用海沙製的磚塊來蓋屋。淡海新市鎮機會已經推行十年了，大部分公寓房子都是空置的，原有的聚落和生態又被破壞掉，缺乏良好的規劃。其實大部分搬到淡海公寓住的都不是本地人。本地人習慣擁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根本不習慣住在狹窄的公寓。其實這個計畫在實行前，沒有認真的聽取居民和專家的意見。換句話，是外行人領導內行人。沒調查清楚這地方的原貌就大肆開發，對居民和歷史文化，都是噩夢。（水源里里長徐榮樹先生）

六、居住品質與社區營造

淡水地區無論在地理景觀、自然生態、街市風貌及人文歷史方面，都非常可觀。其居住環境亦五花八門，具有各自的精彩和危機。老城區的清代街市風貌和正在重建街興起的社區意識是否足以擔當淡水環境改造和社區營造的模范，尚言之過早。水源街、大田寮等淡江大學境內密集住宅環境的惡劣品質，是否對城市規劃的失敗提供了值得引起關注的教訓，也是有待重視的問題。另外，水源地、北新莊、樹林口等地的梯田文化歷史，淡海新市鎮原聚落的文化、歷史、考古和先民遺址等等的記錄，都是有待繼續加強的。

從便利、安全、舒適等有形因素到文化素質、鄰里關係、社區互動等無形特徵；每一項都是衡量居住環境素質的指標。實際上關心居住環境素質的人都不免要問，怎樣的居住環境最理想呢？其實，脫離了居住者本身的感受和表達，任何結論都可能是草率及抽象的。重要的是，每一種居住環境都可以尋找出一個最適合的發展和使用方式。選擇什麼樣的居住環境固然是個人的事，然而，居住行爲一旦開始，居住就不再是純粹個人而是社區的事了。社區如何管理生活環境是民主社會的重要一環；使所期望的生活環境成爲事實，更是居住者的權利與義務。

七、結　語

本田野調查記錄的重點，並不在於從理論上去論證理想中的居住環境，而是透過訪談和拍攝的方式，嘗試呈現淡水各種類型的居住環境，居民的居住感受和經驗。這些表述與經驗，究竟直接反映了什麼觀念，或間接透露出什麼憂慮和希望？居民對自己的居住環境如何命名、如何評價、滿足程度如何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詳加詮釋的議題。各別居民與全體居民在一個惡劣的居住環境裡，究竟要付出多少的經濟、健康、安全、社會關係和精神代價？不同族群、階層和年齡層的人士，對居住環境的感受和經驗和也是有待深入探究的重要議題。

興起的觀光業對淡水而言究竟是無可限量的商機，還是居住品質衰敗的危機？恐怕不是可以輕易判斷的議題。觀光客眼中的悠閒，很可能在淡水居民眼中卻是休憩空間的剝奪。淡水成爲上述商機而付出的有形與無形代價，究竟要如何衡量？公共休閒設施的建設是否朝著擺脫標誌形像，而真是揮發其功能，是淡水鎮公所與淡水居民需共同考慮和承擔的課題。

人不過是一株會思考的蘆葦，詩意的棲居於世。淡水的居住環境品質與休閒生活素質，將決定未來淡水的可居住性及淡水人的歸屬感。

【參考書目】

1.陳培桂， 《淡水廳志》第一冊（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3）

2.陳培桂，《淡水廳志》第三冊（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3）
3.周一夔，《人類環境學》（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
4.坎特・布魯爾、查理斯・摩爾合著，葉庭芬譯，《人體、記憶與建築》（尚林出版社，1981）
5.張止善，＜由我國集居型態的演變論社區管理系統之建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6.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畫室，《台灣的住宅政策：國民住宅計畫之社會學分析》，1988
7.夏鑄九等編著，《古市街與傳統聚落保存方式之研究》（文建會出版，1992）
8.內政部營建署，《淡海新市鎮整體開發計畫之研究：技術報告－II.人口基本研究》，1992
9.尼克・華茲、查里斯・肯尼維堤合著，謝慶達、林賢卿譯，《社區建築：人民如何創造自我的環境》（創興出版社，1993）
10.許戎民，《新市鎮開發產業引進之研究－以淡海新市鎮爲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11.台北縣政府規劃、委託淡水鎮公所、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淡水社區工作室規劃，《淡水河河岸遊憩規劃》（淡水社區工作室，1996）
12.鄭正忠，《居住環境意願之研究：以台北市新北門更新地區爲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13.夏鑄九等編輯，《文化資產、古蹟保存與社區參與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
14.張建隆，《尋找老淡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
15.畢恆達，《找尋空間的女人：一個環境心理學家的性別觀察》（張老師文化事業，1999）
16.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仁零零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1
17.淡江史學編審委員會，《淡江史學》，第十四期，2003
18.淡江大學漢學研究中心，《文化與環境國際學術會議》，2003，未出版

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　之探討

運治*

摘　要

英法於海外爭奪殖民地，而法國於遠東挫於印度後，轉積極經營於中南半島之越南，而越南因與清國之密切　係，終因宗主　之爭而於1884年　發清法戰爭。

法軍除於越南陸地用兵外，亦以其優勢之海軍得逞於福州馬江戰役後，更思攻佔基隆、滬尾以獲抵償之擔保；在不如意下，更以封鎖台之戰略，企圖屈服清國。唯受制於清政府與台　當局之竭力抵抗，以及列強間之矛盾的抵制，再加上陸地諒山之慘敗，終而解除封鎖而與清和。清政府於戰後積極發展海軍，並予台　重視而建省，且激發了台的住民意　。

關鍵詞：越南宗主權　福州馬江戰役　封鎖台灣
諒山大捷　米穀禁　台灣建省

一、前　言

清光緒十年（1884）的清法戰爭起因於中南半島之越南[1]主權問題。戰爭爆發後，法國除於越南陸地上與清廷爭戰外，亦組成艦隊封鎖台灣，造成清廷爲突破封鎖而有各項支援之措施，列強亦因封鎖而有不同之態度，本文擬就清法戰爭何以爆發、法國何以及如何封鎖台灣、清廷之反應（含台灣本地）列強（以英、德、日三國爲主）之態度對策及封鎖落幕等幾方面予以敘述之。

二、清法戰爭之爆發

位於中國南方之越南，其歷史文化悠久，與中國自西周以來即已有密切之關係，[2]及至近代之清帝國更以藩屬國視之且享有宗主國之威權。而法國與越南之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1] 中國史上越南與安南，是同一個意義。清朝以前，大都稱安南，到了清嘉慶九年（1804）曾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他們亦自稱越南國，自此安南便改稱越南。（本文亦通稱越南。）

[2] 據古史所載，中國和越南最初發生關係的時間，也許遠在西周之初。周成王時代，有所謂越裳氏重譯來朝的記述，雖然不敢肯定「越裳」就是指今天的越南，但古史所謂南越，確實是包括兩廣和東京而言，故中越接觸總在二千多年以前。秦始皇統一中國，於嶺南之地，設置南海、

接觸則遲至 17 世紀初期。其傳教士布索米（F. Busomi）、卡伐諾（D. Cavvalno）及羅德（Alexander de Rhodes）等人甚早即已前來中南半島。[3]17-18 世紀英法於遠東的殖民競爭，由於英國掌控了印度，迫使法國勢力被迫退出南亞大陸，而不得不將目光轉離印度，改以中南半島爲根據地，並試圖重整旗鼓以對抗英國。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後，法國鑑於英國獲取戰爭的成果，深感必須積極進取越南。1857 年有 2 名教士被殺，翌年法國聯軍即遠征越南，結果於 1862 年越南割地賠款予法國。1867 年，法國又攻佔越南西部 3 州，確立爲「交阯支那殖民地」。1874 年，法越締結《和平同盟條約》，逼越南成爲法國的保護國，使越南不甘願而求援清廷，自是清法乃爲越南宗主權直接衝突起來。

1881 年，法國藉口 2 名商人遭在越南的劉永福所率黑旗軍襲擊而攻佔河內，2 年後爲黑旗軍擊敗。同（1883）年，法軍派遣海陸軍大舉攻占順化，訂立保護條約，事爲越南權臣所反對，11 月，清廷亦對法國提出異議。

然而，法國態度強硬，發動攻略東京，清軍敗走，於翌（1884）年 6 月再訂保護條約，越南完全成爲法國屬地。清廷派李鴻章於 1 個月前（5 月 11 日）在天津與法國海軍提督福祿諾（F. E. Fournier）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法簡明條約》[4]（亦稱《李、福祿諾協定》）受到左宗棠、彭玉麟等強烈的反對。此外，由於條約本身亦脫離慈禧太后原本的期望，[5]而後又發生駐東京法軍盲動事件，亦即時駐越南之米洛將軍（General Millot）按照福祿諾的通知，派杜森尼（Dugenne）中校率 600 名士兵接近清軍占領的要塞諒山。法軍一行於同年（1884）6 月 23 日到達北黎，不料卻與 4,000 清軍遭遇，杜森尼要求清軍立即撤軍，但清軍司令

桂林、象郡三郡，而象郡即今越南交阯地方，於是越南始正式列入中國版圖。秦朝覆亡，南海尉趙佗佔據了三郡（B.C.207-B.C.111 年）稱南越王。有不少中原人士因避亂遷徙南越，爲中國人向越南移民的初期，同時彼此雜居通婚的結果，中越民族的關係更加密切。

[3] 岩村成允著：《安南通史》（日本：富山房，昭和 16 年），頁 417-418。

[4] 中法簡明條約全文如下：

> 茲際人心搖惑，諸事紛紜，故彼此議立以下簡明條款，呈請兩國准定，冀可消釋中法將開之釁端。他日兩國使臣，倣照約內各節，從容會商詳細條款，俾兩國永敦友誼，共享利益。
>
> 第一款：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應保全助護。
>
> 第二款：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在憑據，不虞有侵佔繞越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概不置問。
>
> 第三款：法國既感中國和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大局之誠，情願不向中國索償賠費。中國亦宜許以毗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並約明日後遣其使臣議定詳細商約稅則，務須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爲有益。
>
> 第四款：法國約明現與越南議改條約之內，決不插入傷礙中國體面字樣，並將以前與越南各條約盡行銷廢。
>
> 第五款：此約既經彼此簽押，兩國即派全權大臣限三月後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

《中法戰爭文獻彙編》（以下簡稱《中法戰爭》）（台北：鼎文書局）第七冊，頁 419-420。

[5] 在該條約簽訂之前，西太后向李鴻章提出四條訓令，作爲和平談判的基本條件。(1)不放棄清國在安南的宗主權；(2)不同意否認黑旗軍；(3)不答應任何賠償要求；(4)不開放雲南給外國通商。然而，就該條約之內容來看，李鴻章卻完全無視西太后的訓令，全面向法國作出讓步。神川彥松：《近代國際政治史》（下卷）（日本：實業之日本社，昭和 24 年），頁 212。

官黃玉賢以未獲本國政府命令爲由，要求延緩 5、6 日撤兵，然爲杜森尼以清軍拒不撤兵而下令開火，清軍應戰，將法軍擊退。此役法軍死傷頗眾。[6]

此項消息傳回法國後，媒體稱其爲「北黎的暗襲」（Gue-tapens de Bac-Le）（中國則稱之爲「觀音橋事件」）使法國輿論一時譁然。福祿諾立即向清廷提出強烈抗議，指責清國作法爲背信行爲，聲明保留請求賠償的權利。但是，總理衙門認爲協約中並未規定撤兵日期，且該條約本身亦非最終文書，故聲明不作任何讓步。同年 7 月 12 日，新任駐清公使巴德諾（Jules Patenotre）根據本國訓令，向總理衙門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遵照天津簡約辦理，特旨北圻清國軍隊速退，賠償二億五千萬法郎，限一星期內答覆，否則當自取抽款，自取賠款。」[7]

對於此項最後通牒，清國雖然表示可接受協約，但卻拒絕法方提出的巨額賠款，[8]因此雙方談判正式決裂。其後，由於美國出面居中調停，7 月 28 日兩江總督曾國荃和巴德諾在上海重新進行談判；此時，法國提出的賠款金額增爲 250 兆法郎，並要求將黑旗軍首領撤職。[9]清國拒絕撤換黑旗軍首領的要求，至於賠款則答應以「撫卹」名義繳交 50 萬金（約 330 萬法郎），[10]結果，雙方對賠款一事未能達成合意。法國乃以 8 月 2 日爲期限督促答覆，但清廷並不予以理會，清法戰爭終而爆發，而戰火立即波及台灣。

三、法國封鎖台灣

1884 年 6 月 26 日，正值北黎（觀音橋）事件之後，清國因深切感到清法間的危機，乃立即任命劉銘傳爲台灣軍總司令官。諷刺的是，法國方面亦於同一天合併巡「東京灣」及「中國海」的兩艦隊，重新編成遠東艦隊，並分別任命孤拔（A. P. Courbet）提督和利士比（Lespes）提督爲正副司令官。[11]

孤拔提督爲解決法清間的越南糾紛，多次主張法國應採取強硬態度向清宣戰，以占領旅順、芝罘、威海衛等清國首府的要塞，帶給清廷威脅使其屈服。但是，茹費理（M. J. Ferry）內閣不欲進行全面戰爭，認爲不如占領台灣北部，以採取所謂「保證政略」，故未接納孤拔提督的意見。[12]

當 8 月 3 日巴德諾和曾國荃會談決裂之後，茹費理首相立即派孤拔提督指揮艦隊前往台灣，命其占領基隆煤礦。4 日，利士比提督率戰艦加利索尼耶號（La Calissonniere）和炮艦路汀號（Latin）進入基隆港，與停泊在同港的巡洋艦維拉（Villars）合流，共同擬訂作戰計劃。同日，法軍作成勸降書遞交清國守備司令

[6] 是役法軍軍官死 1 人，傷 3 人，士兵死 10 人，傷 33 人，失蹤 2 人。張雁深譯：《法國黃皮書》，《中法戰爭》第七冊，頁 220-222。
[7] 同上，頁 226-228。
[8] 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北平：故宮博物院，民國 21 年）卷十八，頁 38-39。
[9] 同註 6，頁 234-235。
[10] 中華民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列強侵略》（二）（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53 年）頁 679。
[11] E. G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台始末》（台北：台灣銀行，民國 49 年），頁 12。
[12] 同上。

蘇得勝、曹志忠，要求在 20 小時（第二天早上 8 點前）內交出基隆要塞。此舉當然遭到清軍的拒絕。5 日，法國艦隊按計劃攻占並破壞基隆炮台，再從大沙灣派陸戰隊 400 餘人上陸，完全控制炮台要塞。[13]

圖一　孤拔海軍中將像（資料來源：白詩薇：〈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1884〉，《淡水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2001）。

劉銘傳在滬尾接到報告之後，立即下令破壞基隆煤礦；清軍往坑內注水、燒掉貯藏的 15,000 噸煤，迫使法國放棄占領基隆煤礦的計劃。6 日，法軍再派 200 名陸戰隊搶灘，以期占領基隆市街，但被劉銘傳擊退，死傷頗重。[14]

由於清軍頑強抵抗，使利士比提督認爲想以少數兵力占領基隆煤礦已無可能，乃向孤拔提督報告：「該地是如此崎嶇多山，果真欲加以占領，勢非大軍莫辦。」[15]至此，孤拔提督不得不向本國政府要求增派 2,000 援軍。同時，在援軍到來之前，他不再作任何冒險行動，僅對基隆港作長期封鎖。[16]

對法國攻打台灣一事，總理衙門以會談交涉尚在進行中，法國未經事先預告即採取軍事行動乃違反前例之舉，故向法國提出抗議，並要求列強「秉公評理」。[17]但是，法國國會卻於同月 16 日承認茹費理內閣在中國沿岸作戰及占領土地的「保證政略」並賦予有關此行動的一切權限。於是，茹費理首相態度更加強硬，向巴德諾公使訓令最後通牒的內容，並命其攻擊福州和基隆。

8 月 19 日，遵照茹費理首相的指示，北京法國代理公使福祿諾向清國遞交最後通牒，要求履行「李・福祿諾協定」及賠償 8,000 萬法郎。[18]然而，雙方因賠款問題無法達成協議。8 月 21 日，福祿諾公使宣告會談決裂，離開北京。22 日，在福州沿海待機的孤拔提督接獲本國海軍部長的攻擊命令，隨即於 23 日率

[13] 同上，頁 13-14。
[14] 《劉壯肅公奏議》，卷三，頁 4-7（台灣文獻叢刊第 27 種，台灣銀行）。
[15] 《法軍侵台始末》，頁 19，註 13。
[16] 《法國黃皮書》，〈中國與東京灣事件〉，《中法戰爭》第七冊，頁 246。
[17]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十二，〈擬給各國公使照會〉，頁 5-6。
[18] 同註 16，頁 249-251。

艦隊進入福州港，並發砲擊沉清軍艦隊，破壞造船局。[19]至此，清廷乃於 8 月 26 日對法宣戰。

孤拔於福州之役後欲在北方進行「更驚人之攻擊」，認爲北方爲「問題之關鍵」，他向法政府建議佔據旅順，封鎖直隸灣，以阻止南方之糧食運往北方，中國政府將因饑饉而讓步，接受法國條件。但巴黎政府畏懼此辦法可能招致不利影響，僅允許進行小規模之海軍行動。[20]其後，他不只一次提出類似的建言，最後甚至主張即使不占領旅順一帶，但至少必須占領廟島群島與封鎖渤海灣。然而，此計劃終究未被接受。[21]對法國政府而言，最理想狀況是在談判恢復之際能占領足供抵償的土地，而占領旅順只不過是暫時措施，並不能成爲抵償的保證；特別是占領該地將伸長補給線，若一旦不得不撤退時，將使清國方面誤認爲是法國的敗北，從而可能不再答允進行談判。因此，法國無論如何都必須設法以 2,000 人左右的兵力，半永久性地占領基隆。[22]

若從戰略或者政略上看，孤拔提督的提案都極具見地，但是由於其本國政府堅持要占領基隆，使孤拔不得已下令進攻台灣。[23]1884 年 10 月 1 日，孤拔提督率領自越南馳援的 2,250 名士兵，將艦隊分成二小隊，一小隊由利士比提督統領攻滬尾（今淡水），另一支小隊由其親自指揮再次攻打基隆，其作戰經過大致如下。

首先，法軍在基隆方面的作戰係依計劃於 10 月 1 日順利登陸沙洞，雖然清國駐防守備軍曾一時被迫後退，但迅即英勇作戰而穩住陣地。然而，當兩軍僵持不下時，總司令官劉銘傳接獲利士比艦隊進攻滬尾的報告，而在擔心大本營台北的安全下，竟不顧各部將的反對，立即撤回大軍救援滬尾，只留曹志忠所屬部隊 300 人和林朝棟的台灣民兵鎮守要衝獅球嶺。[24]於是，法軍等於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占領基隆市街。[25]其後，法軍曾數次爲奪取煤礦區，而試圖占領要衝獅球嶺，但都被守衛清軍（特別是林朝棟率領之台灣民兵）阻止，終未能達成目的。

另一方面，法軍對滬尾之攻勢較基隆晚一天，但軍事行動並未如預期順利。10 月 2 日、3 日，法軍雖設法排除沿岸炮台和障礙，但由於兵員調動和天候等問題，使登陸作戰遲至同月 8 日才得以進行。[26]此時，如前所述，劉銘傳爲免台北

---

[19] 羅亞爾：〈中法海戰〉，《中法戰爭》第三冊，頁 550-556。

[20]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9 月初版），頁 325。

[21] 《法軍侵台始末》，頁 17。

[22] 同上。

[23] 茹費理之政策爲侵據台灣作爲質押，1884 年 9 月 18 日（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巴黎內閣訂定用兵計劃，以攻佔基隆、淡水一帶爲目標，此計劃係受福祿諾之影響。巴黎政府認爲佔有基隆、淡水爲獲致賠款之最佳質押。蓋 1883 年台灣進出口總值達 2,100 萬佛郎（約合銀 300 萬兩）海關徵稅 300 萬佛郎（約銀 43 萬兩）基隆之煤產可供法艦隊之需要。《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25。

[24] 劉璈：《巡台退思錄》，第三冊，頁 284（台灣文獻叢刊第 21 種，台灣銀行，民國 47 年）。劉壯肅公奏議》，卷三，頁 8-10。

[25] 〈中法海戰〉，頁 561；《法軍侵台始末》，頁 24。

[26] 〈中法海戰〉，頁 565-569；《法軍侵台始末》，頁 25-26。

陷入危機，已自基隆率大軍馳赴援助，結果大敗法軍取得勝利。[27]

此戰之結果大大地鼓舞清軍的士氣，同時對法軍造成極大的衝擊。於是，法國爲降低此次戰役失利之傷痛和重大性，儘量稱其爲「偵察戰」，但法軍在攻擊之前都放言「此次行動將只是軍事遊行，可能無須開槍即取得勝利」，對清軍極爲蔑視，相形之下，可知法國戰敗之痛苦與衝擊之大。[28]

此外，此役對其後的清法會談造成極大的直接影響，使法軍在台灣的行動相當慎重，到 1885 年非洲外籍兵團來援之前，兩軍相互對峙，未再進行任何戰鬥，而孤拔亦經此幾次戰役才感到攻奪台灣北部不若其想像容易。[29]

當基隆、滬尾攻防戰處於膠著狀態時，孤拔提督爲使艦隊得以自由行動，首先向本國政府建議應取消目前的「報復狀態」（état de représailles）改爲正式向清國宣戰。對此，巴黎政府只同意對台灣沿岸實行「和平封鎖」（blocus pacifique），除此之外未同意其他事項。於是，1884 年 10 月 20 日，孤拔提督在旗艦巴雅德（Bayard）號發出如下封鎖台灣西北沿岸的宣言，其內容如下：

> 法國遠東　隊總司令海軍中將孤拔，謹依據其職　為左列之宣言：『自公元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自南　（即鵝　鼻）起經西北方至　澳（前者為北緯二十一度五十五分，東經一百十八度三分，後者為北緯二十四度三十分，東經一百十九度三十四分）之沿台　之海岸及港口，將置於余所統率海軍之有效封鎖下。所有友邦及中立國船舶統限於三日內將貨物起卸即撤離封鎖區域，對於所有企圖侵犯封鎖之任何船舶將按照國際法及現行條約之規定加以處理。』公元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日自基隆港巴雅　寄。

並通知在淡水的英國領事佛拉達（A. Frater）使外僑社會大爲吃驚，因爲此舉，必使外僑的商業停頓，商人蒙受重大之損失。法國政府所以允許採取封鎖政策，乃認爲這種封鎖有下列利益：「當我們願意的時候，它可以讓我們恢復談判；這種封鎖使我們有權對中國採取一切戰爭措置而不必宣戰，因此也可使英國不致宣告中立而不讓我們的船舶進入它的補給和碇泊港，如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這種封鎖使我們有權捕獲那些懸掛中國旗幟航行的船舶」。[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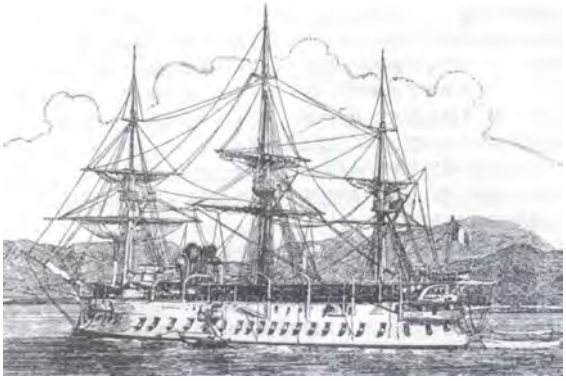
---

[27] 《劉壯肅公奏議》，卷三，頁 10-13；《法軍侵台始末》，頁 26-28。有關淡水之輝煌戰役，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 1884〉，《淡水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1998）一文有詳盡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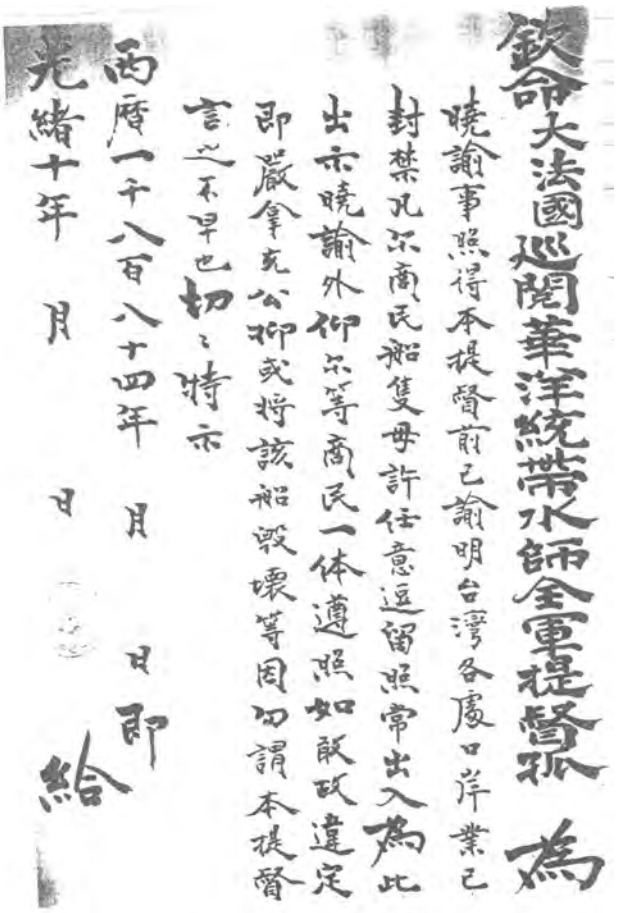
[28] 〈中法海戰〉，頁 572；《法軍侵台始末》，頁 28。

[29] 法軍戰前都說：「這次行動（指攻打基隆、滬尾）不過是一種軍事的遊行散步，一槍亦不用放的。」見《中法海戰》，頁 572。亦有稱之爲「偵察戰」者。唯經此戰役，認爲係發生最壞之影響，認爲與中國的任何協商已經成爲不可能。Maurice LOIR〈孤拔海軍上將艦隊－筆記與回憶〉轉引自白詩薇：〈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1884〉，《淡水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2001）。

[30] 《法軍侵台始末》，頁 37。



圖二　法軍隨軍記者筆下停泊淡水港口的 Bayard 艦，是孤拔提督的旗艦。
（資料來源：同圖一）


欽命大法國巡閱華洋統帶水師全軍提督孤　為
曉諭事照得本提督前已諭明台灣各處口岸業已
封禁凡尓商民船隻毋許任意逗留照常出入為此
出示曉諭外仰尓等商民一体遵照如敢故違定
即嚴拿充公抑或將該船毀壞等因勿謂本提督
言之不早也切切特示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月　日
光緒十年　月　日　即
給

圖三　海上封鎖告示
（資料來源：同圖一）

法國這種封鎖，在實行上卻有許多不便。考此時法軍之封鎖台灣，係起自台灣東北岸之烏石角，以迄南端之最南岬鵝鑾鼻，及西北一帶沿岸，籠括台灣海峽。但在此綿長之封鎖線上，法軍僅以 15 艘軍艦作輪替之監視，兵力實嫌單薄。其分配地區及數量計爲：蘇澳港 2 艦、基隆港 6 艦、淡水港 3 艦、安平港 2 艦、打狗港南灣 2 艦等；後又增援 4 艦，駐泊於閩江口外之馬祖澳以阻中國南北洋艦隊南下援台。

法艦之封鎖最初只限於沿海及北部爲重點，但同年 11 月 12 日再重新宣布擴大到沿海起算 5 海浬的海上。法軍此次封鎖台灣，實無充足之兵力可言，加以雨、霧、海濤和東北季風帶來連續的風暴等無數的困難，使其很難執行有效的封鎖。因此，清軍船舶經常突破封鎖，而與中國本土維持其聯絡。以此，法軍不得不於翌（1885）年 1 月 7 日，重新宣佈加強封鎖，並延長其封鎖線於台灣東部卑南（台東）一帶，以收宏效。

四、清廷反應

台灣民物雖富饒，但在法軍封鎖下，無可否認的，由於文報不通、接濟困難，尤以軍械彈藥困難急待補充，因此，予台灣守軍造成重大的困難與威脅。此外，台灣的對外貿易基本上亦處於停頓狀態，使得物價受其影響而高騰。[31]10 月 29 日清廷即傳旨，認爲：『全台口岸甚多，法人雖有封海，但必有可以運送之處」、「台灣軍火缺乏，著李鴻章、曾國荃、楊昌浚、張之洞、倪文尉設法接濟。」[32]

台灣兵備道劉璈以萬國公法雖有交戰國封堵敵國海口之例，局外各國原不能禁之例，而以法國當日之情，詳論其不合公法違封鎖之五例及不應封而封有妨各國通商五礙之說帖，請各國領事干涉法國之封鎖。[33]但因茲事體大，故未能得到各國領事的回答。

當朝許多大臣亦紛紛上書清廷，提出各種不同的方案措施，其中以會辦北洋事宜的吳大澂的〈援台十策〉最具代表，其方案具體周全，如：破格用人並加給口糧，援兵能渡台者或在台就地招募新勇每月給銀八兩之重賞，援兵能帶後膛槍者賞銀十兩，能解後膛礮一尊者賞銀百兩，並重價雇英、美、德商船裝兵暗渡……等。又如禮部侍郎徐致祥說：『以大勢而論，越遠而台近，越僻而台衝，越貧而台富；台郡嘗有疏虞，沿海各省不得高枕而臥。」台灣被法軍封鎖，戰事雖危急，但只要籌劃得當，充分發揮台灣的有利因素，最終是可以保衛的。提出以台保台，以閩援台，以廣東、南洋援台之策，建議清廷採取有力措施，依靠台灣內部力量就地出兵、出糧、出餉。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派出兵船、陸勇、槍械、餉銀等，積極支援台灣，決不能讓法國占據台灣。[34]

---

[31] 連雅堂：《台灣通史》（中冊）（台北：台灣通史社，大正 9 年）卷十四，頁 468。

[32] 軍機處寄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上諭，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中法越南交涉〉，《中法戰爭》第六冊，頁 10-11。

[33] 福建台灣道劉璈奏摺，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法戰爭》第六冊，頁 133-136。

[34] 會辦北洋事宜吳大澂奏摺，光緒十年十月三日；禮部左侍郎徐致祥奏摺，光緒十年九月十三

另有主張派南北洋艦隊援台，認爲要打破封鎖非戰艦不可。如吏科給事中萬培因建議：「令南北洋派船援台，可否密飭先赴福州海口，圖襲南竿塘，以多攻少，我操必勝，足令彼軍奪氣。故敵聞警回援，台圍必鬆，我船可相機退駛，或乘間徑往援台。彼軍兵力既分，使之疲於奔命，然後以計攻之。」[35]

11 月 1 日，清廷批准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的建議。傳旨：「南洋派兵輪五艘，北洋派兵輪四、五艘，在上海會齊；楊岳斌統帶八營，由漢口搭輪船赴滬，即統領各兵輪赴閩，先至廈門，探明法船情形，繞至鹿港等處登岸，相機援剿。」[36]但重握兵權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曾國荃，飾辭托故，他們說中國軍艦「船小板薄，易被轟沉」，「不足當鐵甲一炮」，敵船堅而且速，倍於華輪。海中相遇，既無退步，萬難脫身。」，勉強派令相隨，一出海則不能得力。」[37]拒不派艦援台，全無大局觀念。11 月 5 日，軍機處傳旨李鴻章、曾國荃：「台灣信息不通，情形萬緊，猶敢意存漠視，不遵諭旨，可恨已極！曾國荃著交部嚴加議處！即著多派兵輪，與李鴻章派出之船，在上海會齊，……速解台灣之危。該大臣等倘再遷延觀望，致誤戎機，自問應得何罪？」[38]在清廷的壓力下，李鴻章、曾國荃才不得不答應派艦到上海會齊，準備援台。北洋大臣李鴻章決定派超勇、揚威 2 艦，由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式百齡（Sebelin）率領，從旅順出發來上海，南洋大臣曾國荃決定派出開濟、南深、南瑞、馭遠、澄慶 5 艘，由提督銜總兵吳安康統領，但都遲遲不出發南下；在清廷多次催促下吳安康才於 1885 年 1 月 18 日，率南洋 5 艘戰艦從上海出發南下。由於日本在朝鮮起事，北洋軍艦未能派出。

孤拔得清艦南下的消息之後，決定親率 7 艦攔擊。2 月 7 日，孤拔率艦隊從馬祖澳出發北上，12 日，雙方艦隊在浙江石浦擅頭山附近海域相遇。吳安康毫無鬥志，不敢與敵艦交鋒，遠望敵艦即率隊逃跑。馭遠、澄慶 2 艦因航速較低而落後，被迫馳入石浦港隱蔽。法艦追擊開濟等 3 艦不及，即返回封鎖石浦港，並於 14 日夜間使用水雷將馭遠、澄慶 2 艦擊沉。開濟、南深、南瑞 3 艦進入鎮海口躲避。清海軍艦隊援台企圖遭到徹底失敗。[39]

清海軍艦隊援台雖失敗，但台灣守軍抵抗力並未受損，是時中國唯一之官商合辦之船公司招商局擁有汽船 26 艘，共 23,000 餘噸，爲避免法海軍劫奪，由馬建忠虛售於美國旗昌洋行（Russel and Co.），其船隻在美旗下繼續與中立國汽船載運軍隊與軍火前往台灣，法軍艦以無宣戰明文，不能截留。另外，清廷在自身艦隊無法援台的情況下，亦被迫採取緊急措施，而暫且利用外國船隻（特別是英國船及戎克船）以密運方式，從封鎖較鬆的台灣東部運送軍需品。中立國商輪對台灣運送軍火武器貢獻甚大，其中尤以瑞典、挪威國船「威利」（Wa-werley）號爲最，由光緒十年（1884）6 月至 12 月，先後運送 10 次，計淮軍 2,000 餘名，大

日；內閣學士周德潤奏摺，光緒十年九月十三日。《中法戰爭》第六冊，頁 25-26、29-32。

[35] 吏科給事中萬培因奏摺，光緒十年九月十六日。同上，頁 91。

[36] 軍機處寄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等電旨，光緒十年九月十四日。同上，頁 79。

[37] 直隸總督李鴻章電，光緒十年九月十六日。同上，頁 94。

[38] 軍機處寄直隸總督李鴻章等電旨，光緒十年九月十八日。同上。

[39]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頁 174-175（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47 年）。

小砲 60 餘尊，步槍 9,000 餘桿，子彈 300 餘萬發，威利輪之績效甚獲中國政府之贊許，以勛章授予其船長。[40]

清廷除以重金雇佣外國輪船包運外，亦依各方之建議組織民船偷運。爲反封鎖，全國各地亦紛紛掀起了支援台灣的運動。在法軍封鎖期間，據粗略估計，從廣東運送前、後膛槍 3,000 支，士乃得槍 500 支，現金 20 多萬；華東數省援助毛瑟槍 5,000 支，克虜伯炮 16 門，現金 20 萬。上海也援助大量軍械，道員龔照瑗裝載江陰淮勇 500 名由恆春登岸，並由民船運到黎意槍 1,000 桿；兩廣總督張之洞雇輪抵澎湖，復濟餉銀 3 萬兩及火藥等項。福建軍民冒著生命危險，駕駛漁船、商船，利用霧夜偷渡，不斷地將物資、軍械和兵員運到台灣。福州道員王正詩率兵 5 營突破法軍封鎖到台。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台灣軍民的抗法戰爭。[41]

由於法軍的封鎖台灣 ，致使台灣的最高負責人劉銘傳面臨了異常困苦的局面，外援不易到來，只得自力更生。爲打開困局，劉氏除了外以「爭援接濟」外，內部主要以「捐資募勇」之策。在劉氏的號召下，台灣各地各階層人民，亦配合採取各種如團練、漁團之方式，積極參加和支援守軍作戰，在台北地區即有 7,000 多民眾拿起武器投軍參戰。[42]

另外，彰化紳士林朝棟，急公好義，自備銀餉槍械，募勇 500 人組成「棟」字軍，在抗法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新竹紳士林汝海，自籌 2 個月的銀餉募勇 200 名協防新竹，解決了新竹守軍兵力不足的問題。武舉王廷理、周玉謙、劉廷玉、陳維樂等，皆自行捐資募勇，或二、三百，或數十人，在基隆河防禦戰中，與敵相持多日，苦守血戰。營官張仁貴，原係宜蘭「巨盜」 經曹志忠招來，精選壯士 200 人，每戰必先，奮勇非常，在戰鬥中中炮犧牲。戲曲藝人張李成走出劇院，奔赴戰場，在淡水大捷中，出奇制勝，作出了重要貢獻。台北紳士林維源先捐款 50 萬元，後又捐款 20 萬元，積極支援抗法鬥爭；紳士劉壽鏗深明大義，也捐款 20 萬元，台灣軍民爲爭取抗法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43]

法軍占領基隆，封鎖台灣，並沒有使清國政府妥協，於 1885 年 2 月 26 日又宣布實行「米穀禁運」，派軍艦在長江口、甬江口等巡邏，檢查來往船隻，不准運糧船北上，企圖切斷中國南糧北運的航道，造成北方和京城用糧困難。唯中國米穀歷來由江南以運河轉運，洪楊之役後運河頻頻失修，遂部分改由海道北運，此漕運海運並行中僅阻止海運，切斷一條航道就想制服中國顯然是徒勞的。英國政府對法軍艦隊封鎖台灣提出抗議，英美發表聲明，英美船隻不接受法軍艦的檢

---

[40] 《中法越南交涉檔》，第四冊，第 1301 號文件，頁 2406-2407；第五冊，第 1466 號文件，頁 2650-2653。《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九，頁 1、14；卷五十，頁 11；卷五十二，頁 15-16。威利船主戴葉生獲賞二等第一寶星（即勛章），彼爲中國政府誤爲英國人，瑞典挪威駐上海領事證實戴葉生爲瑞典挪威國人，非英國人，（中《法越南交涉檔》，第五冊，第 1925 號文件，頁 3317。）按瑞典挪威於 1814 年至 1905 年聯合成一國）。法《外部黃皮書》，1884-1885 年中國與東京事件」，頁 151-152。英人謂法國封鎖台灣，英國利益，受損甚大，表示不滿（1885 年 1 月 23 日《泰晤士報》，1884 年 9 月 4 日法國《時報》）轉引自：《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18，註 67。

[41] 劉子明：《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6 月），頁 152-153。

[42] 鴻臚寺卿鄧永脩奏摺附件，光緒十年十一月六日。《中法戰爭》第六冊，頁 192。

[43] 同註 41。

查。而俄國外相格爾斯（De Giers）針對法國少數軍力之封鎖形容爲蚊蟲螫大象，[44]英公使巴夏禮（Parkes）則稱之爲「孤拔微不足道之軍事成就」[45]。張之洞也曾建議劉銘傳設法對法軍「誘之怒之使之坐困」[46]。毫無疑問的，法軍戰艦十幾艘，兵力 6,000 餘人，長期封鎖台灣，耗資數億，損兵逾千，未能完全實現其政治目的，實在是得不償失。這對法國政府來說，不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嚴重失策，孤拔和巴德諾也承認：「基隆的占領，是一個錯誤。」[47]

五、列強態度

（一）英國

對於清法兩國在越南發生的紛爭，列強均衡量自國的利害關係，玩弄外交權術以求有利於本國。

英國當時與法國間正因埃及問題而陷入緊張關係。特別是在 1884 年 4 月 9 日，英國政府提議救濟埃及財政問題時，法國卻在德國的支持下明白表示反對，使得英國無法趁機攫取利權。[48]

但是，越南問題的發生卻等於爲英國製造意想不到的良機。英國意圖利用越南問題拖住法國，以提昇其在埃及的地位，並在歐洲政治造成對自己有利的態勢。何況法國的越南經略，如前所述本是爲對抗在印度的英國勢力，故其利害關係形同水火。於是，英國即對清國表示好意，同時慫恿西班牙干涉越南紛爭，以妨礙法國的越南攻略。[49]

及自福州馬江之役後，英政府即逐漸實施「服役外國法」（Foreign Enlistment Act），1884 年 9 月 4 日法駐香港領事報告法外部謂，英殖民地當局於前夕公布施行「服役外國法」，唯此後法艦在印度洋及中國海域並未發生補給困難。但法鐵甲艦拉加利松涅號（La Galissonniere）及 46 號魚雷艇在福州近海攻擊長門金牌砲台遭華軍還擊重創，駛往香港修理，卻引起嚴重之大罷工事件。駐英公使曾紀澤以法艦在香港修理事，於 1884 年終迭向英外部抗議，英政府始允將「服役外國法」普遍實施於英帝國全部港口。1885 年 3 月英政府決定加強中立措施，法國軍艦不能在英帝國所屬港口修理，亦不能自由補給煤炭，每一法艦每 3 個月僅能 1 次自英屬地港口購買其駛往最接近戰區之法屬地港口所需煤炭量；對香港言，則法艦僅能獲致駛往西貢所需之煤炭量，此規定由香港總督於 1885 年 1 月 25 日公

---

[44] 《法外交部黃皮書》"Affaires de Chine et du Tonkin (1884-1885)"（「1884-1885 年中國與東京事件」）第 163 號文件，俄外相格爾斯（De Giers）之評語，頁 180-181。轉引自：《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26。

[45] 英駐華公使巴夏禮之言論，1885 年 1 月 10 日（Kiernan，《Brifish Diplomary in China 1880-1885》，Cambridge，頁 175。）同上註。

[46] 《中法越南交涉資料》，《中法戰爭》第六冊，頁 478。

[47] 《法國黃皮書》，《中法戰爭》第七冊，頁 257。

[48] 《近代國際政治史》（下卷一），頁 207-208。

[49]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六卷，頁 473（日本：日本國際聯合協會，昭和 26 年）。

布實施。[50]這些均予法國極大之不便。

1885 年 1 月 30 日，曾紀澤電告總署云：法駐英使瓦定敦向英政府抗議，中國可自香港獲得武器，而法國軍艦不能在香港修理。英政府遂欲允法艦在香港修理並補充食物，曾氏抗議，並謂將截斷香港食物來源。由於香港已於 1884 年 10 月發生反英反法大罷工，英政府不願再度發生罷工，遂未改變其對法政策。是時中國自德國購買之武器由香港轉運，香港總督鮑雲（Bowen）云：「中國自香港獲致大量軍械，所謂香港對法國之效益大於對中國實係揣測」，英國會議員鄧納文（Dunraven）伯爵指責英政府允許法國利用香港從事「野蠻行動」，彼之譴責獲廣泛支持。[51]從上所述，可知英對法仇視的態度，轉厚於清國，以清政府而言，英國實爲列強中支持最力者。

到了 2 月份，法國又宣布實行「米穀禁運」後，由廣州以北之中國港口運輸之米穀均爲法國視爲戰時禁制品，台灣海面及江蘇吳淞口外佘山洋面中國漁船及貨船多艘爲法艦焚毀，水手多名或死或傷，財產損失不貲。『泰晤士報」稱被俘之水手遭受野蠻之待遇。2 月 26 日英國會下院議員馬涅克（Magniac）就法國視米穀爲禁制事質詢，費毛利斯答云：政府諮詢法學家意見後，不能接受米穀爲戰時禁制品之主張。[52]

由上海運米穀至北方之輪船大多屬於英美之業主，或懸英美之國旗，法國宣佈米穀爲禁制品引起中國港埠英美商人之強烈反對。上海英總領事奉巴夏禮命令公告，英政府不承認米穀爲戰時禁制品。巴夏禮並發布通告，英海軍將反對法方以米穀爲禁制品而扣捕，3 月 16 日（光緒十一年正月三十日）瓦定敦訪晤英外相葛蘭維謂，法政府對巴夏禮頗不滿意，認爲係蓄意鼓勵中國抵抗法國，並使他人誤解英政府態度，3 月 21 日（二月初五日）葛蘭維答稱：『巴夏禮公使聲明對法國並無不友好之意，彼僅係行使職權以必要之消息供給英人。」英外相並謂：英政府抗議視米穀爲戰時禁制品，亦不受捕獲法庭有關判決之約束。[53]

---

[50] 《法外部黃皮書》，中國事件」（法國與英國之困難關係）頁 24。《法國外交文獻》第一集，第五冊，第 541 號文件，費理致瓦定敦訓令，1885 年 1 月 24 日，頁 570-572。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France, No. 1 (1885)，英國會文件，法蘭西，第 1 號（1885 年）頁 10。Kiernan 前述書，頁 153。1884 年 9 月 7 日法國《時報》次年 3 月 21 日法國《時報》指責英國售軍火予中國，而拒絕以煤炭及食物供給法國。轉引自：《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18，註 68。

[51] 1885 年 1 月 22 日《泰晤士報》社論，論華人之怨言。《中法戰爭》第六冊，頁 265、297。

[52] 1885 年 2 月 20 日、21 日、27 日《泰晤士報》，1885 年 2 月 4 日、28 日，3 月 11 日法國《時報》。法外部黃皮書》：中國事件」，法國與英國之困難關係）頁 22；第 31-32 頁。『英國國會文件，法蘭西（1885）第 1 號）」頁 15-18。1885 年 3 月 9 日法國《時報》載稱：『國會極左派使葛拉奈（Granet）出面，就法國對華海陸用兵事質詢政府，何以未經國會授權而逕行致牒列強，就戰時禁制品援引交戰國資格」。1885 年 2 月 3 日《泰晤士報》載稱：數百艘中國漁船及航行近海之船隻爲法人摧毀，其水手或被殺，或械送至基隆，遭受野蠻之待遇。《中法越南交涉檔》第五冊，第 1449 號文件，頁 2639；第 1491 號文件，頁 2690；第 1575 號文件，頁 2801；第 1614 號文件，頁 2871，第 1620 號文件，頁 2890，第 1621 號文件，頁 2892。法軍艦在吳淞口外佘山洋面焚毀中國漁船貨船，水手多名或死或傷。轉引自：《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19，註 73。

[53] 英國國會文件，法蘭西（1885）第 1 號，葛蘭維致瓦定敦文，（1）1885 年 3 月 21 日，頁 15-18。（2）1885 年 4 月 4 日，頁 15-20。《法外部黃皮書》，中國事件」（法國與英國之困難關係），頁 50。1885 年 3 月 25 日法國《時報》H.B. Morse 著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英國爲糧食進口國家，視法國宣佈米穀爲戰時禁制品爲一嚴重問題，因而極力抵抗，以避免創此先例，可能危及英國之糧食供應。英國會反法之論調漸強，認爲清法之戰將演變爲英法之戰。西莫士勳爵（Lord Sidmouth ）於 3 月 27 日主張加強英國在遠東之艦隊。貝利（Bury）子爵謂：「英國可能隨時被捲入戰爭」。英國名探險家戰地記者柯爾輝（Colquhoun）謂：「吾人盡最大努力，不能使吾國不參加清法之戰」。4 月 4 日英政府以節略致瓦定敦，說明英國不能承認米穀爲戰時禁制品之理由，若米穀爲法國捕獲，亦不接受捕獲法庭之判決。[54]凡此種種，實予法軍以莫大之打擊，亦是促成法國後來接受和談而解除封鎖的重要因素。

（二）德國

德國自普法戰爭之後，俾斯麥的外交政策雖然是「除法國之外，尚須使其他列強感到德國的重要性 ，利用他們之間的利害關係 ，防止出現反德同盟的可能性。」但是，此點絕不意味著已無必要再壓迫法國。反過來說，德國宰相俾斯麥（Bismarck）亦希望與法國協調，鼓勵其在歐洲以外發展殖民地，是以多次支援法國佔領東京。[55]

及至清法宣戰後 ，對法軍之戰略以台灣爲目標亦予以肯定看法 ，俾斯麥於 10 月 22 日（九月初四日）與法大使館參事代辦蘭德爾（Gaston Raindre）談話，提及中國態度堅定，謂：以目前法軍情況論，中國首都不致爲法軍進攻，而中國海島比北京更易成爲法軍作戰目標，法國佔領台灣以爲質押超過其所要之賠款，如作戰僅限於此地區，則不致引起歐洲貿易之迫切訴怨。鐵血宰相結語云：「茲值文明與半野蠻發生衝突之際 ，吾國自與文明一致 ，但吾國遠東有重大商業利益，吾人因而不得不避免任何有害吾國與中國良好關係之行動 。」[56]由此可見德國玩二面手法的外交。

談到德國與中國之商業利益，其來有自，在北黎事件發生之前，中國已雇用德國軍官。1884 年 6 月 27 日法《時報》稱德國海軍少校式百齡（Sebelin）與梅勒（Meller）奉命指揮短期內自基爾（Kiel）港啓碇前往中國之軍艦定遠號與鎮遠號，德海軍少校華倫道夫（Wahrendorff）則被指派指揮行將竣工之濟遠號軍艦。

北黎事件發生後，駐德公使李鳳苞於 8 月 18 日（六月二十八日）建議總署雇用德籍軍官 50 名分派於中國軍隊從事教練，並謂此辦法可引起法國對德國之猜疑。中國新型海軍尚在萌芽 ，需要外籍專業人才 ，總署遂令李鳳苞立即雇用 50 名德籍軍官，經中國駐柏林公使館之努力，若干德籍現役及退役軍官願前往中國服務，李鳳苞旋報告總署謂，24 名德籍軍官與士官可望於 1884 年 10 月或

（《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 第二冊，頁 363。轉引自： 《越南與中法戰爭》 ，頁 310。

[54] Kiernan 前述書，頁 176；頁 182-184。1885 年 3 月 11 日法國《時報》陳述英國輿論反對法政府之決定。 《經濟學者》雜誌謂法政府之決定就國際法觀點言，並無價值。同上註。

[55] 《法國外交文牘》 ，第四卷，第 561 號，《上院議員聖華致外長杜克列》 ，頁 146-147。轉引自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 ，頁 156（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年 1 月初版）。

[56] 《法國外交文獻》 第一集，第五冊，第 436 號文件，Rainde 致費理電，1884 年 10 月 22 日，柏林，頁 456-457。轉引自： 《越南與中法戰爭》 ，頁 293。

11 月抵天津。

中國駐柏林公使館極力以高額薪給召募德國軍官，中尉軍官年俸 18,000 馬克，另給充裕之旅費津貼。德籍軍官抵天津後即分發於超勇、揚威（均係阿姆士莊 Armstrong 型戰艦）及威遠 3 艦服務，而以曾參加美國內戰之退役海軍少校式百齡爲指揮，李鴻章予式百齡華名萬里城，稱之爲德國水師總兵，令其協同儘先副將林曾泰，儘先游擊鄧世昌等率 7 艦南下對付孤拔之海軍。清廷令署福建巡撫楊昌濬「加意摒循」「客將」旋中國官員指責其「偏執己見，不服調度」，式百齡遂被調往北方。

法國反對派報紙對中國雇用德籍官佐消息大肆渲染，並予以評論，甚至有人謂受雇之德人已逾 160 名，茹費理爲使反對派不再有攻擊藉口，遂令駐德大使郭式爾（Alphonse de Courcel）向俾斯麥交涉，郭式爾與俾斯麥私人談話中謂，李鳳苞揚言可能雇用 50 名德籍軍官爲中國服務，並使史台丁之鐵甲艦啓棹駛往中國。俾斯麥答稱，中法衝突期間，德政府不許德籍軍官爲中國服務，駛往中國之戰艦可視爲戰時禁制品。[57]話雖如此，德國軍官事實上仍持續協助中國，並在德政府半官性報紙《北德意志通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 Zeitung ）說明德政府對德籍軍官爲中國效力之態度。1885 年 1 月 14 日（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德意志通報》發表有關短文，其結論謂：「帝國政府既不能鼓勵，亦不能阻止應徵。」但現役及後備役軍官則帝國政府爲嚴格遵守對中法衝突之中立原則自不能允許彼等應徵。實則李鳳苞所募軍官大半係現役，請假准行，俾斯麥佯作不知，中國所需軍火亦秘密供應。[58]

總之，德國在此兩面光的態度下，初時確實使法國在歐洲外交上無後顧之憂，使法國能專心對越南及清國採取強硬態度。法國宣佈封鎖政策後，德國不僅未提出抗議，甚至主張「只要公平地對待各國，則在戰時採取禁運措施使敵人陷入困境，從而盡早結束戰爭，不失爲一種正當的措施。」[59]此種主張予法國是利多，然其武器軍火秘密供應清國，軍事人員陸續不斷協助清政府，則又使法國莫可奈何。

（三）日本

日本與中國毗鄰，很早就想出兵朝鮮，而清法有關越南問題的紛爭，正好提供日本絕佳的機會。日法間在利害關係上雖表示要相互合作，但隨著清法間關係的日益緊張，日本基於外交權謀亦不得不向中國解釋。1883 年 7 月 26 日，榎本公使拜訪總理衙門，向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諸大臣表明如下態度：「聽說法

[57] 同上，第 385 號文件，郭式爾致茹費理相電，1884 年 8 月 30 日於柏林，頁 390-395。

[58] 《法國外交文獻》第一集，第五冊，第 519 號文件，茹費理致郭式爾電，1885 年 1 月 12 日，頁 543；第 522 號文件，郭式爾致茹費理電，1885 年 1 月 15 日，頁 546。《中法越南交涉檔》，第四冊，第 1293 號文件，李鳳苞函，頁 2379。1884 年 11 月 18 日《泰晤士報》，1885 年 1 月 30 日法國《時報》，1884 年 12 月 13 日《泰晤士報》稱爲中國服務之德籍陸海軍人員已達 126 人。轉引自：《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294。

[59] 同註 48，下卷一，頁 363。

國公使托利庫在與李中堂談判中言及若有任何動向，我國政府（指日本）將與法國連橫共同對抗貴國，但此點全係虛構的妄言，很難相信係出自托利庫公使之口。但若果真曾有此言，則我國政府不得不指其爲誣枉之言。我向貴大臣聲明：我國政府絕無此種意向，並且不存在與法國的連橫及協議。」[60]

然而，日法合作的流言仍不斷傳出，且實際上日法間確實曾暗中進行接觸。例如，同年（1883）9 月 1 日，日本井上外務卿和法國代理公使即在日本外務省碰頭，雙方就琉球問題和越南問題的共同性進行會談，並論及日法間的提攜行動。[61]同年 10 月 6 日，法國加里發駐清書記官拜訪榎本公使，並對其表示，「日本若有意與法國連橫合作，則法國將無異議加以應允。」同時，他更提醒該公使，指出日本如喪失今日良機，則將來琉球案、條約改正案和朝鮮獨立論都無法成功。對於此點，榎本公使亦表示，「日本十分理解法國的立場，一旦清法開戰，基於個人意見而言，即使不存在日法連橫關係，日本亦將採取中立友好的立場，爲法國提供各項方便。」[62]第二年（1884）3 月，適值清法衝突激化之際，日本駐法參事官再次向法國政府通電，詢問政府當局對日法連橫的看法與立場。[63]同年（1884）5 月，隨同大山巖陸軍大臣訪歐視察的陸軍中尉三浦梧樓，與法國陸軍負責人就台灣、琉球問題、法清問題、朝鮮事件以及日法連橫等問題進行會談。[64]日法連橫雖然未能實現，但無庸贅言的，日法間的合作關係卻因而日形緊密。

及至 8 月，清法開戰後，由於法國對台灣、福州進行攻擊，使得日本朝野大爲興奮，日法間的連橫動向更形活絡。例如，法清開戰之後，日本自由黨領袖後藤象二郎及板垣退助透過小林樟雄拜訪法國公使賽奇威（J. A. Sienkiewicz）討論東亞大勢和朝鮮計劃，要求調濟所需軍用資金 100 萬日圓，以及使用孤拔提督手下的軍艦。此點爲賽奇威所接受，但其交換條件爲：日本政府默認法國雇用日本人，以法國船艦運送、借貸臨時費、日本人自朝鮮入侵北清、法清講和時要求將朝鮮作爲獨立國等。不久，伊藤博文亦同意前述朝鮮計劃，甚至向竹添公使傳達密令，改變對朝政策，援助獨立黨。[65]

然而，儘管有日法連橫之動向，但由於法國攻台期間的拖長及戰果無法如法國之所預期，使日本懷疑法國之台灣封鎖策略背後是否隱藏著更深的野心，因而不敢過於信任法國，此種憂慮可由下述事例中看出。1884 年 11 月，日本駐俄公使花房義質向本國政府提出「清法啓釁中處理台灣之方略」該方略的要旨即是：

---

[60] 例如，1883 年 4 月 24 日，駐清榎本公使和布雷公使之間，即曾預期日清或法清戰爭的發生，而討論兩國間的戰略戰術。《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六卷，第 204 號，頁 478；第 243 號，頁 553。轉引自：《台灣國際政治史》，頁 157-158。

[61] 同上，第 259 號，頁 590。

[62] 同上，第 283 號，頁 642-643。

[63] 《法國外交文牘》，第五卷，第 222 號，頁 212。轉引自：《台灣國際政治史》，頁 157。

[64] 安岸昭男：〈日清戰爭前の大陸政策〉，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清・日露戰爭》（日本：有斐閣，昭和 37 年），頁 27 所收。

[65] 田中直吉：〈朝鮮をめぐる國際葛藤の一幕〉－京城甲申の變－（法學志林協會《法學志林》第五十五卷第 2 號，日本法政大學，昭和 32 年，頁 27-9 所收。轉引自：《台灣國際政治史》，頁 177-178。

爲防止法國對台灣的野心，日本應占領台灣。花房公使指出：「台灣鄰接吾國南島，其土地肥沃、人民富裕。然山野迄今多未開發，人民亦未脫離蠻俗。清國雖徒擁其主權之名，但並無拓其土地、教化人民之意，以致台灣每成爲歐人企圖占領之地。如台灣一旦落於歐人之手，我南島之危將驟然升高。現在歐洲諸國結盟以保和平，故有餘力朝亞非各地發展，法國脅迫清國乃其自然結果。如法國一旦陷落北京，必然要求割讓領土。斯時，若所割者爲台灣，則吾國南島之危指日必至。現爲求排除此危機，保障我國安全，其首要工作是使法國放棄割讓台灣的要求，或使清國不答允割讓台灣給法國。如上述二者皆不可得時，唯今之計是我國應自己占領台灣。」[66]在此情況下，由於日本之猜忌，日法之連橫合作自然不成，甚而認爲法之得逞即是日本喪失奪取台灣之機，是以日本對法國之各種措施比較而言，持壁上觀之態度。

在清法戰爭中，法國對台灣的封鎖，其企圖使清政府屈服，但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於是，爲打開此種僵持的局面，法國政府乃在考慮各種戰略之後，如前述又宣布自 1885 年 2 月 26 日起，將從廣東北運的米穀，全都列爲「戰時禁制品」，希望使清國陷入糧食危機，進而促成議和的機會。然而，由於從事米穀運輸者主要是英美的船舶，因此英國立即對此表示抗議，聲明不承認只因運往交戰國港口，即全面宣布爲「戰時禁制品」的作法；而美國駐柏林公使亦批判法國的行爲，譴責將米穀列爲「戰時禁制品」是回歸野蠻戰爭習慣的劣行。[67]

至於其他國家，如：瑞典、丹麥亦反對視食物爲「戰時禁制品」，丹麥對法國之措施表示保留，[68]意大利外相曼西尼（Mancini）雖未表示反對，但謂此係一新問題，應交付外交爭議委員會研究。[69]整體言之，法國於遠東之軍事行動，始終是孤單進行，且偶而受到其他列強之抵制。

六、封鎖落幕

1880 年代的中國仍爲傳統之農業中國，無現代工業；同治中興人物於敉平太平天國之亂後，始著手建立近代海軍，成立兵工廠，購買並自造戰艦，編練人數有限之新式陸軍。然中國對法作戰仍須向外國購買大批武器，加以交通不便，運往戰場需時甚久，而新建之海軍又分爲四大單位，缺乏連繫，更乏作戰經驗，在德國訂購之強大戰艦則因戰事不能駛往中國，以致制海權操於法國。法國對台灣的封鎖雖然使清國軍需補給困難，但同時亦導致列強的反感或懷疑，法國未必有所收穫。同時，在英國的聲援下，清國繼續進行秘密運輸，[70]使得封鎖本身對

---

[66] 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外交篇〉中卷（日本：秘書類纂刊行會，昭和 9 年）頁 183-185。同上，頁 179。

[67] 《近代國際政治史》，下卷一，頁 215。

[68] 《法外部黃皮書》，中國事件：法國與英國之困難關係」，頁 36；頁 43-44。轉引自：《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10。

[69] 《法外部黃皮書》，中國事件：法國與英國之困難關係」，頁 33-34。同上。

[70] Albrecht Wirth 著，周學普譯：頁 61，《台灣之歷史》（《台灣經濟史六集》，台灣銀行，民國 49 年）。

台灣戰局而言，實際上已難造成重大影響。

在台灣的長期攻防戰中，從封鎖前之基隆、滬尾之戰役外，在封鎖期間，於基隆、台北地區以烏嘴峰之戰爲最大規模，而以二次月眉山之戰最爲慘烈。由於台灣各種熱帶病和風土病的猖行，使法國越來越陷入不利的境地，此點單從法軍病患死者數字觀之即一目瞭然。例如，1884 年 10 月 10 日至 23 日間，死者 11 人、病患者 56 人，其中 12 人爲重症。患者從 11 月 1 日到 9 日的 9 天中，死者即達 17 人，病患者 350 人。從 11 月 9 日到 20 日，死者 16 人，病患者 136 人，休養兵 229 人。從 11 月 20 日到 12 月 1 日，死者多達 116 人，患者 220 人，260 人休養。結果，到同年 12 月 23 日之前，侵台法軍的可用之兵竟不足千人。[71]

至此，法國政府開始感到占領台灣之困難，乃再增派駐非軍團 2 個大隊（大約千人左右）前往台灣增援；1885 年 1 月，增援部隊相繼抵達台灣。然而，自 1885 年起，清國方面除整編當地台灣民兵之外，亦不斷增援守台清軍，使清軍從當初的 5,000 人增爲 30,000 人。[72]至此，總計約 3,000 多人的法軍無論如何勇猛，已不可能在台灣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法國政府在明瞭此種嚴峻的現實之後，決心在適當時期從台灣撤兵。但爲彌補因撤退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故決定在撤兵之前再發動攻擊，以收戰果。此外，爲作爲從基隆撤退的代償，法國決定占領澎湖列島。[73]

當時，在澎湖諸島的清國守備軍（包括緩靖、德義等及礮勇練軍）僅 3,000 餘人，無法全面防衛所有散在各處之島嶼。台灣兵備道劉璈因擔憂此事，乃向督辦福建軍務的左宗棠求援，但在左宗棠行動之前，法艦即已兵臨澎湖展開攻擊。[74]戰鬥發生於 3 月 29 日到 31 日之間，清國守軍因無準備而毫無戰意，故除 2 次小規模衝突之外，幾乎是不戰而敗。守將通判鄭膺杰未經交戰，即乘坐戎克船逃回台灣府（台南）。[75]於是，孤拔提督便輕易地占領澎湖諸島。法國方面一時爲勝利欣喜；但是，幾乎在此同時，在越南的法軍卻在諒山大敗，使戰情再次告急。4 月 2 日，孤拔提督接獲本國急電，要求其立即增援東京，並自台灣撤出。

在越南的戰局，法國雖在 1885 年 2 月攻克諒山，占領廣西邊境的鎮南關，但清軍隨即靠馮子材、王孝祺等援軍挽回劣勢，不僅收復鎮南關，甚至在 3 月 24 日到 28 日的諒山大戰取得重大之勝利，保持陸戰方面的優勢。反之，法軍諒山之役的慘敗使巴黎政界大爲驚愕，反對派從而推波助浪，《費伽羅》（Le Figaro）報甚至發表撤退諒山之報告，謂法軍陣亡、受傷及被俘者共 1,800 人。巴黎人心恐慌，股票市場證券大跌，當時法國政治人物瓦爾德克盧騷（René Waldeck-Rousseau）謂：「滑鐵盧（Waterloo）之敗尚未引起如此之震驚」。巴黎報紙除《時報》及《法蘭西共和國》（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兩報外，紛紛著論指責茹費理。諒山之慘敗予法國極大的震撼，半世紀後法人提及諒山之役猶視爲重

[71] 《法軍侵台始末》，頁 38、47、49。
[72] 同上，頁 40。
[73] 同上，頁 52-53。
[74] 《台灣通史》（中冊），卷十四，頁 472。
[75] 同上，頁 472-473。

大戰役之挫敗。[76]

此種情勢發展使法國政府更渴望進行議和。當時，清國駐德公使許景澄及駐英公使曾紀澤等察覺法國此種的動向，乃建議本國政府於此時與法國進行議和談判，使法國無法要求天津條約以外的權利。另一方面，清廷自光緒八年（1882）、十年（1884）兩次朝鮮事變（壬午及甲申事變）以來，即十分擔心日本出兵朝鮮。同時，清軍雖在諒山取得勝利，但是法國艦隊仍擁有絕對的海上優勢，再加上華北因米穀禁運產生糧荒，使北京政府大感威脅。最令北京政府憂慮的是，一旦戰事擴及大陸本土，則內亂將有乘外患再起之慮。於是，主政的李鴻章表示：「藉諒山一戰之威，如能與法締結和約，法國將無法提出過份要求」，從而一心想儘速與法國議和。[77]

在法國方面，諒山一戰使茹費理內閣遭到輿論的激烈攻擊，終於導致 3 月 30 日國會左右兩派聯合倒閣，以 306 票對 149 票的絕對多數，通過對內閣的不信任案。但是，講和會談反而因此變得積極。4 月 4 日，清國代表金登幹（James D. Campbell）與法國方面代表畢洛（A. Billot）在巴黎承認清國提出的講和草案（仍以《天津簡約》爲主），雙方簽定協議正式停戰。[78]4 月中旬，北京批准《李・福天津簡約》，法國亦於 4 月 15 日解除台灣封鎖。

同年 6 月 9 日，李鴻章和巴德諾在天津簽署和約（《中法越南條約》）該條約主要是確認《李・福祿諾簡約》的內容，其規定大體上同前一致。其要項爲（1）清國承認越南爲法國的保護國；（2）清國在老開、諒山兩府附近開設通商口岸；（3）法國自基隆、澎湖諸島撤退；（4）清國若於南部數省鋪設鐵道時，須雇用法國人；（5）兩國分別派遣委員協議畫定邊界及通商細則等。[79]

前述接獲緊急命令的孤拔提督，雖立即著手計劃撤兵台灣事宜，但不久卻再接到本國政府的訓令，指出因停戰及和議預備協約的成立，要求其解除台灣封鎖，但在正式條約成立之前，仍應繼續占領台灣地區。[80]因此，至清法和約正式簽定爲止，孤拔提督一直占領著台灣東北一帶和澎湖諸島。

在此之前，孤拔提督於占領澎湖列島之後，親見媽宮（馬公）港不但可容納千艘以上的船艦，並能遮擋來自任何方向的強風，故認定將來若能在此建立軍港，必能成爲東洋第一堡壘。孤拔提督將此看法向本國政府報告，並獲得茹費理內閣接受。但當建設該港所必需之資金和建材運抵新加坡時，講和條約卻於此時成立，使法國不得不從澎湖列島撤退，於是，建港計劃乃爲新內閣所取消。孤拔提督本人則在講和條約正式成立的二天之後（即 1885 年 6 月 11 日），因患赤痢而病逝於其旗艦巴雅德號，遺骸由同艦於 7 月下旬運抵其本國，以國葬之禮葬於故鄉阿倍比爾（Abbeville）。[81]

---

[76]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頁 342。
[77] 羅惇曧：《中法兵事始末》，中《法戰爭》第一冊，頁 26。
[78] 《中法戰爭》第七冊，頁 390、399-407。
[79] 同上，頁 422-424。
[80] 《法軍侵台始末》，頁 106。
[81] 同上，頁 116。

七、結　語

綜觀清法戰爭的過程，在軍事上各有勝負。清國勝少負多，但最後之勝利，可說是中國的。從 1884 年 8 月 26 日，清政府對法宣戰後，在中國東南沿海，劉銘傳率部頂住了基隆法軍強大攻勢，獲得滬尾大敗法軍的戰績；在陸路上，有劉永福所率黑旗軍的重挫法軍，及最後更因馮子材在諒山的大敗法軍，致使法國輿論大譁，眾議院議員猛烈抨擊茹費理政府，譴責茹費理「出賣法國，使共和國蒙受第一次的羞辱」[82]。在一片責罵聲中茹費理內閣倒台，這是「在法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因外交問題而下台的內閣」[83]。而清法戰爭軍事上的勝利，亦是清政府鴉片戰爭後反列強侵略史上第一次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法軍將領愛蘭明加說：「我從沒有想到清國軍隊有這麼堅強的組織，打得這麼好。」[84]英國人季南評論說：「在這些無名的復仇的戰爭中，白種人同黃種人幾乎第一次立於同等的地位。」、「黃種人的軍隊第一次同歐洲人短兵相接而沒丟臉。」[85]清法戰爭所創造的這麼多的「第一次」，就非常有力地表明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

清法戰爭中由於清國海軍太弱，不能與法艦抗爭，使法艦得以橫行海上，封鎖台灣，禁運米穀，侵占基隆、澎湖，對清國政府造成巨大的軍事政治壓力。清政府不但能利用列強間之矛盾而獲取部分之協助，化解台灣被封鎖之危機，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戰爭結束後，總結這次戰爭教訓時指出：「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應援，何至處處牽制。」清政府在戰後吸取了這一教訓，大力擴充海軍。1885 年 10 月，設立了海軍衙門，委醇親王奕　為總理大臣，以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為會辦大臣，標誌著中國的海軍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級。1888 年北洋艦隊建成，由海軍提督丁汝昌指揮，擁有 7,000 噸級鐵甲艦 2 艘，3,000 噸以下巡洋艦 7 艘，還有炮艦、運輸艦、魚雷艇等共 25 艘，排水量約 50,000 噸，規模、實力都超過了當時的日本海軍。此外還有南洋、廣東、福建等海軍；成立了海軍學堂，聘請英、德等外國人為教習，加強海軍訓練，一個美國學者寫到：「中國成立了北洋海軍之後，它的艦隊在遠東海面上是最大的諷了，中國人不怕海軍示威了。」[86]這對加強清國之國防起了積極作用。

關於清法戰爭對台灣的影響，一般咸認法國侵攻基隆、滬尾，並封鎖台灣，促使清廷對台灣的價值重新認識，結局乃將 200 年來隸屬福建省的台灣獨立起來升格為一個行省。台灣設省之議由來已久，無奈清廷始終蔑視台灣，處心積慮地防範、隔離，視為化外之地，1874 年牡丹社事件日本侵台猶不足為訓，直到法

---

[82] 《內閣的危機與初步協定的簽訂》，《中法戰爭》第七冊，頁 394。

[83] 《中法戰爭史彙集》（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頁 225。

[84] 《法軍諒山慘敗》，《中法戰爭》第三冊，頁 503-504。

[85] （英）季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頁 187、132。轉引自《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頁 177。

[86] 《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頁 152。至於海軍的擴充可參閱王凡：《中國近代海軍的籌建》（收錄於《近代中國禦辱求強》史話，微出版社，1992 年 5 月一版），董進一主編：《北洋海軍的興衰》（山東：威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 年 8 月一版）。

軍封鎖台灣橫行中國沿海及大陸本土，始換來台灣建省的轉機。

然則，法軍侵犯台灣不僅促成了台灣的建省，更刺激了台灣人民的敵愾心，爲了抵抗外來的侵略而積極協助清朝，士紳出資召募土勇，民間流傳「西仔來拍北台灣，百姓合齊要征番」（西仔」、番」均指法軍），於是「團練」、漁團」紛紛組織起來，獅球嶺的防衛戰和滬尾盆地的大勝利，兩役的主力軍便是林朝棟和張李成的民兵。1874 年的日軍侵台祇限於「藩」地內對「番」民的懲罰，這次（1884-1885）法軍對台灣的攻擊、占領與封鎖卻是全島性的，台灣人在此役開始萌生了民族意識的幼苗。再十年後（1895），爲了抵抗日本割台，這株幼苗益形茁壯。

清法戰爭在澎湖

林文鎮*

一、導　言

（一） 法軍侵澎的背景

清光緒 10 年（1884）到 11 年（1885），清朝和法國之間發生的清法戰爭，基本原因是由於法軍覬覦、侵略清朝的藩國－越南。然而孤懸台灣海峽中的澎湖卻無端的成了戰爭中唯一淪陷於敵手的清朝領土，及清法議和之後，法軍最晚撤離的地方。

法國染指越南由來已久，從清同治年間起，就一再的以武力逼迫越南，要割地賠款，簽訂以法國爲其宗主國的合約[1]，還在光緒元年（1875）送交一份越法之間的「西貢條約」抄本給清廷，要求清廷承認該條約，同時開放雲南讓法國通商。而清廷則只雖然在光緒 6 年和 7 年（1880-1881）兩度照會法國，聲明不予承認，卻沒有採取積極的保護越南行動（黎東方，1976：553-554）。到光緒 9 年（1883），主戰的法國茹費理（Jules Ferry）內閣命孤拔率軍攻陷越南國都順化，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明白宣佈越南是法國的保護國，清朝才正式派兵進入越南，與法軍對抗。翌年清軍在戰事失利後，與法國簽訂了「天津草約」，雙方約定清朝撤軍越南，法國也不索賠。但是法軍卻在兩國政府尚未批准草約之前，就搶先進兵諒山「觀音橋」，意圖接收，而被清軍擊退。法國因此藉口清廷背信，要求賠償二億五千萬法郎的巨額軍費，但是清廷仍只答應撤兵，拒絕賠款（上引書：556-557）。於是法軍宣稱將「恢復行動自由，必要時將佔領有效的保證品做爲手段」，並於 8 月 1 日下令海軍提督孤拔，進行破壞基隆港的防備，佔領附近的煤礦做爲報復（黎烈文，1960：10）。

清光緒 10 年（1884）8 月 5 日，法軍艦艇開始砲轟基隆，並且成功的登陸基隆，卻因爲寡不敵眾而不得不在次日就退回軍艦上，改在基隆港外輪流進行「封鎖」（上引書：15）。同年 10 月 1 日法軍增兵之後，同時對基隆和淡水兩地展開攻擊，這一次法軍雖然再度登陸並佔領基隆，卻一再的遭到清軍的反攻及疫病的

* 澎湖采風文化學會理事。

[1] 先後有同治元年（1862）的「法越條約」、同治 13 年（1874）的「西貢條約」。

困擾，獲利並不如預期；而進攻淡水的法軍，也在登陸之後受到了重創，最後只能再度對台灣沿岸實施「和平封鎖」[2]，等待法國政府加派軍隊來增援（上引書：31-40）。

清光緒 11 年（1885）1 月，法國政府研判，增援北台灣的戰場，所能獲得的利益有限，決定從基隆撤軍，把兵力集中到越南北部的諒山戰場，以迫使清廷讓步。但是爲了降低撤出基隆對士氣的衝擊，於是決定先佔領澎湖，因而把澎湖捲入了這場戰火之中（黎烈文，1960：51-53）。

（二）澎湖之役前的戰情

事實上，早在光緒九年（1883），法國的軍艦就已經在澎湖海域活動了。當年 5 月 7 日到 6 月 4 日，還曾經發生「提歐逢特」（Triomphante）鐵甲艦在澎湖大山嶼（澎湖本島）南方擱淺的意外（許雪姬，1991：33）。第二年，法軍還根據軍艦所測繪的水文資料，完成了一幅六萬分之一比例尺的「澎湖地圖」。

光緒 10 年 12 月，爲了因應法國可能進犯台澎的情勢，清廷將台灣的防務分爲前、後、南、北、中五路，前路由澎湖副將蘇吉良統兵三千，駐守媽宮（馬公），並且著手籌建西嶼及蛇頭砲台，以茲守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722 ）。光緒 11 年（1885）1 月，法艦封鎖南台灣的安平和打狗兩地，清廷也積極的雇用丹麥籍和英國籍輪船，將軍備和兵勇運補到台灣澎湖（轉引自葉振輝，2000：91）。

根據英國署領事在澎湖淪陷後的彙報，在澎湖之役之前，澎湖的主要兵力共約三千五百人，由澎湖副將周善初駐守媽宮總其成，以前路勇軍綏靖副中營儘先副將陳得勝，率台灣勇駐守豬母水（今山水）爲前敵。次要的防守，則責成地方仕紳郭鶚翔、蔡玉成、黃濟時等督辦民團，自備資斧，以資守望（林豪，1893：365-366）。其主要兵力佈署大約如下（圖 1）：

1. 媽宮：副將周善初率台州勇一營，居中調度，都司鄭漁帶陳營 300 人協守。
2. 文澳：通判鄭膺杰帶水勇（土勇）400 人（一營）駐守。
3. 東衛：同知　鎮岳帶廣勇一營駐守。
4. 大城北及雙頭掛：守備馮楚　帶臺州勇二營駐守。
5. 豬母水：儘先副將陳得勝帶台　勇一營駐守。
6. 金龜頭砲台、穹窖砲台及新成砲台：游擊梁璟夫帶粵勇 200 人駐守（圖 2、3）。

[2] 這是一種只對沿岸某種距離水域的管制，只嚴禁船舶進出被封鎖的港灣，和國際公法上對中立國的船舶在公海上執行檢查的封鎖，並不相同。

7. 蛇頭砲台及四角嶼砲圍：分別有滑膛砲 4 門及土砲洋砲 3 門（圖 4、5）。
8. 小案山砲台及測天島砲圍：分別有滑膛砲 5 門及土砲洋砲 6 門。
9. 西嶼東、西砲台：沒有安砲。
10. 媽宮港口：有兩條　鍊封鎖但是沒有水雷（圖 6）。

當時的清軍因爲沒有海軍的支援，佈署的重點全部擺在海岸砲台上，除了媽宮港口的前線防務之外，還在媽宮的左側翼構築了三道防守線。第一道是雞母塢（今五德）到豬母水（今山水）稜線，第二道是烏崁到雙頭掛（今興仁）北方稜線，第三道是大城北、拱北山到石泉稜線（葉振輝，2000：91-92）。

而法軍攻澎的艦隊則由兩艘鐵甲艦、兩艘巡洋艦、兩艘砲艇及一艘運輸艦所組成，除了孤拔的旗艦「巴雅號」（Bayard）之外，還有「提歐逢特號」（ Triomphante ）、伊士甸號」（D'Estaing）、 杜夏佛號」（Duchaffaut）、 雒伯號」（Vipere）、和「安那密號」（Annamite）等（黎烈文，1960：100）。兵力包括步兵一個大隊、砲兵一個分隊及各艦原有的海軍陸戰隊，共約 900 人（廖宗麟，2002：584），準備依照孤拔所擬訂的三套進攻計畫行事：

1. 滅西嶼東、西砲台，再進逼媽宮港。
2.擊毀媽宮港各砲台，伺機登陸佔領。
3.由圓頂半島（今澎南地區）登陸，迂迴進兵媽宮。

二、澎湖攻守大勢

（一）媽宮灣砲戰

光緒 11 年（1885）3 月 28 日，法軍各艦廷除了「維伯號」砲艇因爲氣候惡劣而拋錨之外，都在台南海面集合。下午 3 時，孤拔下達啓航令，約在傍晚時分，抵達鎖港東南的「候角」附近下椗。因爲不知道西嶼砲台是否有武裝，所以決定第二天先執行第一個計畫（黎烈文，1960：98-99）。

3 月 29 日清晨，法艦在「巴雅號」率領下，排成單列縱隊，沿著外垵「杞仔尾」岬角，通過西嶼砲台前方海域，但是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攻擊。於是在 6 時 55 分開始實施第二及第三計畫，各艦艇按照事前規劃的戰鬥位置（圖 7），各就各位（上引書：99-100）：

1. 巴雅號在距金龜頭砲台前 900 公尺的位置上，負責砲擊金龜頭一帶各砲台、小案山、測天島砲及四角嶼、蛇頭等地的砲陣地。
2. 提歐逢特號在距四角嶼砲圍 1000 公尺、蛇頭砲台 1500 公尺南方的位置。
3. 伊士甸號位在雞　嶼西南方，以便從背面攻擊四角嶼的位置。
4. 杜夏佛號住在「新城」（ 音亭一帶）西方，從背面攻擊金龜頭砲台及正

面射擊新城高地的營舍。

5. 安那密號完全在各砲台射程以外，但是可以射擊圓頂半島的陸峽和沙　，以掩　法軍登陸。

7 時許，巴雅號、提歐逢特號和杜夏佛號進入澎湖灣，一面和四角嶼及其他各地的砲台交火，一面就戰鬥位置；隨後的伊士甸號和提歐逢特號則集中火力向四角嶼發砲。結果金龜頭東北方的穹窖砲台首先被毀，到 7 時 30 分左右，守軍第一線岸砲的火力逐漸緩和；8 時左右，蛇頭、四角嶼的守軍開始撤退，小案山（今測天島）砲圍也停止發砲（黎烈文，1960：100）。

8 時 20 分，由巴雅號及杜夏佛號繼續對火力比較強的金龜頭、新城及案山三個砲台開火，杜夏佛號奉令駛近金龜頭砲台，其他的艦砲及岸砲則都停止射擊。9 時左右，延遲了 48 小時才趕到的維伯號也加入了戰局；到 9 時 30 分，雙方的砲戰大抵結束（上引書：100）。正午時分，提歐逢特號移到金龜頭前方繼續發砲徹底把砲台摧毀（圖 8）；午餐以後，其他的法艦也分別去破壞包括尚未裝砲的西嶼兩個砲台在內的清軍砲陣地及營舍（上引書：101），這時候，守軍的周善初等人抵敵不住，只好退往大城北（轉引自廖家麟，2002：588）。

（二） 圓頂半島登陸戰

同一天的 12 時 30 分，孤拔下令準備登陸行動，他認爲圓頂灣（今時裡南岸）雖然離媽公有一段距離，卻是登陸時可能付出代價比較少的地點。16 時左右，孤拔移駐杜夏佛號巡洋艦上，親自指揮登陸（上引書：100-101）。

17 時許，法軍約 400 人在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狀況下，由圓頂灣（今**嵵**裡南岸）完成了登陸[3]（圖 9、10），並且以一個中隊的兵力佔領「紗帽山」（圖 11），其他的三個中隊佔領「大山」（時裡的西南方高地），還捕獲了一名當地的俘虜。一直到入夜後，除了守軍幾次的零星射擊之外，雙方並沒有進一步的交火（上引書：101）。

3 月 30 日凌晨，法軍出動小艇去破壞封鎖媽宮港口的鐵鍊之後[4]，巴雅號立即闖入港內，對守軍的散兵壕（在新城高地）做背面攻擊，維伯號和伊士甸號則分別在媽宮灣內和雞籠嶼南方，負責支援圓頂半島的陸上作戰（上引書：101）。另外還派少數軍隊先去佔領測天島，再登陸雞母塢，以便偵查守軍的位置（轉引

[3] 根據《澎湖　志》的記載：「統領〔副將〕周善初傳箭召陳德勝回。得勝曰：強寇在前，而為戰先退，可乎？遂不奉令」（頁 366）。

[4] 3 月 29 日晚上，法軍曾派兵去偵察，確定　鍊並沒有裝置水雷。

自葉振輝，2000：96）。

圓頂半島上的法軍，本來預定在 7 時前向守軍展開攻擊。但是因爲當地的道路狹小，崎嶇難行，砲兵無法準時就位，而延遲到 8 時 15 分才在俘虜的嚮導下出發。這時候清軍的指揮官陳得勝已率部，列隊前進到井仔垵（今井垵）。法軍雖然有艦砲掩護，守軍仍然臥地還擊，有效的阻擋法軍的前鋒部隊[5]（圖 12）。後來法軍從左右兩翼發動鉗形攻勢，又獲得砲兵的支援，守軍才在 10 時許撤退，到雞母塢及豬母水稜線上重新構築防禦陣地（轉引自葉振輝，2000：96）。

11 時許維伯號移到雞母塢北方，伊士甸號移到鎖管港（今鎖港）東方，一起砲轟守軍陣地。守軍面對三面夾攻，又全無援軍支持，不得不分爲兩隊，輪流掩護，輾轉往豬母水、鎖管港（今鎖港）、鐵線尾（今鐵線）方向撤退，最後撤守大城北。法軍則一路追擊，於 16 時左右在鐵線尾北方的雙港仔丘陵紮營[6]（黎烈文，1960：102）。

3 月 31 日，法艦上的陸戰隊分別從雙頭掛及雙港仔登陸（圖 13），支援作戰（廖家麟，2002：588），於是法軍出動所有的兵力，從 8 時 30 分開始發動攻擊，先向東推進到稜線，再轉向北行到烏崁南方，並分兵肅清雙頭掛的守軍。在攻破守軍的第二道防線後，法軍又另外派遣陸戰隊和砲兵由菜園朝西北推進；守軍則只據守大城北、拱北山到石泉的稜線抵抗，也有少數守軍向北逃逸（上引書：102）。

13 時 30 分，法軍向大城北、拱北山守軍發動第二波攻擊，守軍抵擋不住，紛紛退往頂山（今白沙島），搜征民船，載勇渡臺，以避敵（林豪，1893：367）。約 14 時 30 分，法軍已開抵東衛東北方，並繼續向西推進，這時守軍則已全部潰逃。16 時 20 分，法軍進入文澳（今西文）；17 時 15 分抵達媽宮，進駐守軍拋棄的營舍，結束了澎湖之役（黎烈文，1960：102-103）。

（三） 澎湖淪陷之後

孤拔佔領媽宮之後，在 4 月 4 日派一個步兵中隊去佔領西嶼的燈塔和砲台。又派綏靖部隊，到各地去清剿守軍（破壞了港底的火葯庫）、貼佈告安定民心；同時還計畫要從基隆接運砲兵、山砲、材料及各項專業人員來澎湖，準備把媽宮建設成法軍的東洋軍港（黎烈文，1960：104-106）。

---

[5] 《澎湖廳志》則說：「敵陣亂，我軍乘勢急擊，仆其大旗，敵軍潰至海濱，我軍追奔里　；敵酋遙望我軍無後繼者，急令別隊應援。得勝分兵接戰，殺傷過當。」（頁 366）。

[6] 《澎湖廳志》說：「十五日〔3 月 31 日」天明，得勝率軍〔敢死隊」接仗〔劫敵營」，策馬衝陣者再，馬悲鳴不前，得勝忽中槍　地，昏厥親軍救之得免」（同上註）。

然而，這時候清法雙方卻已經在進行和平談判，相約先行停火，法軍就在 4 月 15 日開始解除對台灣的封鎖[7]，使得孤拔想長期佔領媽宮的計畫因此受阻。6 月 9 日，清法合約正式簽字，根據合約第九條的規定，法軍必須完全撤出台灣澎湖（轉引自葉振輝，2000：98）。同一天，孤拔突然宿疾復發[8]，而在 6 月 11 日病逝在媽宮港的巴雅號旗艦上，遺體於 6 月底運回法國安葬（上引書：116）。7 月 17 日劉銘傳派記名提督吳宏洛到澎湖負責接收，法軍在 8 月 1 日開始撤出，到 8 月 31 日完全撤離澎湖（許雪姬，1991：36），只在媽宮留下一座法國海軍紀念碑[9]（圖 14）及一座埋葬有 997 名遺體的法軍公墓[10]（圖 15）。

三、民間對澎湖之役的記憶

（一） 法軍登陸地點之辯

從地圖上來看，光緒 11 年（1885）3 月 29 日傍晚，法軍登陸的圓頂灣就位在現在的馬公市嵵裡南方（圖 16），本來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卻有部分地方人士把《澎湖廳志》中，「法酋孤拔犯媽宮港，分兵由時裡登岸」、「十三晚，夷酋分兵五、六百由時裡登岸，半紮紗帽山頂，半紮山下」的記載（林豪，1883：366），解讀爲法軍從紗帽山的海灘登陸（圖 17）然後佔領紗帽山。[11]然而根據嵵裡當地耆老的相關報導，對法軍登陸處雖然也不能確定，但是卻很有助於問題的釐清。

大致上耆老們的說法是「當天下午五、六點鐘，有三個（或兩個）王姓（或不知姓氏，其中一位名「 i^{5} ho^{7} 」的居民，可能是父子），前往紗帽山東北方海域的「三個滬」去巡滬捕魚（圖 18），當他們發現紗帽山上有法軍時，已躲藏不及，而被打死了兩個（或一個），另一個則被法軍俘虜。次日，法軍押著這個俘虜帶路，一路進兵到大城北（顏文彬，1979：49-51）。

查核嵵裡的王氏族譜的結果，則有下列的線索可供參考：「五世祖考，王公

---

[7] 1895 年 3 月 29 日，法軍在越南諒山慘敗，茹費理內閣下臺，法國新內閣於 4 月 4 日和　廷代表在巴黎談妥和平協議，主要的內容是　軍撤出越南，法軍放棄索賠（黎東方，1976：560）。

[8] 孤拔在 4 月份曾經患過嚴重的赤痢，後來一度治癒，到 6 月 9 日突然復發，而且病情非常嚴重（黎烈文，1960：116）。

[9] 光緒 16 年（1890）10 月法國戰艦，「伊康斯坦號」（Inconstant）抵達澎湖，在媽宮建立法國海軍陣亡將士的紀念碑（位在今中正國小西南角）。現場除了孤拔紀念碑之外（居中），左側是一塊法軍某中尉石碑，右側有法軍某主計官石碑。孤拔石碑下埋的只是孤拔的衣冠和遺髮，但是卻常被誤稱爲「孤拔墳墓」。民國 42 年（1953）原來的遺物及遺骸，遷葬基隆法國公墓，原址改建另一個紀念碑。

[10] 在法軍撤退時，法國公使曾照會　廷，請求對法軍公墓加以照料。民國 53 年（1964），法國與我國斷交後，公墓中的埋葬物均已移走，只留下一座俗稱爲「萬人塚」的墓碑（鄭紹裘，1997：172～173）。

[11] 澎湖縣政府所立的「法軍登陸處」石碑（1979 年）。

諱怡后，享年七十歲；生於嘉慶丙子年（1816 年）二月十五日，卒於光緒乙酉年（1885 年）二月十三日（3 月 29 日）」；六世祖（四弟）考，王公諱秋記，享壽二十七歲；生於同治年已未年（1859 ？ ）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光緒年二月十三日」（上引文：52-53）。

按同治皇帝於壬戌年（同治元年，1862 年）到甲戌年（同治 13 年，1874 年）在位，其中並沒有已未年，離同治朝最近的已未年則是咸豐 9 年（1859 年）。如果王秋記二十七歲（虛歲）過世，就的確是死於光緒 11 年（1885 年），只是被法軍俘虜的是哪一位，就無從查考了。

（二） 是役對地方的騷擾

清法澎湖之役雖然前後只有三天的戰事，但是卻對地方造成了許多前所未見的破壞和騷擾。3 月 29 日法軍登陸後，媽宮的居民紛紛倉惶北走「頂山」，面對清朝統治台灣澎湖以來的第一次戰火，人民心中的驚慌不難想見。《澎湖廳志》（林豪，1883：383）則說，難民「皆口呼城隍神保佑。時夷砲沿途雨下，顆顆墜地即止，無一炸裂傷人者，亦足異也」。法軍撤退後，澎湖廳通判程邦基曾據此上奏朝廷，獲得朝廷下旨加封媽宮的城隍爲「靈應候」（圖 19），並御賜城隍廟「功存捍衛」匾額一塊（圖 20）。

地方上也有觀音菩薩在砲戰中顯靈的傳說，法軍撤退後，原來守衛新城附近高地的指揮官劉燦瑩，曾獻給觀音亭一副木質對聯，以感謝神恩（圖 21、22）。上聯是「寶珞耀雲端萬朵祥光震旦曇花隨法現」；下聯是「慈航橫海表幾聲梵響乾陀魚鼓逐潮來」。目前這副對聯仍然懸掛在觀音亭大殿入口的門柱上[12]

媽宮街則在混亂中遭到亂軍很大的破壞。3 月 30 日，曾有廣勇和臺州勇，趁夜大掠媽宮市街，造成商街盡成灰燼（上引書：367）。根據《申報》的報導，當時的情況則是「至十三日，潮勇忽潰，紛紛四出搶劫殺人，縱火燒屋，種種不法，直與狂寇相同。……法遂乘勢登岸，港內船只多被敗兵奪去，亦有由商民雇用者，紛紛擾擾，奔避不遑」（第 26 冊，影印本，第 541 頁）。

媽宮的廟宇在戰火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比較廣爲流傳的說法有，天后宮的「與天同功」九龍匾（圖 23）爲法軍所掠（莊東，1978：37）。觀音亭被法軍所毀，廟內兩尊觀音佛像及古鐘等文物被掠奪，十八尊羅漢神像也被劫走，後來才由民眾合力索回（上引書：20）。

[12] 該聯主文旁還有附記如下：「乙酉花朝法事犯順〔？〕，余率師扼溝力禦，宵深忽見廟畔霰光照耀，若內典所傳珠瓔寶珞者。用是於砲彈煙雨之中血戰兩晝夜，幸免傷痍。書於榜楹以誌　貶〔？〕」。聯腳署名爲「東官劉燦瑩謹獻並記」。

西嶼則因爲法軍之後佔領澎湖，而造成了一個意外的影響。據西嶼鄉耆老的說法，法軍佔領媽宮之後，在 4 月 4 日派兵從竹灣登陸西嶼，居民紛紛離家走避，等到局面平靜時，已經過了清明節。於是大家只好決定在「三月節」 農曆三月三日）再去祭掃先人的墳塋，[13]因而改變了西嶼鄉竹灣和小門兩村的掃墓習俗迄今（呂順安主編，1994：244）。

四、結　語

1885 年清法澎湖之役時，清廷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不但沒有準備海軍來對付跨海而來的外敵，西嶼有砲臺卻沒有安砲駐兵，其他的砲臺掩體則都不足以抵禦艦砲；甚至還爲了防止指揮官勢力坐大，而故意派出拼湊的軍隊，來防禦澎湖。因此，即使有將近四倍於敵的兵力，也是不到三天就得將澎湖拱手讓敵。

當時由各不同籍貫的募勇臨時組成的澎湖守軍，不但號令難行，軍心不和，而且士驕將怯，無心衛國。除了四角嶼砲圍的水勇（可能是澎湖籍）及陳得勝所部的臺灣勇之外，其他各營莫不長於內鬥，畏於外侮。尤其是廣勇及臺州勇更是形如盜寇，大敵當前都還只顧燒掠，自相殘殺，甚至還同袍鬩牆，見死不救。所以，澎湖的失陷，雖然不能說是歷史的必然，卻是其來有自，那裡是歷史的偶然呢！

[13] 傳統上，泉州人在　明節掃墓，漳州人在三月節上墳。竹灣和小門都是泉州移民所形成的聚落，可是卻在三月節才掃墓。

圖 1．澎湖之役　軍主要防守兵力佈置圖

圖 2．澎湖之役「金龜頭砲臺」地勢現況

圖 3．澎湖之役「新城砲臺」地勢現況

圖 4．澎湖之役「蛇頭砲臺」地勢現況

圖 5．澎湖之役「四角嶼砲圍」地勢現況

圖 6．媽宮港封港鐵鍊殘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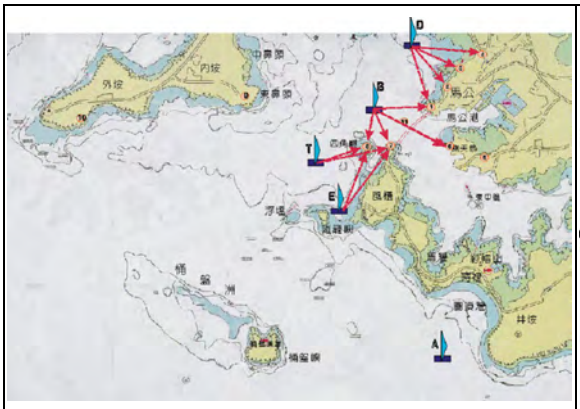


圖 7．澎湖之役法軍艦艇戰鬥位置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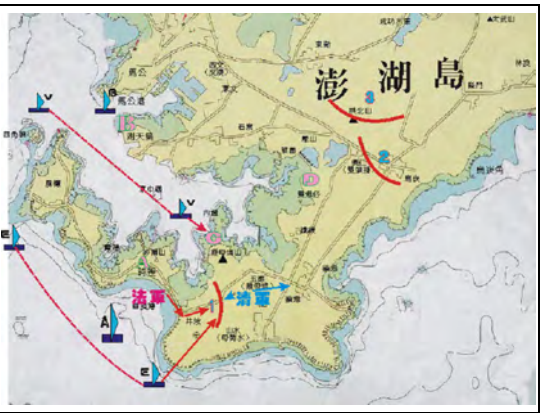


圖 8．澎湖之役法軍進攻路線示意圖（一）

圖 9．法軍登陸的圓頂灣地勢現況（一）

圖 10．法軍登陸的圓頂灣地勢現況（二）

圖 11．法軍登陸後的前哨據點—紗帽山地勢現況

圖 12．　法双方第一次遭遇戰—井仔　地勢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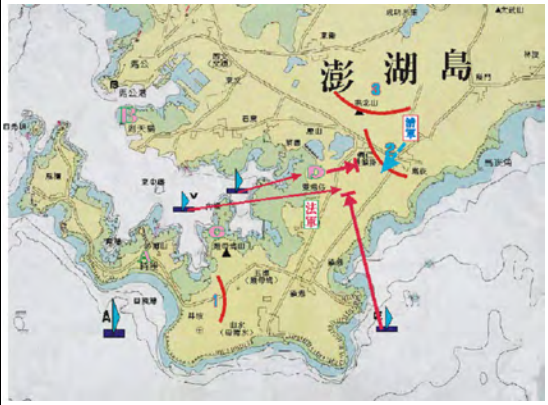


圖 13．澎湖之役法軍進攻路線示意圖（二）

圖 14．孤拔紀念碑現況

圖 15．風櫃尾法軍公墓舊貌

圖 16．圓頂半島形形圖

圖 17．澎湖縣政府所立的「法軍登陸處」石碑

圖 18．紗帽山下的「三個滬」位置示意圖

<table>
<tr><td>
</td><td>
</td></tr>
<tr><td>圖 19．媽宮城隍廟的「聖旨」 廟名）牌</td><td>圖 20．媽宮城隍廟的「功存捍衛」匾</td></tr>
<tr><td> </td><td> </td></tr>
<tr><td>圖 21．觀音亭的木質聯對（左）</td><td>圖 22．觀音亭的木質聯對（右）</td></tr>
<tr><td>
</td><td></td></tr>
<tr><td>圖 23．澎湖天后宮的「與天同功」九龍匾</td><td></td></tr>
</table>

參考書目：

井田　鹿

1969，《澎湖風土記》，東京：編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62，《中法越南交涉檔》，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5，《申報》（影印本，，第 26 冊），上海。

呂順安編

1994 《澎湖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叢書（四）》南投：台灣文獻委員會。

林豪

1883，《澎湖廳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第 164 期），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許雪姬

1991，《澎湖縣志・雜志》（卷 15），澎湖：澎湖縣政府。

莊東

1978，《澎湖縣志・文化志》（卷 13），澎湖：澎湖縣政府。

葉振輝

2000 年，< 中法戰爭澎湖之役>《澎湖文獻鄉土史料蒐集及研究報告書》澎湖：澎湖縣文化局（未出版）。

廖宗

2002，《中法戰爭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黎烈文　，格榮特「E.garnot」著

1960，《法軍侵臺始末》（臺灣研究叢刊，第 16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黎東方

1976，《細說澎湖》（下），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

鄭紹裘

1997，《懷古述舊話澎湖》，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顏文彬

1995，〈法軍登陸時裡訪談考〉《老古》（第一期），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清法戰爭前後的北臺灣（1875~1895）
—以 1892 年基隆　、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

許 毓 良**

一、前　言

清代的臺灣地圖種類繁多，依照繪製主題的不同，可以分爲九類—全圖、主題全圖、分府地圖、分縣地圖、分縣主題地圖、城池圖、堡里地圖、街庄地圖、堡里庄界圖。[1]以北臺灣爲例，現今所公開的清代地圖中，最早可溯及的年代有二幅。一是康熙三年(永曆十八年/1664)，以滿、漢文繪製的臺灣軍備圖。不過該圖著重的是部署在南部，由鄭經指揮的各鎮兵馬。它對於北臺灣的描述，僅繪出淡水一城而已。另一是約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繪製的臺灣輿圖。該圖除了是清領之後第一張地圖外，對於北臺灣山川、規制的繪製頗爲詳細。[2]至於清代北臺灣所繪製的最後一張地圖　，以臺灣所見資料皆認爲是光緒十四　～十七年(1888~1891)，所繪製的臺北府基隆廳與淡水縣圖。[3]不過如此的年代記錄，還可以再往下修正，原因是筆者在中國大陸發現到，光緒十八年(1892)所繪製的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見附圖一)。

該圖典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長寬爲 39.2╳29cm，屬清光緒年間繪本的分縣地圖。由於原製圖者沒有題上名稱，因此典藏單位定名爲“淡水縣輿圖”。但是詳閱後發現基隆廳也繪入其中，故重新命名爲“基隆廳、淡水縣輿圖”，應爲較佳的稱呼。有趣的是該圖也沒有標示繪製的年代。爲何筆者會認定是光緒十八年(1892)所繪呢？根據考證有五點理由：其一，光緒十四年(1888)淡水縣芝蘭保始分出一、二、三保，所以這張地圖的上限應從此年算起。[4]其二，地圖上所繪基隆保的新砲臺，應是現存的基隆頂石閣砲臺。考該砲臺動工於光緒十二年(1886)，竣工於光緒十七年(1891)，遂成爲該圖時間下限的參考。[5]其三，臺灣巡撫衙門是在光緒十七年(1891)開始興建，該圖在臺北府內還畫出行臺，可見得該

* 本文發表時獲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系所副教授楊仁江、佛光大學歷史系所副教授卓克華指正，謹此致謝。

**作者現爲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1 夏黎明，《清代台灣地圖演變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10~15。

2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年 10 月)，頁 5~6。

3 同上註，頁 30；佚 名，《臺灣地輿全圖》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 185 種，1963 年 11 月，頁 8~14。

4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四版)，頁 183。

5 劉敏耀，《基隆砲臺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 年 8 月)，頁 48。

圖繪製的時間，最早也在光緒十七年(1891)。[6]其四，臺灣巡撫衙門未建好之前，則是借用淡水縣署辦公。淡水縣署舊在考棚後面。光緒十九年(1893)才遷至北門放生池，舊址則改建成明道書院 。此圖既然畫出行臺 ，則表示當在光緒十九年(1893)之前。其五，綜合前述的說法，方知此圖繪製的年代應在光緒十七或十八年，但究竟爲何年？其關鍵就是在“行臺”設立的時間。根據《臺北市發展史》的記錄，光緒十八年(1892)始在臺北府城內的西門街興建行臺。舊址就是今天的臺北市中山堂。[7]因此該圖是在光緒十八年(1892)繪製當無疑問。[8]

由於此圖是清末最後一張北臺灣的地圖 ，所以史料的參考價值極高。尤其在跟光緒年間其他的北臺灣地圖相較之後，可以充分反映出區域的歷史變遷。而所比較的對象有二：一是在光緒五年(1879)由臺灣道夏獻綸命令余寵繪製的《臺灣輿圖》(或名全臺輿圖/見附圖二)。另一是光緒十四~十七年(1888~1891)繪製的《臺灣地輿總圖》(見附圖三)。

二、1892 年基、淡輿圖與光緒朝二幅北臺灣地圖的比較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874.5.7)日軍爲達“懲番”目的，逕自派兵登陸臺灣琅嶠，發動所謂的牡丹社事件。同年五月四日(6.17)清廷特命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偕同福建布政使潘霨抵達臺灣，負責與日軍辦理交涉事宜。在這期間沈氏有感於臺灣舊有一府四縣三廳的行政區劃，不足以應付時局。遂於九月完事之後，於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1875.7.20)上奏，建議在北臺灣添設一府三縣以馭地方。[9]此奏獲得朝廷善意的回應，同年十二月二十日(1876.1.16)下旨准設臺北府，並設分府於基隆。同時析分淡水廳爲淡水、新竹二縣，改噶瑪蘭廳爲宜蘭縣。這使得北臺灣，在一步入光緒朝，就因行政改制而有一番新氣象。如此的安排大體固定，即便在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除了再從新竹縣析分出苗栗縣外，其餘的地方都沒有再更動過。

光緒十八年(1892)的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見附圖一)，就是一張在臺灣建省後繪製的地圖。依照標示可以細分爲十五大類。內容如下：

基隆廳、淡水縣輿圖標示名稱分類(括弧爲附表的編號)

山脈

[6] 黃淑清， 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年 4 月)，頁 46。

[7] 陳三井等， 臺北市發展史(一)》(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 年 10 月)，頁 838。

[8] 何謂行臺？即指大員臨時辦公之所。楊仁江教授認爲，圖上行臺標示在近東門處，不是近西門處。因此本文以西門街興建行臺的時間，做爲該圖時間的參考依據尚需斟酌。誠然楊老師的意見，給予作者進一步的思考。但仍堅持己見的原因有二：其一、經過本文第一至第四點的考證，已說明該圖當在光緒十七、八年繪製。其二、 臺北市發展史》記載行臺建立的時間是在光緒十八年。雖然它指出的位置與地圖不吻合，但對照前文來看，年代的段限基本上還是可信。

[9] 沈葆楨， 《福建臺灣奏摺》 ,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九種，1959 年 2 月，頁 55~58。

番山(No.98)　番山(No.104)　番山(No.105)　番山(No.124)　番山(No.125)
鳶山(No.106)　獅球嶺(No.22)　沙帽山(No.90)　大屯山(No.86)　獅頭山(No.112)
龜崙嶺(No.149)

島嶼

社蓁(No.15)　鱟穴(No.16)　鱟穴(No.17)　桶盤嶼(No.18)　基隆杙(No.19)
扛轎嶼(No.20)

港口

基隆港(No.21)　馬鍊港(No.54)　野柳港(No.55)　八連港(No.56)　磺港(No.91)
滬尾港(No.92)　八里坌口(No.113)　假港(No.114)　南崁港(No.126)
八尺門(No.14)

堡名

三貂保(No.48~53)　擺接保(No.98~103)　擺接保(No.98~103)
拳山保(No.63~75)　海山保(No.104~108)　石碇保(No.38~47)
大加蚋保(No.76~85)　金包里保(No.54~62)　基隆保(No.14~37)
桃澗保(No.124~148)　芝蘭一保(No.86~88)　芝蘭二保(No.89)
芝蘭三保(No.91~97)　興直保(No.109~111　八里坌保(No.112~123)

砲臺

(大勝元)新砲臺(No.25)　(基隆小)砲臺(No.27)　(仙人洞)砲臺(No.26)
(油車口)砲臺(No.94)　(地營)炮臺(No.115)　(觀音山)砲台(No.117)
(剜仔尾)砲臺(No.118)

汛塘

(粢光蓁)汛(No.28)　(大基隆)汛(No.29)　(金包里)汛(No.57)　(石門)汛(No.58)
(砲台)汛(No.95)　(八里坌)汛(No.119)　(海山口)汛(No.109)　(埤角庄)汛(No.127)
(桃園街)汛(No.128)

隘名

萬安蓁隘(No.67)　暗坑仔隘(No.68)　大坪隘(No.129)

臺北府城內建置

北門承恩(No.1)　東門景福(No.2)　西門寶城(No.3)　大南門麗正(No.4)
小南門重熙(No.5)　明倫堂(No.6)　文廟(No.7)　老師衙(No.8)
考棚(No.9)　(臺北府)府署(No.10) (淡水縣)縣署(No.11)　城隍廟(No.12)

[10] 洪安全主編，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六)》(臺北：故宮博物院，1997 年 10 月)，頁 4827~4829。

(巡撫)行臺(No.13)

官署

(基隆)海防廳(No.23)　(基隆)煤局(No.24)　(滬尾)海關(No.96)
(艋舺營)叅府署(No.76)　(地營)營房(No.116)

一般地名

遠望坑(No.49)　頂双溪(No.50)　苧仔潭(No.51)　桀光蓁(No.52)
三貂嶺(No.53)　坪林尾(No.69)　十分蓁(No.38)　鳳山庄(No.70)
冷水坑(No.99)　城福庄(No.100)　十三天(No.107)　烏塗堀(No.130)
高山頂(No.131)　七佃庄(No.132)　高山下(No.133)　八股庄(No.134)
龍潭埤(No.39)　內仔港(No.40)　暖暖庄(No.41)　二重埔(No.71)
直潭(No.72)　新店街(No.73)　公館(No.74)　梘尾街(No.75)
枋蓁街(No.102)　媽祖田(No.101)　三角湧(No.108)　大姑崁(No.135)
柑仔瀨(No.42)　八堵(No.43)　七堵(No.44)　六堵(No.45)
五堵(No.46)　錫口(No.79)　三板橋(No.80)　枋橋頭(No.103)
水返腳(No.47)　南港仔(No.81)　八斗仔(No.30)　哨船頭(No.31)
基隆街(No.32)　大勝元(No.33)　二勝元(No.34)　三勝元(No.35)
大武崙(No.36)　仙洞(No.37)　大直庄(No.88)　有蚋庄(No.59)
馬鍊庄(No.60)　金包里(No.61)　石門(No.62)　小圭隆(No.97)
劍潭(No.87)　河上洲(No.89)　油車口(No.120)　大庄(No.121)
坪頂(No.122)　大隆洞(No.83)　大稻埕(No.84)　艋舺街(No.85)
新庄街(No.110)　海山頭(No.111)　八甲(No.82)　桃園街(No.136)
埤角庄(No.137)　中壢街(No.138)　楊梅壢(No.139)　南崁街(No.140)
小南灣(No.141)　大南灣(No.142)　頭湖庄(No.143)　大竹圍(No.144)
白沙澳(No.145)　塗牛溝(No.146)　四股庄(No.147)　大溪墘(No.148)
官渡(No.93)

寺廟

龜山寺(No.123)

書院

(小南門外)書院(No.77)

倉貯

(小南門外)義倉(No.78)

縣界

淡竹交界　淡蘭交界

四至
東　西　南　北

不過觀其內容，再跟光緒五年(1879)《臺灣輿圖》，以及光緒十四~十七年(1888~1891)的《臺灣地輿總圖》比較，就會發現這張光緒十八年的地圖，存有不少錯誤需要被修正。第一是八連(漣)港的位置。光緒五、十四~十七、十八年的三張圖(見圖一、圖二、圖三)，分別出現二個不同位置的八連(漣)港。前二者所繪的八漣港，指的是今臺北縣汐止市的八連里。後者標示的八連港，指的是大屯山西北側八連溪的出海口。[11]然而這條溪的出海口，應位於小圭隆(臺北縣三芝鄉)，而非金包里(臺北縣金山鄉/見附表・編號 56)。第二是磺港的位置。光緒五、十八年的二張圖(見圖二、圖一)，都不約而同地把磺港畫在小圭隆(臺北縣三芝鄉)的位置。但考其真正的地點應在金包里(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見附表・編號 91)。第三是假港的位置。光緒五、十四~十七年的二張圖(見圖二、圖三)，均把假港畫在跳石(臺北縣金山鄉)與沙崙(臺北縣淡水鎮沙崙里)的中間。唯獨光緒十八年的輿圖把假港畫在八里坌口(臺北縣八里鄉/見圖一與附表・編號 114)，可見得是後者繪製錯誤。第四是油車口的位置。光緒五、十八年的二張圖(見圖一、圖二)，分別把油車口畫在淡水河口的南、北兩岸。然考其正確位置是在淡水河的北岸，所以光緒十八年的輿圖又畫錯(見附表・編號 120)。第五、六是小南灣與大南灣的位置。這二處地名只有在光緒十八年的輿圖出現。但是細查下發現正確的地點應在南崁港以北，而非以南(見附表・編號 141、142)。第七是白沙澳的位置。根據光緒五、十四~十七年地圖所繪，應是在今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靠海的位置。但光緒十八年的輿圖竟畫在內陸，亦屬有誤(見附表・編號 145)。第八是大溪墘的位置。光緒五年的地圖明確把芝巴里、大溪墘、草漯畫在一起(見圖二)。可見得大溪墘應在今桃園縣大園鄉保障村的位置，不是光緒十八年地圖所繪疑似社子溪的出海口(見附表・編號 148)。

校對是史料使用的先行工作。雖然光緒十八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被找到八個錯誤，但仍無損於它的價值。因爲透過與另外二張地圖的比較，北臺灣區域變遷仍可以被凸顯。不過所謂的變遷，本文指的是人文發展。至於屬於自然地理的部分，例如：山、嶺、崙、崎、溪，並不在討論的範圍。在此前題下，則有三項重點值得注意：第一，三張地圖均有標示出的地名。這表示從光緒五~十八年(1879~1892)期間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它們包括：屬於基隆港地區的基隆港、八尺門、社寮、八斗仔、三勝元(三沙灣)、基隆海防廳(分府)、基隆煤局。屬於基隆河流域的八堵、七堵、六堵、五堵、劍潭、錫口。屬於淡水河流域的滬尾港、八里坌(口)、坪頂、大隆洞、大稻埕、艋舺街、新庄街、大姑崁、臺北府城、滬

[11] 陳正祥，《臺灣地名辭典》(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1 年 11 月二版二刷)，頁 11。

尾海關。屬於新店溪流域的擺接(保)、石碇(保)、直潭、梘尾街、枋藔街、枋橋頭(街)、坪林尾、新店街。屬於北海岸與丘陵區的金包里、遠望坑、龍潭埤(堵)。屬於桃園地區的桃園街、中壢街、南崁街、白沙漥(墩)、塗(土)牛溝 (見附表・編號 1~13、14、15、21、23、24、30、35、38~47、49、61、69、72、73、75、79、83、84、85、87、92、96、98~102~103、110、113、122、135、136、138、140、145、146)。

第二，光緒五、十四~十七年地圖均有標示出，但到了光緒十八年卻未被標示的地名。這表示在地圖繪製者眼中，重要性不若以往。它們包括：屬於基隆河流域的大加蚋(臺北市大安區)、峰仔峙(臺北縣汐止市仁德里)、馬陵庄(基隆市七堵區瑪南里)、麻少翁屯(臺北市士林區社永平里)、武勝屯(臺北縣板橋市)。屬於淡水河流域的社后(臺北縣板橋市社後里)、頭前庄(臺北縣新莊市頭前里)、搭藔坑(臺北縣龜山鄉樂善村)、關渡(臺北市北投區)、滬尾守備署、滬尾領事、滬尾稅司署。屬於新店溪流域的粗坑(臺北縣坪林鄉闊瀨村)、四城(臺北縣新店市)、三張犁(臺北市松山區三張里)、古亭村(臺北市大安區古風里)。屬於北海岸與丘陵地區的粗坑(臺北縣平溪鄉南山村)、煙仔藔(臺北縣瑞芳鎮海濱里)、老梅鄉(臺北縣石門鄉老梅村)、磺局。屬於桃園地區的南興庄(桃園縣八德市南興里)、霄裡庄(桃園縣八德市竹園里)、大竹圍(桃園縣大園鄉竹圍村)、水汴頭(桃園縣蘆竹鄉蘆竹村)、蘆竹湳(桃園縣大園鄉大竹村)。

第三，光緒五、十四~十七年的地圖未標示出，但到了光緒十八年卻被標示的地名。這表示在地圖繪製者眼中，逐漸顯得重要。它們包括：屬於基隆港地區的哨船頭、大勝元、二勝元、仙洞。屬於基隆河流域的內仔港、暖暖庄、南港仔。屬於淡水河流域的大庄、八甲、海山頭、城福庄、三角湧、十三天、烏塗堀、艋舺營叅府署、龜山寺、小南門書院、小南門外義倉。屬於新店溪流域的鳳山庄、二重埔。屬於北海岸地區的馬鍊庄、石門、小圭隆、頂双溪、十分藔、柑仔瀨。屬於桃園地區的高山頂、高山下、七佃庄、八股庄、埤角庄、楊梅壢、頭湖庄、四股庄(見附表・編號 31、37、38、40、41、42、50、60、62、70、71、76、77、78、81、82、97、100、107、108、111、121、123、130、131、132、133、134、137、139、143)。

從上述的分類來看，當時在北臺灣被視爲最重要的地區，應是基隆港地區。因爲在三張地圖上面，它長期被標示的地名最多，而且新標示的地名也最多。其次重要的是淡水河流域。該地區長期被標示的地名也不少，但不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輿圖的地名亦有。再次重要的應是桃園地區。該地區長期被標示的地名數目，跟不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輿圖的地名數目相同。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緒十八年被新標示的地名，竟達八個之多。可見得在製圖者眼中，它是一處發展迎頭趕上之區。

新店溪流域與北海岸、丘陵區的重要性，似乎處在伯仲之間。雖然前者長期被標示的地名不少，但從光緒十八年輿圖僅被標示二個新地名來看，它的重要性有點下滑。相反地在後者，它在地圖上被長期標示的地名不多，但光緒十八年被標示的新地名竟達六個之多。可見得它在製圖者眼中是一新興地區。至於最不重要的地區應屬基隆河流域。因爲它不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輿圖的地名頗多，並且在新標示的地名數目上，僅出現三個而已。

地區的發達與否，跟交通路線的走向有密切的關係。北臺灣以淡水河爲主幹，與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連結，形成一個水路網路。雖然靠著河運，讓臺北盆地近水之處，往來甚爲方便。但它卻不是官方以交通控制地方的首選。事實上官方所倚重的是陸路。因爲透過陸路，它才能與中、南部的道路做連結。也因爲如此，所謂的“官道”很早就形成。雍正十年(1732)，清廷平定彰化縣熟番舉事後，即把淡水廳治從沙轆(臺中縣沙鹿鎮)遷移到竹塹(新竹市)。並開闢通往芝葩里的道路，連結舊有的“龜崙嶺道”、“內港道”、“外港道”。[12]這三條道路中，以穿越今桃園縣龜山鄉的龜崙嶺道最爲重要。尤其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里坌巡檢，改制成縣丞移駐新庄(臺北縣新莊市)之後。

該道路沿途所經地方，可透過道光元年(1821)署噶瑪蘭廳通判姚瑩的記錄來了解。大抵從竹塹北行三里抵達金門厝(新竹市北區)，北渡頭前溪抵十里外的鳳山崎(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再行十里抵達大湖口(湖口鄉湖口村)。再行十里爲枋埤(崩坡/桃園縣楊梅鎮東流里)。再行十里爲楊梅壢(楊梅鎮楊梅里)。再行五里爲頭重溪(楊梅鎮梅溪里)。再行十里爲中壢街(桃園縣中壢市中壢里)。再行十里爲內嵌腳(內壢與崁子腳/中壢市忠孝里・桃園市龍山里)。再十里行抵桃園(桃園市文昌里)。再十里行抵龜崙頂(桃園縣龜山鄉嶺頂村)。再五里行抵大邱園。再八里行抵龜崙腳(嶺腳/龜山鄉龍壽村)。再七里行抵新莊(臺北縣新莊市)。再行五里，當中還需渡淡水河才能抵達艋舺(臺北市萬華區)。如果要到八里坌口，可從艋舺搭船行約二十里可至。如果要去雞籠則往東北行，十里先抵錫口(臺北市松山區)。再五里抵達南港(臺北市南港區)。再十里抵達水返腳(臺北縣汐止市)。再十五里可見到“一堵山”(五堵南山)，再北過五堵、七堵、八堵，凡十里抵達暖暖。

之後姚瑩的記載即往宜蘭的方向前進。從暖暖行至三里至碇內(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往東行二里至楓仔瀨(臺北縣瑞芳鎮吉慶里)。再三里抵鯽魚坑(瑞芳鎮)。再四里至三貂仔。再四里至茶仔潭。再三里至三貂嶺。再八里至牡丹坑(臺

[12] 陳世榮，〈清代北桃園的開發與地方社會建構 1683~189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頁 96、99、174；黃智偉，〈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頁 65~81。

北縣雙溪鄉牡丹村)。再六里至粗坑口。再六里至頂雙溪。若再走就要進入噶瑪蘭廳界。[13]雖然姚氏沒有記載如何前往雞籠(基隆市)，但只要從暖暖繼續北行，翻越獅球嶺方可抵達。

以上就是臺北未設府以前，以淡水廳治竹塹爲起點，往北的陸路交通情形。不過當臺北府設立以後，北臺灣陸路的中心點有極大的改變，即從竹塹轉移到臺北。光緒十八年(1892)的基隆廳、淡水縣輿圖，即詳細記錄以臺北府城爲中心，向外連結各地的道路。其引文如下：

> 自本城向西至新　十里，至龜崙嶺二十五里，至桃仔園三十五里，至崁仔腳四十五里，至中　街五十五里，至塗牛溝與新竹交界，計程六十五里。自本城至桃園街為尖站，至中　街為宿站。至塗牛溝、淡竹交界，其過溪河四條，惟艋　港設有渡船可達；其餘各溪晴　均可徒涉，設橋樑者有之。
>
> 自本城向南畔，至番山三、四十里不等；內皆係生番、樹林，民居　少。至桃園一帶水田參半，未　荒埔常多，其民居不少。
>
> 自本城出東門至錫口一十二里，至南港仔二十里，至水返腳三十里，至基隆五十五里，至龍潭堵七十五里，至頂　溪一百零五里，至遠望坑、淡　交界，計程一百二十里。向東至遠望坑共過溪河六條，錫口、　口、苧仔潭、頂　溪，常年有水，故設渡船。其餘各溪，水勢緩淺，均可徒涉。至水返腳為尖站，至基隆為宿站；至龍潭堵為尖站，至頂　溪為宿站。
>
> 滬尾港口一線，大船雖可出入，必須乘潮遙立望燈小舟帶引，方可無淺涸之患。惟基隆一口坐南向北，礁砂　眾。其海水甚深，無論大小商船以及輪船，出入較易。故設塘汛、口書、澳甲，隨時稽查。其餘各口沙汕　　，口門又淺，商船不能停歇淡水。惟三貂嶺、龜崙嶺為峻險之嶺，滬尾、基隆兩口為緊要之區。均常載于圖內，理合註說登明。[14]

根據上述道光元年(1821)與光緒十八年(1892)，其里程計算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是分段計算，而後者是以臺北府爲起點一次計算。這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誤差。並且該誤差還會因南、北走向不同而有別。在往南方面，光緒十八年所計者，臺北府城至新庄爲十里。道光元年所計者僅到艋舺，還沒有臺北府城。不過這卻給予艋舺到府城約爲五里的線索。然這多出來的五里，竟成爲二個年代里程計算的誤差。因此光緒十八年所計者，臺北府城至龜崙嶺爲二十五里。這對比道光元年所計者約爲三十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臺北府城至桃仔園，或者臺北府

[13] 姚　瑩，《東槎紀略》，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七種，1957 年 11 月，頁 90~91。
[14] 佚　名，《淡水縣輿圖》，色繪，清光緒年間繪製，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城至崁仔腳，或者臺北府城至中壢街。簡言之，就是道光元年的路程計算，均比光緒十八年還多出五里。

但在往北方面，卻恰好相反。光緒十八年所計者，臺北府城至錫口爲一十二里。這對比道光元年艋舺到府城約爲五里，府城至錫口約爲五里的距離，竟相差有七里之遙。該情形也發生在臺北府城至南港仔，或者臺北府城至水返腳，或者臺北府城至頂雙溪。大抵而言道光元年的路程計算，均比光緒十八年還要縮短十餘里。不過光緒十八年的地圖，出現往基隆的里程數字。並且還描述該港港灣形勢，並以設立塘汛、口書、澳甲隨時稽查來凸顯其地位。證實了基隆越到清末越顯得重要的說法。

有趣的是引文對桃園地區的描述，稱其水田參半，未闢荒埔還很多。最重要的是記載民居不少，可見得前文以發展迎頭趕上之區來形容應不爲過。另外對於新店溪流域(景美溪)的描述，它以本城南畔至番山三、四十里不等帶過。並稱該地多生番、樹林，所以民居略少。隱約也透露出該地區發展，受到限制的事實。至於受到什麼限制？將會在第四節開山撫番戰爭中一併交待。

三、從地圖來看 1885 年清法戰爭結束前的北臺灣

光緒十年七月六日(1884.8.23)清廷下詔對法國宣戰，使得之前清、法在北越與臺灣的軍事衝突更加白熱化。該戰事持續約十個月之久。直到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6.9)雙方在天津簽訂和約，才結束這場戰爭。[15]該戰爭是清末對外戰爭中，少見“平分秋色”的一役。而說它平分秋色，其實只是表明彼此在勝負未決的情況下，即以簽訂條約收場。雖然時論認爲，清廷有戰勝法國的機會；但這充其量只是代表，它在戰術上享有局部的優勢。不足以說明在外交、戰略上均陷入困境。[16]

以臺灣戰場來說，發生在基隆與淡水的二大戰役，不僅充滿戲劇性，更讓戰局有驚濤駭浪之感。不過要提醒的是臺灣守軍，能有辦法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法軍周旋許久，並非毫無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北臺灣行政地位的提升，使得清廷對此地的控制力稍勝以往。尤其在官紳的對應上，因爲築城、建署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剛好可以被用來當作日後勸餉、募勇的管道。而這整個歷史發展，可以從光緒元年底(1876.1)臺北設府談起。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廳、淡水縣輿圖適時提供出一些線索。

---

[1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法軍侵臺檔》 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九二種，1964 年 3 月，頁 23、35。

[16]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 劍橋中國史第十一冊：晚清篇 1800-1911(下)》(臺北：南天書局，1987 年 9 月)，頁 273~275。

該圖對於臺北府城建置有細部的繪製，其中把城垣與五座城樓的名字標示出爲一大特點(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1~5)。不過在草創之時，臺北府城地址的決定有一番爭議。欽差大臣沈葆楨最早所提的議案，即是建城垣於艋舺。但遲至光緒三年元月(1877.3)以前，城工仍沒有開始。此時來臺巡閱的福建巡撫丁日昌 ，眼見預定設郡之地，一片平田毫無憑藉。遂與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文煜上奏，認爲基隆的礦務一開勢必商業大興，可以取代艋舺做爲臺北府城的新址。該議看似準備要進行。因爲丁日昌奏明已卸任淡水廳同知 、現署臺北府知府候補同知向燾，已被派往基隆會籌防務。[17]不過上諭毫無回應，表示朝廷並沒有准行。同年五月已陞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與文煜、丁日昌聯明上奏，共同推舉現任江蘇省海州直隸州知州林達泉，讓他實授臺北知府陞調該職。[18]

光緒三年底(1878.1)林達泉上任後即展開臺北府城工的籌建。在地方士紳林維源、潘盛清、王廷理、王玉華、葉逢春、李清琳、陳鴻儀、陳霞林、潘慶清、王天錫、廖春魁、白其祥、林夢岩、陳受益等的幫助下，共募得白銀二十餘萬兩。遂在八年正月興工(1882.2)，至光緒十年十一月(1884.12)竣工。當時築城所用石材，爲大直山北勢湖(臺北市內湖區成功里)的山石。門樓所用磚瓦，爲北勢湖莊與擺接保枋寮莊(臺北縣中和市)所煉製。石灰爲大稻埕河溝頭(臺北市大同區)所供應。並修築東畔城牆長 412 丈，西畔城牆長 412 丈，南畔城牆長 343 丈，北畔城牆長 340 丈，四周合計長 1,506 丈，約五千公尺。[19]

林達泉不愧爲一幹才。光緒三年(1877)閩浙總都何璟給他的考語是：“氣識宏遠，才守兼長。論臺北事宜言切實，不好高騖遠，措施當有條理。”[20]可惜他來臺一年就病逝，得年 49 歲，沈葆楨還以他的勞績奏請國史館入循吏傳。[21]至於第二任臺北知府繼任的人選 ，則題補最後一任淡水廳同知陳星聚 。光緒四年(1878)陳星聚已 62 歲，但還幹勁十足。同年何璟給他的考語是：“篤實明穩，人亦正派，紳民愛戴，不愧循吏。”[22]事實上陳氏自同治十二年(1873)任淡水廳同知開始，則長期在北臺灣仕宦。[23]雖然光緒元年(1875)該廳被裁撤，但在文煜的保薦下，仍留在竹塹(新竹市)當差，並在臺北知府人選未確定時照舊任事。[24]在這段時間，他所處理最棘手的事情就是教案；即光緒二年三重埔(臺北縣三重市)教案、和尚洲(臺北縣蘆洲市)李氏父子恃教傷差案 。前者是長老教會牧師馬偕

[17]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 年 10 月)，頁 2480~2483。
[18]《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 ，頁 2679~2681。
[19] 陳三井等， 臺北市發展史(一)》(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 年 10 月)，頁 70~72；尹章義， 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 年 10 月三刷)，頁 418~419。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二輯內政)》(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2 月)，頁 514~515。
[21] 蔣師轍， 臺灣通志》 ，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三〇種，1962 年 5 月，頁 492。
[22]《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二輯內政)》 ，頁 783~785。
[23] 諸 家， 新竹縣志稿》 ，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六一種，1959 年 11 月，頁 139。
[24]《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 ，頁 2481。

(George Leslie Mackay)，以所屬教堂遭鄉民破壞，向滬尾副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Erater)投訴。幸好在陳星聚親自前往查明案情後，不致小事化大而圓滿結案。[25]後者是李東面、李先登父子，自恃信奉天主教並號稱“教首”滋擾鄉里。地方文武早已注意他們多年，同年五月陳星聚在艋舺倉署斷案時，不料二人竟持械前往鬧堂，遂被陳氏喝令拏下就地正法。[26]

該輿圖除了繪出四面城垣外，城內的衙署部分也標示出。這一段時期出現的公衙爲淡水縣署、臺北府署、考棚(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9~11)。淡水縣署建於光緒五年(1879)，屬草房建築並於隔年竣工，然建造者不明。[27]照理淡水設縣以後，知縣應該立即上任。但細查官方記錄後，發現情況不是如此。作者推測淡水知縣的派任，最早也在光緒五年(1879)以後。原因有二：一爲在奏摺中找不到淡水知縣人選的訊息。光緒三年(1877)閩浙總督何璟、調補山西布政使暫署閩撫葆亨還上奏，聲稱臺北知府仿貴州省銅仁府之例，由知府兼攝知縣錢糧、詞訟，等到“稍有頭緒”才添設淡水附廓縣治。[28]二爲同爲淡水廳所析分出的新竹縣，首任知縣劉元陞遲至光緒五年閏三月(1879.4)才到任。[29]因此淡水知縣也有可能比照辦理，否則縣署不會這麼巧，也在同年新建。不過首任淡水知縣是何人？現不可考。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淡新檔案的案卷中，能找得到最早的資料是在光緒九年二月(1883.3)，原任新竹知縣徐錫祉調署淡水知縣。[30]同年九月改由朱某代理(可能爲新竹知縣朱承然)。光緒十年(1884)徐錫祉又回任新竹知縣，並再代理淡水知縣。同年八月新竹知縣改由彭達孫接任，徐錫祉可能就一直擔任淡水知縣直到建省爲止。[31]

臺北府署的建立者是陳星聚。之前府署未建時，林達泉、陳星聚皆借用舊淡水廳署辦公。光緒五年(1879)陳氏鳩工興建府署，隔年竣工。工程費用由紳商、富豪義捐。[32]陳星聚擔任臺北知府一職時間很長，直到臺灣建省爲止。至於考棚的設立，最早可追溯至光緒四年十月(1878.11)閩督何璟、閩撫吳贊誠、學政孫貽經聯名上奏，請在臺北設立考棚。讓淡水、新竹、宜蘭三縣的文童，可就近在臺北參加生員考試。[33]光緒六年(1880)官府勸捐興工，由富商洪騰雲捐出地基與部

[25] 陳三井等， 臺北市發展史(二)》(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 年 6 月)，頁 551~552。
[26]《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頁 2540~2542。
[27]《臺北市發展史(一)》，頁 837；黃淑清， 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年 4 月)，頁 46~47。
[28]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年 8 月)，頁 2806。
[29]《新竹縣志稿》，頁 139。
[30]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 淡新檔案(一)：第一編行政/總務類》(臺北：臺灣大學，1995 年 9 月)，頁 162。
[31]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 淡新檔案(二)：第一編行政/總務類》(臺北：臺灣大學，1995 年 9 月)，頁 131、137； 新竹縣志稿》，頁 140。
[32]《臺北市發展史(一)》，頁 837。
[33]《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頁 2916~2921。

分工程款，隔年竣工。其佔地面積甚廣，能容納二千餘人應試。[34]

基隆海防廳爲臺北府的分府，其地位可由丁日昌想把府治遷移至此，而可見一般(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23)。雖然丁氏曾派向燾，前往該處暫辦事務，但他不是首任實授的通判。真正的人選應是原任噶瑪蘭廳通判洪熙儔。如同前述，光緒元年北臺灣因沈葆楨的奏陳，導致行政區的大幅度調整。不過跟淡水廳不同的是噶瑪蘭廳並沒有析分。它只是把通判移駐到基隆，原缺改爲知縣而已。宜蘭縣的改制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不過從光緒三年元、十二月的奏摺來看，洪熙儔可能還在宜蘭，沒有移駐基隆。[35]洪氏之後海防廳繼任官員，可考者爲光緒六年(1880)上任的鄭應基。根據 1910 年基隆公學校訓導蔡慶濤的採訪，基隆海防廳署最早由鄭氏所建，原址在三沙灣庄的海關(基隆市中正區正船里/還不是地圖所繪處)。光緒七年(1881)基隆通判改由徐廷灝接任 。地圖上所標示的大勝元 ，原名大沙灣，就是在徐氏任內更名。光緒九、十年(1883~1884)基隆通判由梁純夫繼任。[36]

至於基隆的煤局 ，根據蔡慶濤的採訪 ，早在光緒元年就設立 (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24)。[37]爲什麼當府、縣衙門均未建造時，煤局就已搶先一步成立呢？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爲因應牡丹社事件，各省督、撫均把握時機上奏，不少即提到開挖煤礦可以興利的建議。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5.30)廷議決定，所有海防事項由南、北洋大臣督辦，關於煤礦則先在河北省磁州與臺灣基隆試辦。同年四~六月英籍礦師翟薩(David Tyzack)探勘基隆礦脈完畢。由於這項工作是臺灣道夏獻綸指派委員何恩綺、李彤恩負責，所以煤局可能就在此時成立。不過根據考證臺灣官煤廠的設廠工作，要到光緒三年十一月(1877.12)才完成。也就是真正的量產要到光緒四年(1878)才開始。然而由於產銷、販售毫無經驗，使得煤務運作極不理想。光緒七年(1881)煤務局已積弊重重，但所屬人員仍極力硬撐。直到光緒十年六月(1884.7)該單位主持人員承認虧損，終告整體煤務經營的失敗。[38]

至於輿圖上還繪出三個非官方的機構—(艋舺)義倉、(艋舺)書院、龜山寺(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77、78、123)，值得一併討論。艋舺義倉建於同治六年(1867)，爲淡水廳同知嚴金清勸捐修成，共設有倉貯十九間。[39]艋舺書院又名文甲書院，現列爲三級古蹟。考其建造年代爲道光十七年(1837)，由淡水廳同知婁雲倡修而成。不過婁雲最初選址於草店尾祖師廟北畔(臺北市萬華區祖師里)，未果行。同年復經士紳林國珖捐獻地基於下嵌莊，才選於現址。然因董事周智仁等以控案延

[34]《臺北市路街史》，頁 47。
[35]《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頁 2489；《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第四輯)》，頁 2805~2806。
[36] 蔡慶濤，《基隆地方研究資料》收入伊能嘉矩文庫微卷編號 T0021，捲號 6-4(手稿及抄寫部分〔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
[37] 同註 36。
[38]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6 月再版)，頁 104~138。
[39]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1963 年 8 月，頁 54~55。

廢，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才由同知曹謹續建完成。道光二十七年(1847)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臺，以文甲名稱不雅遂改爲“學海書院”，並直接由同知曹士桂接任院長(山長)。同治三~四年(1864~1865)曾重修過，當時院長爲舉人陳維英。[40]陳維英嘗爲福州府閩縣教諭、噶瑪蘭廳仰山書院山長。平生因作育英才無數，所以在大隆洞的居所亦被稱爲“老師府”(陳悅記祖宅，亦被列爲三級古蹟)。陳氏通常就被認爲是學海書院，最負盛名的讀書人。[41]不過到了光緒初期，該書院又出了一位山長。雖然他當時聲名平平，但此人就是 1904 年出任北京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張亨嘉。

張亨嘉，字燮鈞，福建侯官人。同治四年(1865)考中舉人。光緒二年(1875)即以福建巡撫丁日昌幕友的名義，伴隨巡視臺灣。光緒五年八月(1879.9)繼任成爲學海書院的山長。張亨嘉在學海書院任期，可能只有一年。因爲他日後又以舉人身份參加“大挑”，被錄用分發至河南省擔任知縣 。光緒九年(1883)考中進士，累官至湖南學政、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1902 年因庚子事件停辦的京師大學堂重新復課，1904 年 1 月該學堂從管學大臣管轄中分出；經管學大臣張百熙的舉薦，特命當時大理寺少卿張亨嘉爲學堂首任總監。[42]當時臺灣已經割讓給日本，在張氏出任總監後的六年，學海書院遂被公開標售，改爲高氏宗祠。[43]不過考其這段歷史，張氏與臺灣的關係可從書院談起。

另外還有龜山寺的沿革。該寺常被稱爲西雲寺、西雲巖寺、大士觀、外巖(岩)，但無所謂龜山寺的稱號。其名稱由來應是位於觀音山獅頭巖山腰，而獅頭巖俗稱龜山，所以繪圖者才定名爲“龜山寺”。寺址在今臺北縣五股鄉成州村，主祀觀世音菩薩 ，亦被列爲三級古蹟 。考其建造的年代可追溯至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三十三年(1768)福建汀州府永定縣貢生胡焯猷等獻地改建 。嘉慶十六年(1811)業主劉建昌等再度勸修重建 。光緒九年(1883)鄉民陳六州等再捐貲重修。早期該寺爲加里珍庄(五股鄉)粵籍劉姓的信仰中心，道、咸時期該地出現的閩粵械鬥，迫使粵籍人士移民他處，之後本寺反而成爲閩籍人士的信仰。[44]

另外輿圖上還繪出一個洋人的機構—滬尾海關(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96)。滬尾海關的成立，可以追溯至咸豐八、十年(1858、1860)天津與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臺灣的安平、打狗、滬尾、雞籠(基隆)，均被開爲通商口岸。不過開埠的運作還在咸豐十一年六月(1861.7)，由抵臺的英國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與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商議後，遂定滬尾爲口岸才開始進行。同治元年六月(1862.7)滬

[40] 同註 39，頁 139。
[41] 李乾朗， 臺北市古蹟簡介》(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1 年 1 月，頁 104~105、126~127。
[42] 張 戡編， 椋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張亨嘉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5 月)，頁 1~11。
[43] 張蒼松， 典藏艋舺歲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97 年 9 月)，頁 68~69。
[44] 楊仁江， 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檔案圖說(一)》(臺北：內政部，1996 年 6 月)，頁 152~154；尹章義等， 五股志》(臺北：五股鄉公所，1997 年 11 月)，頁 551~557。

尾海關開關徵稅 。其關址是使用於滬尾水師守備的舊營房 。直到同治二年八月(1863.10)，稅務都由區天民負責；之後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海關首任洋人稅務司。[45]爾後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割臺爲止，該職務全由洋人擔任。

北臺灣政務的運作大致平順 ，但到了光緒十年(1884)，清法戰雲密佈的危機也波及到臺灣。同年三月因法艦至二沙灣砲台啓釁，造成臺灣守軍與法方第一次衝突。[46]閏五月二日(1884.6.24)淮軍宿將前直隸提督劉銘傳上奏 ，直言我方須從兵將、器械、砲台、兵船興革才有機會獲勝。[47]二天之後，劉即被賞與巡撫銜並命督辦臺灣事務。[48]劉在接受任命後，旋即在同月十四日(7.6)行抵天津與李鴻章會商軍情，四天後與從銘軍舊部挑選的一百四十餘人渡台 。二十四日(7.16)抵達基隆上岸，四天之後移駐臺北府城。[49]

劉銘傳以欽差的身份抵臺，剛好趕上法軍對臺的第一波攻擊。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1884.8.4)，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官李士卑斯(S.N.J. Lespés)率領兵船四艘兵船駛近基隆。李氏佯稱中法和議不成，要在次日上午八時砲轟守軍。劉在十五日黎明於臺北府城接到情報後，即火速趕往前線督戰，但行至半途已聽聞法艦轟擊大沙灣砲台(非地圖所畫者)的砲聲。該砲台營官姜鴻勝本欲還擊，但所配備的五尊洋砲均採固定砲座無法迴旋，因此在法艦的側轟下僅二個小時即傷亡六十餘人。劉銘傳自知我方火力無法匹敵，遂想以誘敵深入的方式進行陸戰。隔日上午九時法軍在艦砲的掩護下，有四、五百人趁隙登陸；以半數直攻從海岸退守至田寮港二重橋的曹志忠部，再以半數紮營於曹部北方的山頭。雙方戰至中午，劉派令記名提督章高元、蘇得勝率百餘人由東路抄截，復派已革游擊鄧長安率六十人由西路繞擊，而福寧鎮總兵官曹志忠與副將王三星再率領二百餘人出陣，三路夾攻大敗法軍、摧毀山頭營舍並驅趕他們回船。[50]

這一場戰役是值得探討，因爲它不是法軍第一次失敗。光緒九年四月十三日(1887.5.19)交趾支那艦隊司令李維業(Rivière)上校，率領二個連的海軍步兵、砲兵等約 400 人，進攻駐紮在北越紙橋由劉永福率領的黑旗隊 。[51]劉氏麾下至少1,700 名大軍，早設伏誘敵深入。初戰時法軍憑藉優勢火力，把對陣的劉部右營

[45] 葉振輝， 《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臺北：作者自印，1985 年 5 月)，頁 85、90~93、156~163。
[46] 許毓良， 〈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臺灣文獻》 第 54 卷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299~303。
[47] 台北故宮博物院編，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年 8 月)，頁 3568~3588。
[48] 洪安全主編， 《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三)》(臺北：故宮博物院，1998 年 10 月)，頁 1790。
[49] 劉銘傳撰，馬昌華、翁 飛點校， 《劉銘傳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 年 7 月)，頁 88~90。
[50] 洪安全主編，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年 8 月)，頁 3611~3617；《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三)》 ，頁 1796~1797、1810~1811；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基隆地方研究資料》 ，頁 3；劉 璈， 《巡臺退思錄》 ，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 21 種，頁 268~269。
[51] “黑旗軍”爲一他稱，劉永福本人自稱所部爲“黑旗隊”。參閱李世瑜， 〈有關劉永福晚年活動的一篇文獻—跋“粵省民團總長劉永福之通告”〉 ，《文獻》 第七輯，1981 年 3 月，頁 113~116。

擊潰；但過於輕敵在無斥候預警下，全軍竟大膽深入對手的陣地。於是被劉永福指揮全軍合圍慘敗，李維業本人陣亡，餘部傷亡約一百名。[52]沒想到此教訓仍在臺灣上演。法人 E. Garnot 在清法戰爭結束後，根據自己從軍的經歷寫了一本“遠征史”，書中有不少一手的記載，自然對此役有一描述。原來法軍稱呼大沙灣砲台爲“新砲台(Fort Neuf)”，它對法軍的反擊是不具威脅性。而在被摧毀後，李士卑斯命令 Martin 中校，率領海軍步兵約 400 人登岸。此時約有 2,000 名清軍向後方撤退，其間他們還受到法艦 Villars 的砲轟。爾後法軍分成二支，一支由 Martin 中校指揮留守在高地，一支由 Jacquemier 上尉指揮進入市街偵察。然這二支軍隊，都遭受至少 2,500 名清軍的合圍，在激戰四小時後退回法艦，共陣亡二名、負傷十一名。[53]

本文並不打算考證彼此“戰果”的真實性，但臨陣人數可能法方記載可信度較高。紙橋與基隆戰役的共同點，就是法軍在臨陣前，一定以優勢火力對敵猛轟，直到確定對手無反擊的能力才繼續進兵 。這一步驟是正確 ，清軍在法軍的攻勢下，的確也出現不少傷亡。不過法軍疏於斥候，遂成爲進兵深入後的致命傷。誘敵深入已成爲清軍在火力居於劣勢下，唯一可以選擇的方法。但敵人中伏後，懾於法軍火力強大，仍必須使用“人海戰術”方能奏效。所以在紙橋清、法軍人數比例爲 4:1，在基隆爲 6:1。

該役法軍不得志於基隆，遂把兵鋒指向福州船政局。事實上在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二日 (1884.7.14)，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官孤拔上將 (Amédée Anatole Courbet,1827~1885)即率領數艘兵船駛入閩江窺伺。同年七月三日(8.23)法方以迅速宣戰的手法，即刻轟擊馬尾造船廠並毀船九艘。[54]三日後清廷下詔宣戰，清法戰爭正式展開。七月九日(8.29)又有法艦三艘近泊基隆，並連續二日對守軍發砲猛轟。同月十四、二十日(9.3/9.9.11)淡水亦出現法艦蹤跡，不過在二十八日(9.18)以前，近泊基隆的三艘法艦仍持續滯留，並帶給守軍攻擊上的壓力。[55]清廷此時密諭劉銘傳若有辦法，宜以塞港的方式對付法艦。[56]但這非易事。因爲法艦日以巨砲轟擊，守軍早遠離海岸退入山邊。

八月十二日(1884.9.30)孤拔率領軍艦 9 艘、運輸艦 22 艘來襲。隔日(10.1)上午六時，法方以一千餘名之眾登陸港口西岸的仙洞庄。章高元率領駐紮該地的恪靖巡緝營、霆慶中營、武毅營二百餘人邀擊於牛稠港山上。雙方會戰二個小時，法軍從山巔抄截，迫章部退出山口；至下午十時，法軍更猛撲清軍，幸賴副將陳

[52] 張壯強， 《廣西近代援越抗法戰爭》(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32、43~44。
[53] E.Garnot 著，黎烈文譯， 《法軍侵臺始末(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頁 14~15。
[54] 此役清方參戰兵船共 11 艘，船政大臣何如璋奏報只損失 7 艘；但事實上是包括揚武、福星、福勝、建勝、飛雲、濟安、琛航、永保、振威在內 9 艘。參閱《法軍侵臺檔》 ，頁 124~127。
[55]《劉銘傳文集》 ，頁 98~99。
[56]《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三)》 ，頁 1822。

永隆力戰挫敵。然而當夜，劉銘傳卻以滬尾遭法艦 5 艘砲轟恐陷敵爲由，命令大軍拔營援滬並撤退至水返腳(汐止市)，僅留曹志忠部三百人駐獅球嶺。因此基隆港灣之戰即在守軍的撤兵下結束，法軍可謂以極小的代價就有豐碩的戰果。[57]

E. Garnot 對該役法軍的編組有詳細的記載，Bertaux-Levillain 中校爲登陸後法軍最高指揮官，麾下海軍步兵一聯隊共 1800 人，配備四斤山砲一中隊、配備旋迴砲二小隊、配備 80mm 山砲一小隊，並加上憲兵、輜重等共 600 人。[58]劉銘傳提到一千餘名法軍登陸仙洞庄，與法國海軍步兵人數相當，有一定的真實性。不過該役清、法軍的人數比例卻不尋常。按照劉氏的說法，當時守軍才二百餘人，比例爲 1:9。或許劉銘傳在繕摺上奏時，刻意把守軍人數壓低以避罪也說不定。然不管如何法軍千餘人之數，清軍按照經驗至少也要調撥七千餘名勇丁，才能達到 4:1 的最低要求。但此時在基隆至多僅三千名勇丁，無法與法軍正面交鋒。[59]

以往評論劉銘傳逕自從基隆撤兵，有出於保存實力考量，有出於戰略援滬考量，現在看來可能二者皆有。[60]劉想要保存實力，應非用於湘、淮鬥爭。他可能是著眼於大膽的賭博，把兵力全投注到法軍人數可能較少的淡水。再以大吃小的方式贏得小勝。不過該賭注也是險局。據事後劉銘傳繕摺辯駁，十三日在與法軍接戰時，忽報淡水有法船五艘直犯口門，他自忖淡水離台北府城更近，非先馳援不可。[61]劉的說辭其實是藉口，因爲他根本不知法軍何時會進攻淡水，上岸的兵力有多少。但他還是賭贏了。事實上劉氏若不撤兵，按清法人數比例與雙方火力的懸殊，他想要在基隆獲勝亦極爲渺茫。基隆撤兵是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最後一招。只是既有撤兵的計劃，當下就要有安排，豈能拔營而不顧。倉卒撤兵的結果，清軍在基隆的重要陣地皆失，不久連最要地獅球嶺也被法軍所奪。

淡水之役是劉銘傳起死回生的關鍵。根據劉銘傳的奏摺，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1884.10.4)法艦八艘轟擊我陣，二十日(10.8)清晨法艦忽散，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料法軍必登岸，遂親督營官(記名提督)龔占鰲埋伏港中，營官(記名總兵)李定明埋伏油車埠，營官(副將銜閩浙補用遊擊)范惠意爲後應。記名提督章高元、劉朝祜，率領營官(記名提督)朱煥明埋伏北台後山。五品軍功張李成率土勇一營埋伏北路山間。頃刻法軍以小輪船，分道駁兵千人登陸猛攻砲台。孫開華見法軍進逼，親率李、范二人出陣，章、張二人包抄陣斬敵軍 25 名，銃斃 300 餘名，敵

[57] 根據劉銘傳的奏報，法艦全數只有 11 艘，這與蔡慶濤的調查略有出入。作者採用蔡的資料原因除了敘事更爲詳盡之外，蔡的報導人想必也親歷這場戰爭。參閱《劉銘傳文集》 頁 100~101；《基隆地方研究資料》 ，頁 3； 巡臺退思錄》 ，頁 284。

[58]《法軍侵臺始末》 ，頁 18~19。

[59] 許毓良，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爲核心的討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323~325。

[60] 孔祥吉， 是避敵自保還是高明戰略—劉銘傳撤守基隆新史料辨析〉 ，《清史研究》 總第 25 期，1997 年 3 月，頁 87~89。

[61] 劉銘傳， 劉壯肅公奏議》 ，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七種，1958 年 9 月，頁 174~175。

軍不及逃避溺海而死 70 餘名。[62]

E. Garnot 也提到淡水之役的情況，詳細程度較清方爲佳。事實上這一次法軍的總指揮官，就是第一次基隆之役失敗的李士卑斯(S.N.J. Lespés)少將。他命令 Martin 中校爲登岸後的指揮官，但此人風溼病復發，改由 Duval 上尉擔任。八月二十日(10.8)共派 600 名海軍步兵登陸，他們的目標有二：一是摧毀新砲台(油車埠砲台)與白砲台(沙崙砲台)。[63]另一是摧毀引爆航道水雷的點火哨。上午十時法軍登陸完畢，隨即像內陸推進。但此時他們遇到障礙，就是苦於密林所阻。密林不但打散他們隊形，也使彼此聯絡感到困難。而密林的另一頭，清軍早屏息以待欲伏擊他們。約十分鐘的接觸，雙方即爆發激烈的槍戰。根據 Garnot 記載，這一條戰線長達 1,500 公尺，彼此射距僅 100 公尺。清軍利用密林充做掩護，成功地包抄至法軍後方，法軍全陷入危境。約中午法軍因彈藥用罄，乃決定撤退；不巧風浪轉大，小艇無法靠岸。拖至下午一時十分，法軍才踉蹌撤離完畢。該役法軍陣亡 12 名、失蹤 8 名、負傷 49 名(清、法所記戰果相差極大)。[64]

法方對此次的失敗有所檢討，他們認爲除了登陸兵力過少外，也缺乏戰術經驗；致命處在於沒有斥候保護前線的推進，以致於受到清軍狙擊手攻擊時便一籌莫展。兵力不足的缺點，李士卑斯少將在未下令登陸前自知，但這些員額是孤拔所能從基隆分撥的最多人數。因此淡水的法軍也只能冒險孤注一擲。[65]再者，登陸後的法軍火力並不強。據記載 600 名海軍步兵僅配備一門旋迴砲(該砲清軍記爲格林砲 Gatling/它其實是一種美製重型機槍，由十支槍管構成，可裝置在野戰輪架上移動)。按法軍射距臨陣的教戰守則，100 碼以外應是大砲的火力支援區，怎料失去這一層支援，法軍的失敗實有跡可尋。[66]事實上清軍的成功，還是得利於人海包圍戰術奏效。由於劉銘傳已把原駐守基隆的三千大軍移調，現淡水到臺北府一路，至少有四千之眾駐紮。清軍不管是臨陣，還是預備隊的上補，兵源都極度充裕。劉銘傳因基隆不戰而退，所引發的政治危機稍解。

爾後的戰役皆發生於基隆。不過北臺灣守軍能苦撐作戰，實際上就是靠先前提到，背後有士紳在餉械、兵源上的幫忙。臺北首富三品卿銜候選道林維源，一直是官府亟力勸輸的對象。內閣中書臺北紳士陳霞林、武舉王廷理自募土勇，協助官軍投入戰場。[67]然而戰局始終爲拉鋸狀態。雖然清軍不時力圖反攻，想要收

---

[62]《劉銘傳文集》，頁 101~103。
[63] 周宗賢，〈淡水與淡水砲台〉，《臺灣文獻》，第 41 卷第 1 期，1990 年 3 月，頁 47~48。
[64]《法軍侵臺始末》，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頁 26~28。
[65]《法軍侵臺始末》，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頁 26、29。
[66] Hughes B. P., *Firepower: Weapons effectiveness on the Battlefield , 1630-1850*(New York: Sarpedon Press ,1997),pp102-103.
[67] 同治七年(1868)未裁兵加餉以前，臺灣綠營每年的經費約二萬兩，以淡水廳 0.69 兩對 1 佛銀的比率來計算，約折合佛銀 28,912 圓，而當時清廷即要以林維源認捐洋圓二十萬。參閱《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頁 3692~3695、3851~3853、4155、4162；《劉銘傳文集》，頁 112。

復基隆，但都被法軍擊退。光緒十一年元月十八~二十一日(1885.3.4~3.7)，法軍獲得外籍兵團增援大舉進攻，連破清軍在基隆外圍丘陵所有陣地。敗逃的清軍麕集於水返腳情況危急。幸好法軍沒有再急攻臺北府，反而在二月十三日(3.29)，出奇不意地攻陷澎湖，冀圖讓之前對臺灣的封鎖能更奏效。三月一日(4.15)清、法停戰，五月九日(6.21)法軍全數撤離基隆，戰事落幕。[68]

四、從地圖來看 1885 年清法戰爭結束後的北臺灣

清法戰爭結束以後，清廷更感到臺灣海防地位的重要，並且爲加快推行洋務的腳步，遂決定建省。光緒十一年九月五日 (1885.10.12)朝廷下旨著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首任巡撫即是劉銘傳。[69]建省之初，省會定在臺灣縣的橋孜圖(臺中市南區)。所以巡撫暫借臺北府淡水縣署辦公。此時在光緒六年(1880)所興建的臺北府儒學也快要竣工。其格局是中央爲大成殿，設東西兩廡。前有廟門，再前有櫺星門、泮池。廟門外左爲禮門，右爲義路。左設明倫堂，右置教授署(老師衙)。入學廩生定額閩生十三名、粵生七名，即俗稱文廟所在(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6、7、8)。光緒十四年(1888)建城隍廟，因廟內同時供奉府、縣二城隍，所以亦稱府縣城隍廟。地方官每到朔、望，必到廟裏參拜(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12)。[70]光緒十八年(1892)巡撫行署從淡水縣衙門移出，另建“行臺”，又稱行轅，於光緒二十一年竣工(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13)。[71]光緒十九年(1893)又另建巡撫衙門與布政使衙門，然因此圖使光緒十八年所繪，所以這二個重要的官署並沒有標出。

另外該地圖標示出多達七處砲台，也相當特別。這當中最值得注意是基隆的砲台。劉銘傳對於基隆戰略地位的認識，可從清法戰爭中的經驗累積而來，只是建省以後如何建設該處的海防頗需深究。事實上當時基隆的砲台共有六處。除了地圖所標示出的大勝元砲台、基隆小砲台、仙人洞砲台之外(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25、26、27)，還有地圖未標示出的社寮砲台、獅球嶺砲壘、紗帽嶺砲壘。[72]以當時各砲台設計的位置，社寮砲台位於口門出海處。戰時若敵人的船艦破壞社寮砲台，硬闖基隆港成功；它將面對港灣西邊的仙人洞砲台，以及港灣東邊大勝元砲台、基隆小砲台的交叉射擊。如果三座砲台的火力，仍無法壓制敵艦，而讓登陸部隊上岸；則有獅球嶺砲壘、紗帽嶺砲壘，做最後的抵抗。此外守軍還可以靠著一條，地圖所沒有繪出的鐵路來進行運輸。簡單地說在劉銘傳的構想下，基隆的海防是朝“要塞”防衛的形勢去規劃。

---

[68]〈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頁 318~319。

[69] 陳在正， 臺灣建省方案形成過程的考察〉，臺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 11 月)，頁 426~433。

[70]《臺北市路街史》，頁 46~47、228。

[71]《臺北市發展史(一)》，頁 838。

[72] 日本東洋文庫藏抄本《臺島劫灰》，收錄曹永和總纂， 《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經濟篇/軍事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 年 10 月)，頁 554~555。

以要塞做爲港口防衛的優先選擇，並不是臺灣最先實施。與此同時，北洋艦隊的二大基地—旅順、威海衛，早已展開工程。[73]會有這樣結果的出現，則是受到德國強烈影響所致 。原來德國總結普法戰爭的經驗 ，在撰寫的軍事著作中提到：“凡語濱海之各國戰爭者，如能將本國所有兵船逕往守住敵國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則爲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則莫如自守本國緊要之海口。”[74]可見得海口爭奪就是戰爭勝負的關鍵 ，爲了要防衛它最好的辦法就是廣建砲台、藏以兵船。不過購買兵船的經費被北洋大臣李鴻章給挪用，於是只剩下建造砲台的構想尙能推動 。[75]當時劉銘傳是聘請德國人鮑恩士 (Baons)、聞德(Hecht M.)，充當工程技師以及訓練軍隊使用槍砲。[76]

基隆海防地位的加強，連帶也使得分府的地位提高。建省後原本通判的官職改同知。光緒十三年閏四月(1887.6)原任通判梁純夫病逝，遺缺由閩浙總督楊昌濬、臺灣巡撫劉銘傳題補代理埔里社通判林桂芬陞任。不過林桂芬的的任命案，直到光緒十四年十一月(1888.12)都還沒有通過。[77]這一段時間的代理可能就由章某與溫培華擔任。前者名字已不可考，只知他把原分府衙門從三沙灣，遷往今基隆市仁愛區基隆郵局附近(日治名爲石牌街)。到溫培華接任海防同知時，又把分府衙門移往今基隆市仁愛區奠濟宮內(日治名爲玉田街)。林桂芬也有可能從未擔任基隆同知。因爲根據日治時期調查的資料，接替溫培華的人選可能是林文能。林文能接任同知時，又把分府衙門移往今基隆市中正區水錦里(日治名爲基隆公學校前面築港船員宿舍)。之後的人選復見於月摺檔。光緒十五年十月(1889.12)基隆同知汪興禕病逝，隔年五月閩浙總督卞寶第、臺灣巡撫劉銘傳題補埔里社通判方祖蔭陞任。該任命案未通過前，其職務可能暫由包容代理。方祖蔭接任同知後，把分府衙門做最後一次搬遷 ，新址選在今基隆市信義區(日治名爲基隆新停車場/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23)。[78]

基隆煤局在清法戰爭時，受到戰火的破壞。這使得劉銘傳在臺灣建省後，亦把整頓煤務列爲施政的重點。光緒十一、十二年(1885、1886)先採商辦煤務的方式。自光緒十三年(1887)開始，官商合辦的臺灣煤務局成立。雖然之後臺煤開闢上海、香港的市場，但是苦於資金籌措，煤務的興辦一直不順利。光緒十六年(1790)

---

[73] 旅順港佈署 10 座砲台，威海衛港佈署 18 座砲台。參閱姜 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1860~1911)》(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 12 月)，155~227。

[74]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212。

[75] 姜 鳴， 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 年 7 月)，178~280。

[76] 對於洋人鮑恩士、聞德的背景資料相當少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典藏的檔案全無提及，而中國大陸學者在研究淮系集團時也只能整理出隻字片語。參閱《劉銘傳文集》 ，頁 201；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12 月)，419~432。

[77] 洪安全主編，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六)》(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年 8 月)，頁 4972、5311。

[78] 洪安全主編，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七)》(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年 8 月)，頁 5763~5765、5783； 基隆地方研究資料》 ，頁 24；http://www.linyhome.com/f/f25htm。

商股退出煤務局，臺煤產量也日漸減少。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官煤廠採掘工作告停，只出售存倉的舊煤。隔年計劃再採官商合辦方式經營，但遲遲未能實施。光緒二十年(1894)爲應付日趨緊張的甲午戰事，基隆煤礦特由官方貸與煤商林振盛等五家重新開採。如此的挖掘工作，就一直持續到乙未割臺。[79]

當然北臺灣的海口不止基隆一處 ，滬尾也被視爲重要的港口 。所以在地圖上，它的附近被標示出四處砲台—油車口砲台、觀音山砲台、剜仔尾炮台、地營砲台(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94、115、117、118)。這四座砲台記錄，最早提到的是油車口砲台。光緒六年十月(1880.11)福建巡撫勒方錡巡臺時，提到淡水河北岸舊有露天砲隄不足以避風雨，指的就是它。光緒八年十一月(1882.12)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臺，除了再度提到油車口炮台外，還上奏說明此時正在動工興建觀音山砲台，以及建議興築剜仔尾炮台。[80]觀音山砲台建造者本爲記名總兵丁槐，但因換防的關係改由記名提督曹志忠接續。[81]剜仔尾炮台建造者不詳，不過看到地圖已經標示出，想必岑毓英的建議已被採納。油車口砲台在中法戰爭時被法國人稱爲新砲台，它毀於戰火。建省之後劉銘傳決定在原址附近興建洋式砲台，仍聘請鮑恩士(Baons)、聞德(Hecht M.)監工。光緒十二年(1886)動工，十五年(1889)竣工。落成後劉銘傳還在砲台入口拱門處，親題“北門鎖鑰”橫聯。該砲台現被列爲二級古蹟。[82]

油車口、地營砲台、觀音山砲台，再一次出現記載，則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臺時。當時臺灣民主國的軍隊守在這三個砲台(根據陳漢光所記還多增一座砲台—關渡砲台)，準備抵抗要來接收的日軍。[83]同年的五月二日(1895.5.25)，日本海軍少將東鄉平八郎率領浪速、高千穗軍艦，靠近淡水偵察。發覺守軍早有準備，因此繞到北海岸，遂改由鹽寮登陸。[84]雖然往後的戰事呈現一面倒的狀態，但是這幾座砲台竟也改變日軍接收的行動，影響整個戰役的發展。

在其他軍事據點方面，該地圖所繪出的九個汛，數目之多也需留意(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28、29、57、58、95、109、119、127、128)。不過刻意把它安排在砲台之後討論，其實是表示駐守在這些汛塘的綠營兵，已經不是當時臺灣軍隊的主力。這九個汛的名稱，並非作者私下命名，而是參照光緒十八年(1892)編纂的《臺灣通志》。依據通志的記載，當時淡水縣的汛塘共有十九個之多 。[85]然製圖者所標示數目竟只有一半。可見得在製圖者眼中，被標示出的汛塘，其重要性

[79]《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頁 214~243。
[80]《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頁 3272~3273、3425。
[81] 諸 家， 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三〇九種，1972 年 12 月，頁 132。
[82] 楊仁江， 臺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檔案圖說》(臺北：內政部，1995 年 2 月)，頁 135~137。
[83] 以往對於乙未抗日的討論，僅記錄臺北守軍堅守的砲台爲油車口、觀音山、關渡，從未提到地營砲台。但遲至光緒十八年該砲台仍被繪於地圖上，因此合理推斷三年之後應也加入作戰行列。
[84] 黃秀政， 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4 月二刷)，頁 144~145。
[85] 蔣師轍， 臺灣通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三〇種，1962 年 5 月，頁 651~658。

應該被凸顯。至於爲什麼說綠營兵已不是主力呢？原來自從同治八年(1869)臺灣綠營裁兵加餉後，人數從一萬四千餘人，大幅縮編成 7,700 人。光緒八年(1882)臺灣綠營再裁撤至 4,500。光緒十九年(1893)再裁撤至 2,405 人。綠營被一再縮編的原因，則是肇因於戰力下滑；但不全體裁撤的原因，則是考慮到仍有巡緝的功能。[86]

或許基於此道理，在臺北府城大南門附近，也標示出北臺灣綠營的最高衙署—艋舺營叅府署(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76)。同治十年(1871)編纂的《淡水廳志》記錄，艋舺營參將(府)署座落在艋舺街。[87]《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還考證艋舺水師遊擊署(艋舺營參將的前身)，設在今萬華區三水街、廣州街一帶。[88]參照廳志的記載，這段敘述是正確。不過時至光緒末年，艋舺營叅府署已經從艋舺遷移到大南門外。依據地圖所繪製的方向，應該在今臺北市中正區的位置。至於光緒朝艋舺營 叅將的資料不 多。月摺檔能找到的人事記錄 ，有光緒九年三月(1883.4)閩浙總督何璟以原任叅將李榮升，已陞補山東榮水水師協副將 ，遂題補閩浙儘先補用水師叅將張欣赴任。另有光緒十九年九月(1893.10)閩浙總督譚鍾麟以原任叅將陳友定降補開缺，遂題補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陳宗凱陞任。[89]

除了砲台、汛塘之外，隘也是另一種軍事據點。隘，簡單地說就是防番之地。[90]地圖上所標示出的隘共有三處—萬安蓁隘、暗坑仔隘、大坪隘(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67、68、129)。根據《淡水廳志》所記，大坪隘屬於民隘，共設隘丁 20 名。暗坑仔隘亦屬民隘，共設隘丁 10 名。[91]萬安蓁隘並未被列入記錄，查閱該地區主要著作亦無所悉。[92]光緒十一年(1885)巡撫劉銘傳在了解隘制的運作後 ，進行史無前例的大改革，收編全島之隘爲官隘。不僅如此還裁撤各隘的隘糧名目，解散隘丁，並以淮軍的隘勇來取代。[93]淮勇就是防軍。早在同治十三年的牡丹社事件、光緒初年的開山撫番，以及中法戰爭均派遣他們來臺。劉銘傳屬於淮系將領，現擔任巡撫一職，再加派更多的淮軍駐臺，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地圖在淡水河口所標示的“(地營)營房”，就是防軍部隊的名稱(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116)。不過根據筆者研究清末臺灣的防軍，其部隊名稱共達 56 個之多，仍找不到有名爲“地營”的部隊。[94]但從地圖所繪得知，他們是一支戍防砲台的部隊。

---

[86]〈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爲核心的討論〉，頁 41、471。
[87]《淡水廳志》，頁 52。
[88] 湯熙勇，《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 年 12 月)，頁 377。
[89]《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頁 3434~3435、3537；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年 8 月)，頁 6827~6829。
[90] 連 橫，《臺灣通史》，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1962 年 2 月，頁 369。
[91]《淡水廳志》，頁 50。
[92] 李文良，《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6 月)；溫振華，《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 年 12 月)。
[93]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年 5 月三刷)，頁 539。
[94]〈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爲核心的討論〉，頁 53~54。

然而臺灣建省後，防軍的任務並不僅止於操作大砲而已，最重要的投入開山撫番戰爭。大抵從光緒十一年底至隔年九月，就發生了一連串的討番戰爭。地圖所見的“番山”，就是主要的戰場(見附圖一/附表‧編號 48、63、64、65、66、98、104、105、124、125)。北部的戰事，比中、南部都稍晚。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86.2.16)劉銘傳檄令記名總兵劉朝祜、滬尾水師守備張廣居，各率兵馬開赴大嵙崁(臺北縣大溪鎮)相機援剿。十五日(2.18)大軍紮營頭寮(大溪鎮)，即有大嵙崁十三社前來就撫，但有竹頭角、貓裏翁社(俱在桃園縣復興鄉)恃強梗化。十八日(2.21)雙方在南雅(大溪鎮)激戰，官軍用大砲遙擊，竹頭角不敵先降，剩下貓裏翁社仍在頑抗 。二月三日(3.8)劉銘傳親赴該地督戰 ，並再派撥三營兵馬往援。五日(3.10)大軍攻入貓裏翁社旁的高山，以大砲猛轟逼其屈服，隔日該社頭目投降。劉氏聞訊立調新竹知縣方祖蔭等，馳赴塩菜甕趁勢招撫；據劉的宣稱從三角湧並塩菜甕以南，毗連大湖一帶生番六十餘社一律就撫。

其實官方一再“宣稱”多少番社就撫，實際情況頗值得懷疑。就如同劉銘傳隨後再奏報，在原來已就撫的區域—三角湧紫微坑(三峽鎮)、屈尺(新店市)二地，有竹加山、加九岸社生番出草。其實這二社近在咫尺，彼此相隔約五十里。劉氏探得消息得知此地“番社甚多”，且萬山壁立毫無路徑。劉命令記名總兵唐仁元先行開路，行抵竹加山社後，該社頭目自知難敵率同八社生番男女千名，並有白鴨尾社(烏來鄉)乞降。至於加九岸社，奏摺只有提到唐仁元再開路至加九岸山後就沒有消息。劉銘傳爲什麼在建省不久，就急著遂行討番呢？當然生番連年出草傷斃人命，不能坐視不管。但有一點原因更是重要，他自己在同一份奏摺中也道出；原來臺灣土豪每每藉口防番，歛費養勇抗官以致號令不行。現在可做一石二鳥之策，透過討番也能整頓地方。[95]不過劉銘傳太過樂觀了，上述已經“就撫”的生番，許多仍未真正繳械，還是保有反抗的實力。

光緒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886.11.15)劉銘傳抵達大嵙崁，與台北士紳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商議剿番 。該地現集結從基隆調來 ，由候補道方策勛率領的防軍三營，駐紮南雅、義興(桃園縣復興鄉)一帶。林維源密購竹頭腳生番爲嚮導，又募得加走社生番引路，自南雅築路五十里達白阿歪社。二十日(11.17)劉氏親入內山視察，令大軍三路前進；記名提督吳宏洛由加飛開路，記名提督朱煥明由竹頭角(今名長興/復興鄉)闢道，記名提督劉朝祜由義興而入。白阿歪番嚴守加九岸山(今名加九嶺山/臺北縣新店市、三峽鎮界山)，二十九日(11.26)吳宏洛繞至番社後面，眾番查覺大駭乞降不許 。隔日劉銘傳抵達白阿歪山 ，頭目率桌家山等十七社投降。該役劉氏再宣稱，所有淡、蘭交界，未降之二十餘番社現一律歸化。[96]

[95]《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六)》，頁 4746~4751、4758。

[96] 劉銘傳， 劉壯肅公奏議》，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七種，頁 214~217。

劉銘傳自豪地表示 ，自光緒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四月 (1886.10~1887.5)爲止。後山已經招撫到 218 社，番丁 50,000 餘人；前山招撫到 260 餘社，歸順者 38,000 餘人。前景看似一片坦然，不過即將爆發的戰爭，又不得不讓雙方干戈相向。光緒十三年五、六月(1887.6~7)，臺灣內山疫癘大作，番社被疫嚴重，其俗殺人禳災。於是據都司鄭有勤的稟報，大嵙崁、鹽菜甕、三角湧化番恆出殺人，訪查後得知是尖石社(新竹縣尖石鄉)、竹頭角社、大埧怡磨、墩樂、插角社(後三社俱在臺北縣三峽鎮)。八月二十四日(10.10)天氣轉涼，劉氏飭令提督李定明率領四營人馬，隨同太常少卿林維源剿辦。二十六日(10.12)先攻褒懂社，九月一日(10.16)李定明自紫微坑剿大埧西側 ，進抵牛角坑與生番發生激戰 。五日(10.20)大埧七社請降，林維源與劉銘傳商議決定把他們遷下山來，其原居地就由漢人入據開墾。[97]

一連串的戰爭給了劉銘傳一個警惕，即受撫的生番不一定安全，或許只是一時窮蹙，或許只是懾於兵威。但等到官方武力稍弛，或防衛鬆懈時，他們隨時都可以再起。這種疲於奔命的戰爭的確讓官方吃不消。尤其淡水、新竹縣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爲還有不少番社沒有被招撫。北路自大壩社(苗栗縣泰安鄉)剿辦後，惟淡水縣樹木繞、食納社(俱在臺北縣烏來鄉)屢出劫殺。都司鄭有勤即刻帶勇剿辦，並牒請宜蘭防軍扼紮林望眼社(烏來鄉)以爲聲援。靠著火砲轟擊，二社生番與部分竹加山諸番分頭出降 。[98]果然在光緒十五年底(1889)，加九岸十七社總頭目有敏阿歪，陰結卓家山、樹木繞(烏來鄉)諸社，連殺 40 餘名隘勇作亂。劉銘傳急調澎湖鎮總兵官吳宏洛爲總指揮，節制建寧鎮總兵官蘇得勝四營、記名提督李定明三營、浙江處州鎮總兵官竇如田二營，復批准臺北隘勇營游擊鄭有勤就地招募土勇千名往剿。十二月初約 4,000 餘名大軍出發，很快就攻抵內、外加輝(桃園縣復興鄉)，十二月十四日(1890.1.4)進至白阿山，有敏阿歪率悍番 200 餘人頑抗。吳宏洛以炸礮、火箭轟擊，立刻攻燬白阿歪社。十七日(1.7)再攻克破校椅欄社。二十二日(1.12)再克卓家山、樹木繞社，眾番大懼捆綁有敏阿歪等兇番赴營乞降。官軍在白阿歪山建築砲台守備，其餘盡數撤兵，準備赴蘭進討南澳番。[99]

北臺灣官軍與原住民的纏鬥 ，直到劉銘傳去職後仍持續 。光緒十七年十月(1891.11)由邵友濂繼任爲臺灣巡撫。在布政使沈應奎護理印務期間，三、四月份淡水縣大嵙崁、雙溪口(臺北縣新店市)、三角湧的生番復蠢動。原來是馬速社、大熟、加拉叭(俱在臺北縣石碇鄉)、大也甘、加九岸社生番出草殺人。九月間合脰、吶哮、舌擺鶴社(桃園縣復興鄉)生番圍攻碉堡駐軍。沈氏以合脰等番罪行重大先行征討，命林維源親赴大嵙崁督剿；由他節制定海正、副營六成兵力，並准就地募勇千餘名。時竹頭角、吶哮社聞訊前來歸命，其餘番社再勾結內加輝社(復

[97]《劉壯肅公奏議》，頁 221~223。
[98]《劉壯肅公奏議》，頁 231。
[99]《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七)》，頁 5603~5607、5645~5650。

興鄉)作亂。在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六日(1891.11.25~12.6)的戰鬥中，官軍從竹頭角、吶哮進入深山，番眾不敵潰散。爲擴大戰果另一支官軍從大壩、大窩社深入，瞠眼等社(俱在苗栗縣泰安鄉)相繼歸撫。根據林維源表示，從咸菜甕至五指山(新竹縣關西鎮、五峰鄉)一帶的番社甚爲平靜，加輝各社也已出降，只剩下水流東各社(今名志朗/復興鄉)頑梗抵抗，現已飭道員林朝棟率勇北上助剿。[100]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1891.12)中旬，吶哮、大埧、外加輝社復亂，林朝棟部無法及時趕到，臺灣巡撫邵友濂先派駐防滬尾游擊楊春海率部前來。不料楊氏在外加輝接戰時陣亡，官軍一時勢衰，從大埧南抵枕頭山、大綏、水流東(臺北縣三峽鎮/桃園縣復興鄉)，盡是原住民舉事。十二月四日(1892.1.3)林朝棟率領的四營兵馬終於抵達大嵙崁，邵友濂命其節制諸軍，林氏遂把大營駐紮於阿母坪(桃園縣大溪鎮)。林朝棟派隘勇新右營把守北面，改定海正副營爲棟字左右營扼其西，以定海右、中營守東面。林朝棟親率棟字正營衛隊直攻夾板山(今名角板山/復興鄉)，陣中還有苗栗縣軍功黃南球率勇相助。吶哮番被砲轟的措手不及，官軍一路進至合脚；但之後攻勢遲滯，要到光緒十八年三月十日(1892.4.6)隘勇前營才進入外加輝。此時領導生番作戰的頭目牙畏阿甕等均戰歿，各社困頓才又出山投降。邵友濂檢討生番歸化復叛的原因，主要是莠民侵欺侮玩、積成仇釁，再加上奸匪從中煽惑終釀戰禍。他要林朝棟與林維源會商，體查民情妥立民番界限，尤嚴禁通事搆煽。此役官軍陣亡者達數百人之多，也算是清末開山撫番戰爭中較爲慘烈的一次，同時也是清末北臺灣開山撫番戰爭的最後一役。[101]

四、結　語

如同前述，雖然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廳、淡水縣輿圖，仍有繪製錯誤的地方。而且相當可惜的是沒有把鐵路、水圳、番社、釐局給標示出來。但做爲清末最後一張北臺灣地圖，它仍有其史料上的價值。該價值若跟光緒五、十一~十四年所繪製的地圖比較，其意義是反映在解釋區域的發展上。基隆港地區的重要性，已經一再地被強調。它不可取代的交通地位，被之後統治臺灣的日本人所看重。1899~1934 年連續幾期的築港工程與擴港計劃，就是殖民地政府設法提升港務與吞吐量的表現。[102]不過對於它的認識，實際上早從光緒朝就已開始。淡水河流域則是因爲臺北府城的設立，更加凸顯其行政上的地位。尤其到了光緒二十年二月(1894.3)，當省會由臺灣府(臺中市)改爲臺北府之後，臺北做爲全島行政中心的地位已經確立。[103]如此的形勢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桃園地區發展的潛力，也反映在地圖所標示出的聚落數目。爾後再因鐵路的舖設，使得該地區的三大聚落

[100]《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頁 6362~6365。
[101]《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頁 6418~6425。
[102] 井出季和太著，郭 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 4 月修正版)，頁 117~118。
[103]《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頁 6902~6905。

—桃園、中壢、頭重溪穩定成長，如此的排名在日治以前都沒有改變。北海岸與丘陵區的發展 ，在光緒十七年 (1891)因在龍潭堵 (基隆市七堵區)發現沙金而丕變。隔年官府在瑞芳、暖暖、頂雙溪、四腳亭、六堵、七堵設局抽稅。[104]但最重要的還在日治以後，從淘金改成開採礦金，而當時金礦坑的主要分佈區，就是在今瑞芳鎮九份與金瓜石。採金業十足改變本區的經濟地位，但溯其根源也是在光緒時就已見端倪。新店溪流域的發展，因爲受限於開山撫番戰爭的關係，即便是該地區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開採的效率仍然不大。然如此的產業潛力，在日本人治下得到發揮。1903~1909 年的討蕃戰爭，成功壓制住原住民的武力，爲日後林業資源的運用奠下基礎。最後是基隆河流域的發展。雖然清末在它的上游發現到沙金，使得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似有榮景。但是沙金業約在 1917 年後開始萎縮，原因是產量逐年遞減。這使得它在北臺灣六大區域中的重要性下降而敬陪末座。[105]

此外從該地圖的檢索中，也發現到新的史料計載。包括：一、以臺北府爲中心的陸路里程計算。這是在道光元年(1821)以後少見的資料。二、釐清光緒末年艋舺營叅將衙門的地點，實際上不在今天的萬華區而是在中正區。三、地圖上所出現眾多的砲臺，顯示它們的確爲守口的利器。尤其又畫出在其他史料中，較少被記載的淡水河口四座砲臺，更顯示出珍貴。四、地圖的說明文字，提到在基隆還設有澳甲與口書。 《淡水廳志》已記載該港設有澳保，並考澳保就是澳甲。[106]然不管是澳甲還是口書，依據康熙四十六年(1707)以後的規定，主要稽查的對象都是漁船。簡單地說就是要把陸上的保甲制度，轉移成海上保甲。[107]由此可知當時寄泊於基隆的漁船數量一定很多，其總數可能也超過滬尾。所以必須要設立澳甲與口書管理。五、現臺北縣五股鄉三級古蹟西雲寺，其名稱有三、四種之多，但還沒有出現“龜山寺”的別稱。地圖上所標示的寺名，或許能做一參考。

1895 年以後臺灣史就進入日治時期，距離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繪製的時間，也只不過三年的光景。在日本人的治理下，北臺灣地圖的繪製技術更趨於進步與仔細。雖然該地圖的繪製方式，不如之後有經緯度地圖準確。但它自有其史料與時代價值，針對這一點可以說它是無法被取代的。

---

[104]《臺灣通志》，頁 260。
[105]《日據下之臺政(一)》，頁 179~183；《日據下之臺政(二)》，頁 467~503。
[106]《淡水廳志》，頁 187。
[107]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文武口〉，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二十二)》(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1 年 11 月)，頁 182。

附表・基隆廳、淡水縣輿圖標示名稱整理表(原圖繪製錯誤用標楷體字顯示)

編號	行 政 區 域	地圖標示名稱	名稱位置考證	備　　註
1.	臺北府城	北門承恩	臺北市中正區光復里(忠孝西路、中華路口)	
2.	臺北府城	東門景福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中山南路、仁愛路、信義路、凱達格蘭大道交叉口)	
3.	臺北府城	西門寶城	臺北市萬華區新起里	
4.	臺北府城	大南門麗正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愛國西路、公園路口	
5.	臺北府城	小南門重熙	臺北市中正區建國里(延平南路、愛國西路口)	
6.	臺北府城	明倫堂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一女中現址)	臺北府儒學
7.	臺北府城	文廟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一女中現址)	
8.	臺北府城	老師衙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一女中現址)	
9.	臺北府城	考棚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中正區一分局現址)	
10.	臺北府城	(臺北府)府署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漢口街、懷寧街口)	
11.	臺北府城	(淡水縣)縣署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臺大醫院後庭停車場現址)	此爲舊衙
12.	臺北府城	城隍廟	臺北市中正區光復里(臺北市警察局附近)	
13.	臺北府城	(巡撫)行臺	臺北市中正區	
14.	基隆廳基隆保	八尺門	基隆市中正區	
15.	基隆廳基隆保	社寮	基隆市中正區	今名和平島
16.	基隆廳基隆保	鱟穴	原址在今基隆港灣之中	1899 年基隆築港計劃中炸毀
17.	基隆廳基隆保	鱟穴	原址在今基隆港灣之中	1899 年基隆築港計劃中炸毀
18.	基隆廳基隆保	桶盤嶼	基隆市中正區平寮里	和平島旁
19.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杙	基隆市	今名基隆嶼
20.	基隆廳基隆保	扛轎嶼	基隆市	今名花瓶嶼
21.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港	基隆港	
22.	基隆廳基隆保	獅球嶺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里	
23.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海防廳	可能在基隆市信義區(日治名爲基隆新停車場)	基隆海防廳衙共遷移五次，

				此爲最後一次也是光緒十六年海防同知方祖蔭上任後所遷。
24.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煤局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	
25.	基隆廳基隆保	(大勝元)新砲臺	基隆市中正區砂灣里	今名頂石閣砲台
26.	基隆廳基隆保	(仙人洞)砲臺	基隆市中山區仁安里	
27.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小)砲臺	基隆市中正區	1895 年日軍攻台時又稱沙元小砲台
28.	基隆廳基隆保	(粲光蓁)汛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	
29.	基隆廳基隆保	(大基隆)汛	基隆市中山區新崙里	
30.	基隆廳基隆保	八斗仔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	
31.	基隆廳基隆保	哨船頭	基隆市仁愛區(基隆文化中心現址)	
32.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街	基隆市仁愛區	
33.	基隆廳基隆保	大勝元	基隆市中正區正砂里	又名大沙灣
34.	基隆廳基隆保	二勝元	基隆市中正區入船里	又名二沙灣
35.	基隆廳基隆保	三勝元	基隆市中正區正船里	又名三沙灣
36.	基隆廳基隆保	大武崙	基隆市中山區新崙里	
37.	基隆廳基隆保	仙洞	基隆市中山區仁安里	
38.	基隆廳石碇保	十分蓁	臺北縣平溪鄉十分村	
39.	基隆廳石碇保	龍潭埤	臺北縣瑞芳鎮龍安里	
40.	基隆廳石碇保	內仔港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	
41.	基隆廳石碇保	暖暖庄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里	
42.	基隆廳石碇保	柑仔瀨	臺北縣瑞芳鎮柑坪里	
43.	基隆廳石碇保	八堵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里	
44.	基隆廳石碇保	七堵	基隆市七堵區七堵里	
45.	基隆廳石碇保	六堵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	
46.	基隆廳石碇保	五堵	基隆市七堵區五堵里	
47.	基隆廳石碇保	水返腳	臺北縣汐止市	
48.	基隆廳三貂保	番山	臺北縣與宜蘭縣界山	今名草嶺
49.	基隆廳三貂保	遠望坑	臺北縣貢寮相雙玉村	
50.	基隆廳三貂保	頂双溪	臺北縣雙溪鄉雙溪村	
51.	基隆廳三貂保	苧仔潭	臺北縣瑞芳鎮福住里	
52.	基隆廳三貂保	桀光蓁	臺北縣雙溪鄉牡丹村	又名燦光寮

54.	基隆廳金包里保	馬鍊港	臺北縣萬里鄉萬里村	
55.	基隆廳金包里保	野柳港	臺北縣萬里鄉野柳村	
56.	基隆　金包里保	八連港	臺北縣三芝鄉古莊村	應隸　淡水芝　三保
57.	基隆廳金包里保	(金包里)汎	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	
58.	基隆廳金包里保	(石門)汎	臺北縣石門鄉石門村	
59.	基隆廳金包里保	有蚋庄	臺北縣萬里鄉	
60.	基隆廳金包里保	馬鍊庄	臺北縣萬里鄉萬里村	
61.	基隆廳金包里保	金包里	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	
62.	基隆廳金包里保	石門	臺北縣石門鄉石門村	
63.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坪林鄉	雪山山脈
64.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坪林鄉	雪山山脈
65.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石碇鄉	
66.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烏來鄉	
67.	淡水縣拳山保	萬安蓁隘	臺北縣坪林鄉	
68.	淡水縣拳山保	暗坑仔隘	臺北縣新店市安坑	
69.	淡水縣拳山保	坪林尾	臺北縣坪林鄉坪林村	
70.	淡水縣拳山保	鳳山庄	疑爲臺北縣新店市粗坑里	疑爲鳥嘴尖旁
71.	淡水縣拳山保	二重埔	疑爲臺北縣石碇鄉格頭村二格	疑爲二格山旁
72.	淡水縣拳山保	直潭	臺北縣新店市直潭里	
73.	淡水縣拳山保	新店街	臺北縣新店市江陵里	
74.	淡水縣拳山保	公館	臺北市中正區富水里	
75.	淡水縣拳山保	梘尾街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里	
76.	淡水縣大加蚋保	(艋舺營)叅府署	疑爲臺北市中正區龍福里	疑爲牯嶺街舊古亭分局附近(日治時期爲憲兵隊，現爲藝文活動中心)
77.	淡水縣大加蚋保	(小南門外)書院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廣州街、環河南路口)	
78.	淡水縣大加蚋保	(小南門外)義倉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桂林路、西園路口)	
79.	淡水縣大加蚋保	錫口	臺北市松山區頂錫、上壽、貴全里	
80.	淡水縣大加蚋保	三板橋	臺北市中正區梅山、幸福、幸市、東門、文北里。中山區民安、正得、正自、正義、正仁、正守、康樂里。	

81.	淡水縣大加蚋保	南港仔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三重、新富、中南里	
82.	淡水縣大加蚋保	八甲	臺北市萬華區仁德里(柳州街)	
83.	淡水縣大加蚋保	大隆洞	臺北市大同區老師、重慶、保安、至聖、斯文、雅揚里	又名大龍峒
84.	淡水縣大加蚋保	大稻埕	臺北市大同區國順、景星、隆和里	
85.	淡水縣大加蚋保	艋舺街	臺北市萬華區西門、新起、公安、福音、青山、祖師、富民里	
86.	淡水縣芝蘭一保	大屯山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	
87.	淡水縣芝蘭一保	劍潭	臺北市士林區前巷里	
88.	淡水縣芝蘭一保	大直庄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里	
89.	淡水縣芝蘭二保	河上洲	臺北縣蘆洲市	又名和尙州
90.	淡水縣芝蘭三保	沙帽山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	又名紗帽山
91.	淡水縣芝　三保	磺港	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	應隸　基隆金包里保
92.	淡水縣芝蘭三保	滬尾港	臺北縣淡水鎮	又名淡水港
93.	淡水縣芝蘭三保	官渡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平原	
94.	淡水縣芝蘭三保	(油車口)砲臺	臺北縣淡水鎮油車里	又名北海鎖鑰砲臺
95.	淡水縣芝蘭三保	(砲台)汛	臺北縣淡水鎮油車里	
96.	淡水縣芝蘭三保	(滬尾)海關	臺北縣淡水鎮新興里	
97.	淡水縣芝蘭三保	小圭隆	臺北縣三芝鄉古莊村	
98.	淡水縣擺接保	番山	臺北縣三峽鎮安坑里	
99.	淡水縣擺接保	冷水坑	臺北縣土城市清和里	
100.	淡水縣擺接保	城福庄	臺北縣三峽鎮成福里	
101.	淡水縣擺接保	媽祖田	臺北縣土城市祖田里	
102.	淡水縣擺接保	枋蓁街	臺北縣中和市枋寮里	
103.	淡水縣擺接保	枋橋頭	臺北縣板橋市	
104.	淡水縣海山保	番山	臺北縣三峽鎮插角里	
105.	淡水縣海山保	番山	臺北縣三峽鎮有木里	
106.	淡水縣海山保	鳶山	臺北縣三峽鎮鳶山里	
107.	淡水縣海山保	十三天	臺北縣三峽鎮添福里	
108.	淡水縣海山保	三角湧	臺北縣三峽鎮礁溪、八張里	
109	淡水縣興直保	(海山口)汛	臺北縣新莊市中港里	
110.	淡水縣興直保	新庄街	臺北縣新莊市營盤里	
111.	淡水縣興直保	海山頭	臺北縣新莊市營盤里	
112.	淡水縣八里坌保	獅頭山	臺北縣五股鄉集福村	今名獅子頭山

113.	淡水縣八里坌保	八里坌口	臺北縣八里鄉大崁村	
114.	淡水縣八里　保	假港	臺北縣八里鄉頂罟村	該地圖疑似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淡水　沙崙里與石門鄉的中間。
115.	淡水縣八里坌保	(地營)炮臺	臺北縣八里鄉米倉村	
116.	淡水縣八里坌保	(地營)營房	臺北縣八里鄉龍源村	
117.	淡水縣八里坌保	(觀音山)砲台	臺北縣八里鄉埤頭村	
118.	淡水縣八里坌保	(剜仔尾)砲臺	臺北縣八里鄉大崁村	現名挖仔尾
119.	淡水縣八里坌保	(八里坌)汛	臺北縣八里鄉龍源村	
120.	淡水縣八里　保	油車口	臺北縣林口鄉嘉　村	該地圖疑似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淡水　油車里，隸　芝三保。
121.	淡水縣八里坌保	大庄	疑爲臺北縣八里鄉埤頭村舊城	
122.	淡水縣八里坌保	坪頂	臺北縣八里鄉太平村	今名太平嶺
123.	淡水縣八里坌保	龜山寺	臺北縣五股鄉成州村	今名西雲寺
124.	淡水縣桃澗保	番山	桃園縣復興鄉三民村	
125.	淡水縣桃澗保	番山	桃園縣復興鄉奎輝村	
126.	淡水縣桃澗保	南崁港	桃園縣大園鄉海口村	
127.	淡水縣桃澗保	(埤角庄)汛	桃園縣八德市大湳里	
128.	淡水縣桃澗保	(桃園街)汛	桃園縣中壢市	
129.	淡水縣桃澗保	大坪隘	桃園縣龍潭鄉大平村	
130.	淡水縣桃澗保	烏塗堀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	
131.	淡水縣桃澗保	高山頂	桃園縣楊梅鎮高山、高榮里	
132.	淡水縣桃澗保	七佃庄	疑爲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	疑爲清水坑附近
133.	淡水縣桃澗保	高山下	桃園縣平鎮市高雙里	
134.	淡水縣桃澗保	八股庄	疑爲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	疑爲十股寮附近
135.	淡水縣桃澗保	大姑崁	桃園縣大溪鎮興和、福仁里	
136.	淡水縣桃澗保	桃園街	桃園縣桃園市	
137.	淡水縣桃澗保	埤角庄	桃園縣八德市大湳里	今名陂腳
138.	淡水縣桃澗保	中壢街	桃園縣中壢市	

139.	淡水縣桃澗保	楊梅壢	桃園縣楊梅鎮楊梅里	
140.	淡水縣桃澗保	南崁街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村	
141.	淡水縣桃澗保	小南˪	桃園縣　竹鄉南崁村	該地圖　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林口鄉嘉　村小南˪，隸　八里　保。
142.	淡水縣桃澗保	大南˪	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	該地圖　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林口鄉嘉　村斗厝坑，隸八里　保。
143.	淡水縣桃澗保	頭湖庄	桃園縣楊梅鎮三湖里	
144.	淡水縣桃澗保	大竹圍	桃園縣楊梅鎮員本里	又名員笨
145.	淡水縣桃澗保	白沙澈	桃園縣觀音鄉白玉村	今名白沙屯，地圖繪製有誤差，應在頭湖庄以北。
146.	淡水縣桃澗保	塗牛溝	桃園縣楊梅鎮高山里	今名土牛陂
147.	淡水縣桃澗保	四股庄	疑爲桃園縣楊梅鎮梅溪里	
148.	淡水縣桃澗保	大溪墘	桃園縣新屋鄉永安村	地圖繪成社子溪出海口，但在今楊梅鎮瑞原里，也有一個名爲大溪墘的舊地名。
149.	淡水縣桃澗保	龜崙嶺	桃園縣龜山鄉	

「淡水地域」研究計　之展望―〔　際性〕　視　　―

波　　潔*

壹、はじめに

筆者の勤務校が位置する沖縄は日本の中でも特殊な歴史的発展を遂げ、固有な文化を有する地域である。亜熱帯性の気候の中で育まれた沖縄文化は、日本・中国・アメリカは勿論のこと、朝鮮半島や東南アジア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て、多様で多面的な性格をもっている。この固有な文化を有する沖縄社会を理解するために、明治以降、民俗学、言語学、考古学、歴史学を先駆けとしてさまざまな学問が「沖縄」を研究対象とし、「沖縄学」が意識的に主張される状況にある[1]。

他方で、沖縄は地理的にも気候的にも台湾に近いだけではなく、歴史的・人的・経済的にも台湾との結び付きが非常に強い場所である。台湾も歴史的に固有な発展を遂げてきており、その「歴史的固有さ」を理解するためにさまざまな学問的アプローチがなされてきたのは周知の通りである。

この二つの地域が、自地域を理解するためにそれぞれ独自に蓄積してきた学問的成果を交流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新たな視点を提供しあうことは大変有意義なことであり、地域理解に多面性と深さ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る。

本稿は、筆者の勤務校である沖縄国際大学の南島文化研究所において2004年から始まった「台湾・淡水地域に関する多面的研究」の取組みについて紹介し、この調査・研究がめざそうとしている「淡水地域」理解のあり方について論ず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淡水地域」に関する個別事象の詳細な検討については言及していないことを予め断っておく。

貳、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における「淡水地域」調査

一、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における台湾調査

筆者の勤務する沖縄国際大学には、1978年、その附属機関として南島文化研究所が設置されている。南島文化研究所は、日本本土及び中国・朝鮮・東南アジア諸国との交流を通じて周辺地域の文化を吸収し、これを固有の文化に融合させ、価値の高い独特の文化を形成した琉球弧の島々を研究対象としている[2]。

---

* 沖縄国際大学総合文化学部社会文化学科専任講師

1 外間守善は「「沖縄学」という言葉を戦後数十年間、ためらいながら使ったり使わなかったりしてきた私が、最近はおめず臆せず、自分の専攻分野の学問として「沖縄学」という言葉を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と述べている。外間守善《沖縄学への道》（東京：岩波書店、2002）325頁。

2 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HP（http://www.okiu.ac.jp/nantoken/nantoindex.html）

琉球弧を主体とする「南島地域」は上述のように周辺地域との密接な交流の歴史を有しているため、近隣諸外国での調査が必要不可欠となり、1994 年からは台湾調査が始まっており、主として考古学の分野を中心として活発な研究活動をおこなってきた[3]。

現在、兼本敏助教授（沖縄国際大学総合文化学部日本文化学科中国語）を代表として台湾調査団が編成されており、2004 年８月の予備調査を皮切りとして、３年計画で「淡水地域」の調査を計画している。

二、個人調査からの発展としての共同調査

筆者自身は19 世紀中葉から20 世紀初頭に至る時期のイギリス極東外交史を専門としており、台湾を直接の研究対象とする「台湾プロパー」ではない[4]。従来、筆者はイギリスの極東外交政策における対日外交の位置づけとその意義について研究を続けてきた。これまでの研究において、当該時期におけるイギリスの対日外交政策は決して相互信頼的な「同盟関係」ではないことを、私は指摘してきた。イギリス極東外交の第一義的課題は、アヘン戦争以来中国に確立した経済上・通商上の権益の維持・確保であり、この政策にとって有益である限り、イギリスは日本と協調していく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研究視角に立つと、「台湾」は非常に興味深い空間だ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清朝統治下、主としてイギリスとドイツが経済上・通商上の権益を確立した台湾は、日清戦争の結果日本に割譲された。すなわち、台湾に関する外交上の枠組みが「清朝を基軸とする条約体制」から「日本を基軸とする条約体制」へ変化したのである。この結果、イギリスは台湾において確立した経済上・通商上の権益を、日本統治下においても継続して維持・確保するため、日本と交渉する必要が生じたのである。他方、日本は日清戦争後「植民地台湾」の経営が主要課題となり、とりわけ台湾の特産品である樟脳・砂糖・茶等に対する諸外国の影響力を削減することが重要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こにおいて、台湾をめぐってイギリスと日本との間に経済上・通商上の対抗関係が生じ、上述した筆者の問題関心と台湾が結び付くのである。

---

[3] 例えば、高宮廣衛・宋文薫〈琉球弧および台湾出土の開元通宝：特に 7～12 世紀ごろの遺跡を中心に〉（《南島文化》、第 18 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 1996）；高宮廣衛・宋文薫・劉益昌〈台湾中部南投県における先史遺跡の調査（概要）〉《南島文化》、第 20 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 1998）；高宮廣衛・宋文薫〈台湾台東県麻竹嶺遺跡採集の挟刀型石斧二例〉（《南島文化》、第 21 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1999）；来間泰男・渡辺ゆきこ〈調査報告書）台湾農業の動向と WTO 加盟への対応〉（《南島文化》、第 23 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 2001）、高宮廣衛・宋文薫・連照美〈澎湖群島の考古調査〉（《南島文化》、第 23 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2001）など。

[4] 拙稿〈イギリス外交の転換－「英独同盟」交渉から日英同盟へ－〉（《史叢》、第 54・55 合併号、東京：日本大学史学会、1995）；〈揚子江協定」の意義－イギリス外交の質的転換と日英接近－〉（安岡昭男編《近代日本の形成と展開》、東京：巌南堂書店、1998）；〈義和団事変を事例とするイギリス極東外交政策の性質〉（《研究紀要》、第 63 号、東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2）

ところで、筆者と台湾との関わりは、1997 年に《台湾総督府文書目録》[5]の編纂に関わって以来大変深くなっていった。編纂作業を通じて台湾総督府のさまざまな政策の形成過程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た一方、台湾各地の訪問や日本人・台湾人の台湾研究者との交流を通じて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関する多くの知識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うした台湾との関わりの増大もあり、上述の研究視角からイギリスの対日外交政策を理解するために、台湾を研究対象とすることを、筆者は企図したのである[6]。

この企図を実現するため、筆者は科学研究費補助金に「１９世紀イギリス極東外交における台湾の位置づけと在台領事館の役割」との研究課題で申請し、2004 年度から３年計画で採択された。本研究の目的は次の３点にある。

「第一に、日本による台湾領有前後における在台湾イギリス領事館の活動内容の実態を把握することである。各領事館が作成した報告文書、在中国及び在日本公使館との往復文書、日本の外交文書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公文書等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り、台湾をめぐって英・清・日各国がどのような問題を抱えていたのか、その実態を明らかにする。

第二に、台湾以外に設置されたイギリス領事館との関係を考察する。とりわけ、台湾に対する政治・交通上の中国大陸側窓口である福建省に設置されていた領事館を対象として、領事館員の人的交流、通商政策遂行上の関係等について明らかにする。

第三に、上述の作業によって明らかとされた実態を基にして、イギリスの極東外交政策における台湾の位置づけを検討することである。アヘン戦争以降のイギリスの対清政策のなかで、イギリス政府は台湾を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ていたのか、日本による台湾領有をうけて、イギリスは対日政策全体のなかで台湾を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たのかを、特に通商政策の観点から明らかにする。

以上の作業をおこなうことによって、在台湾イギリス領事館の果たした役割と、イギリス極東外交政策全体における台湾の位置づけが明らか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る。[7]」

すなわち、台湾をめぐるイギリスと中国・日本との関係の最前線にあった領事館の実態を把握することを通じて、上述のような問題関心を考察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この研究を遂行するにあたって、イギリスの領事館が設置された淡水を避けて通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かし、淡水は単なる「外交空間」だけではない多様な分析が可能であり、個人での調査では限界がある。そのため、個人調査とは違うレベルで淡水を学問的に検討する必要を感じ、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における共同調査を企画したのである。

三、 淡水地域」調査の概要

上述の共同調査は、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で従来実施されてきた台湾調査を利用

---

[5]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総督府文書目録編纂委員会編《台湾総督府文書目録》（東京：ゆまに書房）

[6] 関連する拙稿として次がある。〈イギリスの台湾産樟脳貿易に対する天津条約適用問題－1868～1870 年のイギリス商社所有の樟脳に対する襲撃事件を事例として－〉（《社会文化研究》、第６巻第１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社会文化学会、2003）；〈日本による領台直後期の台湾「外交」をめぐる問題－その制度的枠組みと「外交」問題に関する基礎的整理－〉（《社会文化研究》、第７巻第１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社会文化学会、2004）

[7]〈平成 16 年度 若手研究(A･B)研究計画調書〉

して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共同調査を実施するにあたり提出した調査計画書では研究課題を「台湾・淡水地域に関する多面的研究」とし、その目的を次のように規定した。

「本研究は、淡水港を中心とする〈都市としての淡水〉と淡水河によって台北まで繋がる〈淡水河流域〉をあわせて「淡水地域」ととらえ、この地域の有する固有な性格である［国際性］を多面的な角度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淡水地域」は、台湾島の中でも早い時期から諸外国に開港された地域であると同時に、淡水河によって台湾島の中心都市・台北と繋がっているため、外国人の流入が大変頻繁だった。この結果、外交官・商人・宣教師を中心として、多くの国から外国人が渡来し、台湾島内でも［国際性］の豊かな地域となり、固有な発展をしていった。

こうした「淡水地域」の有する歴史的・文化的背景を検討することは、淡水という一地域の地域研究にとどまらず、同様に多様な意味で［国際性］を有する沖縄との比較にも有益だと考える。[8]」

すなわち、私たちの共同調査では、旧滬尾地区を拠点とする現在の淡水鎮だけを対象とするのではなく、淡水河によって旧滬尾地区と密接な関係を有していた淡水河の上流地区（旧大稲埕・旧艋舺）を有意味の「淡水地域」として認識し、この「淡水地域」を［国際性］という観点から理解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である。

何故淡水鎮だけではなく、「淡水地域」として把握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か。それは、主として 19 世紀後半に、諸外国がこの地域に進出してきた在り方と関係がある。伊能嘉矩は、その様子を次のように記述している。

「（前略）咸豊八・九年間台湾開港の条約天津条約成りて、未だ批准交換を経ざるに先だち、英商ジアルヂン・マツセソン（Jardin Matheson）及びデント（Dent）の二会社は台湾の官僚（道員か）と密約し、夙に台湾より樟脳を輸出して巨額の利益を博したりといふ。尋で同十年、台湾の開港を実顕するに及び、勢自ら樟脳は輸出品の重要なる一に算へらるゝに至りしかば、分巡台湾兵備道陳懋烈の議によりて、出售を官弁に帰することとし、曩に軍工科の採運を督するために道管の軍工廠に属し、淡水庁下の艋舺街に置きたる料館をして、樟脳の収買を兼弁せしむ。蓋し煎脳の多きを加ふるによりて、工料の傷耗亦夥しきが故に、樟脳の售買は皆料館に操縦するを便と為したるに出づ。爰に至り、料館は亦各煎脳竈戸を管束し、当時「内山脳竈の無頼も、漸く迹を斂むるを知りぬ」淡水庁志の賦役志と称せらるる。（下略）[9]」

すなわち、ジャーデン＝マセソンとデントの両イギリス商社は天津条約締結直後にすでに艋舺に進出して、樟脳に関する権益の確立に成功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これら両商社に代表される、主としてイギリスとドイツの商社による商業活動は、北京条約の批准後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り、それと比例して、外国人の「淡水地域」への進出も多様化し、拡大していった。この進出について、台湾総督府外事課は次のように記録している。（下線は筆者）

「然ルニ淡水トハ万国一般ニ滬尾ノ地ヲ呼ンデ称スル地名ニシテ、地図等ニテハ判然

---

8 〈2004 年度台湾調査計画書〉（2004 年 6 月 14 日南島文化研究所福建・台湾、韓国調査団会議提出資料）

9 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復刻 1965（初版 1928））頁 688-689

滬尾港中ヲ指セルモノナルガ、実際上ヲ見ルトキハ淡水河沿岸附近ノ地ヲ称スル通名ニシテ、劉銘伝任後台湾ヲ以テ支那帝国ノ一省ト為スニ及ンデ、台北府ニ淡水県ヲ置キ、台湾北方ノ大部分ヲ管轄セシモ、支那政府ノ淡水港ヲ開キシハ勿論今ノ滬尾ニ止ムルノ意ナリシガ、外人就中独逸人ノ如キハ此地名ノ曖昧二様ナルヲ利用シテ、淡水トハ淡水県ノ意味ニシテ決シテ滬尾ノ如キ一河港ニ非ズトナシ、強テ地名上ニ於ケル区域ヲ布衍シ、淡水河沿岸ノ通商ニ適スル地ハ条約ノ結果ニヨリ皆之開港場タルベシト主張スルニ至レリ。始メ外人艋舺ニ居住ヲ構ヘ貿易ヲ試ミシモ、屡土人ノ襲撃ヲ受ケタレバ終リニ当時猶ホ田園荒漠タリシ大稲埕ニ移ル、是大稲埕外人居留地ノ端緒ヲ開キシ所以ナリ。（下略）[10]」

こうして、淡水河の河口に位置する開港場としての淡水は、諸外国の進出という外的要因の影響を大きく受けながら淡水河の上流に位置する艋舺や大稲埕と一体化し、有意味な一地域である「淡水地域」を形成したのである。それ故に、私たちの共同調査では、この「淡水地域」を、諸外国の進出による「淡水地域」の地域性の確立やその変容を理解するという意味で［国際性］という観点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この計画目的を達成するために、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の共同調査では次のような調査計画をたてている。

① 調査期間

2004 年度から 2006 年度の３年間

② 調査活動

A．台湾調査

「淡水地域」並びに台湾における関係諸機関での資史料の収集、関係者とのインタビュー、及び関係各所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を実施するため、１年に２回程度のペースで台湾を訪れる。

B．日本国内調査

日本国内の関係諸機関に保存・収集されている関連資史料の収集のため、必要に応じて国内での調査活動をおこなう。

③ 研究会活動

本研究をより豊かなものとするために、南島文化研究所において、研究参加者と関連する研究者による研究会をおこなう。

④ 研究成果の公表

A．研究報告

本研究での成果をより内容あるものとするため研究２年目の終わりの段階で「中間報告」をおこなう。報告場所は上記研究会ないしはシマ研究会を活用する。

B．成果物の刊行

３年間の研究が終わった段階で、研究参加者は研究成果を論文として刊行する。投稿先としては南島文化研究所の研究紀要を予定している。

⑤ 研究組織

---

10 台湾総督府外事課作成〈台湾開港場及外人居留地制度ニ対スル意見〉伊藤博文編（平塚篤他校訂）（秘書類纂　台湾資料）（東京：原書房、1970（復刻原本1936）、頁 169

言語学、歴史学を専門とする所員を中心に活動を開始し、研究の進展とともに例えば地理学、社会学を専門とする所員を加えていく。[11]

上記計画に基づき 2004 年７月から始まった私たちの調査活動は、これまでの4ヶ月間で次のようなことをおこなった。

① 第１回研究会の開催

2004 年７月 29 日、藤波が「〈淡水地域〉の国際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台湾調査に向けての問題提起をかねて―」との題目で報告した。

② 第１回台湾調査（予備調査）

2004 年８月 26 日から 29 日の３泊４日で、兼本敏、藤波潔、平香織（沖縄国際大学総合文化学部日本文化学科専任講師（韓国語）の３名が、〈淡水地域〉のうち淡水鎮、大稲埕、天母の各地点の実地調査、関係資料の所在調査並びに関連文献の購入等をおこなった。

こうして始まった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の共同調査は、現在、第１回台湾調査の整理をおこない、当初の研究計画を修正し、より充実した調査内容にすべく検討している段階である。また、第１回台湾調査の成果の中間とりまとめとして 12 月に開催される第２回研究会（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シマ研究会と共催）において兼本が報告を予定している。

参、〈淡水地域〉の［国際性］と研究視角

―19 世紀以降を中心として―

前章では、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における「淡水地域」研究の経緯と目的について述べてきた。既述のとおり、〈淡水地域〉を［国際性］の観点から考察する場合、その淵源をたどることは研究の遂行上必要不可欠のアプローチである。

そこで本章では、筆者の専門である19 世紀後半を検討対象として、〈淡水地域〉における［国際性］形成の背景、とりわけ日本による台湾領有前後における諸外国、主としてイギリスとドイツ、の「淡水地域」への進出について論じていく。

一、19 世紀以前の「国際性」

周知の通り、19 世紀以前にも「淡水地域」への諸外国の進出がおこなわれた。17 世紀にスペインとオランダが北部台湾に進出し、紅毛城を拠点として占領政策をおこなった。この占領によって、カトリックの布教、西洋医学の導入、北投での硫黄採掘等、〈淡水地域〉に「西洋文明」が流入[12]し、この意味でも［国際性］の萌芽的現象が看取できる。

しかし、より重要な意味での［国際性］とは、〈大航海時代〉以降の「世界の一体化」の過程の中に「淡水地域」が組み込まれた点にある。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オランダ独立戦争

---

[11] 〈2004 年度台湾調査計画書〉（2004 年６月 14 日南島文化研究所福建・台湾、韓国調査団会議提出資料、一部を改めた）

[12] 伊藤潔《台湾 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頁 19-21

での対立を背景としながら、東南アジア以東における地域での貿易をめぐっても鎬を削っていたスペイン・オランダ両国が、その貿易戦略、とりわけ対日貿易戦略に「淡水地域」を位置づけたのである[13]。

したがって、この時期の「淡水地域」を［国際性］の観点から検討する場合、スペイン史、オランダ史の研究者との対話は勿論のこと、カトリックの海外布教史や日蘭貿易史の研究者との対話が重要となる。

二、諸列強による「淡水地域」への進出

先述の通り、台湾への諸外国の進出が本格化したのは、第２次アヘン戦争後のことだった。1858 年にイギリスと清朝との間で締結された天津条約では、第７条で「（前略）清朝の＝筆者註］版図内ニ一名又ハ数名ノ領事ヲ任命スルコトヲ得右領事ハ女皇陛下カ英国通商上必要ト認ムル清国開港場ノ何レタリトモ之ニ駐在スルノ自由ヲ有ス（下略）」と規定し、イギリスは清朝との間に正式な「外交関係」を結ぶに至った。そして、第８条では「基督教（中略）ノ宣教者又ハ信仰者ハ清国官憲ノ保護ヲ受クルノ権利ヲ有ス又平穏ニ其ノ職分ニ従事シ法律ニ違反セサル者ハ迫害又ハ干渉ヲ受クヘキモノニ非ス」と規定され、キリスト教の宣教活動も公認された。

この条約では台湾での開港場が明記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が 同時期に清朝とフランスとの間で締結された天津条約では、第６条で「（前略）外国貿易ニ対シテ新ニ港ヲ開クコトハ時代ノ要求ノ一ナルコト立証セラレタルニ依リ（中略）台湾島ニ於ケル安平及淡水（中略）ノ各港ハ広東、上海、甯波、厦門、福州ト同一ノ特権ヲ享有スヘキコトヲ約定ス（下略）」と明記され淡水と安平が正式に開港場となり、イギリスは最恵国待遇によってフランスと同等の権利を享受したのであった。

その後、イギリスは開港場となった淡水に、天津条約によって獲得した権利を行使して領事館を設置した。台湾総督府外事課は、その経緯を次のように記録している。

> 「（前略）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英国領事スウィンホー」氏ハ天津駐在英国公使ヨリ台湾島ニ於テ外国貿易ニ適合スル港口選択ノ命ヲ受ケ、台湾府（台南府）ニ着シ同府ヲ領事館駐在地トナセルコト三閲月、又滬尾（淡水港）ニ移リ淡水港ヲ以テ主港トナセリ。其後支那政府ノ承諾ヲ経テ基隆ヲ以テ淡水ノ附属港トシ打狗ヲ以テ台湾府ノ附属港ヲナセリ。
>
> 千八百六十四年ノ秋スウィンホー氏ハ再ビ領事館ヲ台湾府ニ移シ淡水ヲ以テ副領事ノ駐在地トナセリ、淡水ハ爾後副領事館ノ所在地トナリシガ千八百七十八ニ至リ始メテ領事ヲ置クニ至レリ。[14]」

こうして、イギリスが台湾に領事館を設置したのと同様に、ドイツ、フランス、オランダ、アメリカ等が台湾に領事を置いた[15]。また、正式な外交関係の樹立以前から台湾に進出し

---

[13] オランダ独立戦争とアジア貿易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長谷川輝夫・大久保桂子・土肥恒之《ヨーロッパ近世の開化》（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を参照。

[14] 台湾総督府外事課作成、前掲。

[15] 許雪姫総策画《台湾歴史大事典【附録】》（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会、2004）A146－149。なお、日本による台湾領有直後期における台湾総督府の調査では、台湾駐在各国

ていた諸外国の商社は、外交関係が成立すると続々と台湾に進出し、「淡水地区」へ進出する商社も増加した[16]。さらに、天津条約によって認められたキリスト教の布教も本格化し、「淡水地域」にあってはカナダ長老教会の布教活動がおこなわれた。

こうして、19 世紀後半における諸外国の台湾進出は、外交、経済・通商、宗教といった多面な［国際性］を包含して展開された。したがって、この時期の「淡水地域」を［国際性］の観点から考察する場合、イギリス・ドイツ等の台湾進出各国の外交史的考察は勿論だが、経済史、通商史、宗教史的観点からの考察も必要になる。また、諸外国の進出が本格化するにつれて、諸外国人と台湾住民との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も顕在化するため、言語学的な考察も必要となる。

三、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淡水地域」の［国際性］

1895 年に締結された下関条約の結果、台湾は清朝から日本に割譲された。伊藤博文総理大臣は台湾総督に任命した樺山資紀に対して台湾施政の大綱を示して、その中で行政機関に関して次のように記載している。

> 「三、外務部　台湾には淡水、雞籠、台南、打狗の四開港場ありて、外国人の居留するもの少なからず。清国は既に台湾に於ける主権を失ひたるものなれば、我に於て清国と外国との間に存立したる條約を受け継ぐにあらずと雖も、我が政府は注意を以て、旧来の開港場に外人の住来 (ママ) 居住及其他の接遇を受けしむるに付ては、先づ彼等をして安堵せしむるを要す（下略）
>
> 十一、鴉片烟の事　新領土施政上の一大害物は鴉片烟に在れば、新制施行と同時に我が国の締盟各国との條約明文に従ひ、鴉片烟厳禁の旨を島民一般に公希 (ママ) すべし、但し施行期限を定め、徳義上商業者に商品を処分する猶予を與ふるを必要とす、此事は英国商業上に大関係あれば最も熟図せざるべからず[17]。」

すなわち日本政府は、台湾領有当初において、外国人の居留並びにアヘンをはじめとする台湾をめぐる貿易に相当神経を使っ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は、日本による台湾領有初期における台湾総督府の外事関係部署での取り扱い事項を見ても明瞭である[18]。

領事として下表の人物を報告している（明治 29 年 6 月 8 日拓殖務次官宛「本島駐在各国領事姓名、駐在地等拓殖務次官へ報告ノ件」（『明治二十九年　台湾総督府公文類纂　二十』第三文書所収）より作成）

氏名	所属国・身分	駐在地	管轄区域
グルーネンワルド	ドイツ領事代理	大稲埕	淡水（及び大稲埕）、基隆
レイヤード	イギリス副領事	淡水港	淡水（及び大稲埕）、基隆
ロングフォード	イギリス領事	台南（打狗）	台南安平及び打狗
リアリオ	フランス領事	大稲埕（位置未定）	本島一円
ベイン	オランダ領事	安平	本島一円

16 簡後聰《台湾史》（台北：五美波図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368－370

17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績志》（東京：青史社、1988（原本 1937 年））頁 215－216。

18 拙稿〈日本による領台直後期の台湾「外交」をめぐる問題－その制度的枠組みと「外交」

この「外国人居留地」と「貿易」に密接に関係するのが「淡水地区」である。既述の通り、台湾総督府は清朝統治期に形成された外国人居留地を問題視しており、1896年7月、「台湾ニ於ケル外国人雑居留地区域ヲ定ムルノ件」が閣議決定され[19]、これを承けて、台湾総督府では1896年10月に「本島四港一市ニ於ケル外国人雑居地区域擬定ノ件」を裁定し、日本政府の承認を得たのである[20]。これと同時並行的に、台湾総督府は台湾島内における樟脳・茶・アヘン等の取り扱いや貿易についても規定化を進め、清朝統治期に諸外国の商社が確立した経済的・通商的権益の抑制をおこなっ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る「淡水地域」の［国際性］とは、台湾における外国権益をめぐって、関係各国と台湾総督府との間で繰り広げられた多種多様な交渉に関連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イギリス・ドイツを主とする関係各国の外交史・通商史的視点や日本の殖民地経営史的な観点からの考察が必要なのは論をまたない。

しかし、約50年にわたる日本による台湾統治の期間の始めから終わりまで、「淡水地域」の［国際性］が「居留地」と「貿易」の観点からだけ論じられるのは勿論である[21]。

肆、「淡水地域」調査の今後

一、予備調査を終えて

既述の通り、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の台湾調査団は、2004年8月26日から29日まで「淡水地域」の予備調査をおこない、この中で淡水鎮、旧大稲埕、天母の各地区において巡検を実施した。この巡検において私たちが実感したことは次の点である。

第一に地域の急速な変化である。街並みが現代化し、古くからの都市の景観が失われていく様子に直面して、私たちは「淡水地域」の社会としての形成と変容に関する考察が必要だと考えた。またこれとの関連から、「淡水地域」の社会形成を把握するためには、過去及び現在の「淡水地域」で暮らした（暮らしている）人間のネットワークを理解することも必要不可欠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私たちの調査団に「淡水地域」に対する社会学的アプ

問題に関する基礎的整理―〉（《社会文化研究》、第7巻第1号、沖縄：沖縄国際大学社会文化学会、2004）、頁9－10頁、頁20－35頁

19 「台湾島ニ於ケル外国人雑居留地区域ヲ定ム」国立公文書館所蔵「公文類聚」第20編第13巻外事2通商2雑載

20 「外国人雑居地区域制定（明治三〇年 台湾総督府公文類纂一）」所収、第13文書；「台湾島ニ於ケル外国人居留地経界確定方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3門12類2項33号。なお、淡水における外国人雑居地区域制定の問題については、稿を改めて論じる予定でいる。

21 例えば駒込武氏は淡水中学に対する排撃問題を論じられており、教育史・宗教史等の観点から［国際性］について検討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十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ミッション・スクール排撃運動」（小森陽一他編《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の文化史7 総力戦下の知と制度 1935－55年》1、東京：岩波書店、2002）；「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を考える」（《アジア遊学》、48号、東京；勉誠出版、2003）

ローチを加味するため、都市社会学を専門とする研究者を加えることを検討している。

また、「淡水地域」の形成に淡水河及び淡水河流域の地理的条件が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も検討が必要である。したがって、地理学を専門とする研究者を加えることも検討している。

二、「淡水学」の今後

「淡水地域」を日本側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は、多様な研究視角を提供す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る一方で、当然ではあるが「淡水地域」に暮らす人たちの内面から、あるいは「淡水地域」での生活に根ざしたアプローチで、この地域を理解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

その意味で、淡江大学歴史学系が取り組まれている「淡水学学術討究」の試みは、文学や映像、建築、生活空間といった［内面性］からのアプローチが多数盛り込まれており、沖縄国際大学南島文化研究所が取り組んでいる［国際性］からのアプローチと十分に相互補完的な関係にあると言える。

外間守善の提唱した「沖縄学」と、われわれが追求しようとしている「淡水学」との間に自由かつ闊達な対話が繰り広げられることにより、「淡水学」自体の深化と広がりができるものと考える。

「焚而不燬」（Nec tamen consumebatur）
—清法戰爭時期的馬偕牧師與「耶穌聖教」

林昌華*

摘　要

「焚而不毀」的典故來自於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當中，摩西與上帝見面的故事，當上帝首次向摩西顯現的時候，就是以一株荊棘著火但卻不焚燬的形象出現。這個來自聖經的典故也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成為加拿大長老會的標誌。而馬偕在清法戰爭後，在被拆毀重建的禮拜堂正面，掛上「焚而不毀」的標誌，用以表彰「耶穌聖教」雖然經過戰火的洗禮，但是並沒有被焚燬，反倒如同鳳凰一般，經歷火的試煉而又重生。在寫回母會的報告書當中，他也是以「Nec tamen consumbatur」來向母會報告，台灣的教會已經在苦難中重生。

清法戰爭對於台灣社會來講是一個難以磨滅的記憶，因為在這個戰爭當中除了人命的損傷之外，隨後法軍因為數度登陸攻伐失利而改變戰略，對台灣進行將近半年的封鎖，使得台灣社會被關入一個前途未明的景況當中，因此社會當中許多的謠言與小道消息四處流傳，而這種恐懼後來轉化成為對於外來宗教與信徒的攻擊。因此發生多處教會遭到拆毀以及信徒被虐殺的事件。

戰爭發生的時間是在馬偕來台第 12 年時，當時馬偕的傳教工作正要進入第二階段的擴張時期，「耶穌聖教」的發展也初具規模，除了先後設立的教會以外，牛津學堂以及偕醫館的硬體建設也先後完成。原本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教會應該是會很順利的發展下去，然而 1884 年的清法戰爭和隨後對台的封鎖卻讓馬偕牧師與「耶穌聖教」遭遇到成立以來最大的衝擊。

這個事件對於馬偕牧師最大挑戰的地方，在於他要如何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當中，努力去化解一般人對於外國人以及基督教會的觀感？而他又對台灣社會所經歷的痛苦有什麼想法？

本文就是藉著馬偕牧師數種尚未正式發表的手稿與文獻，來呈現筆下的清法戰爭面貌，並且探討戰爭時期「耶穌聖教」與台灣北部社會的互動關係。

* 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中心講師。

詩的模仿：「還要多久？」

淡水桂冠詩人，1885 新年

法國人轟擊淡水，
　　如今封鎖這座港口。
儘管嘗試登陸，
　　沒能拿下任何防禦工事或是堡壘，
戰爭女神並沒有眷顧他們。
　　他們在淡水的武力堅強，但是你看吧，
他們很快就會解除封鎖；
然而，那還要多久？

如同風暴烏雲般，他們由福州前來，
　　降臨在平靜的海面上，
裝甲的加農砲如同雷聲般的巨響，
　　喚醒異教的中國人，
擊碎砲艦與軍火庫。
　　如同狂風般的航向福爾摩沙，
他們想要征服這座島嶼，
，　　然而，那還要多久？

他們重新開放貿易，
　　從事茶葉的出口以前，
現在的貿易停滯。
　　由於先生們的封鎖政策，
使得此地物價騰貴三倍，你將會瞭解，
　　陷入危機是無法避免的命運。
然而，那還要多久？

新年已經興高采烈的來到，
　　希望不久我們將會見到，
他們所說的報復結束。
然而，那還要多久？[1]

[1] 本詩摘譯自道約翰的「日記」，寫於 1884 年 12 月 31 日，當時的淡水正處於被封鎖的狀態之中，在這個詩篇當中，作者在每一段的結尾都是「然而，那還要多久？」來做結束，正是反映出在清法戰爭的影響之下，使得貿易中止物價騰貴，在新年度來到的時刻，詩人期望戰爭趕快過去，讓一切都回到正軌。詩人的心情洋溢於文字當中。相信這種心情是當時北部台灣人的共同心願吧！

一、前　言

清法戰爭原本是中國與法國爲了越南主權的爭論所產生的糾紛，但是台灣卻被迫捲入。根據大衛遜（James W. Davidson）的書《台灣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對於台灣陷入清法紛爭的源由提出他的看法，他說：

> 就在 1884 年，清法戰爭的末期，台灣雖然與整個主要的紛爭沒有什麼關連，卻被非法佔有，作為法國政府要求清國繳付賠償金額的質押品。[2]

因此在這個戰爭當中，台灣是以質押品的身份被捲入國際的紛爭當中，因此法國當初的目的只是想要短時間的佔有，以便作爲獲得滿清政府鉅額賠償的保證，因此法軍攻擊台灣在戰術的布置上就稍嫌單薄，因爲以區區的數千士兵和不到十艘的軍艦，就想要登陸和佔領北部台灣，結果當然是以失敗收場，大衛遜對於法國人的天真有以下的評論：

> 從軍事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讓世界各國印象深刻失敗的戰爭，然而平心而論，對法國方面來講，他們並不是失敗於缺乏驍勇善戰的士兵，而是因為法國統治當局的錯誤判斷，他們誤判中國人的軟弱無力，以及進對於自己軍隊參戰的過度自信，僅憑著著一小股的武力，以及有限的經費就想要進行名之為要求賠償的戰爭；而不汲營於讓國會授權進行正式的宣戰。[3]

對於清國與法國的戰爭，在台灣的人大多以「西仔反」來稱呼，所謂的「西仔反」是台灣人對於與非漢人衝突時對該事件所使用的稱呼，相類似的稱呼還有「番仔反」，所謂的「反」有反叛、作亂的意思。台灣人對於「西仔」輕蔑的稱呼，不僅止於西方人，舉凡與西方人有關的宗教與人物，都會被認定爲同一個類型，如「西仔教」、番仔教」等稱呼。而這與對於漢人「咱人」的自我稱呼是相對應的。由於那些接受基督教的人，並不參與漢人聚落當中極爲重要的神明祭典節慶活動，因此基本上是與漢人疏離的，而這些基督徒也會抱持著一般人拜偶像是「迷信」和「異端」的看法，而對拜神明的人採取輕視的態度。甚至在台灣中南部，有些基督徒自己購買土地，而形成以教會爲中心的基督教徒聚落[4]，以及基督教徒的墓園。這種基督教與本地人的隔閡，在台灣面臨外力壓迫的時候，容易成爲受迫害的對象，因爲基督徒只是台灣社會的少數人。

雖然法軍侵台的戰爭算是失敗，但是他們的侵犯所激發起台灣人的仇外情緒，卻使得同樣由西方人所設立的教會受到牽連。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後相當短的

請參考，道約翰著，《1884-5 法清戰爭北部台灣封鎖區住民日記》（The journal of a Block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p. 98.

[2]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03. p. 220.

[3] Ibid.

[4] 例如在彰化縣二林鎮的「原斗教會」，原本在雲林西螺鎮的「茄苳仔」所以教會命名爲「茄苳仔教會」，因爲該地位於濁水溪畔，常因爲大水而遭受到人命財產的損失，後來教會的信徒在黃深河傳道師的鼓舞之下，集資前往二林原斗庄，在那裡另外設立一間教會，而信徒就圍繞著教會蓋屋，而形成基督教徒的聚落，而新形成的教會就叫做「新結庄教會」，由於是基督教徒的聚落，因此他們也不會參加附近村莊的神明遶境和抽丁錢活動，因此遭到附近村落居民的敵視。以「賜我吃，賜我穿，賜我欠錢勿用免還」的諺語來譏諷他們。請參考，林昌華，「二林鎮的基督宗教」《二林鎮志：宗教篇》二林鎮公所：2001 年

時間之內，北部教會的信徒受到全面性的壓迫，數間教堂被群眾的拆毀，許多的信徒被殺，被打，或是跑到內山躲藏。牛津學堂和女學都因此而無法上課，這是馬偕在北部台灣建立「耶穌聖教」以來遭遇到最爲嚴重的打擊；然而，初代教父的一句名言「殉道者的鮮血，是建立教會的基石」，在清法戰爭的北部教會當中得到最好的印證，「耶穌聖教」並沒有在刀劍和恐嚇當中消失；相反的教勢卻在戰爭結束之後，進入第二個階段的發展期。

「清法戰爭」對於研究十九世紀北部台灣的學者來講，是一個非常有趣但卻是個極爲複雜的題目，因爲在戰爭當中所牽涉到的不僅止於清國和法國的衝突而已，這個戰爭也影響到在台灣擁有許多商業利益的英國，另外也有德國商船協助清軍載運軍火，以及軍官訓練清兵對抗敵人，甚至連日本的砲艦也來到淡水觀戰。可以說當時的淡水和雞籠成爲全世界的關注的焦點。對於清法戰爭作一個全面性的蒐集資料與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者只能擷取當中的一個層面，做一較深入的探討，這是本文努力的焦點。

二、先前研究的相關文獻

有關清法戰爭與北部台灣社會的研究向來不多，而進一步研究當時的宣教師與教會處境的文章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目前所能見到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別的研究主題的部分章節而已。[5]在這些文獻當中，筆者舉相對比較深入探討清法戰爭的兩篇文章就參考資料與研究角度的問題來討論。

（一）參考資料的問題

就先前研究者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有關馬偕當時代相關的史料有限，最常會被引用的文獻就是《From Far Formosa》(台灣遙寄)，除此之外就是《馬偕日記節譯本》。除此之外，好像就沒有什麼資料可以使用。蔡蔚群先生也看到這個問題，所以有關教案當事人的馬偕牧師的史料，他只能參考相當有限的日記節譯本，以及《From Far Formosa》的相關部分，然後將研究的主要史料置放於《英國國會文書》以及《中法越南交涉檔》等史料。[6]至於郭和烈先生的著作，幾乎全部都是以《From Far Formosa》和《馬偕日記摘要》爲主，並沒有別的史料供參考。

（二）研究角度的問題

關於清法戰爭對北部台灣「耶穌聖教」的影響，蔡蔚群的研究是放在「教案」的角度討論，[7]以教案的角度來研究，所注重的是與「案件」發生的過程，以及事件之後如何進行交涉與賠償。所採用的資料有當事人的口供、宣教師或當地駐

[5] 例如郭和烈，《宣教師偕叡理博士傳》的專書，或是蔡蔚群，《清季台灣教案研究（1859-1885）—以地方交涉爲重心》的論文，不是「清法戰爭」的議題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不然就是討論的以英中交涉過程爲主，。

[6] 請參考，蔡蔚群《清季台灣教案研究（1859-1885）—以地方交涉爲中心》，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論文，1998 年。

[7] 蔡蔚群，《清季台灣教案研究—以地方交涉爲中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8 年。

在的英國領事與滿清政府官員接觸交涉的往來公文，以及事件處理之後的賠償。然而對於整個事件文化上或是宗教上的衝突卻完全的忽視，例如在《清季台灣教案研究》中對於清法戰爭形成教案的原因，是以一句「反外成分明顯高於反教的成分」[8]來解釋，然而在行文的過程當中，卻沒有進一步討論「反外」和「反教」有什麼差別，當時北部台灣對於西方人稱爲「番仔」，稱基督教爲「番仔教」這兩者有可能分開來看嗎？而七間教會遭到拆毀，到底是「反外」還是「反教」，這是蔡文以教案的觀點無法處理的問題。由於反教和反外的差別無法區分，因此蔡文所說的「中英雙方在台的交涉呈現若干新的面貌」[9]自然就難以在他的文章當中看見。

三、本文參考的史料與文獻

（一）馬偕 1884、1885 年的日記

馬偕總共寫了 12 本日記，這些日記內容厚薄不一。例如，第一本的日記是由 1871 年底到 73 年 11 月厚厚的一本 312 頁日記。1875 年 6 月開始到 1884 年底，將近十年的時間卻只有薄薄的兩本日記，而且這兩本日記總共只有 152 頁而已，由此可以看到日記的記載並不是很詳細，然而這些的記載卻可以大致提供時間的架構。

（二）「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委員會台灣宣教相關書信彙編」（Correspondence pertaining to the Formosan Mission of the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本文簡稱「書信彙編」

書信彙編主要的文書是以「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宣道委員會」所接收到，來自海外宣教師的書信以及報告書爲主，這些書信收藏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加拿大聯合教會檔案館」（United Church Archies of Victoria University）當中[10]。與台灣相關的書信是由 1868 年開始收錄直到 1923 年爲止。

而在本文當中所使用的書信是由 84 年的 9 月 1 日開始，一直到 1886 年 2 月 5 日止，總共有 15 封信，在這當中有 10 封信是由馬偕所寫，而另外五封則是由另外一位宣教師黎約翰寫的，寄信的對象爲當時的海外宣道會主席華德羅牧師（Rev.Wardrope）。

1、1884 年 9 月 1 日，黎約翰寫給華德羅。

2、10 月 22 日，黎約翰寫華德羅。

---

[8] 同上，第 122 頁。

[9] 同上。

[10] 加拿大長老教會的相關檔案資料分在兩個地方收藏，這和 1925 年加拿大教會聯合運動有很大的關係。由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不願意加入聯合運動，因此加拿大成立聯合教會之後，1923 年以前的史料收藏於屬於聯合教會的維多利亞大學，而 1923 年之後的史料則是收藏在加拿大長老教會的諾克斯（Knox）神學院當中。

3、11 月 7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4、12 月 12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5、12 月 22 日，黎約翰寫給華德羅。
6、1885 年 1 月 6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7、2 月 9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8、3 月 12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9、3 月 24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10、4 月 6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11、4 月 10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12、5 月 1 日，黎約翰寫給華德羅。
13、5 月 4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
14、5 月 15 日、黎約翰寫給華德羅。
15、1886 年 2 月 5 日，馬偕寫給華德羅。[11]

這些書信當中，一般來講情況都算不錯，但是第 14 和 15 封信因爲墨水褪色，只留下點點的墨跡，而原始的筆跡就已經無法辨認，這是極爲可惜的事情，因爲墨水的褪色之後，除非能夠看到原稿，由鋼筆書寫過的筆跡來辨認，光憑影印稿或是微卷的字跡是無法辨認出來的。

雖然在那段時間留下來的書信數量不算很多，然而在這些書信的內容當中，卻提供相當豐富的資料，特別是當事人對於戰爭、對教會以及台灣社會的觀察記錄。

（三）道約翰的北台封鎖記（Journal of a Block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道約翰是一位當時在大稻埕做生意的茶葉商人，在淡水的「鼻仔頭」擁有別墅以及倉庫[12]，他曾經歷過清法戰爭，於是以一位當事人的身份，詳細的將戰爭的過程以及在那由駐淡水領事官處收到的公文書資料，以日記的形式在香港的「每日快訊」(Daily Express)連載。記載的時間是由法軍砲擊雞籠港的 84 年 8 月 5 日開始，直到次年的 7 月 19 日止。在日記後面加上幾篇文章，例如「雞籠與鄰近地區」、北台樟腦地區筆記摘要」。

（四）《Pak-po Tai-oan Ki-tok TiuN-lo Kau-hoe e Lek-su》（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

本書出版於 1923 年，是北部長老教會爲了慶祝馬偕設教 50 週年出版的簡史，是以台語羅馬字寫成，這本書當中最重要的是當中列舉一些曾經在清法戰爭

[11] 如果將這 15 封信與大事記當中馬偕寫信的時間對照，會發現有些書信並沒有收在這個檔案當中，這些檔案未收的資料保存在哪裡？或是已經佚失？這是一個待查的問題。

[12]1872 年 3 月 9 日當馬偕和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e）以及德馬太醫生(Dr. Mathew Dickson)到達淡水的當天晚上就借宿在道約翰的倉庫。後來馬偕他維持相當不錯的關係。

遭遇苦難信徒的故事，這些故事就成爲瞭解當時信徒經歷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五）馬偕手稿《Tai-pak e Ki-liok》

這是馬偕寫於 1894 年的一份手稿，內容是以羅馬字台語寫成，內容大致有，台北傳教的方法、北部台灣養兒育女的風俗習慣、信徒略傳、以及數間北部教會設教的過程。[13]

（六）台灣文獻叢刊：法軍侵台檔案

本檔案集大致來自《中法越南交涉檔》當中與台灣有關的資料，是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 1964 年出版，共有 5 冊。在這個檔案集當中與教會相關的史料收藏在第四冊的「台灣巡撫劉銘傳咨報台北府淡水縣屬下應教堂被匪搶毀查明賞給」，在這當中除了有英國領事官與滿清官員的來往書信以外，也有被搶教會傳道師的證詞以及教堂遭搶物件清單。

四、本論－清法戰爭與馬偕及「耶穌聖教」

「清法戰爭」的爆發，影響所及當時的台灣社會陷入戰爭的恐懼和陰影當中以外，對於馬偕和耶穌聖教來講，除了前述的擔憂之外，還要加上他們必須面對來自台灣社會一般人的猜疑甚至攻擊。整個事件發展的過程，同爲加拿大派駐台灣的宣教師劉忠堅（Duncan Macleod）在 1923 年出版的書「美麗之島」The Island Beautiful）有著簡要的描述：

> 法國的軍艦在中國的沿海造成許多的憂慮，而在 1884 年的 8 月 5 日，原先的謠言成為事實，有五艘法國軍艦接近雞籠港口，這造成北部台灣的騷動，照例基督徒就會因此成為被逼迫的對象。10 月法軍由北部海岸繞過來淡水港封鎖該地，英國領事建議偕夫人以及小孩，黎約翰夫婦，以及兩位英國的婦女立刻前往香港避難，而這位固守寸土的戰士馬偕博士，拒絕離開他的信徒而接受未知命運的施恩。在其他人離開之後，而法軍已經開始砲擊紅毛城以及附近的地區，這時的馬偕受到瘧疾激烈的攻擊，造成他有數天的時間不省人事。因此學生規勸他搭船前往香港養病。從此之後，他被迫留在香港直到法軍的封鎖結束為止。

對於宣教師和信徒來講，那真是一段極爲痛苦的時間，許多的財產遭到損毀，然而當法軍離開之後，教會就開始修理以及重建教堂。馬偕向中國官員劉將軍提出一萬元的賠償要求，藉著這些經費，他重建艋舺、三峽以及新店的教堂，而傳教的工作又恢復以前的盛況，因此看起來似乎每一次的對立，會激發更多黑暗勢力的攻擊，但卻也激發出這位無懼的宣教師更大的熱情。當戰爭的煙霧散去

[13] 關於《Tai-pak e Ki-liok》比較詳細的討論，請參考，林昌華（馬偕研究的史料問題）《2001 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史館。2003 年 第 31-36 頁。

之後，他在寫回母會書信當中寫到「焚而不燬」（Nec tamen consumebatur）」[14]。

根據劉忠堅牧師的描述，在 8 月 5 日法軍砲擊雞籠之後，基督教徒受到壓迫，10 月，法軍繞過來淡水展爭攻擊之後，淡水的宣教師以及兩位外國婦女前往香港避難，但是馬偕不願意離開，但是卻因爲瘧疾發燒的關係，在稍後不得不離開淡水直到封鎖結束，戰後他以滿清政府賠償的 1 萬元重件數間教會。如今根據新出現的史料，對同樣的過程做更爲詳細的描述。

事實上，根據所出現的史料內容，可以將清法戰爭與馬偕以致於「耶穌聖教」的關係，分成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受到排斥與敵視的階段：由於漢人的優越感作祟，因此台灣北部社會各階層，對於西方人在北部台灣各地開設教堂感到非常不滿，因爲他們認爲基督教只是個「番仔教」怎麼能夠允許他們企圖影響本地人接受他們的宗教。再加上清法戰爭當中的敵人是白種人，這個種族與馬偕是相同的。所以難保戰爭爆發的時候，西方人與西方勢力（教會）不會聯合起來，成爲法軍的內應。

第二階段，心力交瘁的階段：不管對於馬偕或是「耶穌聖教」的信徒來講，都是一段心力交瘁的受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當中，馬偕不斷接到鄉下傳道寄來的報告書，說明教會遇見的問題與困難，而馬偕牧師就需要不斷的下指令，或是尋找英國領事，請求協助解決問題。除了教會以外，他也必須到偕醫館協助對於傷病患者的醫療工作，雖然當時在偕醫館有一位原本就在那裡協助的約翰生醫師以外，還有另外一位英國砲艦上的船醫伯朗醫生協助，但是因爲前來診治的患者實在很多，另外再加上馬偕本身也擁有開刀以及麻醉的經驗，所以他也必須經常在醫館當中協助醫療工作的進行，也是因爲長時間處在亢奮的狀態之下無法成眠，所以最後馬偕發高燒，身體的狀況極爲危急，後來因爲冰塊的診療讓他沈睡數天，身體才逐漸的恢復；但是也是因爲馬偕因爲過度透支體力生病，在他身體比較復原的時候，恰巧汽艇福建號要起程前往廈門，因此在嚴清華跪求之下，馬偕安排教會事務妥當打算搭船繞一圈，吹一些海風，這樣或許會讓他的身體康復的比較完全，因此他就勉爲其難的搭船離開，但是沒有想到，當船隻到達香港之後，聽到台灣沿岸已經被法軍嚴密的封鎖，馬偕只得被困於香港無法回去淡水。

第三個階段，受困於香港的階段：那就是馬偕在香港著急的尋找任何可能的機會想要回來台灣，包括前往法國駐香港領事官，請求是否能夠搭乘法國軍艦前往台灣，但是一切的努力都無法成功。在這個階段，馬偕不斷寫信回去母會，向海外宣道會主席華德羅報告自己原本的計畫，以及事情的發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等等。後來台灣和香港能夠通書信，因此馬偕不放過任何的機會，寫信回去淡水，透過英國領事的轉交，由嚴清華處得知台灣的現況，也通過嚴清華處理北部教會的一切事務。

（一）受排斥與敵視的階段

[14] Duncan Macleod,《The Island Beautiful》Toronto: Bord of F.M.C. pp. 80-82.

馬偕在 1872 年來到淡水，雖然在主觀認定這裡上帝爲他安排的地方[15]，但事實上他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太歡迎外國人的社會環境。[16] 因爲當他在 72 年 4 月 24 日，第一次將「十誡」張貼在他所租房子的大門上時，立刻就有群眾出現，高聲咒罵，並將貼上的誡律撕下，他在當天的日記如此記錄：

> 我在居所門上貼上一張十誡，群眾聚集大聲討論，咆哮，恐嚇然後撕掉。我貼上另外一張，群眾更加激動和憤怒。投擲泥塊到門上將紙弄髒。當他們離開之後，我再貼上一張，這次群眾不再理它，但是經過我家門口時會出聲恐嚇。[17]

不僅馬偕本人受到本地人的攻擊，甚至只要與馬偕相關的人都會遭到連累，馬偕的第一個學生嚴清華就有如此的遭遇：

> 與阿華出外進入鄉間去拜訪他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一位農人。當他看到，認出我們，就立刻鄙視我們，那位農人放出兩隻大黑狗攻擊我們，而孩童也跟著喊叫，高聲的辱罵。[18]

這種敵意的態度雖然隨著時間的過去而逐漸轉淡，但是並不表示台灣人已經接受馬偕，只要是有任何的引爆的機會的話，對馬偕的敵意就會隨時爆發開來。

而清法戰爭正是引爆本地人排斥外來宣教師與教會的重要因素，馬偕的《台灣遙寄》當中有以下的紀錄：

> 1884 年夏天，數艘法國軍艦出現，很快的這個消息傳遍了北部台灣，恐懼以及憤怒的情緒四散開來，轉變成為憎惡外國人以及一切與外國人有關的事物。宣教師立刻遭到懷疑，而本地的信徒則是遭到與法國人聯盟的指控，而我們所有的信徒都受到刑求和死亡的威脅，中國的士兵在基督徒的面前磨亮他們的長刀，有時他們抓住小孩，在他們的頭上揮舞銳利的刀子，並且誓言只要那些外國的野蠻人發射槍彈，那麼就要將基督徒斬成碎片。[19]

前述這些對於馬偕懷有敵意的人，除了滿清的軍人，也有鄉下的農民與孩

---

[15] 馬偕對於台灣或淡水的情感深深的在日記當中呈現，以下的文字這是他在 72 年 4 月 7 日，的日記，當時他才剛由南部的旅行到淡水，算是他擔任宣教師的第一天：
「在淡水。閱讀、行走的時候默想許多。在這個時刻，實在沒有任何的文字可以表達出我內心的感覺，如今我服事的場域已經確定，我的靈魂得到多大的解脫啊！！！而另外一個責任卻放在我的肩頭上。看見許多美好、莊嚴和美麗的北台灣景致；當我想到上帝引導我來到這裡，而這裡還沒有人設立教會，我的靈魂因此而狂喜，因此我可以在這裡奠下基礎，上帝！請在今日幫助我，今日我將在你的面前宣誓對你的忠誠。我已經準備好在所選擇的這個地方付出我的生或死，所以請主幫助我。」請參考「馬偕日記手稿」，第一冊。

[16]馬偕來台之後第一次見到本地人和外國人的紛爭是在 72 年的 4 月 20 日，這時距離他因爲來到淡水而狂喜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下午開始準備傍晚的聚會時，發生一件糾紛，肇因於一些中國兵和幾個外國人的紛爭。前者激動的拿著刀槍由我的小屋前跑過，高喊要殺死那些「番仔鬼」。兩者發生打鬥，有的人鼻樑被打斷，有的衣服扯破，但都還不算嚴重。後來滿清官員出現，懲罰肇事的士兵。」請參考「馬偕日記手稿」，第一冊。

[17] 請參考，「馬偕日記手稿」第一冊。

[18] 請參考「馬偕日記手稿」，第一冊 72 年 5 月 2 日。

[19] George L. Mackay《From Far Formosa》Edinburg: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189.

童，他們可以說是當時北部台灣社會的一個縮影。爲什麼他們要敵視一位對他們無害的外國人？那時候的北部台灣不像曾經數度吃過外國軍隊敗戰的中國。中國人民的心裡因爲多次的戰敗賠償，而對外國人懷抱著仇視的態度；在北部台灣社會，外國商行進入大稻埕帶來的是工作的機會與商業的繁榮。然而馬偕所遭遇的卻是充滿敵意的環境。筆者認爲是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1、漢人的優越感作祟

雖然十九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積弱不振的國家，但是中國人的優越感卻一點也沒有減少。數百年來中國人「天朝型的世界觀」[20]主宰著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當馬偕前來北部台灣社會宣揚「天國的福音」之時，當然會激起本地人的敵意。

例如馬偕設教初期的一位學生吳寬裕接受基督教的過程就有以下的對話：

> 吳寬裕有次來到淡水油漆，他有一位好朋友對他說：『番仔要來設教，你的看法如何？』他就應那個人說：『枉費你的父親讓你讀書，自古以來只有「人」教「番仔」，番仔」怎麼有能力教「人」』[21]

雖然，吳寬裕只是一位油漆匠，但是當他遇見一個外國人來到淡水設教會的時候，他自幼以來受到灌輸的想法就立刻浮現開來。他直覺的反應是，只有「人」能教「番」從來沒有「番」能夠教人。由於這種態度，所以他認爲「入教」的嚴清華是非常的不應該，所以只要有機便會找他的麻煩。[22]

2、北台灣讀書人的抵制

馬偕的第一位學生嚴清華本人是秀才，他的能力及好並且識人非常廣闊，因此對出來台灣傳教的馬偕牧師提供非常大的幫助，但是當初他會願意成爲馬偕的學生實在是因爲馬偕通過了他的層層考驗，他才願意心服口服的擔任馬偕的學生。[23]對於哪些和馬偕辯論的讀書人、道士和學生來講，他們願意和馬偕辯論應

---

[20] 所謂「天朝型的世界觀」這個名詞來自殷海光先生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具有這種世界觀的中國人將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足堪被稱爲「人」的民族，而其他的民族不過是，夷狄之輩，蠻族之邦，雀舌鴃語的國度，所以十六世紀西葡向中國請求進行貿易的代表，不能前往北京，而能在澳門等待中國官員代表與他們見面。數百年以來這種世界觀，隨著通過滿清科舉考試的秀才，不斷的灌輸統治地域之內新生的子弟。所以當西方的宣教師來到台灣之時，當時漢人以「人」自居，當然不屑於西方人的「番仔教」。

[21] 陳清義編《Pak-po Ki-tok TiuN-lo Kau-hoe e Lek-su》，p. 29 馬偕日記當中，對吳寬裕的敵對行爲作一些描寫：「他習慣站在門口，對我們投擲小石塊。之後安靜由小洞中（如果門關著）望進來裡面，看裡面有什麼反應。然後他會在阿華回家的路上等他，如果有他人在場他就會拉扯阿華的辮子，打他耳光，在街上阻擋在他的道路。發出噓聲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攻擊他。現在他來到我的面前說他對他的行爲非常的懊悔。他確信偶像都是沒有益處的並且熱切的希望能多認識上帝」。請參考馬偕日記第一冊，1872 年 10 月 5 日。

[22] 同上。

[23] 根據馬偕日記的紀錄，嚴清華是在 72 年 4 月 19 日第一次出現在馬偕的面前，同月的 25 日決定要成爲馬偕的學生。在決定之前，他邀請他讀書界的朋友、道士以及和尚來和馬偕辯論基督教與台灣宗教，他邀請總共 32 位朋友分成 3 次來和馬偕辯論，這些人都在馬偕的攻擊之下安靜下來。

該是不僅止於和嚴清華的交情，更大的原因應該是他們想要用辯論的方法來讓馬偕知難而退，或至少讓他遭受一些羞辱。只不過事情的發展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除了個人的遭遇之外，馬偕也在他的手稿《Tai-pak e Ki-liok》「台北的紀錄」[24]當中記載一個名叫莊笑的信徒遭到讀書人逼迫的事情：

> 莊笑，63 歲：竹塹人，是滿清的兵頭，個性倔強脾氣很壞，常常與人在街上打架，當年在竹塹設禮拜堂，他惡言相向並且逼迫信教的人。他一次來到禮拜堂要和傳道辯論，但是傳道都以禮相待，讓他越來越明白道理。後來他悔改，要家裡的人也到禮拜堂敬拜上帝，反而遭到自己兄弟的壓迫，於是他就不再回家，住在城裡……他的兒子是讀書人，也悔改信主，於是來教堂教義學，父子二人極為熱心，但是他家裡的兄弟不甘心，城裡的讀書人也聚集起來，不准他的兒子參加科舉考試，向官員檢舉說不可以讓這個人參加考試，因為他入「番仔教」，官員准許他們的請願。。。[25]

另外還有一位名叫劉澄清的人，他自己是讀書人，也曾多次到禮拜堂要和傳道辯論，但是卻改變心意信主，然而原先他所屬的讀書人團體卻因此而逼迫他。

> 劉澄青，他是秀才住在後龍，常常裡禮拜堂辯駁道理，意思是要讓儒教勝利，辯駁一年多，但是每次都輸，他的內心很不甘願，他有一位同姓的人朋友是教會的人對他說，你這樣生氣不對，最好你禮拜天到教堂去聽講道，他答應之後，就預備很多話準備再與傳道辯論，那天傳道講人的榮光就像花草一般的脆弱，他坐在椅子上聽，聽完對傳道說，你所講的信息很好。。後來他與家人都來教會禮拜，不久之後他家裡的神主牌位和佛像都丟棄。
>
> 這個人入教遇見三件艱難的事情，1、他的兄弟和親人都對他不滿，2、讀書人都逼迫他，沒有人要和他說話，3、小孩子不再到他的課房上課，他有數年的時間沒有沒有學生。

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見，那些讀書人許多人都想要用辯論的方式來與馬偕或傳道師辯駁，如果有他們的同儕接受基督教，就會被他孤立和排擠。

3、流傳在民間的謠言影響

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府城設立教會不久，就遇見當地人謠傳外國的宣教師下毒並且挖人的心肝作藥。事實上，南台灣這種謠言滿天飛得情形也在北部出現，根據「北部長老教會的歷史」當中有一個章節提到當時流傳在台灣社會對於馬偕的謠傳：

> 在淡水設教之初，百姓講許多謠言的話，他們褻瀆毀謗說，番仔將要來設教，要霸佔我們的家產，若是入教就要破公婆（神主牌位）除偶像，用藥

[24] Tai-pak e Ki-liok 是一份馬偕以台語羅馬字寫的手稿，內容記錄有他傳教的理論、台北養兒育女的風俗習慣，北台灣的信徒列傳以及數間教會的簡史，應該是馬偕所寫的第一本「耶穌聖教」的歷史書。該手稿目前收藏展示於淡江大學校史館。

[25] 同上。

讓人吃，就會入教，就是算豬和狗，也都會跟他們去。[26]

再差人拿藥粉去街市，撒在食物的上面以及古井的裡面讓人吃，吃了馬上發作，七孔出血，暈眩倒地。」……「入教的人死，就要讓他們發落，不准人哭泣，也不准人的親戚來看，挖死人的眼睛和心肝……」「入教的人死亡，如果要上天堂，就用鐵鉤鉤下巴，吊在椅子上，椅子底下用青盆接死人汁，再用這些汁加在鴉片裡面讓人吸；如果要下地獄，用鐵鉤溝死人的腳後跟，讓他倒栽蔥，以便滴汁」[27]

上述的謠言指控，那些接受耶穌聖教的人，是因爲已經吃到馬偕所散播的藥粉所致，並不是因爲各人的選擇。並且這種藥粉極爲厲害，連狗和豬吃了都會跟隨他去。其實除了前述之外，這個說法也在暗示會跟隨馬偕的人是豬是狗而不是人。另外有關挖死人心肝和眼睛作藥的傳言，則是南北教會都有遇到的問題。

馬偕本人也在他的 1874 年的日記當中記錄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在 3 月 26 日的日記他如此記錄：

1874 年 3 月 26 日，我們前往台地上散步以及傳播福音，那個地方有許多農舍點綴在當中，我們很意外的在這個遠離城市的鄉間看到牆上貼著有關我和「耶穌聖教」的告示，告示上面畫的我長著一個長長的鼻子，手上拿著一把大刀，挖出眼睛和心肝。實在卑鄙！實在卑鄙！實在卑鄙！我們由樹上將這些告示拿下來，然後我們有意的來到一個城市叫做新莊，要看看會在那裡將會遇見什麼事情。群眾對著我們吼叫，於是前往寺廟，結果情況更為惡劣，於是我們由一群看起來隨時要下手抓住我們的憤怒人群當中走出去，半夜回到五股坑。[28]

馬偕日記的內容所顯示出來的不僅止於謠言而已，對馬偕的毀謗已經由口語的傳播變成是公開的告示，當他特意前往新莊時，卻又發現群眾對他的敵意極爲強烈，高聲的對他吼叫，並且作勢隨時要抓他。

4、外國販賣鴉片商販的連累

中英南京條約之後，滿清政府允許英國的商人販賣鴉片，而鴉片對一個國家的危害實在不是用三言兩語能夠說盡。因此不管是吸食鴉片煙者或是他們的家屬，對於鴉片真是深惡痛絕。但是因爲這是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條約，因此在馬偕的日記當中也曾記錄這個與鴉片有關，令人深感遺憾的對話：

1873 年 3 月 19 日，再度前往山谷當中教書以及向學生提問問題，遇見幾位心靈扭曲的人，當中的一個人問我說：「如果我跟隨你的話有什麼報賞？」我回答：「如果你是真誠的話，那麼會帶給你很大的快樂，而這是種快樂是白白得到的。」「噢！不用勞煩你來贈與，你們已經帶給我們快樂和咒詛混合一起的東西，你們這些紅毛番將鴉片強加在我們的身上，因

[26] Pak-po-TiuN-lo Kau-hoe e Lek-su, pp. 38-39.
[27] 同上
[28] 馬偕日記第一冊，1874 年 3 月 26 日。

此我從這個煙管當中得到所有的快樂，如果你能安排地獄的事情，請記得送給我一些鴉片煙膏，來安慰我這個可憐的靈魂。

有些人說：「你胡說八道（當時他因為吸食鴉片而陷入麻醉的狀況） 我並不怕死，死亡算什麼！十六年後，我就再將長大成年，並且擁有富裕的生活。」

前者的那位鴉片煙癮者所講的話，多少反映出當時候的人，一方面西方商人來到亞洲販賣鴉片，另外一方面西方教會來到這裡傳揚福音，這兩者當中有一個難以解開的鍊結，這對於馬偕的傳教事業帶來多大的影響實在值得探討，但是也有人原本是鴉片煙癮者，因爲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而將鴉片煙誡斷。[29]

5、本地人懼怕基督徒與敵軍裡應外合

正如馬偕在《台灣遙寄》裡面所說的，由於台灣人根本分不清楚白種人當中英國人和法國人有什麼差別，因此當他們與法軍作戰就是等同與西方人作戰，因此所有與西方有關的一切都受到懷疑，在這當中首先遭受災殃的就是地方教會。因爲這些教會與西方的勢力有關，既然是與西方的勢力有關，難保不會與法軍裡應外合，爲台灣帶來無盡的災難。以下將進一步詳述，開戰之後北部台灣的群眾對「耶穌聖教的攻擊行動」。另外再根據「台灣劉道辦團章程」的內容來看：

查拏內奸，以斷接濟也。禦敵必先清內；外寇初來，若無內奸勾結，莫知水道路線及我軍虛實，且水米食物取辦無從，日久自成坐困，勢可不攻自敗。今議敵寇臨境，凡沿海各商、漁船筏，概令收泊海口之內；無論何船何人，均不准私出海口，倘有勾通外寇漏洩軍情、接濟食物，貪利引港、私駕船筏出口者，不論有無漁網，貨物，一經團防軍民人等拏獲送官，立與斬首。每獲一內奸者，賞銀 100 元，按名給賞；船筏並給。並查明船係何人物業、係由何團何口出海？一體嚴拏跟究治罪，絕不姑寬。[30]

這個章程開張明義就說：「查拏內奸，以斷接濟也。禦敵必先清內」 這個意思就是說明，在抵禦敵人之前，就應該先將潛伏在內的內奸清除，這樣才有能力來和外敵周旋，因爲：「若無內奸勾結，莫知水道路線及我軍虛實，且水米食物取辦無從，日久自成坐困，勢可不攻自敗」，在這種思維之下，當有外侮來侵之時，最重要的並不是如何準備應戰禦敵，而是先對內部的奸細加以清除。

（二）戰爭爆發之後，群眾對教堂和信徒的攻擊

當戰爭爆發之後，台灣北部的社會在一陣的錯愕之後，群眾開始組織展開報

---

[29] 這位因爲信仰而戒絕鴉片的人是五股坑教會的陳砲，馬偕在 Tai-pak e Ki liok 當中介紹陳砲禁絕鴉片的過程：「他是五股坑的長老，最初他自己來到淡水參加禮拜，他吸食鴉片的煙癮很大，要叫他戒掉相當不容易，有一次聽見傳道說明鴉片的事情之後，他非常的生氣，決意要將鴉片戒掉。回家將所有的器具打破，當天都沒有吸鴉片，因為沒有利用別的藥品來戒癮，整天都很難過，到忍受不住就用鹽放在自己的口中，整天沒有吃別的東西，這樣一連生病十幾天，有人勸他重新在吸食鴉片，但是他回答，就算會死也不再吸食。後來自己就痊癒了。論到戒鴉片，他的心意最為堅定。」

[30]台灣文獻叢刊，《 法軍侵台檔》

復的行動，所謂的報復行動並不是去找法國人復仇，而是去找與法國人沒有任何關係的「耶穌聖教」的教堂和信徒的麻煩。根據《Pak-po Tai-oan Ki-tok TiuN-lo Kau-hoe e Lek-su》(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的的描述，在戰爭的初期，儘管馬偕與官員的交涉，在每個設有教會的鄉鎮貼上告示以便保護教會[31]，但仍然有許多的人遭到刑求或是極刑，也有教會七間教會被拆毀：

> 因為法國來打台灣，台灣的百姓誣賴入教的人，說是通番。大家決意要摧毀北部的教會，各地方的百姓準備要殺、抓、打、搶入基督教的信徒，教會的人在許多的地方遭受極為悲慘的命運。有的被歹人抓去用藤條打，有的被他們綁頭、架腳鐐和手銬。因此有人受傷有人失去生命。
>
> 禮拜堂總共被壞人摧毀 7 間，有的地方連地基石都拿走，新店的會有遭遇大逼迫
>
> ，他們的家被搶以致於無衣可穿，無物可食，並且跑到山裡躲藏，總共在新店有 36 戶被搶。在別的地方例如三角湧、和尚洲、大龍峒、雞籠、崙仔頂，歹人也來搶。那時教會的信徒四散，有的再度見面的時候，只能淚眼相對。[32]

另外馬偕在《台灣遙寄》當中，也有相類似的描寫：

> 戰爭爆發之後，對基督徒的敵意隨即出現，而對於那些聚合劫掠的暴徒來講，他們更可以更無所顧忌的行動了。戰爭不但對他們無害反倒有益。那是少數可以進行搶奪和復仇的好機會。他們高舉、攜帶黑旗、屠宰豬隻、暢飲三蘇烈酒，然後有條不紊的進行他們的計畫。看起來他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屠殺行動，而基督徒是他們有意攻擊的第一個目標，我們教會最好的 7 間禮拜堂被徹底的拆毀，而其他的教堂也遭到嚴重的毀損。大龍峒接近柯玖住家附近的教堂，暴徒拆毀教堂，在地基上用拆下來的磚土造成一個巨大的土堆，有八呎高，在上面抹上黑色的泥土，在面對道路的一邊，用巨大的漢字寫上墓誌銘：「黑鬚鬼馬偕長眠於此，他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新店，暴徒進入教堂，將講台上桌子抽屜裡面的信徒聖餐名錄拿走，然後由第一個名字開始，要讓信徒一一成為他們的受害者，當第一個名字宣布之後，有 40 或 50 人立刻趕往那人的家，將房屋放火燒毀，劫掠他們的財產，攻擊他的家人，摧毀家中的物品。由於攻擊教會房舍的事件發生的那麼突然，因此本地牧師的妻子和家人也僅以身免。
>
> 有一對年紀超過 60 歲的老夫婦，被他們帶往教堂前的河邊，然後讓他們選擇「否定上帝」或者被「淹死」。他們蔑視威脅拒絕放棄信仰。然後他們被帶往河裡膝蓋深的水裡，這一次他們以金錢作為放棄信仰的交換條件，第二次他們再度拒絕，因此在暴徒的憤怒之中，他們被拉到湍急的河

[31] 告示的內容如下：「教堂理應保護，府線出示頻仍。彼與法國無涉，避亂亦屬人情，勿與教徒搬徙，猜疑乘勢搶焚。軍民一體遵照，故違定干究懲」。這張告示應該是出現於 84 年 9 月 1 日以前，當時法軍已經砲擊攻陷雞籠和社寮島。請參考，蔡蔚群， 清季台灣教案研究（1859-1885）—以地方交涉爲中心》，第 123 頁，註 96.

[32] 陳清義《Pak-po Tai-oan Ki-tok TiuN-lo Kau-hoe e Lek-su》pp.65-70.

水當中，然後給他們第三次機會，他們再度拒絕。而是他們就此成為殉道者。對他們來講，和詆毀救主相比，死亡根本不算什麼。[33]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和組織進行這個逼迫教會的工作？根據《法軍侵台檔案》裡面所紀錄傳道的口供，那些來攻擊教會的人可以大致分成三種類型，亦即：湖南勇或淡水壯勇及眾百姓、內山會黨、地保總理等。[34]

1、勇壯或士兵

他們本來就有被賦予監視外國人的責任，而馬偕也很早就察覺到，例如在1873 年 5 月 24 日，他在竹塹就遇見有 12 名士兵跟隨在他們的身後，馬偕問他們的目的爲何，那些士兵回答是要保護馬偕和學生，但是他們的說詞立刻救被馬偕反駁，當天的日記記錄如下：

當雞啼之時，我們就已經準備好要進行另外一天的旅程，當我們走了 1 到 2 哩路，見到 12 名士兵跟在我們後面。我們停下來，我走前去詢問他們的目的為何，他們回答是奉命來保護我們，我回答他們是奉命來看我在做什麼？我們去到哪裡？打算作什麼事情？於是我說，那我們等著瞧吧！[35]

由這些士兵的目的可以看出，在基本上中國政府的官員對於宣教師是採取質疑的態度，「上行下效」之下，法軍砲擊淡水後，那些淡水和湖南的勇兵攻擊教會行動的動機就可以理解。

2、內山會黨

這個「內山會黨」團體的名稱出現在新店教會傳道陳榮輝的口供當中，他說：

8 月 15 日，晚 2 更時候，內山會黨民人聚集，先搶教民住屋物件；及四更時候，來拆教堂。共集 100 餘人，將教堂門窗戶扇以及外牆一切全行毀拆。輝見勢不佳，當即逃避。16、7 兩日，又將教民各家儘行搶劫，該會黨始返內山。聞教民劉貴夫婦被搶之後，竟將夫婦沈死水中。所供是實。[36]

根據口供，這些聚結成黨的人住在新店的內山地區，他們在 10 月 2 日拆教堂，然後根據教堂當中的信徒名錄，在後來的 2 天當中，依照名錄對信徒進行搶劫以及殺戮。這些內山會黨的人起事的時間最早，手段也最爲兇殘，可見他們似乎與其他拆毀教堂的群眾有所不同，因爲他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可見他們根本不將滿清的法律看在眼裡。馬偕的《Tai-pak e Ki-liok》（台北的紀錄）當中曾經記錄發生在三角湧地區的暴徒：

當時三角湧的壞人像鬼一樣的壞，他們每個人都說『你們靠官，我們靠

[33] George L. Mackay “ From Far Formosa” pp.191-192.
[34] 關於個傳道的口供，請參考：《台灣文獻叢刊第 192 種，法軍侵台檔，第 4 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第 536-538 頁。
[35] 請參考馬偕日記手稿，第一冊，1873 年 5 月 24 日的紀錄。
[36] 請參考：台灣文獻第 192 種《法軍侵台檔》第 538 頁。

山』，他們決意要將教堂毀掉，因此每一個到那裡的傳道不是被打，就是被搶。到法國人打台灣，他們來拆毀禮拜堂，教會的人被搶劫，許多人跑到山裡躲藏，後來官府抓一些人去砍頭，也有一些人跑入山裡被原住民殺死，後來三角湧的歹人就比較少[37]

這些內山會黨的人是否與滿清末年的祕密結社「天地會」有關，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3、地保或總理

這些人是地方的領袖，他們對於馬偕到他們的地頭設立教會，都有相當程度的不滿，所已有很多教會與當地人的糾紛，都與這些人有關。所以當清法戰爭的時候，他們會帶領群眾去拆禮拜堂。不過，如果社會環境改變，或是傳道以禮相待的時候，他們也有可能轉變成爲教會的朋友或信徒。馬偕也記錄在洲裡（今蘆洲）一個總理的故事：

洲裡有一個總理常出面來阻擋教會，他工於計謀，常常利用夜間來破壞禮拜堂，到「西仔反」他就聚集眾人一起喝酒，打鑼來拆禮拜堂，將教堂拆毀之後，就在一間廟裡演戲慶祝歡喜跳舞，說從今以後載洲裡不再有禮拜堂了，但是後來洲裡重新蓋起更大更美的教堂，讓他非常失望。他知道再也沒有辦法為難教會之後，就來與教會的人接觸，而傳道善待他讓他非常的高興。最後他自覺羞愧，就與教會成為好朋友。1893 年，偕牧師向他辭行，教會與總理都覺得不捨，於是總理就邀集地保、頭人與秀才聚會，向他們說明，明天偕牧師要起身回國，讓我們設法來向他送行，眾人都答應。於是差人打鑼，叫全街裡的百姓張燈結彩燃放鞭炮，當天有 200 多人用樂隊送他到大稻埕坐船。本來是對敵，現在變成朋友。[38]

（三）戰爭時期的馬偕

戰爭的爆發對馬偕來講，這是他來台灣傳教以來所遇見最大的事件，也是他最大的挑戰。在這當中他必須去面對，家人和其他宣教師的安危、學校和學生的教育問題、教會、傳道和信徒的安危、醫館在砲火煙硝當中如何運作的問題、如何爭取母會對台灣局勢的瞭解與關心等，幾個不同層面的問題。除了這些的問題之外，整個社會人心浮動，謠言四處散播。並且戰爭輸贏未定，相對的就是台灣的將來未明。

馬偕在 84 年 11 月 7 日一封寫給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傳道委員會主委華德羅牧師的書信當中說明戰爭對於北部教會的影響有 6 個方面：

1、所有的工作都陷入停頓的狀態。

2、雞籠現在已經不是中國而是法國人的城鎮，居民逃離那裡和社寮島（你知道在那裡有自閩虔益牧師買來的教會小屋），因此目前你可以將雞籠

[37] 馬偕手稿《Tai-pak e Ki-liok》SaN-kak-eng (三角湧)篇。
[38] 同上，Chiu-nih (洲裡)篇。

和社寮島當成是一片空白。

3、被夷爲平地（中國人的暴徒所爲），並且遭到劫掠。

4、信徒的家也遭到搶劫。

5、對於外國人的仇恨更爲激烈。

6、到處有暴動和騷亂，所有的一切在不安定的狀態之下。[39]

事實上根據馬偕書信和日記的內容來看，前述的所有工作當中，馬偕唯一能夠無礙進行的工作，只有在醫館協助照護傷患的工作而已，因爲神學院和女學都因爲戰爭的關係而停課。而教會的工作又因爲時局危險的情況，並不適合前往巡視。[40]因此，馬偕所能做的工作，就是不斷的閱讀由地方教會寄來的報告書，然後寫信回去指導如何處理，如果所遭遇的是遭遇的刑案的問題，那麼他就會前往英國領事館處，請求英國領事透過外交的途徑解決。例如，七間教會遭到拆毀搬搶，馬偕就請該教會的傳道以及信徒將被搶奪的物件編列成冊，然後再將這些資料送到領事館與官府，這就成爲後來馬偕據以向劉銘傳要求賠償的證據。[41]

除了教堂與信徒的事情以外，馬偕也參與偕醫館的醫療工作。對於偕醫館在清法戰爭所扮演的角色，大衛遜在他的著作當中有著簡單的描述：

> 馬偕博士的淡水偕醫館是他與約翰生醫生兩人負責，這個醫館提供中國的傷兵極大的幫助，由於這個醫館的存在，有許多的性命得以保全，後來孫開華將軍拜訪這座醫館，感激他們以及小金龜子號上的伯朗醫生（他在當時提供寶貴的協助）對傷者和患病的人所提供的服務。[42]

對於基督教的醫館能夠提供協助，道約翰指出是因爲滿清官員並沒有對傷患的士兵提供任何醫療上的協助，所以那些受傷的士兵自行前往偕醫館尋求醫療的幫助。

>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希望能夠找到前往淡水偕醫館的道路，在那裡他們將會受到醫館的馬偕牧師的歡迎，他的心總是隨時對他們開放，而在那裡他們將會受到約翰生醫生的極為專業的治療，就如同在中國一樣[43]

道約翰先生說明偕醫館以及約翰生醫師所提供的協助，但是他並沒有說明到底馬偕牧師在提供醫療當上的角色爲何。馬偕由 1872 年設立醫館以來，他和外國人團體的醫生一起負責醫館的運作和醫療工作的進行，當然他也會參與開刀的工作。例如在 84 年 8 月 18 日的日記記錄他參與一位士兵的截肢手術：

> 為一位士兵開刀，福建號的船長以及小金龜子號軍艦伯朗醫生在場，切下一隻手臂，傷勢嚴重。[44]

---

[39] 請參考附錄二、清法戰爭時期宣教師書信選譯，11 月 7 日書信。

[40] 有傳道寫信給馬偕，在目前敵視外國人的社會氣氛之下，請他暫時不要前往地方教會巡視，因爲這只會激起群眾的反感而已，請參考同上。

[41] 同上。

[42] J. W. Davidson《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London: Macmillan & Co. 1903. p. 230.

[43]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 Chinese war 1884-5》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p. 13.

[44] 馬偕日記第 4 本，1884 年 8 月 18 日。

自 1886 年開始馬偕對患者進行外科手術[45]，在這個之前的馬偕是擔任麻醉師的角色，所以在清法戰爭的時刻，他應該也是扮演相同的角色。然而，由於法軍開始砲擊雞籠之後，馬偕由於過度操勞因此數個禮拜的時間無法睡著，使得他的健康狀況急速的惡化，最後只得尋求約翰生醫師的治療，馬偕在台灣遙寄當中對於自己的毛病有以下的描述：

> 由戰爭開始到那一天為止，我日夜無法休息，在砲擊結束之後，我病倒並且失去意識一段時間，底下是約翰生醫生所寫的一段話，他在我生病的那段時間照顧我：
>
> 「我是照顧馬偕牧師的醫生，他自戰爭開始之後因為工作的負擔過重，加上擔憂地方教會信徒的安危，再加上淡水炎熱天氣當中惡劣空氣，而造成急性腦膜炎（meningitis cerebralis acute），很長一段時間當中，他無法睡眠，而這更造成他全身的衰竭，在那段時間當中他的體溫一直維持在 102 度左右。有一天身體狀況似乎已經惡化，每一個人的見解都認為那是致命的危險，而所有的藥物都無法使他成眠，幸好我聽見海龍號載運一些冰塊送給道約翰先生，在我的要求之下，道先生將所有的冰塊贈送給馬偕來讓馬偕滾燙的腦部降溫，當冰塊使用之後，他立刻進入 36 小時深沈的睡眠，冰塊逐漸融化，但是他的生命得到拯救而甦醒過來。」[46]

馬偕是在淡水砲擊之後，因爲無法成眠而引發急性腦膜炎而病倒。在後來康復之後，他大概暫時離開治療患者的工作，而需要更多的休息。因此清法戰爭時期他在偕醫館的服務只到淡水砲擊之後就告一段落。

（四）馬偕受困於香港

10 月 11、12 日，福建號和海龍號先後來到淡水，當時在淡水避難的外國人婦女與小孩根據領事官的命令，先後離開淡水前往香港避難。在這些人當中包括馬偕的親人以及宣教師黎約翰夫婦，雖然身體極爲虛弱，但是馬偕並不願意離開淡水。

但是在船隻離開以後馬偕的學生嚴清華一再地懇求馬偕離開那個充滿戰爭與危機的所在，甚至爲此而跪下來。馬偕經不起學生一再地請求，所已將教會和信徒的事情作一些安排之後，就在 21 日搭乘「福建號」繞經廈門前往香港。但是沒有想到當他到達香港之後得知，台灣的港口已經被法軍封鎖。

1、心裡的不平與焦慮

受困在香港的馬偕內心非常的沮喪和著急，由於被困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因此他的內心完全沒有準備好，這種心情甚至在他離開香港以前都還存在，在 1885 年 4 月 10 日寫給華德羅的書信當中，表達了心裡的遺憾：

---

[45] 馬偕第一次的手術是爲一個年輕人的眼睛開刀，筆者認爲依照當時的醫療技術程度，應該是處理倒睫毛之類的疾病。請參考馬偕日記，第 6 本，1886 年 4 月 19 日的紀錄。

[46] G. L. Mackay,《From Far Formosa 》p.195.

阿華……如果不是他，我就不會在這裡了，可憐的同伴，當時是他跪下來請求我搭船去繞一圈…[47]

這種不平的心理在他剛到達香港的時候顯得更爲強烈，在 84 年 11 月 7 日滯留香港後寫給華德羅的第一封信說，他是在違背個人意願下留在那裡，而他從來不曾遇到這種打擊，信中如此寫道：

我們的人是在違背個人意志下被迫留在這裡，對我來講特別是如此。在淡水砲擊以及法軍幾次的登陸攻擊失敗之後，英國領事費德來以及港內英國砲艦「小金龜子號」的艦長命令所有的外國婦女必須搭乘第一艘汽船離開。根據這個命令，黎約翰夫人、馬偕夫人和孩子準備與其他人一起出發；由於黎約翰牧師還在學習語言，並且對於北部台灣的工作尚未熟習，我們一致認為他最好陪伴其他的人先離開，留在香港直到這裡恢復平靜為止。

我決定留下來———

他們在 12 日搭上一艘汽船，並且順利的到達目的地，並且立刻在當地租到一間房子居住。自從雞籠遭到砲擊以致於後來戰火波及到淡水以來，我很少入眠再加上當時我遭受到最為嚴重高燒，使得我的生命一度徘徊在生死的關頭——實在感謝黎約翰先生以及學生細心的照顧，讓我很快就得到復原。然後他們許多人懇求我搭船做短暫的旅行，他們認為吹一些海風會讓我的身體恢復體力。

在仔細考慮過整個教會的情況之後，我接納他們的看法。

因此在 21 日，我搭船繞經廈門前往香港，本來打算立刻回來淡水，（我只打算搭著汽船繞一圈而已）——

唉！唉！唉！當我剛剛到達香港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台灣的港口已經遭到封鎖了。

我搭乘前往廈門的汽船回去淡水，但是船隻不准靠岸，甚至連送一封信給停泊在港內的英國砲艦都不被允許。於是她立刻掉頭回去廈門。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打擊。

2、尋找機會回台灣

由於他是在被迫的情況下被迫留在香港，因此他急切的想要回淡水的心情非常的強烈，可能是由於在淡水時，和英國領事合作得非常愉快，使得他認爲大概法國的領事應該也是可以就像在淡水一樣的方便，所以他曾經前往法國派駐在香港的領事處拜訪，希望能夠有機會搭載法國前往淡水的軍艦回台，但是他的請求被法國的領事拒絕了，在 11 月 7 日的書信他如此寫道：

我為了安排搭法國軍艦回去淡水的旅程，曾經去接觸此地的法國領事，但是被告知這種事情是不可以做的。[48]

---

[47] 馬偕在 1885 年 4 月 10 日寫給華德羅的書信，請參考附錄二，「清法戰爭時期宣教師書信選譯」第 6 封。

[48] 請參考附錄二、宣教師書信選譯，第 2 封信。

雖然無法搭法國軍艦回台，但是他離開淡水時唯一沒有安排的事情，就是傳道師的薪水，以及教會工作可能會需要的金錢支出，他完全沒有安排。幸好法國軍艦的通融，願意爲他帶一封信前往淡水，於是他馬上寫一封信給淡水德記洋行的商人，請他支付嚴清華所需用的款項，安排好這件事情之後，總算讓他的心情得到些許的慰藉。他在書信中說：

> 黑暗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亮光」，昨天聽說有一艘法國軍艦同意帶一封信，因此我毫不延遲的立刻寫一封信給淡水的德記洋行（Tait & Co.），請他付款給阿華教會所所需用的所有款項—— 真是輕鬆！真是輕鬆！耶穌掌管萬事！[49]

雖然在寄給德記洋行的事情讓他的心情獲得些許的放鬆，但是他想要回去淡水的心情卻沒有隨著時間的過去而稍減；除此之外，他的心裡也會推想，如果法國真的佔領台灣，而法國的天主教會派駐大量的天主教神父，那麼他辛苦建立的教會規模是否會因此而毀於一旦，他想到這裡心裡就因爲恐懼而顫抖。

> 自從離開淡水直到現在，那裡一切都算平靜。唯一能夠安慰我這滴血的內心的是就算我在淡水也沒有辦法協助信徒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事情。
>
> 然而，能夠在當地，就在那裡，如果需要我願意犧牲性命，死在傳揚福音多年的可憐的人群當中，我也願意。
>
> 當我想到假如法軍攻陷佔領台灣之後，天主教的神父充斥在我所愛的台灣島時，我的內心恐懼顫抖[50]

他所憂慮的事情終究沒有發生，但是情況也沒有轉變，馬偕只能在焦急中耐心的等帶回去的日子來到。然而在等待之中，馬偕也開始思考台灣教會將來的發展方向，在他困居香港時寫回母會最後一封信就提出他的一些規劃藍圖，當我提出另外再派一位宣教師來台的意見之後，曾經多次被詢問，此事我懇求教會或是海外宣道會容忍以下所寫的內容：

> 我從來不曾想過藉著讓另外一個人駐在社寮島上來分割教會，社寮島上只有一些漁夫。牛津學堂是在淡水，而將資源集中是我們所需要的。
>
> 至於社寮島上的小屋，空間只容許讓一個歐洲人住在裡面，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在那裡住好幾個禮拜，而上一次巡視教會並沒有在那裡享受。最多只在那裡數禮拜或數個月轉換環境。
>
> 在淡水的外國人團體當中有一位英國醫生，他極為樂意協助醫館的事情。但是我認為讓傳道在各個不同駐在的教堂分發藥品給患病的人使用，所產生的效果比淡水醫館要大得多。
>
> 我相信中國只能被他自己的子弟改變，現在我們有很多人能夠執行這個工作，不管是在學院、在女學或是不管任何地方，用任何方法都能順利的進行。
>
> 讓我們使用他們，我再重複，讓我們使用他們。這樣他們將會越來越覺得

[49] 同上。

[50] 宣教師書信選譯，第 3 封信。

那是「本土」的教會，因此他們將會為這個教會祈禱、努力與付出；而不會一直等待來自加拿大或是別地方的協助。

我相信一間獨立而本土的教會，就是能夠自養的教會。當然這件事情必須逐漸成形，但是我們必須朝這目標前進。

我們當然是需要經費的協助，特別是在這個段時間試煉之後更是如此，我認為我們做工的力量是很強大的。[51]

在這個書信當中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台灣應該建立起能夠自養自傳的本土的教會，其實當他到達淡水的初期就有這種想法，因此他傳教和訓練學生的工作是一起進行的，這個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間自立、自養、自傳的教會。

他的想法也出現在後來的《台北的紀錄》或是《台灣遙寄》當中，[52]然而他的想法真正實現的時刻要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才得到真正的實現。

另外就是有關醫療的問題，在書信當中指出，雖然在淡水有外國人團體的醫生很願意協助醫館的治療工作，但是他認爲，如果訓練所有的學生讓他們能夠進行簡單的診斷與治療，那麼集合他們所帶來的功效，一定要比只依賴淡水偕醫館更好。

事實上馬偕開始教導學生之後，他就已經開始在教學的內容當中加入解剖、藥理、到醫館觀摩以及分發藥品的功課，這些的功課的目的就是要求學生必須學會與醫療有關的技術。在馬偕的晚年，英國長老教會的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醫生曾經來爲馬偕的幾位學生舉行考試。雖然後來日本政府成立醫學校，再加上衛生當局嚴格取締沒有得到醫療執照的人從事診療的工作，神學校不再訓練醫學相關課程，但是後來有許多的牧師娘兼任產婆（助產士） 這未嘗不是馬偕理論某種程度的實現吧！

（五）馬偕回台與重建

被迫留居香港半年之後，馬偕得知法國政府已經放棄封鎖台灣的政策，並且汽船海龍號正準備啓航前往淡水，聽到這個消息的馬偕就立刻安排回台的準備，他在 4 月 8 日的日記如此記載：

聽說海龍號將起程前往淡水，於是立刻前往詢問，回家後立刻帶著偕夫人、小孩，葉順以及堅木嫂前去照相，買好前往淡水的船票之後，回去安排一切事宜。[53]。

海龍號在 10 日啓航，一切的等待都已經成爲過去，當時的馬偕心情一定是極爲高興，因爲在離開的前一天，馬偕上床卻無法成眠。但世上第似乎有意在馬偕最爲高興的時刻潑他一盆冷水。因爲當 15 日船隻來到淡水港外卻碰見兩艘法國的軍艦，他們阻止海龍號繼續往前行，否則要開砲將船隻擊沈，於是馬偕

[51] 請參考宣教師書信選譯，第 6 封信。

[52] 例如「Tai-pak e Ki-liok」的第一篇，「論台北的法度」或是《台灣遙寄》第 30 章「訓練本地的牧師」以及 32 篇「以本地人來對婦女進行傳教」等都是一樣的想法。

[53] 馬偕日記第 5 本，1885 年 4 月 8 日。

所搭乘的海龍號只得轉向，但是那時船隻實在是已經非常接近淡水港。甚至站在港邊等待的學生身影都可以看見，但是就是不能登陸，當天的日記記下了他的忿怒：

> 航行通過狂暴的海浪前往淡水，看見兩艘法國的軍艦，我們的船由他們中間開過去，一艘船立刻發射空包彈，而另一艘船的砲彈由我們船隻上方飛過，當時我正在船橋上，看見另一艘軍艦想起軍號，轉向將砲口對著我們。於是我們緩慢的開往外海，我們的船長登上當中的一艘船，得知如果再靠近一點的話，船隻會被擊沈。於是船隻轉向前往廈門。船上可以看見站在牛津學堂前的傳道與學生在那裡望著我們。已經那麼接近但卻不能登岸，實在令人感到沮喪。戰爭、戰爭、法國人，你給我記著今天的事情。[54]

登陸不成海龍號轉往廈門最後到達澎湖，再與法國指揮官協調之後，最後獲准靠岸。在經過這些的折騰之後，船隻最後終於在 19 日靠岸，當天馬偕的日記如此記載：

> 在船上可以望見淡水，已經沒有看到法國軍艦，船隻停妥之後，我步下甲板，約翰生醫生來與我相會，我們一起走上山坡。
>
> 和學生、傳道和信徒見面，大家實在都很高興，有些人流下眼淚，所有的人都歡喜快樂。[55]

（六）清法戰爭對馬偕與「耶穌聖教」的意義

清法戰爭對於馬偕與設立才 12 年的「耶穌聖教」來講，是創建以來所遇見最大的危機，這個危機不僅止於信徒受到壓迫而離棄基督教的信仰。另外，如果法軍正式佔領台灣，而天主教會隨之而來接收宣教師先前的成果，那麼他們回台之後將會是另外一場艱難的苦戰。但是最後因爲教會的信徒並沒有因爲威脅而放棄信仰，再加上法國政府戰略的規劃改變使得危機沒有變爲事實。

但是這個事件對於馬偕與後來教會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對於馬偕來講，清法戰爭結束之後，因爲先前淡水偕醫館努力的救治傷患，使得北部地區群眾對於他的疑懼消失，而以「好人」或「偕牧師」來稱呼他。於是馬偕得以擺脫戰爭的陰霾，充滿信心的全力擴展教會在北部台灣的版圖。8 年之後，當馬偕第二次返國休假的時候，他所建立的教會數目到達 60 所之數，而這個擴展的的轉捩點就是清法戰爭。

對於「耶穌聖教」來講，清法戰爭所帶來的就是「焚而不燬」的精神。1923 年「Pak-po Ki-tok TiuN-lo Kau-hoe e Lek-su」回顧清法戰爭那段時間，雖然教會遇見極大的困難，但是因爲信徒堅定的信仰以及上帝的祝福，所以教會能夠在經過風雨而屹立不搖。

> 雖然遇見逼迫，教會仍然屹立不搖，沒有放棄上帝。禮拜堂被拆毀之後，偕牧師與傳道師前往新店，到達之後發現禮拜堂已經不存在，因此他們就

[54] 同上，4 月 15 日。
[55] 同上，4 月 19 日。

在地基上吟詩祈禱，世俗人圍在四周觀看，感覺相當詫異。經過 3 年之後，新店已經重蓋新的禮拜堂，教勢也比較興旺。有會友寫信說，雖然他們遭到劫掠，也經歷悲慘的遭遇，然而他們家業已經再度恢復。上帝實在疼愛他們。

戰爭結束之後，馬偕將劉銘傳所賠償的 1 萬元建立 4 間建有尖塔教會教堂[56]，在教堂上面有「焚而不燬」的標誌，爲的是紀念北部教會的堅持信仰的精神。

五、結　論

清法戰爭原本是中國政府和法國爲了爭奪越南的主權而爆發的戰爭，出乎世人的意料之外，這個戰爭竟然延燒來到台灣。由於這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戰爭，因此同樣是由西方人所傳布的「耶穌聖教」 就遭受池魚之殃。

清法戰爭對於馬偕和「耶穌聖教」影響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受排斥與敵視的階段，而台灣人排斥敵視外來宗教的原因有，漢人的優越感作祟、北台灣讀書人的抵制、流傳民間的謠言之影響、受外國販賣鴉片商販的連累。以及本地人懼怕基督徒與敵軍裡應外合。

第二階段，就是本地的教會與信徒受到攻擊，而根據後來傳道口供的分析，當時帶領人來攻擊教會的有勇壯或士兵、內山會黨，以及地保和總理。這三類人當中的勇壯或士兵，他們本來就奉命監視外國人的在台活動，因此在戰爭的期間，將與外國人有關的教會拆毀是可以理解的。內山會黨本來就是亡命之徒，由他們逼迫信徒放棄信仰可以推測，他們具有某種的宗教色彩，但是因爲所蒐集到的資料有限，需要再作進一步研究。至於總理和地保們則是地方的領袖，因爲受到前述原因的影響，對耶穌聖教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是他們對教會的敵視並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只要環境改變，他們的想法也可能會跟著改變。

第三個階段，就是馬偕被迫留在香港直到戰爭結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當中，馬偕想盡辦法要回來淡水，但是因爲法國政府嚴格的封鎖政策，因此馬偕的回台計畫，一直都沒有辦法實現。被阻隔在香港的馬偕所能作的，就是利用每次可以和台灣通信的機會，指示嚴清華如何處理教會的問題。另外就是寫信回去加拿大母會，喚起教會人士對於台灣局勢發展的關心。這種情況要到次年（1885）4 月封鎖解除，回到淡水爲止。

清法戰爭雖然對馬偕來講是他到達台灣之後所遇見最大的危機，但是因爲淡水偕醫館在戰爭期間，努力照顧傷患的事實，贏得中國官方的讚揚，相對的也使得台灣人對於這個外國宗教的疑懼消失，戰後馬偕得以盡力擴展教會在北部台灣的版圖。

對於「耶穌聖教」的信徒來講，雖然在戰爭的期間他們遭受很大的苦難，但是因爲信徒在遭受苦難當中仍然堅持信仰，所以戰後馬偕以「焚而不燬」的圖像和文字畫在新建的 4 間禮拜堂上面，以紀念這次試煉。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這種

[56] 這 4 間教會是新店、錫口、艋舺、枋隙（今大稻埕教會前身）。

全面性的逼迫當中，讓信徒再度思考基督教信仰對他們生命的意義，也是有了這次的經驗，教會才能在 10 年後再度蒙受苦難時，有更大的力量來面對。

歸結來看，1884-5 年間的清法戰爭對於馬偕牧師和「耶穌聖教」來講，至少呈現出二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偕醫館」的馬偕牧師和約翰生醫生，一視同仁醫療照護受傷的士兵與民眾，使得中國官方以及一般的民眾，對於馬偕牧師和他所傳的「耶穌聖教」有了不同的評價。第二，「耶穌聖教」的信徒面對全面性嚴峻的考驗，信仰基督教，不再是如同一般人所說的有「番仔勢」可以倚賴，反倒是因爲接受基督教會面對苦難的命運。這是第一次，全教會的信徒必須去思考「殉教」（Martyrdom）的議題。

附錄一、清法戰爭相關大事記：

1、引用史料：

「道」：道。約翰「1884-5 年法清戰爭時期北台被封鎖住民日記」"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檔」：台灣文獻叢刊：『法軍侵台檔」

「日記」：馬偕日記手稿（Journal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1901）

「書信」：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委員會台灣宣教相關書信彙編」

(Correspondence pertaining to the Formosan Mission of the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2、事件大事記

1)、劉銘傳抵達台灣，前往雞籠巡視軍情，在當地舉行閱兵，士兵攜帶旗幟，也有士兵發射槍枝，作爲對劉銘傳的致敬，但是這些舉動引起停泊在港內的法國軍艦的疑懼，因此砲艦 Parseval 號艦長下令清除甲板準備進行先發攻擊，幸好錯誤的判斷及時被發現，因此戰爭的危機解除。（道）

2、武裝快艦 Villar 號抵達雞籠，造成居民的驚慌以及外國人的焦慮。因此英國領事前往雞籠與滿清官員和法軍艦長會商，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必須要保護外國人的安全。（道）

3、德國的汽船抵達雞籠港，船上載運彈藥、水雷、電報線等物資。但是法國軍艦拒絕讓這些物資登陸，由於恐怕因此和法軍發生衝突，因此中方要求船隻轉往淡水卸貨。（道）

1884 年

7 月 30 日，英國軍艦「金龜子號」（Cockchafer）到達淡水，這艘艦艇的到來讓淡水的外國人心裡獲得很大的支持。（道）

8 月 4 日，來自雞籠的書信指出，法國的巡防艦 Galssioniere 以及砲艦 Lutin 到達雞籠，艦隊統帥聲明，除非中國將雞籠港交給法國，不然艦隊將會在 8 月 5 日開始砲擊雞籠港。這個要求被台灣的統治當局拒絕。（道）

8 月 5 日，早上 8 點，法軍開始砲擊雞籠，雞籠砲台也開砲回擊，然而因爲法軍的威力強大，因此砲台上的守軍死傷慘重。（道）

在砲擊過後，一隊法國士兵登陸雞籠港，士兵並沒有攻擊雞籠的居

民，而外國人則是登上德國的帆船 Johann Carl 號，他們由那裡登上小艇 Alice 號，前往英國砲艦「金龜子號」 而留在那裡的外國人只有海關關員 Brownlow 以及 Grant。

位於大稻埕的茶葉貿易因爲戰爭的關係而關閉，而每一家外國的商行由 5 位士兵看守，以防止盜匪的劫掠。 (道)

8 月 6 日，法軍 200 位陸戰隊員登陸雞籠，並且開始構築防禦工事，由於法軍人數不多，因此遠本躲在山上的清軍發起攻擊，有四方包圍工事，法軍只得退回船上，在攻防的過程中，清軍報告有超過 100 位法軍被殺或受傷，稍後更正數字爲 15 人被殺，65 人受傷。然而事實上，只有 1 位法軍陣亡，6 位受傷。 (道)

另一個消息是，劉銘傳因爲害怕法軍佔領雞籠港東邊 6 哩外的煤礦礦區，因此下令焚燬該地的煤礦堆，並且將煤礦工廠和機具銷毀。 (道)

率領華兵作戰的指揮官是劉銘傳屬下的總兵曹志忠、章高原。 (檔)

清軍在淡水河的入口處放置六枚水雷，以防法軍攻擊與登陸。 (道)

8 月 9 日，湯瑪士。胡德（Thomas Hood）班特列（Bentley）搭上德船維勒號（Welle）繞過去雞籠觀看被擊毀的砲台等物。指揮艦爲「拉。加理松號」 (La Galissonniere）是一艘巡防艦(Frigate)。我們登上參觀全艦。 雅拉號」是一艘輕武裝快艦（Corvette），魯丁號」是砲艦。 (Gunboat） (日記)

8 月 11 日，另外兩艘法國軍艦入港，使得雞籠港內的艦隻達到 5 艘之數。 (道)

英國領事首度對居台外國人發出警告，在局勢穩定以前，留在前往或是留在雞籠者，必須自行負擔風險。 (道)

8 月 12 日，法軍力攻滬尾，被提督孫開華所敗。 (檔)

8 月 16 日，景美、新店禮拜堂，被在地王、張、林、劉各姓民人拆成平地。 (檔)

8 月 17 日，由於滿清官員對於傷患士兵並沒有提供任何的醫療安排，因此有數位受傷嚴重的士兵由雞籠前來淡水偕醫館尋求馬偕牧師和約翰生（Dr. C.H. Johansen）醫生的治療。 (道)

8 月 17 日，艋舺八甲禮拜堂、水返腳禮拜堂、錫口禮拜堂、大龍峒禮拜堂、和尙洲禮拜堂、均被在地土匪拆毀，各處教民均遭搶劫。 (道)

8 月 18 日，領事再度警告，在目前的局勢之下，外國人不要前往鄉下地區旅行。 (道)

8 月 18 日，爲一位士兵開刀，福建號的船長以及小金龜子號軍艦伯朗醫生在場，切下一隻手臂，傷勢嚴重。傍晚時分費德來領事，伯朗醫生、阿許敦（Ashton）先生、海關的傑克和夫人、來自福建號的瑪堅泰先生，以及小金龜號上的水兵聚會。 (日記)

8 月 19 日，鄉下的村落地區霍亂肆虐，造成許多人的死亡。這是每年必定會發生的事情，因此每天都有神明繞境。 (道)

8 月 31 日，「金龜子號」前往雞籠將在當地服務的海關關員接來淡水，關閉那裡的業務。 (道)

9 月 1 日，領事公告，由於一些載滿石塊的戎克船以及鑿沈於淡水河中，如果有友好國家的船隻進港，清軍將會派遣領航員引領船隻平安入港。（道）

黎約翰寫信給華德羅，向他報告自從 8 月 5 日雞籠爆發戰事以來，教會和社會的狀況。（書信）

9 月 14 日，法國軍艦 Lutin 號來到淡水港外，軍艦向「小金龜子號」做信號要求該英艦提供領航員，但是遭到英國軍艦的婉拒。（道）

10 月 1 日，法提督孤拔攻陷雞籠砲台，劉銘傳退淡水。（檔）

有報告指出，法軍將於明日砲擊淡水。已經有兩艘法國的裝甲艦到達淡水港外。（道）

領事官要求住在大稻埕的外國商人將財物、鴉片與茶葉運往淡水暫收於那裡的外國商行 D. Lapraik & Co.。（道）

10 月 2 日，法軍砲擊淡水，天氣晴朗。（日記）

清晨 6 點 50 分，清軍首先向法國軍艦開火，而法軍也隨即回擊，拉開法軍砲擊淡水的序幕，砲火持續 13 小時。（日記）

10 月 2 日，清晨 2 點，內山會黨群集，先搶教堂物件，8 點時來拆教堂，共有 100 餘人，將教堂門窗以及外牆一盡拆毀。（檔）

10 月 3 日，有報告說雞籠遭到劫掠。而劉銘傳與 1000 名士兵逃往艋舺，居民發現他打算將財物、金錢以及裝備捲走逃往竹塹，於是將圍捕將他關在一間廟宇當中。（道）

10 月 4 日、早上 8 點，湖南勇以及群眾圍聚教堂，隨即將水返腳教會拆毀；（檔）

早上 8 點，先有地保等 8 人闖進錫口禮拜堂，聲言要殺傳道、教民，將門窗一切亂打，隨即將教堂拆毀；（檔）

下午 4 點，艋舺八甲禮拜堂遭到淡水勇壯率領 10 餘人，將教堂拆毀（檔）

晚上 6 點，土民率眾圍繞大龍峒教堂，隨即將教堂拆成平地（檔）

晚上 9 點，總理李明章、保長李乞、李藏益聚眾來圍和尚洲拜堂，聲言要殺傳道、教民。教堂被拆毀成爲平地，所有物件儘被搶奪。（檔）

10 月 8 日，法軍在滬尾登陸，爲提督孫開華、章高員等所敗，退回艦上。（檔）

10 月 12 日，黎約翰夫婦，馬偕夫人以及小孩離開淡水。（日記）

10 月 21 日，馬偕與葉順在下午 5 點登上福建號。（日記）

10 月 22 日，領事官發佈來自法軍海軍司令官孤拔的消息，法軍即將封鎖台灣的海岸，這個命令是在 20 日於雞籠簽署。2 天之後才到達淡水的領事官署。（道）

黎約翰由香港寫信給華德羅，內容爲報告法軍砲擊淡水以及外國人撤退到香港的過程。（書信）

10 月 25 日，馬偕與葉順搭道格拉斯號到達香港，在那裡聽見台灣遭到法軍嚴密的封鎖。（日記）

11 月 2 日，法軍攻陷雞籠港口。（檔）

11 月 7 日，法國軍艦載送郵件前往淡水，於是馬偕立刻寫信給英國領事、嚴清華、約翰生醫生。 (日記)

馬偕寫信給華德羅，報告他前來香港的過程，並且強調他是在違反個人意志之下，被迫留在香港。 (書信)

11 月 10 日，寫信給加拿大海外宣道會主席華得羅先生，書信的內容是有關被困在香港以及法軍攻台的影響。 (日記)

1、所有事情都陷入停頓的狀態。

2、神學院和女學堂停課。

3、教堂被夷爲平地，信徒的家被劫掠。

4、台灣人對外國人的態度更加惡劣。

5、整個社會充滿混亂。 (日記)

11 月 24 日，寫信給麥拉蘭先生，內容談到台灣教會的現況。 (日記)

12 月 12 日，法軍增援雞籠。 (檔)

馬偕寫信給華德羅，內容提及南北的宣教師都被迫撤到香港，然而台灣的傳教工作在他離開之前也已經陷入停頓的狀態，學校停課，而雞籠和社寮島上的居民因爲法軍登陸而逃離一空。最後提到淡水的工作，他被迫留在香港使他的內心滴血，他想盡辦法要回去淡水，就算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書信)

12 月 22 日，黎約翰寫信給華德羅，內容是有關馬偕被迫來到香港之後的狀況，對於先前淡水的信徒所遭遇到的苦難因爲撤退到香港而無法協助，實在感到非常的難過。 (書信)

12 月 23 日，命提督孫開華幫辦台灣軍務（檔）

1885 年

1 月 15 日，中午的時分，亞伯。蘇立飛來訪，他是芝加哥和紐約論壇報以及舊金山記事報的記者。 (日記)

1 月 16 日，馬偕寫信給華德羅，內容提到亞伯。蘇立飛先前到淡水訪問他，後來因爲台灣遭到法軍的封鎖而無法離開，對照自己被迫留在香港，在書信中他說，「他被關在裡面，而我卻被關在外面」 (書信)

1 月 23 日，香港總督下令禁止法國軍艦前來香港運煤。寫信給上海的顧力克（Gulick）內容是有關北部台灣的紛爭，以及 7 間教會夷爲平地的事情。傍晚時橋云（Colquhoun）以及福特前來拜訪，討論台灣現在的狀況。 (日記)

2 月 4 日，寫信給淡水領事，裡面附有交給阿華的書信。 (日記)

2 月 9 日，寫信給華德羅，裡面的內容提及雞籠有一個人敲擊未爆彈而爆炸身亡、一位中壢的信徒受難，阿華現在根據我的指示處理事情。而領事官對教會的協助很大，我的內心很悲傷，但是並不灰心。不論是法國還是中國統治台灣，都將再度回去傳教。 (日記)

3 月 5 日，法軍自雞籠西犯月眉山、暖暖，防軍敗潰。 (檔）

3 月 9 日，繞過去香港，拜訪馬雅各醫生，然後他們夫婦也過來家裡，但是沒有留下來晚，很快就離開，然而和他們相處的時間實在愉快，馬雅各看起來身體狀況不好，真是高貴的馬雅各，晚上夢見加拿大的故鄉。 (日記）

9 日，馬偕的母親過世。 (五月初才收到消息） (日記）

3 月 10 日，收到阿華的信，只出現在雞籠每天都有戰事。但是並沒有決定性的勝利出現。 (日記）

3 月 13 日，寫信給華德羅，提到阿華信中的內容，當地還算平靜，在雞籠有 8000 名法國士兵，10,000 名中國兵，在淡水有 4000 名中國兵，八里坌 1000 名，干豆 2000 名。 (日記）

3 月 20 日，寫信給華德羅，告訴他淡水附近算是平靜，法軍已經佔領雞籠附近的山頭，信徒都算平安，沒有進一步的騷擾出現。 (日記）

3 月 24 日，馬偕寫信給華德羅，內容是根據他由淡水獲得的消息，目前法軍已經佔領雞籠周圍的山頭，而清軍損失慘重 2 、在淡水一切都算平靜，3、信徒沒有進一步受到騷擾。3、會在將來列舉信徒所遭受損失的清單，目前止能嚴密的注意事態的發展。 (書信）

3 月 29 日，澎湖失守（檔）

4 月 6 日，馬偕寫信給華德羅（日記）

4 月 8 日，聽說海龍號將起程前往淡水，於是立刻前往詢問，回家後立刻帶著偕夫人、小孩，葉順以及堅木嫂前去照相，買好前往淡水的船票之後，回去安排一切事宜。 (日記）

4 月 9 日，與馬偕夫婦與葉順前往海龍號的碼頭，得知汽船將在明天啓航，回家之後，孩子聽到都非常高興；上床之後無法成眠。 (日記）

4 月 10 日，中午 12 點登上海龍號，3 點轉往另一艘汽船一段時間，然後再度回到海龍號啓航，海面非常不平靜，海浪很高，看見失事的船隻，汽船轉向北航。 (日記）

4 月 15 日，法軍艦解除對台灣封鎖。 (檔）

4 月 15 日，航行通過狂暴的海浪前往淡水，看見兩艘法國的軍艦，我們的船由他們中間開過去，一艘船立刻發射空包彈，而另一艘船的砲彈由我們船隻上方飛過，當時我正在船橋上，看見另一艘軍艦想起軍號，轉向將砲口對著我們。於是我們緩慢的開往外海，我們的船長登上當中的一艘船，得知如果再靠近一點的話，船隻會被擊沈。於是船隻轉向前往廈門。船上可以看見站在牛津學堂前的傳道與學生在那裡望著我們。已經那麼接近但卻不能登岸，實在令人感到沮喪。戰爭、戰爭、法國人，你給我記著今天的事情。 (日記）

4 月 16 日，整天航行，大約在下午 4 點到達廈門，實在轟動整個岸邊站滿中國人觀看，外國人立刻上岸接受詢問，我們在那裡停留一個小時之後，汽船開航前往澎湖。這次行程比較舒適。 (日記）

4 月 17 日，早上到達澎湖，見到港內有 8 艘法國軍艦，船長前往拜訪巴雅號（Bayard）上的孤拔（Admiral Coubett）艦隊司令。我們看見平安號成爲俘虜停在港內。到處飄揚著法國旗，得知可以前往淡水之後，立刻啓航。在下午 5 點到達廈門。（日記）

19 日，在船上可以望見淡水，已經沒有看到法國軍艦，船隻停妥之後，我步下甲板，約翰生醫生來與我相會，我們一起走上山坡。（日記）

與學生、傳道和信徒見面，大家實在都很高興，有些人流下眼淚，所有的人都歡喜快樂。傍晚在學堂舉行崇拜。（日記）

20 日，四處巡視，察看每一個所在，學堂、女學等地。寫幾封信，然後詢問信徒這段時間的經歷，大致都算平安，伯朗和約翰生醫生來訪。（日記）

雖然有苦難，但是信徒並沒有退縮。（日記）

21 日，打電報回去加拿大，然後檢視醫院的所有器物，以及學堂和女學等地。（日記）

6 月 21 日，法軍撤離雞籠，並且釋放俘虜華兵百餘人。（檔）

附錄二、清法戰爭時期的宣教師書信選譯：

1884 年，9 月 1 日　　黎約翰

華德羅牧師、博士

敬愛的先生

我想你現在一定很焦急的想要知道在台灣的我們狀況如何。這一段時間以來，原本平靜規律的傳教工作和生活被這個殘忍的戰爭所攪亂。你當然也已經由期刊報紙當中知道，法國的軍艦在這一場和中國的爭奪戰中做了什麼事情，他們的對抗最主要是要確認東京地區（Tonquien territory）所有權的歸屬。我們可以談論這件事情，閱讀相關的報告而心裡不必有任何的不安，但是當這個戰爭的喧鬧聲音已經到達家門口的時候，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當我們還在推測這件事情大概可以用溫和而不是敵對暴烈的方式解決的時候，在沒有很多的警告之下，雞籠港（距離淡水大約 10 哩）就已經被砲擊，之後福州也被法軍攻佔。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法國人出現在淡水，也沒有見到任何的法國船隻，但是沒有任何人會知道何時法國人會來攻擊。中國人已經忙著準備如何來阻止他們進入這個港口，河口已經置放水雷，另外還有數艘裝滿石頭的戎克船沈入水中，我們也聽說他們打算將整個出入水道封鎖起來。這些事件都在我們的周圍發生，而我們進一切可能的方法盡力來保護教會的權益，當然在我們的心中極爲焦慮，不曉得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像這種動亂的時刻免不了會伴隨著爲信徒、傳道和教堂帶來危險，因爲中國人是一個容易激動的民族，並且一旦發生暴力事件，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種暴力會延燒到什麼程度，再加上這裡的人對於法國人、德國人或是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人並沒有區別，只是將他們定義爲「番」（野蠻人）。

我可以很愉快的向您報告，我們的教會到目前爲止一切都算平靜。雖然曾經有人警告將要以武力來對付信徒，甚至有一個人甚至報告說他曾看見馬偕的頭被砍下來，然而幸好這些的事情僅止於傳言而已。

馬偕博士向政府交涉，在每一個有建有教堂的鄉鎮貼上告示，指出宣教師與將要對抗的法軍沒有任何的關係，並且每個鄉鎮的頭人必須要爲教會財產的安危負起連帶的責任。這些的告示已經對於安撫人心產生極好的影響。我們很樂意說，滿清的官員非常有意願以這種預防方式來協助我們。

關於傳教的工作，當然會因爲局勢的不靖而受到很大的攪擾。在許多地方教會的傳道已經被建議儘可能的在與一般人的接觸過程當中保持和善，並且盡一切的方法去避免任何會造成騷動的行爲。

目前爲止，馬偕博士已經盡一切所有的力量去保護我們的人，而我們只能將自己和未來交託在上帝的手中。我們聽見也讀到許多令人憂慮的報告，但是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知道上帝掌管一切的事情。

對我們來講，淡水遭到砲擊或是台灣被法國佔領，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然而這些事情確有可能會在將來出現，我們只能祈求上帝掌管一切，並且保護他的教會和祂的子民，並且掌管在這個帝國發生的事件，以便讓他拯救的國度在此地擴展。我們都相信，雖然這是一個困難的功課，但是對於中國的將來來講是好的，因爲現在他們的統治者和官員，在他們坐上現今的職位以前，並沒有將驕傲、無

知、欺騙、以及口是心非的壞習性丟棄。

你或許還沒有聽過，在內山的地區將要興建一所新的教堂，該教堂的興建是爲了紀念馬偕的父親，將要命名爲「馬偕教會」。教會地點位於原住民區域的邊界，被認爲是最危險的地區。在不久以前，該教會的傳道和幾位信徒在那裡遭到原住民的謀殺，如今的教堂是一間堅固，結實的石造建築。並且是由這個地區的傳道和信徒共同出資興建而成。最近我們聽說教堂已經接近完工的階段。

我們相信，這個教堂將可以成爲對抗靈魂最大敵人的堡壘，並且在教堂的牆內可以訓練許多信仰堅定的戰士，以便爲他們的統帥作戰。

我很樂意的說明，我們的健康狀況都很好。在工作之餘我和妻子都忙碌的學習語言。

請在在上帝恩典的國度當中互相的代禱，並且祈求上帝的祝福降臨在葡萄園裡的這塊土地，我們並沒有忘記在加拿大你們和其他的許多朋友，我們也非常歡喜的看見上帝的作爲在你們每一個舉動當中。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請不用爲我們的安危或福祉擔憂，因爲我們正在永恆的磐石上歇息。　詩篇：46 篇。

在此向您表達我的請安

您最真摯的

黎約翰

1884 年 11 月 7 日　　馬偕

華德羅牧師、博士

我親愛的兄弟

我們的人是在違背個人的意志之下被迫留在這裡，對我來講特別是如此。在淡水砲擊以及法軍幾次的登陸攻擊失敗之後，英國領事費德來以及港內英國砲艦「小金龜子號」的艦長命令所有的外國婦女必須搭乘第一艘汽船離開。

根據這個命令，黎約翰夫人，馬偕夫人和孩子準備與其他人一起出發；由於黎約翰牧師還在學習語言，並且對於北部台灣的工作尚未熟習，我們一致認爲他最好陪伴其他的人先離開，留在香港直到這裡恢復平靜爲止。

我決定留下來———

他們在 12 日搭上一艘汽船，並且順利的到達目的地，並且立刻在當地租到一間房子居住。

自從雞籠遭到砲擊以致於後來戰火波及到淡水以來，我很少入眠再加上當時我遭受到最爲嚴重高燒，使得我的生命一度徘徊在生死的關頭——實在感謝黎約翰先生以及學生細心的照顧，讓我很快就得到復原。然後他們許多人懇求我搭船做短暫的旅行，他們認爲吹一些海風會讓我的身體恢復體力。

在仔細考慮過整個教會的情況之後，我接納他們的看法。

1） 傳道告訴我，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不要到鄉下去巡視教會，因爲這只會激起本地人的怒氣。的確，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做什麼工作。

2） 沒有學生留在牛津學堂或是女學堂。

3） 沒有新的紛擾出現，一切都很平靜。法國的軍艦不是停泊下來，就是前往西貢載運兵源。（這是我們猜測的）

因此在 21 日，我搭船繞經廈門前往香港，本來打算立刻回來淡水，（我只打算搭著汽船繞一圈而已）——

唉！唉！唉！當我剛剛到達香港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台灣的港口已經遭到封鎖了。

我搭乘前往廈門的汽船回去淡水，但是船隻不准靠岸，甚至連送一封信給停泊在港內的英國砲艦都不被允許。於是她立刻掉頭回去廈門。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打擊。

在離開之前，我已經處理好教堂、信徒的事情，並且將一份報告交給領事官，本來本來預計幾天之後就會回去淡水，因此對於傳道的薪水並沒有做任何的安排——

「黑暗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亮光」（昨天聽說有一艘法國軍艦同意帶一封信，因此我毫不延遲的立刻寫一封信給淡水的德記洋行（Tait & Co.）請他付款給阿華教會所所需用的所有款項—— 真是輕鬆！真是輕鬆！耶穌掌管萬事！

我爲了安排搭法國軍艦回去淡水的旅程，曾經去接觸此地的法國領事，但是被告知這種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我打算只要有機會，就會搶先在第一時間回去淡水，而其他人會留在這裡直到整個情況安定下來。

戰爭對教會工作的影響：

3）所有部門的工作都陷入停頓。

4）雞籠現在已經不是中國而是法國人的城鎮，居民逃離那裡和社寮島（你知道在那裡有自閩虔益牧師買來的教會小屋）因此目前你可以將雞籠和社寮島當成是一片空白。

5）教堂被夷爲平地（中國人的暴徒所爲），並且遭到劫掠。

6）信徒的家也遭到搶劫。

7）對於外國人的仇恨更爲激烈。

8）到處有暴動和騷亂，所有的一切在不安定的狀態之下。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的天父，上帝保護那些勇敢的信徒、殉道者以及告白信仰的人。在肉體的試煉時，請我們不要失志、不要厭煩、

「祂的美名將永遠存在」 讚揚祂的美名直到永遠」 讓祂的榮光照亮在台灣島上。

再見了，

你最爲誠摯的 G. L. 馬偕

中國香港

P.S. 我已經恢復健康。

1884 年 12 月 12 日　　馬偕

我現在已經健康, 正在等待機會回去

親愛的兄弟華德羅牧師:
數個禮拜以前, 我寫道位於淡水的英國領事下令所有外國婦女搭乘第一班輪船離開. 黎約翰夫人, 馬偕夫人, 以及小孩準備好, 由於黎約翰先生還在學習語言, 我們都認爲陪伴她們一起前往比較好, 而我自己留下來.
由於我的身體在受到高燒的攻擊之後身體衰弱(主要是因爲過度憂慮教會的安危) 我想目前情況算事暫時安定下來(法國人沒有什麼舉動) 所以搭上汽船繞一圈, 吹一些海風, 之後立刻回去. 來到這裡之後才發現台灣已經遭到封鎖的命運, 而在此之前完全沒有任何的警告. 因此在那之後我就被關在外面. 所有要歸鄉的努力全都失敗. 並且我也沒有辦法游過海峽. 南台灣的馬雅各先生也是同樣的被關在外面. 另外還有更多的他們的宣教師和夫人也是如此.
在我離開以前, 已經沒有任何傳教的工作可以做. 所有的一切工作都陷入停頓的狀態, 不可能做任何的工作.
學院和女學校都停課. 教堂不是被拆成平地不然就是關門. 在社寮島上一間購自閏虔益牧師的小屋還在，但是在那裡已經沒有台灣人在島上.
雞籠沒有任何台灣人, 因爲在法國人占領之後, 所有的人都已經跑光.
自從離開淡水直到現在, 那裡一切都算平靜.
唯一能夠安慰我這滴血的內心的是就算我在淡水也沒有辦法協助信徒什麼. 也不能做什麼事情.
然而, 能夠在當地, 就在那裡, 如果需要我願意犧牲性命, 死在傳揚福音多年的可憐的人群當中，我也願意。
當我想到假如法軍攻陷佔領台灣之後, 天主教的神父充斥在我所愛的台灣島時, 我的內心恐懼顫抖.
黎約翰忙碌, 忙著學習語言.
而我也努力讓自己的身體, 精神和靈性更有力氣, 以便隨時準備好在第一個機會來到的時候回去重新立起染血的旗幟, 以及我所愛的島嶼.
加拿大有爲我們祈禱嗎. 噢! 現在立刻禱告. 請求萬全能的耶和華來到, 掃除一切的黑暗權勢。 詩篇一二五篇二節。

G.L. 馬偕

請向我那位誠摯, 認真和值得敬愛的朋友麥拉蘭請安.

1885 年 3 月 24 日，於香港 馬偕

馬偕寫給宣道會主席

我在最近收到三封書信,一封是在昨天收到由約翰生醫生所寫,一封是來自小金龜子號上的陸戰隊員, 而另一封來自停泊於法國旗艦上的朋友.

台灣目前的狀況:

1.法國目前完全佔領雞籠週圍的山頭, 並且正向艋舺挺進當中, 而本地的軍隊損傷慘重.

2. 除了由法國軍艦偶發的射擊以外,淡水附近一切都算平靜.

3. 信徒都算平安,並沒有進一步騷擾的事件發生. 醫院, 宿舍等都還平靜.

4. 在將來我將會提出一份信徒遭難的清單,在此同時,我也焦急的關注事態的發展, 期待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我只希望就目前所見到的事實.

目前謠言就如同無用的灰塵一般的滿天飛舞.

耶穌統治這個世界.

請不斷的爲受苦的台灣禱告.

1885 年 4 月 6 日於香港　馬偕

華德羅牧師、博士

親愛的先生

當你仔細思考自從我們由加拿大回到此地之後的工作，你就不會奇怪我的宿敵，惡性的發燒（Pernicious fever）讓我瀕臨死亡階段，也差一點讓你收到我生前所寫的最後一封信。這些工作包括：

牛津學堂和女學堂的興建，東岸的 14 間教會、西海岸兩間大的石造教堂，偕醫館以及北台灣每一間教堂的整修，另外還有教導學院內的 12 名學生以及相同數目的婦女，另外還有旅行、佈道以及醫療工作。然後還要關心所有的教會，特別是當法軍出現砲擊雞籠和砲擊淡水以及登陸企圖。我們所有人都暴露在槍林彈雨當中和砲彈的轟擊之下。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擔壓迫我的靈魂，這可能是世人永遠不會不會知道的。那就是所有的信徒立刻遭到猜疑，而現在他們所有的人都明智並且謹慎的小心行事，這真是一種極端艱難的環境。

從最初我就相信，我們一定會因爲和法國人的衝突而惹上麻煩，因此我就開始不分晝夜的發出指示以及接收各地的消息。有 20 次我將所寫的指示裝在燒掉一角的信封袋中寄出（根據本地的風俗，這是表示十萬火急之意）。

自從砲擊淡水之後，我有數個禮拜的時間無法成眠（現在這個毛病已經完全離我而去） 後來更有數天的時間我完全失去知覺。Foresee

然而我所做的這些努力使得教會免受更多的悲傷與流血。在離開以前，我把教會將會遇見的一切事務安排妥當，甚至還請信徒將被劫奪的物品列出清單，然後將它交給衙門，而官員承諾將會賠償所有損失的物品。我們淡水的兩間宿舍、牛津學堂、女學堂、以及醫院都沒有遭到攻擊。

我離開原始的想法只是想要讓自己恢復體力，以便準備讓自己隨時可以應付任何緊急的情況，然而卻因此被關在外面，在淡水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會有封鎖的事情發生，並且在封鎖之前並沒有任何警告。

從那時之後的情況：

現在一切都平靜，沒有更多劫掠的事情發生。信徒們遠離淡水和雞籠周圍的士兵。現在我絕對不能到信徒的當中，因爲那是一個魯莽的行爲，而這個行爲會讓整個情況複雜到無法想像的程度。許多本地人都攜帶武器，所以目前信徒最明智以及謹慎的作法，就是保持安靜以及謹慎小心行事。而他們所有的作爲都是根據我在這裡所保握每一次的機會所下的指示而行。但是我知道，對我來說被關在外面，讓我的靈魂飽受折磨。

禱告，噢！請爲北台灣禱告。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禱告，法國人佔領社寮島上教會的小屋。

如今我深信，當大門再度打開的時候，教會是站在對的一方，爲了上帝的緣故，請不要有任何讓人灰心的耳語出現，絕對不要。

我計算每一個磚塊的重量，並且將他們排成列。在高山深谷間旅行，建立教會。藉著上帝的恩典和力量，我相信可以做出同樣的成果。

讓我們如同永恆的高山一般，在困難的時候堅定的站立，讓我們不要被論斷只能

夠在平順的時候才有辦法努力做工和付出； 現在是爲了上帝的工作堅定站立的時刻了。

您真摯的

G.L. 馬偕

1885 年 4 月 10 日於香港　　馬偕

致華德羅牧師、博士

我親愛的先生：

我已經知悉到你上一封書信的內容，

1、牛津學堂和女學的土地權狀的所有權人應該是**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並且正式在英國領事館註冊，因此宣道會所屬的每一呎土地都已經註冊完竣。至於鄉下的地方，因爲條約受到條約的限制，教會只能登記在本地人的名下。

2、您應該和閏虔益溝通，請他將社寮島上小屋的權狀移轉給加拿大長老教會，這件事情只能在他的同意之下於淡水領事館辦理。

3、當我提出另外再派一位宣教師來台的意見之後，曾經多次被詢問，此事我懇求教會或是海外宣道會容忍以下所寫的內容：

我從來不曾想過藉著讓另外一個人駐在社寮島上來分割教會，社寮島上只有一些漁夫。牛津學堂是在淡水，而將資源集中是我們所需要的。

至於社寮島上的小屋，空間只容許讓一個歐洲人住在裡面，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在那裡祝好幾個禮拜，而上一次巡視教會並沒有在那裡享受。最多只在那裡數禮拜或數個月轉換環境。

4、在淡水的外國人團體當中有一位英國醫生，他極爲樂意協助醫館的事情。但是我認爲讓傳道在各個不同駐在的教堂分發藥品給患病的人使用，所產生的效果比淡水醫館要大得多。

5、我相信中國只能被他自己的子弟改變，現在我們有很多人能夠執行這個工作，不管是在學院、在女學或是不管任何地方，用任何方法都能順利的進行。

讓我們使用他們，我再重複，讓我們使用他們。這樣他們將會越來越覺得那是「本土」的教會，因此他們將會爲這個教會祈禱、努力與付出；而不會一直等待來自加拿大或是別地方的協助。

我相信一間獨立而本土的教會，就是能夠自養的教會。當然這件事情必須逐漸成形，但是我們必須朝這目標前進。

6、我們當然是需要經費的協助，特別是在這個段時間試煉之後更是如此，我認爲我們做工的力量是很強壯的。

由你來決定金額，但是我祈禱，你是很小心計算需用的花費來處理這個問題，但是在決定之前請先寫信告訴我們，因爲你們的決定會改變許多事情。

7、我手頭上有前往淡水的船票，海龍號預計昨天出發，因此我所有的行李都放在船上，但是昨天無法成行，因此我今天還要去看她是否會出航。

淡水附近一切都算平靜，阿華寫信到廈門表示一切都好。

如果不是他，我就不會在這裡了，可憐的同伴，當時他跪下來請求我搭船去繞一圈。

後來我不停的寫信給他。這裡一切都好。

您的 G.L.馬偕

誤解痲瘋（麻風）院

--以淡水河域新莊樂生院之文化資產保存為例

紀榮達*

一、 前言

台灣原住民，本無癩病之感染。麻風病之傳播，殆始於漢族之移墾[1]。

日治，昭和五(1930)年，日本殖民政府於大漢溪畔新莊街之頂埤角，建立台灣總督府癩療養所樂生院，以官方強制隔離手段，擬杜絕麻風病源之傳播。樂生院創建之建築物迄今已達 74 年，爲世界抗癩歷史無可替代之珍貴古蹟。

二次大戰終戰後，國民政府依循日人舊制，侵犯麻風人權依然嚴重，期間雖有院民公民權之確定及強制隔離制度之調整，然，威權統治年代，弱勢院民尤若刀俎之魚肉，一度成爲選舉操弄之工具，作爲國民黨的投票部隊。期間，院民頻頻自殺上吊於寒森走廊之現象以及院內怡園精神病院之設立，正是台灣現代史，國共爭戰、台美互動，涉牽庶民生活之寶貴見證。

2004 年底，台灣政府以捷運工程爲由，擬拆除樂生院史蹟，實係主管機關未能正視台灣歷史之誤。本文解讀樂生院文化資產保存之過程，探討遭遺忘、污名、誤解的麻風院、麻風史。

二、 古蹟提報

（一） 樂生研討會

2004.04.26. 滬尾工作室田野組緊急向台北縣文化局函提樂生院古蹟申報。田野組係於 2004.04.25 參加「回首痲瘋百年」國際研討會[2]時，發現樂生院古蹟危在旦夕，有遭受新莊線捷運工程湮滅之虞。研討會中，北縣文化局林泊佑局長雖然具備周妥前瞻規劃北縣文化建設工作之理念[3]，惟，文化局卻已於 2002.08 選擇拆遷重組 71 棟樂生建築中之兩棟，以作爲樂生院新院區文獻資料館之用，其餘 69 棟樂生史蹟將任由捷運局拆除。

---

* 滬尾文史工作室田野組組長。

[1]李騰嶽， 臺灣省通志稿 政事志衛生篇第二冊》 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2 年）頁 146。

[2] 以台灣科技大學范燕秋副教授與青年樂生聯盟爲首的搶救行動，於 2004.02.13-15 三天「樂生營」之後，即積極推展串聯活動，回首痲瘋百年國際研討會亦爲搶救行動之一環，研討會計畫主持人爲青年樂生聯盟蔡宗芳醫師。

[3]青年樂生聯盟，《回首痲瘋百年-樂生院歷史與空間國際研討會》 臺北：青年樂生聯盟，2004 年）頁 8。

棄守古蹟保護權責，似已成爲文化主管機關之慣性，淡水之江頭砲台、大莊營盤、駱家祖厝均有先例。

（二） 陳京川院長

樂生院古蹟之提報，並非始於滬尾，前樂生院陳京川院長，於 2001.03.22 已經行文台北縣政府，惠請該府鑒定樂生院古蹟，樂生院謝楠光副院長，並於函文中註明， 樂生院是全國唯一癩病醫療機構，有其五千年醫療歷史價值」[4]，該函顯示，麻風醫療專業醫師，非但認爲樂生院爲台灣一國之癩病史蹟，亦爲世界醫療歷史不可或缺之一環。惜，當時的北縣文化局，以樂生院業臨拆除之際，主張，樂生院反應古蹟鑒定問題， 實有欠妥」[5]。如此，2001 年，實有欠妥一語，竟成爲數年之間， 縣政整體考量，歉難進行古蹟審查程序」[6]之圭臬。徒令樂生院昭和五(1930)年創建時的官舍（五雲舍） 於 2003.08 間率先遭到怪手鏟除。

（三） 創建樂生院

昭和五(1930)年，台灣總督府創建樂生院，除了醫、護人員之官舍外，尚包括醫療廳舍、病患院舍、機關室（鍋爐房，如圖一） 炊事場、浴場、上下水道、禮拜室及警衛室[7]。至昭和十二(1937)年間，除了病患院舍之增建外，並有學園、保育所、運動場、雞場、園埔、御歌碑及神社（如圖二）之建造。該院院址之選定，在「樂生院案內」即提到，土地高燥，南風迎面，絕好的健康之地[8]。除了療養功能之外，樂生院實具衣食、慰安、娛樂、宗教、教育及生產之機能。在強制隔離的狀況下，自成一個獨立完整之聚落。樂生院生活化、社區化之佈局，完全與外界認知之病房、病院之印象不同。

（四） 捷運環評

台北市捷運局不察樂生院麻風聚落之史蹟資源，捷運新莊線環評，其環境現況及影響，在古蹟部份，竟隻字未提樂生院史蹟之保護[9]。台北縣文化局則以國家重大建設之故，無法指定樂生院爲古蹟，徒然坐視等待樂生院史蹟從台灣史及世界公衛史中消失。

三、 以院作家

（一） 以院作家碑

文化局非止放棄日治時期之古績，終戰後國軍麻風軍患在樂生院之史蹟，亦未受文化局重視。昔樂生圖書室旁有一方日本貞明皇太后之御歌碑，1947 遭吳文

[4] 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90.03.22.九十樂總字第 0716 號函》 臺北：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2001 年）

[5]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90.04.18.九十北文資字第 1613 號函》 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 年）

[6]台北縣政府文化局，《93.09.23.北文資字第 0930008634 號函》 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

[7] 臺灣總督府樂生院，《昭和五、六年臺灣總督府樂生年報》 臺北：臺灣總督府樂生院，1933 年）頁 1

[8] 賴志彰，《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研究調查期末報告》 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6

[9]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新莊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臺北：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995 年）頁 5-23，6-29。

龍院長重刻篡改爲「以院作家碑」[10]（如圖三） 該碑昭和十二(1937)年之落款亦遭破壞，新碑日期爲民國 36 年 3 月，正處 228 事件方酣之際，台南籍的吳文龍院長急於在 228 動蕩期間篡改日后俳句，或有特殊環境背景，以院作家碑之新碑舊痕實爲樂生史之珍貴見證。

（二） 蓮池海會

國民政府高壓統治年代，樂生院內尤需精神慰藉，除了基督教長老教會孫理連牧師娘之傳道事跡，佛教信徒亦重組慈惠會，1953 樂生院民自力奠基建蓋之棲蓮精舍佛堂，實爲族群合作，共創台島生命力之縮影，期間院民自殺行爲逐漸減少，或與尋獲生存目標相關，惜，支援佛堂之孫立人，於 1954 精舍落成後不久，即遭軟禁，目前，佛堂內高懸孫立人「蓮池海會」匾（如圖四），尤爲樂生院珍貴史料，只是，以院作家碑及棲蓮精舍業將拆除，以作爲捷運變電所用地。

（三） 衣冠塚

早年，日本政府誤解麻風病之傳染力，往生院友皆以火葬處理，終戰後亦成習爲樂生院之規範，就連亡故院長，亦僅衣冠塚一方，未能土葬於樂生院之內，捷運局未能察覺麻風文化[11]特色，於樂生池畔，率先拆除美國大使藍欽捐贈之莒光閣[12]，緊將拆除院內僅有之陳宗瑩院長衣冠塚，就連蔣宋美玲、彭孟輯之聖德碑亦在拆除之列。完全無視樂生史、台灣史之完整性、連慣性。

四、 前世來生

（一） 史前遺址

樂生院史蹟並非止於日治及國府時期之建築。1959.11.15 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盛清沂老師曾發現史前石斧，命名爲頂埤角遺址[13]。1997.11 何傳坤教授亦發現石斧及打製石片[14]。2004.08 劉益昌教授則發現石斧及圓山文化陶片（如圖五） 解讀樂生院史蹟之歷史足足往前提升至三千年。

（二） 漢族移墾

樂生院本係平埔族山埔，附近有狙殺漢人傳說[15]。這個由閩西貢生胡焯猷墾闢之山園，至今尤存客族古墳（如圖六） 樂生院海山尾漢人史蹟，正可印證新莊老街早期客族勢力範圍，事實上，丹鳳十八份之江姓即爲閩西移民之福佬客。樂生院古蹟之保存，既可縱貫新莊歷史之前世今生，亦可橫向連結泰山明志書院、

[10]劉集成，《樂生療養院志》 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84

[11] 麻風文化：麻風病患遭受社會及政權之隔離，形成孤島環境，院民爲克服肢體殘缺之不便，發展出特殊之生活方式、工具及智慧，其中軍患與民患之社群，亦具相同及相左之文化特徵。

[12] 張平宜，《悲歡樂生》 臺北：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2004 年）頁 160

[13] 盛清沂，＜記台北地區兩二處史前遺址＞《台北文物季刊》 第 10 卷第 2 期（臺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61 年）頁 13

[14] 何傳坤，《頂埤角史前遺址調查報告》，臺北：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998 年）頁 6-3

[15]王志文，＜七十二份傳奇＞《尋訪凱達格蘭族》 臺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 192

龜山神社、新莊水源地，成爲觀音山麓之史蹟區塊。

（三） 保存樂生

麻風病古稱天刑症，或指患友前世爲惡之報應，今日科學昌明，樂生院民業已走出樂生院，爭取生存空間之環境權，拒絕新院舍與大自然隔絕之新隔離政策，樂生院民保存樂生古蹟之行動（如圖七）實爲台灣爭取國際上之文化交流空間，爲台灣子孫保留文化資產，並保存台灣社會隔絕、誤解麻風病患之見證。

伍、結語

台灣社會及政府長期遺忘、隔離、誤解麻風院、麻風史，企圖以捷運建設爲由，湮滅麻風史蹟[16]，足見台灣之人權立國並未包含麻風人權，文化立國並未含包麻風文化，文化公民權並未包含麻風文化公民權。2004.10.18 行政院跨部會協調樂生保存會議，院民自治會長、樂生古蹟提報人、古蹟捷運共構方案提報人均不得其門而入，顯然，麻風隔離政策始終未變。惟，鄰國日本早於 2001.05.23 即爲麻風病友敞開心胸，小泉純一郎首相爲政府持續實施隔離政策帶給病友痛苦，表達謝罪之意[17]。日本全生院癩病療養院轉型爲癩病紀念館已屆 10 年（如圖八） 該院院友以解說員身份講述全生院歷史，實爲肯定麻風人權之借鏡。

新莊人、迴龍人與新莊樂生院相處爲鄰 70 餘年，樂生院古蹟將是新莊捷運線最珍貴之文化資產，打開「樂生院麻風紀念館」的大門，將使麻風耆宿的晚年重新走入台灣社會，麻風院友或將引領台灣重返國際衛生組織(WHO)。台灣人、日本人、加拿大人….均可搭乘新莊捷運線，探訪樂生院之麻風史及台灣史。

攝影報導文學作家張蒼松，早於 2001.07.25 即已爲文：「人性化、有擔當、重效率之行政風格，爲放諸四海皆準之指標。捷運建設，勢必壓縮院民生活空間，折損樂生歷史記憶，目前，端看政府能否及時應佣智慧，彌縫人道與文化缺口，逆轉形勢，創造三贏局面」[18]。

---

[16] 麻風史蹟：樂生火葬場、樂生神社、御歌碑、御賜治療室、樂生浴場….均爲特殊之麻風史蹟

[17] 張蒼松，《超越天堂的地方》 臺北：中國時報，2004 年 7 月 25 日）頁 22

[18] 同註 14

參考文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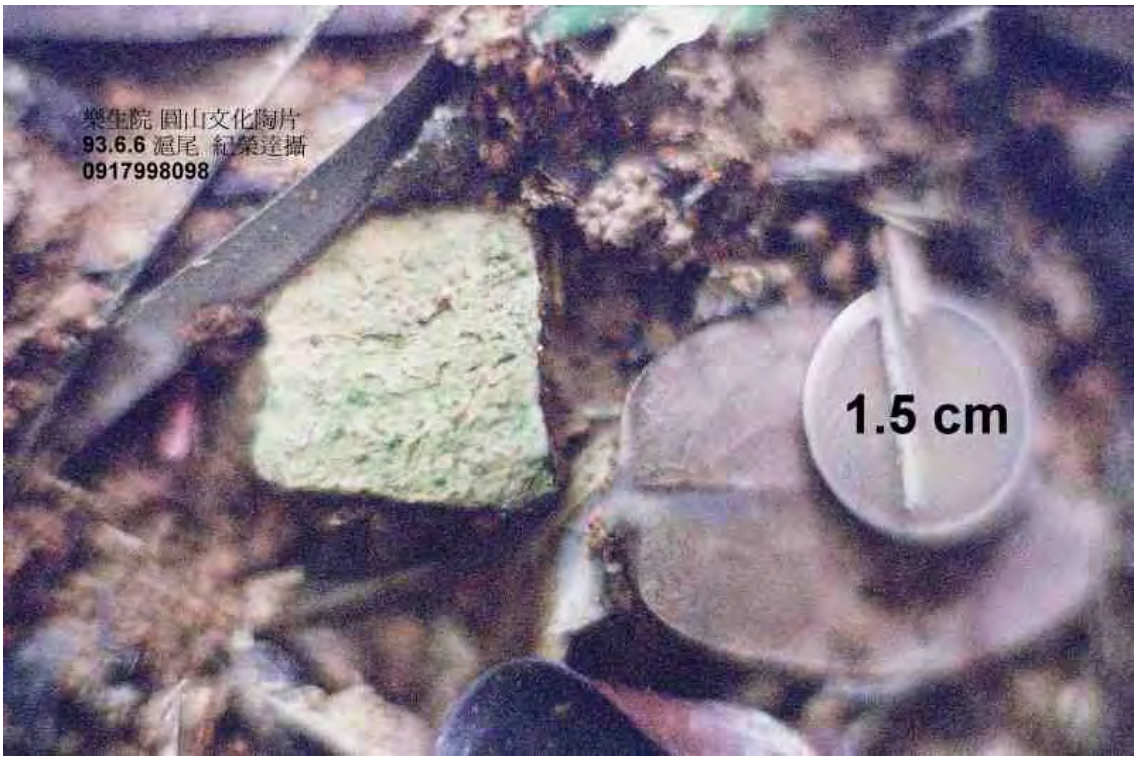
4 王志文
1998，＜七十二份傳奇＞《尋訪凱達格蘭族》臺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5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4， ₡3.09.23.北文資字第 0930008634 號函》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5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995，《新莊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臺北：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6 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
2001， ₡0.03.22.九十樂總字第 0716 號函》臺北：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
7 何傳坤
1998，《頂埤角史前遺址調查報告》臺北：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7 李騰嶽
1952 ，《臺灣省通志稿 政事志衛生篇第二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8 青年樂生聯盟
2004，《回首痲瘋百年-樂生院歷史與空間國際研討會》臺北：青年樂生聯盟。
11 盛清沂
1961，＜記台北地區兩二處史前遺址＞《台北文物季刊》 第 10 卷第 2 期 臺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12 張蒼松
2004，《超越天堂的地方》臺北：中國時報 2004 年 7 月 25 日。
12 張平宜
2004，《悲歡樂生》臺北：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14 劉集成
2004，《樂生療養院志》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14 臺灣總督府樂生院
1933，《昭和五、六年臺灣總督府樂生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樂生院。
16 賴志彰
2004《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研究調查期末報告》臺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圖一）樂生院機關室（鍋爐房）　93.6.22　滬尾　紀榮達攝 0917998098

（圖二）樂生神社　台科大 范燕秋教授 典藏　瀧尾 紀榮達翻拍 0917998098

（圖三）以院作家碑　93.6.6　　瀧尾　紀榮達攝 0917998098

（圖四）棲蓮精舍佛堂之孫立人匾　　9　　3.06.17 滬尾 紀榮達攝 0917998098



（圖五）樂生院 圓山文化陶片　　93.6.6　　滬尾　紀榮達攝 0917998098

（圖六）嘉慶古墳　　93.05.26　　滬尾 紀榮達攝　0917998098

（圖七）院民搶救樂生　　93.08.00　　滬尾　紀榮達攝 0917998098

（圖八）日本全生院麻風紀念館一隅　滬尾紀榮達 0917998098 翻拍自全生院摺頁

北台首座媽祖廟　渡宮之起源與角色

黃富三[*]、方素娥[**]

前言

一、關渡媽祖廟之特色
（一）北臺最早媽祖廟
（二）漢番合建
（三）半官祀廟

二、北台首座媽祖廟興建於關渡之因
（一）地理位置
（二）漢番交往要地

三、關渡宮在北臺發展史上之角色
（一）聚落之形成：條件從番社到漢庄
（二）產業：商業、漁業、農業
（三）宗教聖地

結語

前言

關渡位於臺北盆地西北角，屬於今日市區相對偏遠之地。然而，關渡於史前時代即有人類居住，在 17 世紀前後又領先形成漢庄，在早期北台歷史上更扮演重要角色，其故安在？關渡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有何特色？何以北台最早的媽祖廟在此興建？

關於關渡宮研究，迄今大多是史實的呈現與宗教的述介，比較重要的作品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關渡國中教師。

是：林美容、許谷鳴的〈關渡媽祖的信仰圈〉[1]；吳春和、紀榮達、張志源〈淡水河口寺廟系列——關渡宮〉[2]；林美容《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3]、文崇一等著《西河的社會變遷》等[4]。

本文主要分三部分。一是關渡媽祖廟之特色，由漢番合建及半官祀廟二點探討；二是北台首座媽祖廟興建於關渡之緣起，自地理位置與漢番交往要地二點探討；三是關渡宮在北臺發展史上之角色，探討在聚落之形成、產業之發展及宗教信仰上的地位。

一、 渡媽祖廟之特色

關渡宮位於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是清初諸羅縣所建三座最古天妃廟之一，僅晚於笨港（今新港與北港），也是北臺最古老的媽祖廟，因此人們常說「南有北港媽，北有關渡媽」。關渡媽也以「靈聖」著稱，因而信徒眾多，香火鼎盛。特別的是，它是由漢番合建，創建時並具有半官祀性格。

（一）北台最早媽祖廟

根據關渡宮廟方所提供的簡介，定創建年代爲清順治十八年（西元 1661 年），與鄭成功率軍入臺同一年。但遍觀文獻，除傳聞外，並沒有找到任何佐證的文獻。然而，它確是北台最早的媽祖廟。

《諸羅縣志》中對關渡宮的創建有明白的記載。

1. 天妃廟：一在城南縣署之左。康熙五十六年，知縣周鍾　糾眾建。一在外九莊笨港街。三十九年，居民合建。一在　水港街。五十五年，居民合建。一在淡水干豆門。五十一年，通事賴科鳩眾建：五十四年重建，易茅以瓦，知縣周鍾　其廟曰『　山』。[5]

2. 山廟：在淡水干豆門。前臨巨港，合蜂仔峙、　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甚壯。康熙五十一年建廟，以祀天妃。落成之日，諸番並集。忽有巨魚數千隨潮而至，如拜　然；須臾，乘潮復出於海：人皆稱異。[6]

---

[1] 林美容、許谷鳴，〈關渡媽祖的信仰圈〉，收於林美容、張珣、蔡相煇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雲林：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2003），頁 117-168

[2] 吳春和、紀榮達、張志源，〈淡水河口寺廟系列——關渡宮〉，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1998 年 12 月 12～13 日），頁 1～67。

[3] 林美容，《媽祖信仰與漢人社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4] 文崇一等著，《西河的社會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5）。

[5]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頁 281。

[6]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86。

3.康熙五十四年，干豆門重建天妃宮，取材　島；值西風，一晝夜而達。[7]

4.一在　渡門，原建山頂，康熙五十八年，移建山　。乾隆四十七年修。道光三年重修。[8]

據上，關渡靈山廟是清初諸羅縣所建三座最古天妃廟之一 ，遲於康熙 39 年的笨港街（今北港、新港），而早於康熙 55 年的鹹水港街。再者，笨港與鹹水港天妃廟均在臺灣南部，因此靈山廟也是北臺最古老的媽祖廟北台首座媽祖廟。而關渡媽也以「靈聖」著稱，信徒眾多，信仰圈廣大，香火鼎盛，人們常說「南有北港媽，北有關渡媽」。

（二）漢番合建

更特別的是，關渡媽祖廟是漢番合建的，理由如下：

第一，它是清初諸羅縣三座天妃廟之一，笨港街與鹹水港街均記載「居民合建」，唯獨關渡天妃廟稱係「通事賴科鳩眾建」的，顯示其非漢人居民所建的。

第二，「通事賴科鳩眾建」中的「眾」應該屬於番眾。通事乃清朝設立於番社的準官員，經管番人之事，其所能動員之人自然是番人。事實上，康熙末年，關渡附近居民主要是北投社與八里分社原住民，關渡土地亦然屬於北投社所有，包括媽祖廟所在地。賴科是大雞籠社通事，經營番產貿易，在康熙三十四（1695）年前後已活躍北部及東部（後山）[9]。通事在番社有如土皇帝，因此在賴科倡導下，原住民捐獻土地建廟。

第三，康熙五十一年建廟時，原爲茅草建成的，此乃典型的平埔族建材。而且「落成之日，諸番並集」[10]，顯然也是番人勞力所建的。

目前在關渡宮拜殿尚存有兩對乾隆壬寅年（即乾隆四十七年）由「北投社弟子喜助」的龍柱，雖然已是關渡宮第三次的重修，但仍可由此看出漢番合資的端倪。在道光三年的重修中，關渡宮右山門左邊立面麒麟堵的落款「弟子臺長生」，即是平埔族原住民，其後代世居在淡水鎮竹圍民生里。因此，康熙末年後當是混居地。筆者以爲廟址原爲番產交易所甚或原住民之公廨或瞭望樓。

（三）半官祀廟

1.「天妃廟：一在城南縣署之左。康熙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糾眾建。一在外

[7] 周鍾瑄， 諸羅縣志》 臺文叢 141 種） 頁 288。
[8] 陳培桂， 淡水廳志》 臺文叢 172） 頁 150。
[9] 郁永河， 裨海紀遊》 臺文叢 44 種，1959） 頁 33，內稱「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
[10] 周鍾瑄， 諸羅縣志》 臺文叢 141 種） 頁 286。

九莊笨港街。三十九年，居民合建。一在鹹水港街。五十五年，居民合建。一在淡水干豆門。五十一年，通事賴科鳩眾建：五十四年重建，易茅以瓦，知縣周鍾瑄顏其廟曰『靈山』。[11]」遠離縣治的關渡媽祖廟於重建後，能請周鍾瑄以諸羅縣一縣之長的身分，爲該廟命名並題額，可見當時關渡媽祖廟頗受官方支持。

2.乾隆二十八年十月有一地契，載：

「□□□業主關渡宮媽祖住僧綿遠，緣祖僧于康熙五十六年叨蒙諸邑周因公抵□，感賴神恩，善政□□□，□后左右崙及臨海唇埔，諭令附近庄民墾耕徵納香祀。[12]」契字中，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縣令周鍾瑄親至關渡，並劃分關渡附近「臨海唇埔」與民承墾，永爲關渡宮香祀，關渡媽祖廟和官方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

二、北台首座媽祖廟建於　渡之因

北台首座媽祖廟既不建於淡水河口，也不建於新莊、艋舺、士林等商業區，卻建於盆地邊緣之關渡其故安在？此當與其地理位置、漢番漢番交往要地有關。

（一）地理位置

首先，關渡位於進入台北盆地的門戶　，且地勢較高 ，乃極佳之航海地標與避風港 。其次，關渡隘口兩岸有象鼻與獅頭二山聳峙　，形勢險要， 又是淡水河與基隆河匯流處 ， 控制水路交通之鑰 ， 具有商業機能 。因此 ，它成爲早期漢番交易地 。

1.地勢高而濱水

如圓山、芝山岩，乃台北盆地史前文化之擇居地；關渡地勢高而濱水，食物豐富，居住安全，亦是適合史前人類生活之空間。由其所留下之大坌坑、圓山、植物園文化之遺址可證[13]。在臺北湖時期，乃是環湖聚落之一。

2.避風港與登陸地

關渡口狹隘，早期船隻往往至關渡停靠，以躲避北部冬季甚爲強勁的東北季風。《諸羅縣志》所繪之圖，帆船繪於關渡口內，乃反映當時狀況。根據當地耆老表示：「關渡位居象鼻山南側，象鼻和獅頭兩山間狹隘，淡水河至此與基隆河形成寬廣的水域。在堤防尚未建造之前，該處不但是過往船隊卸貨的泊靠河灣，更是船隻躲避強勁東北季風的避風港；而且，該處地勢居高臨下、扼於要衝之地，不只爲天然之

[11] 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頁 281。
[12]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2。
[13] 盛清沂， 臺北縣關渡遺址調查記〉，臺灣文獻》，13 卷 1 期（1962，3）。

海港屏障，亦爲登陸要地。[14]」同時，北部冬季，淡水、八里地區濕冷、風強，而關渡因北有山脈阻隔，較爲乾燥溫暖，適合居住。

3.漁產豐富

位於河海交會處，鹹水與淡水一進一出，因此魚貝類多而量豐。貝類如蜊仔、蛤蜊、花蛤仔、粉蛤、河蚌；魚類如特種烏魚、黃魚、鰻魚、土龍、加目仔、king1 phiaN1；蝦類有沙蝦、大頭蝦、蝦猴、草蝦。離河口近，亦可操舟出海捕魚，如原住民早已沿基隆河出海採捕魚、蛤與海菜之類[15]。

4.淡水河流域交通要地

「獅頭巖山，與關渡門山相對。關渡山形如象鼻，形家謂之獅象捍門。[16]」形勢險要，於是形成重要之中途轉運站。原住民駕駛獨木舟（莽甲，艋舺） 利用水路來往交通，清代文獻多有敘述。今關渡大橋旁之龍形（蛇仔形）仍留有「艋舺橋」地名與遺址。甚至於有原住民會操舟沿基隆河、淡水河出海採捕魚、蛤與海菜之類[17]。可見關渡長時間以來，即是原住民交通地標與北台必經之地，且有漁產，可供養居民。

（二）漢番交往要地：北投社、八里　社

清初關渡位於漢番交界　，乃漢番交往貿易要地　，是以通事賴科以此爲據點，並建媽祖廟　。

北部的平埔族原住民　，清代、以及西班牙　、荷蘭文獻則被稱爲　「馬賽（Basay）」族，從日本時代以來被稱爲　「凱達格蘭　（Ketaganan　）」族。此族有兩個重要的亞族或大社　，一是今淡水地區的　「沙巴里（Tapparij　）」社；另一是今基隆市區內的金萬里　（Kimaurij　，或稱金包里　Kimpaurij　）」社[18]。兩大

---

[14] 耆老陳聰和先生，現年七十多歲，祖先於清朝時期即世居關渡，在關渡知行路販賣早餐，曾見證關渡堤防興建與關渡隘口拓寬之經過。

[15]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36。

[16] 福建通志臺灣府　山川　錄自重纂福建通志卷十五淡水廳

[17]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36。

[18] 參見：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77-80；106-110。雖然日本人曾引西班牙文獻，謂：Tapparij 與 Kimaurij 兩族都在「海灣」內，因而讓一般學者推定兩大社都在今金山到基隆一帶。不過，細查原文：Estos taparri y quimaurris viven cerca de los españoles dentro en la bahía.（英譯爲：Taparris and Quimaurris live near the Spaniards inside the bay），原意是說「兩社鄰近住在基隆海灣內的西班牙人」不是指兩社都在海灣內，參見：J. E. Borao ed.,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pp. 165-166。西班牙資料其他處所記的 Taparri，位置主要在淡水；至於荷蘭資料，除上引《大臺北古地圖考釋》所討論的那張古地圖標示在淡水外，全部出版文獻或未刊原檔，均毫無例外作：「淡水沙巴里（Tappare op Tamsuy）」。至於 Kimaurij 社應在今基隆市內老街的說法，學界似乎還很難接受。無論如何，不只上引古地圖把該社標在雞籠（即今和平島）對面，所有的荷蘭出版文獻未刊原檔，均做 Kimaurij 位於雞籠對

原住民族之間的往來，除了操舟沿著北海岸航行外，基隆河也是一條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關渡正位於兩大社的交通路線上。

1632 年西班牙神父耶士基佛（Fr. Fr. Jacinto Esquivel, O. P.）有關「臺灣島事情」的報告中，提到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的分流中，有一河口，該地附近，有：「八到九個聚落群居的北投社（Quipatao），住有不少番人。通常可從（淡水）林子繞過山崙來這裡；不過，若河水上漲之時，由河路比較容易，路程也較短，船隻可航行。[19]」荷蘭文獻指出北投（Kijpatou）社，「位於淡水河口，離雞籠（和平島）兩天路程[20]」云云，顯然與上述西班牙資料一樣，指北投大社的位置，就在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的右岸一帶。

北投社的分佈範圍相當廣大，從今天淡水鎮的北投仔（外北投）到臺北市北投地區的內北投一帶，都是馬賽原住民北投社群的活動範圍[21]。十七世紀西班牙與荷蘭文獻中，1654 年荷蘭人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很明確把關渡描繪與標記成「野生灌木林河角[22]」。但它位居番界與交通要津，自然成爲早期番產交易地，如硫磺、籐等。

荷蘭人有時將淡水地區的番社交易，發包給漢人社商（Chinese pachters）承辦[23]。不時有由臺南安平出發的漢人社商或社船（pachtersjonck）北上淡水一帶採買、交易的紀錄。如 1640 年代，何斌父親何金定（Kimtingh 譯音）有帆船到淡水採硫[24]；臺南新市、新化一帶的著名大商人大頭仔三舍（Samsia ck），與八哥（Peco），另一著名跨國大漢商希止老爹（Jan Soetekau）等，都有派船到淡水地區裝載大量粗製硫磺，荷蘭東印度公司並派船保護[25]。明鄭領臺期間（1661-1683），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於 1664 年到 1668 年短暫佔領雞籠，明鄭軍

面的海邊（dorp aen ‘t strant van Formosa tegens over Quelangh），而且在明鄭時代時，即 1666 年的荷蘭記錄，此社之位置與上述 1654 年的古地圖一樣，番社在一條長而寬的街道上（bestaende alleen in een lange en breede straet）參見：VOC1253, fol. 2196v; VOC1257, fol. 1316 等等。由此皆可證十七世紀時的 Kimaurij，或 Kimpaurij 主社，絕不在今天的金山鄉（金包里）境內，也非在基隆市的大沙灣。至於金山爲何會有如此社名，或許可能原因之一是十八世紀後，主社社人西遷到該鄉去；不過，也有可能是地名的變化所以致之。例如，「雞籠」原專屬和平島，但後來竟成大部分指對岸基隆市內的地名。

[19] J. E. Borao ed.,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67.

[20]《臺灣日記》第二冊 *DZII*: (E) 302。原文爲：Ieggende aen de mondt van de riviere Tamsuy, 2 dachreysens van hier (Quelangh),

[21]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74-77。

[22] 同上，頁 49-50。

[23] 資料見於《臺灣日記》等，不枚舉，並請參見：翁佳音，〈地方會議・聨社與王田 — 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五十一卷三期（2000），頁 267，279。

[24]《臺灣日記》第二冊，*DZII*，324。

[25]《巴達維亞城日誌（日譯本）》第二冊，II，頁 38，145 等；以及《臺灣日記》第二冊，*DZII*，313 等等。又，文中的漢商譯名，多有所本，並非肆意翻譯。這些漢商在臺灣各地的「開發」活動，不久應可以重建出來。

隊同時亦列陣駐紮淡水 ，臺南安平的船隻照樣到淡水收購硫磺與藤 [26]。關渡乃必經之地 。

清代是漢人大量移民與開發時期，北部與大陸的貿易日盛，台北盆地的出海口是淡水，但早期船隻多停靠關渡。 《諸羅縣志》載：『干豆門能容數百巨艦」[27]，及書中之插圖，可見關渡是一停泊容易而安全的河灣。清代文獻也指出關渡也是通往麻少翁、內北投、大浪泵、擺接諸番出入之要地[28]，內地商船來此載運五穀、鹿脯等貨物[29]。

由於有商機，自清初即有不少漢商活躍於北部地區，如社商、通事、夥長等。康熙 36 年（1697） 郁永河來台採硫磺時，接待者即是淡水社的「社長張大」[30]，在淡水上岸首日即被迎接「留止其家」[31]。郁永河指出社商勢力極大， 『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 常壓榨剝削番人，盡取番產，成爲「社棍」[32]。通事的影響力更大，乃操控官府與番人關係的要人。他特別提到在康熙三十四（1695）年前後已活躍北部及東部（後山）的通事賴科，稱：「有趨利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33]。顯然，賴科必定經營番產貿易，並且與番人關係良好，因而官府必須假借其力，方能與山區原住民交往。

賴科之活動據點可能在關渡附近，是以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鳩眾」建北台首座媽祖廟關渡天妃廟；而在康熙 54 年重建時，易茅以瓦，知縣周鍾瑄還親臨，題名爲「靈山」 而且「諸番並集」[34]。另外，藍鼎元稱：

查大　　社夥長許略、　渡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　夥長許

[26] VOC1264，fol. 180r。
[27] 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 種） ，頁 17。
[28]「八里坌在淡水港之南，港北爲淡水城，東入干豆門二十里，麻少翁、內北投、大浪泵、擺接諸番出入之路。」 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 種） ，頁 118；陳壽祺， 《福建通志臺灣府》 《台文叢 84 種） ，頁 378。
[29]「磺溪(水不可食，詳見「外紀」)發源於磺山西，過內北投，出於干豆門，入於海○八里岔之北爲淡水港，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內有大澳，分爲二港，西南至擺接社止、東北至蜂仔峙止。番民往來俱用蟒甲。蟒甲者，刳獨木以爲小船也。澳內可泊大船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亦到此。」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 種） ，頁 12~15。『淡水港海口，至干豆門水程十里，內有大澳，分爲二港，可泊大艘數百．」 洪亮吉， 《清一統志臺灣府》 《台文叢 68 種） ，頁 21；諸家， 《臺灣輿地彙鈔》 《台文叢 216 種） ，頁 67。
「淡水港…海口水程十里至關渡門．內有大澳，分爲二港：西南至擺接社止，東北至　紫峙止．番民往來，俱用蟒甲．澳內可泊大舟數百，內地商船間亦到此．」 周元文， 《重修臺灣府志》 《台文叢 66 種） ，頁 33。
[30]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台文叢 44 種） ，頁 57。
[31]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台文叢 44 種） ，頁 23。
[32]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台文叢 44 種） ，頁 36-37。
[33]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台文叢 44 種） ，頁 33。
[34] 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 種） ，頁 281；頁 286。

拔四人，皆能通番語，皆嘗躬親跋涉其地　社和番，熟悉山後路徑情形。[35]

關渡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必然亦經營漢番交易，才能通番語，也才會深入番地。顯然，媽祖廟必然是交易要地。的確，漢人多藉助於神明以維持商業秩序，是以康熙 51 年，在此建北台首座媽祖廟，絕非意外。廟址可能原爲番產交易所甚或原住民之公廨或瞭望樓。

三 、 渡宮在北臺發展史上之角色

關渡宮出現後，對關渡甚或北台之發展有何影響呢？大致有三，一是聚落逐漸形成，二是漁、商、農等產業亦產生，三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成爲北台之祖廟。

（一）聚落之形成：從番社到漢

由於關渡適合居住 ，原住民已經形成聚落 ，在漢人移入以前屬於北投社範圍。清代，漢人移民或從事漁業 、工商業 ，或向原住民承墾土地 ，發展農業 ，形成漢庄 ，先後出現關渡庄 、嗄嘮別庄 ，甚至關渡街 。

1654 年荷蘭人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 ，很明確把關渡描繪與標記成 「野生灌木林河角 」[36]。關渡畢竟位居交通要津之一 ，推測應有番人居住 。

清初淡水河入關渡口後，河面極廣，直至山麓一帶，大致順著台北往士林、其里岸、北投、忠義、關渡之公路線[37]。據康熙 36 年郁永河之《裨海紀遊》 『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爲大湖，渺無涯矣[38]」 康熙 36 年郁永河採硫磺時，形容它是瘴癘之地「人至即病，病輒死」 派往之隸役、兵卒亦驚恐卻步， 如使絕域』[39]」。又據《雍正臺灣輿圖》 ，入干豆門後，確實是一片汪洋，今日之關渡平原盡在河底。因此，番社均散佈於河邊，如北投社、奇里岸社、毛少翁社等，仍然過著漁獵生活。

早期原是北投社、小八里坌社，分居關渡山南與山北。據康熙年間的台灣府志與《諸羅縣志》 台北地區只有社，如康熙 56 年的《諸羅縣志》 有上淡水社、內北投社、麻少翁社、武嘮灣社、大浪泵社、擺接社、雞柔社、雞籠社、金包里社[40]；其中內北投社、麻肖（少）翁社、武嘮灣社、大浪泵社、擺接社五社在干豆門內[41]。依據地理位置，關渡應屬於北投社（嗄嘮別），但山北屬於小八里坌社（今竹圍）。

17 世紀初，閩粵一帶人口壓力日大，漢人紛紛東渡，台北盆地自然成爲入墾的目標之一。關渡乃台北盆地最早發展的聚落之一。關渡聚落族群之演變可能經過三

---

[35] 重修臺灣府志 卷二十一 檄淡水謝守戎　藍鼎元。
[36]重修臺灣府志 卷二十一 檄淡水謝守戎　藍鼎元，頁 49-50。
[37] 引自參考陸傳傑， 《裨海紀遊新注》 台北：大地，2001） 頁 69，附圖。
[38]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台文叢 44 種） 頁 23。
[39] 郁永河， 《裨海紀遊》 台文叢 44 種） 頁 16-17；頁 26。
[40] 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 種） 頁 31。
[41] 周鍾瑄， 《諸羅縣志》 台文叢 141 種） 頁 7。

階段：番社→番漢混居→漢庄。至康熙末年，漢人移民大增，演變爲漢番混居地。漢人聚落之形成當與關渡媽祖廟之興建有關。

約至乾隆年間，關渡蛻變爲漢庄。目前所見之最早紀錄是在乾隆 5 年（1740）劉良璧所修之《重修臺灣府志》內載：「淡水保管下：八里　莊、滬尾莊、大屯莊、竿　林莊、　渡莊、北投莊、八芝蓮林莊、奇里岸莊、瓦笠莊 …。[42]」由此可見，關渡莊至遲形成於乾隆 5 年（1740），可能是在雍正年間即已開始發展。

其後，有時稱「干豆莊」如《續修臺灣府》載：「北投莊(距　一百四十里)、奇里岸莊(距　一百三十里)、干豆莊(距　一百一十里)、八里　仔莊(距　一百二十里)、滬尾莊(距　一百三十里)、　林莊(距　一百四十里)。以上俱係　城北。[43]」

有時稱「關渡莊」如《淡水廳輿圖纂要》「:城北興直保(共一十九莊。兼東...）…和尚洲莊、武嘮」莊、三重埔莊、洲仔尾莊、　渡莊、八里　街、大坪頂莊…[44]」

民間亦稱關渡庄，根據所蒐集到之數件地契，其一在乾隆 23 年 12 月，上載：「…吳立受有自己開　水田壹段，犁份三張半，併茅屋壹座玖間，帶竹圍、農俱、家器等項，座落土名　渡　，東西四至載在上手契內。….託中引到余出頭承買」[45]。因此，至遲乾隆 23 年，關渡庄已經成爲民間通稱的地名。

至於康熙 51 年興建之靈山廟（天妃廟）至遲在乾隆 28 年已被稱爲「關渡宮」，該年有一地契載「　渡宮住僧綿遠　，….余霞岸承墾荒埔壹所　，坐在渡。[46]」

乾隆 57 年「余怡老有祖父水田壹所　，坐在　渡　，土名綿遠　，…乾隆 53 年四月…，.典與朱德　，…，典價佛面銀柒拾員　。今…杜賣找出盡價佛面銀伍拾員　。[47]」所以，關渡內尚有一小地名爲綿遠庄　。

（二）產業

1.商業：漢番交易地；淡水河流域交易中繼站

貿易可能是最早興起之產業，在日治時期鐵路與公路運輸興起以前，淡水河與基隆河是臺北盆地的交通動脈，關渡乃必經之地，早期當是漢番交易地，具有小型港口功能。關渡宮前亦形成一市集，商店自廟左側向外擴展，扮演小街市的角色。關渡宮因而設有公秤，維持公平交易，並收取香油錢[48]。

清初關渡顯然是漢人船隻停泊之港澳。方志亦指出關渡門是一港澳。諸羅縣志》

---

42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台文叢 74 種），頁 80。
43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台文叢 121 種）卷二，頁 76~78。
44 《臺灣府輿圖纂要》（台文叢 181 種），頁 266。
45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1。
46 朱華振提供文書。
47 朱華振提供文書。
48 關渡耆老黃三郎等言。

載：「干豆門能容數百巨　。[49]」又載：「淡水港，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內有大澳，分為二港，西南至　接社止、東北至蜂仔峙止。番民往來俱用蟒甲。…澳內可泊大船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亦到此。[50]」

由上可見，關渡在清初曾是停泊大陸商船的港灣。《諸羅縣志》所繪之圖，帆船繪於關渡口內，乃反映當時狀況[51]。

事實上，關渡與廈門、福州均可對渡往來，《諸羅縣志》載：

「康熙五十四年，干豆門重建天妃宮，取材　島；值西風，一晝夜而達。福州至淡水水程八更，較臺。為近。若半線置縣設營而分兵五百於淡水，因為立市　，通商賈於福州、廈門，不數年淡水一大都會矣。[52]」

硫磺是漢人所需的重要商品，產地磺山在北投，就在關渡近鄰。《諸羅縣志》載：「大　八里　，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　港南北匯。北港內北投（社名），磺氣噴天起」。[53]又載：「磺山在干豆門之左，山產磺，…山之下有磺溪，深可丈餘。[54]」自明代、西荷、至明鄭，硫磺均是交易品，清代亦不例外，如郁永河即經關渡而在其鄰近地區採買。清初方志均指出關渡位於通往「麻沙翁、內北投、大浪泵、擺接諸番出入之路。[55]」因此，為了接近硫磺產地，亦可能有船隻直接停泊於關渡。

如上所述，關渡宮附近當是漢番交往之地。

第一，關渡媽祖廟的興建者是通事賴科，經營番產貿易，在康熙三十四（1695）年前後已活躍北部及東部（後山）[56]。他選擇在關渡建首座媽祖廟，必然有其商業考量。

第二，除賴科外，上有媽祖廟廟祝林助亦是北台要人，與番人關係良好。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時，藍鼎元建議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夥長許拔四人，進入山區結合原住民，原因是四人「皆能通番語，皆嘗躬親跋涉其地□社、和番，熟悉山後路徑情形。[57]」由此顯示關渡廟與原住民之

---

[49]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19），頁 17。

[50] 「磺溪(水不可食，詳見「外紀」)發源於磺山西，過內北投，出於干豆門，入於海○八里岔之北為淡水港，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內有大澳，分為二港，西南至擺接社止、東北至蜂仔峙止。番民往來俱用蟒甲。蟒甲者，刳獨木以為小船也。澳內可泊大船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亦到此。」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19），頁 12~15。

[51]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插圖。

[52]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87-289。

[53]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68-269。

[54]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87-289。

[55]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118。《福建通志臺灣府》亦載：「八里坌在淡水港之南，雍正九年設巡司，北為淡水城，東入干豆門二十里，麻沙翁、內北投、大浪泵、擺接諸番出入之路。」《福建通志臺灣府》（台文叢 84 種，19），頁 378。

[56]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文叢 44 種）「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為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頁 33。

[57] 藍鼎元，《東征集》（台文叢 12 種），頁 25-26。丁日健，《治臺必告錄》（台文叢 17 種，卷一，頁 19。東征集：「查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夥長許拔四人皆能通番語，皆嘗躬親跋涉其地　社、和番，熟悉山後路徑情形；該弁其為我羅而致之，待以

密切關係。

第三，關渡天妃廟在康熙「五十一年，通事賴科鳩眾建；五十四年重建，易茅以瓦，知縣周鍾瑄顏其廟曰『靈山』[58]」，顯示其在北台漢番關係上的重要性。

第四，傳說關渡宮創於 1661 年[59]，此雖非事實，但事出必有因，此地原本即關渡遺址所在地，一向有人類居住。關渡宮廟址可能原爲番產交易所甚或原住民之公廨或瞭望樓。由目前廟中所遺留的傳統建材中，亦可察知此地乃漢番交易地。

2.漁業之發展

除了商業以外，漁業當是關渡首先興起的產業。如前所述，關渡乃淡水與海水交會之地，魚蝦豐富。諸羅縣志：「大　八里　，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　港南北匯。[60]」

早在清初，漢人已至淡水河一帶捕魚。康熙 36 年郁永河《裨海紀遊》稱：「余至之夜，有漁人結寮港南者，與余居遙隔一水，[61]」可見早有漁民在關渡鄰近地區捕魚爲生，清代移民自然以此地爲生計之首選。關渡因位於河海交會處，漁產極豐，乃居民之一大生計來源。事實上，關渡平原在清初時仍是河床或沼澤地，無法拓墾，因此漁民應是關渡最早的居民。而漁業是關渡居民自古至今的傳統行業，直至近年因淡水河嚴重污染方沒落。

除魚蝦外，淡水河亦盛產貝類，可供人類食用外，亦可做飼料，養殖家畜。關渡的養鴨業極爲著名，所生產的鴨蛋即與此有關，推測應可溯至清代[62]。唯因史料仍不足，有待進一步探究。

3.農業之發展

清初，淡水河入關渡門後河面相當廣闊，《諸羅縣志》：

「干豆門從淡水港東入，潮流分為兩支：東北由麻少翁、搭搭悠凡四、五曲至蜂仔峙、西南由武崙。至　接，各數十里而止。包絡原野，山環水聚，洋洋乎巨　也。

優禮，資其行李、餱糧之具，俾往山後採探有無匪類，屯藏巖阿？窮極幽遐，周遊遍歷；倘有游魂伏莽，立即飛報以聞，本鎮調遣官兵，剿臻勦滅，無許偶留根株，以貽地方之害。但恐許略等或有畏遠憚行，弗克殫心竭力，潛　近地，飾言相欺，斯亦不可不慮者。該弁披肝膽以誠告之，更選繪畫者與之偕行，凡所經歷山川疆境，一一爲我圖誌。自淡水出門，十里至某處、二十里至某處，水陸程途詳記圖上。至蛤仔難按卑南覓而止，百里、千里無得間斷；某處、某社、某山、某番，平原曠野，山窩窟穴，悉皆寫其情狀，註其名色。使臺灣山後千里幅員，一齊收入畫圖中；披覽之下，瞭如身歷。重賞酬勳，本鎮無所吝焉！山後廓清，是亦該弁一勞績也。即日舉行，無爲猶豫，慎速慎速！」

58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81。

59 《關渡宮簡介》。

60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68-269。

61 郁永和，《裨海紀遊》（台文叢 44 種），頁 27。

62 黃三郎言，其祖自清朝世代養鴨，人稱「港墘仔黃」，第六次關渡耆老座談會」 2001 年 12 月 18 日，於關渡宮。

[63]」

因此，農業發展主要在淡水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區，關渡地區應尚無農墾。 《諸羅縣志》：武嶗、大浪泵等處，地廣土沃，可容萬夫之耕。[64]」亦即在新莊、大隆同、艋舺等地。康熙 48 年陳賴章墾號請墾之地即是大加臘地方。內載「…西至干脰外，…所請四至內高下不等，約開有五十餘甲，並無妨　。[65]」這已墾的田園在哪裡呢？有人認爲在新莊與士林平原[66]，但仍須更有積極的佐證。

台北盆地到底從何地首先拓墾呢？有別於前面所述，據傳明鄭至雍正年間，鄭長、王錫祺墾奇里岸、芝蘭荒野。由於欠缺具體的史料，學界對此持保留態度。不過，無風不起浪，傳說常能提供有趣的線索，不可全然拒斥。有曰康熙 24、25 年（1685-1686）有墾戶林永耀、王錫祺引率移民拓墾關渡、北投、奇里岸一帶荒埔[67]。由於民間並無此盛傳，但事出有因，以下就加以分析：

康熙末年大陸人口壓力日益嚴重，此後至雍正、乾隆年間漢人大量入墾臺灣。急需土地的移民自然首先會選擇最近、最安全、最容易的地方開墾。當時沿淡水河、基隆河邊緣沿山地帶有小平原，可供農墾。 《裨海紀遊》：張大云：『此地高山四　，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　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68]」這類平原自然引起漢人拓墾慾。康熙 54 年調任北路參將的阮蔡文詠「淡水番」詩曰：「凡此淡水番，植惟狗尾黍；山芋時佐之，原不需大米，近日流亡多，云欲事耘　。[69]」可見康熙末年移民大增，企圖進行北台之拓墾。關渡至北投、士林、大隆同的山麓地帶地勢較高，山凹地區亦有平埔可供小規模拓墾，理應是首選之地。

根據蒐集之乾隆二十八年十月有一地契，載：

□□□業主　渡宮媽祖住僧綿遠，緣祖僧于康熙五十六年叨蒙諸邑周因公抵□，感賴神恩，善政□□□，□后左右崙及臨海唇埔，諭令附近　民墾耕徵納香祀。賴因是地水道莫求，無法（？）承墾。….迨　□□□□日繁，人煙頗輳，援（爰）有余霞岸承墾荒埔壹所，坐在　渡，東至港，西至山，南至吳家田，北至林家田宅，□□□□明白為界，自備工力　埤，陸　墾承（成）歷年徵納香祀。至于乾隆貳拾柒年，分憲干清丈報陞。[70]

由契字中可看出，康熙五十六年因諸羅縣令周鍾瑄至關渡，感賴媽祖的靈聖，遂劃分關渡附近「臨海唇埔」與民承墾，永爲關渡宮香祀，並以住持綿遠僧爲業戶。

---

[63]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87-289。
[64]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頁 287-289。
[65] 《臺灣大租調查書》，冊 1，頁 2。
[66] 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研究》（聯經，1989），頁 64。
[67]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頁 5。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6，1998），自序 1。
[68] 《裨海紀遊》，頁 23。
[69]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文叢 141 種，19），頁 268-269。
[70]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2。

然而，卻因爲缺乏灌溉水圳而未立即有人承墾，直至後來余霞岸方承墾荒埔壹所。

但到底關渡平原何時開始拓墾呢？推測可能是雍正年間。目前所見最早地契字是乾隆 23 年 12 月吳立受之「杜絕賣田契」[71]，再據該批地契一份清單，內載：

此業係于雍正五年利日存退與□宅鋤頭工資艮（銀）二・五兩。至乾隆元年，據通事何輝澤招佃吳立受開墾，收過犁頭艮（銀）五十兩。墾批內東至　竹小港，西至山為界，南至邱俊埔為界，北至林興荒埔為界。…吳立受于乾隆廿三年將業賣與余宅，價艮（銀）一千一百元。賣契並上手共三紙。[72]

可見雍正五年之前，關渡已有人墾荒，可能只是旱園，種植甘藷等旱作。

根據在乾隆二十三年吳立受賣田契，稱「有自己開墾水田壹段，犁分二張半，…帶山水　溉…。[73]」可見在乾隆 23 年之前，關渡已闢有水田。

不過，關渡平原本爲沼澤地，化爲陸地需要相當時日，甚至於需築堤排水方能可進行農耕，因此山凹平地可能先開拓爲旱園。其後，關渡平原一方面因陸化，一方面移民進行築堤排水，逐漸化爲農田，其方式可稱爲「圈田法」 據耆老訪談，當年陳、黃、洪三姓族人合力自山麓起，圈地築堤，再延伸至竹圍、八仙一帶；因受潮汐影響，故必須等到土壤中鹽分逐漸降低，才開始種植鹹草等耐鹼作物，待鹽分退去，才墾成水田。如此一步一步擴大水田範圍，而縮小基隆河下游的泛流區，當地人因此稱這個範圍內的農田爲「塭田」 ，意即低地田，常遭水澇之患[74]。

根據乾隆 35 年一地契，內稱：

　　嘮別　十二分半人等，于乾隆九年向北投社番承墾　竹濫洲壹所，東至北投熟田尾大路為界，西至　渡門大港為界，南至　嘮別小港為界，四至明白。…[75]可見大約至乾隆年間，關渡平原的拓墾區域日益擴大。

另可據 2002 年蒐集到數件地契佐證：

（1）乾隆 23 年 12 月，上載：「…吳立受有自己開　水田壹段，犁份三張半，併茅屋壹座玖間，帶竹圍、農俱、家器等項，座落土名　渡　，東西四至載在上手契內。…託中引到余出頭承買。[76]」

（2）乾隆 28 年地契上載：「 渡宮住僧綿遠，…余霞岸承墾荒埔壹所，坐在渡。[77]」

（3）乾隆 57 年，上載：「余怡老有祖父水田壹所，坐在　渡，土名綿遠　，…乾隆 53 年四月…，.典與朱德　，…，典價佛面銀柒拾員。今…杜賣找出盡價佛面

[71]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1。
[72]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14。
[73]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1。
[74] 耆老林連盛先生言，「第二次關渡耆老訪談記錄」，2001 年 5 月 18 日，於關渡宮。林先生日治高等科畢業，世代務農，農業知識極豐，
[75] 劉澤民《平埔族百社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59。
[76]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1。
[77]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2。

銀伍拾員。[78]」

（4)乾隆五十七年 立杜賣盡根契:「立杜賣盡根契人余怡老，有祖父水田壹所，數不計，犁分參張半，經丈明捌甲載納大租谷四拾四石正。[79]」

（5）同立付托鬮約字（族親林昇、林海、林達、林仙水等）：抵明：林座、林任遺置苧園、山園、厝地、廁池，址在　渡莊，東至大路，西至許家園岸，南至土地公巷，北至林遷官為界。其契卷存在長房林昇收執，年納　渡媽祖香燈銀貳角，再炤。　道光貳拾捌月拾月日　芝　堡　渡莊正[80]」

關渡農地有農田、山園。關渡平原之農田稱「塭田」，須先等鹽分淡化後方能耕種，土壤地力不高，經常年耕耘後方改善。主要作物爲稻米，但亦產鹹草（蘭草），可織爲草袋、草蓆等。至於山園則種植甘薯、花生、茶樹[81]，今馬偕護校鄰近地土名「茶園角」，可能清代即曾種茶，日治時仍有人種植[82]。

綜上，由於關渡沖積平原之擴大，關渡農業日益擴張，由漁村漸演變爲漁農雙棲村。

（三）宗教：北臺信仰重

關渡宮的信眾族群並不僅侷限於漢人　，拜殿尚存兩對乾隆壬寅年　（乾隆 47 年）由「北投社弟子喜助　」的龍柱，以及道光三年的重修所遺留右山門左邊立面麒麟堵的落款「弟子臺長生　」即是平埔族原住民　，由此一再突顯關渡宮和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除此之外　，在右山門右邊立面螭龍窗的落款　「廣東饒邑許國良」、「同邑太學生高國基　」，也揭露出漢人信仰同時兼有閩　、客籍信眾的存在。此次重修是關渡宮第二次大規模的重修　，在目前功德堂外牆猶保存有兩塊紀錄當時出資信眾 的石碑，其中除了信衆之外　，尚有多家船頭行捐款喜助的記錄。

然而，原建於山頂的關渡宮爲何在落成短短七年之後　，就遷建到山麓 ？根據方豪教授的說法　，他用這一現象來反推康熙臺北湖第一次水位下降即是康熙五十八年[83]。但是此次的移建　，常有人誤以爲即是現在關渡宮的所在位置　，其實正確的是位在象鼻穴正對獅子頭的地點　，座北朝南，也就是大約在關渡宮大停車旁福德正神殿的上方　（即財神洞出口上方　），因民國五十三年關渡隘口拓

[78]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7。
[79] 朱華振提供文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藏，T380D313-007。
[80] 《臺灣私法人事編》(台文叢 117 種)，頁 851。
[81] 黃三郎言，日治時「福仔」有茶園，〈第五次關渡耆老座談會〉，2001 年 12 月 3 日，於關渡宮。
[82] 黃三郎，〈第五次關渡耆老座談會〉，2001 年 12 月 3 日，於關渡宮。
[83] 方豪，〈臺北「江頭」之地名學的研究－附論吳廷華及其臺灣詩〉，《文獻專刊》 4 卷 1 期（1950，12）。

寬而無法明確指出其座落 。

明治三十年 ，關渡宮遷於現址 。肇因於活躍在清末日初的關渡頭人林大春[84]，綽號「 鮎呆春 」， 根據地方 上傳說 ：林大春承襲父業經營漕運 ，擁有十多艘大型帆船 ，往來於淡水福州之間 ，家境殷實富裕 ，看中關渡宮的地理風水 ，便將關渡宮的廟地買下 ，以爲自己的住宅產業 ，將關渡宮從原址遷到現址 。然而，林大春遷進新的宅第之後 ，不久所經營的航運事業頻頻遭到意外 ，導致家道中落，只好將買下的地產再度易手給大稻埕富商莊輝玉 ，並捐給智聖和尚整建爲慈航寺 。功德堂外牆亦留下當年重修石碑一塊 ，林大春擔任勸緣首董事 ，並先後共捐出二百八十元 ；古佛洞前放置的大石臼是林大春的船塢修船時舂石灰、油桐來填船縫所使用的器物[85]。

戰後關渡宮香火愈趨鼎盛 ，整修的 步伐也未曾停止 。民國四十四年將屋頂整修爲歇山重簷式 ，前殿擴增爲五開間並重建鐘鼓樓及後殿 ；民國五十五年增建古佛洞 ，日前於後棟完工之後 ，開始進行前殿屋頂結構的整修工程 。關渡宮經過多次整修 ，已不復明治三十年遷建前後的風貌 ，大部分傳統的建材也替換一新 ，只留下絕少的文物見證這座北臺第一間媽祖廟的風華 。

關渡宮傳統的祭祀圈因爲地方經濟拮据的因素 ，而僅僅侷限於附近的五角頭：上元角 、三將軍角 、媽祖角 、觀音媽角及天公角 ，這五個角頭分別負責關渡地區一年之中五大節慶祭典 ，除了該角頭的丁口錢外 ，並各有其經費的輔助來源。目前，由於工商發達與原有在地住民外移 ，關渡宮傳統的祭祀圈 ---五角頭已經模糊了原有的範圍劃分 ，連同主導祭祀的功能也幾乎一併消逝了 。只除了媽祖角及觀音媽角仍維持其祭祀活動 ，且只在三月廿三日媽祖聖誕依舊擁有熱鬧的迎神繞境場面 。

由於關渡媽祖的靈驗 ，讓北臺各地在媽祖聖誕及飛昇慶典的前後 ，多會來此迎請關渡媽祖 。傳統社會中也會利用水路 ，關渡媽祖被迎奉的範圍涵蓋了附近的北投 、士林 、內湖 ，並推展到汐止 、瑞芳 、九份等地 ，且向東方幅散至基隆，東北則達到臺北縣瑞芳鎮的鼻頭角 ；在日治時期 ，關渡媽祖迎奉的路線並沿北迴線鐵路而延伸 至宜蘭縣[86]。若以請神活動的範圍來界定關渡媽祖的信仰圈，那麼可見關渡宮的媽祖信仰在北臺的重要 。

---

[84] 臺灣總督府， 臺灣列紳傳》（臺灣總督府，1916），頁 53。 林大春，關渡人，泉州籍。其先乾隆中來於臺灣，力耕于野。父名林諒，傾心于貨殖，移居於艋舺。以回漕運輸迎客，經營多年，遂獲 巨利，後遷于今處。大春亦善繼述，爲人仁明謙恕，最樂善。明治三十年私設仁濟醫院於稻江，以救治窮民。世人賞揚其美德，四十二年三月授佩紳章。資產約一萬圓。年今六十四。」

[85] 民國 91 年 4 月 11 日，耆老林丁貴先生口述；民國 91 年 7 月 17 日，智聖和尚養子葉獻祥先生於北投自宅口述。

[86] 林美容、許谷鳴， 關渡媽祖的信仰圈》，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會議〉，2001，5）

結語

關渡位於臺北盆地西北角，屬於今日市區相對偏遠之地，然而，在史前時代即有人類居住，在 17 世紀前後又領先形成漢庄。考其原因，與北台最早、最大的媽祖廟關渡宮之出現有關。

媽祖是海神 ，爲閩南人所崇信 ，是以臺灣海港均有媽祖廟的出現 ，並成爲街庄發展的中心點 。然而，關渡與淡水港有一段距離 ，何以北台最早的媽祖廟在此出現 ？其主因是關渡的位置特殊 。

首先 ，關渡位於淡水港之頂點 ， 地勢較高 ，乃極佳之航海地標與避風港 。其次，關渡口兩岸有象鼻與獅頭二山聳峙 ， 形勢險要， 又是淡水河與基隆河匯流處與出海口 ， 控制水路交通之鑰 ， 具有商業機能 。因此，它成爲早期漢番交易地，更特別的是 ，在賴科倡導下 ，由漢人與原住民與共同創建媽祖廟 ，與其他純粹漢人所建之媽祖廟不同 。諸羅縣令周鍾瑄並親臨 ，題名爲「 靈山廟 」，充分顯現其所調和漢番關係之政治意涵 。

媽祖廟創建後，關渡由番社迅速轉變爲漢庄。首先，它在社會經濟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即以廟宇爲中心，形成漢人聚落，從而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促進漁業、商業、農業的發展。其次，它是北台成爲信仰中心，俗語「南有北港媽，北有關渡媽」 ,正是最好的說明。

蓬萊老祖與淡水八月「年例」祭典

簡有慶*

淡水地區的代表信仰神祇為清水巖的清水祖師，其中又以俗稱落鼻老祖的「蓬萊老祖」（簡稱「老祖」）最為興盛。早期祂僅是當地泉州安溪籍人士的鄉土神明，但祖師藉由其靈應事蹟的傳播，信仰範圍逐漸遍及北台灣。後因中法戰爭光緒帝所頒賜的御匾，而引發淡水、艋舺兩地為了爭奪老祖神像於日治時期對簿公堂，此結果造成蓬萊老祖神像半年駐蹕淡水，半年則駐蹕艋舺。

淡水居民祭祀清水祖師的「年例」為農曆的五月和八月，但五月是街上商業聚落的祭典，週邊的農業聚落則以八月為主。農業社會至今依然重視「崇功報德」的傳統，田頭田尾的土地公信仰仍盛，再加上落鼻老祖的靈驗，農曆八月蓬萊老祖恰駐蹕淡水，所以各地均有輪祀老祖的機會。而且八月祭典的背後也有「謝平安」的意義，故八月的「年例」不僅僅是奉祀土地公而已，而是將清水祖師及拜三界公謝平安的祭典三者合而為一。本文探討上述三者之祭典以及落鼻老祖的信仰，藉以了解各聚落間與該神信仰之依存程度和關連性。

關鍵字：蓬萊老祖、淡水祖師公、年例、秋社、謝平安、八月戲

一、 前言

台北地區民間信仰神祇的祭祀，以「年例」的方式來舉行。而「年例」一詞的使用，大概在台北盆地及其周圍的聚落較爲盛行，意思是指一年之中依照慣例所舉行的例行性祭典。而舉行「年例」的理由，有的是神明誕辰，有的是爲了紀念某件事情[1]；本文所提的「年例」，大多數是專指一地區爲了輪祀重要神祇所舉行的祭典，並將「年例」冠上某處某神之名號，例如「淡水祖師公的年例」、關渡媽的年例」等。而這種年例祭典的特色之一，通常都會冠上「恭祝某某神明聖誕千秋」的字樣，作爲祭典的正式名稱。筆者曾對士林地區的媽祖信仰作過調查，當地爲了崇祀關渡宮的「二媽」，將媽祖祭典安排於農曆四月下旬舉行，這種不在媽祖誕辰之日所舉行的特殊祭祀方式，就是所謂的「年例」[2]。淡水地區重要的年例祭典，大致上爲福佑宮的媽祖聖誕和七月普度、清水巖五月的祖師公遶境、各庄頭輪作「八月戲」，以及九年輪庄保生大帝的過爐等[3]。

---

*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1] 例如廟宇落成或神明入火安座的紀念日，也有的是紀念某位神明於該聚落的顯靈紀念日，例如士林陽明山平等里，該地的茶樹發生蟲害，後來有人發起迎請關渡二媽繞境，結果一場大雨將茶蟲給沖走，所以每年農曆二月十四日迎媽祖，當地耆老稱爲「紀念日」。另外深坑、石碇、坪林等地昔日也因茶樹受害蟲侵害，遂迎請關渡媽祖與艋舺祖師公（今改爲淡水祖師公）繞境，結果蟲害泯除，農作物大稔，遂成今日每五年於農曆五月迎關渡媽祖及淡水祖師。

[2] 有關士林地區媽祖的祭祀情形，請參閱筆者〈士林地區的媽祖信仰〉《台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四期，2002 年 10 月，台北：蘭臺出版社，第 87-122 頁。

[3] 有關淡水三芝地區九年輪庄保生大帝的祭典，請參閱戴寶村之〈淡水、三芝地區的大道公信仰〉《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1999 年 4 月，台北：國史館，第 367-387 頁。

目前淡水地區的代表性信仰神祇，一般人都會聯想到清水巖的清水祖師（俗稱「淡水祖師公」）雖然淡水祖師信仰於淡水甚至是北台灣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但是有關祂的研究一般多散見於各期刊報導[4]，學術論文方面目前僅有林渭洲於 1993 年撰寫的《台灣地區清水祖師信仰研究——以台北、台南地區爲中心》，文中於第四章「台北地區清水祖師信仰調查」將台北盆地之祖師信仰分爲「落鼻系」、昭應系」、泰山寺派」及「獨立型廟宇」，其中僅以「落鼻系」一篇有提到淡水清水巖的信仰。該文對於淡水祖師的信仰是以歷史文獻和耆老訪談鋪陳，並未以民間實際的祭祀情形來描寫，所以本篇論文所要強調的是，除了從文獻資料上來了解之外，並從淡水地區對祖師所進行的祭祀活動來探討。

至於淡水地區祖師的年例祭典，淡水街上每年以農曆的五月初六祖師得道紀念日[5]，來作爲恭迎祖師遶境平安的祭典日期，但是要了解淡水祖師在其他遠離淡水街核心的聚落崇拜的程度，就得從農曆八月的年例祭典來窺探之。而筆者所要研究的範圍，即以該月份輪祀淡水祖師最富靈驗的「蓬萊老祖」而舉行祭典的聚落，探討該神明對八月的年例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並藉此了解這些聚落與該神信仰的依存性和關聯性。

二、 淡水人對蓬萊老祖的崇信

（一）蓬萊老祖之來歷與建廟

清水祖師俗名陳普足，爲宋代泉州安溪地方之得道高僧，祖師所親闢之道場爲宋元豐六年（西元 1083 年）創建的安溪蓬萊山清水巖。該巖最早奉祀的六尊祖師神像，其來歷相傳爲祖師曾經醫治好宋代皇后的乳疾，當時祖師婉拒朝廷賞賜之金帛，指以一大塊的沉香木代替，而此木即爲神像之由來[6]。傳說祖師曾於該巖初築室時，與畚鬼鬥法而面部被煙燻黑，故今日神像造型臉色爲黑面，因此祖師又稱「烏面祖師」。根據淡水清水巖管理委員會所撰寫的沿革，提到廟中奉祀的「蓬萊老祖」神像，即爲安溪祖師廟沉香木雕造的六尊祖師像之一，據今百餘年前，安溪清水巖和尚恭迎祖師神像登陸淡水，並安奉於東興街（現草東里中正路）濟生號鄉紳翁種玉之家，由於佛力靈顯，爲指醒蒼生災厄，屢以落鼻示警，因此蓬萊老祖亦稱爲「落鼻祖」（又稱「落鼻老祖」簡稱「老祖」）祖師落鼻之典故，早在乾隆廿二年（西元 1757 年）的《安溪縣志》卷九〈仙釋〉即有提到：

> 宋普足禪師，永春人，……，今像黧黑，被畚鬼煙薰至然也。又傳山寇至斲斷像鼻，僧人取以傅之，了然無跡。如有不愜鼻輒不見，頃之或得諸袍袖中，或得之胸腹前……

，因而每遇天災地變、火災人禍，或是信徒冒瀆祖師等，皆有落鼻的現象。據傳

[4] 如滬尾文史工作室於 1991 年 7 月出版的《滬尾街》第四期〈清水巖上落鼻祖〉。

[5] 距安溪原鄉記載，祖師成道日爲農曆五月十三日，然淡水一地因故將選擇五月初六日作慶典，此緣故詳見下文。

[6] 陳根旺，《淡水清水巖建廟七十週年暨活動中心落成啓用紀念刊》，2003 年，台北：淡水清水巖。

蓬萊老祖只要一落鼻，其鼻子不見得是在神像週邊找到，有時可能會吸附於樹幹上或是電線竿上，但絕不可能會掉落到地面的；而且在主事者曉知祖師落鼻的旨示之前，祖師公的鼻子是無法用香灰黏合的。

關於淡水清水巖「蓬萊老祖」渡臺的歷史有許多種說法，大致分爲二類：其一是根據興福寮一帶的說法，當地有幾位人家在挑菅芒草送至淡水碼頭販賣時，途中遇到了一位來自泉州安溪清水寺的和尚向他們化緣，但這些人家境並不富裕，無法捐助經費幫助和尚返回中國。後來這幾名挑夫一連三日都遇見此和尚，無奈只好用三擔（一說是五擔）菅芒草換取祖師神像，俟後因興福寮人士認爲當地房屋矮小，無法容納祖師神像，於是才把祂留在淡水街上給民眾參拜，但每逢興福寮年例，祖師廟中的神像有權悉數請走，在台灣光復前「掛單」（或稱「請駕」）[7]亦不需添香油錢[8]。其二是相傳淡水翁種玉有偶然遇到一名來臺的安溪清水寺僧侶，因旅費被竊而到處化緣。翁氏乃募款資助該名和尚，於是和尚就把當時攜來的祖師神像讓渡給翁種玉。起先奉祀於翁氏祖廳，後因眾人參拜不方便才移至翁家「濟生號」的店舖內。此種說法在日治大正四年（西元 1915 年）的《臺北廳社寺廟ニ關スル調查》「祖師公宮沿革」[9]有所記載：

> 淡水東興街的翁冊（現管理人翁權之祖父）在偶然的機會，遇見了來自清國清水巖渡臺僧侶，此僧因旅費被竊而到處化緣。翁冊憐憫其遭遇，召集同志集資百數拾元，悉數讓予僧人，因此僧就帶其攜帶而來的神像度讓給翁冊。翁冊在今東興街一四番地家室中立廟，當地安溪人全體共同奉祀及捐獻寄附金。[10]

又根據當地翁家後代翁蘇明先生所述[11]，說明此神像是在清同治六年（西元 1867 年）清水巖僧迎請一尊祖師神像至南洋出巡，神尊爲祖廟鎮殿的六尊神像之一，船遇颱風翻覆，神像漂流至岸上被興福寮苦役所奪。翁瑞玉、翁種玉昆仲以淡水安溪六姓頭人的名義取得神像[12]，再附巖僧四百元（墨西哥鷹洋）安奉於東興街一五番地住所及重修完成的艋舺清水巖讓人膜拜，成爲兩地人心共同信仰所在。

再據《臺北廳社寺廟ニ關スル調查》「廟宇ニ對スルト人民歸響的情況」：

> 廟宇對於人民影響的情況：剛開始僅侷限於安溪縣人祭祀，近二十年來（約 1895 年前後）成為淡水街全部及附近市集部落人民信仰所在，其中以迎祖師公治病的場合最為盛大。

---

[7] 台灣民間到廟中或神明會請神時，都需要跟管理單位登記，而這個過程稱之爲「掛神尊」，而登記神尊出入駕的簿子即稱爲「掛（號）單」，最後「掛單」也成了請神的專有名詞。

[8] 由樹興里蔡國治先生口述（蔡先生自其祖父、父親皆擔任當地之保正、里長，其自身也擔任里長 20 多年）。

[9] 總督府調查課，《臺北廳社寺廟ニ關スル調查》（大正四年調查，台灣分館稿本）淡水公校調查，祖師公宮。

[10] 本段譯文援引自林渭洲《台灣地區清水祖師信仰研究——以台北、台南地區爲中心》，1993 年，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第 183 頁。

[11]本段文字援引林渭洲《台灣地區清水祖師信仰研究——以台北、台南地區爲中心》，1993 年，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第 174 頁。

[12] 此六姓爲：翁、洪、江、汪、方、龔。

廟宇的中心團體：主持祭祀及其他庶務的為翁權及周金釵兩名安溪人。歸依人民之數目：淡水支廳的全體住民。定期的祭典有舊曆正月六日及同年五月六日（祖師公的誕生日）每年兩回，其費用全市街的信仰者醵出。平時及臨時的祭典由附近居住者及翁權的家族，負責朝夕焚香禮拜事宜。建廟基本金，據傳由當時淡水駐地司令官孫開華寄附八百元，另傳部分人士近來提倡建築宏偉壯觀的新廟宇。[13]

由上文得知，蓬萊老祖一開始只限於泉州安溪籍人士祭拜的，直到清治末期、日治初期開始，才逐漸擴大到整個淡水街上和鄰近的聚落。因此參拜的民眾也是日積月累，先前的濟生號提供的祭祀空間不敷使用，故於日治昭和六年（西元 1931 年）成立「淡水清水巖祖師廟興建委員會」，並於現址興建清水巖祖師廟。我們翻閱了日治昭和六年十月一日《台灣日日新報》『淡水祖師廟興工建廟」一篇，報導了淡水清水巖建廟之情形：

淡水街崇祀清水祖師，神靈顯赫，信仰者甚多。惟廟宇係以民家充用，且甚狹窄，故每年祭典之日，參拜者輒擁擠不開，交通為之杜絕。於是該地士商每次提議別建廟宇，以壯觀瞻，然久議未果。者番幸李文珪氏等熱心鼓舞，擇定廟地，請官批認，遂於中秋前二日，由發起人等，邀集該地有志數十名，開建築磋商會於信用組合樓上，先由管理人陳有生氏起述開會辭，然後選任建築委員，許丙氏為委員長，汪明燦氏為副。其他盧阿山、李文珪、吳傳宗、雷俊臣……諸氏，皆為常務委員，即時協議建築諸事宜，滿場贊成通過。建築事務所設於淡水信用組合內，四方善信，有志寄附者，可向該事務所報明云。[14]

因爲當時淡水信用組合與祖師廟的合作，因此自建廟以來，淡水信用合作社和清水巖一直存有密切的關係[15]。

（二）中法戰爭與祖師信仰之擴散

蓬萊老祖之所以能夠由一位淡水安溪移民的守護神，變成淡水地區的代表信仰，或許是因爲老祖於中法戰爭護佑淡水有功的顯靈事蹟，以及祂在各地巡歷時所留下來的傳奇故事，都是促成老祖信仰的擴散。

清光緒十年（西元 1884 年）中法戰爭滬尾一役，淡水祖師庇祐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擊退法軍，當時的光緒帝因此頒賜「功資拯濟」的御匾嘉許蓬萊老祖，這即證明了清水祖師的信仰不單單只是保佑安溪籍人士而已，而是推展到整個淡水地區，甚至是北台灣。但是光緒帝的御匾也使得蓬萊老祖成爲淡水和艋舺兩地的分裂，這段故事在鈴木清一郎在昭和九年（1934 年）所著之《台灣舊慣冠婚

[13] 同註 8。

[14] 擔任常務委員者尚有：郭水源、林安貞、林金鐘、曾四安、林輝焜、李奎璧、陳有生、洪成敷、杜麗水、高桃仁、陳戇居、李兆麟、施添水、施禎益、洪泉、張媽進、林百鍊、林義禮、彭武曲、黃維周、李宗傳、陳玉順、陳金、洪有桐等。

[15] 根據《淡水鎮志》的記載，淡水信用組合成立於日治大正 7 年（民國 7 年）七月廿九日，台灣光復後於民國 35 年七月二十日改稱「淡水信用合作社」。

葬祭と年中行事》 對擊退法軍有靈驗的台北清水祖師廟」中也加以記載：

> ……關於清水祖師，原來是供在淡水一個姓翁的家裡，可以說是私人所供奉的神。後來中法戰爭時，清陸軍提督孫開華，由於向祖師禱告而擊退法軍，於是乃奏請朝廷頒賜匾額。可是翁家的房屋很小，沒有地方懸掛這塊御賜的匾額，後來艋舺新建好這座祖師廟，才把這塊匾額正式懸掛在廟裡，而落鼻祖也就應信徒的懇求，而變成一位來往於艋舺與淡水之間的神。不過淡水信徒非常多，因而就經常把祖師像留在淡水，乃惹起艋舺方面信徒的不安，而要求把祖師像正式供在祖師廟內。這時淡水的信徒就紛紛抗議說：『該神像本來即屬淡水之祖師，艋舺人無權奉迎』結果在大正六年六月，淡水的管理人為了祖師神像的去處寫了一封道歉信……[16]

但最後的結果，蓬萊老祖單月駐蹕艋舺、雙月駐蹕淡水，只是淡水街上的人替祖師舉行慶典的時間爲五月；又艋舺清水巖於農曆七月二十日舉行的中元普度，爲台北盆地安溪人重要的祭祀活動，祖師神像屆時務必留在艋舺，因而淡水人與艋舺人相互協調，故蓬萊老祖神像於六月駐蹕艋舺。

蓬萊老祖在中法戰爭顯靈一事，不能足以解釋落鼻老祖已成爲全數淡水人的信仰，因爲當時的光緒皇帝也分別頒發了「翌天昭佑」、慈航普度」的匾額給淡水福佑宮的媽祖及龍山寺的觀音，所以淡水祖師信仰的傳播，不僅是因爲中法戰爭而聲名大噪，而是以其靈著之事蹟擴散出去的。其實在此之前早有零星祖師顯靈的故事，其中以清同治丁卯年（西元 1876 年）[17]祖師遶境北縣石門落鼻之故事，最爲民眾津津樂道。同治六年十一月廿三日，石門人恭迎祖師遶境平安，結果繞至港口落鼻，庄民都覺得很希奇，都紛紛跑到港邊觀看，沒想到一時天搖地動，房舍倒塌，索幸人們爲睹老祖落鼻而避開了這場災厄，故石門人都認爲是祖師的庇祐。另外日治時期鈴木清一郎也曾紀錄祖師顯靈的例子[18]，祖師有一次在遶境時經過台北的龍口町（今台北古亭附近），神像忽然落鼻，沒多久沿路街道有人家因爲金紙的灰燼而引發火災。還有筆者於竹圍訪查時，也收到一則故事：有一年遶境隊伍經過吳厝時，恰巧該房舍忽然失火，眾人因忙於救火而將祖師神輿置於一塊石頭上，當滅火後轎班將神轎抬起，赫然發現剛剛轎子底下的石頭竟然是尖的，大家都認爲是祖師公顯靈，才使神轎不會摔下來。但是淡水祖師的信仰能夠大規模的擴散到淡水以外的地方，原因是各地每遭瘟疫、蟲害或是天旱祈雨等，都會來淡水迎請祖師，結果該地災疫泯除、稻禾纍纍；甚至有人相信把從祖師公神像底部挖下來的木屑當藥引，就能夠藥到病除。因此即使蓬萊老祖於該月駐蹕於淡水，但神像往往都會被外縣市的聚落「掛單」請去參拜，我們從淡水祖師廟的紀錄來看，二月老祖多在宜蘭、基隆、新莊、汐止；四月多在台北市北投區；五月在淡水、三芝、北投大屯山、紗帽山一帶，因此扣除正、三、六月祖師

---

[16] 本段譯文參考高賢治、馮作民譯之《台灣舊慣習俗信仰》（1971 年 8 月，台北：眾文圖書公司，第 304 頁）及感謝淡江歷史系蔡錦堂老師指導。

[17] 此爲淡水清水巖沿革所記載的日期。

[18] 引自鈴木清一郎《台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 對擊退法軍有靈驗的台北清水祖師廟」，1934 年 12 月，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第 285 頁。

駐蹕於艋舺的時段，淡水人要參拜蓬萊老祖，最快要等到農曆八月才行，所以農曆八月蓬萊老祖才是真正屬於淡水人的月份！或許因爲如此，淡水人在「作八月戲」謝平安的年例同時，都會到清水巖迎請落鼻老祖看戲之外，並藉此的機會恭請祖師暨眾神遶境庄內，以祈求合境平安。

三、淡水八月年例之演變及其特殊性

（一）淡水八月年例祭典之特色

淡水清水巖爲清水祖師舉辦的慶典一年有兩次，爲農曆正月初六到初十日祖師誕辰的禮斗法會，以及五月初五、初六日慶祝祖師得道紀念的暗訪與出巡。後者因爲有淡水街上之大、小公廟宇以及民間團體的參與，規模可謂淡水地區最大的神明綵街遶境活動，故堪稱淡水鎮一年一度的大拜拜。

關於五月初六祭典的由來，據吳勝雄撰之《北門鎖鑰》一書所描述[19]，相傳爲日治時期淡水地區發生了瘟疫，信徒請求祖師公出巡以掃除災疫，不過當時正月初六祖師的誕辰時間已過，但經地方頭人決議後擇於端午節隔天舉行，這樣一來可以利用準備端午節的供品祭拜，減少居民的負擔外，況且當時正爲農閒，故有較多的時間做準備，所以五月的年例因是而來。雖然五月的祭典真正發生的時間較難考證，但是在日治大正十二年（西元 1923 年）六月十三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淡水迎神豫報」中，就已報導了該地準備祖師遶境的時況：

> 淡水街於本月十九日即舊五月六日，照年例恭迎該地清水祖師遶境。當日行列，取齊場所，決定在龍山寺口。本年當事者又特製優勝旗分三等，將賞與藝閣其他優秀者，現各軒及諸團體，正盛為準備，屆時當有一番之熱鬧也。

但五月的年例慶典是以淡水街上的商業聚落爲主，而淡水街週遭以農業經濟型態爲重的聚落，則是以八月作爲年利祭典的時間，而這些聚落的祭典型態，可謂古代里社「秋社」祭典之遺俗。

「社」之崇拜始於何時已無從考證，我們只能從《史記》〈封禪書〉：「自禹興而修社祀」得知，『社祭」發源的年代是相當早的。至於社祭的意義又是如何呢？《孝經》〈授神契〉中有：

> 社者，土地之社，能生五穀。社者，五土之總神。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為神而祀之，報功也。

中國人以農立國，農作與土地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祭祀社神有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之意，並有「從功報德」的意涵在裡頭。故早在《詩經》〈小雅・甫田〉即有：

>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描述周人祭祀社神、田祖祈求豐收之景像。

古代人祭祀社神的日子稱爲「社日」，其又有「春社」和「秋社」之分，時

[19] 吳勝雄，《北門鎖鑰》，1978 年元月，台北：吳勝雄，第 124-135 頁。

間爲每年立春後的第五個戊日爲春社；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爲秋社。但現在舉行春秋二社的日期，多固定於二月初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的前後舉行。在清同治十年（西元 1871 年）陳壽祺等撰之《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風俗・漳州府〉「歲時」云：

> ……二月鄉民仿古春祈，斂金祀神，分胙而歸，謂之作福。……中秋祀土神，蓋古人春祈秋報之意，鄉人作社事，謂之社戲。……

同書卷五十八〈風俗・台灣府〉「歲時」亦記載：「中秋祭當境土地，張燈演戲，與二月二日同，春祈而秋報也……。」以及陳培桂撰之《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農事」有：「……歲時祈報，里中鳩錢祭社，祭必飲，謂之食福」，以上的文獻紀錄，都證明了八月的祈報乃源自古代的社祭。

由於一般人相信「有土斯有財」，土地公能庇祐一方土地的豐收及發展，我們在淡水鎮竿蓁里福德宮之《竿蓁林福德宮誌》，就能看到淡水人對於土地公信仰的起因：

> ……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披荊斬棘，興水利，勤農牧，厚植民生，皆由土地所出，全蒙福德正神所佑也……

，因此今日庄眾的發達、地方產也之繁盛，全賴福德正神土地公的護佑。不過以大台北地區而言，自台灣工業化之後，許多聚落逐漸朝向都市化發展，原來的農業經濟型態有所變革，甚至有些農地已不再耕種，土地的使用轉爲住家或是工廠、商業用地，這種改變也導致社祭形式的轉變。但只要一離開大都會核心的聚落，即使農業不再是整體經濟的主流，但是社祭仍然是該聚落重要的民間習俗。

從中國大陸原鄉一直延續到台灣，秋社祭典是十分的普遍，不過北台灣的秋社更結合了其他神明的信仰，而成了該地的特殊「年例祭典」了。我們綜觀台北盆地週邊的聚落，八月的例祭仍然是一年之中最熱鬧的慶典，諸如台北縣的五股鄉，其每年大拜拜的時間爲農曆八月初八日；而瑞芳鎮也是在農曆八月十五日前後，迎汐止（或木柵）尪公[20]、關渡媽祖和土地公；三峽、鶯歌地區也是於八月中秋節前後，恭迎三峽長福巖的祖師公及台北市文山區的尪公出巡遶境等[21]。

根據日人鈴木清一郎在 1934 年所著之《台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第三編年中行事と例祭」八月卷指出：

> 「謝平安」是每年八月以後所舉行的祭典，也就是還正月十五「祈福」時所許下的心願。因為人們都相信，自己一年來的平安和豐收，都是出於神的保佑，所以才舉行這種感恩祭。[22]

這項「感恩祭」乃是溯自古代的人們對於天、地、水三界神祇的自然崇拜，經由道教的衍譯成了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上、中、下元之三元信仰。所以信徒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天官紫微大帝聖誕之時，會作福許下新的一年平安順遂的良願，至當年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水官洞陰大帝聖誕的同時，就得要好好答謝三官大帝一年來的庇祐。不過根據地方耆老口述，淡水地區以往

---

[20] 台灣北部民間將保儀尊王、保儀大夫兩神皆稱呼爲「尪公」。

[21] 上述之聚落先前舉行祭典的時間不一，而現在的日期爲光復後國民政府推行「統一祭典」後抵訂的。

[22] 高賢治、馮作民譯，《台灣舊慣習俗信仰》，1971 年 8 月，台北：眾文圖書公司，第 482 頁。

於農曆十月也有祭拜三界公謝平安的習俗，但此習俗於日治時期已合併於八月的祭典了。無論耆老的記憶是否確實，但我們能看出淡水地區的農業聚落，至少選擇了延續里社「春祈秋報」的傳統，因此在許願酧還的日期方面，仍以農曆八月爲「謝平安」的日期。

然而淡水除了在八月祭拜土地公和三界公之外，也會至淡水街上的三間大廟恭迎清水巖的蓬萊老祖和五穀先帝、福佑宮的天上聖母與水仙尊王、龍山寺的觀音佛祖等「大公」神祇[23]，不過按照被迎請的神明於祭祀場所的座次和參拜順序來看仍以蓬萊老祖爲首，所以八月的祭典「清水祖師」一神可視作所有大公神明的總稱[24]。蓬萊老祖的信仰對於八月的年例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許是因爲祖師在大陸原鄉的信仰本質與農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相信祂能驅除蟲害、庇祐風雨調順、五穀豐登等緣故[25]；加上平時老祖常被外縣市的聚落迎請，淡水人也就無法參拜老祖，恰巧祖師於八月於淡水駐蹕，故只有在「作八月戲」的時候，方能請到蓬萊老祖至該聚落看戲，並恭迎聖駕遶境祈求合境平安，接受庄民的崇拜。也因爲蓬萊老祖正月駐蹕於艋舺清水巖，淡水人無法在正月初六祖師聖誕之日爲其祝壽，因此八月的年例亦是將三界公、祖師公、土地公三者的生日合併，所以這些聚落通常以「恭祝 三官大帝／清水祖師／福德正神 聖誕千秋」來作爲活動的正式名稱。

因爲淡水地區要舉行八月祭典的地方頗多，所以早期想要迎請老祖的庄頭就只好由祖師廟來排定日期，這些日期久而久之就逐漸固定了下來，由於舉行的日期是配合落鼻老祖的到來而訂定的，所以淡水的八月的年例除了是「土地公的年例」之外，亦是「祖師公的年例」。由於上述淡水八月的年例是「三合一」的祭典，所以各聚落準備供神祭的品，都需要依次先拜過三官大帝，然後是清水祖師（包括其他的大公神祇），最後才是福德正神[26]。另外道士在通疏朗誦丁口時，也要分成三份文疏進呈；至於歌仔戲班所演出的扮仙戲，也要連著扮三場。此外於敬神之後，另備「便菜飯」（即家常便飯）犒賞神明的兵將，和普施該境內的無主孤魂，所以整體的祭典展現了農人對於天地水界神祇的感恩跟對自然萬物的關懷。

（二）淡水的八月年例個案探討

依照淡水清水巖的出入駕登記簿及筆者的田野紀錄，於農曆八月輪祀蓬萊老祖的聚落各有十處，其舉行的時間日期如下：農曆八月初一日崁頂、埤島里（林

[23] 有些聚落也會因地緣或其宗族信仰，迎請台北北投區之關渡媽祖、北投石頭厝集應廟保儀尊王（高炬公）、淡水小坪頂集應廟保儀尊王（張炬公）、淡水三芝九年輪庄保生大帝……等。

[24] 這種現象在歌仔戲團給祖師公辦仙時，即恭祝祖師聖誕千秋的時候，都會一起將其他大公神明的尊稱一起唸過，或是以「列位尊神」帶過。而道士通疏文時，進呈清水祖師的文疏也是囊括其他的大公神明。

[25] 關於清水祖師原始信仰本質的研究，請詳見林國平〈清水祖師信仰探索〉，《圓光佛學學報》第四期，1999 年 12 月，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第 217-251 頁。

[26] 準備供品如牲醴、水果、糕餅等供品，都需要先拜三界公後再拜祖師公和眾神，最後才拜土地公；也有的聚落是將清水祖師及土地公同時參拜。

仔街）；八月初四日沙崙大庄；八月初六日樹林口、畚箕湖；八月初八日竿蓁林；八月初九日三空泉；八月十一日北投子；八月十三日竹圍；八月十五日鄧公里；八月十八日小坪頂；八月二十日興福寮。筆者僅以沙崙大庄、竿蓁林、北投子、竹圍、興福寮等五處聚落的年例案例，提出說明：

1.沙崙大庄

沙崙大庄原址在淡水新市鎮內，該聚落被政府徵收之後，就將原地主所奉祀的土地公廟遷出。剛開始並無爲這些土地公建廟，於每年八月年例時，於現址廟埕搭戲台處設置臨時的神壇祭祀，近幾年來仍住在大庄的居民才與政府爭取於現址重建新廟。此廟原稱大庄福德廟，然而庄內原先奉祀於民宅內之「第六代張天師」移祀於此廟中，天師某日降旨要求廟名後方應增加「府」字，才能配得上張天師的神格，故今日大庄居民重建的土地公廟，正式的廟名爲「福德廟府」。

大庄農曆八月的祭典共有玉皇上帝的爐主和三官大帝暨福德正神的爐主負責主持，惟收丁口錢及報名龜會等事務，改由福德廟府負責處理。大庄的慶典其實自初三日就已開始，它一直延續到農曆八月初八日爲止。每年農曆八月初三日的下午，地方人士即爲廟中奉祀的神明福德正神、張府天師、溫府千歲、黃府千歲等神祇舉行過火儀式；初四日上午才以鼓樂迎請關渡宮關渡二媽，淡水清水巖蓬萊老祖、五穀先帝，龍山寺觀音佛祖，福佑宮天上聖母、水仙尊王，金福宮池府千歲，油車口蘇府王爺，沙崙保安廟清水祖師，港仔平平安宮清水祖師，大庄行忠宮關聖帝君，庄內呂厝仙公及法主公等神祇，回到大庄後並舉行遶境；入廟後下午，廟方延請道士通疏，並由天公的爐主率領庄內各善信齊聚廟前參拜天公、眾神和犒軍。翌日初五日，下午兩點由亦由三界公暨土地公的爐主準備供品至廟前參拜。初六、初七兩日開放給信徒謝戲，至初八日下午由廟方之龜會敬獻龜戲並行犒軍及普施，而晚上龜會聚餐。

當地因爲新市鎮的開發，難以重見以往祭祀的規模，但這每年的年例祭典，也成了該聚落因爲新市鎮搬到外地的住民，能夠回到大庄與親朋好友相聚的日子。

2.竿蓁林

據《淡水鎮志》所載，此地三百年前已有原住民居住，往昔此地爲茅草茂生之地，竿蓁茂如林，故以「竿蓁林庄」爲名。該地的庄頭廟宇爲「竿蓁林福德宮」，依廟方《竿蓁林福德宮誌》云：

> ……自始綿延供奉至日據時代，分為內、外竿蓁林各自宮奉自今，前經里長張土盛先生與里內耆老歷數年商議和奉事宜，並由張里長與其宗族共同敬獻建宮土地，兩度恭請清水祖師公降鑑吉地。里內弟子及十方大德結緣鳩工啟建本宮，雖未竣工然吉辰福臨，擇於歲次乙亥年（1995）農曆十月八日吉時安座大典，爾今爾後竿蓁林福德宮全里民合境供奉，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庇祐斯土斯民永享安樂，僅

以為誌。

由這篇沿革誌可說明，該廟原來是內、外竿蓁林兩處土地公廟合建，並由當地張姓族人獻地，且恭請淡水清水巖祖師公親臨指點建廟之座向分金，故可見當地人對淡水祖師公之崇信。

竿蓁林舉行年例的日期爲農曆的八月初八日，是日上午於竿蓁林福德宮集合後，九點至樹林口（畚箕湖）請神，遶境隊伍遶行竿蓁林郊區後，約至中午回福德宮用點心，之後再繞行竿蓁林街區後，大約於下午一點入廟安座，並於下午兩點開始請行道士通疏、犒軍、普施等儀式。

竿蓁林於年例祭典當天，迎請了淡水祖師廟的蓬萊老祖、大祖，以及淡水媽祖、水仙尊王和龍山寺的觀音。因爲該地居民張姓人士居多，故也迎請小坪頂集應廟的張尪公、尪娘；另外蛤仔山也有高姓人士居住，所以也至台北市北投石頭厝集應廟迎請高尪公、尪媽[27]。

3.北投子

北投里昔稱北投子，該地所建的「北投里福德宮」土地公，原是附近耕田者自行雕塑神像供奉的，早期本無廟，神像供奉在爐主家中，於民國八十年由乩童指示建廟。在台灣光復以前，北投子土地公祭典後「吃福」爲農曆八月十四日，光復後將日期改爲八月十五日，並且增加農曆二月初二日。建廟後，爲慶祝入廟紀念日故改爲農曆十一月初九日。

民國九十一年淡水街適逢淡水三芝九年輪庄保生大帝值年，北投里分配保生大帝犒軍的日期爲農曆農曆八月初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初二日三天，北投里因此將原本農曆八月十一日的年例，延後至農曆八月十六日與大道公犒軍合併舉辦。當日所迎請的神明有清水巖蓬萊老祖暨分身五尊及五谷先帝，福佑宮媽祖與水仙王，九年輪庄保生大帝大帝至九帝、中壇元帥、黑虎將軍、五營斗和犒軍香爐，龍山寺觀音佛祖等。上午九時自淡水街上請神後[28]，沿中山北路、水碓街、北新路、登輝大道後，約十點半於北投子白厝吃點心；休息至十一點半又沿登輝大道、工商路、北新路（湖內）後，於下午兩點入廟，約於兩點半開始通疏、犒軍及普度。

4.竹圍

竹圍地區的年例爲八月十三日，據當地人士表示，早期竹圍八月十三的祭典是與紅樹林捷運站的外八勢（八勢里）小坪頂一起舉行的。在距今三、

[27] 台北盆地保儀尊王（俗稱「尪公」）林氏夫人（又稱申國夫人，俗稱「尪媽」或「尪娘」）的信仰，源自福建安溪大坪。當地高、張、林三姓宗族，相傳於清康熙年間渡台，並攜有尪公、尪媽及香爐各一，初於台北盆地北緣落腳，但因宗族繁衍，故往文山、新店等處開墾，於是以拈鬮方式，高姓鬮得尪公，林姓鬮得尪娘、張姓鬮得香爐，各姓自行祭祀。惟高姓宗族分五甲輪祀：1.頭重溪甲（包括深坑、石碇）2.內湖甲（包括興福、待老坑）3.大坪林甲（包括新店、阿泉坑、六張犁）4.景美甲（景美溪仔口、景美街）5.北投甲（北投嗄嘮別、滬尾、八里坌）；高姓五甲內於景美及北投建有集應廟。另外張姓宗族分九甲輪祀，其中於淡水的下圭柔山（義山里）、小坪頂、台北木柵等三處建有集應廟奉祀。林姓爲三姓當中勢力最小，昔日也有如高、張兩姓輪祀的情形，但今已不復存；林姓家族於台北萬隆建有集應廟奉祀。有關此信仰之研究，請參照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2003 年 6 月，師範大學歷史博士班畢業論文。

[28] 該年淡水街保生大帝「爐主厝」在中正路淡水農會旁。

四十年前，其祭祀的場地是竹圍的部落集會所（簡稱「部落」）惟因八勢里聚落距離竹圍較遠，且竹圍地區遶境的時間都往往延至黃昏，所以才於年例祭典當天獨立舉行。今日的竹圍庄八月的年例，以竹圍、民生、福德等三里合辦。

竹圍本庄祭典期間所迎請的大公神明有：關渡宮二媽、清水巖蓬萊老祖、石頭厝集應廟保儀尊王和林氏夫人[29]、竹圍慈玄宮玄天上帝等，卻不見淡水福佑宮的媽祖及龍山寺的觀音，這或許是因爲竹圍地近台北市的關渡，離竹圍最近的大廟爲關渡宮，而且竹圍亦是關渡宮普度五角頭之「關渡角」[30]，故所請的大公神明除了淡水祖師外，並無淡水街上的媽祖和觀音，不過自行獨立舉行祭典的外八勢仍有迎請。

今日竹圍本庄遶境隊伍至竹圍里福德宮集合後，隊伍從上午九時起駕，先往八勢里後再沿坪頂路至小坪頂，之後又至吳仔厝、石頭厝、忠義、光武技術學院、基督書院，中午返竹圍本庄吃點心，休息至下午一時遶境竹圍本庄，並於約下午四時於竹圍里福德宮入廟安座，並請道士通疏及野台戲扮仙，但是民生里自行於石橋頭福德宮延請道士通疏和演戲。

5.興福寮

興福寮當地的「真聖宮」，是當地舉行年例祭典的庄頭廟宇。真聖宮主祀清水祖師，配祀保儀尊王和林氏夫人、張公聖君等。此廟址在日治時期原是國語講習所，於台灣光復後才改爲廟宇。

該地的年例祭典日期爲農曆八月二十日，因爲八月十八日爲小坪頂的年例，所以興福寮是日上午九點直接至小坪頂集應廟請神，所請的有蓬萊老祖、蓬萊大祖，淡水街媽祖、龍山寺觀音及小坪頂集應廟張尪公、尪娘。因爲地方信眾的要求，才於十多年前迎請關渡媽祖，回程並經過台北市北投石頭厝集應廟迎請高尪公、尪媽。

據當地耆老表示，之前興福寮年例的日期並不固定，大多由祖師廟排定蓬萊老祖來分配日期，故也並非是一直到小坪頂請神，時而至樹林口（畚箕湖），但也有親自回街上請神[31]。我們從爐主每年保管的「求還龜紀錄簿」的登記得知，民國五十年至五十八年的祭典時間爲農曆八月十七日；在此之前也有固定在八月二十日；另外有一次是在農曆八月廿九日。該地祭典時主神爲三官大帝、清水祖師、天上聖母、保儀尊王、福德正神，所以戲班於道士通疏時，需要扮五場仙恭祝上述五位神祇聖誕千秋。

四、結語

[29] 竹圍聚落只有於高尪公五年一次駐蹕北投石頭厝集應廟時，才在年例祭典時迎請，距上次迎請時間爲 2001 年。

[30] 關渡宮普度五角頭爲：關渡角、嘎嘮別角、北投庄角、唋哩岸角、石牌角。其庄關渡角範圍爲台北市北投區關渡里、一德里、淡水鎮福德里、竹圍里、民生里、八勢里、坪頂里等。

[31] 淡水祖師廟規定，農曆八月舉凡迎請蓬萊老祖的聚落，必須於迎請日期的最後一天將祖師迎回祖師廟，但只有樹林口→竿蓁林→三空泉，以及小坪頂→興福寮例外。

淡水最古老的廟宇，爲草創於乾隆年間的淡水媽祖廟——福佑宮，它紀錄了淡水的拓墾歷史，是由汀州（永定）、惠安（螺陽）、南安（武榮）、永春（桃源）、安溪（清溪）、晉江（晉水）、同安（銀同）等州縣先民所胼手開墾的。然則「七邑」人士之中，汀州人最早於道光二年（西元 1822 年）建造鄞山寺奉祀定光古佛；之後咸豐初年泉郡晉江、惠安、南安「三邑」人士，亦建造龍山寺奉祀安海龍山寺分靈的觀音佛祖；而安溪人的信仰神祇清水祖師，要到日治昭和七年（民國廿一年）才建有清水巖奉祀。蓬萊老祖渡台將近一百五十年[32]，其建廟才只有七十多年的歷史而已，但是祂已卻是北台灣眾所皆知的祖師公，這是因爲蓬萊老祖靈應事蹟頻傳，每逢天災地變皆會落鼻示警，加上醫藥不發達的年代，祖師公亦扮演了驅瘟逐疫，或是讓農作物免於蟲害、護佑豐收等角色，所以每年固定迎請的聚落，最遠的紀錄可以抵達宜蘭[33]。

淡水地區的大廟，自古以來以「七邑」人士所建的福佑宮爲首，然經過時代的轉變，雖然淡水媽祖廟至今仍是淡水地區的大廟，其每年農曆三月的媽祖生，與七月廿二日的普度，除汀州籍人士之外，都能見到他們參與福佑宮的祭典。值得一提的是，福佑宮七月普度亦有恭請其他六邑的代表神明作客，而廟方所請的安溪籍人士之神明，即是以清水巖的清水祖師爲代表[34]。雖是如此，淡水祖師雖是安溪移民的守護神，但從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祂與淡水媽祖、龍山寺觀音成了全體淡水人的守護神。此外，光緒皇帝爲此戰役所頒賜之「功資拯濟」御匾，竟引發淡水及艋舺兩地爲了蓬萊老祖的神像，在日治時期對簿公堂告上法院，結果判決老祖神像半年駐蹕淡水，半年駐蹕艋舺的局面，這充分顯示了蓬萊老祖在北台灣的興盛。

農業社會最重視「春祈秋報」的傳統，意即在春天播種時，要對土谷之神祈求風雨調順、五穀豐登之外，到了秋天豐收之際，亦是要好好答謝神明一年來的庇祐，所以年終以前的「謝平安」也都是從八月秋收後開始進行。雖然在都市化的過程當中，使得原本的經濟型態有所改變，淡水地區除了老街爲商業聚落之外，其餘的產業仍是以農業爲主，是故八月的年例祭典有古代「秋社」之遺式。而淡水除了於八月祭祀土地公和三界公之外，同時該月恰爲蓬萊老祖駐蹕淡水，故在作「八月戲」的同時，也將老祖和街上大公之神明一起請來熱鬧，並答謝列位眾神一年來的庇祐，所以八月的年例祭典是結合了三官大帝、清水祖師、福德正神三種信仰。在祭拜的主神方面，除了三官大帝和福德正神是固定參拜的對象之外，其實所迎請的神明也會因爲當地的宗族、地緣等因素，而改變其大公神明的信仰，如本文提到的竿蓁林、竹圍、興福寮等，因爲該聚落有安溪大坪高姓或張姓的宗族，因此每年或是相隔一段時間，都會迎請北投石頭厝的高厓公或是淡

[32] 依淡水祖師廟方宣稱，爲清咸豐年間。（陳根旺，《淡水清水巖建廟七十週年暨活動中心落成啓用紀念刊》，2003 年，台北：淡水清水巖）

[33] 宜蘭地區舉逢迎神大祭，一般都會至淡水清水巖請祖師公，例如每年農曆二及八月，宜蘭市文昌宮都會迎請蓬萊老祖；宜蘭市三清宮二月開漳聖王聖誕，亦有前往迎請分身。

[34] 其他祖籍如螺陽爲靈安尊王、武榮爲廣澤尊王、桃源爲法主聖君、晉水爲保生大帝、銀同爲輔順將軍（舍人公）。

水小坪頂的張厓公參拜。又如興福寮和竹圍，因其地近台北市的關渡，所以在年例祭典時會前往迎請關渡媽祖；其中竹圍庄因爲是關渡宮普度五角頭之一，因此在祭拜時將關渡媽祖奉爲上座，甚至不用到淡水街上迎請淡水媽祖和觀音。另外在舉行年例的日期方面，有時也會配合其他重要的祭典而改變舉行的日期，例如2002 年的北投子，因淡水街區輪值淡水、三芝九年輪庄保生大帝，該聚落分配犒軍的日期距離舉行年例的日子相差不遠，於是該聚落決議將八月十一日的年例合併到八月十六日的犒軍一起舉辦，以節省開支與人力的動員。值得一提的是，因爲淡水新市鎮的開發，沙崙大庄因而廢庄，但是經由大庄人的堅持之下，該地之土地廟能重覓新址重建，而此廟爲每年八月慶典舉行的地方，並藉此把搬到異鄉的大庄人士重新給凝聚在一起，所以祖師公的信仰能發揮敦睦親友的作用。而祖師公的信仰不見得只有在年例祭典時才看得見，例如竿蓁里另闢新地興建的竿蓁林庄福德宮，廟地是該庄人士恭請淡水祖師前往鑑定的。

探究淡水祖師廟與當地聚落的關聯性，我們可以從它的祭祀圈來探討。首先，祖師廟的祭祀圈爲淡水街街區，其範圍可達協元、中興、新生、永吉、民安、清文、長庚、草東、鄧公、新興、水碓、文化[35]等里，是農曆五月初六參與清水巖祖師公繞行的聚落。雖然目前祭典形式並非以爐主制的模式進行，而是以廟方的管理委員會出面主持，而且祖師廟並無募集丁口錢，所有的綵街隊伍皆由上述里內的地方公廟，或是陣頭軒社自主性地參加清水巖的遶境，並個別引領清水巖中的其他祖師分身，可見祖師信仰在淡水街上已經是凌駕於其他的大公廟宇，具有主導性的地位，成了淡水街上的優勢主神。所以淡水郊區的聚落之年例，必須遷就於淡水祖師的信仰，當這些聚落在八月舉行祭典時，『清水祖師」一詞便是囊括了所有大公的神明的總稱。另外這些每年固定迎請祖師作「八月戲」的聚落，廟方規定舉凡淡水鎮內有恭請蓬萊老祖者，應於下一個「請駕」的聚落迎請之前，必須將神像送回淡水祖師廟；也就是說，欲恭請老祖神像者，必須親往祖師廟迎請，可見廟方對於八月的年例，仍具有某種程度的主導性。雖然這項規定有部分的聚落例外，但是祖師廟的這項不成文的規定，和其他迎請老祖的外縣市相較之下是多了一層約束，因爲蓬萊老祖神像在外縣市是被允許用「接力賽」的方式輪祀的，廟方只能依照出入駕簿的紀錄來掌握老祖的行蹤，但絕對無法對這些聚落訂下任何的規則。所以，淡水清水巖是用蓬萊老祖的神像來約束其他淡水街以外的淡水聚落，像這樣子的集權手段，已經把這些表面上看似若即若離的聚落給維繫了起來。

淡水清水巖是淡水地區的大廟之中，年紀最輕的廟宇。雖然如此，但因爲祖師每當淡水居民在最無助的時候，都能夠發揮其宗教心靈寄託的功用，所以在時代的轉變之下，清水巖已成了跨越逐群的大廟，逐漸取代了淡水其他大公的廟宇，而成了淡水信仰的代表，甚至信仰也隨著祂的靈驗事蹟，擴散到整個北台灣，故外地人進而將祖師稱作「淡水祖師公」。爲了以信仰本身需要藉助祭祀活動才

[35] 日巡與暗訪的路線有些許的不同，文化里因街道狹窄，隊伍出入不便，所以初五日暗訪時以乘坐小型攆轎的老三祖巡之。

得以具體呈現的看法，本文特別用淡水地區八月祖師公的年例，取代眾人所深知的五月初六的祭典，以具體了解淡水祖師對於淡水人「年例」的影響，也希望有機會能更進一步探討台北盆地及其周圍聚落之相關祭典，藉以探討淡水祖師及其他神明的信仰對於北台灣「年例」之影響。

淡水地區農曆八月年例祭典行事表

日期	聚落	參拜地點	所恭請大公神明	附註
8月1日	崁頂里 埤島里 (林仔街)	埤島社區 活動中心	蓬萊老祖、淡水媽祖、水仙尊王、五穀先帝、觀音佛祖、行忠堂五聖恩主、庄頭土地公	昔日農曆7.29普度，7.30土地公戲，8.1 天公戲。今日7.30 普度，8.1 天公及土地公戲合辦，未舉行遶境。
8月4日	沙崙里 大庄	大庄 福德廟府	關渡二媽、蓬萊老祖、五穀先帝、觀音佛祖、淡水媽祖、水仙尊王、金福宮池府王爺、油車口蘇府王爺、沙崙清水祖師、港仔平清水祖師、大庄行忠宮關聖帝君、庄內呂厝仙公及法主公	農曆8.3過火，8.4恭請大公神明並遶境、演天公戲、通疏；8.5 演三界公及土地公戲，8.8演龜戲、龜會聚餐。
8月6日	樹林口 畚箕湖	爐主宅 附近空地	蓬萊老祖、蓬萊大祖、淡水祖師（老三祖）、五穀先帝、淡水媽祖、水仙尊王、觀音佛祖、小坪頂恆公及恆娘、福德正神	樹林口和畚箕湖聯合舉行，8.6 繞境後通疏演大戲，8.7 演龜戲。祭祀場所每年不一，街以爐主宅附近之空地舉行。
8月8日	竿蓁林	竿蓁林 福德宮	蓬萊老祖、蓬萊大祖、五穀先帝、淡水媽祖、水仙尊王、觀音佛祖、小坪頂張恆公及恆娘、石頭厝高恆公及恆媽	每當淡水值年張恆公老祖及北投值年高恆公老祖時，年例皆會恭迎老祖、老媽神像。年例當天繞境、通疏、演大戲。
8月9日	三空泉	爐主宅 附近空地	蓬萊老祖、蓬萊大祖、五穀先帝、淡水媽祖、水仙尊王、觀音佛祖、小坪頂恆公及恆娘、關渡大媽、庄內土地公	舉行祭典場地圍爐主宅附近之空地，若逢淡水值年張恆公老祖時，年例當天皆會請老祖、老媽。繞境後通疏、演戲。
8月11日	北投子	北投里 福德宮	蓬萊老祖、蓬萊大祖、淡水祖師（二祖、三祖、十七祖）、五穀先帝、淡水媽祖、水仙尊王、觀音佛祖、九年輪庄保生	2002 年淡水值年九年輪庄大道公，將年例延後於8.16的犒軍。年例當天繞境後，通疏、演大戲。

			大帝、行忠堂五聖恩主	
8月13日	竹圍里	竹圍福德宮	蓬萊老祖、關渡二媽、關渡媽祖（惠仁媽） 慈玄宮上帝公、石頭厝高尪公及尪媽	農曆 8.9 即恭請、淡水祖師關渡媽祖、慈玄宮上帝神像至廟內看戲，而蓬萊老祖及關渡二媽爲年例前一天才迎請的。若逢北投高尪公值年，才會於年例恭請高尪公及尪媽。
8月13日	民生里	石橋頭福德宮	淡水祖師、關渡媽祖（慈德媽） 慈玄宮玄天上帝	與竹圍里福德宮合辦繞境，若逢北投高尪公值年，才會於年例恭請高尪公及尪媽。農曆 8.9 即恭請、淡水祖師關渡媽祖、慈玄宮上帝神像至廟內看戲。
8月13日	外八勢	八勢里活動中心	淡水祖師（新二祖） 關渡大媽、淡水媽祖、觀音佛祖、石頭厝尪公及尪娘、庄內土地公	昔日參與竹圍地區繞境，今自行舉行祭典。年例當天繞境後，通疏、演戲。
8月15日	鄧公里	庄仔內福德宮	蓬萊老祖、淡水祖師（老三祖） 淡水媽祖、觀音佛祖、鄞山寺定光古佛	淡水值年九年輪庄大道公時，年例當天前往爐主厝恭請。繞境後通疏、演大戲。
8月15日	水碓里新興里	水碓仔福德宮	蓬萊二祖、淡水祖師（二祖、老三祖 ）、淡水媽祖、觀音佛祖、九年輪庄保生大帝、沙崙祖師	未舉行繞境活動，於祭典當日下午通疏、演大戲。
8月15日	新興里	新興里福德宮	淡水祖師（十三祖） 淡水媽祖、觀音佛祖、沙崙祖師、油車口蘇府王爺、金福宮池府王爺	於 8.14 夜舉行暗訪，正日當日僅於下午通疏、演戲。
8月18日	坪頂里	小坪頂集應廟(張姓尪公廟)	蓬萊老祖、蓬萊大祖、淡水媽祖、庄內土地公	淡水值年張尪公老祖時，會恭請老祖、老媽參與繞境，下午有通疏及演大戲。
8月20日	興福寮	興福寮真聖宮(清水祖師廟)	蓬萊老祖、蓬萊大祖、關渡副二媽淡水媽祖、木柵集應廟老祖及老媽、小坪頂尪公及尪媽、石頭厝尪公及尪媽、庄內土地公	每當淡水值年張尪公老祖及北投值年高尪公老祖時，年例皆會恭迎老祖、老媽神像。年例當天繞境後通疏、演大戲；8.21 演龜戲。

參考書目

一般史料

王國璠、方豪主修

1965，《台北市志稿 》，台北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印行 。

王國璠主修

1974-1980，《台北市志 》，台北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排印本 。

台北市安溪同鄉會
1967，《安溪縣志》（暨附編）乾隆廿二年重修，台北，台北市安溪同鄉會。
白惇仁
《淡水鎮志》，台北，淡水鎮公所。
林熊祥等修
1950-1951，《台灣省通志稿》，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排印本。
周鍾瑄
1717，《諸羅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周元文
1712，《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六六種，台北，大通書局印行(1984)。
莊　成
1757，《安溪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徐福全
1997，《石門鄉志》，台北，石門鄉公所。
陳壽祺
1871，《福建通志》，中國省志匯編之九，台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陳培桂
1871，《淡水廳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3）。
盛清沂主修
1960，《台北縣志》，板橋，台北縣文獻委員會排印本。
張炳楠監修、李汝和主修
1971，《台灣省通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印行。
劉　佑
1672，《南安縣志》，《安溪續志》，台北，陳其志基金會（1974）。
陽思謙
1612，《泉州府志》，台北，學生書局影印發行(1987)。
懷蔭布
1763，《泉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羅清霄
1573，《漳州府志》。

專書

文崇一等

1975，《西河社會的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市民政局
1985，《台北寺廟概覽》，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發行。
王世慶
1996，《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科研究所。
李獻璋
1995，《媽祖信仰研究》，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
李天錫
2004，《華僑華人民間信仰研究》，長沙：中國文聯出版社。
林國平、彭文宇
2001，《福建民間信仰》，福建，福建人民出版。
林國平
2003，《閩台民間信仰源流》，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阮昌銳
1982，《台灣的都市化民間宗教信仰》，台北市，台灣省立博物館發行。
吳勝雄
1978，《北門鎖鑰》，台北：吳勝雄。
陳紹馨、傅瑞德
1968，《台灣人口之姓氏分布》，台北，台大社會系印行。
趙世瑜
2002，《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信仰》，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
戴炎輝
1974 再版，《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發行。
鄭振滿、陳春生主編
2003，《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劉枝萬
1974，《台灣民間信仰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專刊二十二號。
劉曉春
2003，《儀式與象徵秩序》，北京，商務印書。
劉嘉仁
2001，《金包里媽祖》，台北，金包里堡文史工作室發行。
周宗賢
1983，《台灣的民間組織》，台北，幼獅文化公司發行。
董芳苑
1984 增訂版，《台灣民間祀神之研究》台北，長青文化公司發行。

鈴木清一郎著，高賢治、馮作民編譯
1984 再版 ，《台灣舊慣習俗信仰 》，台北 ， 眾文圖書公司發行 。
施翠峰
1985，《台北寺廟神祇源流 》，台北 ，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發行 。
施添福
1987，《清代在台漢人的組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 》，台北 ， 師大地理系印行 。
張建隆
1996，《尋找老淡水 》，台北 ，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
蔡相煇
1989，《台灣的祠祀與宗教 》，台北 ， 臺原出版社發行 。
潘振球
1996，《台灣省警務檔案彙編 —民俗宗教篇 》，台北 ， 國史館 。
謝國雄
2003，《茶鄉社會誌 》台北 ，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蕭 放
2004，《歲時 — 傳統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 》北京，北京中華書局 。

期刊論文

王一剛
1953，〈淡水河流域的變遷 〉，《台北文物 》1-1：33-35。
王世慶
1971，〈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歷史 〉，《台灣文獻 》23-3：1-38。
尹章義
1980，〈台北平原墾拓史研究 （1697~1772 年），《台北文獻 》直字第 53、54 期合刊 ：1-190。
1985，〈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 -以客屬潮州人開發臺北以及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爲中心所作的研究 〉《臺北文獻 》（直）74：1-28。
1990，〈臺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 〉《輔仁歷史學報 》8：64-78。
白長川
1984，〈台灣人血緣地 --安溪各鄉鎮之姓氏分佈 〉，《台北文獻 》直字第 67 期：55-72。1984 〈安溪全縣各姓氏祖居發祥地之統計 〉，《台北文獻 》直字第 68 期：13-147。
李添春
1968，〈台灣住民之家神及其對神之觀念 〉，《台灣風物 》18-2：

9-14。

李豐楙

1993，〈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之狂文化〉，《中外文學》第 22 期：116-154。

邱彥貴

1992，〈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粵東移民原居地文獻考察的檢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3 期，頁 66-70。

1993，〈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佈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東方宗教研究》新 3 期，頁 109-146。

1995，〈嘉義廣寧宮二百年史（1752~1952）勾勒 -一座三山國王廟的社會史面貌初探〉《臺灣史料研究》6 號，頁 69-89。

2002，〈台北盆地的「尪公」信仰調查研究〉，台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林長青

1979，《台北市安溪同鄉會特刊第二輯》，台北，台北安溪同鄉會。

林國平

1999，〈清水祖師信仰探索〉，《圓光佛學學報》第四期，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第 217-251 頁。

林泗水

1967，〈從台北文獻看安溪與台灣民族淵源〉，《安溪縣誌附編》：73-78。

林美容

1986，〈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53-111。

1990，〈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8 期：41-104。

2001，〈七星地區漢人社會的建立與關渡媽祖信仰圈的發展〉，《七星地區田園文化調查研究與發展計劃》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田園文化基金會。

林偉盛

2000，〈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北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林文龍

1998，〈台灣平埔族媽祖信仰述略〉，《閩臺媽祖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兩岸學者論媽祖》》，頁 217-230。

施振民

197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 --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36 期：191-208。

高賢治

1998，〈頂北投庄的年例祭典〉，《台北文獻》直字第 126 期，頁 1-32。

1998，〈大石牌公廟及其歲時祭祀〉，《台灣風物》第 48 卷第 1 期，頁 137-176。

莊英章

1973，〈台灣漢人宗教發展的若干問題 --寺廟宗祠與竹山的墾殖型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36 期：113-138。

許嘉明

1973，〈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方組織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36 期：165-190。

紀榮達等

1998，〈淡水河口寺廟系列 —關渡宮（一）〉，《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過去、現在、未來》，頁 389-474。

陳根旺

2003，《淡水清水巖建廟七十週年暨活動中心落成啓用紀念刊 》，台北：淡水清水巖。

陳漢光

1972，〈日據時代台灣漢族祖籍調查 〉，《台灣文獻》23-1：85-104。

張珣

2002，〈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58 期：78-106。

傅算寶編

1996，《泉州文博》第三期，泉州，泉州博物館。

劉枝萬

1963，〈清代台灣之寺廟 〉，《台北文獻》第 4 期：10-120；第 5 期：45-110；第 6 期：48-66。

1960，〈台灣省寺廟教堂名稱 、主神、地址調查表〉，《台灣文獻》11-2：37-236。

鄭振滿

2003，〈明清福建里社組織演變 〉，《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335-353。

潘朝陽

1960，〈台灣民俗宗教分佈的意義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 12 期：27-50。

戴寶村

1999，〈淡水、三芝地區的大道公信仰 〉，《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台北，國史館：367-387。

簡有慶
2000，慈誠宮與士林居民的信仰〉淡江歷史系《史化》第 28 期：91-108。
2002，北台灣漳州人祭祀圈之探源—以士林芝山巖四角頭爲例〉，國科會九十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2002，〈士林地區的媽祖信仰〉，《台灣宗教研究通訊》第 4 期：87-122。

博碩士學位論文

王志文
1999，《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文化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滿紅
1976，《茶、糖、樟腦業與晚清台灣經濟社會變遷》，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偉盛
1988，《清代台灣分類械鬥之研究》，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渭洲
1993《台灣地區清水祖師信仰研究——以台北、台南地區爲中心》，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
范純武
2003，《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論文。
陳亦榮
1986，《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文化史學所碩士論文。
陳其南
1975，《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建立及其結構》，台大考古人類所碩士論文。
莊芳榮
1987，《台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文化史學所碩士論文。
溫振華
1978，《清代台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相煇
1976，《台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文化史學所碩士論文。
蔡淵絜
1980，《清代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麗珍

1988，《台灣民俗宗教之空間活動　「玄天上帝祭祀活動爲例　」》，，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日文部份

岡田謙

1938，〈台灣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範圍〉，民族學研究》第 4 期，1-22。

丸井圭治郎

1919，《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北，小塚本店印行。

宮崎直勝

1942，《寺廟神の昇天—台灣寺廟整理覺書》台北，日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發行。

宮本延人

1988，《日本統治時代台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日本奈良，天理教道友社印行。

曾景來

1933，《台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要覽》台北，台灣社寺宗教刊行會發行。

1939，《台灣宗教の迷信陋習》，台北，小塚本店印行。

增田福太郎

1935，《台灣本島人の宗教》，日本東京，明治聖德紀念會。

1939，《台灣の宗教》，日本東京，養賢堂發行。

台灣總督府編

1915，《台北廳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原稿本。

淡水河岸移民宗族組織與原鄉比較

----以西亭陳為例

王志文*

摘　要

宗教信仰可說是人類解決生存問題的工具之一 ，也就是說宗教信仰是一種生活方式，密切的與個人生活及社會秩序相關聯，各地方宗教信仰色彩亦隨地方社會傳統文化與生態環境之不同而有差異，各自發展成其獨特的地方宗教信仰文化色彩，瞭解地方宗教信仰可窺知地方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透過實地的觀察紀錄，再配合事後資料的分析比較，可以徹底了解一個地區發展歷程。

上訴之宗教民間組織，是最基層的社會組織，也反應出人民對環境適應與人際網絡互動，更是一個社會文化經濟的總體反映；若是同樣的族群在不同的地區，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後，再來分析比較兩地之異同，即可了解兩地之社會文化之不同點。

如同自然科學在實驗室中 ，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因素分析，可更清楚造成差異的原因為何 。只是人群更複雜因素更多 ，要靠長時間的實地觀察，深入組織中了解前因後果，才不會被表象所誤導蒙蔽，形成想當然爾的錯誤推論。

台灣的漢人，大多來自東南沿海閩、粵一帶人民，在移民的過程中 ，自然也把原鄉祖籍地的生活模式，帶來移墾的新環境中，其中包括宗教民俗以及民間社會組織。只是台灣孤懸海外，環境與原鄉有差異，有原住民的對抗，其他漢人移墾族群的競爭；再加上後來的日本統治，海峽兩岸的分隔，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發展。這百年來的區隔已經足夠使同一個族群 ，在文化發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有一些是不會更改的價值觀，這些影響都會反映在基層的民間組織中。

關鍵字：淡水河岸　祖公會　角頭　西亭陳　輔順將軍

* 臺北市社子國小教師、文化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一、前　言

在研究台北地區的宗教活動與村落關係，首推日人岡田謙所著〈台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1] 原文在《日本民族研究》第四卷第 1 號，其內容提到其通婚範圍與中元祭祀圈在相似之範圍地區內。

士林之漳州人分四團體，每四人一輪，同安人則是每三年在台北市大龍峒保生大帝廟舉行中元祭一次，乃是他們與住在北投、淡水並淡水河對岸蘆洲、三重一帶同安人之共同大事。

在文內岡田謙也介紹各種「會」的組織，其中也包括神明會、祖公會和祭祀公業，因而在其結論本島人(即台灣人)的集團生活，常與祭祀結合，其無論地域的團體，或家族團體，或職業團體，均與祭祀有密切關係。

故欲知台灣村落之地區族群或家族團體的特質　，必須由祭祀範圍問題入手。因而可以知道欲了解某地的族群特質，觀察其宗教祭祀活動是很重要的。

二、「祖公會」與「角頭」定義

「祖公會」在日人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習俗信仰》一書中，指出祖公會是以祭祀祖先爲目的所組織的團體，依會員捐款的多寡，以定每個會員所擁有的股份。[2] 而載炎輝也在《清代台灣鄉治》中，提到族人按股湊錢而購置田產稱爲合約字公業或稱爲祖公會。[3] 而莊英章也提到了這種合約字宗族大多出現在漢人移墾台灣初期，墾民爲了尊宗敬祖與相互合作的目的，而以契約認股的方式組成一種宗族團體。[4] 他同時區分「宗親會」與「祖公會」之不同：二者雖然都是一種法人團體(corporate group)，然宗親會的組織較爲鬆散，只要同姓隨時可以要求；合約字宗族的派下人則較具排外性，僅限於當初加入會份的後代並不能隨時申請加入。[5] 莊英章更進一步解釋其本質；表面上是祭祀公業，以祭祀其共同之上代祖先爲目的，事實上是一種土地投資團體，透過宗親的關係聚集勞力與資本，積極從事墾闢工作。它所扮的功能與神明會極爲相似，兩者都具有共同投資相扶相持之目的，只不過它以祭祀祖爲手段，而神明會以祭祀神明爲手段。兩者可以說都是一種共同利益團體(common interest group) 。[6] 這些學者都強調祖公會的土地投資行爲以做爲日後祭祀費用的契約型態，但事實上仍有一些祖公會與神明會並無恆產，而是靠「撿緣金」、「丁口錢」、捐款奉獻」來維持其費用開支。因而並不能武斷地以此定義「祖公會」。

而其內部的組成份子，除了有純血緣性的共同祖先型式的祖公會外，另一種是基於血緣與地緣的基礎所組成的宗親團體，也就是移民時期一些來自同一地區的同姓者所組成的團體，透過祭祀遠古的共同祖先而團結起來。[7] 而其性質與神

[1] 岡田謙著、陳乃　譯，〈台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台北文獻》9(4):14-28。1960 年。
[2] 鈴木清一郎著(高賢治、馮作民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8，頁 54。
[3] 戴炎輝，1979，頁 771。
[4] 莊英章，1985，頁 100。
[5] 莊英章，1985，頁 100。
[6] 莊英章，1985，頁 101。
[7] 莊英章，1974，頁 122。

明會之分別有時很難區分界定，在林美容在彰化地區也曾調查過「林姓二十四庄私媽祖會」，以本姓林的媽祖之祭祀，而不與任何一個寺廟發生關聯，來集結鄰近地區同姓聚落，讓人很難說這是神明會，還是姓氏組織，是只能說它是一個血緣性的地緣組織。[8]

事實上「私媽祖會」是祖公會中祭祀同姓神佛的類型，只是在傳統的父系漢人社會中，再加上媽祖其神說傳說中，是名未婚的女神並無子嗣，實在難以冠上「祖公會」之名，故以「私媽祖會」的神明會型態出現。

因爲台灣的民間信仰在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與社會功能的結合型態，即披著宗教外衣進行社會性的活動，神明會是以祭祀共同神明的名義來串連利益相同的人群；而祖公會則是以祭祀祖先爲名義來聯結附近地區的同姓宗親聚落，是一種社會聯結的重要方法，兩者有異曲同功之妙。

因此我們可以稱「祖公會」是指同姓宗親因血緣或地緣關係加入團體中成爲會員，祭拜同姓氏神明或原鄉祖籍地的守護神，是一種較爲特殊限定會員姓氏的神明會。[9]

而所謂之「角頭」，有其多種面向之意義。在物理空間上是指較村落爲小之聚落的空間單位。林美容在〈台灣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一文中，曾提到一個大村庄常分成幾個角頭，而角頭組織代表村庄街鎮、城市人群組織內部分割，和其地緣有相當程度之關係。[10] 例如三年一科的台灣西港刈香是由西港街上的五角頭爲中心；屏東東港東隆宮，每三年一科的迎王是由東港鎮上七角頭共同舉行分擔工作。

莊英章也在濁大計劃中對竹山鎮的調查中，提到社寮分爲北中、大公及過坑三個角頭按次輪流負責普渡。[11] 這樣聚落內的小土名，在台灣的許多地方都有，未必可在文獻或地圖中看到，卻在老人家的談話中常聽到。

在林美容〈台灣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一文中，介紹神明會每年都有過爐的儀式，分角頭舉行，這裏的角頭通常指更大範圍，而不是一個村庄內的角頭。[12] 換言之神明會或祖公會這些組織團體中，角頭是一個參與單位，它可能如前文所敘是村落內的小單位，也可能是一個村庄，有時甚至是超村際的代表，內部再細分爲小角頭，如蘆洲湧蓮寺之角頭，[13] 都是超越過村庄空間範圍的角頭。

因此角頭的另一意義是廟會組織中的參與單位，是一種抽象之社會空間；大可超越村落範圍，成爲村際的空間組織，小則只是村落中之某一角落的聚落空間，本論文所提之角頭即是此一社會空間的意義。

在 1926 年（昭和元年），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曾經對台灣漢人的祖籍地做過調查，其結果應該可以粗略的觀察出台北地區各地漢人的祖籍。根據台灣總督府官房課編纂中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928），清楚地知道台北地

[8] 林美容，1993，頁 104。
[9] 岡田謙著、陳乃　譯，1960，9(14):14-28。
[10] 林美容，1993，頁 179。
[11] 莊英章，1997。
[12] 林美容，1993，頁 181。
[13] 溫振華，1978，頁 61。

區的各地漢人移民原鄉，有福建的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龍巖州、永春州、興化府、福州府，以及廣東的潮州府、嘉應州、惠州府。泉州府可再細分爲南安縣、晉江縣、惠安縣（以上三縣通常稱爲三邑），以及同安縣與安溪縣。

根據統計資料中的百分比，可約略知道各地方漢人的祖籍來源。我們若把各街庄地區佔第一位的祖籍分別標示在地圖上，可以發現淡水河下游的兩岸地區以同安人爲最多，基隆河與新店溪之間以安溪人爲多，大漢溪與新店溪之間以及北海岸地區以漳州人爲首要。

這樣成面狀分布的狀態，說明了同鄉移民成群結隊互助合作、共同開墾的情形是很普遍之事。[14] 而神明會和祖公會便有凝聚這些同鄉人情誼的功能，以便聯庄互保對抗天旱洪澇、族群分類械鬥和土匪海盜的侵犯，這是絕對有其必要。

因爲這些天災人禍治安不靖的災害，往往不是一個村莊可以獨力對抗，因而有許多神明會和祖公會的民間信仰組織，來連絡感情擴展人際網絡以便不時之需，平時聯誼同歡湊熱鬧充場面，戰時則聯盟互保以壯聲勢相互支援。[15]

這許多型態的民間信仰組織，除了以地緣關係爲主通常拜原鄉守護神的神明會外，也有以血緣、姓氏爲凝聚力的祖公會，往往是拜同姓的神明或是歷史上文治武功顯赫的同姓英雄人物，也有拜自己家族中的開台祖或唐山祖和原鄉守護神等各種類別。例如本文所要探討的「西亭陳」祖公會，其所祭祀的神明，是其原鄉守護神「輔順將軍」，俗稱「舍人公」、馬舍工」或「馬舍爺」。

三、移居淡水河兩岸之西亭陳家

西亭陳家過爐的神明，陳姓族人尊稱爲「舍人公」，是西亭陳家之家鄉守護神，又名「輔順將軍」，其成神事跡與姓名傳說眾多（陳清富，1996：2），只知是馬姓之將軍，是一位平亂或是陳氏先人在南遷閩南時的押渡官，保護其族人平安到閩南繁衍，因感其恩澤，故立廟拜之。

舍人公的香火分自原鄉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安仁里十四都連厝保西亭大社的朝旭宮。[16]居住在原臺北州的南院陳氏西亭分族，最先來台開墾者約二百餘年前的乾隆年間，起先集居在五股及蘆洲境內，後有九位族長提議籌設宗親會，並供奉祖神舍人公爲宗親會信仰的象徵。本宗親會原由臺北州轄區內之加蚋仔、新莊、大稻埕、洲子尾、觀音坑及灰窯等六角頭的西亭宗親所組成，在日據時代每角頭派兩名代表共十二名登記爲舍人公會，此爲「臺北陳氏舍人公管理委員會」創設的由來。

後來子孫越來越多，自大稻埕角分出三角埔角，並自觀音坑角分出成仔寮角，共計成爲八角頭，每八年輪值一年著角奉祀。著角交接在農曆九月十五日，稱爲過頭，亦是舍人公千秋之祭祀正日，次年農曆九月十四日爲謝神之祀祭日。[17]例如在西元 2000 年是加蚋仔著角，神像被請到爐主家中奉祀，到了農曆九月

[14] 溫振華《台灣早期開發—北部地區》，台中：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91，頁：31。
[15] 溫振華，1978，頁 58-63。
[16] 陳清富《舍人公與輔順將軍傳記之研究》，台北：台北陳氏舍人公管理委員會，1996，頁 3。
[17] 陳清富，1996，頁 3。

十四日，加蚋仔角爲感謝神恩庇佑，會殺豬公酬神；九月十五日則是由下一個輪值的角頭稱「著角」 由新莊負責將神明請回角頭內的爐主家中祭拜，稱之爲「過頭」。

現今八大角輪值順序依次爲：

1．加蚋仔角：今臺北市萬華之東園新村，東園街果菜市場一帶。

2．新莊角：今臺北縣新莊市地區，在新莊街之武廟進行過頭，[18] 份子較雜，不一定是西亭陳後代，其他陳氏宗親也參與，[19] 是聚落社區都市化的後果。

3．三角埔角：今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延平北路六段永倫里一帶，由上天宮負責。

4．大稻埕角：今臺北市大同區淡水河邊迪化街一帶地區。

5．洲子尾角：原在今臺北縣五股、蘆洲交界處，塭仔圳匯入淡水河處，即因二重疏洪道遭拆遷散莊的洲後村，現在參與人員散居三重、蘆洲、五股一帶，原由蘆洲市中正路底堤防旁的土地公廟辦理，今日已在蘆洲市長安街公園，重建「忠義廟」由其負責辦理。

6．成仔寮角：即今臺北縣五股鄉成洲村靠鄉公所一帶地區。

7．觀音坑角：今臺北縣五股鄉淩雲路一帶山區。

8．灰窯角：今臺北縣蘆洲市仁愛里三民路與復興路三民中學一帶地區。

西亭陳家是一個能清楚代表同安人分佈地區的祖公會，其角頭分佈區，與同安人祖籍佔第一位的淡水河下游兩岸地區完全吻合，在舊市區的角頭仍然十分單純，由西亭陳家後代主其事，但是新莊角因爲都市化，故有大量外來人口，因而使加入者只要是陳姓宗親即可，已不單純是西亭陳家之後代。[20] 而洲子尾角因爲二重疏洪道而散莊，其地理學的幾何空間已消失，但是其擁有的參與資格，即社會空間並未消失。雖然散居各地，呈現一種動態空間的分佈，但是仍爲一角頭的參與資格，也算是時代變遷下的特色（圖 1）。

[18] 訪問三角埔角負責人陳文忠，1940 年生。
[19] 訪問加蚋角委員陳清富，1931 年生。
[20] 訪問加蚋仔角委員陳清富，1931 年生。

西亭陳家過角頭順序如下表：

表 1　西亭陳家過角頭輪值表

序 次	1	2	3	4	5	6	7	8
最近輪值過頭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角頭名	新莊角	三角埔角	大稻埕角	洲仔尾角	成仔寮角	觀音坑角	灰窯角	加蚋角
今地名	今臺北縣新莊市一帶	今臺北市士林區社子永倫里永平街一帶	今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帶	今臺北縣五股鄉洲後村	今臺北縣五股鄉成洲村一帶地區	今臺北縣五股鄉凌雲路一帶	今臺北縣蘆洲市三民中學一帶	今臺北市萬大路東園街一帶
備　註	組成份子較雜，未必是西亭陳後代	由大稻埕角分出		已拆除散莊但在蘆洲市長安街公園重建「忠義廟」，由其負責辦理仍有資格過頭	由觀音坑角分出			

資料來源：訪問整理

資料來源：台灣堡圖（明治三十七年-1904）北投、滬尾 爲基圖 原圖 1/20000

1.觀音坑角　2.成仔寮角　3.洲仔尾角　4.灰窯角

5.三角埔角　6.大稻埕角　7.新莊街角　8.加蚋仔角

圖 1　西亭陳家祖公會角頭空間分佈圖

四、原鄉祖籍地廈門市西亭村之現況

清代的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安仁里十四都連厝保西亭大社，是今日福建省廈門市杏林區杏林鎮西亭行政村，設有西亭村委會，下轄西亭、官任、湖內、郭厝、庵後、上店六個自然村。[21]

原本是靠海維生的小漁村，當時的海水直入到錦園村一帶，所以西亭村三面環海，「種蠔、飼蚵、討小海」是九成以上的人家生活方式，直到 1956 年圍海建海堤，以便興建鷹廈鐵路。同時也漸漸滄海化桑田，1964 年更進一步圍墾海埔地，才改種田地化漁爲農。在這之前，此地只有旱田無水田可種。也因此早年均以船運爲主，因此，沿岸各村莊均有自己的碼頭，無論是到廈門或是台灣，均是乘船前往十分方便。[22]

而整個西亭村是以陳爲大姓，但也有其他姓氏居住在其間，西亭陳家在此地也有六個角頭：三落、後厝、前厝（以上爲大社內之角頭）、湖內（內含連厝、林伯兜）、庵後、郭厝。同樣的每個角頭，也都有自己的角頭神，但是全境的大廟守護神，是在大社的海仔尾渡船頭上的朝旭宮，因爲主神是舍人公，所以渡船頭又名舍人宮口（圖 2）。每年的農曆九月初十，西亭陳家都會在朝旭宮前的廟埕，舉行過角頭繞境瘟莊，並在廟口演戲，其程式爲：

祖廟山口宮放兵請火－官任、蔡厝迎香－收兵回山口宮－過頭、看戲－官任吃香桌（近日增加）。整個過程約二、三日後再回朝旭宮。[23]

這儀式在解放後並沒有停，直到文化大革命後，從 1958 開始停止，一直到約 1982、83 左右漸漸恢復。近年來則在海外宗親的協助下，已重修朝旭宮，一切恢復照舊。

---

[21] 廈門市民政局《廈門市地名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1，頁 60。

[22] 訪問郭厝長老，陳水筆先生（1930 生）

[23] 訪問朝旭宮負責人，陳慶仁先生（實 1931 生，戶口 1926）因爲年輕 22 歲時參加土改表現好，其母擔心被共產黨團吸收帶走，謊稱已 26 歲超過定 25 歲，才留在家鄉，故有此情形。

表 2　西亭陳家所轄之各角頭現況表

輪值年序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角頭名	三落	後厝	前厝	湖內	庵後	郭厝
角頭神	王公、王娘	宋江公	王公、王娘	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	王公、王娘
角頭廟	朝旭宮	後澤宮	朝旭宮	林伯兜宮	興武宮	饒美宮
備註	以上爲西亭大社內之角頭			內含連厝、林伯兜兩小角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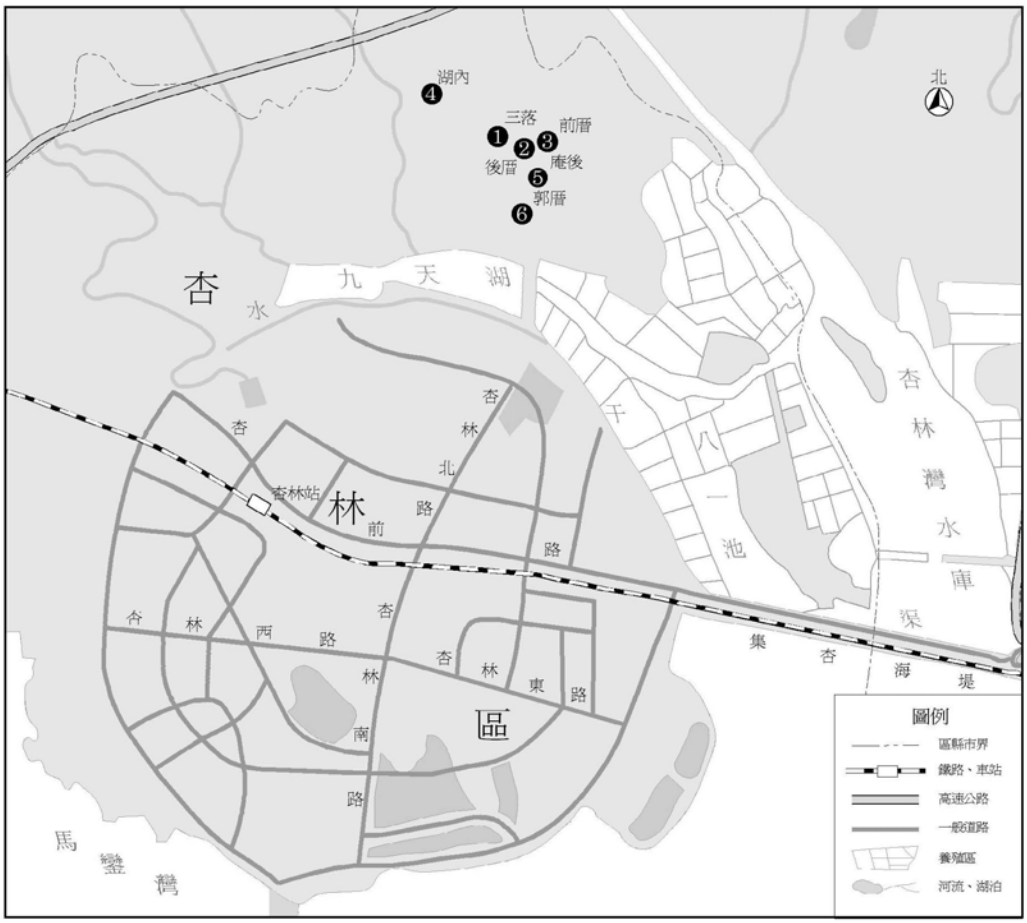
五、結論：西亭陳家的角頭變遷

移居在台灣台北地區淡水河兩岸的西亭陳家之八角頭空間分布，除了加蚋仔角外，同樣也大多是在同安人祖籍佔第一位的地區，充分顯現出拓墾時拜原鄉守護神，這種兼具血緣與地緣的社會組織。

西亭陳家的祖公會角頭，雖然都在同安人祖籍佔第一位的地區，但是這中間有二個角頭也包含特殊的意義，即新莊角與洲仔尾角。我們必須將其社會空間置於動態的觀點下加以考察，要有時間軸，也就是歷史性的縱深感。其社會空間由地理學空間分布，轉化爲一種參與資格的純社會空間，而這中間型態也正在改變中，呈現出一種動態空間的情形。

（一）變遷中的新莊角

在漢人祭祀中「前禮沒除，後禮沒設」的保守心態下，可以把拓墾時期的原鄉祖籍之地緣關係凝聚起來，並傳承給後代參與者的社會空間，限定在同一祖籍的地緣性人群參與者的社會空間。但是這種傳承在人際關係單純的農業聚落較易維持，在人際交往複雜，各地人群搬入外來人口眾多的商業聚落，是很容易因爲順應環境而改變。換言之，當保守與改變的兩股力量在拉扯抗衡時，農業聚落的角頭，較易保守而遵循傳統。而在環境變遷較快速的商業聚落角頭，較易改變內部組織以順應環境改變，來適應社會的新變遷。



資料來源：廈門市政區圖（1995） 爲基圖 原圖 1/50000

1.三落　2.後厝　3.前厝　4.湖內　5.庵後　6.郭厝

圖 4-8　廈門西亭陳角頭空間分佈圖

在西亭陳家中，我們可以很容易比較出，位在新莊街市的新莊角，其組成份子是較複雜的陳姓宗親，未必都是祖籍同安縣西亭鄉的後代，較其他角頭順應環境而先改變其組成份子的參與資格，與其位在繁華的商業聚落核心有密切關係。

（二）只存社會空間的洲仔尾角

另一個角頭洲仔尾，由於是正好位在二重疏洪道的洲後村，整個家廟被拆，其西亭陳家的後人，也因此散庄而搬遷散居各地，其物理學上的幾何空間早已消散而不可尋，但每年輪值的資格並未喪失，祖公會參與者仍然由各地回來「卜爐主，選頭家」，換言之，其社會空間並未消失，雖然因爲外來政經制度的影響衝擊下，使其搬遷四散，但並未因此而失去其參與祖公會之傳統。

事實上，其他角頭的組織成員，因爲工商業社會上生活所需，也早已搬遷原居地，但仍會回來參與祖公會的祭祀儀式。只是洲仔尾角由於拆遷洲後村使其參與份子同時搬遷，突顯出這種呈現動態空間的分布意義。在整個祖公會分布區域日趨都市化後，工商業社會的生活型態，會使日後各角頭都呈現出這樣的動態空間現象。

（三）兩地角頭分佈比較

西亭陳家在原鄉與移居地，兩地均有「跨村落多角頭祖公會」，所信仰神明與組織運作方式幾乎一模一樣，但在空間上卻出現完全不一樣的分佈情形。

在廈門原鄉地，是以西亭大社爲核心，單聚落多角頭，再加上「湖內」、「庵後」、郭厝」三個外圍小村落角頭，所共同組成的社會組織；其分佈的型態，反而較類似「兌山李家」在臺北淡水河兩岸分佈情形，而不像自己的移民宗親在臺北淡水河兩岸的角頭分佈情形（圖 2）。

在臺北的西亭陳家，其角頭空間分佈是標準的散村角頭，分散在整個淡水河流域且距離很遠，與廈門原鄉大異其趣。也不像廈門昔日的西亭村是個標準的漁村，以沿海的漁業補撈或是魚蝦貝類養殖維生；在台的西亭角頭可分爲兩組：「觀音坑角」、「戽仔寮角」、「洲仔尾角」、「灰窯角」，這四個角頭分佈在觀音山麓的河濱平原，是以務農爲主，與原鄉的漁村生活大異其趣截然不同。另一組「三角埔角」、「大稻埕角」、「新莊街角」、「加蚋仔角」，這四個角頭則是分佈在淡水河兩岸的水運碼頭，以商爲主農爲輔的生產方式維生，似乎原鄉的生活模式對他們的影響很小。

「西亭陳」祖公會八角頭，說明出移民爲適應新環境，不一定拘泥在原鄉的生活方式，反而會在舊有的基礎上，學習其他新的謀生技能，甚至找尋新機會追求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由初期的「原鄉生活模式儘可能轉移到新居地」，以減輕因爲居住地區的改變，造成對生活習慣的衝擊；到後來「爲適應新環境必須調整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以配合當地的氣候物產以及人文活動各項條件；待穩定後「尋找機會改變現狀追求更好生活」，到最後建立出與原鄉祖籍地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模式。完成「原鄉可能」、環境適應」、尋找機會」，這樣三階段的移民三部曲。

參考書目：

一、地圖與中文資料

1.臨時土地調查所，1904 《台灣堡圖》（遠流出版社重印，1996）。

2.王志文，1999 〈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台北：文化大學。

3.方淑美，1995 《台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學位論文獎助專刊(1)。

4.李亦園，1988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水牛出版社。

5.李錫祥，1997 〈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6.吳學明，2000 《金廣福墾隘研究》(下)，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7.林秀英，1998 〈蘆洲的寺廟與聚落〉，《台灣文獻》第 29 卷第 1 期，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頁 176-180。

8.林美容，1993 《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台北：自立晚報。

1998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9.林滿紅，1978 〈茶、糖、樟腦業與晚清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115 種》，台北：台銀。

10.周宗賢，1983 〈清代台灣民間的地緣組織〉，《台灣文獻》第 34 卷第 2 期，頁 1-13，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1.岡田謙 著；陳乃 譯 1960 ， 台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北文獻》直字第 9 卷第 4 期，頁 14-28。

12.施添福，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1993 〈台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爲例〉，台北：自立晚報，頁 131-184。

1994a〈揭露台灣島內的區域性:歷史地理學的觀點〉，《等教育》第 45 卷第 4 期，頁 62-72。

1994b《台灣文獻書目解題　第二種 地圖類》（一）~（三），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13.高麗珍，1988 〈台灣民俗宗教之空間活動—以玄天上帝爲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4.莊英章，1974 〈台灣漢人家族發展的若干問題〉，《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113-140。

1977 《林圯埔——個台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5〈台灣宗族組織的形成及其特性〉，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桂冠出版公司，頁 93-123。

15.陳其南，1987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修正版），台北：允晨文化。

1990 《家族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6.陳清富，1996 《舍人公與輔順將軍傳記之研究》，台北：台北陳氏舍人公管理委員會。

17.許淑娟，1991 〈蘭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8.鈴木清一郎 著；高賢治、馮作民 譯 1978 《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19.溫振華，1978〈清代台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台灣早期開發—北部地區》，台中：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20.溫振華、戴寶村，1998《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北縣文化。

21.楊緒賢，1979《台灣姓氏堂號考》，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22.廈門市民政局，2001 《廈門市地名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23.廖秋娥，1989〈觀音鄉閩客聚落的宗教組織與生活方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4.蔡文彩，1984〈洲後村村民對拆遷村的識覺與反應〉，師大地理系友會刊》第七期，頁 28-37。

25.戴炎輝，1984《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

二、日文資料

1.台灣總督府官房課編纂，1928《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2.西岡英夫，1933〈浮洲部落–社子〉，台灣時報》昭和八年十一月份，頁 132-140。

江頭礮臺——中法戰爭被遺忘的礮臺

周宗賢*

一、研究動機

提到「江頭礮臺」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不似名列古蹟之林「滬尾礮臺」那麼有名。但是，如果說「關渡礮臺」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1990 年 3 月我在《台灣文獻》第四十一卷第一期發表〈淡水與淡水礮臺〉一文，探討淡水的各礮臺建置始末，不久之後，好友郭德士教授(John E.Geddes)告訴我，關渡基督書院內有一處舊的礮臺可能跟中法戰爭有關，問我知道不知道？我說「不知道」。之後，因爲種種的因素，竟未能再去研究，一拖就是十多年。2001 年夏，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因接受滬尾文史工作室紀榮達的申請，前往基督書院「會勘」該礮臺，本人才第一次踏入基督書院內針對此一礮臺進行「評鑑」。雖然因該礮臺已經「完全被破壞」致無法列名古蹟，但仍再勾引起我想瞭解這處礮臺的興趣。

2004 年 10 月恰好是中法戰爭「滬尾之役」120 週年紀念，本系爲紀念這個「難得勝利」的戰役，舉辦「淡水學術研討會」，因此，本人就嘗試以「江頭礮臺——中法戰爭被遺忘的礮臺」爲題，就教各位。但是，這個礮臺不但歷盡滄桑，身份多次變更，史料更是難覓，史料不足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文章疏漏難免，還請多多包涵，並且不吝指教補正。

二、中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淡水礮臺

淡水這個港埠在中法戰爭前，已經是台灣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不但經濟繁華，更重要的是它是進出台北府的咽喉門戶，爲防範外敵，在此興建礮臺是當時海防必備的工作。

當中法戰爭滬尾之役爆發時，淡水河口先後已建造了兩座洋式礮臺：「油車埤礮臺」、「凸礮臺」。（附圖一）

淡水第一座礮臺稱爲「滬尾礮臺」，這座礮臺先於同治十三年(1874)由奉調來台幫辦防務的羅大春倡建立並設計砲臺的圖式[1]，不過，礮臺的建造則晚了一年，於光緒二年(1876)由因馬嘉理(Mar Gary)事件，中英關係惡化，海防吃緊時，以福建巡撫親赴臺灣巡視時所創建[2]。這座礮臺在淡水河口位置重要，爲了防備法軍，光緒九年(1884)十一月，劉璈親自來淡水會勘防務，他認爲「惟海口油車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27，台灣文獻叢刊第三 0 八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12，台北。

[2] 連橫《臺灣通史》軍備志・礮臺云：「滬尾礮臺：在臺北府治之西，爲互市之口，勢控北鄙。光緒二年，始築礮臺」。

埤舊壘，與對河之鴨子尾地方，適當衝要，皆宜起造礮營。已・・分營趕造」[3]，文中所指的「舊壘」就是光緒二年的「滬尾礮臺」。光緒九年，經劉璈原地重建後，可稱爲「油車埤礮臺」，不過這座被法軍稱它「兼作燈塔之用」的礮臺，到了光緒十年(1884)滬尾之役爆發時，因比孫開華在趕建中的礮臺舊而被法軍形容爲「舊砲臺」，據《法軍侵台始末》云：

> 一座正在建築中的礮臺(新礮臺)…..此外還有一座兼作燈塔用的，以白礮臺的名稱著聞的舊礮臺。[4]

這座礮臺的位置，可從該書附圖六，一八八四年十月八日的淡水地圖(見附圖一)看到在淡水河口處標記一座 FORT BLANC[5]，如果再對照光緒十一年(1886)出版的《點石齋畫報》之〈滬尾形勢圖〉[6](見附圖二)，就很清楚地看出這座礮臺的位置了。所以，位在淡水河口今油車里的礮臺，光緒二年時稱爲「滬尾礮臺」，光緒九年，則稱爲「油車埤礮臺」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時，則被法軍稱爲「白礮臺」。(附圖二)

淡水第二座滬尾礮臺是由孫開華所建的「滬尾大礮臺」或「新礮臺」。光緒九年(1883)中法戰爭爆發，翌年二月孫開華奉令率軍抵滬尾，閏五月四日，劉銘傳來臺督辦軍務，他於抵臺後，立刻勘察各地海口礮臺，發現各礮臺老舊不合法度，急需趕建新式礮臺，同時，他研判法軍除了進攻基隆外，一定會進攻淡水，於是在六月十二日就親自到淡水巡視，與劉璈、孫開華等共勘滬尾礮臺的基地。六月十六日，劉銘傳自台北府發出〈敵陷基隆礮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云：「時臣正赴滬尾督令孫開華所部趕造礮臺」[7]，到了八月十三日，他又從臺北府發〈法船扞犯臺北基滬俱危移保後路摺〉云：「八月十三日….忽報滬尾敵船五艘，直犯門口。滬臺新造，尚未完工，僅能安礮三尊，保護沉船塞口」[8]。可見，這座礮臺是中法戰爭時「新造」且「尚未完工」的新礮臺。

這座由孫開華趕築的新礮臺，《點石齋畫報》的〈滬尾形勢〉也有記載：

> 三月初臺灣擢勝營友送來滬尾地圖一紙，其中一切布置井井有條，爰倚名手臨□一通，並附誌數語以告世之留心形勢者：滬尾之山分南北，北曰大屯，南曰觀音，水在中央，海口西嚮，口之窄處塞以竹排，排外有竹網，網之外埋水雷十餘具，其護水雷者則沉溺之石船焉，……大屯西麓圍以長城，城有炮駐兵守之，向東地勢漸高，壘石為座，方可數十畝，置巨炮其上，是謂大炮臺。」[9]

再根據《法軍侵臺始末》所附〈淡水圖〉(附圖一)，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這一

---

[3] 劉璈《巡臺退思錄》，稟復函飭調移山後勇營加招土勇并勸捐城工兼另勸林紳捐助防務由＞，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7，台北。

[4] E.Garnot 著，黎烈文議《法軍侵臺始末》頁 25，台灣研究叢刊第七十三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0.台北。

[5] 同上注。

[6] 《點石齋畫報》第一輯②，頁 34-35，天一出版社。1978，台北。

[7] 《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頁 169，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8] 同上注，頁 174。

[9] 同注 6，另參閱附圖二。

座新建的大礮臺，就是法軍所稱的「FORT NEUF」(新礮臺)。這是在戰爭時才趕建的礮臺，所以，法軍稱它爲「新」，以別於在戰爭之前已建造完成且可兼作燈塔的「舊」礮臺。所以，這座礮臺是中法戰爭滬尾之後時的第二座洋式礮臺。

三、中法戰爭後的淡水礮臺

中法戰爭後，劉銘傳有感於澎湖、基隆、淡水、安平、打狗五地之重要性，並認爲辦理海防必先建造礮臺購置先進大礮，因此，當法軍退後，他即飭各員趕造滬尾等五海口十座新礮臺，並向英國購買阿馬士莊新式後腔鋼砲三十一尊。[10]

滬尾的這座新礮臺，一爲已列名古蹟的「滬尾礮臺」(即「北門鎖鑰」礮臺)，另一座已拆毀的「保固東瀛」位在油車口的山坡台地上，它原地是孫開華所趕築的「新礮臺」，但卻毀於法軍的砲轟，戰後，劉銘傳就在原地建造了這座有名的新式礮臺。

另一座城門額題「保固東瀛」的礮臺，因爲毀於日據時期，因此，世人僅知既存的「滬尾礮臺」而忘卻了劉銘傳在滬尾所建的另一座礮臺。

這座已毀的「保固東瀛」礮臺位在那！拙著〈淡水與淡水礮臺〉[11]已經談過，現在再浪費一些篇幅來就教於大家。

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福建省政府秘書長張尊旭應臺灣總督府的邀請來臺遊覽，著「臺灣遊記」記淡水遊云：

> 嗣到舊礮臺閱覽，令人生弔古之感。此處為昔日之水雷營，或謂水電局，蓋係海軍用地。登岸遙望，礮臺之旁，題『保固東瀛』大字，聞係舊礮臺之大門。復行三百餘步，入礮壘，門額一方，題曰『北門鎖鑰』四字，右書『光緒十二年季浣之吉』等字，左書『合肥劉銘傳』等字。[12]

張氏很清楚地指出這兩座礮臺相距三百步，名叫「保固東瀛」位置就在「水雷營」舊址。

「水雷營」位在那裡呢？餘姚史久龍著「憶臺雜記」記他在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十月遊淡水時，稱：

> 滬尾地勢，背環海，與基隆比肩，….滬、基同為北郡門戶，而滬尾尤稱緊要。……滬尾礮臺雖亦係坐在山腰，然在口內半里許，…….尚稱險要。….礮臺本係明臺，甲午春始改造暗臺。設八百磅砲三尊，小者甚多。外垣以雉堞，中為管帶所住，四週皆砲房、兵房，均仿洋式。山下半里許為統領所駐劄，山上更結兩營為特角，其勢聯絡，頗覺雄壯。統領所札之處，即昔水雷局，是局亦係劉省帥創建。[13]

則「水雷營」就在大礮臺山下半里許，即今忠烈祠前忠義宮王爺附近的海軍基地。

---

[10] 同注 7，卷五，設防略，＜買礮到防立案片＞，頁 264。
[11] 周宗賢， 臺灣文獻》第四十一卷第一期，頁 37-66。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年 3 月。
[12] 張尊旭《臺灣遊記》 頁 77，台灣文獻叢刊第八九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8，台北。
[13] 史久龍著，方豪校定＜憶臺雜記＞； 臺灣文獻》第二十六卷第四期，第二十七卷第一期合刊本，1976 年 3 月。

馬偕的「臺灣六記」第二十九章「淡水素描」提到「有一個破舊的中國要塞，在其正後方也有一個，以現代式的土堡隱蔽著大砲和軍隊。」[14]這個「破舊的中國要塞」正好在礮臺的正前方，不就是「保固東瀛」礮臺嗎？

根據上述，我們可以明確說，光緒十二年，劉銘傳所興建的滬尾兩座礮臺，一座靠淡水河邊，位在油車口水雷營的「保固東瀛」，很接近中法戰爭時的舊礮臺—「白礮臺」，因位置低，易爲敵人所發現，故被稱爲「明礮臺」；另一座，位在其正後方三百餘步的「北門鎖鑰」—「滬尾礮臺」，正是戰爭中被法軍所擊毀的「新礮臺」。

四、被遺忘的「江頭礮臺」

「江頭礮臺」就是「關渡礮臺」，位在今關渡基督書院校內。礮臺居高臨下，正面淡水河口，形勢險要，是扼守淡水進入台北的第二道門戶，因此，清光緒以來，即建有礮臺，但是，中法戰爭滬尾之役，戰場在淡水河口一帶，因此，上述的新、舊礮臺—舊滬尾礮尾、油車埤礮臺、白礮臺、大礮臺、新礮臺及中法戰後的「滬尾礮臺」、保固東瀛」礮臺等等，都爲人所知，但是，位在淡水河較內陸距河口有二公里遠的「江頭礮臺」，因未直接與敵交火，相關史料記述不多，後來，又因礮臺土地多次易主使用，致後人對此一礮臺之創建始末所知有限。

何以「江頭礮臺」又稱爲「關渡礮臺」?在還沒有介紹礮臺的建造始末之前，應先釐清「關渡」地名的演變。

(一) 江頭、關渡、干豆

台灣地名的來源，主要有四：一是原住民命名，二是大陸移民的命名，三是荷、西、葡人的命名，四是日本人的命名。關渡這個地方當然也不例外，方豪曾經考證關渡這個地名，認爲是從西班牙文 Casidor 而來，他舉出四點理由：

1.西班牙人稱淡水河爲 Kimazon，稱淡水港爲 Casidor(譯音當作干西豆)，而淡水港與淡水河的分界就是干豆門。

2.Casidor 讀音與干豆極爲類似。漢文譯音，中間略去 si 音，這是譯音中常見的。

3.西班牙人稱淡水港爲 Casidor，在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比郁永河所記甘答一名早六十八年，比杜臻所用干豆一名亦早五十六年，我們並沒有找到比這個西班牙名更早的名字。但最初實由番文轉爲西班牙讀音，然後再轉爲漢文讀音，因爲漢人到台北定住，已遠在西班牙人退出以後，漢人大概不會直接從西班牙人或西班牙文取得干豆的譯名。

4.西班牙式名字，在臺灣北部被保留下來的不止干豆一名，三貂角（或作三朝，或作山朝）原名便是 San Diago。

所以，他認爲關渡這個地名的最早寫法是「干豆」。[15]

---

[14] 馬偕著，周學普譯《臺灣六記》，頁 118-119。台灣研究叢刊第六十九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台北。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關渡之地名學的研究＞，頁 756，台灣學生書局，1969 年 6

他根據台灣的方志及若干墾荒文書，確定了關渡從「干豆」到「江頭」有十一個漢文異名及最早見於記載的年代，茲將其所附〈關渡異名文獻年表〉列出供各位參考：[16]

（附）關渡異名文獻年表

Casidor	西班牙文		明崇禎二年（一六二八）
干豆	澎湖臺灣紀略	杜臻	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
干豆	臺灣府志	高拱乾	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
甘答	裨海紀遊	郁永河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
干脰	墾荒文書	陳賴章稟帖	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
干豆	淡水紀行詩	阮蔡文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
干豆	淡水各社紀程	陳璸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
干豆	紀遊詩	周鍾瑄	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前
肩脰	台海使槎錄	黃叔璥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一二）
干荳	墾荒文書	楊道弘稟帖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
墝竇	社蓁雜詩	吳廷華	雍正十年（一七三二）
關杜	重修臺灣府志	劉良璧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
關豆	重修臺灣府志	劉良璧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
關渡	重修臺灣府志	范咸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
官渡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
江頭	臺灣島全圖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

方師的這篇文章是 1950 年寫的，距今已五十三年之久，但根據日本參謀本部編《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的記述，明治二十八年（1895）六月八日，日本近衛師團派遣步兵第一聯隊第二大隊的「二個步兵中隊（由中西千馬少佐率領）八日在江頭宿營，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進駐滬尾街」[17] 同時，其所附〈臺灣北部守備配置圖〉（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楚地標示「江頭」地名[18]（附圖三），所以「江頭」這個名稱，最遲在 1895 年就已經出現了，比光緒二十三年（1897）早了二年。也許還可以更早。

五、江頭礙臺

自從咸豐十年（1860）淡水開港後，烏龍茶也引進台北栽種，淡水遂快速繁榮起來，再因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日軍侵台的緣故，北台在軍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並受到清廷的重視。沈葆楨稱「雞龍、滬尾港門宏敞，舟楫

月，台北市；或《文獻專刊》第一卷第四期＜臺北「江頭」之地名學的研究——附論吳廷華及其臺灣詩＞，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 年 12 月，台北市。

[17] 許佩賢譯《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第二章第三節，＜佔領台北＞，頁 136。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台北市。

[18] 同上，附冊。㉚臺灣北部守備配置之圖。

尤多；年來夾板、輪船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闤闠喧囂」[19]遂於光緒元年（1875）以台北爲重心，劃北台爲一府三縣，當時模仿西方列強，於海口及要隘之地相地形勢，建造礮臺嚴爲防禦外患。淡水爲台北門戶，滬尾海口距府僅三十里，船隻又容易進入，自然會加強海防設施以保護府城的安全。

江頭即關渡，礮臺所在位於今基督書院校園，昔稱「土地公鼻」[20]的山頭上。從地形來觀察，淡水河口及其北岸沙崙、中崙、油車口、礮臺埔一帶，地形險要，又近海邊及河口，自然是兵家第一線的防禦所在，所以，道光以來，就不斷地在這一地帶建置礮臺；關渡則在距河口較遠較東的內陸位置，但其正對淡水河口門，可以打擊突入淡水河的敵船，亦可扼制關渡這處要隘。因此，關渡土地公鼻的這座「江頭礮臺」的建置應與牡丹社事件及中法戰爭有直接的關係。茲根據有限的文獻史料來推測礮臺的建置始末：

（一）最早創建於光緒元年（1875） 2001 年 6 月，滬尾文史工作室提供一份〈淡水　基督書院江頭礮臺殘址〉的資料稱：『江頭（關渡）礮台，於一八七五（光緒元年）創建於關渡土地公鼻」[21]可惜，他沒有說明這個年代是根據什麼史料。

（二）最遲光緒十年（1884）創建。《台北縣志》卷十五軍事志兵備於〈江頭礮臺〉項稱：『位今北投鎮江頭。光緒中、法之役，提督孫開華所建，今殘蹟尚存」。[22]爲什麼稱「江頭礮臺」而不稱「關渡礮臺」未見交代及註明出處，非常可惜。

中法戰爭前與淡水防務最密切的人物就是霆軍健將孫開華，光緒元年（1875）臺灣海防吃緊，福建巡撫丁日昌即以北台地廣兵少，非得調勇敢善戰的專閫大員率兵駐台不可，於是奏調孫開華來台，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三十日孫開華抵基隆，這是他首次來臺，一直到光緒四年（1878）六月回福建接霆慶營，同年七月三日第二度來臺，主要任務是「撫番」，於光緒五年（1879）回泉州，同年十月四日再率「擢勝營」來臺，分駐基隆與滬尾，一直駐防到光緒七年（1881）十一月二十九日回福建[23]，這期間因閩撫勒方錡來臺巡閱，並指出滬尾極爲重要，要求孫開華應「籌經費，作礮臺」 因此，在光緒九年（1883），中法戰爭前孫開華可能已在關渡建造了礮臺。

光緒十年（1884）十月法軍滬尾之戰慘敗退回海上後，又於十二月發動基隆之戰，曹志忠、蘇得勝所部盡調基隆，劉銘傳以「滬尾海口，尤關台北安危」，擔心法軍再犯滬尾，乃調「楊金龍楚軍兩營，自彰化移駐關渡，修築礮臺」，[24]很清楚地記述楚軍楊金龍在關渡修築礮臺，但是，既是「修築」，則應該之前就

---

[19]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北擬建一府三縣摺＞，頁 56，臺灣文獻叢刊二九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10，台北。

[20] 《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第八章淡水鎮，竹圍里土地公鼻項云：以地形得名，地有神祇，故以土地公號之。台北縣文獻委員會。1960 年，台北縣。

[21] ＜臺北縣古蹟指定審查會議資料—基督書院江頭礮臺＞，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 年 4 月 22 日

[22] 同注 20，頁 23。

[23] 《光緒朝外紀檔》，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孫開華奏。

[24] 同注 7，＜法攻暖暖月眉山連日獲勝並現在戰守情形摺＞（十年十二月廿四日台北府發），頁 192。

已經有「舊礮臺」才稱做「修築」，所以，「江頭礮臺」最遲在光緒十年以前就已經建造。

「江頭礮臺」因位於淡水河內腹，中法戰爭時，並未被法軍轟擊，因此得以保全下來，戰後，劉銘傳在河口建造「保固東瀛」及「北門鎖鑰」兩處新式礮臺，並沒有提及關渡的這座礮臺。

光緒十八年（1890）六月擔任全台營務處總巡的胡傳曾經來到滬尾詳察海口所築大小各礮臺，指出當時是由定海前、中二營及炮隊二哨駐滬尾，[25] 但是否包含江頭礮臺則不清楚。

光緒二十年（1894）爲了抗拒日軍登陸淡水，唐景崧調派軍隊駐守關渡，並在關渡礮台安裝大砲，據日本東洋文庫藏抄本《台島劫灰》附〈改隸前夕清軍在臺之武力配備〉－「全台各礮臺礮位單」的調查統計資料全台共有十五座，其中就有關渡礮台：管帶林發，六吋口徑英國前膛兩尊。[26]

另（全台各營名目單）共有七十營，當中與關渡礮台有關的有兩營：（全臺營務處關渡礮臺衛隊營李、關渡炮隊營林[27]（按李爲營官李文忠、林爲營官林發）

再據（全台各項行礮及各項槍名單）所計：「關渡礮臺」除了兩尊六吋口徑英國前膛礮之外，另配置「毛瑟槍三百桿、吶開司槍六十桿、呿啫槍六十桿」；關渡礮臺營」則有「九响呿啫士槍二十桿、毛瑟槍四十桿」。[28]

關渡礮臺共有多少兵力？據《一八九五年五月中旬日本大總督府陸軍參謀部資料》所記的＜在臺清軍兵力概數＞，當時駐在滬尾街一帶的清軍計：

「滬防軍三營」，人員 1200，

「衛隊營三營」，人員 1200，

「隘勇二營」，人員 800，[29]

共記 2800 人，但真正駐防在「關渡礮臺」的兵力則不詳。

總之，乙未割台前夕，關渡礮臺顯然是全臺重要防務之一，因此，才會派駐可以「獨當一面」的礮隊營及衛隊營由營官統率，且更安裝兩尊六寸口徑的英國前膛礮及佐以 480 桿各式之槍枝。但是，仍無法抗拒日軍保衛台灣，1895 年 6 月 8 日，礮臺淪陷，日軍當晚住宿江頭營區，九日上午未受抵抗的進駐淡水。日據時期，怡和洋行租借此地爲洋行倉庫，今留有怡和碑石一座，一九五七年，再由美籍傳教士賈嘉美在此創設「關渡基督書院」。由於幾經易手，礮臺所在不斷出現新而大型的建築，沒有人重視它，此一百年礮臺終至完全被毀片瓦不留。

---

[25] 胡傳《臺灣日記與禀啓》，〈光緒十八年六月初八申＞及＜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廿五日上撫軍稿＞，頁 50-51。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3，台北。

[26] 曹永和，吳密察編審，《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經濟篇軍事篇》第二節＜臺灣攻防戰＞，頁 555，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1986 年 10 月，台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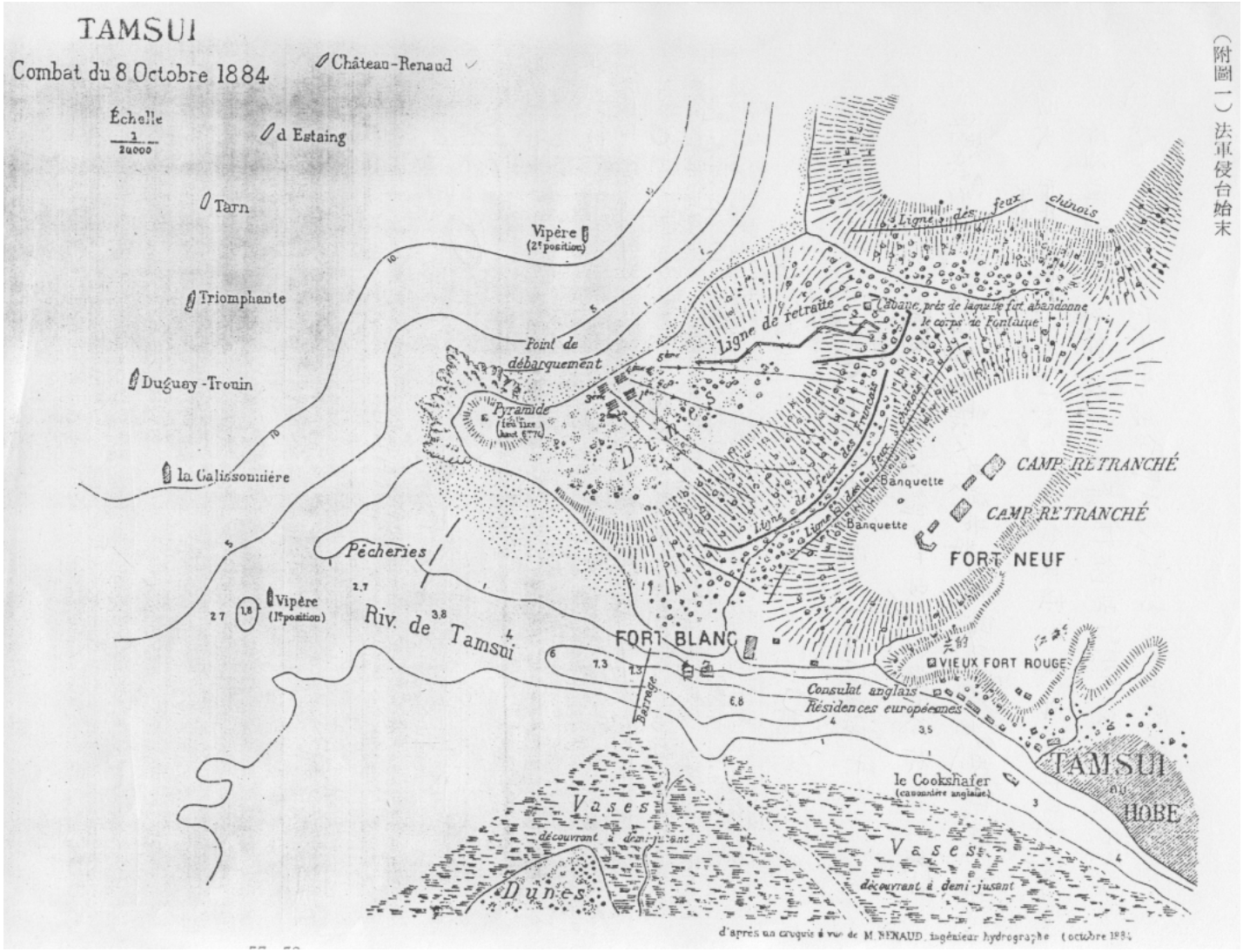
[27] 同上注，頁 559。

[28] 同上注，568-569。

[29] 同上注，頁 583。

六、結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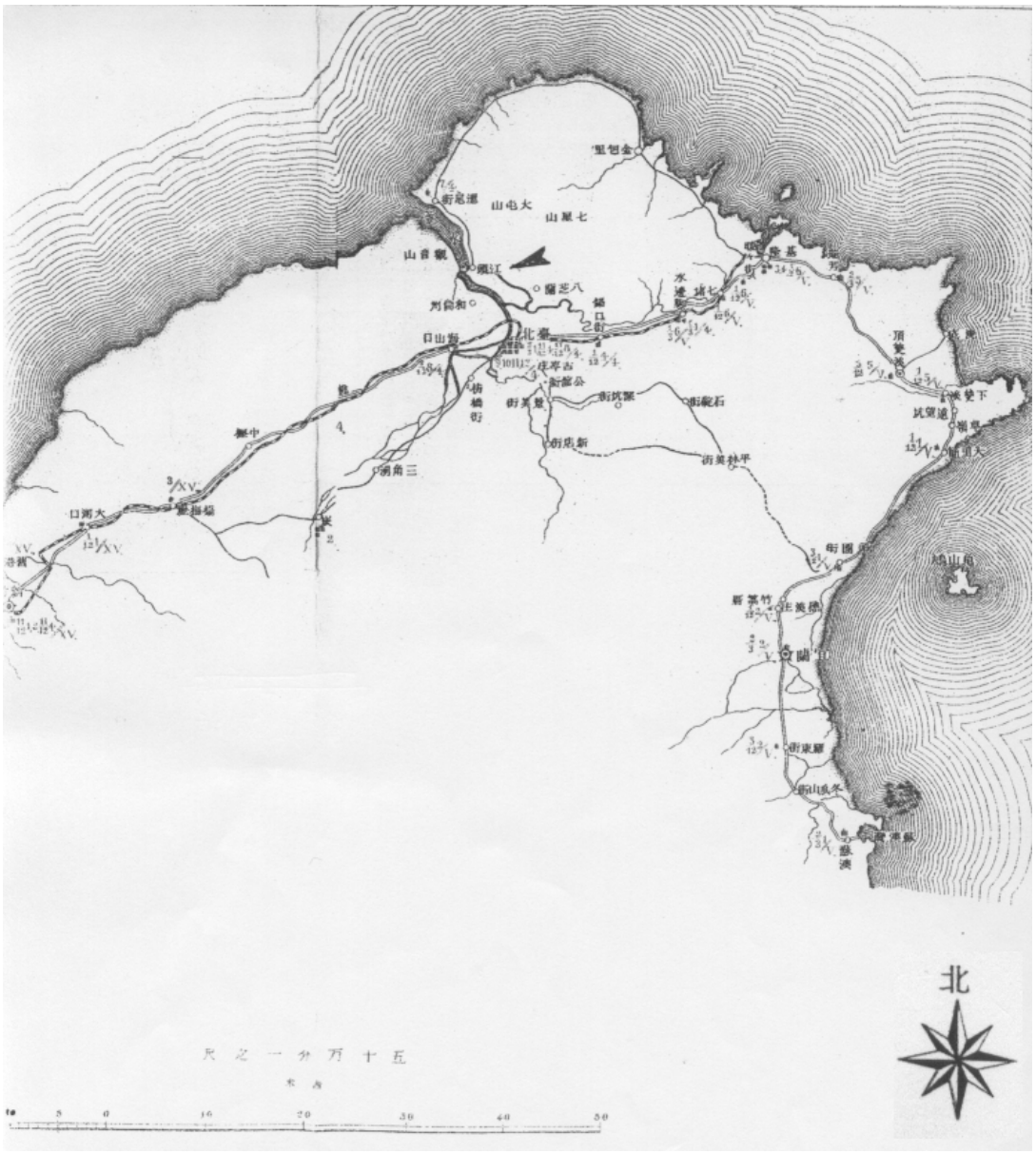
清朝的國防重陸輕海，海防工作是針對緝盜以維治安爲主，但鴉片戰爭的結果，開啓了中國數千年來未曾有的變局，從此以後一波波的強敵率自海上而來，中國海防的空虛弱點完全暴露無遺，台灣首當其衝，同治十三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公然出兵侵占台灣，引發了中國的「海防」與「塞防」孰爲優先之爭，台灣的地位，才從「邊陲」、彈丸小島」躍升爲「中國第一門戶」 從而台灣才有了真正的海防，不僅引進西方現代化的海防兵器，並企圖將台灣經營成爲中國南洋水師的重鎮。在這個背景下，基隆、滬尾、安平、打狗與澎湖成爲台灣五大海防要地，同光年間之後，北台快速繁榮，再面對日本的壓力，北台政、經及軍事益形重要，基隆與滬尾自然成爲台北府的門戶，爲了拒敵登陸，嚇阻外敵入侵口岸，兩港無不重造當時的海防利器------礮臺。淡水距府城約三十里，自關渡以下至海口的河之北岸廣大幅地統稱淡水，近海口處稱滬尾，熱鬧而聚居處稱：滬尾街，自古即如是稱，因地當進出淡水河的口門，因此特別重要，守台北，必先守淡水，守淡水，必先守滬尾，所以自古以來，新、舊、大、小各式各樣的礮臺都出現在這裡，並爲後人所樂道，尤其中法之戰滬尾之役，更是名留青史永垂不朽；但是，從淡水河要進入台北，另一關隘就是關渡，關渡土地公鼻位在高地，突入淡水河中，正面對淡水河口門，居高臨下地形險要，因此，成爲滬尾之後的第二道門戶，關渡再失，則敵軍可長驅直入台北城下了，所以自牡丹社事件之後，爲了加強淡水的防務，關渡也設有礮臺，做爲台北府最後的一道防線。可惜這座隱密性高的「暗臺」 因爲淡水河口佈雷封港，法軍又兵敗沙崙，其海軍艦艇未能兵臨淡水河內而失去揚名立萬的機會，乙未割台之役，日軍自台北而來，不費一顆子彈就接收了這座礮臺，也沒有留下英名，之後，隨著淡水海防地位的沒落，關渡土地公鼻的礮臺也走入了歷史並被人所遺忘。


TAMSUI
Combat du 8 Octobre 1884
Château-Renaud
Échelle
1/24000
d Estaing
Tarn
Vipère
(2e position)
Triomphante
Duguay-Trouin
la Galissonnière
Point de débarquement
Ligne de retraite
Ligne des feux chinois
Pyramide
(ligne tirée haut 6m70)
CAMP RETRANCHÉ
Banquette
CAMP RETRANCHÉ
Banquette
FORT NEUF
Pêcheries
Vipère
(1re position)
Riv. de Tamsui
FORT BLANC
VIEUX FORT ROUGE
Consulat anglais
Résidences européennes
Barrage
TAMSUI
ou
HOBE
le Cookshafer
(canonnière anglaise)
Vases
découvrant à demi-jusant
Dunes
Vases
découvrant à demi-jusant
d'après un croquis à vue de M. RENAUD, ingénieur hydrographe (octobre 1884)

（附圖一）法軍侵台始末

（附圖二）

(附圖三)



清法戰爭與淡水砲台的再考證

林于昉*、楊蓮福**

一、前　言

1884 年，清法戰爭爆發，淡水並非法軍窺伺臺灣的首要目標。[1]直至 8 月，法軍強大艦隊多次砲轟基隆，並登陸進犯，劉銘傳親督清軍將法軍逼退，於是法軍計畫轉攻淡水，溯淡水河而入，一舉攻下臺北，逼迫清廷就範，清法戰爭因而發生。清法二軍在淡水的戰役，主要可分爲「填石塞港」、「法艦開砲」、「中崙血戰」、「敗滬尾」等階段，直至 1885 年 6 月，清法雙方簽訂合約，戰事才告結束。[2]在整個滬尾戰役的發生過程前後，從清軍的防禦佈局，到法艦砲轟，陸戰隊登陸乃至劉銘傳戰後加強防務，淡水砲台似乎在整個戰役中，清法二軍攻防策略與目標設定，都扮演著關鍵且重要的地位，值得我們關注。

「紅堡」、「白礮台」、「小駁台」、「新礮台」、「舊礮台」這些都是外國文獻中對清法戰爭淡水地區砲台的稱呼，由於這些文獻描述記載者因爲個人背景及對淡水地理環境熟悉程度不一，無法詳實將當時淡水地區砲台做完整陳述，致今人參酌相關記載，僅能瞭解當時砲台狀況一二，反觀清軍及國內相關記載文獻，雖有提到當時淡水砲台的位置及形式，但礙於時空變遷、語言差異及記載資料數量甚少，仍無法明確釐清當時清法二軍對峙時，到底淡水地區有幾座砲台，是二座？三座？四座？還是更多，都是本文探討的重點。劉銘傳在清法戰役所修建的「北門鎖鑰」及「保固東瀛」二座砲台後續變化，特別是「保固東瀛」存在與否？成爲一個不解之謎，本文期望透過文獻與地圖來重新解讀「保固東瀛」砲台，本文另一個探討的重點則是新發現在 1895 年日人入台後，所繪製「北門鎖鑰」砲台平面配置圖和剖面圖，重新檢討「北門鎖鑰」砲台修復現狀與 1895 年繪測圖的差異，今古考證期許爲未來「北門鎖鑰」古蹟再修復時，作爲恢復原貌的重要參考依據。

二、清法戰爭前夕的淡水砲台

清法戰爭前夕，清軍到底在淡水地區布防了多少砲台，根據目前出土的文獻，並無明確直接提到砲台數量，僅有間接地從檔案紀錄、地圖或私人雜記中描述部分砲台存在的位置狀況，因此現今學者專家大致認爲清法戰爭前夕淡水砲台至少有四座以上，即「紅堡」、「白礮台」、「新礮台」、「沙崙砲台」，不過從文獻解讀，法軍對峙的砲台有三座，即「白礮台」、「新礮台」、「沙崙砲台」（附圖一），而威脅法軍進入淡水河口，亟欲攻下的砲台目標即是「白砲台」與「新砲台」[3]是一不爭的事實，因此正確釐清當時淡水砲台的位置與名稱，對探討清法

*秋江博物館籌備處
**台灣古地圖史料文物協會召集人

[1] 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淡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88），頁 13

[2] 周明德，《中法戰爭—滬尾血戰史話》，滬尾街文史工作室編著，「淡水古戰場導覽地圖」）

[3] 周明德，〈秋天裡的戰爭〉，《滬尾街》，期 5，頁 5：指出中法戰爭當時，淡水有三座砲台，即「舊砲台」「新砲台」「沙崙砲台」另外許多文獻提到的「紅堡」應即是周宗賢〈淡水與淡水砲台〉，《台灣文獻》卷 41 期 1，

二軍在滬尾戰役的攻防策略與目標，是該役二軍成敗的關鍵因素。

（一）紅堡（紅色要塞）

「在高處的紅色要塞，由英國軍隊庇護的大不列顛領事館…...10 月 8 日進攻紅色、白色要塞……」，[4] 這是一本在 1897 年由法蘭西學院出版的小說「臺灣之火」（Le Feu a'Formosa）描述法軍在 1884 年 10 月 8 日進攻淡水的片段描述，提到紅色要塞與英國領事館的關連，故紅色要塞應該就是我們熟知的紅毛城。「從此路走下去約半英里左右，有海關辦公處，在此後面高高位於懸崖之上是舊荷蘭城堡，現在是英國領事館，在此紅堡（red frot）之旁邊是新蓋領事館舍」，[5] 這是英國茶商 Dodd 在 1884 年 10 月 2 日，日記所記載的片段，描述紅堡位置與英國領事館的地理位置，更加確認紅堡就是荷蘭時期的紅毛城，在 1860 年由英國取得租借權，建立領事館及宿舍。上述兩項文獻已將紅色要塞的基本位置做一描述，但是足以佐證紅色要塞的位置圖，則是真正參與清法戰爭的的法國人 E. Garnot 所著法軍侵台始末一書所附的「1884 年淡水戰役圖」（附圖二），其中圖的右下方有「VIEUX FORT ROUGE」的圖示就是紅色要塞的位置，位在淡水河畔的山丘上，「新砲台」（FORT NEUF）的東南方，「白砲台」（FORT BLANC）的正東方，此一位置正是今日紅毛城和英領事館。[6]

「紅堡」位置是今日紅毛城附近無庸置疑，但他在清法戰爭前夕是否仍具有防禦戍衛的砲台功能，則值得推敲，根據考證，清嘉慶年間的「滬尾砲台」，應在紅毛城西側山下，背著紅毛城，緊沿淡水河邊，到了同治年間，淡水廳志海防志中提到「舊有荷蘭礮城，後外口門山峰造辦礮台、增建營房、戰船凡有十四」礮台更是靠近海口的北邊高地。到了光緒九年，劉璈視察淡水防務，發現一座舊礮台，縮在腹內，不能發揮威力，驅敵海上，這座較靠近內河的礮台，顯然是指同治年間到嘉慶年間的舊式礮台，因已失功能，劉璈乃另選他地興建新礮台，可見在光緒九年（西元 1883 年），紅堡」的礮台已失去功能。[7]

「紅堡」雖具有戰略制高點，但在清法戰爭中，法軍在 10 月 8 日登陸淡水時，許多外僑、領事、海關人員，躲進堅固的紅毛城觀戰，紅毛城及女學堂周圍連中數砲[8]，當時的紅毛城是英租界，不見武裝砲台的功能，雖然法國文獻，陸續提到「先佔領紅色要塞，再向白色要塞進攻」，[9]「四艘軍艦在 10 月 1 日的早晨投入戰役……攻打紅、白要塞、新要塞」，[10] 顯然法軍將紅色要塞視爲武裝砲台的目標，但紅堡卻無攻擊防禦能力，並且不是法軍登陸淡水的主要目標，如果不是記載有誤，就是法軍情報資訊有誤，才將已喪失砲台功能的紅堡，並且是英國租界的地方，做爲軍艦砲轟的目標。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頁 44，中提到的「滬尾礮台」位在紅毛城下的礮台，不過年久失修，已喪失戰鬥能力。二文所提到的「舊砲台」「新砲台」「沙崙砲台」位置和名稱有所出入。

[4] Jear Dargene，《Le Feu a' Formosa》，G.Havard Fils，Edlteur 1897 Paris，p.69

[5] Lames W.Davidson 著，蔡啓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台灣研究叢刊第一 0 七種，台銀本，民國六十一年），頁 161。

[6] E.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台始末》，（台灣研究叢刊地七十三種，台銀本，民國四十九年十月），附圖。

[7] 周宗賢，〈淡水與淡水砲台〉，《台灣文獻》，2002 年），卷 41，期 1，頁 44-47。

[8] Jopn Dodd 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台北原民文化，民國九十一年），頁 58-59。

[9] 石岱原著，帥仕婷、石岱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莎　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扎（1884-1885）》，玉山社，2003 年），頁 59。

[10] Dick de Lon lay，《Au Tonkin 1883-1885》，Paris，1886，p.545-547。

（二）新砲台（油車口砲台）

淡水因戰略位置重要，歷朝砲台修建頻仍，新、舊砲台位置名稱不一，常因時空變遷，不同時代有「新砲台」的出現，清法戰爭前夕的淡水新砲台，係指孫開華在光緒十年（1884年）在油車口所督造的新砲台，當年農曆六月十二日，劉銘傳親自到淡水巡視，與劉璈、孫開華共勘淡水滬尾砲台的基地[11]，並在清法戰爭之際，倉皇築造淡水砲台，[12]這個情形也在法軍的觀察中，「在十月一日，全日中有一千名中國人明顯而且忙碌地工作著。防禦設備，是由一座正在建築中的砲台（新砲台）所構成，在砲台的胸牆上，我們還看不見大砲，可是由於有起重機的設備，我們可以斷定他們正在裝設大砲」「我們艦隊的碇泊地盡可能接近淺灘，和新砲台保持著三四 00 公尺的距離」「敵人乘機在前一個夜晚將三門大砲裝上新砲台的砲座」，[13]並附上新砲台（FORT NEUF）的位置圖，位置大約在紅毛城的西北方，根據當時 John Dodd 的記載「1884 年 9 月 6 日……守軍在靠碼頭的上方的山丘趕造新砲台，挖掘壕溝。新砲台在一個月前才開始建造，尚未安裝萬利輪載來的大砲」「1884 年 9 月 26 日，守軍繼續在淡水河口趕建砲台」「二日清晨六點四十分許，艦砲猛轟白砲台、新砲台，這座砲台是最近二個月，才匆促建於領港人村（Pilot village）上方的山丘，內裝四、五門克魯伯洋砲……新砲台後面山坡及凹地駐紮清軍部隊，這個位置地形良好，無法從海上看到。再後面就是大屯山」，[14]洋人口中的 Pilot village 就是淡水人舊稱油車口庄，[15]根據今人調查與筆者實地勘查，當時新砲台上建造在油車口上，又稱油車口砲台，距離今日「北門鎖鑰」滬尾砲台東北方約一百五十公尺的淡水高爾夫球場內，[16]另有稱新砲台爲「中崙小砲台」顯然是將新砲台與白砲台的位置混淆，造成誤稱，實因砲台建造年代有別，無具體標示，形式難辨，加上中崙、油車口地界相毗鄰；中外文獻名稱有別，今日來論百年滄桑變化，難免有誤。

（三）白砲台（中崙砲台）

淡水地區砲台的修建，從荷蘭時代的紅毛砲城，到清嘉慶道光年間，砲台的重點在於維持治安，防範民變與海寇，到了同治年間，由於列強的入傾以及經貿的成長，淡水不但是臺北的口門，也是防範外力入侵台北的鎖鑰，而成兵家重鎮，不得不在淡水新造礮台。同治年間新建的砲台是更靠近海口的北邊高地上，大約是在今中崙一代，這座砲台的建造除了清代同治年間的淡水廳誌中提到[17]，在法軍的眼中，即是「此外還有一座兼作燈塔用的，以白砲台著稱的舊砲台，它被一些砂包掩蔽著，而在它的砲眼內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門大砲的砲台」，[18]並附有白砲台（FORT BLANC）位置圖，位在紅毛城西南方，靠近淡水河，顯然法軍描述的白砲台是舊有的砲台，並且洋人稱白砲台爲 China pilot，是海船進淡水港的陸標」[19]，

[11] 光緒朝月摺檔，光緒十一年二月七日，劉銘傳奏。
[12] 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蹟考〉，《台灣文獻》，卷 36，期 3.4 合刊，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頁 244。
[13] 編者，〈法軍侵台始末—淡水篇〉，《滬尾街》1992 年 3 月）期 5，頁 19。
[14] 同註 8，頁 31-44。
[15] 同註 1，頁 146。
[16] 周明德，〈秋天的戰爭第一光緒中法之役「滬尾血戰」史話〉，《滬尾街》，1992 年）期 5，頁 19。
[17] 同註 7，頁 44。
[18] 同註 13，頁 19。
[19] 同註 1，頁 146。

「過了白堡就有海關燈台」[20]從這些文獻敘述，和今人調查，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白砲台的位置應是今日淡水海關旁邊的燈塔現址，此地名稱爲中崙，故稱中崙砲台，在今日河堤後方土壘爲砲台遺址，清法開戰時由孫開華駐守，以小口徑舊式砲還擊，火力懸殊，因此被法軍稱爲「可憐的小砲台」[21]，燈塔應在清法戰爭前就已建造，所以白砲台的中外名稱有「中崙砲台」、舊砲台」、小砲台」 如無詳實比對，容易造成解讀上的混淆。

（四）沙崙砲台

清法戰爭滬尾戰役對陣前夕，在文獻中明確提到的砲台，除了前述的「紅堡」、白砲台」、「新砲台」外，另外沙崙砲台也被提到，但常被誤解爲「白砲台」 因「白砲台」位於中崙、沙崙交界，故地圖上常被混淆，加上清法二軍交戰時，沙崙砲台似乎沒有扮演重要地位，故常被忽視，在「點石齋畫報」及「滬尾形勢」兩圖觀察，沙崙砲台似乎被誤解爲「小砲台」，即「白砲台」 因爲文獻指出「沙崙砲台」位在沙崙法軍登陸處，離「城岸」不遠處，才有這項圖示的誤差。[22]根據今人調查， 沙崙砲台」位居淡水河北岸的平坦海濱，旁有石造燈塔「望高樓」 所在地村落稱爲沙崙，今稱淡海，距離淡水仕紳捐造的「城岸」甚近，砲二門用砂囊做掩體，[23]屬於簡易式活動砲台。筆者親往勘查，在今沙崙海水浴場外圍停車場，尚見到略高山丘，滿布林投和黃槿，當地民眾認爲沙崙砲台可能在此地，並且可機動移防，故各項文獻、地圖無法固定清楚標示「沙崙砲台」的詳細位置。[24]

三、滬尾血戰與淡水砲台

（一）10 月 2 日砲戰

1884 年劉銘傳以巡撫銜來台督辦軍務，當時法方準備佔領台灣來脅迫清廷屈服，盤算佔領基隆和它的煤礦工廠，對於淡水的軍事行動，也基於淡水與基隆兩個港的地理形勢，實屬必要。因此，劉銘傳等人斷定法軍除了進攻雞籠外，一定會進攻滬尾，乃趕修滬尾砲台。[25]從 10 月 1 日，法國將領李士卑斯（Lespes）率艦隊抵達淡水港口，展開一場劉銘傳奏摺所說的「滬尾血戰」，[26]這場戰役主要是指「10 月 2 日砲戰」和「10 月 8 日登陸戰」 其最主要的目標便是摧毀砲台、佔領水雷哨及清除障礙物，使法軍艦得以長驅直入臺北府城，因此「滬尾血戰」可說是一場砲台攻防戰。

法軍進攻淡水，目的在破壞威脅法艦的砲台，[27]10 月 2 日的砲戰肇因清軍採取「塡石塞港」的防禦措施，8 月 15 日的前幾日淡水港內開始布雷，滿載石塊的帆船炸沈塞港，以阻止

---

[20] 同註 5，頁 161。
[21] 滬尾文史工作室， 淡水文化資源提引》，台北縣淡水鎮公所，民國 83 年） 頁 86。
[22] 莊展鵬主編， 淡水》，遠流出版社，1994 年） 頁 49。
[23] 同註 16，頁 90。
[24] 滬尾文史工作室曾在民國 83 年製作淡水古戰場導覽地圖，在圖中標示，沙崙砲台的舊地，約在沙崙海水浴場與老海水浴場的中間位置。
[25] 同註 12，頁 244。
[26] 「滬尾血戰」用詞，取劉銘傳〈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劉壯肅公奏議〉，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十七種，民國 47 年）。
[27] 同註 1，頁 151。

法艦闖入淡水河，布置數枚水雷，內有五百磅炸藥，可由岸上的電器設備點燃引爆，因此，孤拔命令李士卑斯將瞰制淡水內港及外港的防禦予以破壞，主要是指砲台，才有 10 月 2 日砲轟淡水的行動，至於清除水路中的水雷，就必須派兵佔領點火哨和敵砲的破壞工作，則是 10 月 8 日登陸戰的主要任務。

10 月 1 日清晨六時，李士卑斯少將所率領的艦隊向英艦 Cockchafer 號發出警告信號，計畫在廿四小時後砲擊淡水的的要塞防禦設備。[28] 這項警告發出後，在淡水的洋人集中在「滬尾集中營」受英艦保護，並且普遍認爲法軍可以在半個小時之內粉碎滬尾所有砲台後，然後派遣陸戰隊登陸，數小時後就可以佔領淡水。

10 月 2 日清晨，清法雙方劍拔弩張，戰事似乎一觸即發，不過到底是何方陣營在何時先開火，卻有不同說法，一說「法艦向英艦發警告之翌晨六時半，四隻法艦羅列於淡水港外圍海面開始砲擊滬尾要塞」，[29] 不過這個說法根據淡水稅務司法來格（E. Farrago）的正式紀錄，是由清守軍在十月二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先開砲，法軍也迅速反擊，艦砲猛轟白砲台（中崙砲台）、新砲台（油車口砲台）。[30] 不過，在 1886 年由巴黎出版的「北圻軼事」提到「四艘軍艦在 10 月 1 日的早晨投入此場戰役，但 1 日晚上到 2 日凌晨並沒有任何攻擊行動。但在 10 月 2 日早上七點二十分所有的外國居民被震醒，中國爲了要驅離法軍而開火，其中一發打中了凱旋號（La Triomphante）的旗桿，幾分鐘後四艘軍艦回擊中國砲彈」「直到中午軍艦繼續攻打紅堡、白砲台、新砲台、壕溝中的兵營」「直到夜晚來臨的前 4 個小時，中國再投擲幾顆砲彈後，停火示意著間歇性休息到後天」[31] 由以上說法，似乎在法方和外國文獻上是由清軍先從砲台開火，時間的落差可能當事人的記憶或其他因素造成落差，但是 10 月 2 日的砲戰，由清軍固守的砲台開火，顯示劉銘傳、孫開華等人在數月前加強砲台修建，並在「前一個夜晚（10 月 1 日）將三門大砲裝上新砲台（油車口砲台）的砲座」[32] 準備以砲陣地火力的戰術來壓制法艦的砲火，同樣地，法國軍艦也是將清軍的砲台作爲砲轟的主要目標，雙方一來一往，砲轟十三小時，各有損傷，戰事暫告一段落，登陸血刃戰隨時爆發。

「法國砲兵只能利用敵人發砲的閃光測出他們的大砲位置，這種無法精確的射擊，直到將近午前七時半，霧慢慢散去，視線比較清楚時，方能予以修正。新砲台不久便受到大雨般的砲彈壓制，可是中國砲兵們卻一直支持到他們的大砲被完全毀壞爲止。」我們艦隊對於白砲台施以密集的砲火，不久便摧毀了他的砲眼，從這時起，李士卑斯少將便保持著於間隔若干時候向這兩座砲台發射數砲」，[33]（註 33）這段敘述砲戰過程的紀錄，似乎已將結果很清楚地呈現，法軍 10 月 2 日砲轟的區域主要是沙崙、中崙、油車口、紅堡等砲台附近區域，也造成新砲台（油車口砲台）和白砲台（中崙砲台）損傷，其中白砲台破壞嚴重，中型砲被毀、士兵陣亡十多名，負傷二十多名，但清軍卻英勇奮戰、死守岡位，不肯寸移，使法軍及洋人預計半小時摧毀淡水砲台的傳言破滅，也延後法軍登陸，佔領淡水的美夢。

10 月 2 日的砲戰，也波及洋人區及滬尾街，上午七時至九時爲射擊高潮，造成紅毛城後

[28] 同註 13，頁 19。
[29] 此一說法見周明德〈秋天裡的戰爭〉一文，本文大多以英國茶商 John Dodd 的〈台北封鎖記〉爲本，但根據 John Dodd 說法卻是清晨六點四十分許，由清軍砲台向法艦開火，二者有所出入。
[30] 同註 8，頁 43。
[31] 同註 10，頁 547。
[32] 同註 13，頁 19。
[33] 同註 13，頁 19。

壁、女學堂屋頂等地損壞，大部分淡水街民多往山區疏散[34]不過，清法雙方交戰的重點乃是法艦與清軍砲台的互轟，新砲台大約隔半小時發砲一次，後來放棄，白砲台隔更久才發一次，但放棄時刻較晚，到上午十點鐘就停了，法艦砲則持續轟擊兩砲台，到下午兩點鐘才止，接著單發，到晚上九點鐘方息。[35]二軍互相對峙，互增兵源，準備下一場砲台爭奪戰。

（二）10 月 8 日登陸戰

「陸戰隊的作戰目標是向新砲台直接進攻，將它的大砲摧毀，隨後轉向白砲台進發，並將位在途中的水雷點火哨佔領，使敷設的水雷爆炸，然後歸艦」，[36]（註 36）法軍 10 月 8 日淡水登陸戰的主要任務有二：1、摧毀新砲台（油車口砲台）、白砲台（中崙砲台）2、佔領水雷點火哨，爆破水雷。從法軍的作戰目標和兵力分佈，顯然是要延續 10 月 2 日對淡水地區砲台的火力壓制，直接派兵佔領摧毀，等於將臺北咽喉的淡水河口卸除武裝，則「台北必守淡水港，淡水港失則台北不能保」，再清除水雷障礙，法軍將可輕易攻下淡水，直入台北，達到佔領北台威嚇清廷的最終目的。因此，清法二軍對於即將展開的登陸血刃戰，嚴陣以待，積極增兵，以新砲台和白砲台兩大要塞做爲攻防的主軸。

10 月 2 日砲戰後，法軍將領李士卑斯鑑於兵力不足，向基隆求援，孤拔以援兵數百名分乘巡洋艦 2 隻，運輸艦一隻，開往滬尾增援，並任馬丁中校爲指揮官，訂於 6 日登岸，可是 6、7 日兩日風浪過大，因此延至 8 日進攻。登陸行動在軍艦砲火的掩護，壓制岸上敵人的砲台和防禦陣地開始，共分爲五中隊的兵力，外加兩個水雷兵分隊，每人攜帶一日口糧，加上十六包彈藥和預備彈匣，在十點左右在沙崙東北海岸（今海水浴場）登陸整隊，第一和第二中隊立刻展開戰鬥隊形，向新砲台稍右的方向進發。二百公尺後有第三和第四中隊做預備隊，屬於法軍右翼攻擊部隊，第五中隊擔任掩護左翼的任務，五隊人數約在 500-800 人左右，由於登陸地點和新砲台、白砲台之間有一片密林（即林投和黃槿），法軍一進入密林，各中隊失去聯絡，無法統一指揮，只有以可見到的新砲台爲目標，朝著目標方向前進。[37]

清軍方面早已備戰多時，先由孫開華令擢勝右營營官龔占鰲，帶兵勇埋伏於假港，擢勝中營營官李定明伏於油車口，擢勝後營營官范意雲爲後應，亦即孫開華守南路，在白砲台陣地周遭，章高元、劉朝祐等人埋伏在砲臺山（今淡水高爾夫球一帶）後方，位在北路的紅毛城附近，張李成則守在北路山間做後應，人數在數千人以上。[38]

當法軍在十一時許，陷入密林中，孫開華立即從白砲台陣地派兵分途截擊，雙方在密林中進行肉搏戰，武功高強的清勇，揮刀殺入敵陣，法軍陷入苦戰「在這災難的時刻，當這些健壯的法軍發現其被砲火攻擊時，準備突然還擊，但這兩個要塞（白砲台、新砲台）及三千名士兵阻斷了我們的退路，他們（清軍）謹慎的對抗這一些官兵，面對著看不見的敵人，我們一個接一個的打仗，前排水手倒下，後排士兵跟著往前遞補」，[39]一位法國法蘭西學院學者根據法軍文獻所撰寫的小說中描述當時法軍的困戰，並用油畫將當時法軍第一中隊指揮官

[34] 同註 2。
[35] 淡水新關稅務司法來格，一八八四年十月二日。
[36] 同註 13，頁 20。
[37] 同註 13，頁 20。
[38] 同註 12，頁 245。
[39] 同註 4，頁 70。

Fontaine 上尉，在戰鬥中，被清軍斬首的畫面模擬重現（附圖三），這個畫面和四十五年後淡水一樁「河南勇仔命案」的當事人河南勇仔，似乎不謀而合，因爲傳說他在中崙血刃戰時，斬殺一法將校（疑似 Fontaine）而頒巨額獎金，並在淡水定居，最後因錢財被謀殺[40]。法軍在這戰役中共陣亡九名、失蹤八名、負傷四十九名，其中有後來因傷重在西貢死亡的第二中隊指揮官 Dehorter 上尉[41]，法軍損失慘重，最後因彈藥耗盡，在十一時四十五分，由信號兵發出撤退的信號，下午一時，清軍獲得勝戰，滬尾的保衛終於成功。[42]

滬尾血戰一役，對法國而言是項沈重的打擊，對清廷而言，則是一次振奮人心的戰役，法方檢討失敗的原因是登陸部隊人數的不足和海軍在陸戰缺乏戰術經驗所導致。自此之後，雖然法軍嚴密封鎖淡水八個月，但只零星砲擊淡水，也不再做佔領淡水的打算，反而清軍方面感受到砲台陣地的重要，迅速修復加強砲台防務，因此清法戰爭在滬尾血戰的成敗，除了淡水地形上的優勢、清軍奮勇作戰、法軍戰術判斷錯誤及情報不足外，淡水地區砲台的正確布署，似乎是一項最關鍵的因素。

四、清法戰後的淡水砲台修建

（一）劉銘傳滬尾砲台

清法戰後，劉銘傳有感於澎湖、基隆、淡水等海口的重要性，因此加強辦理海防，所以當法軍退後，他隨即命令部屬趕造滬尾等地新砲台，「再查台灣辦理海防，賣礮築臺，經臣奏明在案，各口自十二年正月興工，分築礮臺」。基隆、滬尾、澎湖等處，皆擇地另造新臺…基隆、滬尾各二座」[43]光緒十二年正月，劉銘傳聘請洋人鮑恩士造滬尾二座礮台，以昂貴的進口鉄水泥來興建礮臺及子牆，大礮則向英國購買，並在光緒十五年（1890 年）五月完成大礮安裝成爲臺灣最現代的礮臺之一，捍衛著台北的門戶。[44]

（二）「北門鎖鑰」與「保固東瀛」

根據上述文獻所載，劉銘傳確曾在滬尾與建二座礮臺，其中一座就是今日位在淡水高爾夫球場旁，列爲二級古蹟的「北門鎖鑰」礮臺，因爲礮臺入門處上方題有「北門鎖鑰」和「光緒七二年季春中浣之吉」、合肥劉銘傳」等字，很清楚地顯示是劉銘傳在光緒十二年在淡水興建的礮臺，而且很幸運地歷經日治時期、國民政府遷台等時期保存至今，成爲見証清代強化淡水海防的史蹟。不過，另一座滬尾礮臺到底何在?則是眾說紛紜，有一說與「北門鎖鑰」同時期的砲臺還有兩座，但並不在淡水鎮，一座是在對岸八里鄉觀音山的山腹，另一座是在關渡西邊山丘的「江頭砲台」，[45]八里觀音山砲台的位置圖，曾出現在明治廿八年（1895 年）

---

[40] 同註 4，頁 16。

[41] Dohorter 上尉生於 1850 年，1866 年進入海軍學校，1883 年升海軍上尉。1883 年 8 月 17 日離開巴黎派遣在凱旋號指揮砲擊行動。

[42] 同註 12，頁 245。

[43] 見琉壯肅公議，卷五，設防略，「辦水路電線摺」（光緒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及「台灣水陸電線告成援案請講摺」（光緒十四年五月初五日），頁 256-260。

[44] 同註 7，頁 51。

[45] 林衡道、陳秀芳，《台灣古蹟概覽》，幼獅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三年），頁 153。

三月廿七日發行的「台灣實測地圖」裡的淡水港示意圖（附圖四），當時日軍尚未入台，已派人偵測淡水港砲台，其中淡水河右側有一砲台似乎就是觀音山砲台，1895 年，唐景崧攜大批官銀由滬尾乘船內渡後轉乘德籍軍艦，觀音山砲台曾開砲轟擊，造成數十人傷亡，德國軍艦也發砲壓制，觀音山砲台於是被擊毀，[46] 但這二座砲台僅存少部遺跡，也無文獻檔案明確記載，確定就是劉銘傳建造的另一座滬尾礮臺。

長住淡水的外國牧師馬偕，曾在「台灣遙寄」的淡水篇中提到「沙灘上有一黑燈塔，附近並有一白燈塔，再過去是漁村，岸上有許多小船，以及曬著太陽的漁網。岸上有一中國炮臺，小丘對面尚有一炮臺，均設現代化工事，掩護著大砲和兵士」，[47] 本書出版在 1896 年，馬偕書中所提到的年代應仍是清朝統治時期，小丘的砲台應是「北門鎖鑰」，那岸上的中國砲台究竟爲何?是位於海關的砲台，還是其他砲台，白砲台在清法戰爭時已有損毀，是否戰後修復，不過就地理位置判斷，應是白砲台的可能性較大。同樣在一位曾擔任清廷滬尾鹽館官員史久龍在 1894 年 10 月遊淡水時，曾記載「西至海關衙門以外，英得吉利士洋行，瑞記洋行、領事府、稅務司公館、蟬聯而前，直至洋海關止，此外一片砂石，礧礧磊磊，再半里許，則防營砲台在焉」[48] 以乎和馬偕所提的中國砲台有許多地理位置的類同性，到底是「白砲台」？還是另一座砲台？令人啓疑竇。不過他在前一段提到滬尾形勢時，則對滬尾砲台（應是北門鎖鑰）有詳實描述「滬尾砲台雖亦係坐於山腰，然在口內半里許，其勢亦開舒而不收斂」，砲台本係明台，甲午春始改造暗台，設八百砲台三尊，小者甚多。外垣以雉堞，中爲管帶所住，四週皆砲房、兵舍，均仿洋式。山下半里許爲統領所駐，山上更結兩營爲角，其勢聯絡，頗覺雄壯。統領所札之處，即昔水雷局，是局亦係劉省帥所創建，中有委員，教師，學生。督造水雷，安置海口以防敵，立法甚善」[49]。

從史久龍的雜記中，我們得到幾個訊息：

1.1894 年時除了山腰的滬尾砲台外，還有一個位於海關旁的防營砲台，這個防營砲台與馬偕書中的中國砲台是否同一座，是白砲台，還是另有其他砲台？這項訊息與日人在入台前繪淡水港示意圖中，也出現了淡水河口的左側有二座砲台，靠近河邊與燈塔者稱爲新砲台，更遠處的山丘則稱爲舊砲台，新舊砲台之分爲何？是孫開華督造的油車口砲台後改成「北門銷鑰」故稱舊砲台，而新砲台位置彷若「白砲台」，可是它比「北門鎖鑰」還早怎麼會是新砲台，還是與「北門鎖鑰」同期，福建省秘書長張遵旭曾提及的「保固東瀛」？

2.水雷局所在地就是滬尾砲台統領所駐劄之地，後來成爲軍事教育訓練場地，是不是當年劉銘傳設立的礮台之一，只建城墉後將砲台經費挪爲水雷局訓練之用，才有史久龍感歎「海疆無警，節省經費，裁去教師，惟留學生數人，乃至演放時不知藥線所在」

[46] 戴震宇，《台灣的城門與砲台》，（遠見文化，民國 91 年），頁 48。
[47] 馬偕博士著，林耀南譯，《台灣遙寄》，（台灣省文獻會，台灣叢書譯文本第五種，民國四十八年），頁 221。
[48] 史久龍原著，方豪校訂〈憶臺雜記〉《台灣文獻》第廿六卷第四期、第廿七卷第一期合刊本，民國六十五年三月。
[49] 同註 48。

的變通方法，這樣的觀點，似乎到了民國五年福建省秘書長張遵旭到淡水遊玩時，曾記載『嗣到舊礮臺閱覽，令人生弔古之感，此處爲昔日之水雷營，或謂水電局，蓋係海軍用地，登岸遙望，礮臺之旁題「保固東瀛」大字，聞係舊礮台之大門。』[50] 這段描述與史久所提劉銘傳創辦的水雷局，應是同一地，位在今淡水忠烈祠山下的陸軍基地，只是「保固東瀛」並沒有標示年代或署名落款，到底是清代光緒十二年的舊礮台，還是日人所題的「保固東瀛」 因爲東瀛是日本俗稱，到底是保護東方之島還是保護日本都值得推敲，因爲三百步之距的「北門鎖鑰」的門額，清清楚楚地將年代署名標示，何以同時期同人所爲竟有如此大的差異，頗令人疑慮，還是只建城墎，由統領駐劄，做爲軍事教育訓練單位，而被劉銘傳虛報爲另一座滬尾礮台，還是保固東瀛就是日人測繪的新砲台，不過，這種說法在日人入台後第二年所繪制的台灣舊砲台原圖資料中，北部地區只見基隆地區砲台，滬尾只有「北門鎖鑰」並沒「保固東瀛」礮台的原圖，似乎說明，即使有「保固東瀛」一名，到底與劉銘傳有無關聯，建造年代爲何？是武裝陣地還是軍事訓練單位，都有賴更多文獻、史蹟文物佐証，才能證明劉銘傳到底有無創建第二座滬尾砲台這個歷史疑案。

五、「北門鎖鑰」的保存與修護考證

（一）修護與保存現況

滬尾砲台「北門鎖鑰」自從建築完成後，除了馬關條約，乙未割台之議時，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搭德輪鴨打號離台，滬尾砲台士兵曾砲擊鴨打號，以阻擋唐景崧的逃竄，[51] 便不再參與過戰事，即使日人登台時也從鹽寮登陸，並未波及淡水地區，日人入台後，「北門鎖鑰」所有權歸於日本政府，由陸軍管理，才撤走砲台的四座大砲，將此地作爲砲兵射擊的演練場，由於列爲「清國名勝古蹟」，日人亦編列預算予以保存並置設施，以供遊覽。台灣光復後，砲台由國軍駐防，直到民國 74 年（1985 年）由內政部指定爲第二級古蹟，軍隊完全撤出，省後轉歸台北縣政府管理，並進行修護，由專家學者組成小組，進行「北門鎖鑰」現況調查與修護計劃，民國 80 年由政府投入經費進行整修，已完成第一期修護工作，同時開放供民眾參觀。砲台呈矩形，由外至內分別爲土垣、壕溝、子牆、砲座、被覆甬道與廣場，構造層次分明。[52] 台北縣政府將砲台內右側房舍規劃爲展示室，陳列淡水清代砲台老照片及立體模形，近期更在母牆部份興建步道，和外圍山坡設立「滬尾砲台公園」 規劃成淡水古蹟園區，達到古蹟休閒遊憩的功能。

（二）1896 年日人測繪原圖

民國七十七年，台北縣政府委托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完成北門鎖鑰調查研究及修護計劃（附圖五） 由於缺乏原始資料佐證，僅能利用砲台現況和部份文獻紀錄，逐步拼湊原有的砲台面貌，雖然參與計劃的學者專家已竭盡所能蒐集文獻，並比對同期相關砲台設施，針對百

[50] 張遵旭，《台灣游記》（文叢第八九種，台銀本），頁 77。
[51] 同註 16，頁 111。
[52] 台北縣政府，《滬尾砲台導覽地圖》

餘年來因自然損毀與人爲修改破壞部份，努力建構砲台古蹟原貌，不過仍然力有未逮，許多疑問未能解開，宛如瞎子摸象，難窺全貌。筆者長期收藏台灣文獻資料，並組織「台灣古地圖俱樂部」同好林于昉醫師，近年在日本收集到一批 1896 年繪測台灣舊砲台原圖（附圖六），其中二張是「北門鎖鑰」的平面配置圖及剖面圖，對於「北門鎖鑰」古蹟再修復，將提供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三）「北門鎖鑰」古今大考證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五條所載：「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不得變更，如因故損毀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目前所稱的修護，實因古蹟遭受損毀之故，無論係自然或人爲破壞，修復工作的大致原則爲保存原有形貌，故修復工作應分兩部份，一爲鑑定其原貌，對近年修改或破壞的部份盡可能予以恢復，二爲現況良好部份，以現代技術予以保存，使不再繼續遭破壞，而不做無謂的修護。[53] 根據上述修護原則，成爲台北縣政府對「北門鎖鑰」現況的維修成果，不過當時在欠缺第一手原始資料的情況下，許多「北門鎖鑰」滬尾砲台的修護工作，並無法達到恢復原有形貌的地步，如今藉由１８９５年原圖和早期圖像的重現與維修現況作一對比考證，將能提供有關單位重新恢復「北門鎖鑰」原貌的參考價值。

1.廣場兵舍---據日治時期「古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資料」所載的「舊砲台」:「煉瓦造台灣葺平家一棟，建坪約八十六坪，城門上有北門鎖鑰匾額」這棟房子爲木造瓦頂的傳統閩南式三合院建築，根據 1895 年代日本隨軍記者留下的滬尾砲台寫真照片（附圖七），可以很清楚看到有三棟傳統閩南式瓦房建築，大砲也尚有留存，到了 1930 年代從大門外拍攝到的遠景也可看到瓦房的殘跡（附圖八），似乎就是史久龍所提到的[54]「中爲管帶所住」的兵舍，因此其形式和材質似乎就是「煉瓦台灣瓦葺平家」至於面積大小，根據「北門鎖鑰」原圖所繪測，以圖示五百分之一計算，佔地大約寬 22 公尺，長 27 公尺的面積，合 210 坪左右，類似今日現況中所保持的兵舍範圍，至於棟數或形式原圖中並無標示。

2.土垣（母牆）與壕溝---史久龍文中曾提滬尾砲台「本係明台，甲午春始改造暗台」[55] 清末新式炮台的布局理論上，有所謂「明台」「暗台」的設計，暗台地處隱僻，不易察覺，有些砲台更設有外層土垣，可以減低砲彈爆破的威力，[56] 如果史久龍在 1895 年所見到的「北門鎖鑰」是在前一年才改爲暗台的理論成立，則其土垣是否是劉銘傳所建造值得再考證，從 1895 年的寫真照片中似乎已有土垣的存在，樹木尚低矮，視野清楚較不隱僻，但較可減少砲彈爆炸的衝擊。1895 年的原圖，也以顏色表示出土垣的範圍，並測繪出高程數字，似乎砲台的北側及東北側爲最低，有利於大砲射擊，最高點的高程，在南側靠近高爾夫球場，且土垣面積範圍最大，只是現況已被破壞。另一張北門

[53]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台北縣淡水砲台調查研究與修護計劃》（台北縣政府，民國七十七年）頁 47。
[54] 楊孟哲，《台灣百年攝影展圖錄》（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八十四年），頁 48。
[55] 同註 48。
[56] 李乾朗、俞怡萍合著，《古蹟入門》（臺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 88 年），頁 98-100。

鎖鑰，北側及西側的剖面圖顯示，二側土垣高度都略高砲座高度，呈自然壘土的緩坡型，壕溝的高度也和廣場內的高度一致，都和現況調查符合。[57]

土垣和壕溝部份，另有二項發現值得重視，一爲砲台大門寬度，在原圖上的測繪是土垣與壕溝的入口處道路寬度是一致，且無大門設施，與今日入口道路現況似乎變寬，比大門還寬的情形略有不同，二爲砲台靠西南側，近高爾夫球場的土垣，有一甬道可連接壕溝，現況已遭破壞，不見當年景象。

1.子牆與砲座---1895 年「北門鎖鑰」原圖中的子牆部份，在大門處所測繪大門厚度與現況相同，但材質並無標示，第一層階梯也位在大門右下方，只是坡度較緩，延伸到與甬道並齊，今日現況較陡，未延伸到與甬道一致，第二層階梯原圖也是在大門上方右下角並不是在大門正中央，顯然是後 人所改建，另外大門二側則有明顯的土夯，現況已被修改過，也連帶影響到大門與西側子牆的平行完整度，[58] 現況似乎略呈前大後小，同樣在與大門同側的南北二側子牆轉角處，都有土夯，不似今日現況平整。

從 1895 年北門鎖鑰的剖面圖，可察覺在子牆部份前端有礫石狀，似乎爲證明當年因經費不足而採取「外用鉄水泥敷面，礙基亦多用石子與鉄水泥參和以期減省」的推論是正確，[59] 另外靠近北側與東側砲座部份的子牆，改變也甚多，特別是楷梯部份，其中最靠東西側的砲座，原有五座階梯，今祇剩二座，東側砲座原有一座階梯現改爲二座階梯似乎現況與原圖有所出入，在砲座方面，原圖並無任何砲基的標示，現況則有三座砲台有砲基，而且也增加三座機槍座，與原圖異差大。

2.甬道及被覆--滬尾砲台東南側砲座附近有彈藥庫，相傳在日人入台前夕駐守砲台的兵勇四處逃遁，致要塞無一兵一卒，幾位淡水住民好奇的點蠟蠋，潛入幽暗的甬道，不慎引火，發生大爆裂，瞬間人房共焚毀。[60] 這段插曲在現況維修時，曾在東南側甬道發現爆炸殘跡，1895 年的原圖中，日人將這個「爆發」的範圍繪測出來，並加以註明，證實上述傳言並非虛假。原圖中以「掩蔽部」表示今日甬道，在砲座與甬道銜接處另有「暗路」相通，顯示必須經過室內的甬道和「暗路」才能到達其他砲座，以保護兵員的安全，在「暗路」與砲座旁都有一小房間，推測應是砲彈儲藏室或兵員避難處，做爲砲彈射擊後，躲避敵方砲彈射擊的空間，今日的現況除北側尚留有氣窗及空間，東側的砲座台的空間，已被修改，完全封死，不見昔日的面貌。同樣在西北側與西南側的壕溝內有二個小空間，是「不當敵礙之處」 到底有何功用？現況已無此設施，值得再進一步考證。

從另一張剖面圖來分析甬道可發現，甬道的材質並不是一般的紅磚而是類似礫石爲主的石板條所構成，今日現況中的紅磚，到底是原有的建材，還是後人改建時所增加使用的材質，

[57] 同註 53，頁 27。
[58] 同註 53，頁 279。
[59] 同上。
[60] 同註 16，頁 14。

都有再考證的必要。

「北門鎖鑰」砲台的被覆並沒有覆蓋鉄水泥，被覆層完全是裸露的土方，不僅覆蓋先築好的甬道，從 1895 年的舊觀照片可清楚看到，裸露的土方被覆早已存在，並已略有草木生長，甚至今日現況中在甬道上方所出現的甬道通氣孔，在原圖與舊照片中都未出現，因此調查研究報告，推論通氣口爲原貌所有，與實際有所出入，研判應是光復後新設，因爲剖面圖也沒有標示通氣口的設施，可見最初設計被覆與甬道時並沒設想通氣口的設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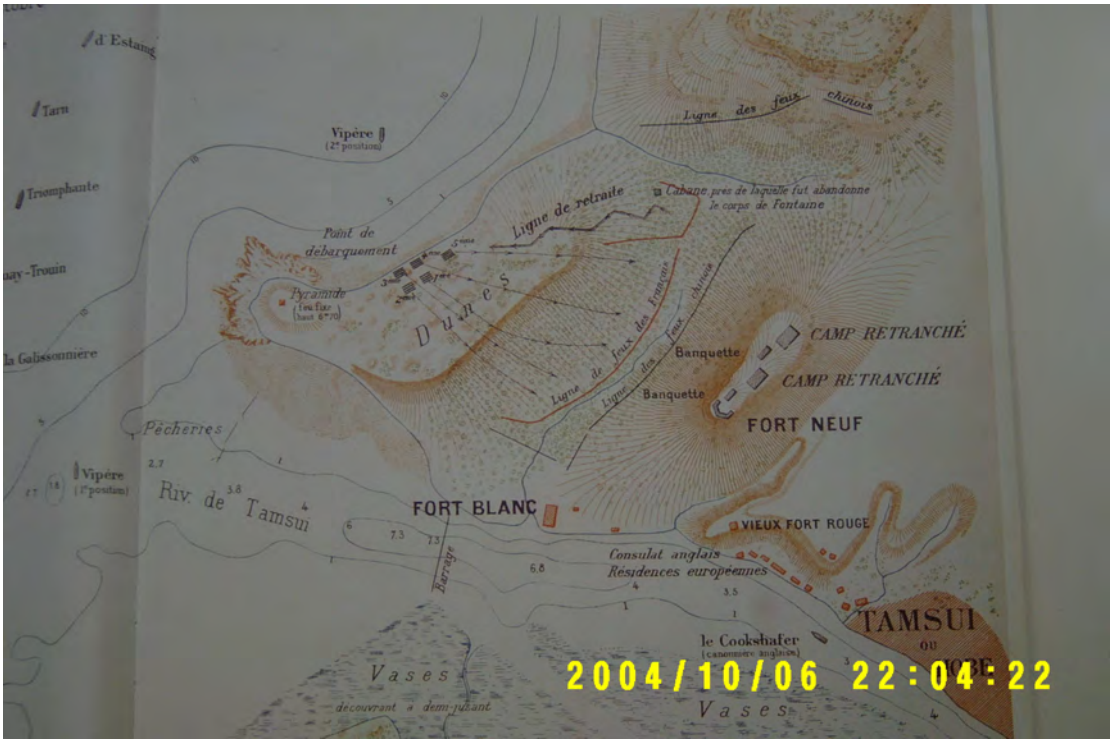
六、結　語

清代對台灣海防的重視，始自同治年間的牡丹社事件，真正發揮海防與砲台的功能，則是光緒十年的清法戰爭，特別是滬尾血戰後，不論是 10 月 2 日的砲戰，10 月 8 日的登陸戰，或是後面爲期數月的封鎖，由於淡水砲台的威力，扼守淡水河口，使法軍無法長驅直入，進犯台北府城，這也是爲什麼 1895 年日人並沒有直接在淡水或基隆登陸，反而選在東北角鹽寮登陸的緣故，避免與海防砲台正面交鋒，減少傷亡，這也說明清法戰爭滬尾血戰一役，清法二軍幾乎都是以砲台要塞做爲攻防的主軸。如果法軍當時能迅速摧毀淡水地區的砲台要塞，淡水將被快速佔領，則台北城不保，歷史勢必重新改寫。正因清軍英勇抗敵，堅守砲台要塞，雖有所損毀，卻仍迄立不搖，法軍無法越雷池一步，成爲有清一代難得的一次勝仗，故稱滬尾血戰爲砲台攻防戰，實不爲過。

由於砲台對台灣海防和淡水的重要，才有光緒十二年劉銘傳興建「北門鎖鑰」等砲台的由來，不過，由於文獻缺漏，始終無法明確指出劉銘傳所建滬尾另一座砲台的真實位置，是觀音山砲台，江頭砲台，還是「保固東瀛」或者根本是一個空殼子，有城墉而無武裝砲台，是一個軍事訓練及指揮所，而不是一個戰鬥要塞，在日人侵台前的實測圖中，淡水新舊砲台的名稱釐清或許須要更多史料遺跡佐證，才能將另一座滬尾砲台的神秘面紗，揭開在世人面前。同樣「北門鎖鑰」歷經天然毀損和人爲破壞，倖能留存至今，並能在有關單位和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下維修成古蹟，供後人憑弔，自有其歷史意義，但因欠缺原始資料，始終難窺全貌，筆者有幸能獲得原圖考證，略述一二，非行家所言，針對現況維修做一建議，期望能拋磚引玉，做爲「北門鎖鑰」再維修的參考之用，也爲清法戰爭在淡水留下蛛絲馬跡，做一歷史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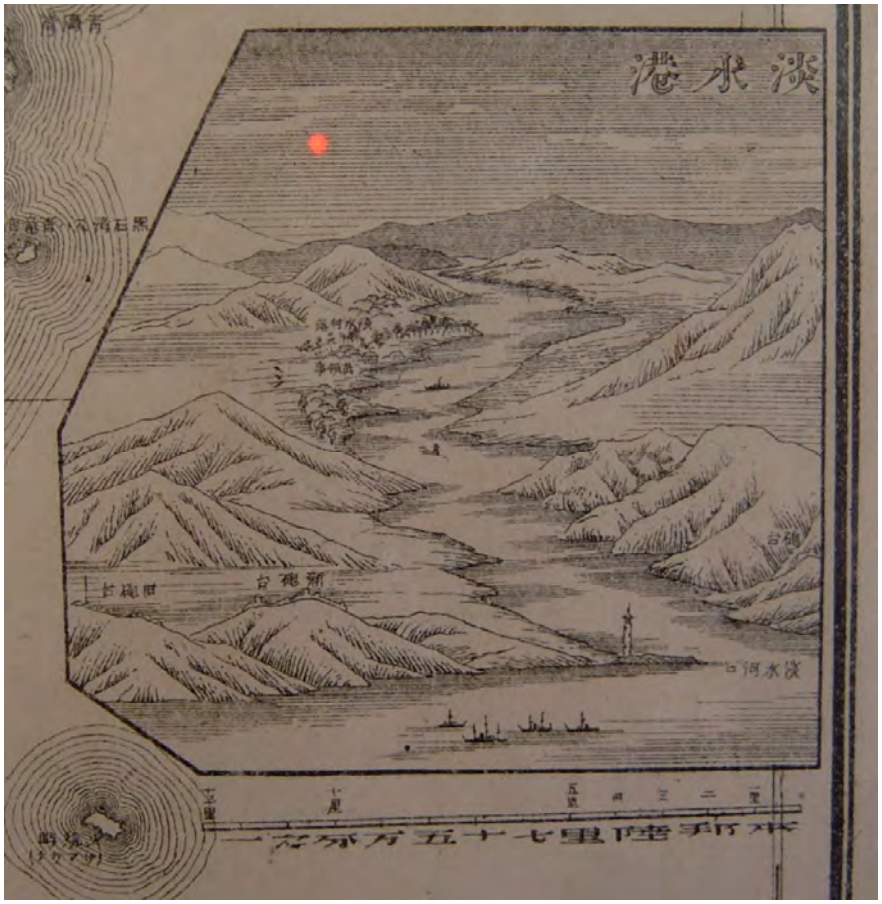
附錄： 照片和圖表）

附圖一：清法二軍淡水地區攻防及砲台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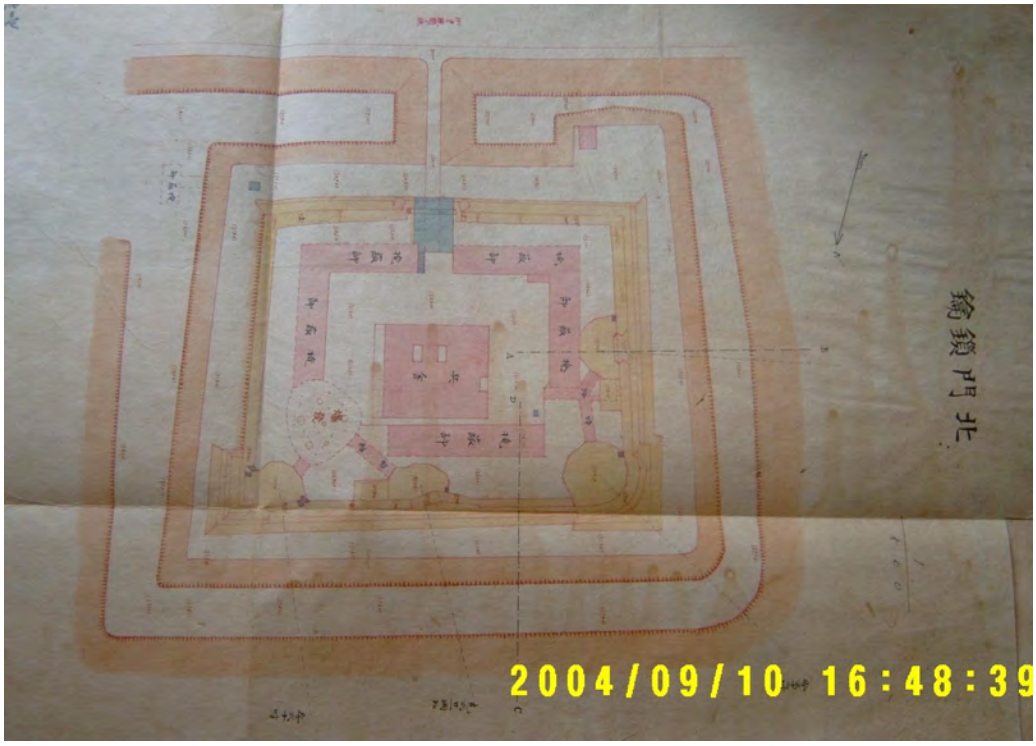


附圖二：1884 年淡水戰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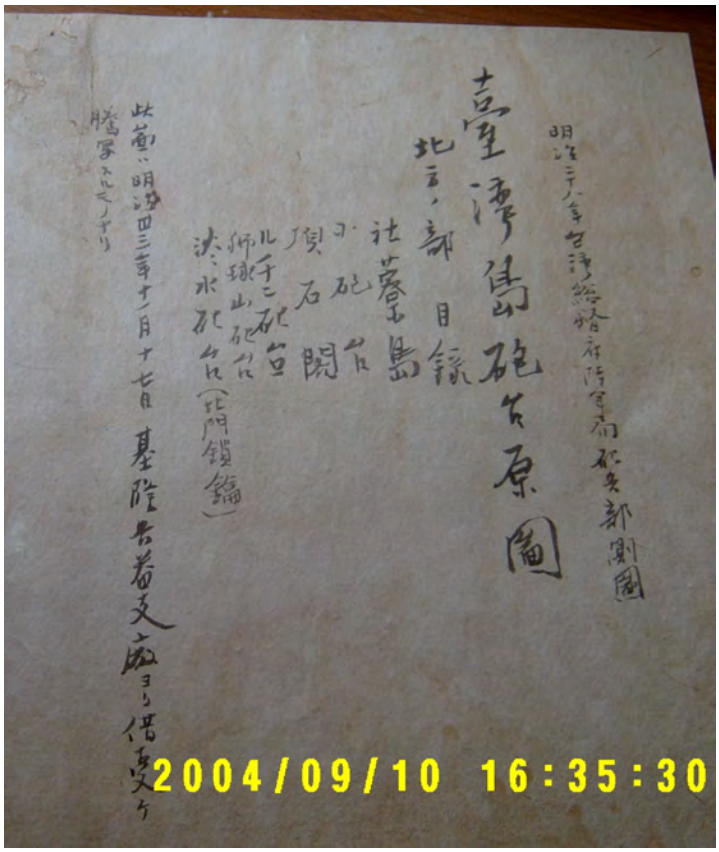
附圖三：10 月 8 日法國軍官被斬首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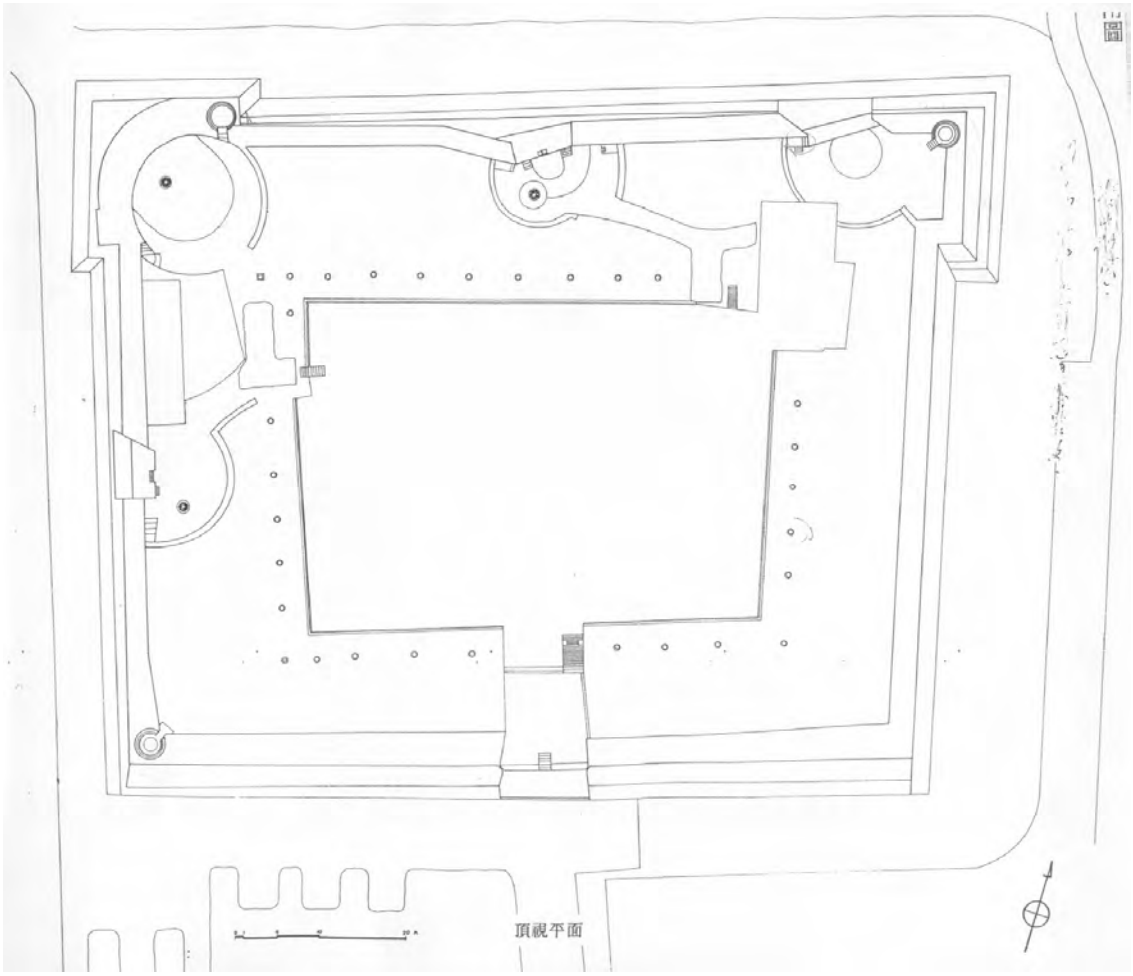
附圖四：1895 年淡水港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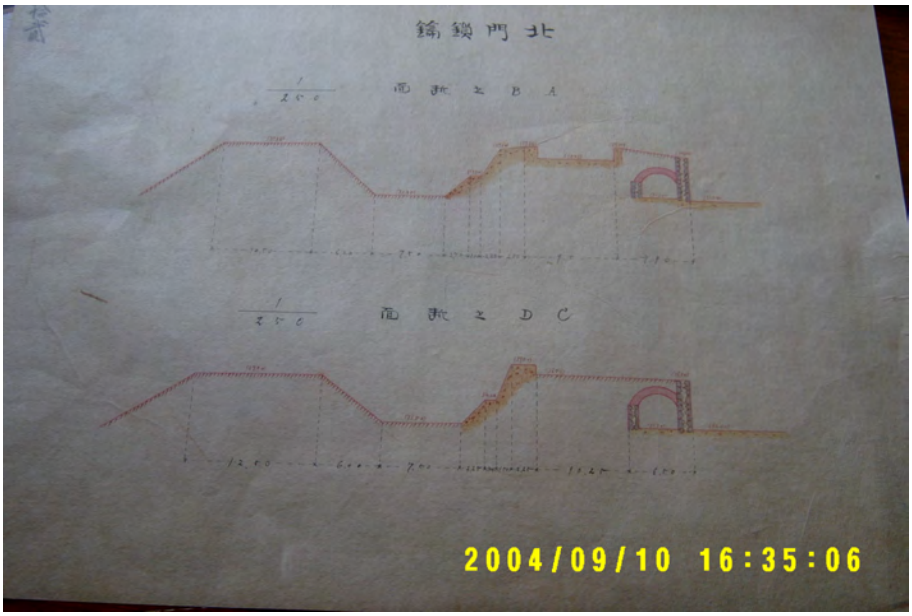
附圖五：北門鎖鑰現況調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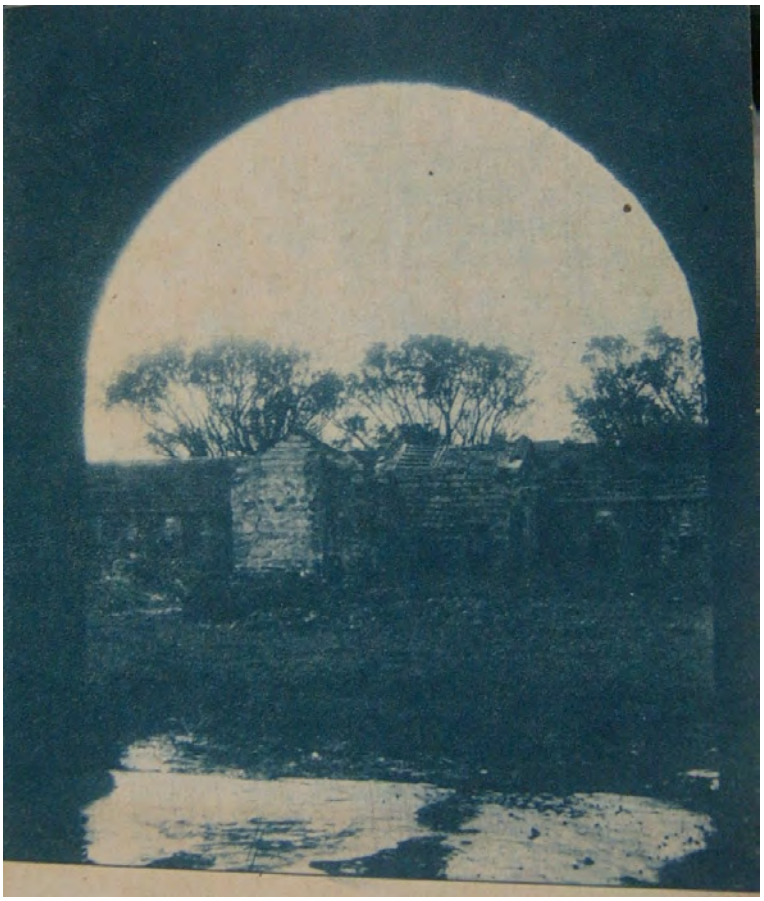
附圖六：1895 年北門鎖鑰砲台文件



附圖六-1：1895 年北門鎖鑰砲台平面圖



附圖六-2：1895 年北門鎖鑰砲台剖面圖



附圖七：1895 年北門鎖鑰舊貌

附圖八：1930 年北門鎖鑰兵社殘跡照片

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

紀榮松 (Rongsong JIH)*

提 要

清法戰爭（1884-1885）因北圻宗主權糾紛而起。 隨著戰火自越北逐步蔓延到福建、台灣、浙江,法國海軍也迭次增兵遠東。孤拔提督前後曾經動用的船艦合計多達五十艘，含鐵甲巡洋戰艦五、大小巡洋艦二十、運輸艦十二、砲艦九、及杆雷艇四。其規模甚至超越法國本土艦隊。 當時法國駐外海軍均以「兵站」（station locale)、「支隊」(division navale）為單位，只有孤拔擁有「艦隊」(escadre）司令頭銜。 本文描述孤拔屬下與台灣戰場較有關連的巡洋艦、砲艦、杆雷艇，依據美國海軍所珍藏的船艦圖片、史料、書籍，探討法國駐亞艦隊編組的演變消長，穿插相關的當代海軍史實，並評比部份法艦、清艦的性能與戰績。

關鍵詞：清法戰爭，台灣，法國海軍，巡洋艦，砲艦，杆雷艇。

一、前言

北黎 (Bac Lé) 事件把原本是侵越法軍與北圻黑旗軍之間的局部衝突轉變成清、法兩國間的戰爭[1]，戰火也自越北逐步蔓延到福建、台灣、浙江。 法軍先消滅清國駐福建的船艦、砲擊馬尾船政局、破壞閩江沿岸的眾多砲臺，佔據基隆長達八個月，在淡水登陸卻當日就被清軍擊退，繼而封鎖台灣海峽與浙江鎮海港，最後又攻陷澎湖列島。 這一連串的事件對清國東南本土和台灣影響深遠自然不在話下。 1885年9月清廷將台灣從福建分出、單獨建省，便是清法戰爭的一個漣漪。 孫逸仙也自述在乙酉年 (1885) 才矢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 交戰時清法兩國陸軍以北圻爲主戰場; 制海權在握的法國海軍則以砲擊口岸、登陸掃蕩、據地爲質、阻絕封鎖爲主要任務, 始終沒有類似甲午 (1894) 年清日艦隊大海對決的場面。習史、治史者不單要瞭解戰事如何發生、如何演變; 也要追究何以如此發生、何以如此演變 [2]。 雙方指揮官的習性素養、所能動用的部隊裝備、後勤補給能力、部卒操作武器嫻熟程度、官民意志是否協調等等, 對臨陣對敵者的士氣與所能采行戰術甚至戰事勝敗都不無影響, 也都值得史家分頭深入探討。 拿破倫三世在位期間 (1852-1870), 法國應用產業革命所帶來的造船新技術, 有計劃地擴充軍備, 和英國再度爭奪海上霸權。這二十年間所引進的船艦、武器和戰術不止在當代的戰爭中一一測試改進, 也在清法交鋒時發揮作用。包括孤拔座艦

* [美國] 亞洲研究會會員。

1 見註 52。

2 黃仁宇教授生前曾數度言及 『撰史者不宜貿然先帶批判態度, 因爲那就是一種要求歷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 吾人務必先窮究歷史「何以如是發生」』。此話亦見於黃著 《南天北地今古敘》 (臺北：時報出版社，2000), 頁 160。

“八野” (Bayard)[3] 在內的五艘法軍鐵甲艦馳騁台閩浙海面, 南北洋兩艦隊都莫可奈何，對清廷刺激極深。清法議和以後, 福建船政大臣裴蔭森和督辦福建軍務親差大臣左宗棠因而聯名奏請仿製鐵甲艦。 雖有李鴻章掣肘，馬尾船廠卒於1886年底安放小型鋼甲艦 “龍威” 龍骨， 一年後下水, 1890 年移交北洋，改名 “平遠”[4]。 就提升閩廠造艦、設計能力而言，參照法國新式海防艦 Achéron 的形貌、自建鋼甲艦 “龍威” / “平遠”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也算是法艦侵華帶給清國自強運動 (洋務運動) 的激勵和正面效益。 本文描述孤拔提督屬下參戰巡洋艦、砲艦和水雷艇的性能與戰績。 從美國海軍所珍藏的法國船艦圖片史料著手, 說明法國駐亞艦隊編組的演變消長，並穿插相關的當代海軍史實，探討清法戰爭期間主要法艦的角色。

孤拔 (Amédée Anatole Prosper Courbet, 1827-1885)[5] 提督, 於清法戰爭期間先後擔任法國海軍北圻支隊司令、 (陸海軍)北圻遠征軍司令、及遠東艦隊司令; 轉戰越南之中圻北圻及清國東南之閩台浙澎, 任內死於澎湖媽宮。 位於其故鄉 Abbeville 聖母堂的墓園[6], 迄今香火不絕。 百年來法國海軍已有三艘主戰船艦相繼以孤拔爲名, 爲法國自普法戰爭 (1870-1871) 以來唯一享此殊榮的軍人。 遠東艦隊只有孤拔擔任過司令；隨著孤拔死亡，艦隊也縮編爲遠東支隊，因此把遠東艦隊稱作孤拔艦隊也非常合宜。

---

[3] 「Bayard」 依津沽方言, 有譯作 “巴雅” 、 “拜雅” 或 “貝雅”者。 前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授李劍南氏指出, 漢語「雅」字實略帶鼻音 (「ng」), 北洋政府推出注音符號時曾爲此另定一碼, 惟今已失傳。 此處改用南音 “八野”注譯, 似乎較爲貼切 「Bayard」原音。

[4] 席龍飛,《中國造船史》(湖北，2000), 頁 322-323;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 – 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 (上海: 交通大學出版社, 1991), 頁 220-223; 馬幼垣,〈北洋海軍 “平遠” 艦考釋〉 《嶺南學報》(香港，2000), 新第 2 期, 頁 185-240。李鴻章昧於派閥私心, 罔顧大局, 對閩廠與 “平遠” 艦一再歧視打壓, 致使清國自建鋼甲艦宛如曇花一現, 難以爲繼。姜書與馬文於此均有極精闢的分析。按: 李鴻章排斥左宗棠、沈葆楨創建的馬尾造船廠, 與劉銘傳迫害劉璈如出一轍, 均有極深的派系成見作祟。若非左宗棠在世時背書, 兼且慈禧與光緒對法國海軍記憶猶新, 以李鴻章個性, 恐不容裴蔭森仿製鐵甲艦之議輕易落實。繼 “平遠” 之後閩廠所造船艦有魚雷砲艦、運輸船、拖船、魚雷艇等大小計十艘, 戰力與重要性均不及 “平遠”。 “平遠” 曾參與甲午年(1894) 黃海大東溝海戰, 表現不俗。 乙未年威海衛戰後編入日本艦隊, 仍名 “平遠”, 於日俄戰爭沈沒於旅順港外。

[5] 孤拔, 1827年6月26日生, 1885年6月11日卒。 法國理工學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畢業。(見 Georges Gustava Toudouze, 《**La vie héroïque de l’amiral Courbet** 》, (Paris，1944)。) 孤拔於 1849 年 10 月 1 日任少尉, 1852 年 12 月 2 日任中尉, 1856 年 11 月 29 日任上尉, 1861 年 12 月 24 日任少校, 1866 年 08 月 14 日任中校, 1873 年 08 月 11 日任上校, 1880 年 09 月 18 日升少將, 1884 年 3 月 1 日在越南晉升中將。 (見 《**Annuai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 》, (Paris，1884-1885)。) 按: 法國理工學院爲歷史悠久的公務員、工程師培育學校, 創立於 1794 年 3 月 11 日、大革命直後。 拿破倫於 1804 年改爲軍校, 所頒校訓(「**Pour la Patrie, les Sciences et la Gloire**」, 即「**For the Fatherland, Sciences, and Glory**」) 與校旗沿用迄今。著名數學家 Siméon Denis Poisson、 Henri Poincaré、 Augustin Cauchy 即該校校友, 另一數學家 Joseph Louis Lagrange 則爲創校人之一。學校規模不大, 卻已先後產生三位法國總統: Sadi Carnot (1887-1894) 、 Albert Lebrun (1932-1940) 、 Valéry Giscard de Estaing (1974-1981)。理工學院與海軍官校 (École Navale) 校友領軍作戰、擔任艦隊司令者均不乏其人。

[6] Abbeville 在法國西北, 距 Dunkerque (鄧寇克) 與法比邊境不遠, 原爲法國風景最優美的城鎮之一, 1940 年 5 月毀於德軍戰火。 孤拔葬於其故鄉聖母堂的墓園內, 與詩人 Millevoye、 考古學者 Jacques Boucher Crèvecoeur de Perthes、 歷史學者 Ernest Prarond 等同鄉爲鄰。 鎮內有一 「孤拔廣場」。

圖 1。法國遠東艦隊孤拔提督 (1827-1885) [7]**。**

二、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船艦概說

鐵甲巡洋戰艦 “凱旋” (Triomphante) 乘員 Maurice Loir 上尉在 《***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附錄 (頁 359-368) 所列舉孤拔屬下軍艦名稱和各艦官員[8] ， 基本上取自 1885 年版法國《海軍與殖民地年鑒 》**(*Annuai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 。 艦隊裡經年有船隻移防，人事也時有更迭；年鑒只能反映編印之前的斷代狀況。有些在 1883-1884 年跟隨孤拔、利士比[9]作戰的船艦，後來又調到北圻、南圻的，或是一向隸屬 「運補大隊」 (Service des transports) 的， 便不

[7] 法國海軍拉法葉級巡防艦 “ 孤拔號” (F-712) 公開發佈圖片。原圖見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Paris，1886) 與 J. De La Faye, 《**Histoire de l'amiral Courbet** 》**,** (Paris ， 1890) 扉頁。 圖中孤拔配帶 1883 年 12 月 20 日獲頒的「榮耀勳團」第二級勳位(Grand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此圖可能依據少將時期的舊照片添加勳位繪成。按: Légion d'Honneur (榮耀勳團) 爲拿破倫所創立, 共分五級勳位, 獲得勳位者在軍官團中另成一團體。勳位不同於勳章。之前孤拔獲頒榮耀勳團勳位日期爲: Chevalier (第五級), 1857 年 10 月 22 日; Officier (第四級), 1868 年 12 月 30 日; Commandeur (第三級), 1869 年 7 月 23 日。

[8] Georges Gustava Toudouze 《***La vie héroïque de l'amiral Courbet*** 》(頁 66-68) 也有相同的資料。

[9] Sébastien Nicolas Joachim Lespès, 1828 年 3 月 13 日生，1844 年投軍，1846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50 年 10 月 26 日升中尉，1854 年 12 月 2 日升上尉，1864 年 1 月 27 日升中校，1873 年 5 月 20 日升上校，1881 年 12 月 7 日升任少將，1888 年 6 月 23 日升任中將。1883 年底就任法國駐清國及日本海域支隊司令。

會在 1885 年初的年鑒裡列在「遠東艦隊」項下[10]。又如當時孤拔和法國政府租用、徵用運輸船隊來運補駐台陸軍，海軍年鑒對此一概忽略。 反而在駐紮基隆的(陸軍) 非洲兵團 E. Garnot 上尉所著的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1894) 可以找一些到蛛絲馬跡。

依 《海軍與殖民地年鑒 》1885 年 1 月底的統計，當時法國有 2 個艦隊：防衛本土的「機動艦隊」(Escadre d'Évolutions)和孤拔的「遠東艦隊」(Escadre de l ' Éxtrême-Orient) ； 外加 7 個支隊、9 個兵站和 「運補大隊」(Service des transports) 。當時法國海軍最高軍階爲中將 (vice amiral)。 孤拔和「機動艦隊」司令 Victor-Auguste Bon Duperré 在現役的十六員中將裡排名分別爲第十五與第六。「機動艦隊」司令職位尊崇，統率第一線的戰艦群。若以船數而論， 「遠東艦隊」規模其實更爲龐大[11]，計有巡洋戰艦 (Cuirassé de croisière) 五艘，巡洋艦 (Croiseur) 十五搜，砲艦(Cannonière) 七艘，武裝運輸艦 (Aviso transport) 一艘，一等運輸艦 (Transport de 1re classe) 二艘，二等杆雷艇 (Torpilleur de 2e classe) 二艘。 通常所有的一等運輸艦都歸 「運補大隊」統一調配，常年往返各殖民地；各支隊、 兵站頂多只配備小型運輸艦。 清法戰爭後期把兩艘一等運輸艦直接編在「遠東艦隊」名下是很不尋常的作法。

如果把換防的軍艦和陸續徵用、租用的船舶都列入考慮，總計孤拔在清法戰爭期間前後曾經動用的船艦包括：巡洋戰艦五艘，一等巡洋艦 (Croiseur de 1re classe) 八艘， 二等巡洋艦 (Croiseur de 2e classe) 六艘，三等巡洋艦 (Croiseur de 3e classe) 五艘，一等偵巡艦 (Aviso de 1re classe) 一艘, 砲艦九艘，二等杆雷艇四艘，一等運輸艦三艘，二等運輸艦(Transport de 2e classe) 一艘，武裝運輸艦二艘，(徵用)快速運輸艦 / 補助巡洋艦 (Croiseur auxiliaire) 一艘, 徵用 / 租用運輸船 (Transport afrété) 五艘。 表 1 先將這些船艦和當時的艦長姓名及到任日期一一列出，再依艦種擇要說明於後。礙於篇幅與時限，本文先討論與台灣戰場有密切關連或對戰局整體影響較大的代表性巡洋艦、砲艦、杆雷艇，遺漏的和次要的且留待他日另文補述。

隨著新艦噸位日益增大，舊艦的等級與重要性往往調降[12]。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一等巡洋艦在八年後 (1892) 就紛紛改列爲二等、三等[13]。 表1依戰爭當時法軍正式區分法則而列。 一等巡洋艦的艦長爲上校(Capitaine de vaisseau) ，二、三等巡洋艦爲中校 (Capitaine de frégate) ，砲艦和魚雷艇、杆雷艇的艦長則爲上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大體與英國海軍體制相同 。官兵調往駐外支隊、兵站服勤，通常以兩年爲期。有不少軍艦在輪調外派時，順便連艦長也一道更換，例如表1戰艦 "八野"、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否則由法國本土派人赴亞履新，航程就需時兩個月，例如巡洋艦 "獨貴土音" 的Guien 。 表1有些軍艦的艦長更換較頻，是因爲立功而提前調動，例如砲艦 Vipère、Aspic 和巡洋艦 Volta、Château Renault。偶爾也有因艦長負傷不得不調換的，例如馬尾戰後的杆雷艇 45 號。

---

[10] 例如「運補大隊」的一等運輸艦 Nive, 馬尾海戰時在馬祖，淡水登陸戰時在基隆，然後又運送傷兵到越南；雖然不曾隸屬遠東艦隊，所擔任的支援任務與清法戰爭密切相關，從《海軍年鑒》卻絲毫看不出來。

[11] 「機動艦隊」則有戰艦 6、巡洋艦 2、魚雷艇 4。

[12] 例如甲午戰後，日軍接收北洋艦隊的"鎮遠" ，列爲戰艦。等十年後日俄戰爭爆發，"鎮遠" 因船速慢而改列海防艦，退居第二線。船艦分類因時而異，各國海軍皆然，不獨法、日。

[13] Stephen S. Roberts 〈**The Classification of British and French Screw Crusing Ships, 1840-1900** 〉 《***Warship International***》(1977), P.144-156。

表 1: 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船艦

艦名	艦種 [14]	馬力 ch[15]	砲	艦長
Bayard	巡洋戰艦	825	6	Parrayon (830415-) (Courbet 中將座艦)
La Galissonnière	巡洋戰艦	500	6	Fleuriais (831220-) (Lespès 少將座艦)
Turenne	巡洋戰艦	850	6	Dupuis (850206-) (Rieunier 少將座艦)[16]
Triomphante	巡洋戰艦	575	7	Baux (830609-)
Atalante	巡洋戰艦	450	6	Galache (830519), Trève (840531)
Duguay-Trouin	一等巡洋艦	875	5	Muret de Pagnac (830719), Guien (850103)
Villars	一等巡洋艦	650	15	Viville (840101-)
d'Estaing	一等巡洋艦	650	15	Coulombeaud (831215-)
Lapérouse	一等巡洋艦	550	15	Méquet (841201-)
Nielly	一等巡洋艦	550	15	Dorlodot (840822-)
Magon	一等巡洋艦	550	15	Puech (841210-)
Primauguet	一等巡洋艦	550	15	Buge (841215-)
Roland	一等巡洋艦	550	15	Mayet (850105-)
Champlain	二等巡洋艦	450	10	Martial (840721-)
Château-Renault	二等巡洋艦	450	7	Boulineau (830415), Le Pontois (841117-)
Éclaireur	二等巡洋艦	450	8	Fournier (831128-)
Rigault-de-Genouilly	二等巡洋艦	450	8	Richard (840721-)
Kerguelen	三等巡洋艦	250	6	Fournier (830115-)
Volta	三等巡洋艦	250	6	Fournier (830115), Gigon (840530)
Duchaffaut	三等巡洋艦	230	6	Le Mercier-Moussaux (840101-)
Lutin	砲艦	100	4	Debar (830509-)
Vipère	砲艦	100	4	Lejard (811215), Picard (831113), Boué de Lapeyère (840909-)
Lynx	砲艦	100	4	Blouet (820718), Bonnaire (840820-)

[14] 以 1883-1885 年法國海軍年鑒爲準。

[15] 計算「馬力」有幾種方法，因定義不同(如下)，所得「馬力」值也懸殊： **Horsepower** ： A unit of power used to measure the rate at which an engine works, equivalent to 746 Watts。 **Indicated Horsepower (IHP)**: A measurement of the power produced by a ship's engine, measured using a gauge on the engine。 **Brake Horsepower** ： A measurement of the power produced by a ship's engine, measured using a brake on the engine shaft。

[16] Adrien-Barthélemy-Louis Rieunier, 1833 年 3 月 6 日生，1851 年投軍，1853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57 年 3 月 7 日升中尉，1861 年 3 月 4 日升上尉，1870 年 7 月 22 日升中校，1871 年 6 月 4 日升上校，1882 年 3 月 31 日升任少將，1889 年 5 月 25 日升任中將。 1885 初抵達遠東，爲孤拔第二副手。 「李懷義」爲封鎖鎮海時其幕中紹興師爺爲他所取正式漢名，向鎮海守將歐陽利見提督投遞拜帖時曾數度使用。1885 年 12 月 1 日繼 Lespès 擔任遠東支隊司令(至 1887 年 2 月 22 日 C.J. Layrle 接任爲止)。 1886 年夏，李鴻章伴隨醇親王視察旅順大塢及渤海各口，李懷義仍在遠東，乘 "杜亨" 艦率六艦赴煙台致意。撰寫 《醇親王巡視北洋海防日記》的天津海關道周馥取其音譯作「理堯年」,也相當貼切。 李懷義日後升任中將、海軍部長。

Aspic	砲艦	100	4	Schlumberger (830901), De Fauque de Jonquières (840329-)
No.45	二等杆雷艇	100		Latour (8308) / Campion (840901-)
No.46	二等杆雷艇	100		Douzans (830721)
Saône	武裝運輸艦	175	4	Monin (830322-)
Annamite	一等運輸艦	650	2	Le Bourguignon-Duperré (831115-)
Tonkin	一等運輸艦	650	2	Nabona (841116-)
Chateau-Yquem	快速運輸艦	650		Lejard (850201-)
La Clocheterie	二等巡洋艦	450	10	De Barbeyrac Saint-Maurice (850219-)
Fabert	二等巡洋艦	450	8	Cochet (850401-)
Kersaint	三等巡洋艦	230	6	De la Bonninère de Beaumont (820404-, Tonkin D.N.)
Hamelin	三等巡洋艦	250	6	Roustan (830811, Tonkin D.N.)
Parseval	一等偵巡艦	175	4	Morel-Beaulieu (830103),Thounens (830715)
Comète	砲艦	100	4	Noirot (841013-)
Sagittaire	砲艦	100	4	Krantz (850101-)
Jaguar	砲艦	65	2	Fouet (840205-)
Hyène	砲艦	65	4	Bernard (8502-, Tonkin D.N.)
Lionne	砲艦	100	3	Hennique (840214-, Tonkin D.N.)
No.44	二等杆雷艇	100		Grenouilloux
No.50	二等魚雷艇	100		Vignot
Nive	一等運輸艦	660	2	Le Borgne de Kerambosquer (831115-) ★
Tarn	二等運輸艦	430	2	Mallarmé (831101-), Delort (850207) ★
Drac	武裝運輸艦	175	4	Ferrat (830310, Tonkin D.N.)
Cholon	租用運輸船			
Canton	租用運輸船			
Cachar	租用運輸船			
Nantes-et-Bordeanx	徵用運輸船			
Tancarville	徵用運輸船			

★運補大隊 (Service des transports)

三、孤拔艦隊的巡洋艦

(一) 概說

表2 ： 穹甲巡洋艦問世之前，法國無護甲巡洋艦的系譜 (1868 -1885)

巡洋艦級名	噸數	完工年份	艦數	參與清法戰爭的艦數與艦名
Decrés	1870	1868	1	0
Desaix	1722	1868	1	0
Limier	1323	1868-1869	5	2 (Hamelin, Volta)
Château Renault	1820	1869	1	1 (Château Renault)
Linois	1191	1868	1	0
Infernet	2042	1871-1876	4	2 (Champlain, La Clocheterie)
Sané	2017	1872-1876	3	1 (Fabert)
Bourayne	1330	1870-1874	10	3 (Douchaffaut, Kerguelen, Kersaint)
Hirondelle	1181	1873	1	0
Rigault de Genouilly	1722	1878-1879	2	2 (Rigault de Genouilly, Éclaireur)
Tourville	5698	1877	1	0
Duquesne	5905	1878	1	0
Duguay Trouin	3479	1879	1	1 (Duguay Trouin)
Lapérouse	2363	1880-1884	4	4 (d'Estaing, Nielly, Primauguet, Lapérouse)
Villars	2382	1880-1885	4	3 (Villars, Magon, Roland)
Naïade	3637	1882	1	0
Iphigénie	3346	1883	1	0
Aréthuse	3487	1885	1	0
Dubourdieu	3700	1886	1	0
Milan	1705	1885	1	0

探討近代軍艦系譜大致可以 1860 年法國第一艘鐵甲戰艦 Gloire 問世作分界[17]。 在此之前的數百年，木造軍艦以風帆爲動力，艦型演化緩慢。十七、八世紀的水手若死而復生，一樣可以很快適應十九世紀上半的船艦。大約自 1860 年起，船艦進化日新月異，幾乎每隔二十年就見證一次某些艦種的全面汰換 。若將鐵甲巡洋戰艦（如孤拔座艦 "八野"）視作戰艦的袖珍化，不列爲巡洋艦；則 1860-1880 的主流巡洋艦均無護甲，即所謂 Unprotected Cruiser。 1881 年第一艘穹甲巡洋艦[18] Esmeralda 在英國動工， 次年法國也興建小型高速偵察艦 Milan 和穹甲巡洋 Sfax，爲近代巡洋艦的搖籃期劃下休止符。 從 1861 到 1880 的二十年搖籃期間，法國建造的無護甲的巡洋艦多達 62 隻[19]， 其中只有三隻不用木殼：Duquesne, Tourville，和 "獨貴土音" (Duguay-Trouin)。 這

[17] 用英國的全鐵製戰艦 Warrior 和美國南北戰爭的 Monitor 作分界固然也合適，不過仍以 Gloire 最早竣工、帶動一 時風氣。

[18] Deck-protected Cruisers, 日後簡稱 Protected Cruiser, 清代稱作 "穹甲快船" ，現在多稱作加護巡洋艦。 參與甲午年 (1894) 黃海大東溝海戰的清國 "濟遠" 、 "致遠" 、 "靖遠" 以及日本的 "浪速" 、 "高千穗" 就是。英國爲智利建造的 Esmeralda 後來輾轉也由日本購得，改名 "和泉" 。

[19] 含自船體中央切開，加裝汽機、槳輪的 11 隻帆艦。

一百四十多年來，法國沒有外購任何巡洋艦，全係自製。如果把原以風帆爲動力、後來才切開船身、加裝汽機的 11 隻舊式木船除外，1868 年到 1885 年間法國一共建造了 45 艘的無護甲巡洋艦，分屬 20 級 (見表 2)。參與清法戰爭的計有 8 級、19 艘[20]。 在基隆購煤滋事的 Volta 是其中最老舊的；而砲擊基隆的 Villars 則是當時法艦最新的款式。 表 2 所列最早的 9 級巡洋艦都沒有衝角，從 Rigault de Genouilly 開始才有，是 1866 年 7 月 20 日意、奧的黎撒海戰給各國海軍的影響 [21]。

表3 ： 孤拔艦隊的代表性巡洋艦的規格

艦名	Duguay-Trouin	d'Estaing	Villars	Châteaurenault	Volta
建造地	Cherbourg	Brest	Cherburg	Normand	Cherbourg
安放龍骨	1873	1877	1875	1865	1864
下水	1877-03-31	1879	1879	1868	1867
成軍	1879	1881	1881	1869	1869
除役 / 拆解	1900 薑船	1901 除籍	1896 除籍	1895 薑船	1892 除籍
艦材	鐵骨鐵殼	鐵骨木殼	鐵骨木殼	木骨木殼	木骨木殼
長(水線)	89.76 米	81.92 米	75.97 米	78.18 米	63.40 米
寬	13.18 米	11.38 米	11.58 米	10.74 米	10.36 米
吃水	6.25 米	5.66-5.87 米	5.23-5.49 米	5.74 米	4.47-4.85 米
基準排水量	3,479 噸	2,363 噸	2,382 噸	1,820 噸	1,323 噸
鍋爐	8 oval boilers	6 cyl boilers	6 cyl boilers	4 oval boilers	2 oval boilers
船機	1 軸 HC	1 軸 HC	1 軸 HC	1 軸 HC	1 軸 HC
馬力	4,800 ihp	2,750 ihp	2,750 ihp	1,700 ihp	1,000-1,100ihp
最高速率	15.5 節	15 節	14.5 節	14.3 節	12-12.5 節
儲煤量	490 噸	300 噸	400 噸	?	200-235 噸
乘員	322	264	264	202	154
水線護甲	無	無	無	無	無
砲座護甲	無	無	無	無	無
主砲	7.6 吋 x 5 ，1870 年式	5.5 吋 x15 ，1870 年式	5.5 吋 x15 ，1870 年式	6.4 吋 x1 ，1864 年式	6.4 吋 x1 ，1864 年式
副砲	5.5 吋 x 5; 1 磅砲 x 10	1 磅砲 x 8/10	1 磅砲 x 6/8	5.5 吋 x 6 ，1864 年式	5.5 吋 x 4, 1864 年式
魚雷管	14 吋 x 2	無	無	無	無
衝角	有	有	有	無	無

(二) 鐵殼巡洋艦 "獨貴土音"

[20] 情報艦 Parseval 比三等巡洋艦小，比砲艦大，以下討論不將它列入巡洋艦。
[21] 有關黎撒海戰對海軍造艦與戰術的影響，參看紀榮松 〈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 〉註 38。

在參與清法戰爭的大小50艘法國軍艦裏，巡洋艦“獨貴土音” (Duguay-Trouin)[22] 的設計與角色極爲突出:

1. 艦載汽艇不計，“獨貴土音”爲孤拔屬下唯一的鐵殼軍艦。
2. 就外型而論，“獨貴土音”有碩大的艦首衝角，有雙煙筒，有四座舷台。 這些獨家的外貌特徵使它在參戰船艦裏有若鶴立雞群，很容易辨認。
3. 在先後參戰的19艘法國巡洋艦裏戰力最強：其火力與艦身的防護僅次於法軍部署在亞洲的五艘鐵甲戰艦，而速力尤有過之。 因此“獨貴土音”極受孤拔重用:

[1] 馬尾戰後、率隊出閩江時(1884年8月25-29日)，孤拔以“獨貴土音”爲座艦打前鋒;

[2] 1884年11月底12月初，得知清軍南洋艦隊可能自滬南駛參戰時，孤拔急調手下最威猛的巡洋艦赴西貢爲駛向臺灣的運輸艦護航，“獨貴土音”自然中選;

[3] 1885年2月，孤拔赴江蘇、浙江海域攔截南洋艦隊時，“獨貴土音”原也在列[23] ;

[4] “獨貴土音”不只參與1884年8月23日的馬尾海戰和10月8日的淡水登陸戰， 在隨後的淡水封鎖戰也極活躍。

法國喜歡用人物爲巡洋艦命名，百多年來在前後共130隻的近代巡洋艦裡就佔了113隻：其中有62隻以51位艦長或提督重複命名，51隻以海軍軍人、技術專家或政治家命名。 以地名、動物或抽象名詞命名的只有17隻[24]。 Rene Du Guay-Trouin（ “獨貴土音”，1673-1736）中將是法國十八世紀的海戰英雄，1711年9月12日在 Rio-de-Janeiro 峽立功。迄今法國前後已有五隻軍艦以“獨貴土音”命名。 參與清法戰爭的是第三代 [25] ， 由造船師 M. Boden依據 M. Eynaud的設計圖在瑟堡船渠 (Cherbourg Dockyard) 建造，1877年3月31日下水，兩年後成軍，總造價(含搭載兵器) 折算當時美金爲 791,300元。“獨貴土音”艦首有極碩大的衝角，長達 22 呎 (參看圖2)。以三檣風帆提供補助動力，帆葉總面積爲15510 方呎。

“獨貴土音”的五尊 7. 6吋(19公分) 主砲是1870年式,後膛單管， 和鐵甲巡洋戰艦“八野”、“凱旋”安裝的副砲同一型式: 砲身長 415公分，重7960公斤，彈頭重75公斤，裝藥15公斤，初速每秒448米，在1000碼外可穿甲7.5吋。 其中一門安在艦首，射擊扇面張角30度。其餘四門分別裝在舷側四座突出的舷臺 (sponson) 上[26] ， 射角各有128度。 四門單管14公分副砲位於前後舷臺之間，左右舷各兩門, 射角66度。第五門14公分副砲在艦尾。艦首接敵時，三門7.6吋主砲(含前舷臺的兩門)齊發，可拋擲彈頭 496.5 磅。 後舷臺兩門7.6吋主砲和艦尾5.5吋副砲可向艦尾方向拋擲

---

[22] Duguay-Trouin， 李青崖譯作“榮歇度魯安”，姜鳴譯作“杜居土路因”。

[23] “獨貴土音”後因儲煤不足, 提前返台。1885年2月13日孤拔支隊在壇頭山以南、三門灣外海域遭遇清艦。法艦張帆全速疾駛, 仍未能追及“南琛”、“南瑞”、“開濟”。孤拔手下頗以快速巡洋艦 Tourville 未能留在亞洲爲憾。見 Maurice Loir , 《**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Paris ， 1886)， 頁252-253。“獨貴土音”若在場，戰況亦可能迥異。

[24] 中名生正己 < 佛國巡洋艦艦名考> 《佛國巡洋艦史》〈世界の艦船, 增刊50集，木津徹[編],〉(東京海人社, 1998), 頁158-161。

[25] 1900 年 在鐵殼巡洋艦“獨貴土音”除役以後，法軍把大型運輸艦“北圻 / 東京” (Tonkin) 改名“獨貴土音”，服役至 1927 年。運輸艦“東京” 也曾到澎湖、基隆參加清法戰爭，改名是戰後的事。孤拔屬下運輸艦容他文再述。

[26] Sponson， 許景澄譯作「耳臺」,也很貼切。 許景澄在 1884 年出使德法之前雖無海軍背景，駐歐期間，公餘殷勤考證，力撰 《外國師船圖表》(光緒丙申[二十二]年浙江官書局本）十二卷。 是清季唯一有系統地介紹西方與日本軍艦的專書，水準很高。

彈頭400.5磅[27]。 從事舷戰時，片舷火力含兩門7.6吋主砲(即前、後舷臺各一門) 及兩門14公分副砲, 齊射可拋擲彈頭 470磅。 1870年式的14公分副砲砲身長 313.5公分，重2600公斤，彈頭重28公斤，裝藥6.15公斤，初速每秒460米。

在拿破倫三世的積極推動下, 法國原是最早研發、採用熟鐵製作舷側護甲的。儘管如此, 法國在1858-70年間建造的34艘適於遠航的裝甲船艦, 有31艘仍然採用木質船身。而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大小船艦, 只有巡洋艦“獨貴土音” 和少數艦載小汽艇爲鐵殼。 其他駐亞軍艦(含“八野”等5艘鐵甲艦) 都是木質船身, 間或採用鐵骨。無論鐵殼或木殼，累積的海洋寄生物都會使阻力大增，影響速率。十八世紀末各先進國海軍開始在木質船身外加裹一層銅皮，既能防蛀又可減少蛤蜊等海洋寄生物。 同樣的木質船艦，才在船塢裡刮淨船殼剛過幾個月，裹貼銅皮與否就會有1節至1節半的速率差距。1780 年英艦在直布羅陀外就憑著船殼裹銅帶來的速率優勢,逮捕了六艘西班牙船隻[28]。這方法卻不能直接用在鐵殼船艦，因爲銅鐵在海水裡接觸會滋生電流，蝕損鐵殼更甚。 因此, “獨貴土音”水線下的鐵殼外先栓嵌7.9吋厚的木料襯墊，再加裹一層銅皮。早在 1845年，英國 Portsmouth 海軍學院化學科教官 W. J. Hay 已經發現含氧化銅的油漆反制海洋生物累積比採用含鉛油漆或鑲裹銅皮更有效。Hay 因而在晚年獲頒 “海軍總化學師” (Admiralty Chemist) 的名銜。建造“獨貴土音”時，法國人顯然還不知道英國人的秘方。 有趣的是，與“獨貴土音”同時建造的英國鐵殼軍艦 (例如：大小性能都相近的巡洋艦 H.M.S. Rover) 竟然也採用木料襯墊加裹銅皮。當時包括清國在內，不少國家的造艦都師承法國，連英國技師也往往惟恐法國的一舉一動必有深意，不可掉以輕心。 英國海軍衙門因而模仿法國、延後廢除風帆[29]。 巡洋艦 Rover 的船殼處理方式也是如此。這不像是英國蓄意保密欺敵，倒更有可能是心態保守、偶爾缺乏自信的緣故。

(三) “獨貴土音”與馬尾戰事

自1884年7月16日起, 法艦隨孤拔陸續駛入閩江。福州爲通商口岸, 當時清法並未宣戰, 船艦進出不受攔阻。8月23日戰爭爆發時， 法艦下泊於馬尾羅星塔西側泊地有: 三等巡洋艦(兼孤拔指揮艦) Volta (1323 噸)、 砲艦 Aspic、Lynx、Vipère (465 噸) 及水雷艇45、46 號 (31 噸)，排水量合計不到2800噸。 吃水較深的一等巡洋艦“獨貴土音” (3479 噸)、d’Estaing (2363 噸)、與 Villars (2382 噸) 在下游羅星塔南側下泊[30]。 除“獨貴土音”爲鐵殼外, 他船均爲木質。 二等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1820 噸)與武裝運輸艦 Saône (1571 噸) 在馬尾下游、金牌峽上游的館頭。其他軍艦停泊閩江口外馬祖澳。 清軍停泊於馬尾計: 巡洋艦“揚武” (1560至1608噸) 、 運輸船“琛航”、“永保” (1358噸)、三等巡洋艦“伏波”、 “飛雲”、“濟安” (1258噸) 、砲艦“振威”

---

[27] 美海軍總工程師(後爲海軍工程署長) J. W. King 於 1877-78 赴歐攷察各國造艦狀況。其報告謂「獨貴土音」後舷臺兩門 7.6 吋主砲和艦尾 5.5 吋副砲合計可向艦尾方向拋擲彈頭 377.3 磅，有誤。

[28] 參看 D. K. Brown, 《*Before the ironclads – Development of ship design, propulsion, and armament in the Royal Navy, 1815-60* 》 (Annapolis, 1990), P.202。

[29] 參看紀榮松〈孤拔清法戰爭提督的 “八野” 座艦 〉《台灣風物》卷 52-4 ， 頁 15 -16 的討論。

[30] 馬尾港區近年經中國疏濬開挖，已可容泊一萬五千噸級貨船。清法交戰時三千噸以上的船隻潮退時只能到羅星塔以南，不能到馬尾。孤拔乘老舊的木質巡洋艦 Volta 在羅星塔以西(接近馬尾) 督戰，相當冒險。清軍若懂得妥善運用手中的七艘杆雷艇和蚊子砲船“福勝” 、“建勝”，或是把“振威” 、“飛雲” 、“濟安”三船也調到上游，戰況極可能全面改觀。

(572噸) 、“福星” (515噸) 、砲艇“藝新” (245噸) 、水砲臺“福勝”、“建勝” (256噸) 共11船。

圖2。 “獨貴土音”攝於馬尾羅星塔南側泊地與清艦對峙時 (1884 年8月上、中旬)。
[U.S.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NH75912]

圖 2 爲“獨貴土音”攝於馬尾羅星塔南側泊地與清艦對峙時的珍貴照片，美國海軍歷史中心 [U.S.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編號 NH75912。 後方清艦爲粵督張之洞增援福建的三等巡洋艦“飛雲”，其後檣懸掛清國的三角黃龍旗[31]。 時當盛夏，清法軍艦除了以帆布天蓬遮蔽陽光，也

[31] “飛雲” 、“濟安”爲清國福建船政局所造第八第、十一艘兵艦，兩艦同一款式：木質、1258 噸、攜砲 5-7 門、乘員 166-180，分別於 1872 年、1873 年下水。 1884 年 7 、8 月，清國親差會辦福建海防事宜張佩綸、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屢次電請南北洋撥船，江督曾國荃、直督李鴻章都推拖不肯，張佩綸、曾國荃爲此失和互詬。只有粵督張之洞撥“飛雲”、“濟安”兩艦到馬尾助陣。 十九世紀後半船艦演化快速，不但各國對船艦的分類方式有分歧，即使單一國家的船艦定義也會隨時代而變。早期福建船政局把馬尾建造的船艦一概攏統稱作「兵輪」,並沒有按噸位或功能細分艦型。依英軍習慣，則稱“飛雲”等艦作 Sloop 。 後世華文資料多半只列“揚武”爲巡洋艦，就是這個緣故。 法軍自 1874 年起把 1860 年代稱作一等 Aviso 的 1200-1300 噸級軍艦都改列爲三等巡洋艦。因此，記述清法戰爭的當代法文書籍 (例如：Loir，《**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頁 117) 指稱清軍在馬尾有四艘巡洋艦 (指“揚武” 、“飛雲” 、“濟安”和“伏波”) 。本文姑且將清艦按法軍定義區分，以便比較。“飛雲”管駕爲(參將)高騰雲，“濟安”管駕爲(守備)林國祥。高騰雲爲廣東順德人，行伍出身，歷任廣東廣德營都司、廉州營游擊、廣海營參將。甲申年奉派督帶“飛雲”到馬尾，時年四十四， 爲清法戰爭陣亡的清國最高階海軍軍官。林國祥爲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畢業，1874 年管駕運輸船“琛航”，1884 年駕“濟安”到馬尾參戰，船漂沉於下游青州港，未死。 甲午(1894) 年春 ，管帶廣東水師的“廣乙”魚雷砲艦，與通報艦“廣甲” (吳敬榮管帶) 、魚雷砲艦“廣丙” (程璧光管帶) 到北洋參與會操。7 月 25 日與巡洋艦“濟遠” (方伯謙管帶) 在朝鮮豐島遭遇日本最新銳的大型巡洋艦“浪速”、“吉野”、“秋津洲”，砲戰失利，“廣乙”駛至朝鮮

都用帆布風斗改善艙內通風。 由背景山稜弧線可知攝影者(“莫儒架勢”乘員 Moses Lindley Wood 中尉) [32] 係自羅星塔、馬尾船廠之間向東南方向瞻望取景。下錨的“獨貴土音”艦首朝西南，面向上游閩江、烏龍江交會處，且錨鏈緊繃，可知正值退潮時分。孤拔的副手、利士比少將在閩江原以“獨貴土音”爲代用座艦。 八月初利士比奉孤拔令出閩江返登其座艦“加里松涅” (La Galissonniere) 、並拖帶砲艦 Lutin 到基隆動武。 圖中“獨貴土音”未懸少將旗，可知攝於利士比離閩之後。一等巡洋艦 Villars 與 d’Estaing 分別在 8 月 15 、16 日抵達羅星塔 [33]， 而 Wood 中尉的馬尾、福州相簿並無 Villars 與 d’Estaing 在場的照片，由此可推斷“獨貴土音”這幀照片極可能在 8 月 3 日到 14 日之間拍攝。

馬尾清艦除蚊子砲艦“福勝”、“建勝”以外全爲木質。福建清軍雖無 Gatling 機關砲或 Hotchkiss 快砲, 但杆雷汽艇較法軍爲多。 張佩綸在北京是相當出色的御史與政略家[34]， 實地佈陣作戰卻是絕對外行，偏又驕倨過人、剛愎自用、不尊重專業意見。 張佩綸和張成拿“振威”、“飛雲”、“濟安”三船和法軍在馬尾下游羅星塔南側的三隻大巡洋艦並列殊爲不智，實不若集中兵力與孤拔在羅星塔以西交手較爲得計[35]。 據“企業號”觀戰報告，清艦以“振威”反應最快，砲戰甫始即能立刻還擊。 可見並非所有在場的清軍官佐都像張佩綸、張成、何璟那樣麻木遲鈍、缺乏

十八島擱淺，縱火焚艦後，率部輾轉逃回。9 月 17 日黃海海戰之後，丁汝昌、劉步蟾奏請懲處方伯謙。 24 日方氏未審即問斬以後 ，林國祥奉派接管“濟遠”。1895 年 2 月，日軍攻陷威海衛，遣送程壁光、林國祥等殘餘清軍回煙台。林國祥遭清廷裁汰後未曾復出，不知所終。

[32] “莫儒架勢” (U.S.S. Monocacy) 乘員 Moses Lindley Wood 中尉，密蘇里州出身，1875 年自海軍官校(在馬里蘭州的首府 Annapolis)畢業，1883 年 8 月 10 日調到 “莫儒架勢”。當時美國海軍規模不大，全軍現役中尉只有 88 員額 (上尉倒有 260 編缺)，Wood 資歷較淺，排名 72 (參看 《U.S. Navy Registry》, 1884) 。 Wood 日後擔任 U.S.S. Eagle 和巡洋艦 U.S.S. Maryland 艦長，晉昇爲代將, 卒於 1931 年 4 月。Wood 中尉在福州和馬尾拍攝許多和清法戰爭有關的珍貴照片。 世間流傳的清軍“揚武”巡洋艦照片極少，歷來最清晰的兩張都是 Wood 所拍。“莫儒架勢”於 8 月 1 日抵達福州。8 月 23 日砲戰爆發時，Wood 中尉率 16 名陸戰隊在福州護僑，不在馬尾現場。

“莫儒架勢”爲馬里蘭州西北部小河，名稱源自當地 Shawnee 族印第安語 “Monnockkesey”, 乃「溪流曲折有緻」之意。1864 年 7 月北軍 Lew Wallace 少將與南軍 Jubal A. Early 中將沿河交戰。北軍雖敗，卻爲 Grant 將軍爭取到寶貴時間，得以及時部署環繞華盛頓的防線。“莫儒架勢”戰役因而被稱作“The Battle that Saved Washington ”，當年年底海軍便在馬里蘭州 Baltimore 港建艦以作紀念。“莫儒架勢” 爲明輪(蹼輪) 在舷側的砲艦, 1370 噸, 載砲 6 尊, 乘員 159 人。1864 年 12 月起工， 1865 年下水。 1866 年成軍以後，一直在亞洲服役至 1903 年除役、拍賣 ，與清國、日本、朝鮮均有極深淵緣(容他文再述)。

[33] Loir , 《**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頁 115。

[34] 張佩綸，字幼樵，直隸豐潤人。同治壬午年(1870) 22 歲中舉，次年中進士點翰林。歷任署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辦福建海防親差大臣。1875-1884 年間共上奏折 127 件，其中彈劾和諫議約佔三分之一。崇厚與俄議約，張佩綸認爲喪權辱國，應予殺頭。張佩綸也曾迫使王文韶去職，聳動京畿。 1882 年上“保小捍邊當謀自強折” ，暢談建設四洋海軍。朝鮮壬午之變後，張氏上“請密定東征之策折” ，建議清廷征討日本 (見張佩綸《澗于集》奏議卷二, 葉 2-7) 。 1883 年 12 月 3 日張氏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倡議設立海防股。在當時的清流名士裡頭，以張氏對海防最感興趣，也好發議論；私底下與清流派的對頭、洋務派掌權者李鴻章也有往還，兩人惺惺相惜、關係微妙。 張氏彈劾公卿將相多人，唯獨從不公開批評李氏。馬尾戰後張氏被革職戍邊，1888 年返京後旋投入李鴻章幕下，並娶李家獨女爲繼室。名作家張愛玲即張佩綸、李鞠耦的嫡孫女，李鴻章的外曾孫女。

[35] 十九世紀末美國海軍官校校長馬漢將軍的“海軍戰略” 教材就以 “集中” 爲海軍戰略、戰術要則之一。所謂“集中” ，不單指己方兵力、火力的集中，也包括目標的集中和意志的集中。馬漢授課時最常問學員的問題就是，倘若敵我遭遇時雙方各有兩隻同級軍艦，究竟應該一一對敵或者設法以二擊一，再對付第二隻敵艦? 較穩當的答案是後者。其實在馬漢的理論廣爲人知以前，稍有實戰經驗或數理常識的各國海軍官佐已經不約而同地採行這原則。 比如: 法軍在羅星塔南側的三艘大巡洋艦很有默契地協力擊沉“振威”以後，再分別對付“飛雲” 、“濟安”。 張佩綸原本希望南北洋能派船增援，在馬尾部署優勢兵力來嚇退法軍，無奈曾國荃、李鴻章不肯配合。既然情勢如此，張氏就不該留置“飛雲” 、“濟安” 、“振威”於死地，憑白錯失機會運用這三船來攻擊孤拔在上游的弱勢兵力。古書以上馴對中、下馴的巧妙事例，確與現代兵法若合符節。可嘆張佩綸在北京好談兵事、氣焰極盛，其實連流傳千年的華夏兵學規鑒也有欠體會。

敵情意識。包括“獨貴土音”在內的法軍三隻巡洋艦也體會“振威”艦長(管駕)能戰敢戰，若讓「振威」走脫到上游更不好對付，甚至會威脅孤拔的支隊而影響戰局。 於是三隻大巡洋艦第二輪所有的砲火不約而同都改以“振威”爲靶。 依閩海關職員鄭丙言與普天忠奮集(孔廣德著) 的記載，“振威”沉沒時，鄰近的“飛雲”、“濟安”都還來不及起錨或磔斷錨鏈[36]。 在“企業號”觀戰的 Roche 和 Cowen 直指“振威”管駕(許壽山)爲全清國最具敵情意識、最勇敢、最稱職的海軍指揮官[37]。 如果清軍各級官員都像許氏，法軍在馬尾和閩江的傷亡必然更大，也確實有可能影響法軍此後的臺海戰略部署。 由此也反證“獨貴土音”等艦很有默契地協力將“振威”率先擊沉，對法軍而言仍可說是重大戰功；不能單以“振威”船小、法船大來論列英雄[38]。 歸根結底，馬尾戰況有一大部分該怪張佩綸、何璟等清國駐閩前敵重臣不諳外交、不解戎機、漫無佈置、糟蹋人才，也因此成就了“獨貴土音”艦長 François Muret de Pagnac 的功名。 法軍秋後算帳、論功行賞，在基隆就給 Muret de Pagnac 上校晉昇少將。英商寶順洋行的東主 John Dodd 在淡水經營茶葉出口多年。他的《清法戰爭北台灣封鎖日記 》忠實地紀錄法軍在淡水河口的逐日行蹤。在 1884 年 11 月 4 日這天有如下的記載：『上午十一時，清國海關的燈塔巡護艦“飛虎”來到，在清國龍旗上方懸掛法國旗。“飛虎”在“加里松涅”舷側稍作停留便駛向基隆，“獨貴土音”也尾隨“飛虎”而去。』[39] Dodd 住在淡水河鼻仔頭[40]， 常在河口英國領事館出入，與馬偕牧師也時有往還。他對淡水口外法艦如何調動的觀察與紀錄是詳實可靠的。和岸上其他人一樣，所不知道的是法艦爲何移動。1884 年 11 月 4 日是“獨貴土音”艦上官兵的吉日：艦長 Muret de Pagnac 這天由孤拔提督轉頒法國海軍部的命令，在基隆晉昇少將、調回法國。他是孤拔艦隊上校級軍官當中第一個晉升將官的。當時法國海軍現役少將只有 30 個編缺，Muret de Pagnac 憑馬尾與閩江的戰功獲得拔擢，時已年五十八[41]。 在 Muret de Pagnac 之後， “凱旋”艦長 Baux, “八野”艦長 Parrayon , Villars 艦長 Vivielle 也相繼於 1885 年 4 月 11 日, 1888 年 11 月 16 日, 1889 年 7 月 4 日晉升少將。 此外，在戰

---

[36] 池仲祐 “ 海軍實記 - 述戰篇上 - 甲申戰事記” 也有相同的記錄。

[37] 見 James Roche 與 L. L. Cowen, 《**The French at Foochow** 》**,** 頁 16-17。 Roche 與 Cowen 爲美艦“企業號”乘員。以“企業號”爲名的美國軍艦前後已有八艘，1884 年到馬尾的“企業號”是第五代，1375 噸，1874 年下水，1877 年成軍，1909 年除役。1883 年至 1886 年曾環繞全球，經年在各地測量水文航道。清法交戰時剛好在遠東執勤。“企業號”於 1884 年 8 月 12 日載 John Lee Davis 提督自上海抵達馬尾。Davis 甫抵馬尾即移駐蹼輪砲艦“莫懦架勢”，至 9 月 1 日再換乘其原來座艦 U.S.S. Trenton (3900 噸)離去。“企業號”在馬尾停留到 9 月 7 日。

“振威”管駕許壽山，字玉珊，福建閩縣人。同治戊辰(1868) 年入沈葆楨所設福建船政局後學堂第一期，四年後畢業，先充陸營教習，旋任砲艇“藝新”管駕 (千總)， 敘功升守備。光緒庚辰 (1880) 年曾國荃任兩江總督，調許氏到江寧管帶蚊船(水砲臺) “虎威”，數年後回閩，甲申(1884) 年接砲艦“振威”管駕，於馬尾力戰陣亡，時年三十二。 Roche 與 Cowen 對“振威”奮戰事績描述極詳，且贊不絕口。 “振威”不單能立即還擊法艦，在受彈無數、多處受傷起火時，猶欲與相近的 d’Estaing 同歸於盡，爲 Villars 砲所碎。 沉沒之際“振威”復響一砲，觀者異之。 原來 “振威”官兵自知不免，猶裝填最後一彈，欲俟近敵時搏殺之，及見勢不可爲，乃鳴砲一聲以絕。 Roche 與 Cowen 不識任何清軍官佐，所有褒貶對事(船)不對人，較張佩綸所奏更加可信。 法軍記錄較簡略 ，仍與美軍敘述吻合 (參看 Loir , 《**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頁 133)。 許氏早年管帶“藝新”時，艇上有一投軍少年楊用霖，隨許氏學習英文及航海術。 楊氏機敏好學，日後晉昇至“鎮遠”鐵甲艦幫帶大副，爲北洋艦隊行伍出身的最高階軍官。乙未(1895) 年威海燈師，清軍丁汝昌提督、劉步蟾總兵等相繼服毒自盡，獨有楊氏以手槍自裁，端坐不仆，不失軍人本色。死事之壯烈，與其師許壽山先後輝映。

[38] “振威” 排水量爲 572 至 600 噸，“獨貴土音” 、d’Estaing、與 Villars 三艦合計排水量爲 7700 噸。

[39] John Dodd ,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during the Frano-Chinese war, 1884-1885** 》(Hong Kong , 1888), 頁 73。此書已有陳政三譯本 (台北：原民文化，2002) ，譯者增添細心考證、持平議論，非一般憑書直譯者所及。

[40] 鼻仔頭在今日紅樹林與淡水捷運車站之間，二次大戰前建有水上機場，曾駐有日本海軍水上飛機與飛艇。

[41] Muret de Pagnac 艦長 1826 年 8 月 10 日生，1842 年投軍。1866 年 8 月 14 日升中校，1875 年 4 月 27 日升上校。

前曾到基隆購煤滋事並和李鴻章簽訂天津簡約的 Volta 艦長福祿諾中校[42]也在 1891 年 5 月 21 日晉升少將。

圖 3。馬尾海戰圖。

圖 3 爲英國「Graphic」畫報於 1884 年刊載的馬尾海戰圖。觀戰者立足於閩江南岸海關大樓背後的山巔，面向羅星塔(圖中央偏右的深色島嶼) 與馬尾 (圖中央偏左) 。正下方爲清艦“濟安” (左) 與“飛雲” (右) 。更小的砲艦“振威”此時已毀，沉在圖片更右方(下游) 不見。正右方爲法軍的鐵甲巡洋戰艦“凱旋” 。(“凱旋”在閩江口卸下部分軍實、減輕酬載, 得以及時駛到羅星塔參戰。) “獨貴土音”在左下方。 位於“凱旋”與“獨貴土音”之間、接近羅星塔的兩艦爲巡洋艦 d'Estaing (上) 、與 Villars (下)。 由“獨貴土音”右舷向北依序爲砲艦 Aspic、三等巡洋艦(兼孤拔指揮艦)Volta、及砲艦 Lynx、Vipère。此時水雷艇 45、46 號執行杆雷刺擊完畢，已離開現場，駛向中立國船艦泊地待避(在羅星塔更右方, 圖中不見) [43]。 左上方遠處清艦或沉或焚, 辨識不易。

---

[42] 福祿諾(François Ernest Fournier), 1842 年 5 月 23 日生，1859 年從軍、186 1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65 年 9 月 1 日升中尉、1869 年 5 月 22 升上尉、1879 年 10 月 1 日升中校、1884 年 5 月 24 日升上校、1891 年 5 月 21 日升少將， 1897 年 9 月 16 日升中將。福祿諾挑撥清法，引發北黎事件經過，見註 52。

[43] 在羅星塔下泊中立國船艦計: 美國軍艦“企業號” 、英國軍艦 Champion、Saphire、Vigilant (懸 Dowell 提督旗) 、帆船 Sin Kolga、Batavia、Guiding Star、汽船 Mary Austin、 “大沽” Taku、 “吳淞” Woosung、Glenfinlas。此 外，美國蹼輪砲艦“莫懦架勢” 與英國砲艦 Merlin 停泊福州護僑。見 Roche 與 Cowen , 《 The French at Foochow 》, 頁 9; Loir , 《**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頁 120。 其後砲艦 Merlin 曾於同年 9 月 11 日抵達淡水，向砲艦 Cockchafer 轉達

船廠受法艦砲擊，濃煙茂密 (正上方略偏左) 。清軍艦砲、岸砲仍作斷續還擊，圖中法艦附近可見水柱若干。砲戰自午後一時五十六分十三秒開始, 這圖描繪二時一刻左右的戰況，各船艦位置、外貌細節與比例都大致不離譜，相當難得[44]。

(四) 三等巡洋艦 Volta

巡洋艦 Volta 是 Limier 級，在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軍艦裡最爲老舊。 同型艦 Hamelin 隨孤拔到越南和福建，是清法關係緊張時第一艘試圖進入閩江的法國軍艦。 7 月 13 日在江口觸礁，19 日由英艦拖到香港修復，從此留在越南。 Limier 級巡洋艦共造了 5 艘(表 2)，原本裝置 1864 年式或 1866 年式 16 公分砲 1 門，1864 年式或 1867 年式 14 公分砲 4 門。 完工不久一律換裝 1870 年式。 Volta 沒有安裝 16 公分砲，5 門 14 公分砲都在甲板上。 孤拔於 1884 年 7 月 14 日乘“八野”離滬赴閩。16 日在馬祖澳換乘三等巡洋艦 Volta 進入閩江, 下泊於馬尾，福州居民大爲震駭。劉銘傳乘“海晏”也在同一天抵達基隆。8 月 23 日，馬尾海戰爆發，Volta 爲孤拔旗艦，有不少西畫描繪孤拔立於 Volta 艦橋指揮的情景。 圖 4 Volta 尾纜牽繫汽艇 White 號，後方爲砲艦 Vipère，更右方爲一艘杆雷艇 (45 號或 46 號) 。Volta 與 Vipère 的間隙遠方爲清艦“濟安”，與圖 2 “獨貴土音” 背後的 “飛雲” 同型同貌。 最右方岸邊半棟白色洋樓即清國馬尾海關。 這照片是從羅星塔以西、 接近清軍“揚武”的錨地朝東南方向取景，與圖 2 拍攝於同一日，時在馬尾砲戰之前。迄今“飛雲”、“濟安”的近距離照片還不曾出土，因此這兩圖彌足珍貴[45]。

歷來華文論著往往以法軍「船堅砲利」來簡化解釋馬尾戰役的懸殊戰果，例如：中國海軍部在民國十五年審定、池仲祐所編 《海軍實記 - 述戰篇上 - 甲申戰事記 》 就說

“法艦禦砲則有鐵甲，衝鋒則有雷艇，桅盤悉置機關砲，兩船通語時有旗號，我船均無之。砲多前膛舊式，又無護身鐵板，船皆木質，彈過立穿，輪艙多設立機，機在水線上，易遭擊毀。”

這話其實只對了一半：馬尾法艦「砲利」有之， 「船堅」則未必。 在場鐵甲艦只有“凱旋”一艘，而且不能駛近船政局，對 8 月 23 日當天的戰局影響有限[46]。 孤拔當時的座艦 Volta 排水 1323 噸、長 208 呎、攜砲 5 尊(見表 3) ，與清軍的“飛雲”、“濟安”、“伏波”相當，比清軍旗艦“揚武”噸位還小。 Volta 於 1864 年起工、1867 年下水、1869 年完工、木骨木殼 (既無舷側豎甲也無艦內穹甲)，艦身比清軍在場所有十一艘船艦的任何一隻還要朽舊，何堅之有?[47] 馬尾清軍

Dowell 提督手令後復返馬尾 (見 Dodd, 頁 20) 。

[44] 比如：“凱旋”、 “獨貴土音”與 d’Estaing 的艦首有明顯衝角, “獨貴土音”左舷有二舷臺，“凱旋”有一舷臺, 圖中依稀可辨。此外，在場各艦的桅檣、煙筒數目也都正確。

[45] 撥交廣東的“飛雲” 、“濟安” 雖與“伏波” 同型，帆架並不相同。由圖 2、圖 4 可知“飛雲” 、“濟安” 掛方帆，所需帆纜水手也因此比“伏波” 多 36 名，全艦乘員達 166 人，與孤拔在馬尾的旗艦 Volta 相當，噸位也接近。

[46] 鐵甲艦“凱旋”在場，對孤拔和馬尾法軍當然有鼓舞士氣的作用；砲擊閩江沿河砲臺時法軍主要依賴“凱旋”和“獨貴土音”。

[47] 與 Volta 同型同齡的 Hamelin 七月中旬在閩江口觸礁，幾乎沉沒，狼狽不堪，後來由英艦拖救到香港修理。「船堅」之說，只能用在“八野”、“凱旋”等五隻鐵甲艦和巡洋艦“獨貴土音”。 若楞指法軍在馬尾的其他艦艇也比所有的清艦堅實是沒有根據的。 當時清國南洋艦隊擁有德製巡洋艦 “南琛” 、“南瑞”，北洋艦隊擁有英製的“揚威” 、“超勇”，都是鋼質，配備的火砲也都超越當時的同級軍艦。清法交戰時「船堅砲利」用在清國這四隻新船倒是貼切合適的。十九世紀後期艦船進化極快，等十年後(1894) 甲午戰爭爆發，“揚威” 、“超勇”就落伍了，速率遲緩、徒有利砲而無水密隔艙的設計弱點在黃海海戰凸顯無遺。此外，南洋艦隊的巡洋艦“開濟”，是馬尾船政局在 1881-1883 年依據購自法國的設計圖紙自行仿製的鐵骨木皮的巡洋艦，與孤拔屬下的一等巡洋艦 d’Estaing、Villars 、Laperouse、Nielly、

確實沒有 Gatling 機關槍或 Hotchkiss 快砲，後膛砲卻不是法軍獨有[48]。 其實，清軍杆雷汽艇比法軍還多， 只是不懂得在砲戰爆發時趁機衝鋒。等砲戰結束，清艦或沉或毀，兩隻杆雷艇在 8 月 25 日凌晨四時才攻擊砲艦“蝮蛇號”與巡洋艦“獨貴土音”未遂， 平白讓“獨貴土音”的機關槍擊毀。 清軍各艦艇之間缺乏默契和橫向協調，而縱向的通訊指揮也不靈光，即使擁有再先進的武器裝備也不能發揮統合戰力[49]。 1884 年清軍在馬尾的慘敗，正是十年以後北洋艦隊在黃海大東溝和威海衛相繼被日軍擊敗的預兆。 把戰敗歸咎於敵方「船堅砲利」,是清國主事者卸責自保慣用的伎倆,也反映其潛意識裡唯物和阿 Q 的心態。殊不知兩軍作戰,人的因素(無形的戰力) 往往比物質(武器裝備) 重要。馬尾之戰，清軍徒有讓法軍傷亡慘重的條件與機會卻無能運用。 老實說，以當時馬尾清軍將帥的領導統御和用兵方式，即使雙方互換船艦，法軍一樣可以擊敗清軍。 劉永福、馮子材在北圻、孫開華在淡水， 都曾實實在在地獲勝，總不能也說是清軍和黑旗軍「船堅砲利」所致罷?

巡洋艦 Volta 多次參與清法戰爭前的交涉。1883 年 9 月 17 日, 代理駐清公使德理固乘 Volta 自上海抵達天津。10 月 30 日, 德理固又乘 Volta 赴橫濱向日本政府辭行, 然後再經由順化換船返回法國。1884 年 4 月， Volta 抵基隆, 艦長福祿諾中校以購煤及水兵遊覽砲台被阻, 幾至動武。Volta 旋北駛赴天津。5 月 11 日, 福祿諾與直隸總督李鴻章訂天津簡約[50]。 5 月 17 日, 福祿諾面交李鴻章節略, 於清法在越駐軍換防日期一節兩人處置草率荒唐, 埋下戰爭伏筆。 當時孤拔還在北圻。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海軍將校不乏正人君子[51]， 福祿諾卻是貪求名祿、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不但戲弄李鴻章，也欺瞞法國政府，釀成北黎事件[52]。造成日後法國 20 名軍官、500 名士兵埋骨基

Primauguet 相當，並不落後。此所以清廷又續製同型艦“鏡清” 、“寰泰”兩隻，分別於 1885、1886 年完工，撥入南洋艦隊服役。馬尾所造船艦，品質較好的新船都分派南、北、粵洋，剩餘的舊船則留用於福建、台灣。甲申一戰，連舊船也沉毀殆盡。其後劉銘傳在臺灣後山「剿番」,都依賴北洋調船支援。(附註 ： 清季漢人爲「開山撫番」政策與台灣原住民曾有多次衝突，對原住民並不公平，當時也還不瞭解不同文化、不同種族應如何相互尊重，雙方因此付出慘痛的血淚代價。)

[48] 穆圖善(福州將軍) 和楊昌睿等奉旨撈取馬江沉溺船砲。第一批大小洋砲二十四尊、師船廣艇上大小鐵土砲十二尊，在馬尾戰後一個月撈取(見穆圖善光緒十年九月十六奏摺) 。第二批撈獲的砲械包括“藝新”前後膛洋砲四尊，“振威”後膛大洋砲四尊，“揚武”後膛洋砲一尊等 (見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八奏摺) 。

[49] 清軍除了擁有七艘杆雷汽艇以外，還有“福勝” 、“建勝”兩艘鐵殼蚊子砲艦，噸位雖小，所攜載的十八噸巨砲卻不容忽視。呂翰率“福勝” 、“建勝”，逼近“獨貴土音”奮戰而亡。觀戰的美軍認爲以兩艦船小砲大而裝填遲緩的特點，更適合在上游遙擊、不宜肉搏。呂翰，廣東鶴山人。曾肄業上海英華書院，同治八年入福建船政學堂，畢業以後爲沈葆楨賞識，擢升砲艦“振威”管駕，駐防澎湖。光緒元年調赴“揚武”練船，遊歷南洋諸島及日本，授守備加游擊銜。復以防護台灣案晉都司。光緒二年管帶“飛雲”艦，次年調帶“威遠”練習艦，兼充駕駛班學生教習。復以台灣三次剿平後山加禮番社，以游擊升用。光緒七年調赴天津差遣。光緒八年丁憂返閩。光緒十年充船政局後學堂教習，旋統帶“福勝” 、“建勝”兩蚊子砲船。馬尾戰啓，呂翰駛船逼近法艦陣亡，兩艦隨殉者八十三人。呂翰和“振威”管駕許壽山都是船政學堂駕駛班第一屆畢業生，卒年一樣是 32。

[50] 談判期間福祿諾爲中校 (Capitaine de frégate), 並非上校 (Capitaine de vaisseau) 或准將(總兵)如李鴻章向朝廷所言。法國海軍與殖民部以福祿諾之全權僅屬臨時性質且其官階過低, 原擬由利士比少將赴津正式簽約。 利士比抵達時簡約已簽, 遂改赴北京遊歷、拜會清國總理衙門。福祿諾於 5 月 24 日晉升上校並調回法國。參看註 43、52。

[51] 見本文 “一等巡洋艦 d’Estaing 與 Villars ” 一節例證。

[52] 1884 年 6 月 23-24 日, 北圻法軍 1000 名依福祿諾版天津簡約接收諒山, 觀音橋當地駐軍王德榜部未獲清廷指示, 不敢擅退。北黎 (Bac Lé) 衝突遂起, 法軍失利。法國朝野甚怨清國背信(違約)、偷襲, 乃有報復之意。實皆李鴻章議事不夠週延、福祿諾復從中撥弄所致。福祿諾在天津應李鴻章要求，塗去節略所定清軍撤防日期，交李鴻章保留，事後卻未呈報法國政府。北黎事件爆發，福祿諾翻臉否認曾經讓步，法方因而指控李鴻章手中文件爲僞造。上海、法國報紙將清方文件照相發佈,福祿諾仍然堅持未曾在該文件畫押,甚至願以決鬥證實自己清白。 巴黎筆戰名家 Henri de Rochefort Lucay

隆的，部份可說是由於福祿諾一再撒謊、挑撥所致。

圖 4。孤拔在馬尾的旗艦 Volta (USNHC：NH 75911) ，與圖 2 同日拍攝。

淡水之役 (1884 年 10 月 2-8 日)，Volta 與巡洋戰艦 Atalante 、 砲艦 Lynx 留守馬祖澳。 10 月 5 日，日軍“天城” 艦艦長東鄉平八郎少佐抵達淡水時[53]，法軍正在等候增援，伺機登陸。 沉不住氣的東鄉跑到基隆拜訪孤拔， 錯過淡水觀戰的機會。 日軍的“清佛海戰紀略” 把 Volta 列爲淡水參戰法艦之一。 如果不是參謀本部的官員糊塗，便是東鄉失職。 Volta 確實到過淡水，卻

與其鬥劍，兩人均受輕傷。法相茹費理深信福祿諾無辜，至此清法戰爭遂不可免。直到福祿諾晚年(1921) 撰寫回憶錄才承認刪除撤兵日期確經他本人同意畫押。見龍章， 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 ，頁 242-249。

[53] 明治維新時, 日本海軍繼承德川幕府橫須賀製鐵所, 在西洋技師指導下開始建造小型軍艦。 最初兩艘爲 “迅鯨” 與 “清輝”, “天城” 爲第 3 艦, 由 “清輝” 放大、改良而成。 明治 11 年竣工, 木質 926 噸, 爲較巡洋艦更小的 3 檣 sloop。木津徹[編], 《日本巡洋艦史》 世界の艦船, 增刊 32 集〉(東京：海人社，1991), 頁 12。 東鄉少佐於 1884 年 5 月 15 日就任天城艦長, 隨旗艦 “扶桑” 赴上海。 旋奉松村淳藏司令指示, 考察揚子江(至漢口) 、福州、香港、淡水、基隆、廈門。見日本海軍參謀本部,《清佛海戰紀略》(東京，1888), 頁 61-65 ； 小笠原長生, 《東鄉元帥詳傳》 (東京，昭和 9 年), 頁 77-79 ； 東鄉元帥編篹會,《世界之東鄉元帥》(東京,昭和 10 年), 頁 40。 東鄉分明錯過 10 月 8 日淡水戰事,《清佛海戰紀略》所繪淡水戰役地圖卻仍將 “天城艦” 與諸法艦並列於沙崙口外, 儼然東鄉身歷其境, 頗有誤導之嫌。(此事東西史界罕有提及者, 附記於此。) 《清佛海戰紀略》謂巡洋艦 Volta 亦參與 10 月 8 日淡水戰事, 與法方資料不合。東鄉日後大破俄國艦隊, 建不世勳業, 積功升至元帥, 日人以「聖將」稱之。 然其壯年時期身心俱不如意, 宦途坎坷, 亦曾數度誤判情勢 (如錯失淡水觀戰時機等)。 倘非同鄉山本權兵衛(官房主事)向同鄉西鄉從道(海軍大臣)求情, 東鄉中佐早已屆齡退役, 無從晉升大佐，遑論參與清日甲午戰爭或日俄戰爭? 東鄉中佐曾列入待退 、編遣名單一事, 見吉田俊雄,《聯合艦隊の榮光と悲劇 - 東鄉平八郎と山本五十六》 (東京：秋田書店，1968), 頁 66。

是 1885 年的事。1885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初，孤拔率隊攻擊澎湖時，Volta 與鐵殼巡洋艦“獨貴土音”留在淡水擔任封鎖、警戒的任務[54]。 諒山法軍失利的消息傳到台灣以後，在停火(1885 年 4 月 15 日) 之前， Volta 與另一巡洋艦 Kerguelen 曾從基隆趕運一批軍需到澎湖。

(五) 一等巡洋艦 d'Estaing 與 Villars

從表 2、3 可知，參戰的法軍巡洋艦裡戰力僅次於“獨貴土音”的，便是 Lapérouse 級 4 隻 (含 d'Estaing, Nielly, Primauguet, Lapérouse) 和 Villars 級 3 隻 (含 Villars, Magon, Roland) 。兩型設計要目、兵裝、性能都非常接近，也有類似“獨貴土音”採用的水密隔間。差別主要在尺寸、汽機數目和續航力 [55]。 若就外型而言，Lapérouse 級的衝角較大，如圖 5 所示。 此外 Magon 和 Roland 艦首 2 砲不在前甲板上，而隱藏在艏樓 (forecastle) 的兩舷內。

兩型參戰七艦當中，以 d'Estaing 和 Villars 最爲活躍。 基隆第一次砲戰(1884 年 8 月 4 至 6 日)就有 Villars。1884 年 7 月下旬起，Villars 停泊基隆港兩週。 8 月 3 日 Villars 攔阻運載 19 門 17 公分克魯伯大砲和水雷的德船 Wille 在基隆卸貨， Wille 便轉航滬尾(淡水)了事。 當時清法尚未宣戰，Villars 遵照國際公法，既未曾硬登中立船隻臨檢， 也沒有把 Wille 扣留或擊沉。 對照甲午 (1894) 戰前日軍“浪速”艦長東鄉平八郎大佐在朝鮮豐島罔顧公法、悍然擊沉載運清兵英船“高陞” 的行徑[56]，即知 Villars 艦長 Vivielle 行事猶有俠士君子風範，乃知法守法的正派軍人。 Vivielle 其後於 1889 年 7 月 4 日晉升少將，爲孤拔手下上校艦長晉昇少將的第四人[57]。

馬尾海戰時，吃水較深的一等巡洋艦“獨貴土音” (3479 噸)、d'Estaing (2363 噸)、與 Villars (2382 噸) 在下游羅星塔南側下泊，與清軍三等巡洋艦“飛雲”、“濟安” (1258 噸) 、砲艦“振威” (572 噸) 對峙。協力率先擊沉清軍作戰最奮勇的“振威”的，這三隻法軍一等巡洋艦和臨開火才及時趕到羅星塔的巡洋鐵甲戰艦“凱旋” 都有份。Villars 和 d'Estaing 分別於 8 月 15 、16 日到達羅星塔。張佩綸原以爲自己的部署還算穩妥， 這兩艘法軍大型巡洋艦的來臨顯然讓張佩綸措手不及，對 8 月 23 日馬尾一戰有相當影響。 d'Estaing 又參與淡水戰役和澎湖登陸戰。 封鎖期間，Villars 和 d'Estaing 似乎也曾在淡水外海短暫露面[58]。1885 年 4 月 10 日, d'Estaing 自香港返澎, 證實法陸軍在越北失利。 次日， d'Estaing 在臺灣琅嶠 (鵝鑾鼻) 洋面捕獲“平安輪” (Ping-On)。船上攜有 10518 枚銀幣和 8 塊大銀錠。“平安輪”所載楊岳斌部衆 750 人被解往馬公及西貢。4 月 15 日， d'Estaing 赴淡水、基隆，宣告解除封鎖。 自 3 月底澎湖登陸戰開始，“凱旋”與 d'Estaing 的

---

[54] 見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during the Frano-Chinese war, 1884-1885** 》(Hong Kong , 1888), 頁 127-128。

[55] Lapérouse 級有反復式臥機 2 具，Villars 有 1 具。 Lapérouse 載煤 300 噸，而 Villars 可載 400 噸，以 10 節航速能巡航 4000 浬。

[56] 擊沉“高陞號”的“浪速”艦長東鄉平八郎大佐，其後在日俄戰爭以殲滅遠道東來的波羅地海艦隊揚名世界，積功晉昇元帥。飽受俄國欺負的芬蘭甚至以「東鄉」(Togo) 爲其啤酒命名迄今。就史論史，東鄉擊沉“高陞號” 乃其畢生人格一大污點，不宜因晚年蓋世戰功的光環作用而代爲隱諱。東鄉於“天城”艦長任內到淡水觀戰的表現也顯示他早年不成熟、判斷力不足的瑕疵 (參看註 54)。小笠原長生把東鄉描述成天縱英明的作法不足爲訓。

[57] Sylvestre Léopold Viville, 1831 年 6 月 3 日生，1847 年入伍，1849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54 年 3 月 8 日升中尉、1860 年 7 月 11 日升上尉、1872 年 9 月 9 日升中校、1881 年 5 月 31 日升上校、1889 年 7 月 4 日升少將，以少將退役。

[58] 依 John Dodd 日記,疑似 Villars 的法艦在 1884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9 日兩度出現。d'Estaing 則在 11 月 29 日和 1885 年 1 月 17 日提及。

槍兵(陸戰隊) 留在馬公值勤，艦上人手一直不足[59]。 直等到 5 月 5 日， 徵用快速運輸艦 Château-Yquem 運來增援陸軍， “凱旋” 與 d’Estaing 的槍兵才得以歸建。法軍自澎湖撤退時，d’Estaing 和另一巡洋艦 Kerguelen 拖帶 44 號杆雷艇與 50 號[自走]魚雷艇經由西貢返回法國[60]。

圖 5。一等巡洋艦 d’Estaing (USNHC：NH 74982)。

清法議和以後，Villars 率先到基隆掃墓，時在 1889 年。往後駐亞法艦陸續到基隆、澎湖探望戰友的墓地，前後總共八次[61]。Villars 在 1896 年除籍。d’Estaing 則在 1901 年除籍。Villars 級的 Magon 和 Roland 在戰爭末期才調到澎湖，未曾參與實際戰鬥[62]。Lapérouse 級的 Nielly 曾隨孤拔到浙江，砲擊鎮海。同型的 Primauguet 和 Lapérouse 則在戰爭結束後、艦隊縮編前才移防遠東。這五艘巡洋艦的角色都遠不如 d’Estaing 和 Villars 重要。

(六) 二等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 時，南軍成功地以巡洋艦 Alabama 騷擾與北軍據點往來的商船，對各國巡洋艦的設計立即有很大的影響。 英國的 HMS Inconstant、 美國的 USS Wampanoag、以及法國的 Château Renault (或 Châteaurenault) 便是第一批吸取 Alabama 的經驗而增大馬力、火力的產品。圖 6 爲二等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旁有加煤駁船停靠。煙筒頂部設置遮雨蓋，是法國軍

[59] 當時所謂「陸戰隊」，無非自各軍艦帆纜、生火、管旗水手中抽調, 授以步槍, 與今日「爲海軍收戰果、爲陸軍作先鋒」的專業陸戰隊不同。登陸淡水的 600 名法軍由各艦攤派如下: “加里松涅” 與 “凱旋” 各 120 名, “八野” 100 名 (由運輸艦 Tarn 載運), d’Estaing 與 Chateau Renault 合計 130 名, Duguay Trouin 與 Tarn 合計 130 名。

[60] 45、 46 杆雷艇在 1885 年 3、 4 月遭風沉沒，法軍以 44 號杆雷艇與 50 號[自走]魚雷艇遞補，兩艇抵達澎湖時清法尚未簽約，但已停戰。詳見下文“水雷艇”一節。

[61] 紀榮松〈清法戰後赴台掃墓的法國軍艦〉(未刊稿) 。

[62] Roland 在 1885 年初才剛竣工，就疾駛遠東報到，是當時法軍最新穎的軍艦。

艦的特色。不用時多半移到煙筒前方，例如圖 4、圖 7、和圖 9。 Château Renault 的遮雨蓋卻分成左右兩半，與眾不同。Château Renault 的性能、數據，可參看表 3。

圖 6。曾參與閩江、淡水、澎湖戰役的二等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USNHC: NH 74981)。

1883 年 4 月 15 日新編的北圻支隊 (Division Navale du Tonkin) 在瑟堡成軍，含鐵甲艦 2 隻("八野"，Atalante), 巡洋艦 3 隻 (Château Renault， Kersaint， Hamelin), 情報艦 1 隻(Parseval), 運輸艦 2 隻 (Drac, Saône), 砲艦 3 隻 (Lynx, Vipére, Aspic)， 桿雷艇 2 隻 (Torpilleur No.45, 46)。 由孤拔少將統率，開赴遠東作戰。 之前在北圻作戰的法國海軍其實都是南圻支隊派出的遠征軍。 孤拔本人、"八野" 艦長 Parrayon、和 Château Renault 艦長 Boulineau 的派令都在同一天(4 月 15 日) 發佈(表 1)。 4 月 23 日孤拔初登旗艦"八野" 就職。 東航途中 (5 月 19 日)，黑旗軍劉永福斬殺北圻遠征軍司令李維業 (Rivière) 上校於紙橋[63]。Château Renault 不止參與中圻順安炮擊與登陸作戰，往

[63] 李維業(Henri-Laurent Riviére), 1827 年 7 月 12 生，1843 年從軍、 1845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49 年 9 月 1 日升中尉、1856 年 11 月 29 日升上尉、1870 年 6 月 1 日升中校、1880 年 1 月 30 日升上校。1881 年 11 月 19 日任南圻支隊(Division Navale de la Cochinchine) 司令，1882 年 9 月 1 日起兼任砲艦 Pluvier 艦長。1883 年遠征北圻時，爲劉永福所殺，當時新成軍的北圻支隊剛啓程赴亞不久。李維業雖是海軍校官，也是業餘小說家，頗有文名, 其雄心爲獲致法蘭西學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 院士資格及海軍將官地位。就任南圻海軍支隊司令時已 54 歲，急欲立功，以實現其大志，認爲赫赫武功足以增強其入選院士的機會。離法赴越時致書友人曰：「余假道東京以入法蘭西學士院。」若當選爲該院院士，著綠色制服，佩帶寶劍，爲法國文人最高榮譽。另一個被劉永福斬殺的法國北圻遠征軍司令安鄴 (Marie-Joseph-François Garnier, 1839-1873) 則常在《地理學會會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發表專文，爲頗負盛名的探險家。曾以巨著《柬埔寨以北探航記》獲提名爲法國研究院(Institute de France) 院士候選人，也獲得 1873 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頒獎。十九世紀法國殖民動機常有個人的政治虛榮心超越國家經濟利益的現象，安鄴和李維業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兩人的遭遇也有類

後的閩江、淡水、澎湖各戰役也都在場。 1884 年 10 月 8 日淡水戰役， Château Renault 艦長 Boulineau[64]擔任登陸部隊指揮，親率 5 個連 (600 人) 上陸。(詳見附錄二。)

戰爭期間，法軍在基隆設立港務局，由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的 Guédon 中尉負責[65]。孤拔從香港購買兩艘小汽輪： Georges 和 Kowlown ，又加派兩隻汽艇，都交給 Guédon 支配。港務局曾有兩名隸屬 Château Renault 的水兵遭一個基隆婦女誘騙而被割去首級。當時法軍在社寮島建立貯炭所，由俄國和德國船從香港購煤補給，維持至少 2000 噸的儲量[66]。另外在基隆港邊還建立飲用水蒸餾所和麵包工廠。 這些設施在法軍撤離時立即被接收基隆的淮軍或焚或拆，劫掠一空，連中立國在基隆的洋行也未能倖免[67]。1885 年 3 月 24 日， 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 拖 46 號杆雷艇離基, 與戰艦 “凱旋” 、巡洋艦 d’Estaing、Duchaffaut 開往台南會合，準備攻擊澎湖。途中 46 號杆雷艇在暴風中失事。 終戰以後，Château Renault 伴隨鐵殼巡洋艦 “獨貴土音” 返回法國。

(七) 二等巡洋艦 Champlain

圖 7 攝於法國本土，是極有趣的軍艦照片。圖裡波平如鏡，倒影分明。 二等巡洋艦 Champlain 所有的風帆、索具都曝晒在晴空下；水兵的衣物也晾在艦艏和艦橋兩側，幾乎艦上能利用的空間和帆纜全都用上了。 Champlain 屬於 Infernet 級，2042 噸，是蒸汽時代法國最早超過 2000 噸的巡洋艦 (表 2)，也是最早直接安裝 1870 年式 14 公分口徑 (22.6 身倍) 後膛砲的巡洋艦。水線長 79.86 米，寬 10.89 米，吃水 5.71 米，速力 13.7-15 節，乘員 205 人，攜 14 公分砲 8 尊。 Champlain、Rigault de Genouilly 與 Nielly 在 1884 年 10 月下旬抵達基隆增援[68] ，時在基隆二次戰事爆發之前。往後 Champlain 都在台灣南部執行封鎖任務。1885 年 1 月 5 日迄 20 日, Champlain 夥同戰艦 “凱旋” 、 “加里松涅” 搜索台南海岸， 拿捕 30 艘清國帆船， 把 200 華人移送基隆服勞役。2 月 6 日，孤拔率 “八野” 、 “凱旋” 、巡洋艦 “獨貴土音” 、Nielly、Rigault de Genouilly、Eclaireur、運輸艦 Saône、砲艦 Aspic 北駛, 攔截清國軍艦。封鎖臺灣任務交利士比執行: 戰艦 “加里松涅” 、Atalante、巡洋艦 Volta、d’Estaing 在北部水域, 巡洋艦 Villars 與 Champlain 在南部。

似之處。 安鄴生平參看陳三井，《近代中法關係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4) ，頁 3-21。 此書對茹費理的殖民思想與對華政策也有極簡明扼要的探討。安鄴，1839 年 7 月 25 生，1855 年從軍、 1857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60 年 11 月 7 日升中尉、1865 年 12 月 23 日升上尉、18__年_月_日升中校。

64 Thomas Gabriel Léonce Boulineau , 1838 年 6 月 9 日生，1855 年從軍、 1857 年 8 月 1 日少尉見習、1861 年 9 月 2 日升中尉、1863 年 12 月 6 日升上尉、 1878 年 10 月 8 日生中校、淡水登陸戰後 5 天(1884 年 10 月 13 日) 晉昇上校、調職。

65 E. Garnot,《**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1894) , 頁 73。 (黎烈文台銀版譯本頁 37。) Victor Marie Guédon , 1849 年 3 月 8 日生，1865 年從軍、 1883 年 2 月 5 日升中尉。

66 基隆本地(八斗子) 所產的煤塊含膠質(瀝青)過多，焚燒過速。除非煉成焦炭，並不適合軍艦使用。 孤拔曾經建議調派 Brest 軍港閑置的煉焦設備到基隆，結果不了了之。英國拒絕售煤給法軍，法軍乃透過德、俄購買香港煤炭。

67 John Dodd ,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during the Frano-Chinese war, 1884-1885** 》 (Hong Kong ， 1888), 頁 163。中立國洋行受損的部分，後來由清廷認賠了事。

68 Christophe Rouil 的 《被遺忘的清法戰爭》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 (Taipei: le Pigeonnier, 2001), 頁43 有張Champlain小艇在基隆沙岸登陸的照片。

圖 7。二等巡洋艦 Champlain ，此圖取自 G. Dollé "Frégates et Croiseurs" (Paris, 1947), 頁 19。

四、孤拔艦隊的砲艦

1860-1905 期間，法國軍艦都由五座官渠 (Cherbourg, Brest, Lorient, Rochefort, Toulon) 和民營的造船廠承建。早期民營的造船廠以 Bordeaux 的 Arman 廠最有名。 後期以在 La Seyne 的 FC de la Méditerranèe, St Nazaire 的 Le Havre, Soc de la Loire, Penhoët, 以及 Bordeaux 的 Soc de la Gironde 等造船廠承造大船較多；Le Havre 的 Normand 造船廠則以建造魚雷艇著稱。當時法國砲艦 (Cannonière)以 250 噸爲分界；內河、沿岸砲艦排水自 48 噸至 202 噸不等，能跟隨艦隊開赴遠洋作戰的都在 360 噸以上，而且有逐代增大的趨勢。 清法戰爭期間派駐遠東的砲艦包括第二代、木質的 "標準" 級 (Étendard, 445-500 噸，1868 下水), 第三代、鐵骨木皮的 "鱷魚" 級 (Crocodile， 465-492 噸，1874-1882 下水) ，和第四代、鐵骨木皮的 "彗星" 級 (Comète, 492 噸， 1884-1885 下水) 。

"鱷魚" 級砲艦水線長 144 呎 7 吋，吃水 10 呎 10 吋，單軸、臥機，440 匹馬力，速力 10-11 節，攜煤 50 噸；載 1870 年式 5.5 吋砲 2 門， 3.9 吋砲 2 門， 1 磅砲 2 至 4 門；乘員 76 人。曾到台灣、福建、浙江作戰的四艘都是"鱷魚" 級，如表 5 所示。四艦當中，Lutin 原屬利士比的支隊，曾隨同利士比砲擊基隆，終戰時也跟隨利士比到基隆撤軍。其他三艦從北圻支隊成軍就直屬孤拔指揮，也因此得以參與較多的戰役。 表 5 還列有五艘砲艦，或在戰爭末期才移防臺澎、或一直在越

南值勤，與台灣淵緣較淺。 即使是同屬“鱷魚” 級的砲艦，外貌也不盡相同。 瑟堡官渠所造的砲艦有衝角,如 Lutin 和圖 8 的 Lynx。 Rochefort 廠所造的砲艦艦首筆直,例如 Aspic 和圖 4 的 Vipère。除此之外,各艦配備差異不大。 寶順茶行的 John Dodd 說 Vipère 像蛇,這是法軍封鎖台灣期間 Dodd 困居淡水苦中作樂的玩笑話，望文生義，不能當真。 法軍砲艦以走獸命名的更多，可從未存心讓名貌相符。 倒是 Vipère 艦首兩側有蝮蛇雕飾，遠看和清軍北洋軍艦艦首的銅質龍雕非常相似。

圖 8。在馬尾率先開火的“鱷魚” 級砲艦 Lynx 。

四艘砲艦當中，以 Vipère 與淡水最有關聯，參戰次數也最多。戰爭期間有三任艦長。第一任艦長爲 Lejard (1881 年 12 月 15 日到職), 1883 年 8 月 18 日隨孤拔參與順安 (Thuan-An) 砲擊與登陸戰。 次日“八野” 與 Vipère 遭越軍擊中, 受輕傷。 第二任艦長爲 E. P. M. Picard，1883 年 11 月 13 日到職， 隨孤拔參與 1884 年 8 月 23 日的馬尾砲戰。 這兩場戰役砲艦 Lynx 也在場，表現不如 Vipère。Vipère 第三任艦長就是原來擔任巡洋艦 Volta 副長的 Boué de Lapeyrère。 馬尾砲戰時，他督率一批汽艇，防範清軍杆雷艇的突擊；並親自操作 Volta 的汽艇 White 號的杆雷，重創清軍“福星”砲艦立功[69]。 9 月 9 日在馬祖澳，de Lapeyrère 調往 Vipère 任職。9 月 26 日, Vipère 阻止英船在滬尾下載 150 名清兵。然後又參與 10 月 8 日的淡水登陸戰，赴越南。 12 月 15 日, 載法駐台陸軍指揮官 Duchesne 上校抵達基隆，這是法政府批准孤拔佔領臺灣北部以後的事。1885 年 3 月 4 日, Vipère 支援法陸軍, 砲擊基隆暖暖清軍陣地；效果雖然不彰，對陸軍的士氣大有裨益。3 月 27 日, Vipère 和運輸艦 Annamite (載陸軍) 隨“八野” 離開基隆。3 月 28 日, 孤拔的澎湖特遣隊會集台南海岸待命時，Vipère 到金門避風，次日清晨澎湖砲戰爆發才歸隊。當時清軍馮子材、蘇元春等擊敗法軍於諒山, 法國朝野大震。孤拔攻佔澎湖遂乏人注意。佔領澎湖以後，孤拔以 3 隻砲艦在群島

[69] White 號汽艇的照片見本文圖 4。

週圍巡弋[70]。1885 年 7 月 29 日遠東艦隊縮編爲支隊，Vipère 留在支隊服役，與砲艦 Sagittaire 作伴。

表 4 ： 孤拔艦隊的砲艦

艦名	造船廠	品級	艦材	參與的主要戰役或其他任務
Aspic	Rochefort	鱷魚	鐵骨木皮	馬尾、川石島(護線)、三門灣(偵巡) 、石浦
Lynx	Cherbourg	鱷魚	鐵骨木皮	順安、馬尾、馬祖澳(留守)
Vipère	Rochefort	鱷魚	鐵骨木皮	順安、馬尾、淡水、澎湖
Lutin	Cherbourg	鱷魚	鐵骨木皮	基隆、淡水(偵巡)、澎湖(偵巡)、基隆(撤軍)
Hyène	La Seyne	標準	木質	駐防北圻
Lionne	Bordeaux	鱷魚	鐵骨木皮	駐防北圻
Jacguar	La Seyne	標準	木質	戰爭末期接防
Sagittaire	Normand	鱷魚	鐵骨木皮	戰爭末期接防
Comète	Cherbourg	彗星	鐵骨木皮	戰爭末期接防

法軍其他砲艦都沒有 Vipère 活躍。 1884 年 9 月 3 日， 砲艦 Lutin 曾到淡水偵巡，發現港口已閉， 且有英情報船 Cockchafer 及清國通訊船“萬年清” 停泊。1885 年 4 月 12 日， Lutin 在澎湖拘捕載運 84 名清軍的帆船。馬尾戰後，孤拔率衆艦出閩江抵馬祖澳 (1884 年 8 月 30 日) ，曾派砲艦 Aspic 停泊川石島，夥同英艦保護電報纜線[71]。 Aspic 也曾隨孤拔到石浦，封鎖南洋艦隊的清艦。

五、孤拔艦隊的水雷艇

法國自 1875 年開始向國內和英國的造船廠訂製魚雷艇。 國內廠商包括在 Le Havre 的 Normand 造船廠，Seine 河的 Claparède 造船廠，La Seyne (Toulon 附近) 的 Forges et Chantiers de la Méditerranèe 造船廠；國外的廠商則爲 Thornycroft 和 Yarrow。 當時 torpedo 一詞涵蓋繫雷（mine）、杆雷（spar torpedo）、[自走]魚雷（Whitehead torpedo 或 locomotive torpedo）、以及拖雷（Harvey torpedo 或 outrigger）。魚雷艇或用杆雷，或用[自走]魚雷，艦首外貌明顯不同。 杆雷製作較易：餅狀硝棉套在長杆前端，用信管點火。除電瓶、長杆及撐持長杆的槓桿以外，無需其他器械。任何汽艇都可以迅速改裝成杆雷艇。硝棉或稱棉火藥 (gun cotton)，爲 Braconnot、Pelouze、Schönbein、Söttger 等人於十九世紀 (1833-1845) 發現的無煙火藥，以純棉花浸入硝酸、脫水硝化製成，威力較黑火藥強大且穩定可靠，不致因靜電意外引爆。

法國最早的 19 艘魚雷艇款式紛歧，可說是各家各廠的實驗品。從第 20 號到 55 號，有 29 艘爲同一尺寸(27 米長) ，由三家國內固定廠商承造。1883 年北圻支隊在瑟堡成軍，45、46 兩號杆雷

[70] E. Garnot, 《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 (Paris, 1894) ，頁 212。 (黎烈文台銀版譯本頁 115。)
[71] 川石島可與福州上海聯繫。戰後清廷亦由此鋪設海底電報纜線至滬尾。

艇分別由一等運輸艦 Annamite、Mytho 運載，隨孤拔到越南。45 號於 1885 年 3 月在基隆遭風沉沒，46 號也在拖行澎湖途中浸水沉沒，是清法戰爭法軍艦艇僅有的徹底損耗。 法軍立即以 44 號杆雷艇與 50 號[自走]魚雷艇遞補，抵達澎湖時清法和約尚未簽訂，但已停戰。這四艘雷艇都是 La Seyne 的 Forges et Chantiers de la Méditerranèe 造船廠所造的 「27 米式雷艇」，排水 31 噸、單軸、速力 18 節。45、46 兩號都在 1879 年起工，分別於 1880 年 6 月 3 日、4 日完工。[72] 這兩號制式杆雷艇都有艙罩，艦身修長，狀若雪加煙 (見圖 9)。 法國水兵喜用艇長的姓氏代替番號，因此常稱 45 號爲 Latour 艇， 46 號則爲 Douzans 艇。 馬尾戰啓，M. A. H. Douzans (上尉)[73] 艇長首先以杆雷刺擊 “揚武” 巡洋艦左舷船舯，迫使 “揚武” 貼岸擱淺 (後爲法砲所碎) 。Douzans 艇汽缸被清軍還擊的砲火擊毀，漂流到下游羅星塔中立國船艦泊地，艇員死一人。Latour 艇攻擊砲艦“福星” 沒有奏效，F. Latour 上尉艇長[74] 左眼被清軍子彈擊瞎，艇員一人手折，也駛到下游羅星塔美軍“企業號” 附近避戰。兩艇在以後清法戰爭歷次各戰役都沒有再露面或立功。當天實際重傷清軍“福星” 砲艦的是孤拔代用旗艦 Volta 的汽艇 White 號的杆雷，由 Volta 副長 Boué de Lapeyrère 親自操作。 孤拔率隊出閩江以後，9 月 1 日在馬祖澳調 H. E. Campton 上尉接替負傷成殘的 Latour。

1885 年 2 月 15 日 (光緒十一年乙酉正月初一), 法軍旗艦 “八野” 的副長 P. F. C. Gourdon 中校[75] 與水雷官 E. C. E. Duboc 上尉 [76] 銜孤拔令, 各率交通汽艇一艘加裝杆雷 (內含 13 公斤硝棉), 趁夜潛入三門灣內，攻擊停泊在石浦村天后宮前的 “馭遠艦”。 法兵死一人, 而 “馭遠” 、“澄慶” 俱沈。 (法艇其實未曾攻擊 “澄慶”。) 總體來說，孤拔運用杆雷艇確有靈活、果敢、積極之處。這和孤拔自己曾於 1874 年擔任 Oléron 島 Boyardville 魚雷學校上校校長當然有關。 尤其是他能以普通汽艇加裝杆雷代替制式雷艇，一再奏功，可說是潛艇問世之前海軍戰術史上相當重要一頁, 海軍史界留意者尚不多見。 杆雷戰術與日後的「神風特攻隊」極爲相似，使用者需有相當膽氣。 當時英軍顧慮艇員易遭傷亡，因此並不鼓勵使用杆雷。

甲申開戰時清軍僅僅李鴻章的北洋艦隊擁有魚雷艇。 滬尾孫開華部在淡水河口佈置線導式繫雷，又用沈船封港，雖無魚雷、杆雷小艇，法艦始終未能溯河進犯。馬尾戰前，張佩綸借調丁憂在籍的北洋水雷學生林慶平在烏龍江海潮寺前督練杆雷艇，曾有函稱: 「**法有二水雷船, 我亦急造杆雷廿具, 盡斂官商小輪, 得堅利者五艘, 並各船小舢板合十二艇, 終日在烏龍港操演, 孤拔頗爲疑懼, 使白藻泰來問… 合肥練魚雷、水雷十餘年而斂船入口, 閩風生畏, 不如閩之敢作敢爲矣…。**」[77] 白藻泰 (de Bejaure) 爲法國駐馬尾副領事, 「合肥」指李鴻章。 孤拔及其屬下對清軍杆雷艇深懷戒心確係事實，然而所謂「敢作敢爲」云云，乃張佩綸空言自許，並無實據。 清軍不懂得在砲戰

---

[72] Henri Le Masson, 《**Historire du torpilleur en france**》(Paris, 1963) 頁 287。

[73] Marius Auguste Hyacinthe Douzans, 1852 年 7 月 8 日生，1865 年從軍、1868 年 10 月 2 日少尉見習、1870 年 8 月 15 日升中尉、1879 年 6 月 10 日升上尉。

[74] François Joseph Antoine Adolphe Latour, 1851 年 5 月 3 日生，1868 年從軍、 1871 年 10 月 2 日少尉見習、1874 年 12 月 17 日升中尉、1881 年 7 月 12 日升上尉。

[75] Palma Firmin Christian Gourdon, 1843 年 1 月 19 日生，1865 年從軍、 1865 年 10 月 1 日少尉見習、1867 年 10 月 1 日升中尉、1874 年 7 月 30 日升上尉、1884 年 10 月 13 日升中校。

[76] Émile Charles Eutrope Duboc, 1848 年 6 月 18 日生，1869 年從軍、 1872 年 10 月 2 日少尉見習、1875 年 4 月 27 日升中尉、1883 年 2 月 8 日升上尉。

[77] 張佩綸《澗于集》書牘卷三, 葉五十三上。

爆發時讓杆雷艇趁機衝鋒；等砲戰結束，清艦或沉或毀，兩隻杆雷艇在 8 月 25 日凌晨四時才攻擊砲艦“蝮蛇號”與巡洋艦“獨貴土音”未遂， 平白讓“獨貴土音”的機關槍擊毀。馬尾清軍之杆雷小艇雖有 7-12 艘之多，未及運用即已潰滅。 馬尾戰後，張佩綸和駐守長門砲臺的福州將軍穆圖善亡羊補牢，撈取沉船的砲械，「夾河而守，下布水雷」，防止法船再進閩江。 張佩綸自註曰：「**船政新買電發雷，而李鳳苞乃誤買碰雷，可恨可殺！**」[78] 顯然張佩綸沒有再嘗試重建杆雷艇隊，轉而倚賴防禦式的繫雷。

圖 9。法國“27 米式”制式杆雷艇的第一艘，孤拔的 45、46 號與此同型、同貌。(杆雷擱在艇首右側。)

六、討論與結語

清法戰爭期間孤拔屬下船艦多達 50 艘，不但創下歷來法軍駐亞紀錄，其規模也超越當時法國本土艦隊。 法軍派遣 5 隻鐵甲巡洋戰艦參戰，清國北洋、南洋為之震懾，莫敢爭鋒。就實際戰績而論，法軍巡洋艦、砲艦、杆雷艇、運輸艦都曾發揮預期作用；在砲擊口岸、登陸掃蕩、阻絕封鎖時，各艦種都曾積極參與。 孤拔運用杆雷艇確有靈活、果敢之處：先在馬尾以制式杆雷艇重傷清軍巡洋艦“揚武”，在石浦復以克難杆雷艇擊沉南洋巡洋艦“馭遠”，是杆雷戰術的優秀範例。 馬尾清軍杆雷艇較法軍為多，未能及時衝鋒，乃遭各個擊破。可見“船堅砲利”固然重要，若要求勝，需發揮統合戰力，不能徒重硬體投資。馬尾船政局於戰後成功仿製小型鋼甲艦 “龍威”（“平遠”），可算是法艦侵華帶給自強運動的正面激勵，也是清季造艦實力的重要客觀指標，其意義與日本自製巡洋艦 “秋津洲” 相當。(李鴻章建設北洋艦隊只重外購，從未著眼於厚植自製能力。)

清法交戰時兩國陸軍以北圻為主戰場；制海權在握的法國海軍則以砲擊口岸、登陸掃蕩、據

[78] 張佩綸致李鴻藻函，見《澗于集》書牘卷三，葉五十八上。

地爲質、阻絕封鎖爲主要任務。雖有兩國部分艦隻在內河激烈砲戰，卻沒有類似甲午 (1894) 年清日雙方艦隊主力在大海對決的場面。1885 年初奉派赴閩參戰的清國部分新銳船艦曾有機會與條件從事遊擊戰、突破法軍漫長封鎖線。 南洋五艦在隊官吳安康麾下徘徊浙洋多日, 甫見敵蹤即分別遁入鎮海港與石埔村, 陰錯陽差地牽制住孤拔艦隊主力, 容增援臺灣的楊岳斌於台東卑南順利上陸。 吳安康總兵所以欠缺鬥志、非依附岸炮則不得心安, 實肇因於對法艦性能及布署的無知；因而未能以己之長制法之短[79]。然則環顧當時清國上下官佐, 具備當代海防、海戰常識者並不多見[80]。若非駐各地海關洋員誠心協助[81] ， 以及香港、廣州、上海、天津中西文報紙殷勤報導[82] ， 官方文書對法艦的名號與行蹤幾乎無從掌握, 往往只能信手報稱 「法逆大小兵輪三號(隻)來攻」、法寇大黑輪二艘已去, 不知何往」、有三桅白色兵輪一號由某某門駛進, 轉由某某門出口而去, 顯有詭謀, 無從查問」等。 像這樣漫不經心、含糊籠統的情報, 縱然廟堂叟嫗皆解, 對臨敵作戰或後世研究的幫助委實有限。 清軍不只是交手之前對敵方的軍力、佈置無法掌控；往往在交手之後也依舊茫然，因而對敵方傷亡的估算很不準確。馬尾砲戰後第十天，張佩綸致電總理衙門如下：

「初三敗仗，已達。 頃探是日孤拔砲傷臂折，共斃法三百餘人。 孤歿眾口一詞，然各國皆爲深諱，極確亦不足釋恨。 洋船焚雙筒三桅一艘、擊壞一艘。 魚雷一船，係都司陸桂山擊碎。 又一船亦損。」[83]

孤拔在馬尾傷臂是實[84]。法艦「雙筒三桅」的只有“獨貴土音” 一隻， 這「焚」字若指「焚毀」則與事實顯然不符。 指稱在岸上守護船廠的陸桂山擊毀魚雷艇更是信口開河、張冠李戴，把馬尾海軍的浴血死戰一筆勾銷。 這當然是因爲張佩綸自己匆忙逃竄到鼓山， 對江裡、江邊戰局無法充分掌握。可是清法軍艦在砲戰之前已經在馬尾一連對峙四十日，身爲前敵海軍副司令 (會辦福建海防事宜欽差大臣) 居然連近在咫尺的敵艦名稱也還無法交代，實在是不可思議。 甲午戰爭時北洋大臣李鴻章、提督丁汝昌及旅順、威海守將在各文電、奏章中屢屢只用「倭船」一詞含糊交差，同樣顯示清朝多數文武大員對外國船艦的認識非常有限。像許景澄、曾紀澤那樣肯用心研究船艦的，確如鳳毛麟角[85]。

習史、治史者不單要瞭解戰事如何發生、如何演變; 也要追究何以如此發生、何以如此演變。雙方指揮官的習性素養、所能動用的部隊裝備、後勤補給能力、部卒操作武器嫻熟程度、官民意志

---

[79] 1885 年 2 月孤拔親率 “八野” 等六艦自馬祖泊地北駛, 截堵吳安康所率南洋船艦。 11 日在三門灣遭遇, 法艦無一能追及 “南琛”、“南瑞”、“開濟”。 孤拔手下頗以快速巡洋艦 Tourville 未能留在亞洲爲憾。見 Maurice Loir ,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1886), 頁 252-253。

[80] 就當時文檔看來, 清國官員中許景澄、曾紀澤、薛福成、劉璈於洋務、海防之見識(或措施)各有其同儕或籌防大員(如李鴻章、張佩綸等)遠所不及之處。浙東鎮海之役薛氏襄助歐陽利見提督的表現可圈點之處甚多。劉璈戰前籌防全台, 戰時守衛台南, 在台四年, 勇於任事, 頗著勞績, 後遭劉銘傳構陷, 抄家充軍。見許雪姬,〈劉璈與中法戰爭〉 臺灣風物》35 卷 2 期, 頁 1-28。

[81] 海關稅務司 E. Farago (匈牙利籍) 、H. F. Merrill、H. B. Morse (美籍) 、 J. Carrall 等經由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轉呈清廷的觀戰報告可算詳盡確實。 戰後清廷曾贈勳 Farago、Morse 等人。 Morse 頗多漢學著述。

[82] 例: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述報法兵侵台紀事殘輯》(臺北：臺灣銀行，1968, 臺灣文獻叢刊第 253 種)。

[83] 張佩綸甲申七月十三日 (1884 年 9 月 2 日) 致總理衙門電，見 《澗于集》電稿卷，葉 25 上。

[84] 法人曾以馬尾負傷未癒的孤拔於11月2日乘轎子巡視基隆陣地爲題，製成瓷盤留念。見 Christophe Rouil 《被遺忘的清法戰爭》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 (Taipei: le Pigeonnier, 2001) 封底照片。其實，孤拔涉險深入閩江四十日，何璟、張佩綸若知兵法，及時佈置，莫說擊傷孤拔一臂，要讓法軍死傷慘重也非難事。

[85] 見註 26。

是否協調等等，對臨陣對敵者的士氣與所能采行戰術甚至戰事勝敗都不無影響，也都值得史家分頭深入探討。本文將參戰的全部法國船艦和當時的艦長姓名及到任日期一一整理列出，再依艦種擇要說明，無非期望能填補近兩甲子以來在研究清法戰爭涉及海軍史料方面的些許空白。 礙於篇幅與時限，只能先討論與台灣戰場較有密切關連或對戰局整體影響較大的代表性軍艦，遺漏的和次要的且留待他日另文補述。

後記

繼〈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 座艦〉[86]、〈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87]，本文爲一系列探討甲申、甲午海軍史實的第三篇報告[88]。 謄稿期間，得海軍歷史中心 (U.S. Naval Historical Center)、美國海軍官校(U.S. Naval Academy / Nimitz Library)、國會圖書館 (U.S. Library of Congress)、及馬利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McKeldin Library) 諸多方便，謹此申謝。 圖 2 、圖 4 以往已有少數西文史書轉載，卻罕有人探索攝影者身份，更從未根據地況、地物及海軍史料來考證、推敲圖片背景， 因此未能詳細交代圖片與清法戰爭的種種直接關聯；讀者也因而不知其珍貴。 (圖 3、圖 10 亦然。) 清法戰爭距今一百二十年，史料、史蹟泯滅的情形已經很嚴重。有感於此，工暇在華府遍訪各圖書館和海軍舊船廠，搜尋、玩索晚清海軍史料，仿佛在尋寶。詮釋軍艦圖片時，也難免有若解析出土化石。 本文所述僅代表個人觀點，與任何政府機構或學校無涉。

附錄一：1881-1886 年間法國駐亞船艦編制的變遷

1881-1882 年法國駐亞軍艦

太平洋海軍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Ocean Pacifique): Triomphante (Brossard de Corbigny 少將, 801017) Eclaireur，Hugon，Limier 。

+ 大溪地兵站 (Station Locale de Tahiti) Vire，Guichen，Beaumanoir，Orehena，Aorai，Taravao，Nu-Hiva 。

清國、日本海域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 Victorieuse (CA Meyer, 820119) Champlain，Villars，Kersaint，Lutin 。

---

86 《台灣風物 》,52 卷 4 期，頁 9-37 (2002 年 12 月) 。

87 美國亞洲學會中國軍事史分會 2004 年年會(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5 月 24 日) 講稿。

88 其他章節題爲 [1] 清法、清日交戰時造訪淡水的中立國軍艦，[2] 清法戰後赴臺掃墓的法國軍艦，[3] 甲申、甲午參戰艦艇圖片判讀問題舉隅， [4] 評介日軍《清佛海戰記略》，[5] 清法戰爭中立國馬尾觀戰記錄的比較，[6] 孤拔與劉璈的諜報交鋒，[7] 探討東鄉平八郎大佐對訪日清艦水兵晾衣方式的評論， [8] 美國海軍情報官沈威廉中尉所見的甲午戰爭， [9]“定遠” 、 “鎮遠”的姊妹艦 －主砲斜置 (*En Èchelon*) 的列國鐵甲艦。

南圻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a Cochinchine)　Tilsitt (CV Riviere ,　811119)　Hamelin，Parseval，Antilope，Drac，Surprise，Harpon，Sagaie，Yatagan，Mousqueton，Javeline，Hache，Fanfare，Leopard，Carabine，Massue 。

1882-1883 年法國駐亞軍艦

太平洋海軍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Ocean Pacifique): Montcalm (CA Landolfe, 821114) Eclaireur，Kerguelen，Limier，Hugon。

+ 大溪地兵站　(Station Locale de Tahiti) Vire，Volage，Guichen，Orohena，Aorai，Tarava，Nu-Hiva 。

清國、日本海域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 Victorieuse (CA Meyer, 820119)　Villars，Volta，Kersaint，Lutin 。

南圻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a Cochinchine)　Pluvier (CV Riviere, 811119, command ship since 820901)　Hamelin，Parseval，Drac，Alouette, Surprise, Fanfare, Leopard, Éclair, Trombe, Framee, Yatagan, Javeline, Hache, Carabine, Massue 。

1883-1884 年法國駐亞軍艦

太平洋海軍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Ocean Pacifique): Montcalm (CAFranquet, 840113) Eclaireur, Kerguelen, Dayot, Limier 。

+ 大溪地兵站　(Station Locale de Tahiti) Vire, Volage, Orohena, Aorai, Taravao, Nu-Hiva 。

清國、日本海域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 La Galissonniere (CA Lespes ,　831224)　Triomphante, Duguay Trouin, Villars, d'Estaing, Volta, Lutin, Victorieuse, Tourville 。

北圻支隊　(Division Navale du Tonkin)　Bayard (CA Courbet , 830415) Atalante, Chateau-Renaud, Kersaint, Parseval, Drac, Hamelin, Lynx, Vipere, Saone, Aspic, Torpilleur No.45, 46。

+ 北圻分隊　(Flottilie du Tonkin)　Pluvier (CF Morel-Beaulieu, 830715) ,Leopard, Fanfare, Surprise, Hache, Carabine, Massue, Yatagan, Trombe, Éclair, Mousqueton, Javeline 。

+ 南圻分隊　(Flottilie du Cochinchine) Alouette, Framee, Escopette, Coutelas 。

1884-1885 年法國駐亞軍艦

遠東艦隊 (Escadre de l'Extreme-Orient) Bayard (VA Courbet , 840301)，　La Galissonniere (CA Lespes ,　831224)，　**Turenne (CA Rieunier,　850219)** Triomphante**,** Atalante, Duguay Trouin, Villars, d'Estaing, Laperouse, Nielly, Magon, Primauguest, Roland, Champlain, Chateau-Renault, Eclaireur, Rigault-de-Genouily, Kerguelen, Volta, Duchaffaut, Saone, Lutin, Vipère, Lynx, Comete, Sagittaire, Aspic, Jaguar, Annamite, Tonkin, Chateau-Yquem, Torpilleur No.45, 46 。

太平洋海軍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Ocean Pacifique) Reine-Blanche (CA Franquet, 840113), Dayot**,** Bourayne 。

北圻支隊　(Division Navale du Tonkin)　Kep (CV De la Bonniniere de Beaumont, 850224)

Hamelin, Hugon, Parseval, Chasseur, Pluvier, Nagotna, Nievre, Drac, Fanfare, Lionne, Lion, Leopard, Hyene, Surprise, Arquebuse, Alerte, Avalanche, Mutine, Rafale, Carabine, Hache, Javeline, Massue, Bourrasque, Yatagan, Mitrailleuse, Revolver, Éclair, Tromb, Berthe-de-Villers, Carreau, Garnier, Henri-Riviere, Jacquin, Moulun, Adour 。

1885-1886 年法國駐亞軍艦

遠東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Extreme Orient) Turenne (CA Rieunier, 851201) Primauguet, Roland, La Clocheterie, Decrès, Vipère, Sagittaire, Aspic 。

太平洋海軍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 l'Ocean Pacifique) Duquesne (CA Mond de Saint-Hilaire, 851202) (Chief of Staff: CV F.E. Fournier, 851015) Magon, Fabert, Bourayne 。

北圻支隊 (Division Navale du Tonkin) Kep (CV De la Bonniniere de Beaumont, 850224) Hugon, Chasseur, Brandon, Pluvier, Nagotna, Nievre, Comete, Lionne, Lion, Lutin, Leopard, Hyene, Arquebuse, Alerte, Avalanche,Bourasque, Casse-Tete, Estoc, Mutine, Rafale, Carabine, Mousqueton, Massue, Mitraileuse, Revolver, Éclair, Tromb, Berthe-de-Villers, Garnier, Henri-Riviere, Jacquin, Moulun, Adour, Bobillot, Cuvellier, Doucet, Levrard, Raynaud, Rollandes 。

附錄二：淡水戰事(1884 年 10 月 2-8 日) 法艦動態

1884 年 9 月 29 日, 孤拔乘巡洋戰艦 "八野", 率砲艦 Lutin 護送三艘運輸艦 Nive、Tarn、Drac 自馬祖抵達基隆。當時港內有運輸艦 Saône、情報艦 Parseval、二等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一等巡洋艦 Duguay Trouin、及砲艦 Aspic。孤拔於馬祖已經擬就攻擊淡水計劃, 交給利士比執行。同日利士比率巡洋戰艦 "凱旋"、"加里松涅" 與一等巡洋艦 d'Estaing 赴淡水。巡洋戰艦 Atalante、三等巡洋艦 Volta、與砲艦 Lynx 則留守馬祖澳。10 月 1 日, "凱旋" 等 3 艦抵淡水, 與砲艦 Vipère 會合。利士比以旗號通知英艦 Cockchafer 次日將有戰事。這天孤拔攻陷基隆砲台, 劉銘傳倉惶退守臺北。 10 月 2 日, 利士比所率法艦與清軍滬尾堡壘相互砲擊。 英艦 Cockchafer 自淡水海關碼頭移泊上游鼻仔頭[89]。 利士比派巡洋艦 d'Estaing 赴基隆請援。孤拔乃增派巡洋艦 Château Renault、"獨貴土音" 及武裝運輸艦 Tarn, 夥同 d'Estaing 前往淡水。 10 月 5 日, 日艦 "天城" 自香港抵淡水觀戰。 同日黃昏, 法援軍抵淡水。 以天候不佳, 6、7 兩日無戰事。10 月 7 日, "天城" 駛抵基隆拜訪孤拔。10 月 8 日, 法艦 7 艘掩護編成 5 個連的 600 名水兵登陸淡水海濱, 由 Château Renault 艦長 Boulineau 指揮。如圖 10 所示, 沿淡水沙崙海岸、自南而北法艦依次爲 "加里松涅" (利士比旗艦, 鐵甲艦)[90]、"獨貴土音" (一等巡洋艦, 圖 2) 、"凱旋" (鐵甲艦) 、Tarn (武

[89] John Dodd ,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during the Frano-Chinese war, 1884-1885** 》, (Hong Kong, 1888), 页 25-58。

[90] 10 月 2 日法艦砲擊淡水時, "加里松涅" 亦在最南方, 距河口最近。當日滬尾街內、外僑區、及上游鼻仔頭等河邊住宅區所受流彈極可能發自 " 加里松涅 ", 以其射界恰與河岸平行, 稍有俯仰則射程丕變、殃及上游矣。

裝運輸艦) 、d'Estaing (一等巡洋艦, 圖 5) 、Château Renault (二等巡洋艦, 圖 6)。 砲艦 Vipère 原在淡水河口，其後移到更北方的公司田溪口外，掩護法兵撤退。 湘軍出身的清國署福建陸路提督、漳州鎮總兵孫開華率軍迎擊法軍於滬尾中崙。 法軍陣亡 17 名, 傷 49 名[91], 登陸的法軍倉皇退回軍艦。 奉令赴台觀戰卻在淡水辱命的日軍 "天城" 艦長東鄉平八郎少佐、陸軍大尉山根武亮由孤拔派員陪同, 在基隆考察清軍砲台築造法及備砲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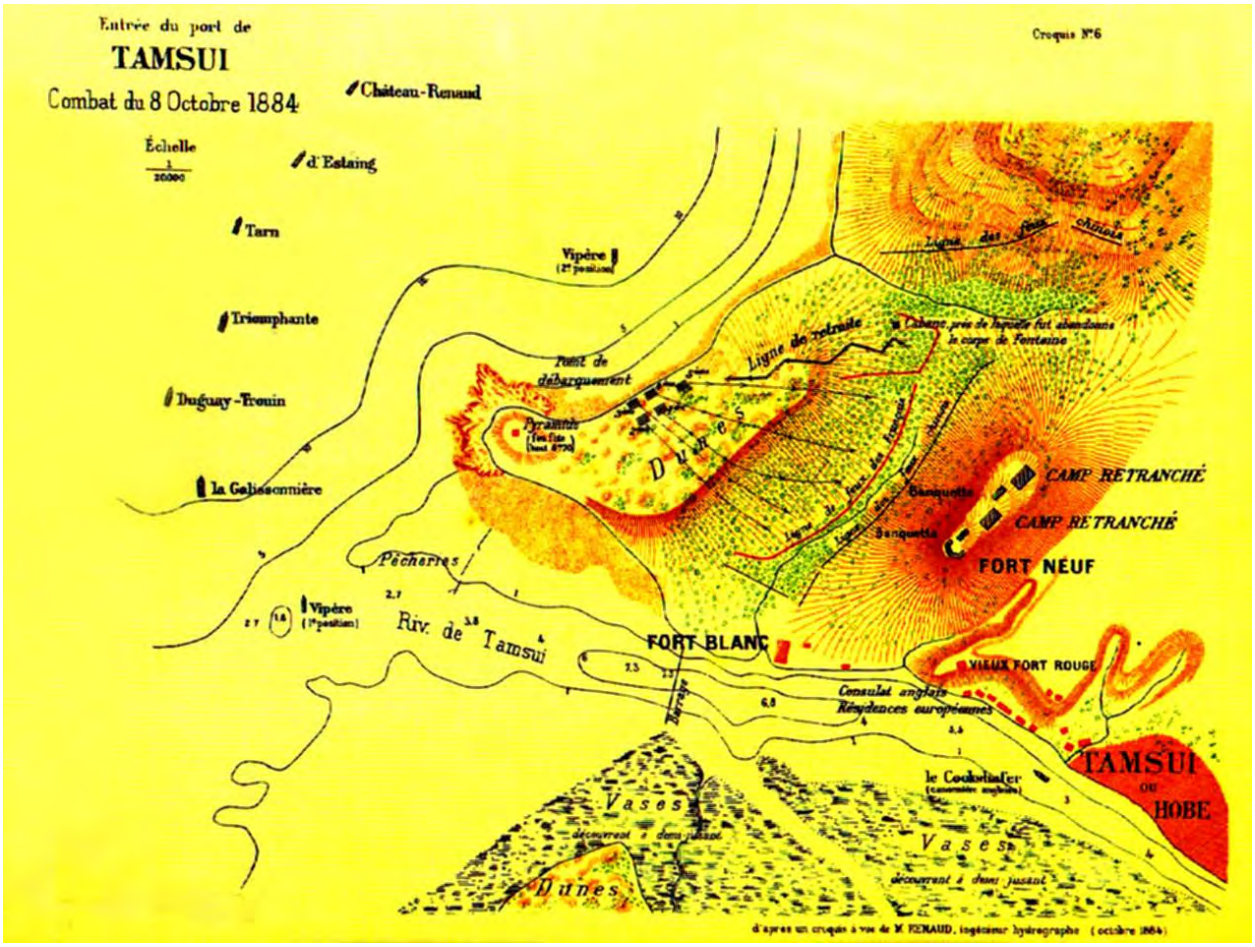


圖 10。 淡水登陸戰地圖。 駐台非洲兵團 E. Garnot 步兵上尉在水文工程師 M. Renaud[92]所測航道圖添加軍艦泊位而成，收於 Garnot 所著的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 (1894) ，圖 6。

淡水戰役爲臺灣四百年來守方擊退外敵之首次, 於政治、歷史、軍事角度觀之均甚有意義。 滬尾居民迄今每年猶爲陣亡的清、法軍弔祭[93]。 當時外僑和士著對孫開華治軍嚴明、英勇善戰都有

---

91 "加里松涅" 9 死 9 傷, "凱旋" 4 死 17 傷，d'Estaing 2 死，Tarn 2 死，Château Renault 7 傷, "獨貴土音" 4 傷, "八野" 3 傷。參看 Loir, 《**L'esc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頁 204 。 該役法軍陣亡者最高階爲上尉, 即華文資料「三圈官」或「三畫官」。

92 Marie Joseph Auguste Renaud, 1854 年 9 月 30 日生，1873 年 11 月 1 日考取 élève de l'École polytechnique、1875 年 10 月 1 日升 élève 階、1877 年 10 月 1 日升 Sous ingénieur de 3^{e} classe、1879 年 10 月 2 日升 Sous ingénieur de 1re classe。爲法軍駐北圻最高階水文測量師。水文測量師員額有限，絕大多數都在巴黎服勤。l'École polytechnique 即孤拔母校，見註 6。

93 周明德,〈秋天裡的戰爭 – 光緒中法之役「滬尾血戰」史話〉 《海天雜文》(臺北: 板橋, 1994), 頁 89-117。

極高評價，遠非在基隆棄甲卸兵、望風逃竄的劉銘傳所能及[94]。

[94] 孫開華在淡水擊敗登陸法軍之前一星期，孤拔在基隆督軍登陸仙洞山、毀仙洞砲臺。 劉銘傳急撤曹志忠部至水返腳(汐止)，自己則以台北空虛爲由，從基隆退守板橋，劉氏手下和基隆官紳咸不以爲然。戰後台灣建省，劉氏實授台灣巡撫，建設北臺的貢獻不容抹煞。然而終清法之役，劉氏除了毀壞八斗子煤井、略有壯士斷腕的氣魄，其他時刻若非請械、請餉，即專與在臺同僚(湘軍)鬥氣，並無赫赫戰功可言，與戍守淡水的孫開華相形見絀。 比較含蓄的說法是劉氏自基隆撤軍，可能是受了不解軍務的滬尾營務處李彤恩三度飛書告急所誤導。戰後清廷將李彤恩驅逐回籍，處置也算合宜。劉銘傳卻一再上奏貶孫揚李，語多不實。 這是光緒年間淮軍體系日漸得勢時，極力排斥湘軍殘餘勢力的眾多事例之一。 劉銘傳對湘軍出身、戰時鎮守台灣南部的劉璈更不夠厚道。 似乎當時劉銘傳不單領軍已經遠不如早年與太平天國或捻軍作戰之時，爲人也不無可議之處。

Admiral Courbet's Cruisers, Gunboats, and Spar Torpedo Boats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1884-1885

Rongsong Jih *

Long before the Sino-French War (1884-1885) broke out, there had been regio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local "Black Flag" units (黑旗軍) and the French Tonkin expeditionary forces dispatched from the Cochinchina. Two French commanders, Frances Garnier and Henri Riviere, were killed by LIU Yongfu (劉永福), the leader of the "Black Flag", in 1873 and 1883, respectively. The conflicts could no longer be confined in Tonkin when the French Government mis-perceived the *Bac Lé* (北黎) incident as a concrete proof that the Manchu Chinese Government in Beijing had no intention to honor the terms outlined in the *Tiantsin Convention* (天津簡約) of May 1884. As the war escalated and gradually propagated from Tonkin to Keelung (基隆，northeastern Taiwan), Mawei (馬尾，on River Min of Fujian), Tamsui (淡水，northwestern Taiwan), Shipoo (石浦) and Zhenhai (鎮海) (Zhejiang) and the Pescadores Islands (澎湖) off Taiwan (Formosa), the French Navy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men-of-war dispatched to Asia, in order to reinforce Vice Admiral Courbet's "Far East Fleet" *(Escadre de l'Éxtême-Orient).* Though certainly no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and same place, there were in total 50 warships at his disposal, including 5 "station battleship"-type ironclads, 20 cruisers – large and small, 9 gunboats, 12 transports, and 4 torpedo boats. The size of his fleet actually exceeded that of the home fleet *(Escadre d'Évolutions),* when other naval units in various French colonies of the time were either called "naval division" (*division navale*) or "local station" *(station locale).* Courbet was the only one who had ever been awarded the title of a "fleet" commander-in-chief. Two months after his death on Pescadores Islands, the "Far East Fleet" was downgraded to the "Far East Division".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materials (photos, books, etc) available at several naval facilities and libraries in the eastern U.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rench cruisers, gunboats, and the spar torpedo boats that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Sino-French War. Detailed interpretations are given to a couple of precious photos of Chinese and French warships standing off at the Pagoda Anchorage off Mawei that were taken by a young U.S. naval officer on-site just a week or two prior to the naval battle of 23 August 1884. Also worth noting is that Admiral Courbet commanded three successful attacks with standard and auxiliary spar torpedoe boats at Mawei and Shipoo; sinking or seriously damaging Chinese men-of-war "Yang Wu" (揚武, 1608-ton), "Fu Hsing" (福星, 515-ton), and "Yu-Yuan" (馭遠, 2630-ton). This was unprecedented in the East Asia.

Keywords: Sino-French War (1884-1885), Formosa (Taiwan), French Navy, Cruiser, Gunboat, Spar Torpedo.

---

* Member of *[U.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pecializing the19th-century Asiatic naval history.

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

Rongsong JIH (紀榮松)

一。前言
二。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船艦概說
三。孤拔艦隊的巡洋艦
1。概說
2。鐵殼巡洋艦“獨貴土音”
3。巡洋艦“獨貴土音”與馬尾戰事
4 。三等巡洋艦 Volta
5。一等巡洋艦 d’Estaing 與 Villars
6。二等巡洋艦 Chateaurenault
7 。二等巡洋艦 Champlain
四。孤拔艦隊的砲艦
五。孤拔艦隊的水雷艇
六。討論與結語
附錄一。1881-1886 法國駐亞船艦編制的變遷
附錄二。淡水戰事(1884 年 10 月 2-8 日) 法艦動態

法國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

略談法軍在福爾摩沙的生活（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白詩薇（Sylvie PASQUET）[1]

壹、前言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即《中法和約》）在天津正式簽訂。清法戰爭結束後，有幾部由參戰的法國軍官撰寫的著作相繼問世。這些著作除了對作戰計劃和軍事行動作詳細的敘述以外，還強調由孤拔（Amédée Anatole Prosper COURBET）海軍中將率領的法國軍隊在福爾摩沙的艱苦的生活。[2]本文即藉由 Paul BRIERE 助理海軍軍需官、Émile Charles Eutrope DUBOC 海軍上尉、Eugène Germain GARNOT 步兵上尉、Maurice LOIR 海軍上尉、Paul THIRION 海軍陸戰隊營長等軍官的觀點，試圖對法軍的「日常生活」有進一步的了解。[3]主要有四個方面：一、與惡劣的天氣作鬥爭；二、糧食補給；三、衛生狀況；四、法軍與當地居民的接觸。

這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內容相互補充，當然也難免會有重復之處（例如，Eugène Germain GARNOT 多次引用 Maurice LOIR 的記載）。此外，孤拔的一名少年水手在法國

---

[1]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近代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France ）研究員。

[2] 孤拔常被尊稱為「海軍上將」，實際上，他的軍銜是海軍中將。在當時法文資料中，沒有「臺灣」字樣，福爾摩沙（Formose）的居民稱作「中國人」（Chinois）或「天朝人」（Célestiaux）。

[3] BRIERE Paul，〈 Le *Volta* en Chine et au Tonkin (1883-1885)〉（「Volta」號在中國和東京〔一八八三～一八八五〕），《Revue maritime et coloniale》（海洋與殖民雜誌），124 卷（巴黎：海軍暨殖民地部，1895 年 1 月出版），頁 66–109； 124 卷（1895 年 3 月出版），頁 477–528；這篇文章獲得了由《海洋與殖民雜誌》頒發的金質獎章。DUBOC Émile Charles Eutrope，《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中國與東京之役三十五個月）（巴黎： Charavay，1899 年出版）。GARNOT Eugène Germain，《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avec atlas》（巴黎：Ch. Delagrave，1894 年出版）；中譯文：卡爾諾撰，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附地圖集》（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0 年出版）；作者於一八八五年一月才抵臺。LOIR Maurice，《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孤拔海軍上將的艦隊——札記與回憶）（巴黎：1894 年出版〔巴黎：Berger-Levrault，1886 年初版〕）。THIRION Paul，《L'expédition de Formose, souvenirs de Formose, souvenirs d'un soldat》（遠征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的回憶，一個士兵的回憶）（巴黎：Henri Charles-Lavauzelle，1897 年出版）。上述著作既然代表法國觀點，文字和圖片不免反映出當時的殖民思想，這種殖民思想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

[4]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臺灣史料叢刊第 6 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年出版）。石岱（FERRERO Stéphane）、帥仕婷譯，《當 Jean 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一八八四～一八八五）》（臺北：玉山社，2003 年出版）。小水手的名字是 Jean，只知道他的姓以「L」開頭；他參戰時的年紀應該不會超過十五歲。

《地球畫報》（La Terre illustrée）從一八九０年十月到一八九一年五月間陸續刊載的書信生動地描繪戰爭的各個方面，與軍官筆下的敘述相呼應。小水手寫給他的母親和一位朋友的書信，文筆不講究，但直率風趣，在形式上有別於軍官的「正式」著作。[4]

「日常生活」，聽起來或許有一點「逸事」（anecdote）的味道，但我們不要忘記，逸事在歷史中深深地紮下了根。所以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在其名著《路易十四世的世紀》（Le Siècle de Louis XIV）裏給「逸事」一詞下了這樣的定義：「是一個在歷史豐收之後還有麥穗可拾的狹窄的田地。」[5]

貳、與惡劣的天氣作鬥爭

一八八四年六月，法國政府和清廷因爲安南的屬地歸屬問題而發生爭端。法國政府向清廷索取賠款遭到拒絕後，內閣總理茹費理（Jules FERRY）決定佔領臺灣。他之所以選擇臺灣當做擔保品，主要是因爲考慮到臺灣「最容易守，守起來又是最不費錢的擔保品」，還有，基隆附近有豐富的煤礦，可以爲法艦供應燃料煤（實際上，佔領煤礦的計劃未能實現）。同年九月以後，基隆、淡水及澎湖陸續成爲清法海戰在臺灣的主要戰場。[6]

Paul BRIERE 是三等巡洋艦「Volta」號的助理海軍軍需官（圖一）[7]。他早在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到基隆港時的心情是這樣的：

> 法國分艦隊的艦艇很少停泊在福爾摩沙港內，因爲我們與這座島毫無利益關係；因此，這個目的地激起了我們的極大好奇心。……軍官上了岸，要去〔基隆〕城附近遊覽；景色看起來美極了，他們都急著要看一眼；但在防守航道的炮臺近處，他們成爲當地駐軍部隊謾罵的目標，有的兵舉槍瞄準他們，有的兵刺激幾隻狗向他們衝去……。[8]

Eugène Germain GARNOT 寫道：

> 〔一八八四年〕九月三十日早晨醒來便欣賞到基隆的嵯峨崖壁。長滿熱帶植物的峻嶺圍繞著海港；這即是以後在悠長的歲月中要消耗那樣多徒勞的努力，那樣多獻身的勇武的那片奇怪而又神秘的土地，而且這片土地以後會要成爲那樣多勇士的墳墓！[9]

當法軍面對陌生環境的同時，尚要面對基隆海面狂風豪雨之隨時來侵襲的威脅。法艦有因風暴而隨時駛離拋錨處的準備：

〔一八八四年〕十月十四日，突然而猛烈的一陣風告訴我們季風的季節已經到了。在基隆港，「Bayard」號有三條錨鏈斷掉；在淡水，「Triomphante」號走錨，差點撞上「Duguay-Trouin」號。第二天，軍艦都被迫駛離錨地。有一天在開航時，絞盤在縱搖中往上移動，致使一人死亡、數人受傷。[10]

---

5 《路易十四世的世紀》於一七五一年出版。

6 白詩薇，〈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一八八四年）〉，淡江大學歷史系主編，《二００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 年出版），頁 8。另可參見楊家駱主編，《中法戰爭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

7 圖一來源：法國國家海軍博物館。

8 BRIERE，頁 94。

9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41。

10 LOIR，頁 181。

法艦不得不到澎湖或其他地方躲避暴風的襲擊，這樣往返航行非常危險。東北季風最猛烈的時候，一個禮拜內就有好幾天軍艦有可能遇險，[11]勞累過度的輪機兵每十分鐘都要給鍋爐放水，錨鏈被大風浪颳斷的消息頻傳。[12]失掉的錨爲數不少，非要從法國運來備用錨 ——福爾摩沙海岸被稱爲「錨的陵墓」，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時，在香港的英國軍官不忘打賭：「有幾艘法艦會在狂風惡浪中遭難？」

同自然界的暴力作鬥爭，導致法軍消耗了不少精力。在氣候不佳的季節裡，遠征軍遭受苦難，得病的士兵特別多，使後勤補給遭到極大困難：

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份內，雨繼續不斷地落著，在超出一切預期地延長著這番佔領的期間，壕塹汎濫著，小徑變成了溪流，使得一切補給工作達到極端困難的地步。

我軍在這「悲慘堡壘」的駐屯實在可憐到了極點。這落不完的雨水像冰塊的尖鋒一樣打著人的臉孔，它常使人們費盡氣力燃起來的火熄掉，並將宿營的地方變成一片泥塘。在這番雨水之下，兵士們都臥在一尺深的泥漿裡面。污穢不堪的制服，再也分別不出顏色了。[13]

總之，法軍要面對「能想像得出的最惡劣的氣候。」[14]

參、糧食補給

孤拔海軍中將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基隆港灣成爲補給中心，由軍需官來組織（所以對「日常生活」的描寫以基隆爲主）。在那裏安放了兩個提供飲用水的蒸餾裝置和幾個麵包烤爐。法軍在「Palm」島（社寮島，即今和平島，是基隆港進出的門戶）上設置了煤倉庫，由來自香港的輪船供煤；倉庫附近有約十二個當做庫房用的臨時木棚，還有存放鐵錨的庫場。[15]

一個定居香港的法國商人帶來了一艘船的貨物，準備販賣各種食物，但要價實在太高，士兵真的買不起。[16]孤拔的小水手買幾根甘草和一盒火柴時被這個雜貨商欺騙，他很生氣地說：

> 你想想，我們在這裡盡忠職守，受盡了（可以不用吹噓地說）疲勞、煩惱、痛苦的時候，卻有人千方百計地欺騙我們，利用我們。這些人是什麼人呢？中國人？易洛魁人？猴子？哼！一點也不是……他們是法國人！真令人作嘔。[17]

一些商人的動機不單純：

一個名叫 MARTY 的、在香港的法國商人，帶著種種色色的罐頭食品跑來基隆開設店鋪。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也同樣跑來開店；可是，被我們懷疑和敵人有著關係，他們不久便被驅逐出境了。[18]

最初，因爲當地居民不敢賣食物給法國人，漁民也不敢捕魚，所以士兵吃新鮮食物的機會不多。這也是他們身體虛弱，甚至生病的一個重要原因。法軍認爲，基隆

---

11 DUBOC，頁 267。

12 LOIR，頁 181。

13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66。

14 THIRION，頁 8。

15 LOIR，頁 191。

16 LOIR，頁 191-192。

17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66。

18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47-48。MARTY，應該指上述不誠實的雜貨商，他後來破產，一八八五年一月間，由另一個商人代替。

居民很怕中國文武官，才不願意賣東西給他們（也就是說，中國官員煽起對法軍的敵意）。[19]

後來，從外面運來的新鮮食物局部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由於提督的要求，法國 Messageries maritimes 輪船公司[20]由香港往日本的定期郵船都在基隆停泊，以便將法國郵件和新鮮的食物載來。這些郵船通常只需四天便可從橫濱航抵基隆。它們載來一些活的牲口（有些小小的肥牛後來被手執武器的看守者在 A 點附近放牧），大堆大堆的獵獲物，鹿、兔、雉、家禽、雞蛋，以及在基隆絕對無法得到的一切東西。

馬鈴薯來自香港，麵粉則來自澳洲或加利福尼亞。[21]

對平常只吃罐頭食品的法軍來說，郵船每兩個禮拜運來的新鮮的蔬菜水果和雞蛋尤其重要：「給病人的份一發完，食堂總管們就把剩下留給我們的一搶而空。」[22]法國婦女聯盟送來的甜食和在中國帆船上獲得的糖果也分給野戰醫院的病人吃。[23]有趣的是，在二等巡洋艦「Châteaurenault」號上服務的廚師是中國人，他很會用有限的、無變化的食物燒出各種美味的菜，贏得大家的好評，也間接地讓法國人保持愉快的心情！[24]不過軍艦上有中國僕人，法國軍官說話要格外謹慎。[25]

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孤拔宣告封鎖福爾摩沙以後，法軍抓到不少中國帆船，獲得了很多貨物（這點足以證明地方貿易的活躍）。因爲沒有地方存放，只好把可以利用的部分——稻米、茶葉和鴉片拿到軍艦上，銀幣則送交巴黎國庫。法兵覺得奇奇怪怪的東西——各種佛像、經過雕刻的木頭、繡花的衣服和中國式的拖鞋，也不勝枚舉，害得軍需官來不及分類和編號（圖二）。[26]孤拔的小水手有趣地說：「不過，最好玩的莫過於軍需官們在整理清點這堆破布時臉上的表情！東西那麼多，他們不得不往海裡扔！」[27]

肆、衛生狀況

法國軍官下令燒毀基隆的幾個區，拆掉一些不衛生的破房子。這些破房子實際上是強盜窩（當然，也有可能是敵軍的巢穴）。開始時，法兵勉強住進簡陋的小屋（圖三）。[28]到了一八八五年一月底，兩千名援軍到齊，法軍全面佔領基隆以後，形勢有些好轉。[29]法兵把還沒有壞掉的房子弄乾淨以後，重新用石灰漿粉刷、裝飾起來，當做營房。他們還拆除他們認爲不衛生的小巷，修築用小公園點綴的大馬路。Maurice LOIR 寫道，有一位英國企業家帶來了相當多的建築材料，想要建造比中國的陋室更舒適、更衛生的磚房。[30]孤拔的小水手加以說明：

---

19 LOIR，頁 192。

20 即法國郵船公司；提督，指孤拔。

21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47。

22 DUBOC，頁 268。

23 LOIR，頁 202。

24 DUBOC，頁 272。

25 BRIERE，頁 483。

26 LOIR，頁 196。圖二來源：LOIR，頁 197。

27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8。

28 圖三來源：LOIR，頁 190。

29 一八八四年十一月間，來自東京、受過最多戰爭鍛練的九百名援軍剛到臺灣時，軍服裝備都沒有，大多數連鞋子也沒有（THIRION，頁 97）。

30 LOIR，頁 191。

> 有人考慮蓋房子，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是一位英國佬做的事，他抵達時帶了數量龐大的材料，房子就一下子被蓋起來。真的房子，石頭做的，磚砌的，樣子都很不錯……不管怎樣，總比住在中國人污穢的茅屋裡來得好。那些害我們的瘟疫之巢，害蟲之穴。我真的不知道東方人怎麼能生活在裡面而不得病，就像我們軍醫所說的，他們應該有抵抗病菌的能力。[31]

軍醫在基隆海關內設置了野戰醫院。對法國人來說，福爾摩沙是一個景色極美，但對健康有害的地方。尤其，水質不好，再加上供士兵住的木棚被污染，這都帶來了造成大量死亡的流行病——霍亂流行病。據傳，當孤拔海軍中將於一八八四年十月一日攻陷基隆時，「中國人故意沒有把死者安葬好，也沒有把傷者抬走」，[32]傷寒症、霍亂等疾病很快就蔓延開來了。三個禮拜後（即十月二十三日），孤拔便發電給法國政府：

> 兵士不服水土，多數染上傷寒症，甚至數人有虎列剌　徵候。從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日，我們損失了十一人，現有五十六名病人住入病院，其中十二名情況嚴重。直至不健康季節的終了，我將儘可能節用部隊，但此舉不免使各種工作及敵情偵察大爲延誤。[33]

還有：

> 而且健康狀態也更加惡化了。從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一日，有二十六人死亡，有二百二十名病人充塞於各病院，因而非將病院重新予以擴充不可。此外，各中隊內尚有二百六十人正在修養，不能擔任軍務。我軍全部有效實力僅爲一千一百人。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效實力更降至一千名以下。[34]

據 Paul THIRION 指出，「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軍可憐的戰士不但缺少麵包，還缺少最需要的藥物。」[35]在沒有必需的藥物的情況下，只能用硫酸鈉和海水治療熱病，用苦艾（一種植物，學名 *Artemisia absinthium* L.，可蒸餾出烈酒）治療霍亂。[36]軍醫似乎有一種迷信：「霍亂」一詞是說不得的，是忌諱的，只能說：「這個病。」[37]孤拔海軍中將每天冒著大雨到野戰醫院探望病人，還叫屬於他自己的樂隊演奏幾曲，讓病人得到娛樂和消遣。[38] Émile DUBOC 和 Paul BRIÈRE 帶著悲傷的語氣說道，每天總有由修道院院長帶頭的送殯行列沿著海灘往墓地前進。[39]一八八五年一月以後，衛生狀況才漸漸地好起來。但是，總括起來，死於霍亂、痢疾、熱病的士兵非常多，甚至比陣亡者還要多。幾乎三個士兵當中就有一個染上霍亂。[40]

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就是《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簽訂後兩天），率領法國遠東艦隊的孤拔海軍中將在停泊澎湖馬公港的旗艦「Bayard」號上病死（圖四）。[41]他有沒有感染霍亂？對他的死因有一些爭論。一八八五年四月間，孤拔患上嚴重的肝病，痢疾發作，所以吃不下罐頭食品。臨死前，他只能喝幾杯使他暫時恢復活力的咖

---

31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65。

32 FARRERE Claude，《L'amiral Courbet, vainqueur des mers de Chine》（孤拔海軍上將——中國海之戰勝者）（巴黎：Éditions françaises d'Amsterdam，1953 年出版），頁 175。

33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38。虎列剌，即霍亂。

34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49。

35 THIRION，頁 8。

36 THIRION，頁 95。

37 DUBOC，頁 185。

38 LOIR，頁 186。

39 DUBOC，頁 267；BRIERE，頁 514。

40 THIRION，頁 8。

41 圖四來源：FARRERE，扉頁畫。

啡和一種用橙花調配的飲料。[42]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Paul BRIERE 接受法國《新電訊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實際上，我自己認爲——當時，大家也是這麼認爲的，他死於霍亂。這種病對我們的部隊和海軍士兵造成的創傷比中國的炮彈還要嚴重。」[43]

伍、法軍和當地居民的接觸

Eugène Germain GARNOT 將基隆居民對法軍的態度的轉變作如下分析：

當佔領之初，當地居民由於我們的態度而安心起來，大家都留在市內，專心從事日常的工作，甚至還和我們的兵士發生某種程度的睦誼。可是不久，居民們服從著中國官吏的命令，從我們四周撤退，他們帶走了最貴重的東西，去和敵兵合在一塊加入那快要開始的殘酷的戰爭。市街不久便被完全拋棄，白天只看到我軍攜著武器的雜役從屋架上搜取生火的薪柴，夜晚則只有敵人的游擊隊進出，企圖襲擊我們的步哨。那些半毀的店鋪從洞穿的板壁內伸出那些一度引起我們兵士的興趣而隨後卻被用足跟搗碎了的傢具。家庭用具、塗釉的陶器、形狀奇特的漆器、竹製的靠椅、寫著金字的長招牌、佛像的殘肢斷胴、用動物大腸製成的各種顏色的燈籠、商人的帳簿等等，充斥著街路，被行人們踐踏著。[44]

不作戰的時候，法兵很少離開宿營地；因有特別需要而離開宿營地，也得小心不要中「野蠻殘暴的敵人」的圈套。當地居民都知道，每次砍法國人的頭可以領取五十銀兩的獎金（約值三百五十法郎），因此他們想盡辦法設下陷阱。有一次，在荒無人煙的基隆，巡邏隊看到四個流浪街頭的中國婦女，看起來很健康，一經檢查就發現她們患有可怕的傳染病，當晚就把她們給槍斃了。[45]據 Maurice LOIR 的記載（應該指同一件事情），三個流浪街頭的中國女人被抓的時候，不掩飾自己的任務是挑逗法兵，引誘他們進入不三不四的房子裏，目的是要殺他們，這三個女人毫不留情地被槍斃。[46]孤拔的小水手對此事有更具體的說明：

> 你知道水手並不是都有美德，當然囉！有些時候也跟別人一樣會被一張漂亮的小臉蛋吸引過去。

中國人知道這個，他們想利用這種風流的毛病來作爲他們卑鄙的報復手段，於是跑到醫院找些爛到不可再爛的女人，然後把她們放在基隆的街上，誰要是被她們的媚眼勾引到，誰就倒霉！中了毒之後就會在難以忍受的痛苦中死去。無論如何，要是我們跟著她們去，就會跟雞的下場一樣，被誘到一間破屋裡面，不會活著出來。有一天，我們逮到她們其中的三個討厭鬼，因爲她們犯了蓄意謀殺罪，我們就把她們給槍斃了。[47]

實際上，可疑的或走錯路太靠近法國人的「天朝人」，只要被發現就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

[42] 《L'amiral Courbet》（孤拔海軍上將）（Abbeville：A. Retaux，1885 年出版），頁 73。作者為「孤拔家裏的朋友」，姓名不詳。

[43] KERVIL Jean，〈Cinquante ans après... Le commissaire Brière, compagnon d'armes de l'amiral Courbet, nous parle de son chef〉（五十年後——孤拔海軍上將的戰友 Brière 軍需官給我們談到他的長官），《La Nouvelle Dépêche》（新電訊報），1935 年 6 月 15 日出版，1 版（巴黎）。

[44]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35。

[45] DUBOC，頁 268。

[46] LOIR，頁 193。

[47]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6。

一個穿紅色衣服的中國女人向一個兵士賣雞蛋、蔬菜和魚，賣了十天以後，這個兵士以為，跟著她到一小茅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食物，結果他被殺。同樣的，一個勤務兵正在買一隻雞的時候，中國人向他示意房子裏面還有更多的雞，把勤務兵的頭砍下來以後，向中國軍官索取獎金（圖五）。[48]我們可以想像，艱苦的日子使得有些法兵不顧個人安危去買吃的東西。敵人甚至會趁黑夜鑽進法國在基隆的墓地去掘出死屍，將死人的頭砍斷；法軍不得不派人守護墳墓（圖六）。[49]

一八八四年十月八日，法軍佔領淡水失敗後就發生把斬獲法人的首級高懸於竹竿上示眾的事情。中文資料〈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淡水戰事詳述〉對這件事作如下描述：

> 有人在林中見有法兵數名，潛匿期間；即執而殺之以領賞。……是日，奏凱回營，時近黃昏，故敵軍死者未暇檢點。有喜事者，將法兵首級懸於馬祖廟前樹間，以示得意；而法船則懸白旗以示哀。我軍兵勇於獻俘後，各持所獲賞銀，欣欣相謂曰「此法人首級也」！相視而笑。……土勇於奏凱之後，將法人之屍，或肢解之，或臠分之；或飲其血，或啜其腦。且有破法屍之腹，出肝腑以示人者。旁觀不覺齒爲之冷、身爲之慄，而彼乃怡怡自得，恬不知怪。蓋土勇多是熟番，當其未歸教之先，與生番無異；食生飲血，視爲固然，故不以爲異也。聞英國駐是處領事見土勇所爲，似屬殘忍過甚，不覺動其惻隱之心，特照會孫軍門，[50]請嚴禁土勇戕屍；未悉孫軍門如何辦理也。
>
> 以上皆友人信息，言之鑿鑿；故泚筆錄之，以當露布之傳。[51]

據淡水英國茶商陶德（John Todd），外國人對斬首示眾行為提出抗議：「孫將軍承諾不再讓這種事發生，並立即下令埋葬首級。」[52]

如上面所說的那樣，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孤拔宣告封鎖福爾摩沙以後，法兵抓的中國帆船很多。開始時，帆船上的人被俘獲。這些用來搬運作戰裝備和軍糧的俘虜，確實幫助了缺乏人手的法軍——尤其是在泥濘不堪的山路上。他們「像牛馬一樣地幹活，可以說，他們代替了後來才到的騾子」（圖七）。[53]不過，俘虜越多，對法軍安全構成的威脅越大，用來監視他們的部隊也越多。到了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孤拔下令把他們「這些又髒又不給人好感的傢伙」送往香港附近的島嶼。[54]

一八八五年二月以後，中國舢舨恢復安心地穿梭基隆港，運來魚、雞等食物。有些居民也回到基隆城內，似乎不再畏懼中國官吏了。[55]「他們只是想做點生意的商人。現在已沒有砍不砍頭的問題，買西瓜時，可以不用把頸子留下來。」[56]

---

[48] 圖五來源：Loir，頁 192。

[49] Briere，頁 514；Loir，頁 192。圖六來源：Duboc，頁 269。

[50] 即駐守滬尾陸軍提督孫開華（湘系）。見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蹟考〉，《臺灣文獻》，36 卷， 3、4 期合刊（1985 年出版），頁 239-256。 滬尾，即淡水。

[51] 林呈蓉主編，〈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淡水戰事詳述〉《臺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編譯出版中心，2001 年出版），頁 324-325。

[52] 陳政三譯述，《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臺灣歷史譯叢 03，臺北：原民文化，2002 年出版），頁 61。原著《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於 1888 年出版。〈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淡水戰事詳述〉中所提「將法人之屍……或飲其血，或啜其腦」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是否全部屬實？陳政三也注意到了：「陶德在本書篇末〈北臺樟腦產地印象〉中，也有原住民啜食人腦的記載」（頁 61，註 11）。

[53] 圖七來源： Loir，頁 194。

[54] Loir，頁 194-195；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61。

[55] Loir，頁 201。

[56]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9。

陸、小結

綜合分散在法國軍官著作中對「日常生活」各個方面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嚴峻的現實持續了好幾個月，對作戰的進展情況也不無影響——那是戰爭所固有的危險和艱苦。本來，出動的兵力嚴重不足，再加上困難重重，法軍很難有效地佔領北臺和封鎖全臺。這一切大大地削弱了法國的威嚴。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國政府說：「我們在福爾摩沙不是征服者而是債主」，它認爲只要堅持下去，中國就會讓步，接受法國的條件而交付賠償金。援引的著作都強調指出：「沒有看到在福爾摩沙的海軍陸戰隊，就無法體會到這些精銳部隊非凡的英雄氣概和堅信不移的精神，他們拖著消瘦、蒼白的臉和爲疾病所折磨的身體，遭到殖民戰禍的危險」，[57]「從長官到普通士兵，法軍都堅信，他們爲著政府打仗和陣亡不會有任何實際上的收穫。」[58]字裏行間的含義，就是對法國政府的嚴厲的批評。

參戰的著名海軍軍官兼作家洛蒂（Pierre Loti）在《孤拔海軍上將的死亡》一文中感人地描寫普通士兵的心情。[59]他寫道：

> 啊！福爾摩沙島——誰敢敘述人們在那裏驚心動魄的戰事？誰敢記錄戰死當地的殉國者長長的名冊？這場戰爭在種種苦難中進行——風暴、嚴寒、酷熱、痢疾、熱病，他們卻毫無怨言；有時，他們沒有吃飯、沒有睡覺，在中國槍林彈雨下完成了某種叫人受不了的任務以後，疲乏不堪地回營，可憐的衣服被基隆永不間斷的雨水都淋透了，而他——孤拔海軍上將突然地，因爲有需要，就下令再出發。好吧！他們再次挺身而起，開赴前線，直到戰死沙場——而且是爲著沒有收穫的動機。而那個時候正爲了微不足道的選舉糾紛和家庭爭吵而忙著的法國，幾乎不曾把那漫不經心的目光轉向戰死沙場的士兵。在我國，除了水兵的家人以外，這可憐的、光榮的福爾摩沙艦隊還會妨礙誰睡覺和遊樂？（圖八）[60]

[57] Briere，頁 514。

[58] Thirion，頁 8。

[59] Loti Pierre，〈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孤拔海軍上將的死亡），《Vert et Rouge》（紅與綠），86 期（巴黎：1953 年出版），頁 31；Loir，頁 203-204。

[60] 圖八來源：Loti，頁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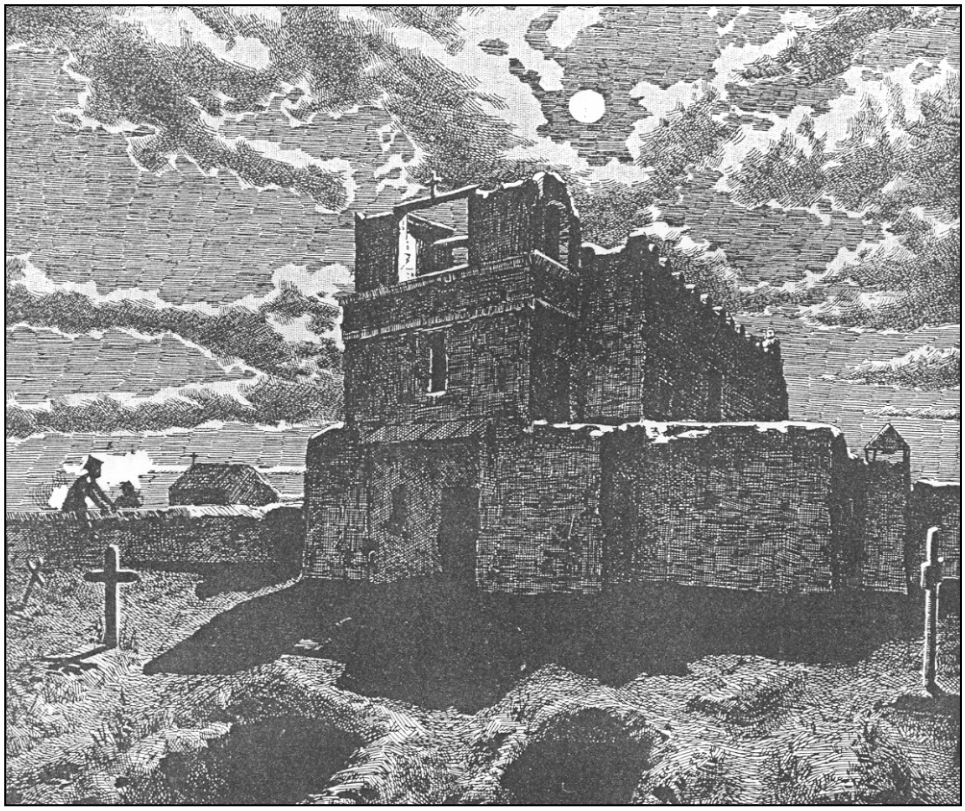
圖一　Paul BRIERE 像

圖二　抱著各種神像的法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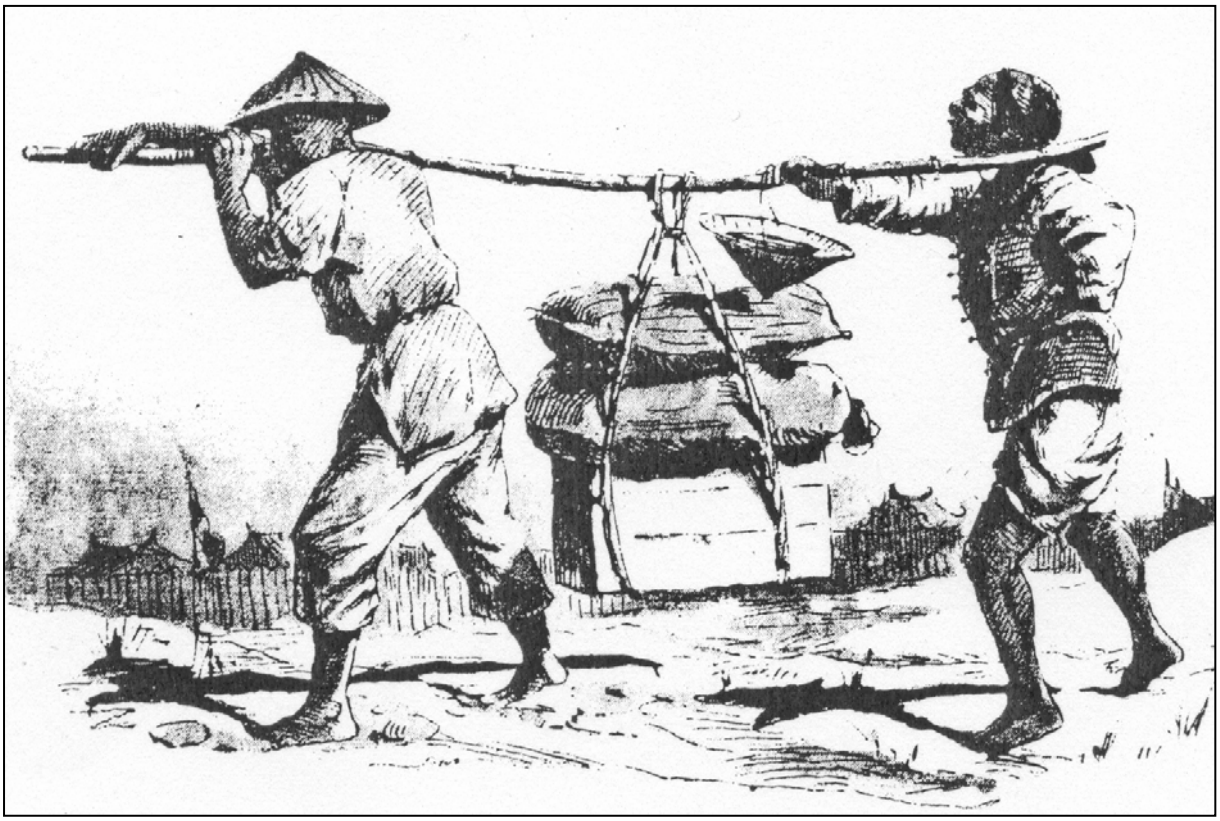
圖三　法兵在基隆「勉強住進簡陋的小屋」

圖四　孤拔海軍中將半身雕像

圖五　「此法人首級也」



圖六　趁黑夜偷挖法人墳墓



圖七　被俘的中國人幫法軍搬運糧食

圖八　旗艦「Bayard」號上的水手

-

清法戰爭基隆之役

葉振輝*

發生在 1884-1885 年清法戰爭臺澎諸戰役中，基隆之役具有：戰事期間最長、戰局最膠著、研究起來最為複雜的特色。

一、相關研究與史料

有關清法戰爭基隆之役的研究，周宗賢可能是最早的一位，他在近 20 年前，便開始研究基隆古砲臺，研究成果包括：第三級古蹟仙洞砲臺修復計畫、和基隆砲臺建置始末[1]。砲臺的研究雖與戰役有關，畢竟不是戰役的研究。

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在 1996 年 10 月 舉辦過「清法戰爭在基隆-西仔反」的紀念活動，1997 年戴寶村在該基金會的通俗性演講《由"清法戰爭"看"晚清的臺灣"》 指出當時社寮島 (和平島) 、月眉山、獅球嶺、仙洞全都併入戰場[2]。後來方雅芬在該基金會的刊物發表一篇針對基隆官煤場（清國井）的文章 [3]。方文也不是直接有關基隆戰役的研究。蘇文魁在該基金會的網站有一篇寫得極爲流暢的文章《清法戰爭在基隆》[4]，從戰爭經過講到戰爭遺蹟和相關景點 ，雖無註釋、亦無地圖，卻是具體而微的研究成果。

2003 年值清法戰役 119 周年，基隆市立文化中心舉辦了清法戰爭專題展，展品中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陳三井所提供的「上海點石齋畫報」 ,以及相關歷史照片，法國在台協會的合作與文化組長魏雅樹及組員畢永明也參加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主任許梅貞則裝扮成清朝的格格，向法國友人解說清法戰爭展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軍訓室，軍護課程二年級選修課程內容，規劃的「軍略地理」(大二下 36 小時)，希望使學生透過地略知識，結合該校週邊現地戰術，研習臺灣戰史(基隆戰役)，瞭解國防地理因素與國家戰略之關係，擴充愛鄉愛土之情操，並支持國防軍事建設之建軍備戰作爲 [6]。這是研究成果在教學上的應用。

2000 年 4 月開幕的基隆役政公園，位於清法戰爭基隆之役的陣地，可惜沒

* 高苑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1 周宗賢，陳信樟（計畫主持），《三級古蹟仙洞砲臺修復計劃》 (基隆：基隆市政府，1989 年)。周宗賢， 〈基隆砲臺建置始末〉，《淡江學報》，期 33（1994 年 3 月） ,頁 51-106。

2 http://www.ocean.org.tw/mag/006/006007.htm

3 方雅芬，《1997 清法戰爭系列活動動態導讀-揭開清國井的神祕面紗》，http://www.ocean.org.tw/mag/006/006009.htm.

4 http://home.kimo.com.tw/linyhome/f/f25.htm

5 http://www.wfdn.com.tw/9205/030507/news/

6 http://ind.ntou.edu.tw/~militran/class.htm.

-

有收藏與該次戰役有關的器物。所幸在役政公園隔鄰的中正公園梅園，有原爲清法戰後 1887 年劉銘傳整建白米甕砲臺（基隆市中山區） 安裝了三尊八英吋英製阿姆斯脫郎後膛鋼砲，其中僅存的一尊，該尊古砲先後移置於基隆市中正公園忠孝亭前及臺北市三軍大學校區 1993 年，由三軍大學回贈[7]，雖非原物歸原地，總算相去不遠。

暖暖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林穎玲，撰有《懷古尋跡訪砲台》和《懷古尋跡訪砲台》[8]，探討摃子寮砲台山的古砲臺，該砲台建於清光緒年間、日本時代曾經重修，二次世界大戰後列入要塞管制區，位於信義區、中正區的山巒間，也就是目前的海洋大學與碧砂漁港的後方山頂，與白米甕砲台互爲犄角，現已指定爲第二級古蹟，納入都市計畫保護區規劃。

彰化女中軍訓課程陳榮慶教官編撰的「臺灣戰史」，提到劉銘傳抗法戰役，有關法軍初犯基隆和再犯基隆的作戰經過[9]，並沒有講基隆在 1884 年 10 月初失陷以後的基隆戰役。

公共電視臺「跟我遊臺灣」節目，2002 年 3 月曾播出《基隆與清法戰爭之旅》單元，介紹二沙灣砲臺、民族英雄墓、法國公墓、和役政公園[10]。提到基隆戰役的部分顯然有限。

另有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特別指出，基隆之役乃清法戰爭中，臺灣守軍「士氣由盛轉衰的關鍵」，而臺灣「所有有關於清法戰爭的現存遺蹟中，只有在基隆還看得到我方陣亡軍士的碑銘」[11]；史觀或有見仁見智，但全文含圖片在內 32 頁當中，以 23 頁的篇幅探討基隆之役，倒是創舉。許文用了許多中文史料，也參考了不少有關清法戰爭的中文著述，是最大優點，但戰史的研究缺乏地圖佐證，空間概念的不足，與戰役有關的古地名未做考究。

廖宗麟《中法戰爭史》引用了豐富的中文史料和中譯本的外國檔案，豐富有餘，消化不良，見一段抄一段；無地圖佐參，毫不認識與戰爭有關的臺灣地理，敘事時以陽曆爲主，忽而改用陰曆爲主；立場不夠客觀，處處顯露維護淮軍劉銘傳，批判湘軍劉璈、孫開華的痕跡，對於劉銘傳先前棄守基隆的戰略，以及後來誤信假情報、高估敵軍、低估本軍，制定固守待援、緩攻基隆的戰略，都沒有評論；至於李鴻章稱讚劉璈備禦中南部、「布置不錯」的情形，不置一詞。廖書所引資料可參考，但論斷不無可疑[12]。

有關清法戰爭基隆之役的史料，陳三井《中法戰爭地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一文，做了初步介紹[13]。2003 年行政院文建會顧問何康美，從法國蒐集整理了

---

[7] http://www.klcscr.gov.tw/hot3.htm

[8] http://www.linyhome.com/i/i810.htm；http://www.klnn.net/culture/article2.htm.

[9] http://www.tacocity.com.tw/micjou/%A5x%C6W%BE%D4%A5v.html.

[10] http://www.pts.org.tw/php/html/twlive/ne.

[11] 《臺灣文獻》季刊，卷 54，期 1，（2003 年 3 月），頁 296。

[12] 廖宗麟，《中法戰爭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頁 315-364, 465-590。

[13] 國學文獻館（主編），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論文集》（臺北：聯合報，1996），頁 228-236。

-

一份 16 頁的《清法戰爭臺澎法文書目》（未出版）[14]，最具權威。可惜能閱讀法文的學者不多。

六年來葉振輝有關清法戰爭在臺灣的研究，未曾間斷。1998 年先在第一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西仔反淡水之役》之同時[15]，完成《劉銘傳傳》[16]，其中第二章《劉銘傳與北臺灣籌防》與清法戰爭基隆之役有直接關係；2000 年發表《中法戰爭澎湖之役》一文；2003 年 10 月 12 日和 19 日，又在淡水社區學院，演講《清法戰爭》與《清法戰爭前後臺灣的經濟與社會》各一場。同年，參與「清法戰爭與臺灣」特展的策展，10 月 29 日隨同國立臺灣博物館工作人員，赴基隆勘查清法戰爭基隆之役和淡水之役古戰場勘查。11 月 2 日和 16 日，兩度應邀在該館舉辦的「山與海的對話-戰爭與和平」活動中，從臺北市驅車到基隆和淡水，隨隊解說，藉由實地踏查清法戰爭古戰場的方式，讓學員了解清法戰爭與臺灣歷史發展的關係，以輔助學校鄉土教育課程的實施；11 月 23 日和 12 月 21 日，在該館演講《清法戰爭在臺灣下港》與《清法戰爭基隆之役》各一場。根據前此的研究經歷，乃能有本篇之作。

二、樓打號巡洋艦刺探軍情

1884-5 年清法戰爭期間，法軍窺伺基隆，並不始於劉銘傳督辦臺灣軍務，既不是針對劉銘傳而來，也不是對臺灣有領土野心。法軍侵略臺灣之目的，在於控制基隆煤礦，用做將來與中國議和談判的擔保品，其意義與英國在鴉片戰爭期間控制舟山群島相似。當時清國方面似乎無人了解法軍的這種計畫。清國人至多以爲法國想占領臺灣和基隆煤礦，出兵臺灣之目的，被解讀爲直接對臺灣的領土野心。

法軍窺伺基隆，並非毫無徵兆。法國軍艦「樓打」號 (“Volta ”)先於 1884 年 4 月 13 日（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未經照會，闖入基隆，強買煤炭、窺伺砲臺、並放言砲攻基隆 [17]，已露出侵臺端倪。雖然臺灣道劉璈提出報告，促請總理衙門向法國交涉，但號稱重視海防甚於塞防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並不以爲意，認爲「係口角細故，不值深辯」，一副和稀泥的態度，以致失去籌防先機。所以說，劉銘傳到臺灣督辦軍務之初，所發現的諸多防務缺失，李鴻章實應負決策判斷錯誤、有失先機的責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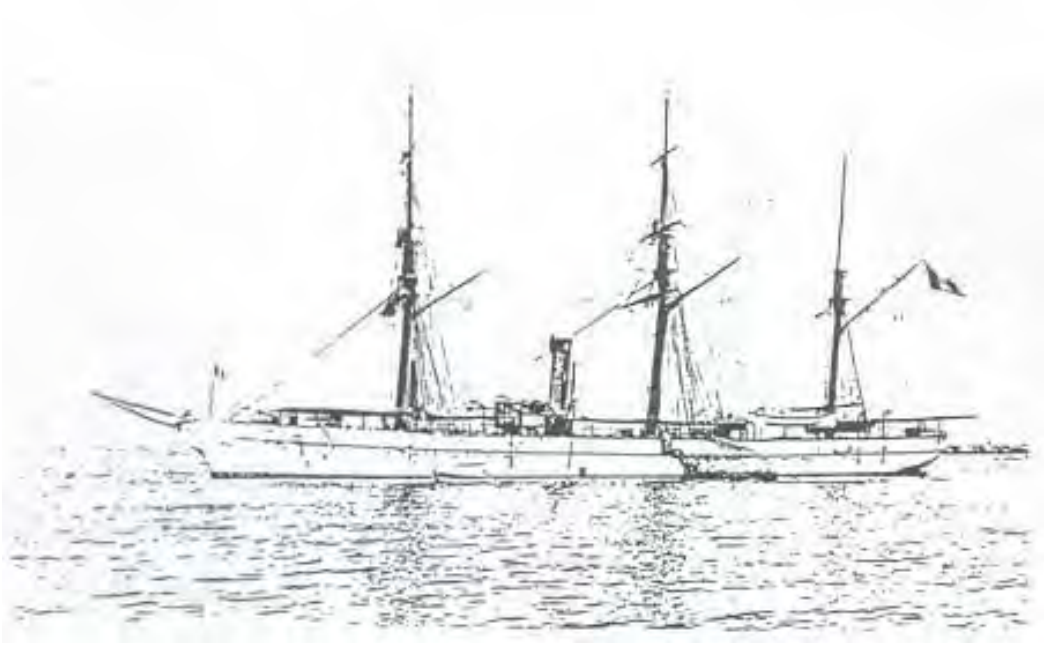
[14] 何康美，“Notice bibliographique sur l’expédition du Formose et des Pescadores,” 1993 年 4 月 22 日，國立臺灣博物館「中法戰爭在臺灣」特展第二次籌備會議資料。

[15] 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載：《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國史館等協辦。

[16] 葉振輝，《劉銘傳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臺灣先賢先烈專輯。

[17] 劉璈，《巡臺退思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據臺灣文獻叢刊第 21 種勘印，1997），頁 258-259，〈法國樓打兵輪駛至基隆尋端挑釁並請咨明總理衙門由〉（清光緒十年四月初四日）。該事件詳情，可參閱：廖宗麟，前書，頁 332-336，但有關劉璈「對於即將打上門來的敵寇……幻想……照萬國公法行事，未免過於糊塗顢頇」之評論，甚爲不妥。因清法兩國尚未宣戰，外交活動自屬正常。

-



圖一　法國巡洋艦樓打號

三、劉銘傳抵基隆佈置

1884 年 6 月 26 日（潤五月初四） 詔令還在病假中的直隸提督劉銘傳，督辦臺灣事務。當時，中、法兩軍正在北圻衝突，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而臺海局勢也開始緊張，臺灣防衛力仍待加強。劉銘傳帶著「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前直隸提督」關防，率領百餘位軍官和教練，於 7 月 10 日（潤五月十八日）自天津乘輪南下，先抵上海，法國公使頻頻刺探劉銘傳的行期，劉銘傳連日置酒高會，聲言某日乘某艦赴臺，卻趁大風雨的夜晚，微服登小艇，從吳淞口乘海晏輪出發，7 月 16 日（潤五月二十四日）抵達基隆。第二天（潤五月二十五日） 劉銘傳正在基隆布署，一艘法國巡洋艦「威剌士」號 ("Villars") 藉口巡查海口，到基隆港停泊 [18]。 7 月 20 日，劉銘傳移駐臺北府城 [19]。

[18] 該法艦到 8 月上旬參與攻擊基隆爲止，一直停泊在基隆，實際的任務，在偵察基隆岸上清軍的防禦情報。外國軍艦巡查通商口岸，爲 1843 年中英虎門通商條約所定，列強援引片面最惠國條款，一體適用，以致即將爆發戰爭的敵國軍艦，藉口巡查口岸，事先停泊在即將攻打的口岸，蒐集軍事情報。

[19] 英國劍橋大學總圖書館（藏） 怡和洋行檔案，Jardine archive, B24/1/72。

-

圖二　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前直隸提督關防

根據劉銘傳到臺後的觀察，臺灣一島孤懸海外，居南北洋要津，形勢緊要，而且蘊含豐富礦藏，早就是各國覬覦的目標。從防務方面來看，基隆是臺北的咽喉，澎湖是臺南的鎖鑰，而外島澎湖因地勢孤立，防守非得靠兵船不可。臺灣原有福建派來的四艘輪船，往來臺、閩之間；其中「永保」和「琛航」二船，負責臺北裝煤載貨；「萬年青」及「伏波」二船專備臺南，因應調配往來之需。可是在劉銘傳抵臺時，這四艘船都不在臺灣，全駛往福建或上海，而且有電報的地方只限南部的打狗（今高雄市）、臺南、與安平之間，島外聯絡並無電報：通訊聯繫大有問題[20]。

在港口方面，基隆港的口門狹窄，是一處天然船塢，但是原有砲臺位置過低，而且設於口門以內，無法防守。經過仔細探勘後，劉銘傳擇定緊扼外海口門的鱗墩（又名鯉魚堵，即萬人堆鼻山）、社寮（今和平島）兩山對峙之處，各築一座砲臺，別建一座護營（今海門天險），以遏阻敵船進口之路。這些工程所需材料都仰賴廈門供應，但是當時並無輪船運輸。另外，滬尾（今淡水）和蘇澳二港，也都容易通船。以上情形，全需靠定購的槍砲運抵臺灣後，才可一一設防。這些籌辦中的急務無法立即著手，徒然令人望洋興歎。在兵力方面，當時全臺共有防軍四十營，其中三十一營駐紮臺南，臺北只有九營。劉銘傳認爲，軍隊的佈署，應待各將領擇定後，視情勢的輕重緩急，再大幅加以調整。至於軍餉的來源，則力求自給自足。臺灣物產頗爲豐富，以茶、鹽和樟腦爲大宗。等待防務步上軌道後，即可詳細清查，以造地方之利，希望以地方自有的資源，供應全臺防戍所需[21]。

---

[20] 葉振輝，〈劉銘傳傳〉，頁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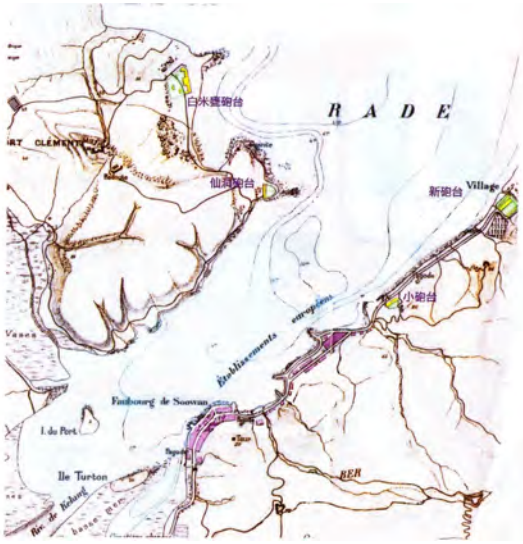
[21]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 27 種，卷三，保臺略，〈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頁 165-166。

-

圖三　從二沙灣眺望基隆港入口

說明：北方小島爲基隆嶼，最靠近和平島。　　攝影/ 葉振輝　2003 年

劉銘傳籌防的情形，如《法軍侵臺始末》所載， 1884 年 8 月 4 日到達基隆港的法國海軍少將李士卑斯（Vice Admiral Lespés）所獲情報，顯示基隆港已在防禦狀態中，三座低砲臺控制著海港的入口。劉銘傳新建的砲臺，是其中唯一有作用的砲臺，砲牆用三合土建造，加二十厘米鋼板，鋼板上有五個砲眼，配備十七厘米克魯伯大砲。新砲臺俯瞰並控制入港的水道，舊名頂石閣砲臺，位於大沙灣，今中正路三一八巷內土地廟「福安宮」上方、海拔五十餘米的旭岡。在基隆港入口西角的仙洞鼻崖壁，舊名仙洞砲臺 ，配備三門十八厘米大砲。在太白社區附近、燈塔南側，萬人堆鼻山頂，舊名白米甕砲臺，今稱三級古蹟光華古砲臺之處，配備四門十八厘米滑膛砲。此外，在二沙灣砲臺山、今海門天險之處，還有一座配備三門十八厘米滑膛砲的小砲堡[22]。在發動攻擊以前，法軍已經準確地預估：除了新砲臺以外，都不是法軍的對手。



圖四　基隆初期的布防

[22] 黎列文（譯） E. Garnot（著），《法軍侵臺始末》（L' Expé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臺北：臺灣銀行，1960），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頁 13。

-

劉銘傳離開天津時，已奉旨由閩浙總督何璟、張兆棟迅即撥款四十萬兩，解交劉銘傳，作購買槍砲及修改澎湖等處砲臺之用。劉銘傳抵上海後，即籌劃餉械接濟之事。運砲委員游學詩於 7 月 30 日，雇德商萬利輪船 ("Welle") ，自上海運砲械南下， 8 月 2 日，運抵基隆，遭法艦「威剌士」號阻撓，不能卸載後，再開往滬尾卸載[23]。該批運抵滬尾卸載的砲械，包括十九門十七厘米砲和若干魚雷，日後派上用場，對付來犯的法軍[24]。8 月 5 日開戰時，守軍有 2,500 人。

圖五　便裝的劉銘傳

四、基隆之役 1884/08/05-06

在馬祖的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官孤拔（Admiral A.. Courbet），8 月 2 日奉到該國政府命令，務必破壞基隆防禦工事，並占領基隆煤礦。於是命令李士卑斯少將執行此項任務。 8 月 3 日，李士卑斯乘 魯登艦 (“Lutin ”)，離開閩江碇泊地，駛往馬祖，與孤拔（當時以「拜逸」號 (“Bayard ”)爲旗艦）會面， 「拜逸」號給魯登艦補充了煤， 「拜逸」號所載的陸戰隊移往「剌嘉理順尼亞」號 (“LaGalissonnière ”)，李士卑斯搭旗艦「剌嘉理順尼亞」號，率魯登艦，於 3 日下午 5 時 30 分出發， 4 日上午 11 時抵達基隆港停泊，隨即展開攻擊準備。

法軍首次進攻基隆的兵力，總共近千[25]；其配備與布署如下：

1.剌嘉理順尼亞旗艦（配備 24 厘米砲塔砲 2 門、24 厘米砲座砲 2 門、10 厘米

[23] 羅剛， 《劉公銘傳年譜初稿》 （臺北：正中，1983） ，頁 415, 424, 426。 《述報法兵侵臺記事殘輯》 （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三輯第 50 冊， 《淡水勝仗指證》 ，清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頁 57，所稱擔任運補之商船，譯爲「惠爾」號。

[24] 黎列文（譯） ，前書，頁 13。

[25] 羅剛，前書，頁 427。

-

砲 6 門、旋迴砲 8 門，戰鬥兵員 350 名。

2.威剌士巡洋艦（配備 14 厘米砲座砲 15 門、旋迴砲 8 門，戰鬥兵員 260 名）。

3.魯登砲艦（ 14 厘米砲座砲 2 門、 10 厘米砲 2 門、旋迴砲 2 門，戰鬥兵員 78 名）[26]。

圖六　孤拔遺像

資料來源： 點石齋畫報》 第三集，頁 49。

這三艘法國軍艦完全針對岸防砲臺而布署，守軍並未先發制人，完全是被動抵抗，讓法艦從容完成攻擊準備。當法軍布署完成以後，李士卑斯便派遣副官上岸，致送最後通牒，要求守軍撤去一切防禦，同時通知居住基隆的外僑和停泊港內的其他船舶 [27]。

1.剌嘉理順尼亞旗艦因爲吃水較深而停泊港外，以其右舷暴露在新砲臺正前 方 900 米之處的危險位置，希望艦砲砲手憑技巧和鎮靜抵銷危險；左舷面對光華古砲臺，可運用艦上砲塔的大砲轟擊該砲臺的 4 門 18 厘米滑膛

[26] 羅剛，前書，頁 427，謂李士卑斯率四艦來犯基隆，內有「拜逸」號艦。但實際上，孤拔旗艦「拜逸」號上面的陸戰隊，先在馬祖移往李士卑斯旗艦「剌嘉理順尼亞」號，後者再開往基隆。8 月 5 日基隆之役，共有法艦三艘參戰，並無「拜逸」號。

[27] 羅剛，前書，頁 428，謂最後通牒的要求，是「若期限內和議不成，隔日清晨便攻擊基隆砲臺」 顯然有誤。因爲臺灣不是清法兩國議和之地，劉銘傳來臺灣，也非爲了議和，當時臺灣無人有權代表清國與法國議和，何況兩國之間尚未正式宣戰。

-

砲，這方面不用多所顧慮；艦尾可以側擊仙洞巖東側的砲臺。

2.威剌士巡洋艦停泊在新砲臺射程以外，以其右舷暴露在海門天險的小砲堡正前方 120 米，看似準備接受該小砲堡 3 門 18 厘米滑膛砲的砲擊，實際上是運用艦上左舷砲位控制仙洞巖東側的砲臺。

3.至於魯登砲艦，因爲艦小、吃水較淺 [28]，行動敏捷，可以深入港內，一方面冒著接受一切岸防砲的威脅，另一方面卻可以向兩岸任何砲臺進行側擊或背面攻擊[29]。

8 月 5 日上午 7 時 30 分，李士卑斯少將向各艦下達戰鬥準備命令。8 時正，法艦向岸砲開火，守軍立即還擊。新砲臺的第一排五發砲彈，其中三發直接命中「剌嘉理順尼亞」號旗艦的甲板，其中一發甚至夾著吼聲，鑽入艦砲的砲位，使一尊 24 厘米砲爆炸損壞，但法兵無傷亡。旗艦「剌嘉理順尼亞」號實施側舷齊射，第一排砲擊之後，便毀去新砲臺半數的砲位。砲臺前壁被穿，24 厘米砲彈射穿砲眼、粉碎砲架、破壞砲檯、炸死砲手。8 時 45 分，火藥房中彈轟毀，烈火延燒到附近村莊。新砲臺傷亡官兵六十餘人，姜鴻勝所部守軍後撤，曹志忠（記名提督福建福寧鎮總兵）所部仍守近海小山（即小基隆山，今中正公園內忠烈祠一帶的山頭）後二重橋（今名義重橋，爲舊名大基隆的仁愛區和舊名小基隆的中正區之間的重要橋樑）[30]。其他的岸砲，經巡洋艦「威剌士」號和魯登砲艦各發幾砲以後，便歸於沈寂。

到上午 9 時，戰鬥開始一小時後，守軍全部退卻。李士卑斯接著發出登陸信號，旗艦「剌嘉理順尼亞」號的副艦長馬丁中校 (Martin) 率領陸戰隊四、五百人登陸，立即占領新砲臺，因火仍在燒，且守軍已開始據守東方高地，瞰制著海港，法軍不久便放棄新砲臺，另以巡洋艦「威剌士」號的陸戰隊占領海門天險的小砲堡，同時在魯登砲艦幾發適當的掩護砲擊下，「拜逸」號的陸戰隊從新砲臺轉進，攻占了山巔最高點（今槓子寮山，標高 162 米）從該處看到 2,000 名中國正規部隊，長長的行列，朝往淡水方向的路上敗退，退到隘路時，還受到巡洋艦「威剌士」號的間歇性砲擊。午後，法軍水雷分隊以棉花火藥，毀去一切砲臺設施；到傍晚，港灣內的防禦已經完全消滅。當夜傾盆大雨，宿營的法軍不得好好休息[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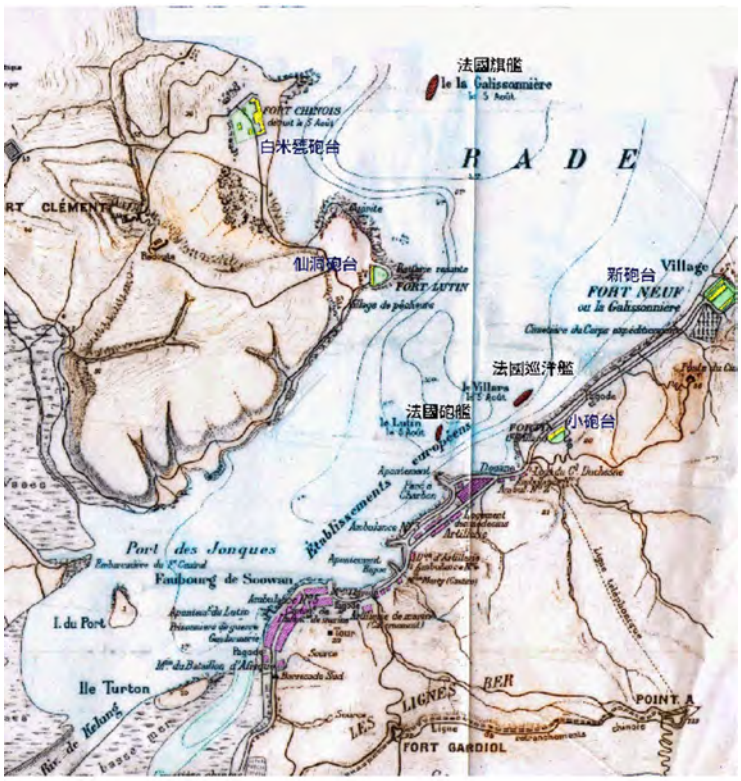
[28] 清法戰爭時的基隆港，退潮時，近岸部分成爲一片廣大的塗灘。塗灘中央有一條淺狹的水道，僅容舢板通行。從入口到街肆，港灣全長約 3 公里，最寬處有 1.5 公里。清國政府不僅未曾採取措施，以防止或減輕泥沙淤積，反而廳由帆船在港內傾倒壓艙物。此一港灣頗易於到達，也有很好的天然屏障，卻可惜吃水太淺，較大的汽輪都無法進入。
陳正祥，《基隆市志-自然環境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8），頁 21-22；轉引：施添福（編），《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七基隆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23-24。

[29] 黎列文（譯），前書，頁 13。

[30] 劉銘傳，前書，卷三，保臺略，〈敵陷基隆砲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頁 168-172。

[31] 黎列文（譯），前書，頁 13-14。

-



清法戰爭基隆戰役地圖　1884 年 8 月 5 日 -6 日

圖七　基隆之役 1884 年 8 月

圖八　大沙灣砲臺遺址

攝影/ 葉振輝　　2003 年

圖九　壯烈犧牲的克虜伯大砲

資料來源： 怯軍侵臺始末》。 電腦繪圖/ 葉振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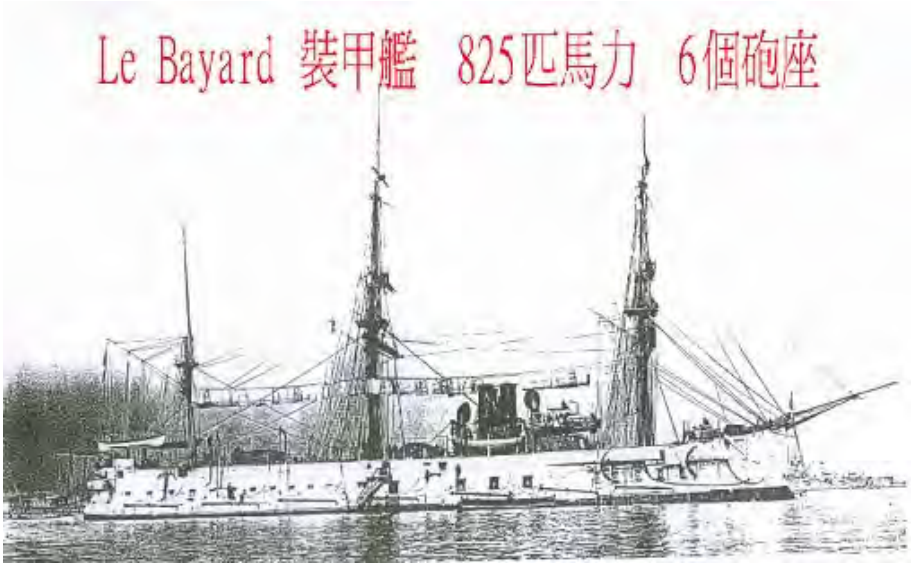
8 月 6 日（舊曆六月十六日） 法兵四百餘人「登岸，直犯二重橋營壘」 經過一番激烈槍戰後，法兵大敗，營地被攻破，被擒一人，失坐旗一面、砲四尊、帳房數十架、洋衣帽甚多[32]。這次會戰結果，據清國方面記載：法軍傷亡一百多

[32] 劉璈，前書， 稟法船來基隆開釁砲臺被毀暨十六日獲捷各情由》 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三日，頁 268-269。

-

人，守軍數人[33]；但在法軍方面的記載，卻是：法軍戰死二名、負傷十一名，差別甚大。尤其不同的，是法軍記載早在 8 月 5 日便攻占了槓子寮山，中國方面卻說法軍 8 月 6 日才登陸，直撲二重橋。

8 月 6 日的遭遇戰，據《法軍侵臺始末》所載，李士卑斯的副官、海軍上尉傑克（Jaquemier）於該日下午 2 時，率巡洋艦「威剌士」號的陸戰隊外出偵察，目標是基隆廳衙門和街肆，以及一個距離頗近瞰制街肆的築堡陣地（即港口南岸的獅球嶺）。出發不久，遭遇爲數甚多的守軍，經過一番猛烈槍戰之後，法軍不得已退卻：此處應是中國方面所稱的二重橋遭遇戰。與此同時，留在槓子寮山的「拜逸」號艦的陸戰隊，正被守軍的散兵線重重包圍。守軍從荊棘叢中潛行接近，對法軍採取有力的攻勢。只剩兩百支步槍的法軍，抵抗著來攻的 2,500 名以上守軍，從槓子寮山的據點撤退到岸邊，1,200 米的路程，花了一小時半，連同撤回軍艦上的抵抗時間計算，一共是四小時[34]。



圖十　拜逸號

五、基隆砲戰 1884/08/30-31

8 月 6 日法軍退回艦上以後，基隆戰事歸於沉寂。劉銘傳立即派員赴廈門，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 臺北：文海，1974） 電稿三， 劉爵帥由廈門來電》 清光緒十年六月十日酉刻到，頁 20-21。

[33] 當天早餐時，劉銘傳用激將法，使章高元（統領武毅軍記名提督） 鄧長安（已革游擊）分別率隊，迂迴繞出占領山巔的法軍據點東側和西側。8 時許，法國馬丁中校分兵二百餘人，在曹志忠營北的山上築營，以其餘二百餘人直接接近曹志忠營壘，並以艦砲助攻。到中午，槍砲聲不絕，達四小時之久。曹志忠一面飭守本營，一面親督王三星（總兵銜儘先副將）等率隊二百餘人出戰。鄧長安所率 60 人小隊，從荊棘叢潛行，進入法營，毀敵砲；並與章高元、蘇得勝（記名提督）從東面夾擊，擊斃山巔法軍官二名、山下法軍官一名，法軍退卻，且暫且走，除陸上死傷百餘人外，皆退回艦上。參閱：
劉銘傳，前書，卷三，保臺略， 敵陷基隆砲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 頁 168-172；卷首，劉朝望， 書先壯肅公守臺事〉 頁 74-77。

[34] 黎列文（譯） 前書，頁 15。

-

轉發電報給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8 月 10 日到達，清國朝野人心稍慰[35]。劉銘傳希望「臺灣摺件，由廈門、福州文報局轉交天津縣代遞」，不必按一般方式，專人遞送北京，以收時效，這項建議於 8 月 15 日獲准[36]。因爲在臺灣籌防的劉銘傳，與大陸方面的軍情傳遞，即使臺海未遭法艦封鎖，本來就是個大問題。何況法軍方面還利用其情報傳遞較迅速的優勢，意圖混淆視聽，使中國決策當局誤判。按，法國公使館方面於 8 月 8 日致南洋大臣曾國荃照會，云：法國已奪基隆口岸砲臺，暫不取福州，索賠八十兆法郎，分十年交付。其實，這是一個虛僞宣傳，意圖掩飾法軍已被基隆守軍擊退回法艦之真相。李鴻章到 8 月 16 日，才確知法國的欺騙詭計[37]。 8 月 17 日，廈門甚至還謠傳法艦攻破澎湖消息[38]。

法軍利用外交手段，以拖延攻擊時間。自從 8 月 6 日法軍從基隆岸上撤退以後，法國政府認爲進攻基隆之舉，並未使清廷讓步，反而是法國公使館接到總理衙門 8 月 12 日抗議基隆被攻擊的照會。其次，考慮到法軍若是放棄基隆，等於被看作無力的告白，會被恥笑，此種情況必須避免。因此，利用外交談判的時間，進行軍事準備。8 月 7 日晚間，李士卑斯託海關稅務司鮑 琅樂（M. H. Brownlow）函邀劉銘傳上船相會；劉銘傳函覆，體制有關，未便相會，要求法方人員上岸商談，另約鮑稅務司 8 月 8 日上午 10 時相會，以了解法軍邀會之用意[39]。上諭嘉許劉銘傳「具有識力」[40]。 8 月 9 日，李士卑斯告知鮑稅務司，兩國未失和，法軍欲請劉銘傳來商，兩不開砲，只當未開仗，彼此信函問候。後來，魯登砲艦駛往上海，以便報告軍情給法國政府，巡洋艦「威剌士」號駛往馬祖，向孤拔報告戰果，留旗艦「剌嘉理順尼亞」號扼守基隆港外，實行未經正式宣告的封鎖[41]；但清國方面記錄「法艦掛白旗駛去一艘」，至 8 月 16 日，法艦二艘仍停泊基隆口外，運兵船四艘開回香港[42]。劉銘傳預料法軍雖然在此役戰敗，必不甘心，可能將會擇期再行進犯，於是上書朝廷，請求增兵船援助臺灣。證諸日後發展，劉銘傳的判斷是正確的。

8 月 16 日，茹費理 (Jules Ferery) 內閣獲得法國國會信任案的支持[43]。 8 月 19 日，法國代辦謝滿祿 (Vicomte de Semallé) 提最後通牒，索賠八十兆，限四

---

[35] 吳汝綸（編） 前書，電稿三， 劉爵帥由廈門來電》 清光緒十年六月十日酉刻到，頁 20。

[3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德宗實錄選集》 臺北：臺灣銀行，1964） 臺灣文獻叢刊第 193 種，卷 188，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諭， 電寄各省將軍督撫等，此次法人肆行……」，頁 110-111。

[37] 羅剛，前書，頁 442。

[38] 吳汝綸（編） 前書，電稿三， 寄譯署》 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子刻，頁 28。

[39] 劉璈，前書， 纛法船來基隆開釁砲臺被毀暨十六日獲捷各情由》 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三日，頁 268-269。

[4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德宗實錄選集》 卷 188，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己亥）又諭， 電寄劉銘傳……」 頁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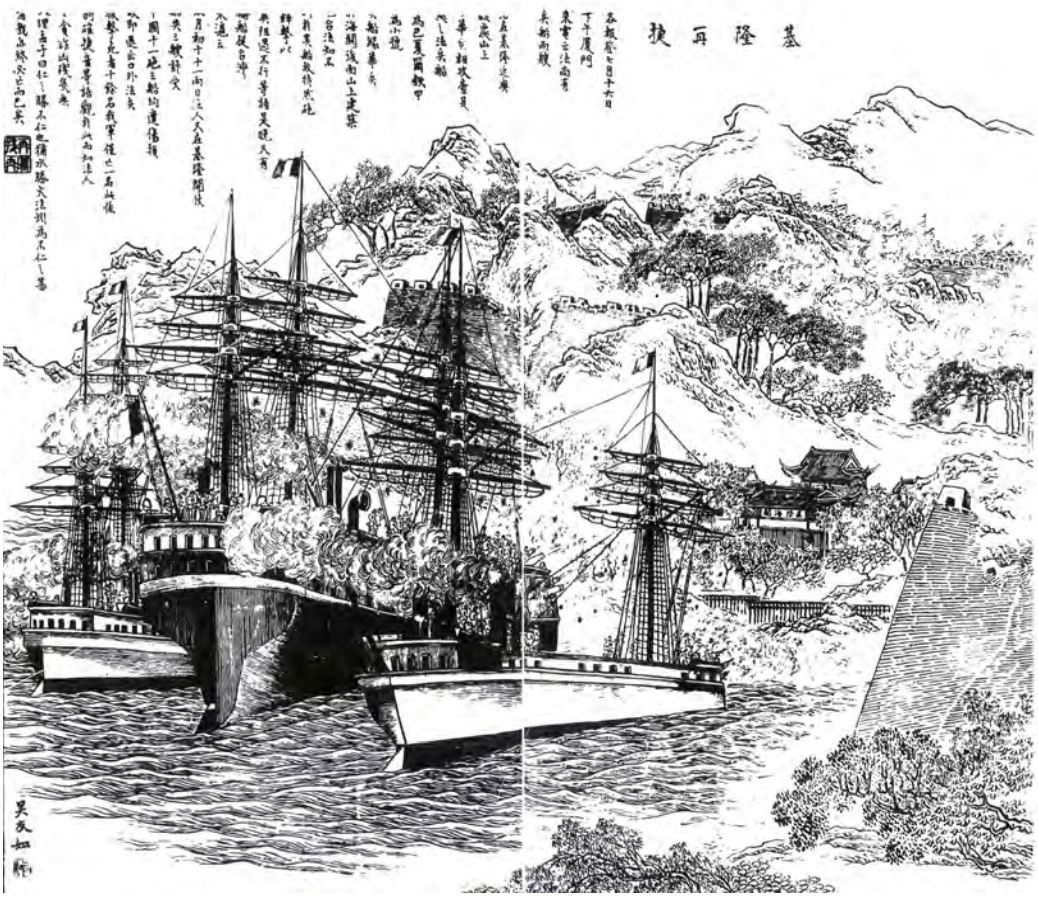
[41] 黎列文（譯） 前書，頁 15。

[42] 吳汝綸（編） 前書，電稿三， 廈門彭軍門來電》 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子刻到，頁 24。

[43] 法國積極準備發動戰爭，上議院以 358 票贊成、152 票反對，通過內閣提案，籌軍費 48 兆法郎，以逼使清國履行天津條約。參閱：
吳汝綸（編） 前書，電稿三， 上海道致譯署》 清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戌刻到，頁 28。

-

十八小時答覆，次日，總理衙門指示李鴻章，分電南洋大臣、閩省、臺灣方面備戰，電兩廣督撫進兵越南[44]。 8 月 22 日，海軍部長命令孤拔攻擊清國艦隊，並破壞福建船廠和閩江沿岸的防禦工事。一周後，孤拔完成了最新的任務，令李士卑斯全力攻基隆 [45]，隨後孤拔親自乘戰艦 「凱旋」號（另譯「德輪凡得 」"Triomphante" ），往基隆視察。



圖十一　1884 年 8 月 30-31 日基隆砲戰

說明：在清國南洋艦隊被法軍消滅後，法艦隨即攻打基隆，卻未得手。

資料來源：吳友如（繪），基隆再捷》，點石齋畫報》 第六集，頁 21。

8 月 29 日，李士卑斯率三艦至基隆，掛旗索戰。次日，法艦開砲猛攻基隆，守軍憑山爲障，開砲還擊，法艦退泊基隆口外。 8 月 31 日，法艦再次砲轟基隆，卻不得手[46]。

9 月 2 日，孤拔到達基隆港外，看到「拜逸」號和魯登兩艦停在港灣內。孤拔登上「拜逸」號艦，召集官兵精神講話，告訴他們捷報—中國南洋艦隊和福建

[44] 羅剛，前書，頁 445。

[45] 同上。孤拔在轟毀閩江要塞後，命李士卑斯全力攻基隆，但《法軍侵臺始末》未見記述。

[46] 羅剛，前書，頁 456-460。這一段攻守經過， 《法軍侵臺始末》並無記述。

-

船廠被摧毀。孤拔並且用 8 月 5 日進犯基隆的法艦名稱，將守軍原來的仙洞砲臺改名魯登砲臺、海門天險的小砲堡改名「威剌士」號砲臺，大沙灣的新砲臺改名「剌嘉理順尼亞」號砲臺。孤拔發現到，守軍已完全拋棄原來的砲臺和海濱一帶，而改在山頭上積極建築防禦工事。

9 月 4 日，孤拔回到馬祖，拍電報給巴黎，提到基隆守軍的最新布防情況，說中國人爲預防法軍登陸起見，已經在四周構築大規模的防禦工事，守軍人數眾多，估計在法國海軍步兵聯隊到達基隆以前，絕對不能嘗試進攻，甚至在聯隊到達以後，進攻也很困難，因爲基隆多密林。孤拔認爲，基隆產煤，占領基隆也許是有利的，但絕非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地，尤其因爲水淺，能容納大型艦停泊的水域面積狹窄，而且在秋冬之際開始的東北季風期間，風濤險惡；更重要的因爲基隆遠離北京，在基隆的一切作爲，影響不到北京的決策：如果法國政府決心占領臺灣作軍事基地，則占領澎湖更合適；如果要占領全臺灣，必需有比當時多上三倍以上的進攻兵力；無論如何，占領北方的芝罘（今煙臺） 威海衛、旅順，都比在臺灣採取行動划算[47]。

9 月 6 日，孤拔從馬祖又拍電報給法國政府，說如果政府決定在華北採取行動，他準備先破壞淡水守軍的防禦設施，只留兩艦封鎖基隆[48]。9 月 8 日，劉銘傳至滬尾布置防務，添派砲勇百人，分配各砲臺，即日返基隆[49]。9 月 9 日，基隆有法艦三艘，滬尾亦見法艦探查攻臺北之水路。9 月 17 日，法艦開始在滬尾口門搜捕，商船不通，致使此後由大陸裝運臺灣之兵械，或不能卸載，或遭劫奪。9 月 18 日，法孤拔得法國政府電令：首先占領基隆，當占領基隆以後，再率各艦進攻清國北部[50]。除了占領基隆以外，這一封電報並未指示攻占臺灣北部其他地方；法軍要進攻的後續目標，是在清國北部。法軍在戰爭期間，並未放棄外交談判的機會；法國對臺灣的企圖，只是取得保證品，性質類似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占領舟山群島；法軍不敢從事大規模陸戰，不致於「並臺灣北部而占領之」。

六、基隆之役 1884/10/01-02

爲了展開新攻勢，法軍重新編組，由三艘運輸艦： 尼夫」號（"Nive " ）（從西貢灣出發）、坦恩」號 （"Tarn" ）、鬥拉克」號("Drac")（從 Along 灣出發），載運 1,800 名的海軍步兵和兩 200 名苦力 [51]，分三個大隊， 9 月 17 日離開越南，向馬祖集結。 9 月 29 日下午 4 時，在「拜逸」號和「魯登」號兩艦護送下，三

[47] 黎列文（譯） 前書，頁 15-16。
[48] 前書，頁 19，註 19。
[49] 劉銘傳，前書，卷三，保臺略， 法擬調陸兵來攻臺北片》 頁 172-173。
[50] 比較：羅剛，前書，頁 467，認定孤拔所獲法國政府電令，爲「進攻基隆並臺灣北部而占領之」，與黎烈文（譯） 前書，頁 18,20，註 23，直接譯自法文書籍所引電報，兩者內容有間。
[51] 許毓良， 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 頁 306，引用：馬昌華、翁飛（點校） 劉銘傳（撰），劉銘傳文集》 合肥：黃山書社，1997） 稱「法方以近三千名之眾登陸」 較實際多出一倍的登陸兵力。茲以參與戰役的法國軍官甘諾(E. Garnot)所著《法軍侵臺始末》("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中譯本爲準。

-

艘運輸艦從馬祖揚帆，向基隆接近；同一時刻，巡洋艦「伊士甸」號 (" D'Estaing ") 、戰艦「剌嘉理順尼亞」號與「凱旋」號等三艦，也從馬祖出發，向淡水接近。 9 月 30 日上午 9 時，孤拔率領的五艦到達基隆下錨，基隆港內已經會合了五艘法艦：情報艦「梭尼」號("Saône")、巡洋艦「漆度連納」號("Chèteau-Renault")、巡洋艦「杜蓋都音」號("Duguay-Trouin")、砲艦("Aspice")、和情報艦「巴則佛」號("Parseval)。法軍立即對守軍陣地、展開一般偵察，以便決定攻擊地點和登陸地點[52]。

表一　基隆失陷前的防禦工事

位置	防禦工事	弱點
東面高地	從 102 高地開始，沿著稜線，經槓子寮山，到 65 高 地（基隆廳衙門東邊上方）爲止。這堵肩牆裡面，有兩處設堡陣地，是守軍的內堡和茅草搭蓋的營舍，一處在槓子寮山的後面，另一處離 65 高地約 100 米遠，剛好在狹路的後方，今爲枕山砲臺遺蹟。	狹路後方的設堡陣地，位置相當拙劣。
南面高地	用來組絕法軍由基隆進攻淡水的通路 。從紅淡山（標高 155 米）山麓的設堡陣地（今紅淡山砲臺）開始，沿著稜線，向西北延伸，經獅球嶺九七高地（往淡水通路的上方） 和 125 高地、140 高地、148 高地，，從兩座古塔下（可能是慈雲寺下方）過去，到 133 高地（上有掩堡）爲止，大約爲佛祖嶺、大陂頂、康樂嶺、到松樹嶺一線。	標高 155 米的設堡陣地，建得無甚見識。
西面高地	肩牆從火號山（標高 132 米）的一座掩堡開始，向西延伸，經狹路的設堡陣地，到一另座開有砲眼的設堡陣地（可能是大武崙砲臺）。	開有砲眼的設堡陣地，若先被法軍攻下內木山（Clément） 便可使守軍立即撤退[53]。

清軍的布署情形，據《法軍侵台始末》所載，完全以俯瞰街肆和港灣高地上的防禦工事爲滿足，分別在環港東、南、西三面的巔上，築造一道幾乎連續不斷、鋪著淺草的肩牆，肩牆高約 1-2 米，厚約 2-3 米。牆上飄揚各色旗幟，這不但暴露了防禦工事的位置，而且在一定的間隔處，透空暴露若干山砲，顯然砲臺僞裝也未盡周全。

分析了守軍的防禦弱點以後，孤拔決定了進攻的戰術。第一、務必先占領 內木山：一則由於港灣的阻隔，大武崙砲臺打不到內木山，再則從內木山，更容易偵察和瞰制各處守軍的防禦工事。第二、泊在港內的軍艦，砲轟東面設堡陣地和海岸之間的丘陵。第三、利用海上和陸上砲火掩護，從內木山附近登陸。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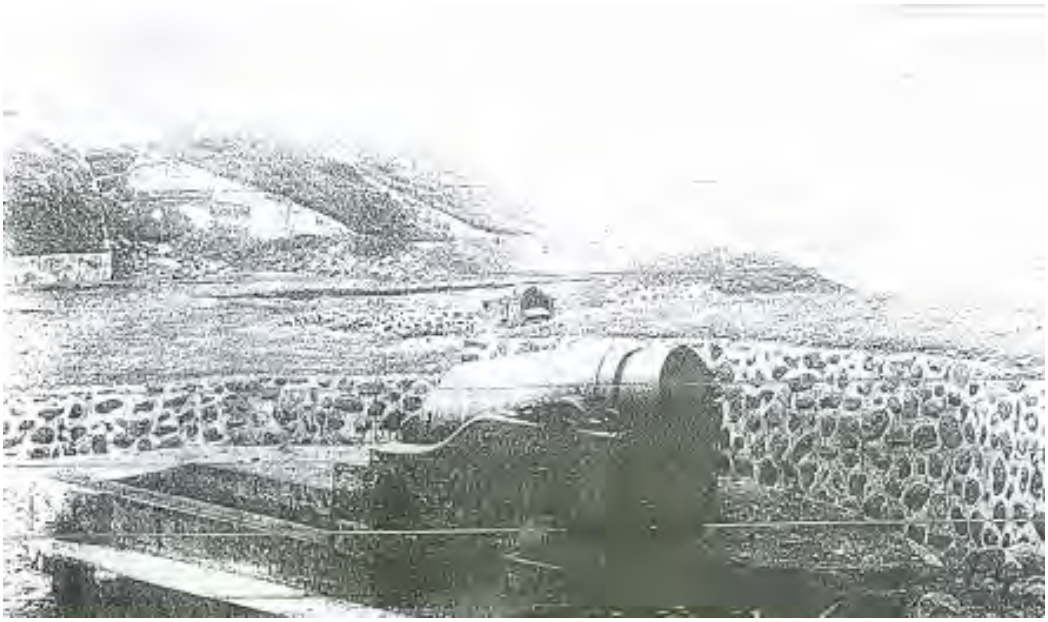
[52] 黎烈文（譯） 前書，頁 18-22。
[53] 許毓良，前文，認爲 Clément 係仙洞岩。

-

利用高地各支脈的天然掩護，登陸進攻。第五、軍艦布署方面， 「拜逸」號、「杜蓋都音」號、 「漆度連納」號、及魯登等四艦，各自泊在有利位置，屆時一齊砲轟西面高地狹路上的設堡陣地和大武崙砲臺。其餘各艦泊在必要時，可以砲轟東面高地砲臺的良好位置[54]。

10 月 1 日清晨，法艦五艘砲轟基隆，接著法軍分三波登陸基隆。清國方面的紀錄是：法軍官一員陣亡，守軍傷亡百餘人，仙洞陣地及兩側山丘失陷；酉刻（下午 5 時至 7 時之間） 法軍收隊上船。當晚，劉銘傳下令棄守基隆，以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率奮勇數百人，星夜馳援滬尾[55]。

但在法軍方面的戰爭紀錄，則有所差異。據《法軍侵臺始末》記載，法軍五人陣亡、十二人受傷，守軍損失超過四百人。法軍依計畫、在上午 9 時，占領了內木山；近 11 時，占領守軍放棄的小堡；近下午 4 時，砲兵到達陣地。10 月 2 日，法國海軍步兵毫不費力地占領了西面高地（今中山區）全部。10 月 3 日晚間，東面高地（今中正區）守軍撤往淡水。次日，法國海軍陸戰隊在未遭遇抵抗之下，將它占領，而後移交給海軍步兵駐守，陸戰隊回到艦上。南面高地（獅球嶺）也是一樣毫不困難地被法國海軍步兵占領[56]。



圖十二　淪陷後的基隆砲臺

說明：清軍原有岸砲，已於 8 月 5 日遭破壞。但 10 月 4 日起，法軍才真正控制砲臺，圖示的大砲係從法艦卸下的艦砲，砲口朝向內陸，以對付守在山頭的清軍。

資料來源：Garnot, op. cit., p. 139.

七、法軍推進南嶺腳 1884/11/14

[54] 黎烈文（譯） 前書，頁 22-23。
[55] 劉璈，前書，頁 284-286， 〝基隆失守大隊拔回臺北府城緣由〞 清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56] 黎烈文（譯） 前書，頁 23-24。

-

基隆自港口周圍高地淪陷後，戰局膠著，守軍反攻失利，法軍再深入也受挫。守軍各將領及臺北知府陳星聚等，先是聯名屢次稟請基隆通判梁純夫，募土勇，以進攻基隆，但募勇尚未成軍，便有鬧餉鼓譟、不遵約束情形。劉銘傳鑒於缺餉乏械，決定在不增兵餉的前提下，發給口糧，鼓勵若克復基隆，立給賞號銀二萬[57]。

11 月 1 日三鼓，曹志忠率隊二千人（其中一千二百人參加戰鬥）由五堵向獅球嶺九芎坑進攻，晨六時抵嶺下，爲法軍發現，自山上轟擊，死傷四十餘人，收隊退回五堵，法軍僅一人受傷。劉銘傳令勿輕進以傷精銳，但基隆法軍對於臺灣反攻部隊前所未有的勇氣和自信，已經有所認識[58]。

圖十三　基隆淪陷後戰役地圖

說明：基隆淪陷後，1884 年 11 月 14 日、1885 年 1 月 10 日、1885 年 1 月 26 日、和 1885 年 3 月 4 日，法軍一共發起四次攻擊。淺紅三角形表示清軍據點，黃色矩形表示法軍所設砲臺，粉綠線條表示清軍所挖壕溝和所築長牆。藍色表示河川湖泊。紅色表示聚落。法軍在 1885 年 6 月撤退前，隔著暖暖的基隆河以北，全歸法軍控制。

資料來源：《法軍侵臺始末》；《臺灣全圖百科大事典》（臺北：戶外生活，1996），五萬分之一基隆市地圖。　　繪圖/　葉振輝

11 月 4 日，法政府電令孤拔擬具占領淡水意見書，孤拔請增兵遣將。11 月 12 日法軍 450 名增援到基隆，當天，法軍便展開偵察活動。法軍一個中隊往七堵山區拔西猴溪上游谷地進行偵察，遭遇對面高地守軍的步槍攻擊而折回營地，翌日清晨，法軍組成四個步兵中隊、一個砲兵小隊，希望迅速偵察最新敵情，三天兩夜下來，只遭遇了守軍的斥堠，破壞了今泰安瀑布附近、守軍一處名爲「南嶺腳」的茅屋補給站，最後疲憊不堪地回去基隆營地，法軍一位軍官、兩名士兵

[57] 劉銘傳，前書，卷二，謨議略，〈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頁 139-145。
[58] 羅剛，前書，頁 523。黎烈文（譯），前書，頁 44-45。

-

受輕傷[59]。

清軍方面的軍情報告，有所不同。劉銘傳報稱，自 11 月 7 日起，法軍連攻暖暖三天，練董周玉謙等，率勇嚴守山隘，挫之，斃法兵十餘人，並其上尉一員，土勇傷亡十餘人[60]。

法軍還想進一步推進，但援兵從安南來，運輸困難，而且戰場擴大，難以兼顧，何況還要適應基隆地區東北季風陰雨的不利氣候。雖然 11 月 23 日，法軍小輪船七艘開到基隆，聲言俟兵到齊即攻滬尾[61]。卻等到 12 月 12 日，法軍才重新發動基隆的陸上攻勢，也再受挫。當日黎明時分，法軍百餘人自九芎山分撲鳥嘴峰營卡，練勇悉力抵抗，勢且不支，適各處營勇、練勇來救，槍傷法軍十餘人，奪獲紅旗一面，法軍敗退。彰化仕紳林朝棟獨備糧餉兩月，募勇五百人，協守暖暖；新竹方面仕紳林汝梅亦籌款兩月，募勇二百人，協守新竹[62]。

12 月 30 日，因原擬增援臺灣的 4,000 法軍，爲安南截留，孤拔親赴安南調兵。一周以後，法國援兵抵達基隆，新的陸戰又開始了。

八、基隆法軍生活

圖十四　法軍圖譜

說明：1883 年派往安南（今越南）的法國軍隊，共有五種，後來都有派到臺灣作戰。

資料來源：*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October 27, 1883, p. 396.　譯註/ 葉振輝

[59] 黎烈文（譯） 前書，頁 45-47。
[60] 劉銘傳，前書，卷三，保臺略， 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 》 ，頁 181-183。
[61] 羅剛，前書，頁 532,538。
[62] 同註 60。

-

回營的法軍，仍舊得面對陰雨的天氣和不良的公共衛生，一名法兵回憶錄寫著：「我這一支部隊的衛生情況，如果再這樣下去，不到三個月，我們就沒有兵可以拿武器了」[63]。一如 1874 年日軍侵臺之役，日軍病死的多過戰死的好幾倍，1884-1885 年法軍侵臺之役，法軍病死的也多過戰死的好幾倍。法軍「都死於什麼疾病？赤痢、一般衰弱、傷寒，尤其是一種被醫生稱爲森林熱的疾病」[64]。從法國海軍檔案，可發現當時孤拔向海軍部提出的醫藥補給需求，包括了金雞納酒、奎寧、硫酸納、催吐劑、有蚊帳的病床等[65]，可推知當年基隆法軍感染的不知名森林熱的疾病，就是瘧疾。1884 年耶旦節前夕，孤拔本人也承認，法軍可憐的健康狀況，使基隆的占領，變成了痛苦[66]。

傳染病之外，基隆法軍還得忍受思鄉之苦。1884 年 12 月 31 日，普通的法國家庭在吃年夜飯的時候，基隆時間是 1885 年 1 月 1 日凌晨 3 點，睡不著的法軍，提筆寫家書：「故鄉是晚上 7 點，親愛的父母親，您們圍桌吃團圓飯，沒人缺席……我要您們永遠幸福」[67]。李奧（Maurice Loir）少校也曾十分地想家，在獲得來船補給之後，所寫的家書上：「桌上的食物、衣服、鞋子、紙、火柴，我們無一不缺。唯一可以讓我們滿足的是，從歐洲來的信。哦！這些法國的信！我們是多沒耐心、焦慮地等著。只有它們能告訴我們，遠方故鄉和家人的訊息，排解憂愁，暫時忘記每日的苦難和艱困」[68]。

法軍如何苦難？如何艱困？由於傳染病，飲水格外小心。法軍被告誡，「只可喝煮過的水、或水源清澈（遠離樹葉及雜物堆）的水」[69]。由於食物有限，「一星期只吃一次肉，並且是每人 90 公克，其餘的時間，則是乾糧和罐頭牛肉」[70]。缺乏現煮的食物，是因爲海軍補給品，限於乾糧、咖啡、糖、牛肉罐頭、燒酒、四季豆、胡椒、鹽、醋、油等，乾糧以每日三餐或一餐半（補給困難時）計算[71]。由於清軍欺敵或騷擾，法軍私人日記寫著：「昨日凌晨一點，被兩發槍聲喚醒，每個人立即備位戰鬥，我們站在泥巴裡、被雨淋到凌晨四點」[72]。由於基隆冬雨，法軍在基隆渡過的 1884 年至 1885 年冬季裡，有太陽的日子，還不到十天[73]；從 1885 年 1 月 26 日到 3 月 3 日，連續 37 天看不到太陽。他們的兵力，並非如劉銘傳誇大的那樣，源源增兵，再三發動攻擊。到 1884 年 11 月 20 日爲止，基隆

---

[63] Paul-AnatolThirion, Commandant, *L'expedition de Formose. Souvenirs d'un soldat*（Paris, 1898）,p. 27.

[64] Garnot, op. cit., p.77.

[65] Archives du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BB4/1520, *Copie de la correspondance confidentielle de l;amiral Courbet, 15 juil 1883-10 juin 1885*, cahier3, n-552, 1884/10/27; n-558, 1884/10/29; n-617, 1884/11/11; cahier4, n-477, 1884/12/24; n-16, 1885/01/03; n-673, 1885/05/11.

[66] Archives du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BB4/1520, cahier 4, n-478, 1884/12/24.

[67] Charles de Gayardon, *A la mémoire de mon cher fils Charles de Gayardon*（Trevoux, 1885） p. 32.

[68]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Paris, 1892）, p. 219.

[69] Archives du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BB4/2480, *Cahier d'ordres des forces navales commandées par Courber（1883-1885）*, n-418, 1884/10/18.

[70] Gayardon, *op. cit.,* p. 39.

[71] Archives du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BB4/2479, *Cahier d'ordres des forces navales commandées par Courber（1883-1885）, n-305, 1884/10/03.*

[72] Gayardon, *op. cit.,* p. 35.

[73] 黎烈文（譯） 前書，頁 1。

-

方面的法軍，住院 136 人、休養 229 人，真正可以服軍務的健康兵只剩 1,200 人，其中 272 人已經或即將退伍回國[74]。

九、北非大隊參戰 1885/01/10

1885 年 1 月 4 日，有英商二船爲法軍運糧到基隆。三天後，所謂的亞非利加大隊登陸基隆，這批援兵來自北非阿爾及利亞，都是前科犯 -從法國陸軍監獄和苦役場釋出的亡命之徒。1 月 8 日夜間，法軍五百餘人分兩路，自深澳坑、月眉山潛襲，清軍以眾擊寡[75]。1 月 10 日自獅球嶺、鳥嘴峰、石梯嶺、大水窟四路，環攻基隆南方的清軍陣地[76]。法軍一時挫敗，認定不可能對清軍再發動正面攻擊[77]。

十、外籍兵團參戰 1885/01/26-30

1885 年 1 月 11 日，運輸船廣東號（"Canton" ）從安南抵達基隆，載來 1,000 名所謂的外籍志願兵 -主要由來自阿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德國的原法國領土）不願被德國統治、願意效命法國的青年所組成；第二天，登陸，在田寮港東岸紮營？1 月 21 日，又有法國援兵到基隆。1 月 24 日的夜晚，法軍編成 1,900 人的游擊隊，一支自八斗仔登陸，攻下暖暖河對岸的月眉山，配合自田寮港進發的另一支，合攻大水窟、圓窗嶺。 1 月 25 日至 27 日，兩軍在大雨中戰鬥，到 2 月 1 日停戰爲止，守軍死傷 700 餘，法軍死亡 21 人，傷 60 人，守軍仍在月眉山頂加強防禦，法軍固守山下據點[78]。法軍已經突破長牆，並在長牆南方、面對月眉山的地方，布署了砲臺，劉銘傳卻報稱獲勝。

經過這次的攻防戰以後，法軍認定守軍固守無虞，如果要有突破進展，法軍必須再投入 2,500 至 3,000 兵力，因爲：

第一、守軍兵力眾多，並且在官員號召下，得到民力協助，構築完成了陣地堡壘。

第二、守軍鬥志高昂，堅強不屈。

第三、守軍仍然使用欺敵戰術，以突襲法軍。

第四、守軍裡面有不少募勇，裝備良好。

第五、除非使用衝鋒攻勢，否則不能破解守軍的英勇。

第六、守軍採用歐洲的軍事原理，構築了敵前的地下陣地內堡，除非用砲兵，否則摧毀不了。

第七、在守軍仍然固守有大砲瞰制的高地期間，法軍所占領的基隆各要塞

---

[74] 前書，頁 47。
[75] 羅剛，前書，頁 568。
[76] 劉銘傳，前書，卷三，保臺略，無標題奏片，頁 189。
[77] 黎烈文（譯） 前書，頁 60。
[78] 劉銘傳，前書，卷三，保臺略， 《法攻暖暖月眉山連日獲勝並現在戰守情形摺》 ，頁 190-193。

-

並不安全，法軍無法推進[79]。

2 月 4 日，法軍約 400 人進攻大武崙，失利而退[80]。2 月 8 日，劉銘傳奏報新的布防：從大水窟到月眉山，開造深溝巨洞，長十餘里，以避敵砲，另從暖暖到六堵、七堵，橫亙大武崙，設置要隘十餘處，防線長達三十餘里[81]。

2 月 11 日，法國海軍部長拍電報給孤拔，通知基隆的法軍將於 4 月間撤退，在撤出基隆以前，授權孤拔以當時現有兵力做他自己認爲能做的事，還要求孤拔守密，以免議和談判對法國不利[82]。

2 月 21 日，孤拔建議法國政府，在撤兵基隆以前，先占領澎湖，當議和成功以後，再嘗試繼續控制澎湖的可能；孤拔還建議封鎖米穀輸往華北，並以澎湖爲基地，進攻旅順。法國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議[83]。

十一、月眉山之役 1885-03/04-05，07

3 月 2 日，基隆雨停，二十四小時後，法軍完成另一波的攻擊準備。以 1,280 人的游擊編組，各攜 6 日口糧，子彈 170 發，3 月 4 日清晨三點半出發，縱隊沿著前次進攻月眉山的海岸路線前進 ，四個小時以後 ，到達攻擊發起線的山谷窪地，除分三股由枕頭山、竹篙山、龍潭堵進攻外，主力另從深澳坑抄襲守軍的長牆背後，切斷了戲臺山，炸破長牆，攻下月眉山巔，戰至 3 月 7 日，天又下雨才停戰。事後法軍估計：法軍傷亡約 200，清軍傷亡約 1,500，而旁觀者的英國人的不同估計，英國人認定法軍死亡 400，守軍死亡 1,100[84]。月眉山之役，可說是基隆開戰以來，死傷最慘重的一次，也是清法戰爭基隆之役的最後一次。

至此基隆河以北既已全部淪陷，法軍進占過港，與暖暖對峙。劉銘傳調孫開華、章高元所部精兵共 5,000 餘人固守淡水，另以臺北和新竹約 2,000 預備兵力輔助 [85]。退守基隆外圍的清軍 ，相對薄弱：分守在五堵和六堵一帶 ，在接近法軍的位置，安排了監視哨，大隊兵力布署在六堵和水返腳（今汐止），以防止法軍從基隆河谷地進攻臺北。

最接近法軍的暖暖街，則由武舉王廷理負責 [86]。暖暖地方有周印（字玉謙），人稱「周印頭」 起來號召鄉民組成團勇（當時稱土勇） 在竹腳潭（現暖暖橋附近） 渡船頭（現暖江橋與暖暖溪出口附近）設據點守衛，又在基隆河南岸禁山寺後山立石寨，以監視法軍動態 [87]。

---

[79] 黎烈文（譯） 前書，頁 71,77, 註 36。
[80] 羅剛，前書，頁 583。
[81] 前書，頁 582。
[82] 黎烈文（譯） 前書，頁 78， 註 42。
[83] 前書，頁 72-74， 註 47。
[84] *Annual Register 1885*, new series (London, 1886), p. 331.
[85] 廖宗麟，前書，頁 519。
[86] 許毓良，前文，頁 319。
[87] 《暖暖-水源的故鄉》 基隆：暖暖文史工作室，1999） 全開彩印摺頁。

-

圖十五　紅淡山古道入口

攝影/ 葉振輝　　2003 年

劉銘傳趕赴六堵指揮。三個月以來，清軍投入基隆陣地的一切軍用器材，包括克虜伯砲，全部落入敵手。而法軍在基隆各據點，此後不再受清軍威脅[88]，即使撤出基隆之際，也無被追擊之慮。

法軍擬訂了三套進攻澎湖的計畫 。第一套計畫是假定西嶼砲臺有武裝時用的。 3 月 29 日，以「拜逸」號爲首的法國艦隊，排成單縱隊，沿著西嶼外垵岬航行，沒遇到任何攻擊，順利地通過彷彿無人防守、其實根本就是無人防守的的西嶼砲臺之前方海面。這就是《澎湖廳志》所說的「見西嶼內外塹有砲臺，夷船開砲擊之不中，而砲臺不回一砲·知其無備，乃直指媽宮港」。1885 年 3 月 29 日（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上午六時五十五分，孤拔下令實施第二套及第三套計畫。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1885 年 3 月 31 日） 孤拔率戰船，占領媽宮。法軍從占領的第五天起，開始釘死清兵遺棄的大砲，破壞廟宇，並毀去港底的火藥局，本欲燒湖東、湖西兩地營積之糧食，因人民懇求而止。孤拔以澎湖爲險要之地，想要長期占領做爲法國東洋軍港。然而，此時清法雙方已進行和議，於是相約停戰。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1885 年 6 月 9 日） 清法媾和，並在和約第九條規定，法軍自臺灣及澎湖諸島撤退。

[88] 羅剛，前書，頁 611。黎烈文（譯） 前書，頁 81-91。

-

圖十六　紅淡山清軍營房遺址　攝影/ 葉振輝　　2003 年

十二、停戰撤兵

雖然孤拔力主戰事，但是法國政府不想再繼續戰爭，孤拔因憤無後援，將士又傷亡頗多，媾和的第三天，終至病發身亡，他的職務改由副提督李士卑斯接任。而清國方面也有主戰派，督兵大臣彭玉麟反對停戰尤力，指責李鴻章喪權辱國。李鴻章辯稱，臺灣是中國的郡縣，而安南只是中國藩屬，寧可失去藩屬，也不能損及郡縣。停戰電文傳到福建時，左宗棠認爲文中只協議臺灣停戰，並未提及歸還基隆的事，於是上疏反對協議。然而，爲時已晚，劉銘傳到 4 月 16 日得到李鴻章電報，才知李鴻章早於 4 月 2 日（舊曆二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完成和約畫押（草簽） 換約後，中國軍隊撤至桂滇邊界，而臺灣法軍亦於 4 月 15 日（舊曆三月初一）解除臺海封鎖，各封閉的口岸也隨之重新開放。法軍掩飾得很好，撤出基隆好像是議和以後的必然結果。

6 月 20 日，記名提督蘇得勝經淡水抵達基隆，從法軍接收被虜華人。蘇得勝等軍官從靜肅的法國士兵前、走過法軍營舍，這才驚覺到：原來未能被打敗的敵軍人數居然那麼少 [89]。次日（舊曆五月初九）清晨，基隆法軍撤往澎湖，劉銘傳與楊岳斌、孫開華等前往接收基隆。 據 6 月 25 日寶順洋行寫給怡和洋行的信上透露，6 月 21 日和 22 日，法軍撤出基隆，前來接收的清軍，劫掠洋房，拆毀了法軍建在怡和洋行土地上的部分房屋 [90]。該年 9 月 1 日，英國駐淡水領事費里德(Frater)函報駐北京英國公使，稱清軍劫掠案已獲賠償 [91]。

---

[89] Garnot, op. cit., p.229.
[90] Jardine archive, B24/1/72.
[91] 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s and Legation,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I . To and from Tamsuy. 1885*. FO228/808, p.267.

-

十三、基隆善後

清廷特別重視澎湖和北臺防務。基隆的海門天險與淡水的北門鎖鑰，也都是清法戰後新造或改造的。臺灣巡撫劉銘傳從英國所買進的 31 尊後膛鋼砲，其中的 17 尊安裝在澎湖，13 尊在基隆和淡水、1 尊在打狗山（今壽山）大坪頂；另外，媽宮城在戰後也加強增築 。目前可知，當時布署在基隆的後膛砲 ，總計 8 尊，其中大沙灣 8 英吋 1 尊，二沙灣 8 英吋和 6 英吋各 1 尊，和平島（當時稱社寮島）12 英吋 1 尊、10 英吋和 8 英吋各 2 尊[92]。清法戰爭基隆之役的善後，造就了今天的一些古蹟，也引起了一些歷史憧憬。

十四、相關史蹟文物

（一）一級古蹟海門天險：位於基隆港東岸碼頭對面二沙灣山丘上，又名二沙灣砲臺，建於清道光年間中英鴉片戰爭時期。至 1884 年清法戰爭時砲臺大部份受損，清 法戰後整修，牆身以石塊堆砌 而成，頂部保留攻擊用之射口，額「海門天險」字。

（二）法國公墓：「海門天險」對面有一座於 1909 年興建的「法國公墓」，但大門深鎖，從未對外開放，在基隆有很多人對這座公墓的興建和由來，豪不知情，正如靜躺在基隆山頭的幾座砲台，例如海門天險或白米甕砲台，也變成觀光區的裝飾物一樣。1996 年 10 月 13 日至 20 日，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因「清法戰爭在基隆- 西仔反」紀念活動的舉辦。商得法國在台協會同意，9 月 8 日星期天中午 12 點到下午 6 點，法國公墓將首度對外開放。當天下午 3 點，正砂里里長俞明發及基金會成員，特別邀請數位天主教教友在法國公墓內，爲清法戰爭戰亡於基隆的法國亡魂舉行靜肅的天主教追思祈禱，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釋昭慧法師也會前來誦經超渡，以實現地球村情懷的新世界觀 [93]。

[92] 許毓良，前文，頁 300，「光緒 19 年基隆砲臺營建及數量表」。
[93] http://www.oceantaiwan.com/foot/da002-2.htm.

-

圖十七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一

圖十八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二

圖十九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三

圖二十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四

圖二一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五

圖二二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六

-

圖二三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七

圖二四　基隆法國軍人墓之八

（三）獅球嶺砲臺：獅球嶺指的是中山高速公路，經過大業隧道穿越的那座山嶺，是基隆進出台北盆地的必經之地，經七堵、錫口（松山）通達台北大稻埕；山巒迤邐，樹林濃密，山巒峻峰，處處險隘斷崖，居高臨下，其位置蟠踞成凹形環港地勢，是軍事要塞的天然重鎮。站在獅球嶺西北平安宮位置，往東北面山嶺望去，可看出山嶺形狀像獅子。有獅首和獅身，嶺下有一個原來是圓錐形的山丘已經鑿除一半，像是半球；獅身也因各種開山、堆土的緣故而略變形 [94]。

（四）槓子寮砲臺：由基隆交流道終點下高速公路，往市區的方向沿中正路前行，一路有路牌指標指示，再轉正豐街、祥豐街右轉立德路，上山後走泥土石子小路，就可抵達槓子寮砲台。一般人所知道的槓子寮砲台，是位於基隆市之東北山上信義區深澳坑，這一座古砲台，當初是爲了戰爭而設置，今日從砲台上方，可以鳥瞰基隆嶼及八斗子漁港全景，景色十分宜人 [95]。

（五）大武崙砲台：位於基隆市安樂區大武崙情人湖風景區的山頂上，是坑道堡壘式的軍事要塞；現有長達一千公尺的坑道，但入口甚小，具有防禦作用,防止敵人前進；前有小山丘遮擋，可避彈；四周設有石牆；依砲盤結構，可知當時設有輪子以轉動方向 [96]。這是基隆戰役末期開始整建的，日本時代可能也曾有一定的用途。

（六）西仔反七字仔：清法戰爭以後，有人編出一首臺灣史詩「西仔反」，全是七字一句，共有 96 句，其中提到基隆的事蹟，篇幅約占四分之一 [97]。對於劉銘傳棄守基隆，始終梗梗於懷 [98]；描述法國艦砲打中岸砲砲管，引發爆炸和火災；描述法軍攻陷獅球嶺以後，在福德祠前病倒、病故，都符合史實。基隆人當時認爲獅球嶺土地公顯靈，傳爲佳話。茲節錄第 9-18、45-46、57-60、77-88 句如下：光緒十年反西番，大銃扑來滿庄亂；欽差兮兵真好管，即時抽兵放予番。擇日擇

---

[94] http://www.ettoday.com/2004/09/03/329-1681374.htm.
[95] http://ezgo.coa.gov.tw/detail.php?theme.
[96] http://www.mcjh.kl.edu.tw/race/web82031/
[97] 陳憲國與邱文錫（合編），《臺灣演義》（臺北：樟樹出版社，1997），頁 177-188，原稿由黃灶生後代提供。
[98] 劉銘傳退到臺北府城，準備繼續南退，竟被憤怒的民眾軟禁在艋舺（今萬華）龍山寺，見：陳白，《被歷史遺忘的抗法保臺英雄》，《北京之春》，期 117（2003 年 2 月），頁 75-76。

-

時扑砲臺，欽差大奸都會知；銃子扑入砲臺內，內面發火燒出來。西仔大銃扑基隆，淡水聽著地都動……西仔插上獅球嶺，欽差流落到府城……西仔出世在番邦，起兵欲來征基隆；臺灣地理猶閣重，無彩興兵了戇工……西仔第一毋知死，也敢欲來用心機；臺灣毋是伊管理，見著福德病難醫。兵馬來到獅球嶺，來到福德廟前埕；好在土地有靈聖，顛來倒去滿廟坪。土地一時有主意，夜間柺仔舉一枝；番兵受著柺仔比，決定無藥通好醫……。

圖二五　二沙灣清軍墓碑

（七）清軍墓碑：在二沙灣砲臺遺址附近，發現有七塊石製墓碑，字跡雖難辨認依稀可看出係湘軍和淮軍軍官之墓碑，立碑年代在 1888-1890（光緒 14-16）年之間，即清法戰爭基隆之役以後，是否在該次戰役犧牲或因霍亂等傳染病而死，或戰後亡故，皆未可知。

十五、感想

清軍始終未能驅逐占領基隆、數量較少的法軍。法軍 1885 年 3 月的月眉山行動以前，劉銘傳若是先發制人，主動攻擊，結果或許大不相同，因爲法軍暴露在守軍射程範圍內，而且只有極少的軍艦可掩護法軍，劉銘傳坐失時機。其次，劉銘傳採用防堵長牆戰術，與從前勦捻的防堵類似，卻未提防敵人採用現代歐洲步兵山地游擊戰術，也許是因爲當時中國人的見識還不及於此。

120 年後，基隆市政府爲了已經發現的一級古蹟二砂灣砲台，二級古蹟大武崙砲台、槓子寮砲台，市定古蹟獅球嶺砲台、白米甕砲台等五座砲臺，打算在海門天險旁非古蹟區，籌設雞籠砲台文史館 [99]。基隆的古砲臺，實際上還有更多；以清法戰爭基隆之役而言，暖暖區與中正區之間隱藏在樹林草叢之間，未經發現

[99] http://www.ettoday.com/2004/02/17/736-1587421.htm.

-

的、而法軍遺留至今的地圖有註記的清軍砲臺，大多未被發現。現有知名的基隆古砲臺，儘管已經列入古蹟，相關的歷史並不十分清楚，仍有待加強研究。此時此地，淡江大學舉辦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甚有意義。提供拙作，共襄盛舉，頗覺愉快。

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

許文堂*

摘 要

發生在一百二十年前的清法越南戰爭，在法國似已逐漸成為被人遺忘的戰事，其歷年來出版的大量回憶錄、檔案文件、學術研究等大抵達成窮盡考察的共識，因此在既有的歷史定論下，反而容易自集體記憶中逐漸褪色甚至消失，畢竟法屬印度支那才是主體，清法戰爭只不過是插曲而已。

反觀中國方面，自清代以來，迄今已出版的文集、資料、研究幾可說是「汗牛充棟」。然而，對於清法戰爭中的若干史實仍有歧見，或有未盡充分明白之處，所以相關的評價自然也就矛盾互見各不相容。在經過兩個甲子的時光之後，清法戰爭仍籠罩在一片民族主義的迷霧中。正如西哲所謂：「人創造歷史，卻不了解他所創造的歷史」。

台灣無端被捲入清法戰火，無論是外交談判失誤或邊將啟釁，在在顯示戰爭本質的荒謬。本文將淡水、基隆戰役中的史實，透過清法兩國當時的通俗讀物------畫報所呈現給其民眾的「戰況」進行對比，從而指出史實與集體記憶的差異。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但是對於大部分民眾的集體記憶似乎不受影響，尤其當牽涉感情因素、宗教信仰，更使史實難以彰明。無論如何，科學研究應實事求是，對官文書紀錄、市鎮史誌的書寫，不應「誤導」民眾。

關鍵辭：清法戰爭、淡水、基隆、法越戰爭、點石齋畫報、集體記憶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發生在一百二十年前的清法越南戰爭，在法國似已逐漸成爲被人遺忘的戰事，[1] 其歷來出版的大量回憶錄、檔案文件、學術研究等大抵達成窮盡考察的共識，因此在既有的歷史定論下，反而容易自集體記憶中逐漸褪色甚至消失，畢竟法屬印度支那才是主體，清法戰爭只不過是插曲而已。反觀中國方面，自清代以來，迄今已出版的文集、資料、研究幾可說是「汗牛充棟」。然而，對於清法戰爭中的若干史實仍有歧見，或有未盡充分明白之處，所以相關的評價自然也就矛盾互見各不相容。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在經過兩個甲子的時光之後，清法戰爭仍籠罩在一片民族主義的迷霧中。正如西哲所謂：「人創造歷史，卻不了解他所創造的歷史」。

本文並無宏大的企圖冀望撥雲見日破舊立新，而僅僅呈現在這次戰爭中的淡水、基隆戰役中，透過清法兩國當時的通俗讀物 ------畫報，呈現給其民眾的「戰況」對比，從而解釋史實與集體記憶的差異。

1884 年 5 月《點石齋畫報》創刊於上海，由於印刷技術較爲先進，使用照像石印，畫報得以大量印製，是清末影響較大的畫報。尤其，創辦之初即以報導清法之戰而聞名，故選爲對照之用。至於法國畫報的 歷史較長，茲擇約當同時的《*La Terre illustrée*》與《*Illustration*》兩者爲參照之用。前者連載有「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一文，是清法戰爭的報導文學，後者則登有法越戰爭的報導，均足可供參考。

二、清法戰火殃及台灣

法國與越南因禁教問題，而在 1858 年引發衝突，1862 年法軍佔領南圻三省，兩國簽訂「柴棍條約」，許法國以傳教、通商自由，並割讓南圻之邊和、嘉定、定祥三省。[2] 1873 年 10 月，因涂普義（Jean Dupuis）航行紅河，往來雲南北圻之間商販的問題，再度引發法越衝突，法軍安鄴（Francis Garnier）爲劉永福黑旗軍設伏於懷德府之紙橋擊殺，戰端再起。[3] 法軍佔領河內及寧平、南定、海陽四省。雙方於 1874 年 6 月在西貢簽訂「甲戌條約」，內容計分二十二款，取代 1862 年的壬戌條約，其中影響清越關係最鉅者厥爲第二款：

> 「大富浪沙國大皇帝明知大南國大皇帝係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致大富浪沙國大皇帝自許幫助，又約定如或大南國儻有匪梗並外國侵擾，而大南國大皇帝有咨援者，則大富浪沙國即當隨機幫助要清，亦

[1] Rouil, Christophe.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Le Pigeonnier, 2001. "*Some Nearly forgotten Battles*", Taipei Times, November 15th. 2001.

[2] 《大南實錄》，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81）正編，第四紀，卷 26，頁 19-24。

[3] 《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 49，頁 33-34。

願剿絕海匪之擾掠於大南國洋分者，所有需費均屬大富浪沙國自受並無索還」。[4]

條文中「自主之權」意即越南非中國藩屬，而法國之「幫助」則跡近納入「保護國」(Protectorat)。和約第三款即言「大南國大皇帝應酬此許助之情，約定如有與各外國通交則須與大富浪沙國合意」。[5] 第五款更進一步確立法國在南部交阯支那所占六省的完全主權。

1878 年 10 月，廣西潯州副將李揚才竄入北圻爲亂地方，[6] 越南朝廷首度向清廷提及南圻失地一事，並請派兵協助平定北圻匪亂。由於自太平天國亂事之後，越南北圻即飽受清地股匪竄入擾亂地方之苦，越方也曾請清方派軍協勦。故而嗣德帝特別上奏清廷。[7] 越南首度提及南圻失地之事：「自咸豐年間上國偶遭多故，臣國孤立，以致已失南陲六省土地」，「皇仁一視，豈忍貽害一方」，以小國之恃大國以其能救患恤災爲理由，請求派軍助勦。因此光緒帝諭劉坤一、馮子材等迅速赴援殲匪，不得貽誤外藩。[8] 1879 年正月，兩廣總督劉坤一函總署，「查越南之於我朝本屬羈縻之國，閱其歷代紀載亦復帝制自為」，如今屢煩中國出兵助勦，全然「不思疆域各殊之理」。據劉坤一之見，北圻股匪只對法國不便，中國不能使越南拒法人，又何必爲法人除匪？[9] 劉坤一之札廣西左江防軍道趙沃要其招撫各匪，文中稱「越南有中國與法國為之應援」，已透露清法對越南承認雙重宗主權的訊息。[10] 而清軍入越「助剿」，長期駐軍，正是清法衝突之源。

1880 年，越南嗣德帝以隔年逢辛巳歲貢之期，遣吏部右侍郎阮述改授禮部銜正使，侍讀學士陳慶洊，兵部郎中阮懽充甲乙副使。又以北界太平天國餘黨及土匪劫掠，地方未靜，乃具邊情疏文，命阮述遞到廣西，祈派營弁防剿。[11] 越南此時不僅寄望清軍能剿平北圻匪亂，甚至可以協防，以抵抗法軍的進一步行動，因此派出使節求助。

1881 年春，清廷先後藉招商局唐廷庚、粵省鹽道馬復賁、水師守備黃秀玲等入越偵察情勢，此時清廷仍以防堵法國勢力滲入雲南、廣西爲要務。及至 9 月 14 日，駐法公使曾紀澤始頭一次向法外部提出照會，抗議「甲戌西貢條約」損及中國對越南之宗主權，提議清法協商解決越南問題。但並未否認此約之存在。[12] 負責對法交涉之全權大臣李鴻章不推翻此約，蓋多年前駐北京法使羅淑亞（Comte de Rochechouart）早已照會總理衙門。當時並未提出抗議，使此一基本原則問題成爲兩國衝突之根源。當時雲貴總督劉長佑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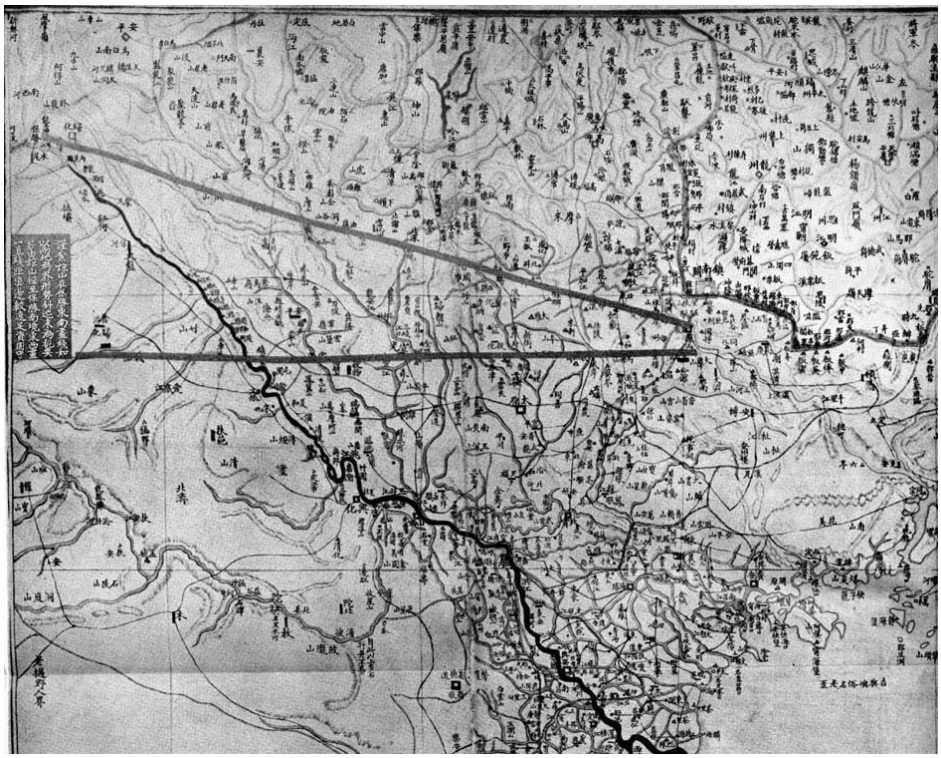
[4] 《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 50，頁 7-8。
[5] 《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 50，頁 7-8。
[6] 《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 60，頁 24。
[7] 《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 60，頁 31。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冊一，頁 91-92。
[9] 前引《中法越南交涉檔》，冊一，頁 85-90。
[10] 前引《中法越南交涉檔》，冊一，頁 85-90。
[11]《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 63，頁 41。《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131，頁 26。
[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冊 1，頁 169。

法國占據北圻乃爲圖謀滇 、桂，直趨四川、湖南。如能驅逐日本 ，恢復琉球 ，則法亦不敢進窺西南 。[13]

1882 年春，法、越又以北圻行商問題發生衝突 。法軍攻下河內 ，要求越南接受前約保護商旅 ，法國得置商務機構於北圻各地 。阮廷以內有黑旗軍劉永福助戰，外遂以宗藩關係爲訴求向清廷求援 。[14]

就法國之立場，認爲越南此舉有違 1874 年「甲戌之約」 是企圖拉攏中國以阻礙法國行使權利 ，而越南殖民地乃歷經多年經營所取得無可否認的利權，是該國在遠東發展的橋頭堡 ；至於清帝國作爲所謂的宗主國 ，並未曾對其藩屬與其他列強的交涉而有所介入干涉乃至於抗爭 ，例如法國曾出兵高麗，英之佔領緬甸 ，日之侵琉球 、朝鮮，清廷均未能有效反應 ，與西方國際法觀念之「宗主國」名實不符，因而法國強力干涉之策遂成 。[15]

清越就此進行協商，1883 年 1 月，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Frédéric-Albert Bourée）達成初步草約，其大要有三點：一、中國自越撤軍，法國聲明無侵占土地之意 ，亦無害於越南主權 ；二、法國得自紅河通航貿易 ，中國在保勝立關 ；三、中法在雲南 、廣西與江河間之地畫界 ，北界歸中國管轄，南界由法國巡查保護 ，共同抵拒外力侵犯北圻 。[16] 圖中水平線左側方塊內



註明：「謹案諒山在保勝東南 ，畫線如以兩地為界 ，形勢斜迤未為扼要 ，若

[13] 前引《中法越南交涉檔 》，冊一，頁 156-165。
[14] 前引《中法越南交涉檔 》，冊二，頁 709-712。
[15] Cordier, Henri. *Le Conflit entre France et la Chine,* Paris: Leopold Cerf, 1883, pp. 5-6.
[16]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 》（北平：清華大學 ，民國 24 年），頁 72。

由諒山徑自保勝南境，東西畫一直線，距滇邊較遠，足資固守」，[17] 此乃軍機處針對法方寶海提議之上方斜 線所做的對策。[18]

然而此約爲清議派不容，法方則以此約與 1874 年甲戌和約抵觸，召回寶海，改派巴德諾（巴德哪，Jules Patenôtre）爲駐華全權公使，未到前以駐北京代辦謝滿祿（Comte de Semaillé）繼續談判。1883 年 3 月，法國會通過增援北圻議案。5 月又以駐日公使脫利古（德理固，Arthur Tricou）爲談判特使。此時北圻戰事不斷，黑旗軍劉永福與法軍李維業（李葩利，Henri Rivière）戰於懷德府紙橋，是役李維業陣亡，於是法方再度增兵。7 月中嗣德帝薨。8 月，法軍在遠東艦隊司令孤 拔中將（vice-amiral Courbet）率領下攻占順化，越南被迫簽城下之盟。

1884 年 5 月間，法國駐華全權公使巴德諾先行抵越，[19] 6 月 6 日在順化與越吏部尚書阮文祥、戶部尚書范慎遹、尊室漩議定「甲申和約」十九款，約中第一款安南承認並接受法國的保護，在一切對外關係上法國將代表安南，在外國的安南人將受法國的保護。[20] 簽約換文前，在順化法國使館，將清廷冊封敕給之鍍金駝鈕銀印「大南國王之印」當場銷融鑄成銀塊，表示清越之間封建藩屬關係的永久斷絕。[21] 此後之交涉已轉變爲中、法兩國間的外交爭戰。

5 月 11 日，李鴻章與福祿諾訂天津簡約，福請李應自北圻限時撤軍，諒山方面以 6 月 6 日前撤離，保勝方面以 7 月 1 日接防，李僅答以儘速撤離，致未見明文規定。6 月 23 日法軍由杜堅尼上校（colonel Dugenne）率領抵北黎（即北麗屯 Bac-Lé）要求清軍三日後交出諒山城，駐軍廣西提督王德榜以未奉命撤離，雙方爆發衝突，[22]是役法軍死 28 人，傷 46 人，巴黎方面群情激動，稱「北黎事件」。清方稱「觀音橋事件」或「諒山事件」）

法國總理茹費理電李鴻章責其背信，駐北京代辦謝滿祿（Comte de Semaillé）亦奉令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法國通牒限清軍於 7 日內撤退，賠償 1250 萬兩銀。清廷答應已進行撤軍，惟不允賠款，新任法使巴德諾 7 月 1 日抵滬，與欽命兩江總督曾國荃在上海談判，[23] 至 8 月 2 日宣布破裂，法國以後採「自由行動」，也就是報復性的懲罰，此爲據地爲質的抵押政策，以迫清

[17] 中國史學會編，《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年，全 7 冊），冊 1，書前頁附圖（一），未編頁碼。

[18] 同前引《中法戰爭》，冊 6，頁 103。

[19] 《大南實錄》正編，第五紀，卷 4，頁 7。

[20] 前引《中法戰爭》，冊 7，頁 371、376。此乃據法文版譯出。《大南實錄》正編，第五紀，卷 4，頁 8，越官方紀錄爲：「大南國自認大法國保助，其義是大南國有與何外國交通，則大法保助其事，並大南人民有居在諸外國者，大法亦爲之保助」。即所謂保護國條款。

[21] 《大南實錄》正編，第五紀，卷 4，頁 9。

[22] 《大南實錄》正編，第五紀，卷 4，頁 14-15。前因廣西巡府徐延旭、黃桂蘭等延誤軍機遭下部議處，故軍紀較嚴。

[23] 交涉過程詳情可參閱：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商務，1996 年），頁 127-147。

廷就範。清廷也先期於 7 月 10 日派劉銘傳赴台防備 ，於 16 日抵台。

1884 年 8 月 2 日，停駐在福建閩江的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遣列士卑少將（contre-amiral Lespès）往攻基隆，以解除武裝防衛、奪取煤礦爲目標。[24] 列士卑以 La Galissonière 爲旗艦，率巡洋艦 le Villars、砲艦 le Lutin，三艦於 4 日 11 時抵基隆，5 日上午 8 時開炮，岸上炮台完全被毀 ，清軍倉惶撤離 ，將存煤火燒，並毀壞採煤設備 。7 日，列士卑報告孤拔 ，認爲基隆不值得一佔 ，因其煤質火力不適於船艦之用 。[25]

8 月 16 日，茹費理獲國會授權進攻福州 ，[26] 孤拔得令遂在 8 月 23 日發動攻擊，30 分鐘之內時間完全摧毀福州造船廠 ，炮台及七艘軍艦 。法軍僅損失一艘魚雷艇 ，死傷 30 人。[27] 9 月 14 日，孤拔建議法國政府北上佔領威海和旅順，其次是廟島群島 ，將可迫使清廷屈服 。但法國不願擴大戰事 ，佔領通商海口，致招各國干涉 ，故授權孤拔據基隆爲補給地 。[28] 9 月 30 日，遠東艦隊師分兩路，孤拔率 le Bayard 爲旗艦，加上 le Lutin, le Drac, le Tarn, le Nive, le Saône, le Châteaurenault, le Duguay-Trouin, le Parseval, l'Aspic 等諸艦往基隆 。列士卑率 la Galissonière, la Triomphante, le d'Estaing 等往淡水。艦上裝載海軍陸戰隊軍官 53 人，士兵 1800 人。[29]

10 月 1 日，法軍於清晨 6 時登陸基隆 ，激戰之後 ，清軍損失 400 多人，法軍則有 18 人受傷。[30]淡水方面因淡水河口已爲清軍以石沈船 ，築成堤壩，船不得入，故法艦皆泊於沙崙外海 ，距新砲台 3400 米，距白砲台 2500 米之遠處。[31]10 月 2 日清晨，清軍先發制人 ，炮擊法艦，但不甚得力。法艦也因旭日逆光及晨霧緣故 ，難以準確瞄準回擊 ，但未幾即摧毀白砲台 ，繼之新炮台亦毀。由於法軍偵知淡水河中佈有電線水雷 ，故擬先派兵登陸攻佔控制站 ，以解除障礙，列士卑往報孤拔增兵 ，獲增援 600 人。[32]

10 月 8 日晨 10 時，法海軍 600 名登陸作戰，岸上清軍孫開華 3 營守南部，章高元，劉朝祐 4 營守中路，土勇張李成 1 營守北路。雙方激戰至 12 時，法軍因遭激烈抵抗而撤退 。此役清軍死 80 人，傷 200 餘人，至於法軍則有 17 死，49 傷。[33] 法軍被捕之軍官封丹上尉 （Capitaine Fontaine）及戰死者均被斬首，懸於福佑宮前示眾 ，經法軍透過英國領事干涉方才取下 。[34] 此役清方稱

---

[24] Garnot, Le Capitaine Eugen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1884-1885*, Paris: Delagrave, p.24.
[25] Garnot. Op.cit. p.25-30.
[26] Ibid. p.31.
[2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 235-237。
[28] Garnot. Op.cit. p.36-38。
[29] Garnot. Op.cit. p.40-41.
[30] Garnot. Op.cit. p.42-46.
[31] Garnot. Op.cit. p.49.
[32] Garnot. Op.cit. p.50-53.
[33] Garnot. Op.cit. p.56. 另見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4），頁 53。
[34] Dodd, John.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Taipei: Cheng-Wen, 1972 (rep. of 1st edition of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p.52.

「滬尾大捷」，朝廷於 11 月 6 日賞銀一萬兩。淡水之役的結果是清廷主戰派一時抬頭，和談爲之中止。

往後數月之間，淡水港口既封，法軍雖未再攻淡水，僅於據守之基隆附近偵察地形、掃蕩土勇，並以實施海上封鎖爲主要任務。至 1885 年 2 月，法軍宣布米糧爲查禁物資，稽查海面各輪，漕米北運亦告受阻，華北大有飢荒之虞，3 月又往據澎湖爲質，使清廷備受糧食壓力。加以去歲朝鮮發生甲申 12 月 4 日政變，日本虎視眈眈，更使清廷急欲結束戰爭。

在北圻方面，山西之役，黑旗軍敗走，之後北寧、太原相繼失守，法軍再陷諒山、鎮南關、宣光等地。但 1885 年 3 月，馮子材軍獲得戲劇性的鎮南關、諒山大捷，使法國政論以犧牲過大、軍費繁浩之由，導致茹費理（Jules Ferry）倒閣。[35] 另一方面，清廷以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爲介，4 月 4 日由其私人代表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在巴黎與法外長畢樂（Albert Billot）簽訂和議，即雙方停戰，回復到去年之李福天津簡約爲議和底本。故在 4 月 15 日，法艦即告解除封鎖行動。

6 月 9 日，李鴻章與巴德諾在天津簽定「中法越南條約」十款。其中李鴻章最爲在意者是第二款，「法國與越南自立之條約章程，或已定者或繼立者，現時並日後均聽辦理。至於中越往來言明必不致有礙中國威望體面，亦不致有違此次之約」。[36] 實則戰敗國何來「威望體面」之「帝儀戴」可言？

1885 年 6 月 11 日，孤拔病逝於澎湖，遺體由旗艦 le Bayard 運送回法國，接受隆重國葬。6 月 21 日，法軍全部撤離基隆，7 月 22 日始全部撤離澎湖。法軍遺留在基隆的墓園埋葬了 6~700 名海陸官士兵，其中約 120 人是死於戰鬥，約 150 人是因傷而死，其餘都是因感染霍亂、傷寒、赤痢等流行傳染病而死。[37] 根據當時居住台北的外商記載，每年夏天必有時疫發作，如霍亂、傷寒、赤痢等傳染病造成大量死亡。清軍接收基隆之後，也因傳染病，每日造成爲數三十人以上的死亡率。[38]

十年後，日軍登陸台灣一樣面臨了嚴重的衛生問題，日軍戰死者遠少於因傳染病而死者，共約 5000 人。[39]

三、圖像、文學、述奇、史實

上海《申報》創辦于 1872 年，由英人美查（Ernest Major）兄弟及三名股

[35] 陳三井，〈茹費理的殖民思想及其對華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1980），頁 269-289。

[36] 中國史學會編，《中法戰爭》，冊 7，頁 422-425。李鴻章對於「威望體面」之譯爲法文 (dignité)「尊嚴」作「帝儀戴」甚爲滿意。

[37] Rouil, op.cit. p.150. 另據 Garnot 的說法，有 20 餘名軍官，500 餘名海陸軍士兵葬於此地。Garnot, op.cit.,p.73.

[38] Dodd, op.cit., p.173-174.

[39] 鄭天凱，《牧台圖錄》，台北：遠流出版，1995），頁 31。

東所辦，[40] 由於內容新奇 ，國內外大事亦多 ，因此極受歡迎 ，爾後美查又於 1878 年創辦點石齋印書局 ，[41] 專事翻印刻板書 ，獲利甚豐 。[42] 因此，1884 年 5 月又推出畫報 ，與《申報》隨售，頗有相益得彰之效 。

由《點石齋畫報 》出刊時 ，點石齋主人美查所作之序言很可見其出刊之動機：

「畫報盛行泰西 ，蓋取各館新聞事蹟之頴異者 ，或新出一器 、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說，以徵閱者之信 。而中國則未之前聞 ，同治初，上海始有華字新聞紙，厥後申報繼之，周諮博采賞奇析疑 ，其體例乃漸備 ，而記載事實必精必詳，十餘季來海內知名，日售萬紙猶不暇給，而畫獨闕如，旁詢粵港各報館亦然 ，於此見華人之好尚 ，皆喜因文見事 ，不必拘形跡以求之也。僕嘗揣知其故，大抵泰西之畫不與中國同 ，蓋西法嫻繪事者務使逼肖 ，且十九以藥水照成 ，毫髮之細，層疊之多，不少缺漏，以鏡顯微能得遠近深淺之致 ，其傳色之妙，雖雲影水痕、燭光月魄、晴雨晝夜之殊，無不顯豁呈露，故平視則模糊不可辨窺 ，以儀器如身入其境中 ，而人物之生動尤覺栩栩欲活 。中國畫家拘於成法 ，有一定之格局，先事布置，然後穿插以取勢 ，而結構之疏密 ，氣韻之厚薄，則視其人學力之高下，與胸次之寬狹 ，以判等差。要之，西畫以能肖為上 ，中畫以能工為貴，肖者真，工者不必真，業既不皆真，則記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 ？然而如圖書集成 、三才圖會，與夫器用之制 、名物之繁，凡諸書之以圖傳者，證之古今不勝枚舉。顧其用意所在，容慮夫見聞混淆，名稱參錯，抑僅以文字傳之，而不能曲達其委折纖悉之致 ，則有不得已於畫者 ，而皆非可以例。新聞也，雖然世運所至 ，風會漸開，乃者泰西文字 ，中土人士頗有識其體例者 ，習處既久，好尚亦移。近以法越搆釁 ，中朝決意用兵，敵愾之忱，薄海同具，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 ，市井購觀，恣為談助。於以知風氣使然 ，不僅新聞即畫報亦從此可類推矣 。爰倩精於繪事者，擇新奇可喜之事 ，摹而為圖，月出三次，次凡八幀，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而茗餘酒後展卷翫賞 ，亦足以增色舞眉飛之樂 ，倘為本館利市計，必謂斯圖一出 ，定將不翼而飛 ，不脛而走 ，則余豈敢。光緒十年暮春之月尊聞閣主人識　美查」[43]

美查之《申報》既對法越之事長期報導 ，對市面上「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市井購觀，恣為談助 」一事，一定了然於心 ，且視爲極大商機 。如下圖所示，當時市面上販售純粹想像之 「法蘭西與劉義 大戰形圖 」，內容空洞 ，只

[40] 宋軍， 《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6），頁 7。徐載平、徐瑞芳， 《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頁 2-3。
[41] 《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 334。
[42] 宋軍， 《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6），頁 49-50。
[43] 《點石齋畫報》，甲一，第 1 號，1-2。

見「豈蔻山」後「細看內有萬軍之勇」，一紙售價值銀一分，尚且搶購一空。因此，乘機推出《點石齋畫報》此其時也，事實也證明該畫報獲得世人喜好。

自光緒十年（1884 年）甲申四月中浣起，每旬印行一次，圖凡八帧，價洋五分，隨《申報》發賣。第一號稱甲一，以次爲甲二，依序至甲十二號，集成一輯，再轉由乙字排序，全部順序計分爲：按天干之序，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共十輯；按地支之序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戌、亥，共十二輯；按八音分爲金、石、絲、竹、土、革、木，共八輯；按六藝分成禮、樂、射、御、書、數，共六輯；接下來的爲文、行、忠、信、元、亨、利、貞，共八輯，全部四十四輯。[44]

《點石齋畫報》中有關清法戰爭者，經初步檢索所得如下：

力攻北甯（甲一頁 3）、輕入重地（甲一頁 4）、越事行成（甲三頁 19）、自取撓敗（甲七頁 51）、法使抵滬（甲八頁 62）、爵帥抵滬（甲十頁 75）、天鑒不遠（甲十頁 77）、基隆懲寇（甲十一頁 83）、吳淞形勢（甲十二頁 91）、法敗詳聞（甲十二頁 92）、法犯馬江（乙一頁 3）、法人棄尸（乙二頁 12）、基隆再捷（乙三頁 21）、法酋孤拔（乙五頁 35）、臺軍大捷（乙六頁 42）、不容逼處（乙六頁 46）、梟法示眾（乙七頁 50）、練軍入海（乙八頁 58）、以迎王師（乙八頁 59）、爲龍之光（乙十頁 76）、甬江戰事（丙九頁 67）、法艦兵叛（丙九頁 71）、幸獲生還（丙十頁 76）、法人殘暴（丙十二頁 92）、天牖其衷（丁二頁 10）、滬尾形勢（丁三頁 18）、孤拔真像（丁七頁 49）、和議畫押（丁七頁 50）、漕米起運（丁八頁 58）等各圖說，尚未計入清軍相關人物如劉軍門小像（寅十頁 60）、李傅相（鴻章）、曾襲侯（紀澤）、劉銘傳、孫開華等人皆曾入畫。

刊出的圖像中與台灣戰役有關者爲：基隆懲寇（1884 年 6 月下浣）、法敗詳聞（1884 年 7 月上浣）、基隆再捷（1884 年 8 月上浣）、臺軍大捷（1884 年

[44] 《點石齋畫報》，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83）五函共四十四輯。元、亨、利、貞、忠、信、行、文八集的排列方式上有爭議，陳平原認爲先"元亨利貞"，而後"文行忠信"的排列順序，是錯誤的，應該倒過來。

9 月上浣） 梟法示眾（1884 年 9 月中浣） 和丁集第三的第三十九號滬尾形勢（1885 年 4 月上浣）。

現以與台灣相關之第一幅 「基隆懲寇 」內容爲例 ，只見畫者吳友如將滿山遍野繪滿劉銘傳軍 ，團團困住來侵法軍 ，迫使退回艦上 。其內文說明：

「基隆一島屹峙閩省洋面 ，左臺灣而右福州 ，澎湖在其北巖疆也 。上令閩省三爵帥馳防臺灣 ，而澎湖、基隆皆其所管轄 。法以索費不遂 ，遽於十五日朝八點鐘寇犯斯土 ，相持約五點鐘，時我燬其兵輪一艘名未 拉司者。寇見我炮台有損 ，遂揮兵四百名 ，攜炮四尊登岸 ，經劉爵帥飭臺灣鎮章總戎率隊由後包抄 ，斃寇百數十名，生擒酋目一名，奪獲法炮四尊，旗幟、帳棚等物甚多 ，餘俱逃入兵船 ，退出海口 。夫其眈眈於此 ，仍是舍堅攻瑕之故智 ，然而一經肇釁 ，敗衄遽遭 ，設非我聖朝大度包容 ，則欲其靡有孑遺 ，直指顧間事耳 ，螳臂當車殆我岌岌乎 ？（吳友如繪）」[45]

8 月 5 日上午 11 時，法海軍少將列士卑抵基隆 ，隨即派副官登陸 ，要求守軍投降。次晨 7 時 30 分再發最後通牒 ，未復，法軍遂在 8 時正開炮 ，清軍也同時回擊 ，在戰鬥一小時後 ，基隆三個炮台及火藥庫全被摧毀 ，法軍無傷亡。當日下午 ，法國陸戰隊前往偵察煤礦所在 ，遭遇 2500 名清軍 ，經過 4 小時激戰，法軍陣亡 2 人，負傷 11 名。列士卑以兵力不足無法佔領市街及煤礦 ，派 le Lutin 開往上海發電報告巴黎政府 ，另一艘 le Villars 駛往馬祖，向駐在當地的孤拔報告戰果 。La Galissonière 則留守基隆港監控 。[46]

[45] 《點石齋畫報》 基隆懲寇（甲十一，頁 83） ，1884 年 6 月下浣。
[46] Garnot, op.cit., p.25-30。

接著下一期的《點石齋畫報》卻刊出了「法敗詳聞」，圖繪法軍爲清兵追趕墜崖下海的慘狀。解說之內容是：

「基隆一役，前將戰勝情狀繪畫成圖，呈電諸君矣，近得日耳曼人來滬述及戰事尤為詳細，其時彼船亦在基隆海面，親見法人扯旗開炮，燬我炮台，台上火藥被炸，華兵遂退。此時，法弁派兵三百名，攜車輪炮四座，大小旗幟、帳棚一切登岸，偏置炮台以及台後山上。方欲前進，而華軍約千人嚴陣以出，相與對敵，法大不支，委旗、棄炮、倒戈爭逃，棚帳、衣帽隨路遺棄，墮崖落澗死亡枕藉，奔至水邊又以船離岸遠，相率下水，而又為海水漂沒，幸有小划子趕來相救，乃剩一半歸船，否則三百人無一生還矣。又云法兵素稱勁旅，生平觀戰亦經數次，從未見此次法人之敗之狂奔亂竄狼狽不堪者，於此可見華軍之可用，而法人之勝之落矣。以上皆日耳曼人所述於尊聞館主人者，竊思此人係局外人，無所諱亦無所飭，即謂為實錄可也。兵事不厭精詳，見聞較確，用再繪圖，以供眾賞云。（張志瀛繪）」[47]

如果此事屬實，登陸法軍被殲滅一半，豈不達一百五十人之多？但此事絕非真實，清軍戰鬥皆有紀錄，傷亡人數姓名一一列表上報，豈能有誤！[48] 倒是劉銘傳所上之〈敵陷基隆炮台我復破敵營獲勝折〉，對戰況有此描述：

[47] 《點石齋畫報》，法敗詳聞（甲十二，頁 92），1884 年 7 月上浣。
[48] Dick de Lonlay, *Au Tonkin, 1883—1885*,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86, p.544.

「…擊倒山巔擁纛之法酋二人，與山下法兵頭一人，敵軍大潰。我軍一鼓登山，當破敵營，奪獲洋槍數十杆，帳房十架，並獲其二纛，斬首一級。探報法兵傷亡者百餘人。逐北至船邊始返我軍傷亡才數人」。[49]

如此冒名貪功，卻被《申報》的一則消息打了問號，該報登出「法不認敗」一文指出：「據法國官場所傳，則云法兵敗信，系屬子虛」。[50]

不過中國讀者也許寧可相信畫報所顯示的輝煌戰果，不僅多俘獲 4 尊大炮，尚且擊毀一艘軍艦，士氣因而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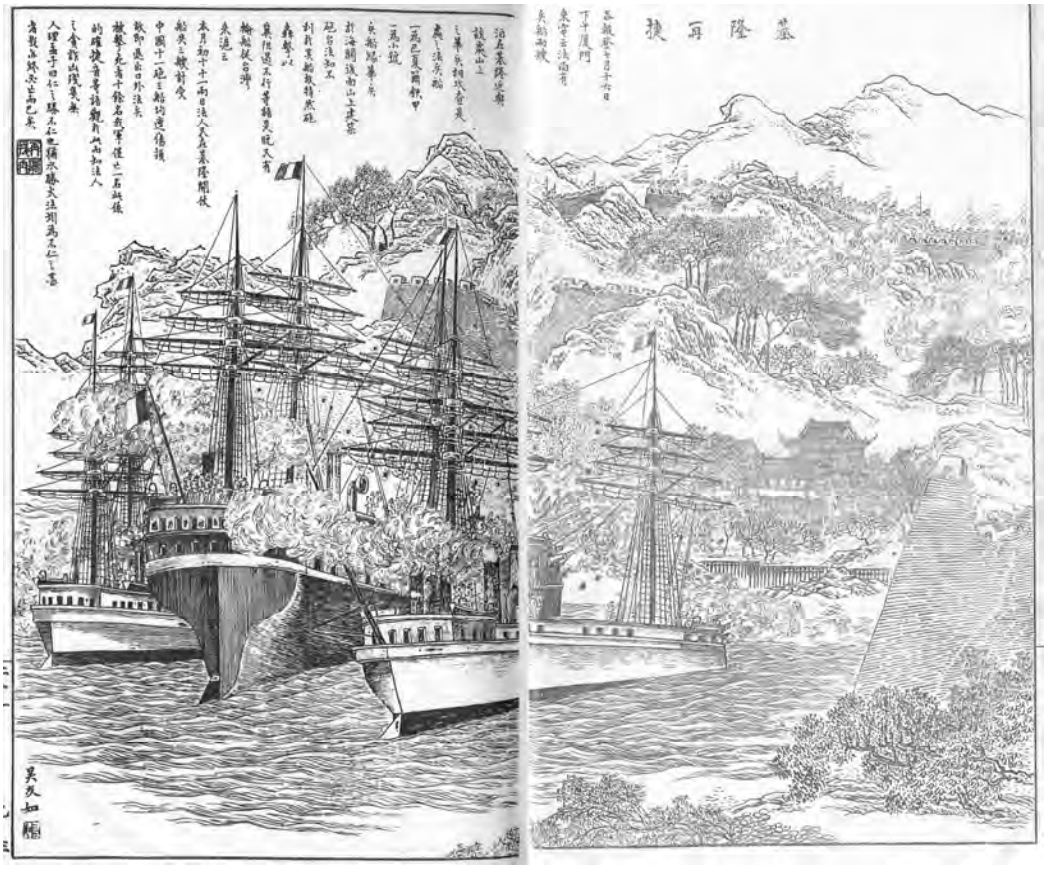
接下來的「基隆再捷」一文更讓人莫名其妙，依其內容說明稱：

「各報登七月十六日（9 月 5 日）下午，廈門來電云：法尚有兵船兩艘，泊在基隆近與該處山上之華兵相攻，查是處之法兵船，一為巴夏爾鐵甲，一為小號兵船，緣華兵於海關後面山上建築砲台，法知不利於其船，故特燃砲轟擊，以冀阻遏不行等語。是晚，又有輪船從台灣來滬，云本月初十、十一兩日（8 月 30-31 日），法人又在基隆開仗，船共三艘，計受中國十一砲，三船均遭傷損，故即退出口外，法兵被擊死者十餘名，我軍僅止一名，此係的確捷音等語。觀於此而知法人之貪詐凶殘幾無人理，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法矧為不仁之甚者哉，亦終

[49] 〈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3，頁 3410-3412。
[50] 《申報》，1884 年 8 月 14 日。

必亡而已矣！（吳友如）」[51]

此事可能是指 9 月 2 日孤拔乘 La Triomphante 戰艦至基隆，與 Le Bayard 及 Le Lutin 兩艦會合，視察戰情。[52] 問題是，基隆炮台早已告摧毀，清軍如何能開炮十一發，致使三艦皆受創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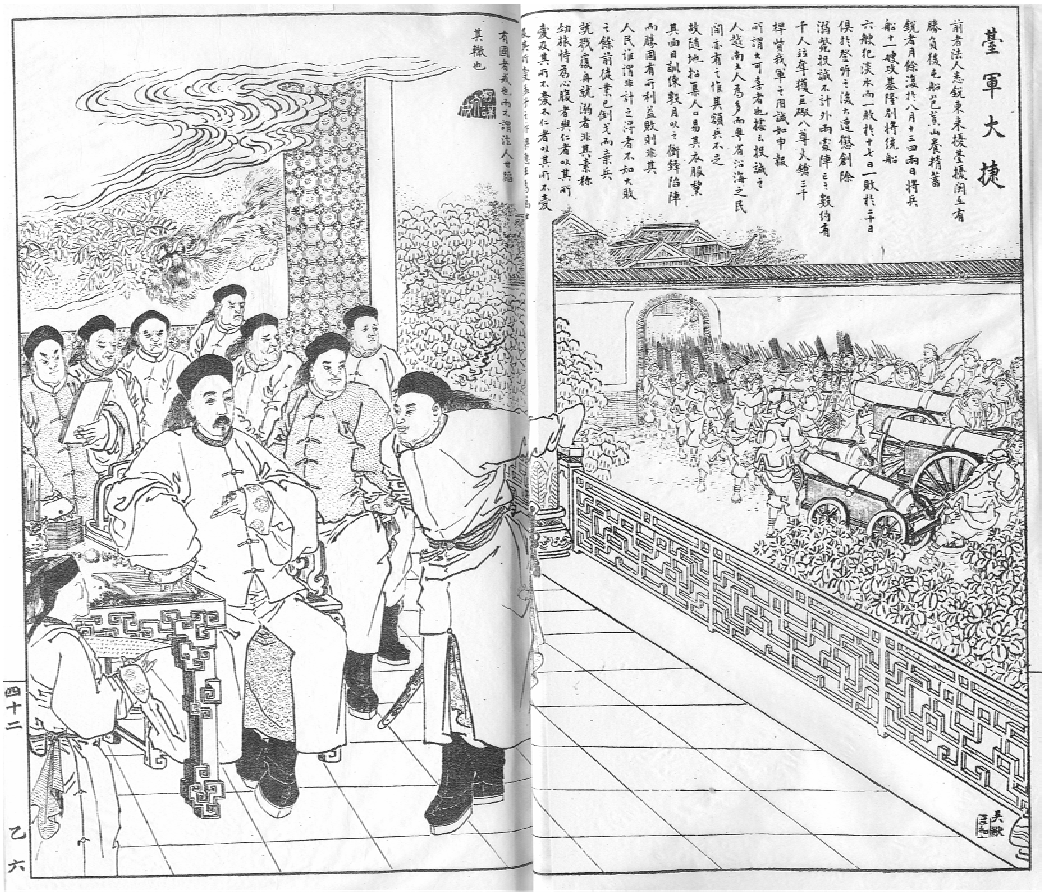
「台軍大捷」一圖描繪 10 月 8 日淡水之役。圖中雍雍大度之清官，自爵帥以次，個個彷彿中興名臣圖像，運帷籌握而將來犯法軍擊退。其內文曰：

「前者法人悉銳東來，擾臺、擾閩互有勝負，後屯船芭蕉山，豢精蓄銳者月餘，復於八月十三、四兩日，將船十一艘攻基隆，別將統船六艘犯淡水，而一敗於十七日（10 月 5 日），一敗於二十日（10 月 8 日），俱於登岸之後，大遭懲創，除溺斃、投誠不計外，兩處陣亡之數約有千人，竝奪獲巨礮八尊，火鎗三十桿，貲我軍之用。誠如《申報》所謂大可喜者也。據云投誠之人，越南土人為多，而粵省沿海之民間亦有之，惟其額兵不足，故隨地招集人口，易其衣服黧其面目，訓練數月以之衝鋒陷陣，而勝固有所利益，敗則非其人民，誰謂非計之得者？不知大敗之餘，前徒業已倒戈，而棄兵就戮覆舟就溺者，非其素稱勁旅恃為心腹者與？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之斥梁惠

[51] 《點石齋畫報》，基隆再捷（乙三，頁 21），1884 年 8 月上浣。
[52] Garnot, op.cit. p.32,35.

王為萬世有國者戒也，而不謂法人甘蹈其轍也。（吳猷友如）」[53]

如果所言「除溺斃、投誠不計外，兩處陣亡之數約有千」可信的話，清軍早已獲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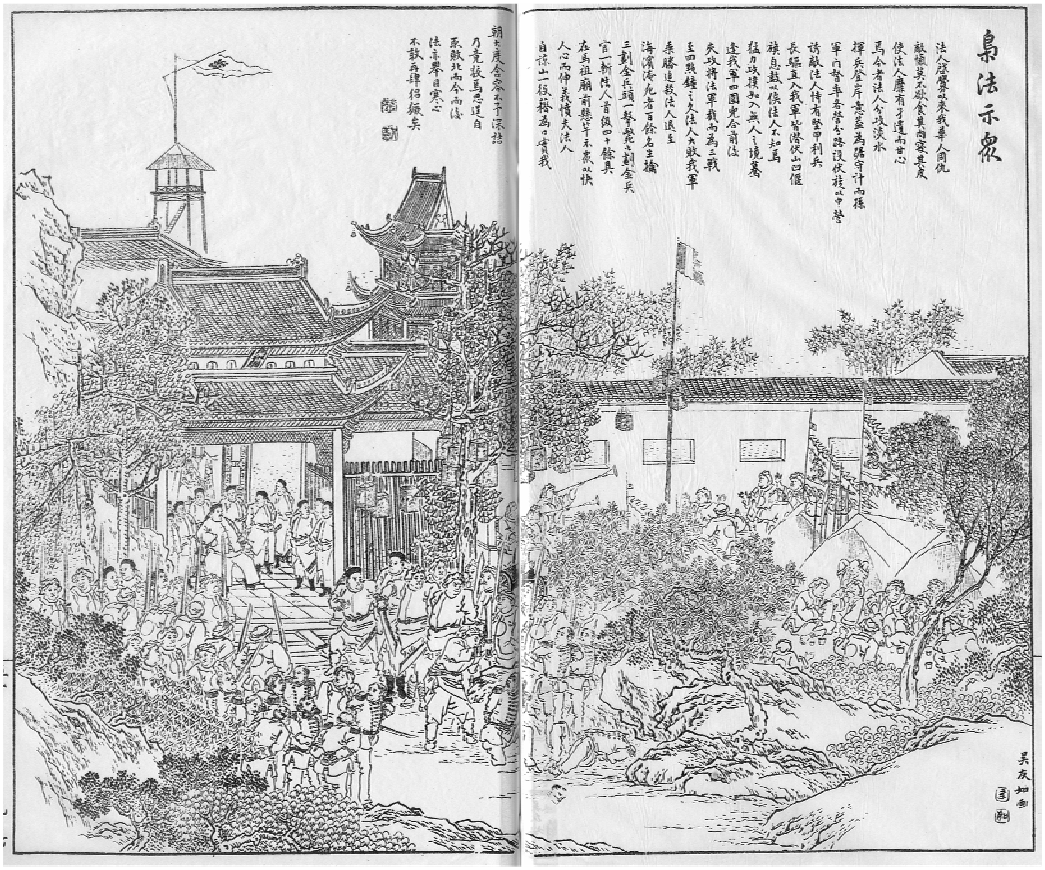
而乙輯第七集之「梟法示眾」，則純粹滿足中國人喜好圍看刑場砍頭的心理，看淡水一役被俘法軍身首異處之時，同仇敵愾之氣得以伸張。其解說爲：

「法人啟釁以來，我華人同仇敵愾，莫不欲食其肉、寢其皮，使法人靡有子遺而甘心焉。今者法人分攻淡水，揮兵登岸，意蓋為踞守計，而孫軍門督率各營，分路設伏，旋以中營誘敵，法人恃有堅甲利兵，長驅直入，我軍皆潛伏山凹，偃旗息鼓以俟，法人不知焉，猛力攻撲如入無人之境，驀逢我軍四圍兜合，前後夾攻將法軍截而為三，戰至四點鐘之久，法人大敗，我軍乘勝追殺，法人退至海濱，淹死者百餘名，生擒三劃金兵頭一，擊斃七劃金兵官一，斬法人首級四十餘，具【俱】在馬【媽】祖廟前懸竿示眾，以快人心而伸義憤。夫法人自諒山一役藉為口實，我朝大度含容不予深詰，乃竟狡焉思逞，自取敗北。而今而後，法亦舉目寒心，不敢再肆猖獗矣。（吳友如繪）」[54]

不過內容所說，三劃金兵頭應指在岸邊被俘之受傷上尉封丹　，至於擊斃

[53] 《點石齋畫報》，臺軍大捷（乙六，頁 42），1884 年 9 月上浣。
[54] 《點石齋畫報》，梟法示眾（乙七，頁 50），1884 年 9 月中浣。

七劃金兵官不知何指 ？難道是列士卑不成 ？顯然並非事實 。而斬獲的首級也增多了二十餘級 ，不知以何物混充 。



最後，「滬尾形勢」是追記去歲 10 月 8 日淡水大戰之地形圖 ，畫工十分迫肖，只是內容所云法軍戰斃 、溺斃數百人 ，又再度誇大戰情 。請看內文：

「三月初，台灣擢勝營友遞來滬尾地圖一紙 ，其中一切布置井井有條 ，爰倩名手臨撫一通 ，並附誌數語，以告世之留心形勢者 。滬尾之山分南北，北曰大屯，南曰觀音，水在中央，海口西嚮口之窄處塞以竹排 ，排外有竹網網之，外埋水雷十餘具，其護水雷者則沉溺之石船焉 。由石船而水雷，而竹網，而竹排，凡四重。而又慮為敵所乘 ，復於排內伏水雷二十餘具，此水路之設防嚴密也 。大屯西麓，圍以長城，城有炮駐兵守之，向東地勢漸高，壘石為座，方可數十畝，置巨炮其上，是謂大炮台 ，分駐五營築城，以為屏蔽，再進則南面為滬尾街 ，即洋人設埠通商處 ，英有護商兵輪泊焉 ，山北港道分歧 ，有兵三營駐其處 ，為大屯之後路 。觀音與大屯相為犄角 ，而大小之數止及其半 ，其西面海口，前敵一營 ，為後援，不設炮台，挖濠數重以自守 ，濠外沙灘築有水城 ，藏兵其中看守堵口料物，與陸兵相呼應，此陸路兩岸之設防嚴密也。去秋滬尾之戰，法人戰斃、溺斃者約數百人 ，而其登岸之處 ，即在長城之外 ，是圖出而與親履其地目睹形勢者 ，無以異已也 ，而戰事可無煩贅述已 。 (吳友如

繪）」[55]

平心而論，該圖確有如「親履其地目睹形勢者」之效，但自報章以迄奏摺，全國上下能不浮誇者幾希。數月前「梟法示眾」所誇大的法軍溺斃百餘名，與時俱進變成戰斃溺斃約數百人。

現再以法國出版的《La Terre illustrée》（地球畫報》）爲例，這份畫報發行的時間很長，約與《點石齋畫報》同，自 1877 年創刊至 1949 年停刊。也因幾度易手經營而將刊名更動，不過總以探索世界各地之冒險經歷爲主題，故而是份受到一般大眾喜愛的周刊。最先，其刊名爲《Journal des voyages et des aventures de terre et de mer》，意爲《陸路及海上之旅行與冒險》，至 1886 年改名爲《Le Monde pittoresque》，（世界風光》）而 1890 年改作《La Terre illustrée》。在這份畫報上，於 1890 年起連載了一篇名爲《孤拔元帥的小水手》（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的文章，內容是由一位見習水兵寄給其母親和友人的信組成，記載了 1884 年 8 月至 1885 年 6 月間隨孤拔艦隊遠征時的事，這一系列以信件報導形式呈現的故事，和 Maurice Loir 的《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或是 Eugene Garnot 的戰史《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相互參照，有相當的符合，更添加了一些個人觀察的趣味性描述。當然，作者可能是位年輕的見習水兵，也可能是由寫

[55] 《點石齋畫報》，滬尾形勢（丁三，頁 39），1885 年 4 月上浣。

作高手捉刀改寫 ，因爲在結尾時 ，編者附記了一段希望讀者能獲得閱讀的喜悅，如同他們在謄寫 （或改編）時的樂趣 。[56]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在《地球畫報》連載時，也都配有插圖 ，相較之下顯得 真實可信 。

小水手 10 月 5 日的信中記述了攻佔基隆的情況 ，附圖是一群法國水兵英勇的登陸作戰 。[57] 先前 10 月 1 日的登陸基隆之戰 ，法軍很快便占領 Fort Clément（今之外木山）小水手記道：「我們又棒又漂亮的國旗飄揚在 Clément 山上，此時此刻 ，我們淚流滿面….」。[58] 法軍只有 5 人陣亡 ，12 人受傷。清軍方面則損失超過 400 人。[59] 10 月 2 日、3 日更不費一彈 ，向前推進陣地 。

圖 19 為了早點登陸，個個都往水裡跳，跑時刺刀向前！

法軍進入基隆沙灣市區時 ，發現一幕大爲驚異的景象 ，劊子手正在執行砍頭的任務 。

「由於臨走的時候中國當局已下令把這件事做一個了結 ，所以聽話的劊子手就去把他抓來 ，並在公共廣場上處決 ，這只是一種程序問題 ，它讓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 ，即使被斬首的人也是如此 」。

小水手描述劊子手的手法 ：

「手裡拿著形狀古怪的菜刀 ，刀身很寬，末端呈新月形 ，一刀就把他的頭砍下來。哇！你沒看到多麼乾淨俐落啊 ！用不著再砍一次 ，眼力和腕

[56] 鄭順德譯，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4），頁 291。 ”Nous espérons que le lecteur aura éprouvé à la lire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éprouvé à la transcrire.” 此處 transcrire 可作謄寫或改編 解，中文版鄭氏未譯此段編案。

[57]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頁 38。

[58]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頁 37。

[59]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1884-1885*, Paris: Delagrave, p.45-46。

力著實驚人」。

清軍已經撤離，市面上「剩下一些表面上看起來不會傷人的中國人，他們像善良的老百姓一樣做著小本生意，等客戶前來買東西」。[60] 所描述的景象和清軍宣示的嚴禁販售物品予法軍的情形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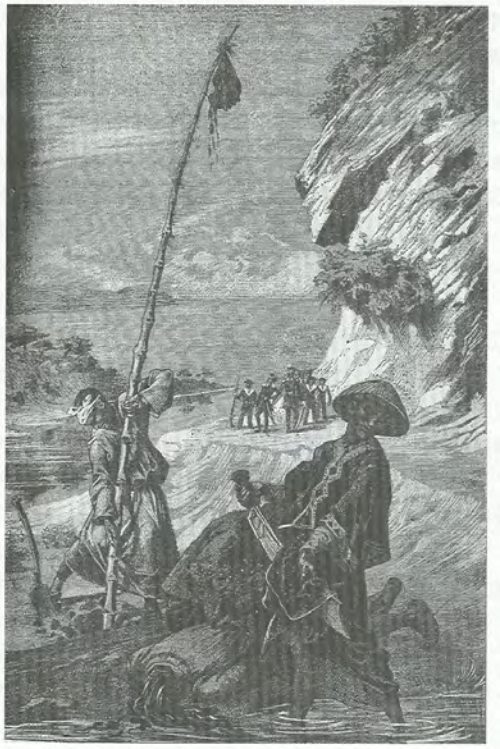


圖 22 用不著再砍一次，眼力和腕力著實驚人！

小水手 10 月 15 日的信中記敘是淡水之役。登陸淡海時的景象：

「到了岸邊，到處都是沙丘，就像在敦克爾克（Dunkerque）一樣，可以看到一大堆不斷受到海風吹襲的灰色小丘，軍鞋都陷在腳底下的沙堆裡面」，朋友，你看要是有人跟你述說一場戰鬥，詳細的把右翼、左翼和中線的運動都講出來，那他不是不在場，就是事情完了之後，才根據所得到的情報來講述」，我們到底是要往紅堡或白堡去，那時候我卻什麼都不知道」。

這段話十分生動的描繪出法軍登陸後因不明地勢而陷入血戰前的困境，接下來是慘烈的戰鬥，雙方進行肉搏戰。「真奇怪啊！….當刀子捅進肉裡面的時候，發出噗的一聲，接著就是輕微的爆裂聲…」。[61]

最後小水手記載了每艘艦艇人員的死傷數目：La Galissonière 有 9 死 9 傷，La Triomphante 有 4 死 17 傷，Le Dugay-Trouin 有 4 傷，Le Châteaurenault 有 7 名受傷，Le Tarn 有 2 死 4 傷，Le Bayard 有 3 傷，d'Estaing 有 2 死 5 傷，全部

[60]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40-43。
[61] 前引書，頁 49--50。

有 17 位戰死，49 位受傷。[62] 與 Garnot 上尉一書對照之下 ，顯然小水手的紀錄更爲詳細 。

圖 23 有一位被我釘在戰友的身上

駐守基隆的法軍遭遇的最大敵人是傳染病 ，包括霍亂 、瘧疾、赤痢，以及不知名的熱病。小水手 11 月 30 日的信件是寄 給友人，因爲他不想讓母親擔心。他描述法軍對霍亂（Choléra）的忌諱心理，而以抹香鯨（Cachalot）代稱。「患者往往在三 、四小時內無聲無息的就死亡 」或者像慢火熬死一樣 ，「身體越來越凹進去，臉頰沒了，鼻子沒了，眼睛也沒了，所有這些都陷下去了 …」。[63] 惡劣的衛生條件使疾病不知何時襲來 ，這種情形嚴重打擊了士氣 ，因此，孤拔每天都會到野戰醫院巡視 ，派遣樂隊演奏音樂以安慰病患 ，在小水手眼中的他是毫不遲疑地身先士卒作戰 ，也能關懷照顧每一士兵 ，因此每個士兵都樂於聽命 。下圖是孤拔巡視醫院安慰病人的情形 ，孤拔最後自己也在 澎湖媽宮因赤痢 、貧血等多重病症併發之下去逝 。

[62] 前引書，頁 53。Cf. Garnot. op.cit., p.56.
[63]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頁 62。

圖 27　元帥走過去，很直截地握住那個人的手

小水手的信中也提及清軍喜好獵頭的情況 。由於官方高價懸賞收購法軍人頭，因此在重賞之下勇夫備出 。法軍外出極易遭到伏擊 ，或有以「美人計」誘之以取頭，[64]也有因外出買雞而丟了腦袋的 ，小水手的同伴就有一位慘遭「雞販」鋸下頭顱 。[65]法軍外出到華人區是不安全的 ，「最難受的是他們用鐵鉤從四面八方把你鉤住 ，然後不慌不忙地把你的首級取下來 」[66]，除了生宰活割之外，最常見的手段就是挖墳墓以取屍體的首級 ，「由於瘧疾還沒有完全根絕 ，每星期都會死一 、二個人。這些無賴於是夜裡跑到墳場去把墳墓打 開，挖出屍體再把頭砍下來 」。[67] 爲了懲罰偷屍賊 ，並扼止這種不道德行爲 ，法軍在墳場設伏，對付這些凶殘的偷屍賊 。下圖即描繪偷屍情形 。

圖 28　這些無賴於是夜裡跑到墳場去，把墳墓打開挖出屍體，再把頭砍下來

至於《L'Illustration》關於基隆 、淡水戰役的報導 ，筆者未能得見 。鄭順德在《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書中所徵引的《L'Illustration》的插圖大都是戰鬥英雄的肖像 ，例如孤拔元帥 、拉度上尉 （Capitaine Latour）、茹費理 （Jules Ferry）德歐特艦長（Commandant Dehorter）內格里葉將軍（Général Négrier）、

[64]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5-76。
[65]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3。
[66]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6。
[67]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75。

哈維勒上尉（Capitaine Ravel）、迪玻克上尉（Capitaine Duboc）、以及孤拔元帥臨終景況及 le Bayard 旗艦上的陳設等等，由《L'Illustration》展現的英雄圖像，充分塑造了史詩般的記憶。[68]

茲另舉北圻戰役的報導爲例：

下圖是由《L'Illustration》派赴北圻的記者在東京（Tonkin）戰役所繪的插圖，李維業少校（commandant Riviere）與木蘭准尉（aspirant Moulin）合力搶救一門炮的狀況，圖中戰火硝煙彷彿可見其激烈之一斑。李維業死於 1883 年 5 月 19 日紙橋一役。[69]

ÉVÉNEMENTS DU TONKIN. — LE COMBAT DU POU-DAÏ : LE COMMANDANT RIVIÈRE ET L'ASPIRANT MOULIN SAUVANT UNE PIÈCE DE CANON
D'après un croquis de M. Bernhard, correspondant particulier de l'*Illustration*.

下圖是 1883 年 8 月孤拔率軍攻下順化（Hue）前的登陸作戰，法軍裝備情況似乎和登陸淡水時類似？只不過戰況大爲不同。孤拔軍自沱囊（Danang）海口溯香江而上，一日即直抵順化京城。[70]而在淡海的漫漫沙丘卻成了法軍前進的障礙，「到處都是沙丘，就像敦克爾克一樣，可以看到一大堆不斷受到海風吹襲的灰色小丘，軍鞋都陷在腳底下的沙堆裡面」。[71] 不僅如此，淡水的清軍守備阻斷了法軍前進的可能性。

[68]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ⅩⅦ，14，39，54，57，86，87，126，133，134-137，141。

[69] Baschet, Eric. ed. *Les grands dossiers de L'Illustration, Indochine, Histoire d'un siècle,1843-1944*, Paris, Le Livre de Paris, 1995. p.61.

[70] Ibid. p.66.

[71]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 49。

L'EXPÉDITION DU TONKIN : ATTAQUE DES FORTS DE HUE, LE 20 AOUT

PRISE DES DUNES PAR LES TROUPES DE DÉBARQUEMENT DE L'ESCADRE

1883 年 12 月，山西（Son-Tay）一役在北圻戰役有決定性的作用 ，城中守軍有滇桂軍七千人 ，外加黑旗軍數千人 。孤拔率軍九千人 ，沿紅河西上 ，攻下山西 。圖中可見法軍奮勇攻城的情形 ，而一萬多名的守軍的頑抗 ，自層層竹柵及滿天硝煙似乎可以感染讀者 。

EXPÉDITION DU TONKIN. — LA PRISE DE SON-TAY

1884 年 3 月 29 日的北寧（Bac-Ninh）之役，呈現遭遇戰中的英勇戰況 ，兩軍皆有傷亡 ，也更因此而襯托出以少擊眾的艱苦卓絕 ，將英雄形象突顯出來。

L'EXPÉDITION DU TONKIN : LE COMBAT DE BAC-NIOUE, LIVRÉ LE 29 MARS.
D'après un croquis de M. Bernhard, correspondant particulier de *l'Illustration*.

四、神、人、鬼、集體記憶

在淡水，作爲居民信仰中心的各寺廟神祇也一起度過烽火歲月 ，甚至有神蹟流傳。[72] 戰後，光緒皇帝頒賜匾額「慈航普渡」予龍山寺，「翌天昭佑」予福佑宮，及賜「功資拯濟」匾額一面予清水祖師 。

淡水龍山寺乃滬尾街之泉州籍之晉江 、惠安、南安三邑街民爲崇奉觀音媽祖，經黃龍安等人募款聚資 ，武榮洪獻地，鳩工興建於咸豐八年（1858 年）完竣，因爲是由晉江安海的龍山寺分靈來台 ，故亦命名龍山寺 。其中供奉觀音，法像莊嚴神韻非凡 ，旁祀媽祖與註生娘娘 。據說戰爭時 ，觀音曾顯靈助陣，故獲御頒「慈航普渡」匾額。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中有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以觀音無限的悲心與正智，隨時隨地無不循聲而應的靈感示現 ，正完全符合民眾的期待 。

[72] 基隆、澎湖也許全被攻陷之故，未聞有神蹟。據昭和 5 年（1930 年）淡水郡役所編之《淡水郡管內要覽》 淡水街計有福佑宮等 13 所寺廟。淡水郡役所編， 淡水郡管內要覽》，台北市：盛文社，1930） 頁 61。

（淡水龍山寺慈航普渡 ）

福佑宮是淡水街的發源中心 ，通稱媽祖宮 ，據說始建於雍正年間 ，根據對聯落款年代 可考者 應是乾隆三十七年 ，後屢經整建 ，現今廟體部分建於嘉慶元年（1796 年） ，是銀同、武榮、晉水、螺陽、清溪、桃源、永定等七邑人所集資興建，應可說是淡水移墾先民的重要共同信仰中心。據傳說，10 月 1 日法艦炮擊正熾時 ，有人見一群和尚於廟的上空排擋砲彈 ，故而福佑宮附近民宅均未受損 ，此皆媽祖庇蔭之功 。也許有些人疑惑何來之和尚 ？福佑宮的「望高樓碑記 」可以提供線索 ，早年淡水 先民爲航行安全曾聚資建樓如塔 ，請福佑宮的和尚負責點燈 ，以作爲導航之用 。[73] 釋道融合全爲生黎 ，在此又得一註腳 。

[73] 「望高樓碑：仝立望高樓，泉、廈郊出海戶尾街董事共爲設立守望以便利涉事 ，竊惟淡江港口係諸船出入要津之所，其東北勢旁有假港一處，每遇黑夜沙汕擋蔽莫辨真假，前經一二船隻誤認假港致遭不利。奚另邀同船戶相議捐資，建立望高樓一座在假港涯，付與福佑官住僧慶西倩工守護，每夜明燈照應，諸船由燈下南勢進港可保無慮，其走立費須業經在港諸船允捐銀壹六元外，再到本港者每次出銀肆錢以爲守樓工資油火等費，願我同人玉成其事，捐金不替，則眾生無迷津，而諸船皆利涉矣。嘉慶元年端月　公立」。

（福佑宮御賜翌天昭佑匾）

也有一廂情願的傳言說法軍自艦上用望遠鏡觀察淡水，只見街上屋宅頂上有和尚在護衛，法軍因而深感恐懼而自行退兵。崇信清水祖師的居民認爲是祖師大顯佛力救濟，故戰後御頒「功資拯濟」牌匾予清水巖。現今淡水清水巖祖師廟的北邊龍門石柱上刻著一副對聯：「祖德施石門昔日震災殫佛力，師勳建沙崙當時制敵顯神通」，即是闡揚清水祖師顯靈濟民的事蹟。上聯所說故事是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67 年 12 月 18 日)，安溪信眾迎祖師繞境至石門港口邊時，祖師神像突然落鼻，鄉民皆至港口邊圍觀，此時正逢大地震，房屋倒塌無數，但鄉民卻皆未有傷亡。[74] 下聯即是指清法戰爭中，在滬尾大顯神通之事。

問題是淡水本無祖師廟，現今淡水的清水巖乃 1932 年始建，成於 1934 年，之前的「落鼻」清水祖師來自何處？清水祖師是福建安溪移民的守護神，早期北台的安溪人建有艋舺清水巖、三峽長福巖，而淡水的清水巖年代最晚。根據三峽長福巖所記載，清水祖師本名陳昭應，崇信佛教卜居安溪清水巖，因精通醫術，藉爲鄉民治病傳揚佛法，因爲嘗試藥草，多次中毒而致使面貌變爲黑色，故又稱爲「烏面祖師」。[75] 其後，因信眾隨朱元璋滅元，受敕封爲「護國公」，詔命於清水巖建立祠堂崇祀。因此，自此祠分靈之祖師廟，均稱清水巖。據說每逢天災巨變，清水祖師便會落鼻示警，事後將鼻子沾上香灰清水就可黏回，故而又有「落鼻師」之名。

艋舺清水巖，始建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經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重修，至咸豐三年（1853 年）毀於「頂下郊」之爭戰火，同治六年（1867 年）重建，其後幾經翻修，然尚能存其原貌。據艋舺人之傳說：法軍進犯淡水時，淡水人請去祖師神像助陣，及勝，竟拒絕歸還神像，艋舺人無奈，只得另刻一尊神像，證據是光緒皇帝御賜「功資拯濟」匾至今仍高掛艋舺清水巖殿內。至於落鼻老祖則經官司判定，淡水及艋舺兩方各供奉六個月。

淡水人的說法是：落鼻老祖本即淡水士紳翁種玉家所供奉，全因祖師獲皇帝御賜匾額，並爲建廟酬謝清水祖師，遂將落鼻祖暫寄艋舺清水巖，待淡水的清水巖落成後再行迎還。無奈建廟大事因擇地、經費和人事糾紛，而告一拖再延。最後，地方選中原由苦力挑夫供奉之蕭府王爺府址起建，從巖殿中的龍柱、藻牆、雕刻等石木作工及捐題碑記，可以看出淡水人通力合作，精心營建本廟。不料，1934 年，淡水清水巖落成後，艋舺方面不給迎還，認爲落鼻祖的佛像本就是鎮殿之寶，乃淡水人請去助陣，戰後理當歸還。

清水祖師佛像在艋舺與淡水信眾互不相讓的情況下，只得對簿公堂，展

[74]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卷十四，考四，祥異，頁 347，記載：「六年．．．冬十一月，地大震；二十三日，雞籠頭、金包裏沿海山傾地裂，海水暴漲，屋宇傾壞，溺數百人」。

[75] 此說頗類神農氏嚐百草，另一傳說是祖師與惡鬼鬥法，被煙火連燻七晝夜，以致面色黧黑，終將惡鬼降伏，其成爲祖師座下的張、黃、蘇、李四大將軍。但是，殿中的四座銅像也有說是代表風、調、雨、順。

開佛像爭奪戰。法庭要求兩造將證物呈堂對質，艋舺人提出御頒「功資拯濟」匾額，卻反而敗訴。因爲日本法官認定戰爭是發生在淡水，而且光緒同時還頒給龍山寺「慈航普渡」和福佑宮的「翌天昭佑」兩副匾額，既然兩副都在淡水，「功資拯濟」也理當頒給淡水的清水祖師廟，因此裁決佛像歸還淡水。

（淡水清水巖功資拯濟匾）

（艋舺清水巖功資拯濟匾）

只是當淡水信徒前往迎駕時，發現艋舺方面已雕一尊和落鼻老祖一模一樣的佛像，可謂巧奪天工，真假難辨，目的用以擾亂淡水人的迎駕。傳說在迎駕的前一晚，落鼻祖託夢給淡水人，告知正身的佛冠上會停一隻蒼蠅，希望不要抱錯佛像。翌日，淡水人成竹在胸而來，順利迎還老祖佛像。不料艋舺人又抗告，指淡水人錯抱佛像。最後，法官覺得清官難斷神佛事，裁定佛像由兩方共有，採輪流供奉，12 月正月雙月，及 3、6、8、10 各月在艋舺，4 月 5 月雙月，及 2、7、9、11 各月在淡水。之所以如此安排，乃是顧及正月及 5 月分別是祖師生日及成佛日，如以半年計或是單、雙數月輪替，正月及 5 月勢將偏歸於一邊，因此有此複雜的輪替方式。淡水人覺得與其拖延下去清水巖就無法正式成立，因此只得委曲求全將就。淡水清水巖每年農曆五月初六

的大祭典，在日據時代是少數經過日本政府認可的廟會，每年都吸引眾多信徒參加，迄今歷久不衰。[76]

至於稍遠一些的鄞山寺定光古佛在這次戰爭中則未有聞神蹟，讓淡水人津津樂道的風水沖剋傳說是否有所影響？或者是因爲距離稍遠爲艦炮流彈所不及，故而神力無從發揮？

鄞山寺當然是淡水重要古蹟，也是客家文化的瑰寶。鄞山寺建於道光三年（1823 年），咸豐八年（1858 年）重修，其建築形制始終保有原貌，是台灣早期來自閩西汀州的移民張鳴崗號召同鄉所建，以永定縣的鄞山寺命名，其中供奉汀州人的守護神定光古佛，在兩廂設有接待同鄉抵台住宿用的汀州會館。本寺曾經歷史滄桑而一度破敗不堪，幸經公告爲二級古蹟，現已經整修。現在淡水的鄧公里和鄧公路之所以得名，即是得自「定光佛」得道前之俗姓鄧。[77]

（鄞山寺定光古佛）

神佛的際遇不同，凡人的命運更大不相同，留存在人間的記憶更因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戰爭改變一些人的命運，幸與不幸立判殊途，然而時移境遷，評價亦因而不同，茲僅舉二、三人與台灣戰事有關人物爲例。

劉銘傳的保台事蹟與作爲首任巡撫任內的建設長期以來爲史家所肯定，因而形塑出全面正面的集體記憶。儘管近年來學界對劉銘傳與劉璈之爭，排忌孫開華之舉，與夫所謂自強新政之成敗，都進行新的研究，究明真相，[78] 可惜尚未能深入民間記憶。尤可慮者，民族主義的迷霧成爲別有用心之人妝扮劉銘傳爲完人的利器，進而驅使劉銘傳爲「統一大業」的馬前卒。

---

[76] 本文關於淡水掌故多半得聞於世居淡水的汪肫仁先生及其尊翁汪潤澤老伯，謹此誌念。同時也感謝艋舺及淡水兩地清水巖輪值義工的解說。

[77] 白惇仁等編，《淡水鎮志》，淡水：淡水鎮公所，1988），下冊，頁 484。

[78] 許雪姬，〈劉銘傳研究的評介—兼論自強新政的成敗〉，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台北，2003 年，頁 303-322。

以清代人的記憶來看，同治四年（1865 年）劉銘傳淮軍與鮑超霆軍奉令夾擊捻匪賴文光等部於鄂豫之交的尹隆河，劉之淮軍先期而至，但爲捻匪所敗，爲之潰逃。鮑之霆軍依時而至，大舉破匪，殺敵無數，致捻匪敗逃以去。鮑超雖立下汗馬功勞，豈料因劉銘傳卸責禍於鮑超，致使霆軍星散。[79] 此事當爲劉璈、孫開華等人深知，因此對於劉之到台督軍，心中不免容有疑慮。而且，湘淮不睦爲眾所知，1884 年 10 月 1 日，法軍對基隆發動攻擊，劉銘傳料將不守，且連獲淡水李彤恩三次告急，謂次日法軍將攻 淡水，遂不顧部將之反對，「舍基隆唊敵」，執意撤軍兩百里至新竹。不料，退至艋舺即爲台民怒而圍之，[80]「捉爵帥髮，由轎中拽出肆毆，且詬之為漢奸、為懦夫」，[81] 此事傳出，益爲湘軍所訕笑。所幸，基隆法軍爲留守獅球嶺的曹志忠營及林朝棟率土勇三百人所阻，土勇即林朝棟自募之台勇也。而淡水方面，則有孫開華等力戰，逐退登陸法軍。因此，儘管詔旨有「謗書盈篋」之語，[82] 但值用人之際，劉銘傳尚能保全，主要依仗李鴻章之力保。

湘淮之爭朝廷並非不知，安排劉銘傳到台，可謂錯著，朝廷雖強調要兩派不分畛域，終不能免於傾軋收場。劉銘傳自認爲：

> 「左宗棠到閩後，劉璈合謀傾陷，蜚語上達天聽，孫開華乘勢朋擠，誇功諉咎忘其所以，楚淮構訟結仇，因自劉璈興之，實由孫開華成之」。[83]

此事以督辦福建軍務的左宗棠上奏彈劾淡水通商委員李彤恩爲導火線，而告引爆派系大戰，最後以左宗棠去逝，劉璈被流放黑龍江，孫開華內調泉州署任提督告終。

其實，劉銘傳表面上獲得勝利，也並非白璧無瑕，上諭「劉銘傳督師無功，正當力圖自贖，著將台灣善後事宜認真整頓以觀後效」。[84] 嚴旨斥責並非無道理可循。首先，欺君之罪即該當斬，1884 年 8 月 5 日首次基隆之戰，劉銘傳上折稱：

> 「擊倒山巔擁纛之法酋二人，與山下法兵頭一人，敵軍大潰。我軍一鼓登山，當破敵營奪獲洋槍數十桿，帳房十架，並獲其二纛、斬首一級，探報法兵傷亡者百餘人。逐北至船邊始返，我軍傷亡才數人」。[85]

實際上法軍在此役中，一小時之內即摧毀所有砲台，以 200 名兵力上岸搜索，面對 2500 名以上的守軍反擊，僅陣亡 2 人，重傷 4 人，輕傷 6 人，而清軍死亡在 200 人之譜，尚且放火燒存煤，並引水淹礦井，倉惶撤軍而去，戰況遠

---

[79] 薛福成，〈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收於中國史學會編，《劘軍》（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冊一，頁 363-366。

[80]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Taipei: Cheng-Wen, 1972 (rep. of 1st edition of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p.36.

[81] 中國史學會編，《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冊 6，頁 192。

[82] 劉朝望，〈書先壯肅公守台事〉，《劉壯肅公奏議》卷首，頁 3332。收《台灣先賢集》六，台北：中華書局，1971）

[83] 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劉銘傳奏，轉引自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跡考〉載《台灣文獻》，卷 36，期 3-4，頁 239-256。

[84]〈再請開巡撫缺並銷督辦差回及養疴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1，頁 3358。

[85]〈敵陷基隆炮台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折〉，《劉壯肅公奏議》卷 3，頁 3404-3407。

非劉所自陳。

10 月 1 日的第二次基隆之役，法軍 5 人陣亡，12 人負傷，而清軍損失超過 400 人，劉即不顧部將勸阻下令撤軍。[86] 而淡水之役，分明是發生於 10 月 2 日，但劉銘傳卻爲迴護李彤恩，並掩飾自基隆退兵之失，故意上奏爲同日雙邊開打，淡水告急，不得不赴援。[87] 至於事後戰功則再次誇大爲「斬馘 25 級，槍斃三百餘人」，至於「溺海者更七、八十人」。[88] 法軍正式的統計是損失 17 人，負傷 49 人。劉銘傳欺君之罪又當如何？

其次，在其彈劾劉璈諸多罪名中，有一戰時之大罪，即在台北餉絀之時咨提督孫開華等營加足夫價，「意在誘脅各營譁潰，使敵人得乘我之危」。[89] 戰時人力短缺，加足定價乃理所當然，不料亦可以意圖使劉帥「死於噪餉之兵」入人罪名，由此可見其帶兵治軍之一斑，尤其有愧眾多志願從軍之土勇。據淡水關稅務司法來格報告，基隆失守後，劉銘傳自艋舺募得志願軍 7000 人之多。[90]其實，台北十二營長夫總計也不過 192 人，每人三兩銀，其數何多？

劉銘傳之所以留存在集體記憶中者，主要爲其乃首任台灣巡撫，自強新政受到肯定。不過這些新政有些是在劉璈任台灣道時已經推動。劉銘傳之推動新政六年，除「曠宇天開」之基隆新竹間鐵路外，其餘新政恐淪爲奏章之「作文比賽」，難爲人們所記憶矣。

劉璈在光緒七年（1881）四月受命爲台灣道，較劉銘傳蒞台約早三年時間。清法戰爭之前，劉璈籌防台灣頗有實績。戰爭期間，劉璈負責新竹以南防務亦頗得宜。[91] 無如幸抑不幸，法軍攻台時戰火未及於南方戰線，劉璈除調度勇餉之力外，並無赫赫戰功足資邀幸，以致在戰後遭劉銘傳羅織五小罪、四大罪、十條劣績，即居劣勢不得平反。[92]

其實，劉璈聲望與劉銘傳相埒，劉銘傳之所以痛下殺手，且關說軍機處，必置死地，緣於劉璈曾密稟左宗棠、楊昌濬，在其〈稟基隆失守大隊拔回台北府城緣由〉文中歷陳劉銘傳撤軍原由及實際戰況。[93] 左宗棠據此上奏，致使劉銘傳遭到嚴旨切責。再者，爲李彤恩案而求自保，亦必去劉璈，故以委由商辦釐金事宜不當之名目，將劉璈撤職，再行羅織。當時局勢使清廷欲倚重劉銘傳，而且左宗棠於 1885 年 9 月 5 日病死福州，後山既倒，大獄遂成。

最後，劉璈以浮報營餉、募勇開支浮冒之貪瀆罪，11 月遭判斬監候。值得一提的是公道自在人心，劉璈離台時，南部地方「士民走送，揮淚告別」、

---

[86] Garnot. op.cit., p.46.

[87] 〈法船併犯台北基滬俱危移保後路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3，頁 3409-3410。

[88] 〈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3，頁 3410-3412。

[89] 〈嚴劾劉璈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10，頁 3596-3602。

[90]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四，頁 2260。

[91] 許雪姬，〈劉璈與中法戰爭〉載《台灣風物》卷 35，期 2，頁 1-28。

[92] 〈嚴劾劉璈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10，頁 3596-3602。

[93] 劉璈，《巡台退思錄》，中興新村：台灣省文獻會，1997）卷 3，頁 284-285。由原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8 年三卷本合集。其實劉璈之摺乃據基隆廳通判梁純夫在 10 月 6 日所上之稟如實轉奏，梁如夫該文亦登於 1884 年 11 月 2 日之《申報》。另外，坐探委員李成瑞之稟內容亦大致相同。見《中法戰爭》冊 5，頁 569-570。

「台地番民至今有尸祝者」，而浙江台州士紳合力替劉璈交清追款一萬餘兩銀，使璈罪減一等，改遣戍黑龍江效力贖罪。台州一地乃劉璈在同治三年至十一年署理之處，時隔十餘年，當地人民猶感念其恩澤，甚至在劉璈死後仍祀之於東湖祠，可見其施政深入人心。所幸劉璈並不因劉銘傳之構陷而沈冤不白，學者許雪姬爲之白謗洗冤，有持平之論。[94]

1885 年 3 月杪孤拔往攻澎湖前夕，泊安平港外，透過英領事邀劉璈赴艦上面談，

> 「左右諫曰：法人狡，往將不利。璈曰：不往謂我怯也，咄乃公豈畏死哉！至安平炮台語炮台守將曰：有警即開炮擊，勿以余在不中也。孤拔相見甚歡，置酒饗，語及軍事。璈曰：今日之見為友誼也，請毋及其他。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將何以戰？璈曰：誠然，然城土也。兵，紙也。而民心，鐵也。孤拔盡醉而歸，法艦亦去，而台南得以無害」。[95]

劉璈膽識彷彿可見，亦成爲戰爭中之一外交插曲。

1884 年 10 月 8 日淡水一役使孫開華名垂青史，[96]不過以劉銘傳個人之記憶，就有極爲不同的面貌，茲錄於下以供參考。劉銘傳在戰事過後四日之奏摺言：

> 「孫開華斬執旗法酋，奪旗銳入，我軍見敵旗被獲，士氣益張，斬馘二十五級，內有兵酋二人，槍斃三百餘人，敵乃大潰。……滬尾英人登山觀戰，拍手狂呼，無不頌孫開華之奮勇絕倫，餽食物以鳴歡舞」。[97]

這個關於孫開華奮勇情形的說法和當時英人所記不差。[98] 至於殺敵數目，則未如此誇張，淡水海關稅務司法來格（Edmond Farago）說，法軍死 20 人。[99] 法軍的實際統計則爲死亡及失蹤 17 人，負傷 49 人。[100]《清史稿》則事後加碼至「斬馘二千餘級」。[101]

事隔一年多，劉銘傳再上奏時則指責孫開華種種錯誤，除直指其帶部不嚴外，滬尾之戰時，

> 「孫開華三營認守南路，章高元、劉朝祐四營認守中路，土勇張李成一營派守北路。法兵由南路上岸，孫開華所部適當其鋒，李定明等帶隊接戰，片刻已陣亡六百餘人，前隊稍卻。正在危迫之際，章高元等率淮勇大隊直搗其中，張李成土勇抄擊其後，孫開華堵住橋口，督隊甚嚴，敵兵三面受敵，狂奔敗北，張李成斬水師統領封君首級，紳民皆道其功。

---

[94] 許雪姬，〈劉之爭與晚清台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4，頁 127--158。及前引文〈劉璈與中法戰爭〉皆爲力作。

[95] 連橫，〈劉璈傳〉，《台灣通史》，中興新村：台灣省文獻會，1976）卷 33，頁 704-708。

[96] 孫開華字賡堂，湖南慈利人，官至提督，光緒十九年卒，謚壯武，清史有傳。〈孫開華〉，見《清史稿校註》，台北：國史館，1989）冊 13，卷 466，列傳 246，頁 10670-10671。

[97] 〈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劉壯肅公奏議》卷 3，頁 3410-3412。

[98] Dodd, op. cit. p.45-52.

[99]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四，頁 2256。

[100] Garnot, op.cit., p.56.

[101] 前引《清史稿校註》，頁 10671。其實在傳包清冊也只作「約三百」而已。

臣因滬尾緊要，卻助孫開華之聲望，以便統屬各營保守要隘，故奏報時推重孫開華一軍戰功為最。不料已故大學士左宗棠到閩後，劉璈合謀傾陷，蜚語上達天聽，孫開華乘勢朋擠，誇功委咎忘其所以，楚淮構訟結仇，因自劉璈興之，實由孫開華成之。臣帶曹志忠一營，並新募土勇堵紮基隆一路，所有隨帶親兵、炮手、勁旅、利器全在滬尾，該處布置防守，皆臣同李定明、章高元隨時商辦。孫開華或住淡水，或住滬尾街鎮，除餉項之外，布置一切並不聞問，且與楚淮諸將皆不浹洽，臣得免肘掖之患。臣現已因病乞退，原不該追論前事。惟念臣若不速到台北，不知孫開華何以禦敵？今事終局是非分明，臣固不欲直陳其過，亦不肯稍沒其長。孫開華血氣之，勇若遇內地土寇以烏合之師，仗虛囂之氣，或可僥倖有功，如將來海疆再有事故，朝野採其虛聲，一旦假以事權，侵扣餉項所失尚輕，特恐貽誤大局，臣不能不據實密陳」。[102]

前後兩摺對照之下，可見劉銘傳之必欲去之而後快。孫開華之獲罪全在於不肯爲劉銘傳圓謊其擅撤基隆之失，不肯力保李彤恩。孫密函左宗棠以辯白劉銘傳誣其防滬無能故捨基隆以救淡水之說，且言及劉欲逃往新竹之事。[103]劉銘傳爲自保，只好「惡之欲其死」矣。所幸朝野中外對於孫開華之戰功皆有見聞，因此孫開華得以倖免。

「英雄不怕出身低」這句老話也可適用於劉永福。劉原爲小工，1867 年入越南加入「太平軍」餘黨吳鯤之部，流竄於越南北圻爲亂。這些「客匪」計有盤文二、梁文利之「白旗軍」，劉永福之「黑旗軍」，及黃崇英之「黃旗軍」等，尤以黃崇英爲最大股，平日走私販毒坐收保護費，彼此相互攻略，遇官兵來剿則屢降屢叛。[104] 劉永福初以助剿有功，獲越廷賞九品銜百戶，[105] 後往據雲南邊境保勝營生。[106] 因其鴉片、武器等商貿利益與黃英衝突，屢相交攻。[107] 及至 1873 年 8 月法國商人涂普義（Jean Dupuis）強行通航紅河，越方不許，引發安鄴（Francis Garnier）11 月攻占河內事件。[108]

其實，涂普義的最大客戶與保護者本是雲南巡撫岑毓英和提督馬如龍，軍火交易與鴉片走私是其獲利的商機。[109] 劉永福之「黑旗軍」及黃崇英之「黃旗軍」都是經營同樣生意，並且據地抽取過路保護費。因此衝突在所難免。

1873 年 12 月，劉永福在懷德府紙橋設伏襲殺安鄴，此後劉團漸受統督黃佐炎倚賴。[110] 至 1883 年 5 月 19 日，劉永福軍又在懷德紙橋故地設伏，殺法

[102] 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跡考〉，頁 247。
[103]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五，頁 2946-2947。
[104] 許文堂、謝奇懿編《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 年），頁 320。越方將黃崇英作黃英。
[105]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321。
[106]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322，345。
[107]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333。
[108]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383-384，388。
[109] 郭廷以，前引書，頁 229。
[110]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389-391。

軍上校李維業（即韋鷺 Henri Rivière）等二十餘人。[111] 因而獲越廷嗣德帝授提督正二品，隨後又封爲義良男。[112] 越南朝廷之所以由不信任轉爲重用劉永福實是出於無奈，越軍或可追剿地方股匪尚且不必勝，面對法軍則毫無戰鬥力可言。劉團之所以戰勝法軍，除習於利用地形進行遊擊戰之外，配備最先進的洋槍和西洋私梟助戰有莫大關係。[113]

李鴻章自始即不以爲劉永福可用，以其乃「黑旗匪徒」，「匪首本為粵逆餘孽」，[114] 原屬極力剿討之對象。不料「清議派」力主固邊存越，甚至必要時立劉永福爲越南國王。[115] 因此，有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聯絡劉永福抗法。但是自視爲上國的清廷並非沒有私心，1882 年 11 月 27 日，李鴻章與法使寶海（Fédéric Albert Bourée）於天津議定草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第三條規定：

> 「由中法兩國在雲南廣西界外與紅江中間之地 應劃定界限，北歸中國巡查保護，南歸法國巡查保護。中國與法國互約申明永保此局，並互相立約將越南之北圻現有全境永遠保全，以拒日後外來侵犯之事」。[116]

此舉何異於清法兩國劃定勢力範圍，共同瓜分北圻？

劉永福當然只是清廷清吏眼中的棋子，反不若越南君臣子民之對其寄予厚望。清法戰爭之時劉永福和台灣並無直接關聯，但他和唐景崧都在 1894 年，清日甲午戰爭之年調到台灣。1895 年的乙未保台之戰，台民踴躍捐輸，寄予厚望，兩人一樣未戰先逃矣。

死爲鬼雄，「羅漢腳」得配享馨香，正反映出台灣庶民的樸實美德。在基隆的戰役中，有暖暖地方頭人周玉謙招募土勇抗法，除在媽祖廟誓師外，並以重賞獎勵殺敵，能斬「西仔頭」者，「首級帶血者賞銀一百二十兩，無血者賞銀五十兩」。[117] 爲何斬敵首級會有「無血」的現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挖墳取法軍的屍首，故而無鮮血。[118]

一次在土地公潭附近的激戰，即在今日南榮路隧道口金山寺，應是法軍稱 Nai-nin-ka 附近，[119] 有多名守軍陣亡，其中九名「羅漢腳」無人認領殮埋，遂由眾人公葬，稱「九人公」、「勇士公」，至今得享香火。[120]

鄉民的集體記憶更進一步延伸：

> 「清軍與暖暖軍追殺至海灘，法軍遺屍遍野，聽說孤拔也於是役陣亡，現基隆海水浴場的法國公墓便是失敗的侵略者葬身之處」，[121]

---

[111]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462。
[112] 許文堂、謝奇懿編，前引書，頁 462-463。
[113] Taboulet, Georges. *La geste française en Indochine*,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56, pp.793-794.
[1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冊一，頁 534。
[11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 231。
[116]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一，頁 532。
[117]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市七堵、暖暖區志》，基隆市：1995），頁 110。
[118] 關於獵頭、挖屍取頭的情形，參見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4），頁 73-76。
[119] E. Garnot, *op.cit.*, p.87.
[120] 《基隆市七堵、暖暖區志》，頁 110。
[121] 同上。

這樣的說法也堂而皇之的登載在官方文書，不免讓人驚訝「重建」的記憶與史實的差異。

五、結論

報紙以及畫報對於近代知識的普及傳播具有極大作用，尤其大量信息經由有心之傳播，往往形成輿論，影響社會至鉅。《申報》既長期注意報導法越搆釁問題，乘清法用兵之際，推出《點石齋畫報》，正足以供博采周諮之士大夫賞析，復可滿足市井之民的求知欲望，更建構一種前所未有的同仇敵愾之勢。儘管《點石齋畫報》之文字好用典故，仍不脫士大夫習性，而且內容亦未盡真實，對清法戰爭的報導仍可滿足大眾的熱烈期待。相較之下，法國之報紙既多，所報導之事既迅速又詳細，因此《La Terre illustrée》、《Illustration》等畫報反是文字多於圖像，圖像僅作爲吸引讀者閱讀記事述奇的輔佐工具。

從《點石齋畫報》中誇大的戰果報導來看，固然鼓動人心激勵士氣，但似乎也反映了官場虛憍之氣。戰後清廷未能徹底反省，在清法之戰中南洋福建水師所存無幾，不思勵精圖治，不過十年之後，甲午戰爭又盡失北洋艦隊，只得賠款割地。相距十年間，兩次海戰摧毀了清朝的南北洋艦隊，也宣告「自強運動」的破產。

法越搆兵北圻時，清廷原冀從中漁利，因此有李鴻章寶海之議約。然而未能認清自我實力，亦不顧法越已然簽約，最終還是以李鴻章福祿諾之天津簡約結束戰爭。主戰派往往狃於戰役一時之小勝，汲汲於戰以維尊嚴，殊不知清軍在整體戰爭中失敗的後果。如果 1884 年 6 月 23 日的北黎事件純出於誤會，那麼 8 月 23 日至 29 日的福州之役即是法軍的報復性懲罰（l'état de représailles），而據基隆則是以之作和談的抵押品（gages）。由於清廷宣傳的大捷，使法軍難以放棄本已不擬續佔的基隆，改佔澎湖，並北上封鎖沿海，宣佈米糧爲戰爭物資，迫使清廷終告屈服，透過總稅務司赫德派出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與法國談和。北黎觀音橋事件使清法兩國徒然虛耗一年，浪費無數人命、資源之後，又回到李福天津簡約，萬民膏血全爲「帝儀戴」（Dignité）而已。

論者常以清軍之敗乃武器不如西洋之船堅炮利，事實證明，此次清法戰爭，不論在船艦、大炮、槍械方面，清軍裝備均不相上下，而且在人數方面更占有絕對優勢。那麼只能歸於人員素質，不論在基隆的林朝棟或淡水的張李成所率的土勇都極勇敢奮戰，使法軍刮目相看。反倒是正規軍之營勇，若有欠餉，則有嘩潰之虞，1895 年日清乙未之戰再度證實了這一點。

研究者雖然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但是對於大部分民眾的集體記憶似乎不受影響，尤其當牽涉感情因素、宗教信仰，更使史實難彰。本文限於

篇幅只有指出集體記憶的差異面相 ，未能討論選擇性記憶或動機性遺忘等理論層次問題 。無論如何 ，實事求是對於官文書紀錄或是求真的科學研究 ，應是比較重要 ，而且是基本的事情 。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大南實錄》，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81 年，二十冊。

2.《台灣先賢集》，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第六冊。

3.《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年。

4.《德宗景皇帝實錄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年。

5.《點石齋畫報》，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83 年。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中法越南交涉檔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七冊 。

7.中國史學會編，《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年，七冊。

8.中國史學會編，《捻軍》，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年，六冊。

9.白惇仁等編，《淡水鎮志》，淡水：淡水鎮公所，1988 年，二冊。

10.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6 年。

11.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北平：國立清華大學，民國 24 年。

12.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年。

13.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市七堵、暖暖區志》，基隆市：基隆市政府，1995 年。

14.淡水郡役所編，《淡水郡管內要覽》，台北市：盛文社，1930 年。

15.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小組編 ，《清史稿校註 》，台北：國史館，1989，十五冊。

16.許文堂、謝奇懿編，《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 年。

17.連橫，《台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

18.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年。

19.陳培桂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淡水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20.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21.劉璈，《巡台退思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由原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8 年三卷本合集)。

22.鄭天凱，《牧台圖錄》，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 年。

23.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4 年。

24.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商務，1996 年。

25.Baschet, Eric. *Les grands dossiers de L'Illustration, Indochine, Histoire d'un siècle,1843-1944*. Paris, Le Livre de Paris, 1995.

26.Cordier, Henri. *Le conflit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Paris: Leopold Cerf, 1883.

27.Dodd, John.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1884-5*. Taipei: Cheng-Wen, 1972 (rep. of 1st edition of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28.Garnot, Le Capitaine Eugen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Delagrave, 1894.
29.Lonlay, Dick de. *Au Tonkin, 1883-1885.*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86.
30.Rouil, Christophe.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Le Pigeonnier, 2001.
31.Taboulet, Georges. *La geste française en Indochine*.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56.

二、期刊論文

1.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台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 年 6 月)，頁 127-161。
2.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跡考〉，《台灣文獻》，36 卷，3-4 期，頁 239-256。
3.許雪姬，〈劉銘傳研究的評介—兼論自強新政的成敗〉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3 年)，頁 303-322。
4.許雪姬， 劉璈與中法戰爭〉載《台灣風物》35 卷，2 期 2，頁 1-28。
5.陳三井， 茹費理(Jules Ferry)的殖民思想及其對華政策(1880-188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 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0 年 7 月)，頁 269-289。

（咸豐十年陳維英任職內閣請大學士 祁窩藻題三代祖圖）由 翁同龢書

子祥祖媽

遜言祖媽 中曆 乾隆 戊戌 年
即西曆 一七七八年生

子祥祖 中曆 康熙 丁亥 年
即西曆 一七〇七年生

父瀾祖 中曆 乾隆 乙丑 年
即西曆 一七四五年生

渡台 三十六 歲
西曆 一七八〇年

遜言祖 中曆 乾隆 己丑 年
即西曆 一七六八年生

渡台 二十 歲
西曆 一七八八年

（陳悅記祖宅全景）

大龍峒陳悅記祖宅修護紀實

陳應宗[*]、吳春和[**]

摘　要

大龍峒「陳悅記大厝」是台灣現存最早期的大型宅第，由於很少人認真了解古蹟歷史文化，主因是早期領導文化的高官、專家，本身是外地人，用外地的文化認知，以官大學問大，主導了文化教育，扭曲了歷史文化，例如「陳悅記祖宅」，被里人尊稱為「老師府」，這名稱即很清楚了解歷史定位於「宅第」，卻被當時官方歸類為「祠廟」，我們利用這次機會，先詳細介紹「宅第」的歷史文化和發展過程，建築形式、各項功能與配置邏輯、人文背景、生活文化與宅第之間的實質關係，讓社會更能以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古蹟文化，也利用了這次修護的機會，【古蹟開腸剖腹、一絲不掛之時】，讓世人更看清古蹟的每一細部結構，客觀的証明以前部份創造不實古蹟歷史的專家學者，沒有認真觀察的「研究」是誤導歷史文化的元凶，更不可以無視古蹟的各項社會學術、教育…多元功能的重要性，一昧只求蒙混過關，蹧蹋古蹟文化，滅失可貴的文化遺產，使世代子孫永遠不知文化為何物！

關鍵字：大龍峒、陳悅記、文瀾 、陳遜言、維藻、維英、維藜、維菁、維藩、公館廳、護龍、公媽廳、餘慶堂

前　言

古蹟乃是先民生活記錄的具體表徵，也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資產。座落於台北市大龍峒，人稱「老師府」的陳悅記祖宅，是國家三級古蹟，始建於大清國嘉慶 12 年（西元 1807 年）是一座大型燕尾式傳統宅第，歷經世代傳承，陸續或有增建與維修，仍然保有「老師府」獨有的地緣文化與人文內涵。在民國 91 年（西元 2002 年）底，經業主宗親們的努力籌募資金下，開始分期施工整修，被台北市政府所忽視，而已坍塌腐朽的三級古蹟「老師府」。期盼能修舊如「舊」延年益壽的使「老師府」古蹟再生。基於對「老師府」的濃厚感情與維護古蹟的使命，將持續關心避免「老師府」古蹟，被「除舊怖新」的錯誤觀念給毀掉，使得「老師府」古蹟成了「返老還童」的遺趾。這是一段痛苦的【陳悅記祖宅修護紀實】。

一、建築沿革：

（一）始建大厝： 座落於大隆同莊港仔墘【陳悅記大厝】俗稱（港墘內）

1.建築年代：清 嘉慶 12 年（西元 1807 年）

2.建築型式：同安式・前低後高排列。雙進正身、 雙護龍。

3.人文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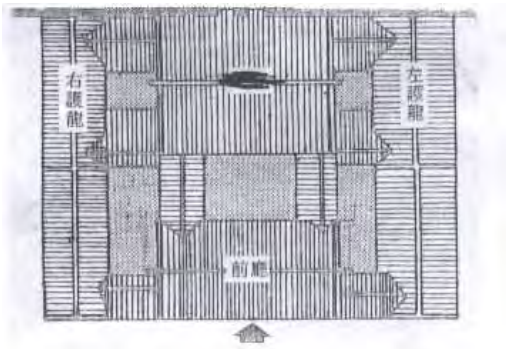
[*] 台灣文化守護聯盟成員、大龍峒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台灣文化守護聯盟成員、桂竹文史研究室負責人。

先正陳遜言原籍同安灌口，弱冠年赴鄉試未第，逢母故，葬母後，於乾隆 53 年（西元 1788 年）渡台侍父；其父文瀾祖，乾隆 45 年（西元 1780 年）來台，居滬尾街行醫，由於醫術仁德受北淡人士敬重，生子三， 遜言公居長，遜朗公次之二十五歲渡臺（西元 1799 年），季子遜陶公來台年二十（西元 1800 年）；遜言公渡臺後投筆從商，乾隆 59 年（西元 1794 年）娶妻楊氏，創立「陳悅記」經營船頭行、料館、穀米、采帛等貿易，嘉慶 12 年（1807 年）始建大隆同港仔墘陳悅記大厝，兩進正身雙護龍，座東朝西，後靠龍峒山連脈，面前堂番仔溝、淡水河、林口案桌、觀音筆架，右臨基隆河、峰延接七星、紗帽、大豚、象獅守財水、葫蘆繫右腰，左攬佳鱟金稻浪萬頃、納百川左龍倒水袖裡來，居間山川秀逸，水路要衝，實爲育才、營運上選佳址，遜言公聘名師、藏典籍，教育子孫里人，經商餘親授經史，耕耘文教，提昇家族鄉里，以擇宅址之遠矚，選弘文經營之義，成就新鄉紮根，立樹德仁徵。

道光三年遜言公長子維藻、次子維藜、等多位子弟入泮，文瀾祖見欣然，數日微疾而逝壽七十九，葬於內湖大陂臥虎丘（圖 2）。

（當時大厝配置圖說）



陳悅記祖宅嘉慶年間始建之規模：二進雙護龍

（圖 1）

文瀾古墓

（圖 2）

4.配置說明：（依尊卑次序）

（1）二進正廳：龕室–左神明–右牌位 。 後正中高大位爲最，再分「左大右小」神明乃古聖先賢爲尊，牌位乃祖先迎靈進主列位爲長，同安俗道爲儒先，分立各柱時必迎三代祖分靈進主入位供奉，按三代考妣生辰忌日年節如生前時一般，早晚分別敬果奉茶獻食上香；各別創立公業祭祀則依業產歲租永祀；遜言公衍世遵制，耀前裕後。

（2）二進左間：父 文瀾祖居間，內房–起居用，前室–生活用（男讀女紅），（早期不慣新居，常返滬尾街住，後遇洋匪朱濆席捲始歸）

（3）二進右間：遜言公及夫人居內房起居用、前室-（同上）

（4）一進大廳：客廳

（5）一進左間：遜朗公及夫人起居室–清嘉慶 15 年（西元 1810 年）遜言公于陳悅記大厝右側（鄰瓦筒厝）二房公厝建成移出。維藻居入。

（6）一進右間：遜陶公及夫人起居室（大隆同街後）三房公厝完成後遷出。維藜住入。

（7）二進左護龍三間二出手：維藻居左室後來維菁繼　維藜居右室　中廳–內

廳用 右出手–廚房　左出手–通廊

（8）二進右護龍三間二出手：維菁居左室　維英居右室 後維菁住左護龍維英移左室　中廳–內廳用 右出手–通廊　左出手–廚房 天井中水井一口（西元 1971 年後大同區非法工廠林立水質污染填）

（9）一進左右護龍幕賓教席用、客房、中廳、書房用、下房（近門戶）僕室。左護龍、左出手爲左側門；右護龍、右出手爲右側門。

（圖 3）

（二）增建三進：

1.增建年代：清 道光 5 年（西元 1825 年）

2.建築型式：三進雙護龍七包三陽陰廊亭燕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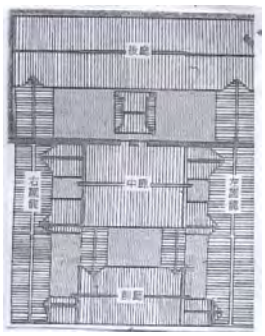
3.人文背景：

道光五年三子維菁、四子維英等子弟入泮，同年維藻舉乙酉登第三十八名，（圖片-4）沿建三代居三進。（道光四年新任鳳山知縣，進士劉功傑爲三進落額款)乙酉秋落成，（圖片-5）維藻娶妻林氏（二品封林紹賢長女，林汝梅、林占梅胞姑）。

後續興建 龍峒山（劍潭泮）、怡園（保安宮左側）、嘯園、棲野巢 於大龍峒及對岸 分子尾、和尚洲，幽靜靈秀之別業，供當時四位兒子讀書會悟弘藝切磋之所。

（上半部框內 1825 年增建部分）

道光五年建第三進



維藻中試區

第三進門楣款

（圖 3）（埕前石座旗篙壹對）〔圖 4〕（門楣懸太子少保爲維藻立文魁匾）　〔圖 5〕

4.配置說明：

（1）三進 正廳 供神明稱之神明廳；　二進 正廳 供祖先牌位稱之公媽廳；一進正廳 稱之頭前廳。

（2）三進正廳左間 遜言公 楊太夫人起居間，左前通左側廳、左側廳後間住細嫺，後邊間粗嫺房木梯摺角上「半樓仔」儲藏空間，左護龍上間廚房下爲僕房。

（3）三進正廳右間 劉氏起居間，與右側廳通配置與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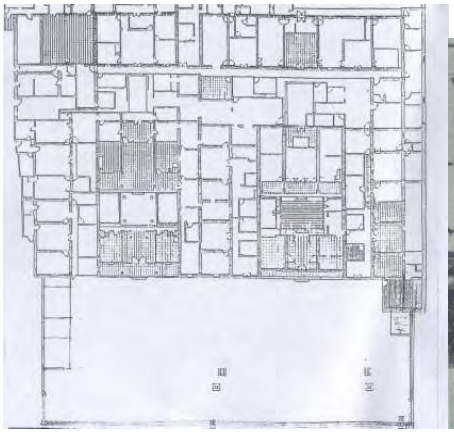
（三）拓建公館：

1.增建年代：清 道光 12 年（西元 1832 年）

2.建築型式：雙落三進正身三護龍陰陽亭廊對稱燕尾官式

3.人文背景：

道光 12 年人丁成長（增維藩、維藝二子，鵬升、鶴升、鵬升、鶚升、鷺升、鷹升六孫）學生日增，迎門仕賈頻繁，拓建公媽廳右平行中軸線三進「公館廳」秋成。歲末，楊太夫人卒，楊太夫人孝淑淵涵、寬厚和豫，輔遜言公持內，鍼黹佐之，撫庶子勝己出，足不越閾，就連侄輩亦少晤其面，遜言公雖屢行大善，楊太夫人穩善布施，實與同功。道光 13 年仲春，葬於內湖枧頭山，虛左先歸。有謂陳氏一門多傑，乃遜言公及夫人孝仁所致，覓尋祖塋、修墳、迎養親老，三十餘年如一日，兩人箬笠芒鞂，澗谷荊榛，日數十里遍覽形勢，風雨飢寒，未嘗言苦，半年始獲臥虎佳穴葬父，楊太夫人塋地，亦由精通易理而不惑陰陽之遜言公購得，親自料理空左位備老　私謚「淵豫」厚葬賢妻。



（圖 6）

（圖 7）公館廳外貌

4.配置說明：

（1）公館三進：（遜言公及夫人）最高輩份對外慶典、應酬，接待賓客用。爲祖父母輩主賓客住宿及休息依尊卑長幼配置間次。

（2）公館二進：次高輩份對外慶典、應酬，接待賓客用。主要以（維）字輩賓客使用。

（3）公館一進：建成當時（升）字輩最小，長孫時 7 歲，是同伴嬉戲學藝下棋之所，臨大埕及外花園，是活動量大之青少年配置之傳統規制空間。

（4）增多了護龍、次間，主要內眷區在公媽廳全三進深軸左護龍至中護龍寬之內。少數主眷隨身女媚及男僕配置重要門戶及機動方便處。其餘均在右護龍外簷巷口佣房及前後花園壙所。

（四）四進遺基：宅第 (分金座向) 主 遜言公歿

1.建基年代：清 道光 27 年（西元 1847 年）

2.建築型式：原設定雙落四進正身 三護龍陰陽中庭廊亭對稱燕尾官式－未成。（因主卒，停工，遺下建四進用石雕門檻，石門框…建材 與已完成之今依留有雙廂雙護龍石條基樁）

3.人文背景：

道光 15 年（1835 年）維藻公車北上病逝蘇州，扶椁返台設靈龍峒山，適維英執教明志書院辭歸，爲亦師長兄守喪，靈堂不慎失火，眾無措維英奮力推出靈柩，

台灣道姚瑩曾獎其博學優行，三載喪後，推掌噶瑪蘭廳仰山書院，道光二十四年福建巡撫劉鴻翔，派維英赴十閩首邑閩縣任教諭（圖 8），開台士入閩教之先河，初任，閩中士人譏台灣蟳無膏（無真才學），維英率侄樹藍、弟子書紳，一夜改換署聯，十閩驚傳，維英等台籍貢生廣學，就連維英帶去福州的廚丁然仔棋藝也冠全閩，許多慕名遠自南昌而來的舉人，都連敗在然司棋下，另有一次書紳在廟會當場以蔗粕揮毫，字字流暢，閩人公認其書法第一中鋒，維英任職閩間，修文廟、先賢祠，捐俸重建節孝祠，工部尚書廖鴻荃告老歸田，聞訊專程訪維英即長揖欲跪，維英連忙扶止，廖感銘母亦供祀祠中之謝忱。

道光 27 年遜言長孫婚，遜言依制準備增建第四進，迎臨四代寬以頤居，親自安排將早已準備留放後院的建材，匠師奠基立牆之際，七月逝世享壽七十九，「陳悅記」建築，依俗例停砌，留下這營建脈絡。（圖 9 圖 10）

公媽廳二進外翰匾　（閩縣教諭）
（圖 8）

四進遺留牆基
（圖 9）

四進遺留石門檻、門柱等材料
（圖 10）

遜言公渡台經商有成，不忘公義，除自宅拓建館舍，藏書萬卷，延聘名師獎勵學子。道光年間修茸保安宮，添購東廡器具，立朱子牌位設義學，照福鄉里。道光初華北肌荒，他運米天津平糶，出資修茸貢院，助海疆運軍需，淡水廳修文廟，造城垣、增書院、建義倉、設義渡、義塚、修道路、橋樑……（詳見陳維英楊太夫人行述 咸豐九年內閣大學士賈楨、周培祖、塡騰墓誌鐫石）（渡台祖譜）

咸豐九年 石旗桿

道光五年 夾桿石

同安 燕尾式 屋脊獸

遜言公佳城，民國 65 年毀（圖 11）

維藜兄弟尊遺囑分立家業（道光 27 年）

大公（悅記）二途：一爲 祭祀租 七大房輪值；（參見規約書序文）

一爲 育才租；學海、樹人書院膏火及子孫教育之用。（附淡水廳誌 學海書院文獻）

小公 恭記（長房）維藻 舉人 時卒遺五柱輪值 長 鶚升 份生 年 22 次 鶴升 庠生 19 三 鵬升 13 鸛升 12 鸞升 11 主穀糧 采帛商。

寬記（次房）維藜時 48 歲二柱。拔貢，候選訓導，軍功。 長鵬升 17 鶚升 庠生 16 歲

信記（三房）維菁時 45 歲二柱。庠生，詹事府主簿，軍功，理問銜，書房鷺升 17 鷥升 1

敏記（四房）維英時 37 歲二柱。明志書院講席，仰山書院山長，閩縣教諭鷹升 16 庠生 鳶升 11

惠記（庶出）維藩時 23 歲一柱鶚升 3 歲。維藝時 17 歲 維苞時 13 歲。

維藜（二房）析產後移居怡園。仍主持大公庶務，並協辦廳防練團軍需，同治四年將父遺所買北投陳姓水涎，租年收一百三十二石捐充書院膏火，五年卒。後代培根日據初捐地孔廟，修怡園改名素園。

（五）建餘慶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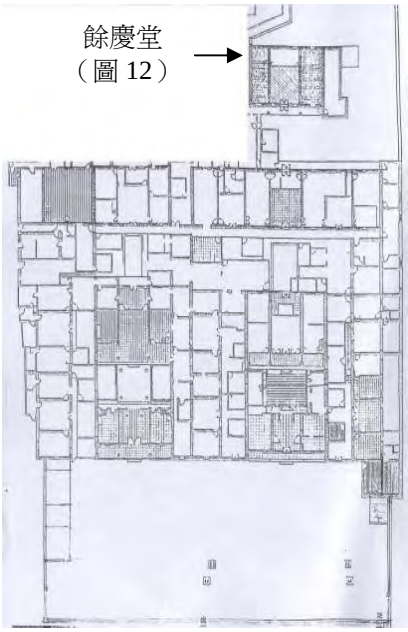
1.建築年代：清 道光 28 年（西元 1848 年）

2.建築型式： 餘慶堂 公媽廳 四進，正身二間 中軸爲佛龕大廳，左室四代曾祖母。【側室、寡，是居大廳（單）間（側間）原因，建築外貌與身分規範是傳統漢貴族文化社會約定俗成，爲管理、視別群體】
餘慶 是公管廳四進，正身三間 中爲大廳 ，次間外雙出手，左靠四進中護龍，中護龍朝餘慶堂明確公媽廳四進主位，中護龍天井建一閣觀景樓；公館廳四進（餘慶）右是以小於正身高度與縱深建一廳雙次間雙出手，緊圍三進後右門戶。

3.人文背景：

庶母劉氏於長曾孫出生依制建四進〔餘慶堂〕咸豐七年卒。咸豐元年，維英

詔舉「孝廉方正」六品備用，小刀會之亂（圖 13），巡撫道台請旨欽派維英兄弟協理團練剿洋匪，軍功加級，候選內閣中書。逢八國聯軍及太平軍戰亂三科九年停考，咸豐九年舉鄉進士（圖 14），公車再上，不第供職內閣中書任國史館分校紫薇郎五品銜（圖 15），升主事京堂漢票籤，內外史官四品銜，同治初返台掌學海書院，立匾款「通奉 徵仕 內外史 第」（圖 16）於公館廳簷門楣，爲同治初，宅內父祖輩及諸位兄長自己和子侄住所正名； 龍峒山別業維藻卒後久荒，維藩修用以督劍潭練團水師，維英更別業「太古巢」，同治八年（1869 年）歿，著有『鄉黨質疑』、『偷閒錄』、『太古巢聯集』，均未刊行。時各藏家抄本、再抄本合集印行詩抄，乃諸多迂谷文友、同僚、門生作品併集，今人誤判文獻，故誤認陳宅咸豐失火重建，今特于此訂謬，並請史存日治界專家考鑑勘誤，以正史實。



咸豐元年詔舉孝廉方正（圖 13）

維英 供職內閣中書任國史館（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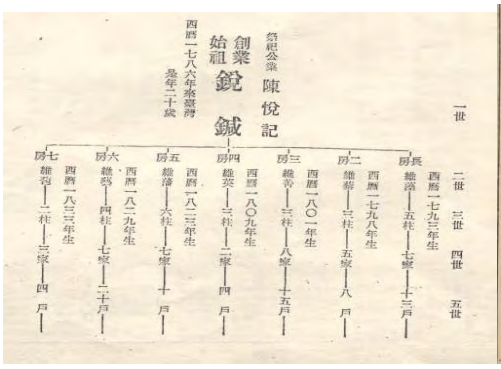
維英親筆書寫宅第名稱門匾（圖 16）

咸豐九年 維英中舉匾（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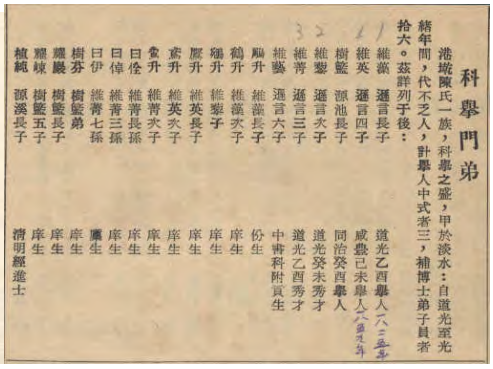
4.配置說明：

（1）餘慶堂深軸四進，原後花園近院，百武外有荷塘澤陂爲防（今重慶北路三段覺修宮邊）與蘇厝爲左前鄰，界以修竹爲屏，巨茄苳林（啓聰學校現址尚存數棵），右邊瓦筒厝接 上二房公厝 接潁川書樓 左右腹地寬達三百公尺種有許多奇花異果，由後院腹地可看出基地規劃，預留五進尚有天然廣闊美景屏障，維菁（三房）同治五年接管大公，次子 庠生鶖升 淡水廳志採訪， 維菁光緒二年卒， 長子鶖升續管理，光緒五年，重修公館四進 門楣「餘慶」留款 及藏書萬卷的「潁川書樓」，六年鶖升歿 書樓七子庠生曰伊居入 著書授課，惜書樓於民國六十四年改建公寓。道光末維藩辦軍務練團，於祖宅中護龍左設騎練場曠所，維藩好武，屢率船艦親剿洋匪擄獲洋匪、船砲，累軍功四品，揚威北淡，因排行第五，與板橋林老五、八芝蘭潘老五合稱北台三粒五。

配置圖



世係表



科舉中第表

二、歷次整修：

（一）日治整修：大正十一年（西元 1922 年）發表皇太子將訪台，促民間整修市容迎事項，陳悅記將大厝公媽廳一進主脊加高，剪碗、瓦作、部分木構修葺。

日據時代整修台度洗石子，當時流行作法（圖 17）

日大正 11 年修後公媽廳埕前（圖 18）

（二）民國整修：民國六十年（西元 1971 年），當時主因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 王政宜，奉 蔣介石命 爲佈局總統連任，取得絕對高票國民大會代表同意票數，應當時老國代要求，以福利委員會名義，指示動員行政、調查系統向陳家施壓，管理人 陳錫慶同意售內湖祖上寶地約二十甲每坪售數百元，爲此多位家族公務員身分長輩受約談，不同意則 或私刑或以工作職位不保要脅，遷祖墳百餘門，讓售，供建老代表別墅，將售地款部分用以整修祖宅，由淡水匠師承包施工，主要施工以各進正身外表以及大廳表面處理： 瓦作將古瓦大瓦更新，但當時新瓦是採內湖瓦窯，較薄小沙多質脆吸水率高，是屋頂木構使用年限短促之一因， 剪碗以亮面玻璃取代，木架構木雕上古彩繪全上新漆另繪，地鋪原有油面六角、尺二 尺磚全改爲磨石子尺磚、 灰作敲除，改以水泥替代，部分外牆貼上磁磚、大埕鋪面由油面長磚鑲石條改水泥抹平。族裡管理人盛大辦了落成升旗典禮，席上竟是刨祖墳之流（貴賓），當時僅修繕款額換算回內湖祖地即高達萬坪以上，與高官之應酬，平均一日約達換算祖（慘）600

坪碧湖之濱別墅祖產售價，應驗遜言公遺訓「創業難 守成更難」「讀書樂 爲善最樂」數十年克勤克儉祖宗創業，第一等不仁不義兄弟爭田，可憐的當時官員有長官命令得奉行；老國大實在也爲國家需好精神做好國代，爲總統服務，福利一定也得要好，心悅則臣服，當時總統更辛勞，年歲高 責任大，只因專業經驗豐百姓萬方擁戴，專業教授領袖執照只一張，其餘未結業，拖老命，置各人死生之度外，偉大的救星，刨祖墳是陳家管理人，管理人也無奈，黨、政、軍頭都偏愛，賣祖求榮非原意，只是想要新台幣。散盡財產族人平安，也許是另一種善爲；至此陳宅另 一番新外貌。

民國 60 年修復 旗桿
（圖 18）

民國 60 年修復落成情況
（圖 19）

落成時公館廳情況
（圖 20）

修復落成升旗
（圖 21）

修復落成典禮儀式 管理人陳錫慶致詞，台上貴賓即推動祖業異手的官員（圖 22）

三、古蹟修護：

（一）古蹟申請：民國六十四年都市計劃預將祖宅從公館廳以南做爲 8 米巷道及學校用地，管理人詢得主管機關原意以申請古蹟變更都市計劃。

（二）古蹟核准：民國 71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佈，74 年 8 月 19 日陳悅記大厝成爲臺灣頭一批勘定古蹟，自此歸 類別：【祠廟】 國家第三級古蹟「陳悅記祖宅」（老師府）。

（三）修復計畫：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由漢光建築師事務所，所做的研究與修護計畫書，研究過程草率，未經詳實收集資料、文獻、照片、田野調查、訪問。該研究報告出於民國八十一年除了當時一群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師生到現場測量各部尺寸以及現場照片外，均無參考舊照片或詢問當地住戶、耆老、鄰居，也未參考文獻資料、確實整理研究，外觀明顯新作不附建築年代與禮制，亦不曾深入了解，將錯誤資料不加查證隨意認定，至爲不當，例如：

1.屋頂剪貼乃民國 60 年淡水剪黏師，原貌盡失、材質危險不附禮制，研究修護計劃將就現況，未加考證，彩繪將原作塗去加上新作，用料亦非礦、植物彩，同屬民國 60 年所作，未保原作、未依原貌，畫風與原傳統舊作差異甚大，該研究報告竟大爲讚賞以大篇幅彩照置於前頁，民國 60 年未有文資法未列古蹟，今公布文資法已 22 年，修護宜恢復傳統風貌，尊重古蹟、法律、更是保有古蹟業者永續吃飯的被修理對像。

2.在該研究第一章第二節與第二章第二節以他人之詩誤爲迂谷之作品原合集於手抄本之誤作，做爲推論古蹟曾火災後重建依據，該古詩內容明顯與陳家當時背景不符，又有前代文獻研究刊物早訂正該文，今在此研究中一再誤用，實爲莫名。文末所言「公媽廳後廳『悅記』門額落款，乙酉秋，劉功傑尙待考察……，依現存資料實難斷定確定時間……」。一般稍加台史翻閱即知，劉功傑籍貫湖南，道光三年進士，四年署鳳山縣知縣；道光五年（乙酉）維藻中舉，娶妻林氏，大小登科，人口增加，依制增進落，又有人物落款見證年代，脈絡清晰爲何難斷？可見研究考證這般。

3.該研究在陳家渡台前原鄉所用之照片全是錯誤的,這些照片沒有一張是真正的「大井腳」,至今這些地方尙在，是廈門灌口鎭牛烏村而非灌口墟大井腳，灌口墟乃原灌口市集，今天的灌口街農貿市場，邊有口古井即大井腳，旁有小山丘爲鳳山，山丘上有座三太子古廟，故陳宅公媽廳內右聯寫：「派衍登瀛由魚孚鳳山而北淡」,研究歷史怎可矇騙世人，誤導歷史豈是負責國家古蹟歷史研究重任應有作風。

4.該研究第四節三、木構架第二段:「在公館廳……精緻的木雕在在顯示主人，一在炫耀財富，一在炫耀功名。」這種研究報告我們不禁要問，在私人宅第裡面，外有有圍牆、花園、老樹與大埕，庭院深深的私人生活空間，應以當時的文化背景古建築整體空間功能考量，該研究是以文化、藝術何種角度作爲研究思量，而指其爲炫耀財富？炫耀功名？真讓人匪夷所思。

＊ 上述列舉區區其中，荒誕之處不勝枚舉，不再一一明述。

（四）緊急支撐工程：89.04.24.由市府文化局發包「陳悅記祖宅」緊急支撐工程，由於設計不當，施工不良，使原本尙完整的廂房撐垮了，主因原本木結構被撐高，因榫桿原理關係，使木構鬆脫慢慢下傾。

（圖 23-24）

（圖 25）

（五）修護工程：民國 91.10.23.陳悅記祖宅第一期修護工程由馬英久市長開工，

1.工程合約書：本工程是業主私費修護，全由古蹟專業建築師訂定合約範本，工程合約內容雖然概括了所有法規大綱精神，但是這種範本只是通用本再加以註明甲、乙雙方名稱，實際內容不明確，留下許多模糊空間，並且有許多與現場現況不符之情形，分析其因不外乎。

（1）81 年上述研究計畫不實引用於修護工程合約書，對古蹟歷史無認知，對古蹟年代、建材、用途、藝術、工法不了解。

（2）預算短少、灌水似乎只是形式上的預算，包商無法依循。例一：鷹架工程；例二：公媽廳神龕……等等。

（3）沒有詳細了解原貌規劃、細目設計圖說均無，得標承包廠商，無法明確依圖施工，全依照監造單位心意、授權或指定，並無明確標準（依文資法古貌、古料…），一般業主外行，設計單位著名古建築學者專家又受聘於政府主管單位，形成研究、計畫、設計、監造、政府主管專家、學者、業主顧問，集所有機制於一體系，也是工程，修護過關與否的唯一關卡，只要任何考量，可以從嚴，亦可從寬，可以高高舉起，也可以輕輕放下，這些不明確設計圖說之處，對工程埋設測試工程環境監督指數，因此古蹟工程是大眾的責任，依法每個人都有權參與。

2.包商施工不久，架設工程鷹架搭設問題便使古蹟破壞極為嚴重，慘不忍睹（如附照片）

（1）依文資法與合約規定施工前對文物保護，事前完全沒做。設計監造、承包廠商也未有效監工。

（2）設計單位並沒有預先設計合理保護古蹟特殊工程之鷹架結構施工圖推脫由包商自行負責施工，施工包商即具古蹟特殊工程資格，理應有專業修護保護古蹟之能力監控指導或規劃工人施工，並可與設計單位商討，今顯然完全不在意古蹟，只求草率了事。

（3）施工廠商所用之鷹架工人，未具古蹟修護常識經驗，又無施工明確設計圖，查明後始得知鷹架工程工人只是轉包之普通鷹架承包。

（4）由於無修護古蹟經驗之鷹架工程施工，使致古蹟實體屋頂、屋瓦、屋脊被不當施工過程與架設之鷹架不當受力，全面性的屋瓦破壞、屋脊因不當受力毀壞、傾倒。並架設在施工範圍外住戶屋頂，屋脊亦因承受不當壓力而傾倒，又毀

壞住戶之文物、任意盜接住戶電源。

（5）將原有之花園、老樹全部剷除，只爲搭建臨時工地，四周原有舊料、文物、建材及石雕全不翼而飛。

※爲保持客觀，實際施工過程以影像記錄呈獻如下：（**如後附件所示**）

3.以陳悅記祖宅修護工程不當過程之建議如下：

（1）徒有合約不依嚴加督導、設計監造，相關單位應依法律責任追究並加以合約罰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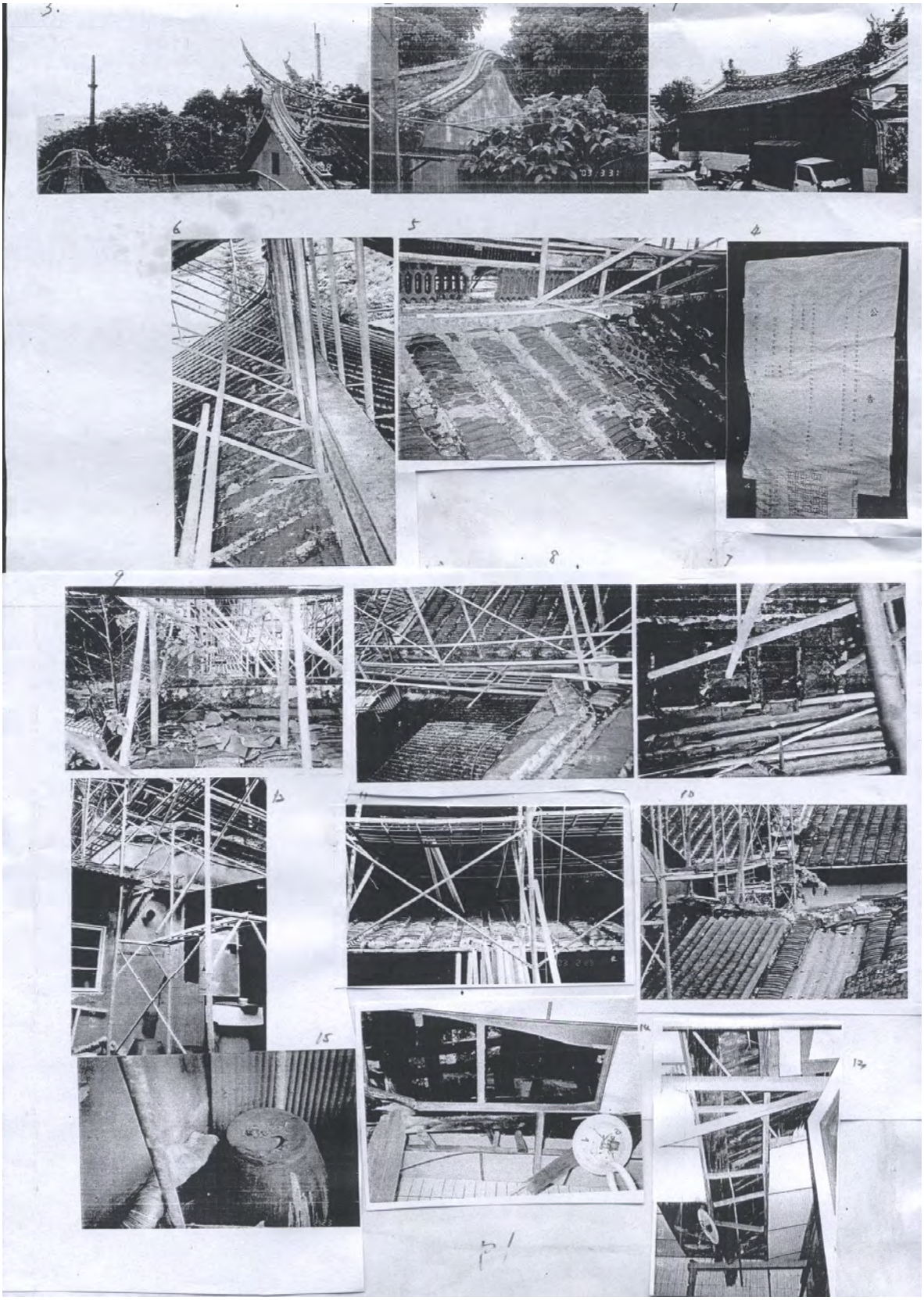
（2）迅速以活動方式，廣泛收集相關資料佐證古蹟原貌與歷史見證考究。例如：徵求老照片、文獻、文物、耆老座談研究會…等。

（3）訂正研究計畫設計之誤失，詳加明確規範，並全程記錄照相、錄影。例如：屋脊之剪黏不當材料，不當施作之工藝與內料，牆面之不當材料與形式，原有之防禦設計，應於以恢復，才能凸顯當時盜匪與械鬥頻繁的年代和陳家授命辦理團練剿匪自宅門戶之防衛與歷史背景重現 ，充分見證時代與建築物之歷史文物功能與因由，做爲鄉土實物教育，現場尚有許多門扇是毀後新設，有的原本無門，是後來打牆開鑿，原有雙扇門，卻設計單扇，這些在合約中均錯置、誤設，地坪之石基下陷也應扶正，地面比原貌高出，應回復原貌，以利通風除濕，木作之木料應依傳統工法泡製除蟲，測量舊料規格與正確座標圖樣復原，屋瓦更是最爲重要，應早日區別現有各年代瓦之產地、制法與功能，選用正確完好的原貌規格強度、厚度、大小，以原貌規格新製，並落新記（年份）適當用於屋頂，施傳統瓦作之工法，原本合約設計之防水層做法絕不能使用，因爲這不是古蹟應有之作法，不合文資法，，而且這等作法是偷工減料法，是設計包商對設計沒信心、材料沒信心，瓦作工法沒信心才需如此，此作法短期一、兩年保固期不發覺漏水，因爲有防水層，不表示沒問題，一旦發現問題已經嚴重，因爲瓦頂層腐壞到 PU 層破漏時，上瓦層早已散離，又長年將防水層兩面的瓦貼近不透氣的防水層，濕熱腐臭霉污聚於防水層上下，尤其木架橫樑濕腐蟲蟻即蛀入木料，故防水層是嚴重包藏禍心的不當新料，決不是原貌的古蹟修護所應有的創新得意設計，反觀之，沒有本事以原材料、原工法做好瓦作。至於瓦下放置不銹鋼的作法也一樣不合法規，因爲磚、瓦、灰、石的冷熱縮漲與不銹鋼膨脹係數差異甚大，每天屋頂的日夜溫差將兩種材料不同伸縮挪移。首先，瓦四周的灰作在不銹鋼上先撕裂，每天撕裂灰作與不銹鋼分離，乘載瓦、灰伸縮挪移後，雨水不但不被不銹鋼槽所導引控制，反從邊緣瓦灰破縫整條鋼槽邊漏水，古人之所以選用陶、瓷與瓦、石、灰砂接合，除代表當代建材背景，古人也充分了解土石一家的材料相容特性，以及修護時可回收性建材如磚、瓦、石、陶瓷與不能回收之黏接性建材如灰糌。灰作的取材有差異，傳統好的白灰是木炭燒製，耐久，用於牆面不易發霉，牆色溫潤，各種灰作選用上，用途功能不同，添加之沙、麻絨、稻草、糯米、粗糠，比率不同，灰漿調製後，充足的育成期始能成料施作。原木料應實質瞭解材質善加利用，不勘使用時，應以同材質新料更換……太多的古蹟修護問題不是一時可道盡，總之應當以「古蹟爲師」，以「古蹟的在地文化」爲師，我們肯定古蹟產、官、學界多年的努力與辛勞，但是不可諱言的，我們的古蹟在以往的修護中滅失，甚而消失了更多保貴的文化，希望大家拿出專業道德與良知，更謙卑、精確面對古蹟、面對在地，爲文化「真相」留給後世見證，還文化一線希望和可尋的脈絡

後　語

古蹟修護意在保存古蹟的原味原貌，修護的精神在【看起來沒有修什麼！】，俾能彰顯古蹟歷史內涵，及群體聚落的生活記憶，與一般的建物修護是大大的不同。政府部門常常便宜行事，巧妙的避開文資法的規定，找來同一批學者做規劃及審查，而學者本身又兼開業建築師，等於裁判兼球員的雙重角色，造成商業利益矇蔽了，對古蹟修護應有的基礎準備與整體的規劃。也就是說，對古蹟【怎麼拆如何修？】都沒有交待清楚就施工了，如此，不夠確實規劃修護，不了解古蹟真正損壞的狀況，不深入研究傳統的工法與建材等等，因未列入考量而導致施工的錯誤，將使得古蹟的原貌永遠消失。更有自行變更設計造成重作的破壞，使得古蹟變成【被設計出來的古蹟】。【維修的破壞遠大於歲月的剝蝕】就是【老師府古蹟】當下的寫照。

【附件】實際施工影像記錄集



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

傅錫壬*

摘　要

〈奔流〉的作者王昶雄先生是淡水人，所以在淡水學第二屆國際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驛站風情中的鄉土情懷〉文中剖析了王先生對民族、國家、故鄉的濃郁情懷。卻對日本人統治本島時，本島人內心的苦悶與掙扎的描述著墨較少，於是我再一次詳細閱讀王先生的代表作〈奔流〉想對王先生的創作心態作更為周延的了解。

作者以「奔流」作為小說命題，無疑是具有揭示小說主題的作用的。雖然整篇小說中「奔流」一詞的出現僅一見（我就感覺難以形容的溫暖的血潮在體內奔流）但我們可以想見，在修辭的運用技巧上，凡是與「內心情緒的激動」相關的形容，都可以視之為「奔流」當我們檢視這條線索時，不難發現，「奔流」（或內心情緒的激動）它不僅是主題，也是故事情節推展的脈絡。那麼，「奔流」此一情結，又究竟如何產生的呢？它代表的是什麼現象呢？當我們將整篇小說中，引發作者情緒激動的情節依序臚列之後，很清楚的看出，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的殖民地文化模式，與臺灣固有傳統優質文化，發生了強烈的衝擊。作者王昶雄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曾接受兩種文化的薰陶者，當他面對兩種文化都是優質的時候，實在很難作「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取捨，因為處理文化的傳習，本來就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加之，作者對本島卻又有難以割捨的親情，對本島青年又有太高太多的期許，對內地（日本）也有不少的記憶與思念。所以這種衝突，根本是個無解的謎。甚至，作者在小說的結尾，也只能無奈的說：「我想膩了」。

作者將這樣一個解不開的謎，營造出小說中兩位重要的角色，伊東春生和林柏年，在性格的刻劃上，兩人正代表兩種不同文化傳承者；所以小中他倆的衝突是情節，而實際上正是兩種不同文化衝擊的面像。於是小說中其他的人物，無非都是在襯托此一主題而已。

關鍵詞： 王昶雄 奔流 文化 衝擊 伊東春生 林伯年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前　言

〈奔流〉的作者王昶雄先生是淡水人，所以在淡水學第二屆國際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驛站風情中的鄉土情懷〉，文中剖析了王先生對民族、國家、故鄉的濃郁情懷。卻對日本人統治本島時，本島人內心的苦悶與掙扎的描述著墨較少，於是我再一次詳細閱讀王先生的代表作〈奔流〉[1]，想對王先生的創作心態作更爲周延的了解。張恆豪[2]有一段如是的描寫：

> 這篇小說以日文寫於一九四二年仲秋，其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如荼如火推皇民化運動，迅雷飆風地發動太平洋戰爭，強徵臺灣志願兵遠赴南洋參戰的前夕。一九四三年七月，在日帝保安課的多方刁難下，〈奔流〉終於慘遭修改地刊載在張文環主編的《臺灣文學》雜誌上。〈奔流〉是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冷智地揭露皇民化運動對於臺灣人心靈的摧殘與破害的文學力作，在臺日五十一年的孽緣中，〈奔流〉不僅是篇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同時由於其犀利的人性剖析和嚴謹的藝術控制，作者以靜觀入微抽絲剝繭的自然主義技巧，對於被壓迫者的意識情結，有冷澈逼人的解剖呈露與檢驗，職是，它的意義已不祇是歷史的見證，在皇民化的夢魘飄逝四十載的今日，〈奔流〉已超越了時空的制限，成為臺灣新文學史上具有永恆價值的經典之作。

一、東京某良家女性----難以形容的溫暖的血潮在體內奔流

在這篇小說中，直接出現的「奔流」一詞，其實祇有一次，（我未睹該小說的日文原作，不知道是不是譯者的修辭技巧之故。）是作者回憶起在內地（日本）的十年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個女人。在作者的筆下，她應該就是「日本傳統文化美」的化身。他的描寫是：

> 東京某良家的一個女性的存在，我是不能忘懷的！我能了解插花與茶道，也能喜愛和服和高島田式髮髻，更能陶醉於能樂（日本特有的一種古典歌舞樂劇）與歌舞伎，完全是靠這個人培養起來的。圓圓的眼珠經常閃動著聰明的光芒，雖然有點好強而使人覺得冷漠的端整的臉龐，卻讓我感覺到溫暖的心情。滿頭密厚的黑髮盤成舒適的結、非常柔美的動作線條等，都對出生南方（臺灣）的我，投來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據說後來她做了插花的師匠，她就是透過插花，不斷地追求人生更深更深的那種死心踏地的生活方式，引發我激烈的懷念。

這段描寫無疑是王昶雄對日本傳統文化中，善美部分的肯定；「插花」、茶道」、和服和高島式的髮髻」以及「能樂與歌舞伎」，正是代表日本傳統文化以及立國精神的美德，而相對於這些美德，令人顫慄的就是「劍術與武士道」，它

[1] 〈奔流〉的文本見前衛出版社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　張恆豪主編 林鐘隆譯 王昶雄校訂。
[2] 見張恆豪〈反殖民的浪花---王昶雄及其代表作奔流〉一文。

同樣代表日本的立國精神，但也是它引發太平洋戰爭、將臺灣視爲殖民地的野心泉源。所以基本上王昶雄並不排斥日本文化，就在他嚮往日本文化的美善之面，而又厭惡其醜陋之一面之矛盾之衝突下，也益顯他對日本人以皇民化教育、殖民者心態對待本島人的痛心。所以他在愛恨交加中，使血液爲之「奔流」 於是小說中他對命題的第一次掌握，是這樣寫的：

> 予我心靈無限啟發的她，是我的老師、朋友，也是心目中的戀人。每碰上她的視線偶然向著自己時，我就感覺難以形容的溫暖的血潮在體內奔流。

於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王昶雄這篇小說所以以「奔流」命題，在字義上指「血液的沸騰、情緒的激動，一如浩浩蕩蕩的滾滾江水。」的情緒而言；在深層的意義上，正是代表有教養的本島人，在面對日本文化，善美與醜陋兩種力量同時進襲下的衝突與覺醒。

二、離別東京---熱熱的東西湧上心頭

在這種命題之下，我們不難在小說中看到，作者激動的情緒，正是貫穿整篇小說的重要脈絡。小說中一開始，是作者對自己住慣了十年的東京的回憶。他說：

> 「現在閉上眼睛，當夜的情景，還可以歷歷浮上腦際。像長蛇一般開往下關的夜車，九點離開了東京站，經過有樂町、新橋、品川、大森，街燈逐漸從視野消失時，簡直無法抑制，熱熱的東西湧上心頭。不全是離情的淒苦，而是自己一旦回到鄉里，不知何時再能踏到這首善之區（指東京）的心思，使我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

這段描寫正透露出作者內心矛盾的開始，也就是他對日本善美文化即將面臨鄉土文化沖擊的心中隱憂，他離開故鄉臺灣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所以他對自己文化的附著力，一時尚未建立信心，所以他「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 而文中「熱熱的東西湧上心頭」也正是所謂的「奔流」。

繼而作者回到了故鄉，也產生了信心。他說：「對好幾年沒見的故鄉風物，真正從心底感到很美，而鬆了一口氣。」但他對做一個樸實的鄉下醫生，是不能滿足的，畢竟在當時社會上，對能到日本學醫，是多麼大的期許與責任。於是作者又陷入內心的矛盾，他說：「今後如何求得刺激，這種不著邊際的思量，經常像煙炙似地在胸口冒湧、盪漾，把頹喪的心，帶向無限的遠方。」這「經常像燻炙似地在胸口冒湧、盪漾」的現象，也就是內心的激盪與「奔流」 ,其產生的背景，表面看是生活習慣的調適，而深入的剖析，而習慣的形成正是文化薰陶下的具象。

三、第一次遇見伊東----打心底湧起了歡喜

小說的發展中出現了兩個重要的人物，伊東春生和林柏年，其實作者在安排這兩個人的名字時是別具用心的。他們兩人都是本島人，伊東改用了日本姓，而

林則保留了本宗的姓，依東是一個強烈認同日本文化的年輕人，而林柏年則極力維護著中國人固有的孝道，所以他們的衝突，實際上作者也暗示了兩種文化的衝突；也正是當時本島人在被日本人統治下，代表絕大多數兩種類型的心態。然而作者在小說卻並沒有作出兩種文化孰優孰劣的擇抉或批判。就如同兩人的名字一樣，「春生」也罷，「柏年」也罷，都意謂著長久不衰，只是在當時，兩種文化的最大不同，「春生」是象徵日本文化的正當起步萌芽，而「柏年」又正是中華文化的悠久傳承。所以在整篇小說中作者自始至終，也沒有對伊東春生說出任何惡劣的批評。正因爲文化有各自不同民族性與傳承性。當作者第一次見到伊東時的描寫是這樣的：

> 「果然沒錯。」我露出了會心的微笑，並不是對自己的靈感未衰的慶幸，而是這個人的存在，彷彿與我有緣似的，雖有點奇異，但好像在追求明朗的思念似的漠然的歡喜。教授國文，以及其不膽怯的態度，有這樣的本島人在鄉里，使我的心有所依藉，打心底湧起了歡喜。

顯然在作者第一次遇見伊東時，不但對他沒有任何成見，而且是充滿期許與喜悅的，更把他視爲本島人的依藉。所以作者的感受是「打心底湧起了歡喜」這種情緒的激動，也是一種「奔流」，而「教授國文（指日文）」一語，也暗示著當時本島人努力學習日本文化，以力爭自己身份地位的苦心。在此段文字之前，作者是這樣寫著：『那個老師嗎？」柏年好像所等待的機會終於來到似地說。「他是本島人，太太卻是內地人（指日本）」，』也顯示了林柏年對這位有親戚關係的伊東沒有好感，作者已經很技巧地安排了伊東與柏年之間是存在著「心結」，也正是中日兩種文化的衝突。

四、伊東來訪----不可思議地搖撼靈魂的感覺

無疑的，伊東春生是這篇小說中的最重要人物，所以作者也用了相當多的文字與技巧來刻劃他。伊東首次的拜訪作者，就是一場很精彩的描寫。依東的個性與心態，可以從幾段對話中表露無遺，他與作者談到本島人的夢想時說：

> 「是嗎？不過人是需要夢的。人類的成長進化，是受那夢的鼓舞推進的。我們學校是專收本島人子弟的，他們並沒有懷抱太大的夢，直接了當的說，殖民地的劣根性經常低迷不散，很傷腦筋。」又說：「他的視野很窄，因為無法離開自我的世界去想東西，總是怯怯的，人都變小了。譬如說……」

這兩段話實際上本是作者對本島青年的批評，只是透過伊東的嘴說出來而已，所以當我讀這篇小說中，直覺的認知是，作者借著伊東和柏年二人的思想矛盾寫出自己對兩種文化衝擊的想法。當伊東強調日本文化精神時，又引發了作者情緒上強烈的震撼。

> 「伊東在說話時，眼角放出紅光，看來臉上的皮膚都發放著光輝似的。我在心中暗暗地想，這是比我所想的，更為奇特的人物。被他的硬幹態度吸

引住，我吞了一口口水。想想看吧，現在，在這裡，一個本島人娶了一個日本人為妻，言語、舉動，根本上完全變成了日本人。而他站在中學校的教壇，堂堂地教授國文。過去的人不敢祈望的，接觸到真正的某種東西，彷彿籠罩著知性的煙靄，變成了挖掘對方心臟一般的熱情的話，在感受性很強的中學生們心中，植下有如古代武士的精神。那是既跟喜悅不同，又不是什麼的，只是不可思議地搖撼靈魂的感情，也許可稱為一種感動的東西。」

作者在發現依東受日本文化影響之深時，那種莫名的喜悅就簡直像看到自己，所以作者的結語是「兩個人雖然今天才開始聊起來，卻簡直像十年的知己一樣。」

五、柏年失態----一種不知名的東西，湧上胸口

作者創造柏年這個角色，完全是爲了反襯伊東而設計的。在過年時節的一場餐聚中，作者挑弄出伊東內心的另一面像，這也正是柏年與伊東格格不入的癥結所在。年節的餐聚上共有五個人，作者，柏年，伊東夫婦和伊東的岳母。年節的團聚，在中國人的習俗中是何等被重視的傳統象徵。在豐盛的菜餚中有鯛魚、曬乾的青魚子、雞湯、油炸蝦等，柏年卻全不夾佳肴，只是默默地吃著燴年糕。也唯獨「燴年糕」是道道地地的中華料理。這種描寫已暗示出柏年對鄉土文化的維護與珍惜。熱鬧的氣氛，被突如其來的伊東親身母親的到訪而打破。作者對這位本島人的生母是這樣描寫的：「說話的人，彷彿是相當上了年紀的女人，從那笨拙的國語，立刻就可曉得，是本島人。不知為什麼，依東有點慌張地到大門口去了。」按常理判斷，既然是母親來了，應該高興還來不及呢！繼而母親又說：「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很久沒看到你們了，想來看看。春生啊，你爸爸最近忽然身體衰弱下來，經常口頭禪似地叫說，寂寞得沒辦法持續下去。偶而也去見見你的爸爸吧！」母親的口吻竟是如此的怯懦。作者最後的描述是：「這是用本島話說的。末尾的地方，竟成了抽泣聲，不能聽得很清楚。」而伊東的態度竟讓作者感到「那本島的女人是依東的生母。若是，依東為什麼這樣鄙夷自己的母親，而敬而遠之呢？」這個答案，從柏年的失態舉止中覓得了答案。當伊東支走了生母又唱起「伊那節」（日本長野縣伊那地方的民謠）時，柏年的情緒暴發了。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

可是，伊東唱到要完未完時，柏年像無法再忍受下去了似的說：「肚子疼得厲害，我先失禮，承您款待了。」柏年說著，忽然站起來，跳到大門去了。那氣勢，如果有人笨拙地想阻止的話，就一巴掌把對方打一個趔趄。柏年那種不逞的魂膽，使我茫然。但是，柏年對伊東在意識之一角，始終棲息著抗拒的心，我今天才體會出來。我不能不這樣勸阻：「柏年君！這樣對老師不是不禮貌嗎？」但是，伊東一邊用手勢制止我，一邊說：「別管他，別管他。」

這種尷尬的場面所激盪起的情緒波動，作者卻很巧妙地安排在一對日本母女的身

上加以處理。「一直沉默著的和服打扮的母親，閉著嘴咀嚼著。太太一直望著窗外，那好像專心在想什麼的表情，流動著一抹像是悲哀，又似淒涼難以捉摸的東西。」此時無聲勝有聲，母女兩人內心激動是更爲深刻的。其實她們也表現了在日本傳統文化薰陶下，女子的婉約與容忍。

當作者離開後，發現柏年還站在榕樹下，他的情緒已進乎崩潰。他帶著震顫的，低沉而激烈的聲音說：「依東春生，不，朱春生，他蹂躪自己身生的父母.....」在柏年訴說了一連串春生的不是之後，作者的心境是：「沉默寡言和體格不相襯的膽怯的柏年，在那裡會有這樣熱情的地方，簡直令人不可思議。柏年的激動固然不尋常，我的失望也相當大。一種不知名的東西，湧上胸口，站著的腰部有點靠不住似的。」所以會讓柏年如此失態，又讓作者如此驚悸，都在於伊東的對自己親身父母不孝，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百善孝爲先，這是何其嚴重的道德虧欠。

六、伊東生父之死----感覺到某種熱熱的東西在胸口冒湧著

伊東的生父朱良安死了 ，是宿疾糖尿病併發格魯布性的急性肺炎 。這個惡耗，依東並沒有通知作者，他是聽柏年說的，因爲朱良安臥病時，伊東只去探望過一次。在告別式的當天，作者沒能趕上台北參加，於是就近參加了本城近郊墓地的葬禮，在薄暮夕陽的映照下，葬禮的氣氛已經格外淒涼，這時作者寫到自己的心境是「我一邊往上爬，一邊感覺到，某種熱熱的東西在胸口冒湧著。」在葬禮進行中，作者特別留意伊東，他的描寫是：

> 穿麻衣的遺族所包圍著的棺柩右側，差著腿站著的依東的存在，立即吸引了眼睛。穿的是黑色洋裝，戴的是黑色腕章。大概由於心情的關係，臉上的光彩消失了，顯得很蒼白。身旁的太太穿著日式禮服，嚴肅地站著，雖然微俯著身子，眼角彷彿有一點紅著。女人們的號哭正在無止境延續著的時候，依東簡直忍無可忍似地，更歪起原已苦皺的臉，怒斥說：「不要再學那種不能看的做法啦！」

在這段文字中，可注意的不僅是伊東對葬禮的不耐，而他穿的喪服與當時台灣鄉間傳統的服飾是不類的 ，倒像是日本的禮節 。作者及時掌握住了場景反襯的效果。他運用鏡頭轉移到柏年的描繪上：

> 有一個趴在棺柩上不肯離開的老婆婆，是個瘦小的女人。長久以來忍耐又忍耐過來的壓縮的感情，忽然找到爆發點似的，如同像死者控訴，彷彿詛咒一切事物的自棄的哭聲，毫無節制地延續著。那是彷彿在那裡聽過的聲音。幾乎同時，我直覺地感到，是依東的母親。想像一個無人可依靠的悽慘的女人，好像胸口受到壓縮，我的心跌進苦悶中。但是次一瞬間把這個可憐的老婦人，保護似地帶開去的，卻不是伊東，而是穿著簡單麻衣的年輕人。他是柏年，哭的紅腫的眼睛，大大的眼珠在亮著，我幾乎有忍不住要叫他一聲「柏年」的衝動。

這段描寫中，穿著我國傳統喪服麻衣的柏 年，極盡對伊東母親保護及孝順的舉

止，在作者的刻意安排下，絕不是只在反襯伊東的不孝而已，實際上很明顯的還是兩種文化的衝突。

七、伊東棄母---有生以來不曾嘗到過的欲嘔的重壓

在葬禮結束後，又一幕殘酷的戲碼上演了，作者是這樣描寫的：

> 伊東的臉，在我看起來，是愈來愈悽慘。在行走中，伊東的的太太靠近走在前面的老太婆說：「媽！先到家去，然後再回去吧。」可是伊東說：「不，臺北的家還要收拾，早一點回去比較好，反正會去看的。」說著，就像拉著太太的手似地，很快地走下山去。我懷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但是，既不是夢，也不是別的什麼。當感覺那是世上深刻的現實時，我簡直想咬嘴唇。因為我感到，有生以來不曾嘗到過的欲嘔的重壓。我連看到那可憐老婆婆的身影，都會興起不忍之情。這時候，有個人打橫裡跳出來，叫著說：「姨母！跟我一道回去吧！」就去拉住老婆婆的手。那人便是柏年，他好像完全沒有感覺我的存在似的。那聲音看來很顯然只對著伊東的行動的反抗。也許嘴唇反映著燃燒的憤怒，便激烈的痙攣著，還傳到全身，震幅過大地顫抖著，在夕暮昏暗中，還是看得很清楚。對於易感的柏年，這無疑是相當大的衝激。我拖著沉重的腳，走下山去。雖然想叫柏年，但是，想一個人悄悄地思考，反省的心情，充滿了心胸。

當伊東竟做出了拒絕讓母親留在身邊侍奉的忤逆行爲時，作者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他用的是「當感覺那是世上深刻的現實時，我簡直想咬嘴唇。因為我感到，有生以來不曾嘗到過的欲嘔的重壓。」那麼嚴厲的詞彙。而仗義執言的又是柏年。作者又刻意安排伊東和柏年做了一次強烈的對比。此時作者對伊東在某些日本文化上的全盤接受，已經有了反省和非議。所以他對伊東的結語是：「伊東回到臺灣以後，還能把曾住在內地當時的，完全打扮成內地人的心態一直維持到現在。伊東這種作風和觀點，真不敢領教。即使如此，到底可否把父母當作墊腳石嗎？娶日本女人為妻的伊東，對日本岳父母孝是對的，但對生父母有所忤逆行為，是千不該萬不該的。」作者對伊東行爲的批評，正是站在我國固有的倫理觀念的立場。睹此一幕，作者竟「無法阻止淚水從眼睛滾落下來」，足見其內心的激動。

八、柏年苦練劍道----感覺到某種剛強生命的狂揚

本島青年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力爭上游，是格外令人感動的。在小說中，作者先以教務主任，擔任史地的田尻先生和伊東的對白來輕蔑他們，繼而才刻劃出青年們的努力。「選手們根本沒注意我們的談話。彷彿要打斷手腕，彷彿要喊啞聲音似地，揮劈著竹刀。我的眼角熱起來了（本島青年啊！）我在心中叫喊著。」作者雖然接受過很好的日本醫學教育，他也熱愛日本，但每當他看到本島青年在殖民地下掙扎時，他的民族感情熾烈的燃燒了起來。作者對這種環境的認知是：

「我們現在隨著歷史的成長，非學習我們自身的成長，使得到成長的結果不可。向山峰實實在在地一步一攀登吧，有時要能忍耐爬山路所蛻下來的腳步。對於我們茫茫的前途，一步的怠惰、頹廢都不許可。始終要以不屈的精神，把一切加以新的創造。」

在本島的青年中，柏年是個典型的代表，柏年靦腆卻不認輸的的性格，正是本島青年傳統文化下蘊育的一般面像。作者看著「柏年撫著手腕，很愉快地笑著。他那淺黑的肌膚滲出了汗水。我卻從那裡感覺到某種剛強生命的狂揚。」

九、紀元節當日，本島人贏了------無法抑制活活的血正在奔躍

紀元節是日本建國紀念日，二月十一日，也正是本島青年在劍道上贏了的日子，一如作者所說：

「那不是做夢，本島人終於把劍道，變成了自己的東西了。多半是心和技一致了，所謂能虛心坦懷地應戰的結果吧，或是激烈如噴火的鬥志，壓倒一切了吧。無論如何，優勝了。州下的稱霸，和全島的稱霸是一樣的。被欺侮為膽小如鼠的事，現在已成古老的故事了。現在就要吹滅卑屈的感情，本島年輕人正要開始飛躍了。我欣喜之餘，氣都喘不過來了。胸都無端地膨脹起來，無法抑制活活的血正在奔躍。」

本島青年贏一場劍道，真的那麼重要嗎？真的必要引發作者內心如此激昂慷慨的衝動嗎？我們不難看出，這正又是作者潛意識中，兩種文化的衝突。劍道是象徵日本人的立國精神，但本島人卻能把劍道變成了自己的東西，所以本島青年不再被欺侮爲膽小如鼠了。而贏的時機，又正好是日本建國紀念日的當天，所以作者的安排是極爲明顯又細膩的。但劍道既已成爲本島人的東西，並不意謂日本文化可以在本島立足生根了，兩種文化畢竟仍有其相異之處。所以作者又安排了一節伊東和柏年更火爆的衝突。情節是這樣的，比賽得了冠軍的第二天，中堅人物伊東在得意之餘，要邀柏年和作者一起到家中小聚，卻被柏年堅決的拒絕了。惱羞成怒的伊東追上去，抓住了柏年的衣襟，用強有力的手掌連續地向柏年的面頰飛過去。但是柏年並沒有想反抗，任他毆打。此時兩人的對話是：伊東說：「你真是個莽撞冒失的傢伙，那種開始腐化的精神，能有什麼用。」柏年立刻頂嘴：「老師才是那樣的。拋棄親生父母的心情，還能教育人嗎？」所以兩種文化衝突的根本是很難改變的。

十、訪柏年南投的家----我的眼眶禁不住熱昂起來

當藥局生告訴作者，大約在兩小時前柏年提著皮包來告別，作者因爲出診而未能見面，以致懊惱極了。引起了作者更想見這個年輕人的念頭，他決定前往柏年南投的家，沒想到當他抽空到了南投，柏年卻早兩天離開本島，到內地（指日本）去了。柏年的前往日本，對作者是相當大的震撼。作者此時的心境是：

「觸及這個老太婆衝口而出的樸訥的本島語背後流露的親情，我的眼眶禁不住熱昂起來。柏年的內地之行，是完全不曾預期的，這樣離開家，給父母的，是會湧起異樣的寂寞感的。為什麼不來跟我商量呢？」

作者也順勢更進一步描寫出，在日本人統治下，本島貧窮家庭的普遍想法，在當時一般我國傳統的想法，當然是希望子女都能榮宗耀祖，而在日本殖民地的統治下卻只有學醫一途，所以作者學醫，伊東也學醫，終究柏年遠離家去內地也是要學醫。作者雖然自己學醫，但他對這種想法是極端排斥的。他甚至說：

「但對於『望子成醫』的天下父母親的這種安逸的想法，真使人有不寒而慄之感。讓潛藏在一個年輕人身中的可能，充分的生長，這種沒有偏見的熱忱，不才是現代的父母親所應有的嗎？醫學萬能，絕不是對本島可喜的語辭。但是，遇到柏年的母親住視我的那種含著尖銳羨慕之意的眼神，我的精神就完全消沉下來了。」

其實，這種對學醫的偏見，是日本限制本島年輕人潛力發展的結果，不是本島年輕人的錯，更不是天下父母心的錯，是在異族強力壓制下的環境使然，所以甚至連作者最終思索也是消沉的。但是，當作者最後告辭時，仍不忘記要說：

「歐巴桑！本島人的前途並不限於醫業，今後的本島人，既可做官吏，也可以開拓藝術之道。所以如果抹殺了個人所具有的天賦能力，是非常可惜的。」

可見作者對本島年輕人的期許之深。而柏年正是一個典型本島青年的象徵。

十一、伊東的身世----忽然發覺自己的全身無端地熱起來

訪柏年的家鄉南投，也進一步了解了伊東的身世。原來伊東也是兩種文化衝突下的受害者。伊東的父親朱良安雖然是個商人，但他的先嚴卻是清朝的貢生，無疑是堂堂的書香世家。所以朱良安從小被灌輸四書五經，也養成了他不問世事的讀書人氣質，所以經商業績不理想，以致夫婦衝突頻頻。伊東又是獨生子，個性難免受到影響，對家庭的壓力一時無法忍受，公學校一畢業，馬上要求到內地（日本）去讀書，唯一的條件是要入醫學校。就在伊東日本受教育的階段，讓他變成了日本人的習性。對伊東的改變，作者是這樣描寫的：

「五年間，只回家一次，已經變得認不出來的體格壯健的青年了。怯弱的地方，一點也看不到痕跡了。更令人驚奇的是表現的態度，所使用的國語（指日本語）的腔調，跟內地人一點都沒有分別。對只能講很不流利國語的父母，或者對完全不會講國語的人，也很少說本島話。」

伊東的父母萬萬沒有想到，伊東對日本文化的愛好更甚於醫學，於是伊東更強烈的違背父母的意願而考上 B 大的國文系（指日文系） 所以伊東的剛愎性格就是在兩種文化長期衝突下形成。反觀於柏年此次前往內地（日本）的命運，不僅柏年的母親變得邊哭邊笑，露出茫然的眼神，即便袖手旁觀的作者「忽然發覺自己的全身無端地熱起來」，柏年會跟伊東有相同的遭遇與命運嗎？

十二、故鄉淡水----心靈中聯繫上某種悠久的東西以及人智不可及的偉大事物

當故事的發展已將近尾聲之際，作者的筆終於觸及到他的故鄉，一個廢棄的港灣淡水。在一切沉浸過後，作者發現淡水之美。他是這麼描寫著：

> 我坐在草坪上眺望港口，自己此刻所在的位置，和前方背後的山都是同樣的高度，周圍是名副其實的下界。憑虛御風不知所止---古人在文中寫得太好了。山巒、河流、對岸的村落、眼下市街的屋子重重疊疊，一切都在陽光下，籠罩在煙霧中，這樣反而叫人想到這廢港的風情之美。可以望見遙遠而荒涼地展開著的臺灣海峽，海的藍，溶入天空的藍，連吐出的氣息都會染上顏色似的。曾是臺灣長期間文化的發祥地、貿易港，盛名曾受謳歌的這個廢港，現在這樣靜靜地睡在充滿片片晚春色彩的大自然上的情狀，使我感覺，不可思議地在我的心靈中，聯繫上某種悠久的東西，以及人智不可及的偉大事物。接觸經常聳立著的山川草木，以及幾乎目眩的藍空的光輝，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有生命的東西存在的力量....

文中不僅流露出作者對故鄉淡水的溫馨感情，更重要的是他肯定了淡水在傳統文化上居有悠久發祥地的地位，作者對故鄉的愛是建立在不可言喻而又確確實實存在的文化認同之上。所以他說那是一種「使我感覺，不可思議地在我的心靈中，聯繫上某種悠久的東西，以及人智不可及的偉大事物。」當作者沉醉在對淡水的美景之際，很自然地他的思緒就會回到內地（日本） 他說：「內地冬情燒印在心裏的我，這才恍然大悟，因而忘掉了故鄉常夏的好。使我感覺對鄉土的愛心不夠。」不知不覺地兩種文化又在作者的心中激起了無限漣漪。

十三、我想膩了----撞上了風的稜角，更用力的一直跑

在整篇小說中，伊東畢竟是一個關鍵人物，其實，他就是兩種文化衝突下活生生的標本；也就是他才引起了作者內心的奔流，所以作者在故事結尾，仍對他做了蓋棺論定式的評述。

> 一直不曾覺得，從崗上俯瞰，伊東的頭髮，一根根彷彿數得出來似地映在眼中。我的心情彷彿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那樣，做了無法挽回的事情似的。三十才過了三、四的伊東的頭髮，白髮不是佔了三分之二以上了嗎？我頓時不能不想到伊東不為人知的心勞。線條看相當粗的，其不是相當細嗎？在伊東認為，要成為一個道地的內地人，是要鄉土的土臭完全去掉，為了這個連親生的親人也非踩越過去不可。在學校，或者在社會接受純日本化教育的年輕人，回到家門一步，就會被放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裏。這裏

有本島青年雙重生活的深刻苦惱。所以，要克服這種苦惱，向著單方面，從正面加以挑戰，並且非把它踩得粉碎不可。還有，在這個時代，我們為了求得牢固的既成陋習的獲得解放，而不顧死活的戰勝了它，下一個世代的我們的子女不就是可以自然地變成自己的東西嗎？也許伊東是為了拋棄俗臭沖天的父母而贖罪，才會在感覺上格外激烈，對不成熟的生活方式感到戰慄的本島青年，懷著粉身碎骨的獻身精神從事教育去吧。

這次作者觀察伊東的角度不再是站在對等的立場，而是超脫的，是「從崗上俯瞰」，自應有它的公平性，而且透視的更爲徹底。伊東對兩種文化衝突的處理態度，是採全盤積極的改革，更不惜忤逆親生父母，伊東的如此激烈做法是對嗎？畢竟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中，大多數人的想法是比較傳統的，至於傳統的想法就一定錯嗎？似乎作者也沒有辦法從小說的結束時，給我們讀者們一個可以依循的途徑，其實，這整個故事是在刻劃兩種文化的衝擊下，解不開的謎 。所以，最後作者說：「我想膩了！連想都不願意再想。」但是，他情緒的奔流，卻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他說：「從山崗上跑到山崗下，然後像小似地疾跑，跌了爬起來跑，滑了爬起來再跑，撞上了風的稜角，更用力的一直跑。」

結　語

作者以「奔流」作爲小說命題，無疑是具有揭示小說主題的作用的。雖然整篇小說中「奔流」一詞的出現僅一見（我就感覺難以形容的溫暖的血潮在體內奔流），但我們可以想見，在修辭的運用技巧上，凡是與「內心情緒的激動」相關的形容，都可以視之爲「奔流」。當我們檢視這條線索時，不難發現，「奔流」（或內心情緒的激動）它不僅是主題，也是故事情節推展的脈絡。那麼，「奔流」此一情結，又究竟如何產生的呢？它代表的是什麼現象呢？當我們將整篇小說中，引發作者情緒激動的情節依序臚列之後，很清楚的看出，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的殖民地文化模式，與臺灣固有傳統優質文化，發生了強烈的衝擊。作者王昶雄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曾接受兩種文化的薰陶者，當他面對兩種文化都是優質的時候，實在很難作「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取捨，因爲處理文化的傳習，本來就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加之，作者對本島卻又有難以割捨的親情，對本島青年又有太高太多的期許，對內地（日本）也有不少的記憶與思念。所以這種衝突，根本是個無解的謎。甚至，作者在小說的結尾，也只能無奈的說：「我想膩了」。

作者將這樣一個解不開的謎，營造出小說中兩位重要的角色，伊東春生和林柏年，在性格的刻劃上，兩人正代表兩種不同文化傳承者；所以小中他倆的衝突是情節，而實際上正是兩種不同文化衝擊的面像。於是小說中其他的人物，無非都是在襯托此一主題而已。

參考書目

1.王昶雄著、校訂，林鍾隆譯， 《奔流》 (台灣作家全集・翁鬧 巫永福 王昶雄 合集　張恆豪主編　前衛出版社　1991.2.1 初版一刷 2000.8.30 初版五刷）

2.張恆豪　反殖民的浪花----王昶雄及其代表作〈奔流〉 同前